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六卷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六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900 × 122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6\frac{3}{4}$ · 插页 9 · 字数 619,000

1961年8月第1版

1965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502 定价（四）2.90元

目 录

第六卷說明	XIII-XXXI
-------------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发表在“新萊茵报”上的文章**

一八四八年十一月

柏林的危机	5—6
昔日的公国	7—8
新的代表机构。——瑞士运动的成績	9—13
柏林的反革命	14—22
一	14
二	18
三	21
*卡芬雅克和六月革命	23
萊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	24
內閣在被告席上	25—26
声明	27
良心的懺悔	28—34
“科倫日报”	35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編者注

打倒捐稅!!!	36
艾希曼的命令	37—38
呼吁书.....	39
联邦法院的选举	40—42
市政府.....	43
呼吁书.....	44
評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內閣就拒絕納稅問題发布的 公告.....	45
檢察长和“新萊茵报”.....	46—47
柏林和科倫的檢察机关.....	48
法兰克福議會	49—50
*到处戒严	51
德意志中央政权和瑞士.....	52—62
曼托伊費尔和中央政权.....	63
德利加爾斯基——立法者、公民和共产主义者.....	64—69
*对“新萊茵报”提出的三个訴訟案	70—71
联邦委員會委員剪影.....	72—77
法兰克福委員會关于奧地利事件的报告	78—84
新聞數則.....	85—86
曼托伊費尔的机关报和約翰。——萊茵省和普魯士国王.....	87—88
意大利的革命运动	89—93
德国教授們的可耻行徑.....	94—95
十 二 月	
劳麦先生还活着	96

“反革命的第二阶段”	97
国民院	98—116
反革命政变	117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118—146
一	118
二	123
三	128
四	134
反革命的新同盟者	147—149
“新莱茵报”的诽谤	150
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判	151—161
一	151
二	157
普鲁士反革命和普鲁士法官	162—169
辟谣	170
新“神圣同盟”	171—172

一八四九年一月

革命运动	173—175
资产阶级的文件	176—180
合众国的预算和基督教德意志的预算	181—185
新年贺词	186—192
匈牙利的斗争	193—207
瑞士报刊	208—213
孟德斯鸠第五十六	214—231

一	214
二	225
普魯士逮捕科苏特的命令	232—233
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	234—246
一	234
二	241
巴黎状况	247—250
*巴黎局势	251—252

二 月

“科倫日报”論选举	253—257
康普豪森	258—261
“新萊茵报”审判案	262—285
馬克思的发言	262
恩格斯的发言	279
对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	286—306
馬克思的发言	286
拒絕納稅案	307—308
政治案件	309
*“科倫日报”的分工	310—315
拉薩尔	316—321
一	316
二	319
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	322—342
一	322
二	334

博德尔施文克及其伙伴治理下的普魯士財政	343—354
施泰因	355—356
“科倫日报”駐維也納記者	357—358
澤特	359—361
“科倫日报”論馬扎尔人的斗爭	362—368
羅馬宣布成立共和国	369
再論旧普魯士的財政	370—372
告密	373—374

三 月

御前演說	375—381
一	375
二	376
卢格	382—384
經濟狀況	385—390
英国士兵的誓言	391—393
三月同盟	394—396
維也納和法兰克福	397—400
*三个新法案	401—406
政府的挑衅	407—409
霍亨索倫王朝的总改革計劃	410—415
书报檢查	416—418
十亿	419—423
法兰克福三月同盟和“新萊茵报”	424—425
*第二議院的奏折草案	426—429

*三月十八日	430
*“新普魯士報”論三月十八日	431
霍亨索倫王朝的出版法案	432—440
一	432
二	437
柏林关于奏折問題的辯論	441—452
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戰爭	453—457
皮蒙特軍隊的失敗	458—460
一	458

四 月

皮蒙特軍隊的失敗	461—468
二	461
三	465
法兰西共和國的對外政策	469—470
*皇冠喜劇	471—472
僱傭勞動與資本	473—506
一	473
二	480
三	486
四	492
五	499
*政治流亡者的引渡	507—508
聲明	509
柏林第二議院四月十三日會議	510—514

俄国人	515—517
关于招贴法的辩论	518—530
一	518
二	524
拉薩尔	531—533
*第二議院的解散	534—535
*波茲南	536—539

五 月

柏林的反革命策划	540—542
拉薩尔	543—548
普魯士給法兰克福諸君的耳光	549—551
*解散	552
拉薩尔	553—558
萊茵省市政委员会代表大会被禁	559
萊茵各城市代表大会	560—561
*同盟中的第三者	562—563
他們要戒严	564—565
*普魯士軍隊和人民革命起义	566—567
*問工人	568
沙皇和他的藩臣們	569—570
霍亨索倫王朝的丰功偉績	571—575
*反革命的进攻和革命的发展	576—577
普魯士新宪法	578—579
杜塞尔多夫的血腥法律	580—581

貝爾格區的起義	582—583
*“科倫日報”賣身求榮	584
“十字報”	585
*普魯士給法蘭克福諸君的又一記耳光	586—587
新的軍法憲章	588—595
一	588
二	592
*愛北斐特	596—599
*“新萊茵報”被勒令停刊	600—603
*匈牙利	604—615
*“告我的人民”	616—618
致科倫工人	619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文章和文件

致“法蘭克福報”編輯部	623
弗·恩格斯。*普法爾茨和巴登的革命起義	624—626
卡·馬克思。六月十三日	627—629
卡·馬克思。致“新聞報”編輯	630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遺稿

卡·馬克思。工資	635—660
[A]	635
[B] 補充	636
I. 阿特金森	636

II. 卡莱尔	636
III. 麦克库洛赫	637
IV. 约翰·威德	637
V. 拜比吉	639
VI. 安得鲁·尤尔	639
VII. 罗西	639
[VIII.] 舍尔比利埃	640
[IX.] 布雷。儲蓄銀行	641
[C]	641
I. 生产力的提高对工资有什么影响?	641
II. 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竞争	643
III. 工人彼此之间的竞争	643
IV. 工资的波动	644
V. 最低工资	645
VI. 改善生活状况的建议	646
VII. 工人联合会	658
VIII. 雇佣劳动的积极方面	659
弗·恩格斯。*法国工人阶级和总统选举	661—667
弗·恩格斯。*蒲鲁东	668—672

附 录

卡尔·马克思	675
弗·恩格斯请求准许他居留伯尔尼的申请书	676—677
代表团晋见检察长茨魏费尔	678
关于法院侦查员侦讯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第二的通告	679
“新莱茵报”审判案	680

洛桑工人联合会給弗·恩格斯的委托书	681—682
“新萊茵报”1849年第一季度預訂通知	683—684
对“新萊茵报”的审判延期举行	685
德利加尔斯基对“新萊茵报”的控告	686
科倫工人联合会委员会1849年1月15日會議記錄摘要	687—688
“新萊茵报”被宣判无罪	689—690
对“新萊茵报”的两次审讯	691
民主宴会	692
二月二十四日的宴会	693—694
居尔岑尼希的宴会	695—696
科倫工人联合会1849年4月16日全体會議的決議	697
科倫工人联合会委员会1849年4月17日會議記錄摘要	698
科倫工人联合会第一分会的決議	699—701
科倫工人联合会1849年4月23日全体會議的決議	702
关于召开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通知	703—704
“新萊茵报”編輯們的命运	705
卡尔·馬克思离开科倫	706
“新萊茵报”审判案	707
通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命令	708
注釋	711—770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771—786
人名索引	787—818
期刊索引	819—823
譯后記	824

插 图

- 載有“內閣在被告席上”一文的“新萊茵報”号外的一頁26—27
- 載有卡·馬克思“資產階級和反革命”一文的“新萊茵報”
的一頁128—129
- 載有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科倫受审时发言全文的
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的扉頁.....263
- 1848—1849年的匈牙利地图604—605
- “新萊茵報”最后一号的一頁620—621
- 卡·馬克思的手稿“工資”的第一頁.....633

第六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收集了他們在1848年11月至1849年7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同第五卷一样，第六卷所包括的大部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民主运动中代表无产階級观点的唯一报纸——“新萊茵报”上发表的文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报”上用唯物主义辯证法分析了当时发生的事件，揭示了政治冲突的实质，认为它是尖銳階級斗争的一种表现，判定了政治舞台上階級力量的配置和对比，并据此拟定出无产階級在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不同阶段上的策略路綫。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論上概括了群众在革命时期的丰富經驗，发展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政治思想，进一步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的基本原理。

本卷开头的几篇文章是馬克思在普魯士发生尖銳的政治危机和策划反革命政变的情况下写成的。馬克思分析了逐漸低落的欧洲革命的进程，指出了反革命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把普魯士所策划的政变看作是欧洲悲剧的第三幕；第一幕是法国无产階級在六月的日子里的失敗，第二幕是1848年11月1日革命維也納的陷落。

馬克思力求通过“新萊茵报”向人民群众預告即将来临的决战，并教导他們准备回击反革命的进攻。在“柏林的危机”、“柏林

的反革命”以及其他文章中，馬克思闡明了 1848 年 11 月普魯士的政局，并证明王权和普魯士国民議會之間业已成熟的冲突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

馬克思要求普魯士国民議會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把大臣們作为国事犯加以逮捕，革除一切不服从国民議會決議的官員的职务，并宣布他們不受法律的保护。他提出拒絕納稅的口号，以便剝夺反革命政府反对人民的手段之一。馬克思认为，由于拒絕納稅而必然展开的运动，是激发群众革命毅力的手段，是革命新阶段的开始，在順利的情況下这个阶段的結局应当是推翻王权和人民取得彻底的胜利。

馬克思在萊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員會的呼吁书（見本卷第 24 頁）中号召各民主团体举行民众大会来鼓励居民拒絕納稅。在区域委員會的第一个呼吁书中，馬克思警告說不要用暴力手段抗拒納稅，以免在萊茵省发生孤立的和分散的起义。当普魯士国民議會本身通过了拒絕納稅的決議后，这一运动已开始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质的时候，馬克思在第二个呼吁书（見本卷第 39 頁）中号召用一切办法来反抗征稅，号召組織武装的民团以反击敌人，并成立安全委員會。馬克思认为安全委員會是临时革命政权机关的萌芽。它所頒布的命令应当看作是唯一合法的命令。这种革命政权机关应当代替三月革命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反动官僚机构。同仅仅号召消极反抗征稅的普魯士国民議會完全相反，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号召“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消极反抗应当以积极反抗为后盾。否則这种反抗就像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犢的反抗一样”。（見本卷第 38 頁）

馬克思在“新萊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和在民主主义者萊茵区

城委員會的呼吁书中，为全德国的民主主义者拟定了坚决大胆的行动綱領。这些文件对于研究馬克思在德国革命危机时期所采取的策略有巨大的意义。

但是，普魯士国民議會仅限于号召消极反抗；萊茵省所掀起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在普魯士其他省份沒有得到积极的支持。結果反革命获得了新的胜利：1848年12月5日普魯士国民議会被解散。馬克思在“反革命政变”一文中写道：“国民議会长期以来軟弱怯懦，現在它自食其果了。它曾听任反人民的阴谋活动在好几个月中从容地策划、加强和巩固，而現在它成了这种阴谋活动的第一个牺牲品。”（見本卷第117頁）

馬克思的“資產階級和反革命”、“孟德斯鳩第五十六”、“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康普豪森”等一系列文章，以及在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員會审訊中的发言，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分析了普魯士反革命获胜的原因；他揭示了德国三月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指出它与自己历史上的先驅者——十七世紀、十八世紀英国和法国的資產階級革命有本质上的不同。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建立了适合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的政治制度，而三月革命“只是改組了政治上层，而沒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檢察机关”。（見本卷第278頁）英国和法国的資產階級确实領導了革命运动，而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却不想通过革命而是想通过同王权达成和平協議的办法来取得政权。馬克思指出，康普豪森和汉澤曼在革命中采取的立場不能用这些政治活动家的个人品质来解釋，而應該用他們所代表的那个階級的物质利益来解釋。普魯士的資產階級由于害怕觉醒起来的无产阶级，不惜向旧社会势力作任何妥协。資產階級无论如何要保存“法制基础”，因此拒絕向封

建社会势力作坚决斗争，而把稍加改头换面的旧的地主官僚国家保存下来。由于害怕资产阶级所有制受到侵害，普鲁士资产阶级力求保存封建所有制，从而抛弃了它在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必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这样它便预决了自己的必然失败，而为反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馬克思在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审讯中的发言，揭露了声名狼藉的“法制基础”的真实含义，那就是企图把旧法律强加于通过革命来确立自己的法律的新社会。馬克思发展了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他证明说：与法学家的幻想相反，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旧的法律，就会造成社会危机，这种危机只有政治革命才能解决。

馬克思总结了半途而废的三月革命，证明坚持“法制基础”和臭名昭彰的“协商论”的必然结果，一定是尖锐的政治冲突。这个冲突果然于1848年11月在普鲁士爆发，而以12月5日的政变告终。

馬克思把王权同国民议会之间的这个冲突看作是两个国家政权的斗争，两个元首的斗争。但是，两个自主的政权不能同时并肩地在一个国家里行使权力。它们之间的斗争必须由物质力量来解决。馬克思揭示了这一斗争的深刻的阶级根源。他指出，这并不是同一个社会基础上的两个议会党团的政治冲突，而是两个社会的冲突，是具有政治形式的社会冲突。这是王权——旧的封建贵族社会的代表和国民议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之间的斗争。

馬克思駁斥了對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的控告，證明拒絕納稅是人民自然的和合法的自衛手段，人民有權用暴力還擊暴力。馬克思始終不渝地堅決捍衛人民的主權，捍衛人民進行革命的權利以及人民積極干預歷史進程的權利：“當國王實行反革命的時侯，人民完全有權利用革命來回答它。”（見本卷第 305 頁）

馬克思在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審訊中的發言，以及他和恩格斯在“新萊茵報”審訊中的發言，都是利用法庭來宣傳革命觀點，控告當局和揭露反革命計劃的光輝范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報”審訊中的發言，捍衛了革命報刊的權利，他們認為革命報刊的首要任務是破壞現存反動政治制度的全部基礎。

在普魯士反革命政變之後，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堅信自己的看法：歐洲革命的命運不決定於經濟落后的德國，只能決定於當時歐洲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法國和英國。

馬克思在“意大利的革命運動”、“革命運動”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考察了 1848 年歐洲革命和反革命所經歷的道路。馬克思一再回顧法國無產階級的六月失敗，這次失敗引起了無產階級的敵人——法國共和主義資產階級的失敗，在整個歐洲大陸上則引起了反對封建專制政體的資產階級和農民的失敗，并使曾經以爭取獨立的鬥爭來響應二月革命的各被壓迫民族遭到了新的奴役。所以馬克思強調指出，歐洲革命的命運同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的命運緊密結合在一起。

馬克思在總結歐洲革命時得出結論說：“1848 年革命運動的主要成果不是人民贏得了東西，而是他們失去了東西，——他們丟掉了幻想。”（見本卷第 162 頁）富於遐想、良好願望和華麗辭藻的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所有一切幻想，都被急劇的歷史進程和殘

酷的反革命无情地踐踏无遺了。馬克思号召人民要吸取反革命所提供的教訓，以便在将来的战斗中及时而大胆地运用这些教訓。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普魯士反革命政变之后所写的全部文章，都对胜利的法国无产階級革命的临近充滿了希望，因为这次革命会推动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革命高潮的出現。这个新的高潮，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那样，应当导致德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完成和向无产階級革命的轉变。关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序幕的思想，在馬克思主义奠基人根据 1848—1849 年革命經驗所制定的不断革命的理論中得到了发展。

馬克思认为資產階級英国是法国无产階級革命的主要敌人，因为資產階級英国“把許多民族变成自己的雇佣工人，并用自己的巨手来扼制整个世界”。当时馬克思认为，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而这次大战会給英国无产階級政党——宪章派的胜利起义創造条件。总结了 1848 年的欧洲革命的“革命运动”一文的結尾这样写道：“法国工人階級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就是 1849 年的前景。”（見本卷第 175 頁）

正如恩格斯后来所指出的，1848—1849 年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对欧洲革命前景的判断中，对欧洲大陆各国經濟发展的成熟程度作了某些过高的估計，由此得出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即将来临的論点。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把主要希望寄托于法国无产階級的革命主动性上，同时也密切注意欧洲其他国家的斗争进程。他們热烈支持被压迫民族爭取自由的斗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許多文章里捍卫波兰的独立，对波兰人民进行的解放斗争对欧洲民主的意义給予很高的評价。在“意大利的革命运动”、“羅馬宣布成立共和

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皮蒙特军队的失败”等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以深切的同情論述了意大利人民为自身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他们认为意大利人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皮蒙特王权的背叛政策。恩格斯写道：“对付政府的叛变和怯懦，只有一种手段：革命。”（見本卷第457頁）恩格斯說：意大利人民不應該只用正規軍来抵抗奧軍和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而應該掀起群众起义，开展革命战争、游击战争、真正的民族战争，以便永远消灭奥地利的压迫。

本卷有許多文章（“匈牙利的斗争”、“‘科倫日报’論馬扎尔人的斗争”、“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匈牙利”等）是論述匈牙利革命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以极大的同情关注匈牙利人民反对反动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斗争。恩格斯分析了匈牙利的軍事行动的进程，认为匈牙利革命领导人善于采取許多措施以保证农民支持革命的作法具有特殊意义。他还強調了匈牙利战争的人民性质和游击性质，并对科苏特政府所采取的坚决的革命的对敌斗争方法給以很高的评价。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民族問題看作是整個欧洲革命問題的一个組成部分。他們依据民族运动为谁的利益服务，以及它在客观上成为誰的工具，把民族分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他們把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归为革命的民族，因为这些民族的斗争削弱了当时欧洲几个主要的反动国家——俄国、普魯士和奥地利。1848年夏天，馬克思和恩格斯热烈关怀捷克的民族运动，特别是布拉格的起义。但是，在这次起义被镇压以后，反动的资产阶级地主分子在奥地利境内的斯拉夫民族的运动中占了上风；結果哈布斯堡王朝和俄国沙皇政府便利用了这些民族来镇压德国和匈牙利的革

命。由于这些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的内容和客观性质发生了变化，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些民族看作是反革命的民族。

列宁研究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1849 年对待民族問題的立場后，写道：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因为 1848 年無論从历史上或政治上來說，都有根据把民族分为‘反动的’民族和革命民主的民族。馬克思反对前者而拥护后者，这是对的。自决权是一种民主要求，它自然应当服从一般的民主利益。在 1848 年和以后的年代，这些一般利益首先就是同沙皇制度作斗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144 頁）

在“匈牙利的斗争”和“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这两篇文章中，恩格斯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想，既反对泛日耳曼主义，又反对泛斯拉夫主义。在恩格斯的 文章中，一方面对奥地利境内的許多斯拉夫民族的运动給予了正确的历史评价，把它看作是違反当时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利益的运动，但是另一方面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命运却作出了某些錯誤的論断。恩格斯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似乎这些民族在未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已不能起进步作用，似乎这些民族注定要遭到灭亡，而不能作为独立的民族存在。在这些文章中，还片面地把德国人征服許多斯拉夫民族的过程描繪成进步的，傳播文化和文明的过程。这种說法是同恩格斯自己在其他文章（見第 5 卷“法兰克福关于波兰問題的辯論”和本卷“波茲南”等文）中描繪的德国諸邦对东欧实行搶劫掠奪政策的情景相矛盾的。恩格斯关于奥地利帝国境内的各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前途的观点，是和他关于小民族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分不开的。恩格斯认为，以后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趋向是集中，这种发展进程会使这些弱小民族丧失自己的独立性，被大的、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的民族所并吞。恩格斯列举了苏格兰的盖尔人，法国的布列塔尼人，以及西班牙的巴斯克人作为例子。对于美国侵占墨西哥的部分领土，恩格斯也是从这个观点来评价的。但是恩格斯在估计弱小民族的命运时，并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除了集中的趋向外，还有另外一种趋向——弱小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它们建立自己国家的要求。恩格斯关于某些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作用的错误观点，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在1848—1849年间还处于开始阶段，弱小民族的民族运动的经验还比较少。同时还应当指出恩格斯文章中关于这些斯拉夫民族的命运的一些保留意见。“如果斯拉夫人在他们受压迫的某一个时期开始新的革命历史，那末他们仅用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自己是具有生命力的。从这个时候起，革命就会要求他们求得解放，而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局部利益就会在欧洲革命的更重要的利益面前消失。”（见本卷第334页）奥地利境内各斯拉夫民族在恩格斯写作这些文章之后的百年来的发展，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些民族的生命力和坚强性，他们已经争得了自由和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且胜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系统地深刻地阐明了欧洲各国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同时也极其重视对普鲁士反革命政变后的事件进程的分析。他们认为德国民主派的主要任务，是一步一步地捍卫自己在报刊、人民集会和议会中保留下来的阵地。

“三个新法案”、“霍亨索伦王朝的总改革计划”、“霍亨索伦王朝的出版法案”等三篇文章尖锐地批评了曼托伊费尔政府提出的各种法案，这些法案堪称为对1848年12月5日国王钦赐的畸形

宪法的补充，它們必然把国家引回到旧普魯士立法的宗法式野蛮状态。

恩格斯的“第二議院的奏折草案”、“柏林关于奏折問題的辯論”、“柏林第二議院四月十三日會議”、“关于招貼法的辯論”等文章，是为了批評普魯士議會第二議院的活动而写的。恩格斯分析了第二議院的辯論，憤慨地指出，第二議院的議員們，其中包括极左派的代表，不但沒有公开捍卫人民的民主权利，反而迎合議会的妥协迁就行为，节节让步。恩格斯譴責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首領，这些“議會讲台上的初出茅苖的騎士們”，說他們希图用議會的方法来达到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即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的东西。本卷中收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尖銳地批評了資產階級議會主义，并拟定了革命的議員在議會中的策略，其主要特点就是要把議會內的活动同議會外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地結合起来。

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1848—1849年的活动是同群众的革命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1848年春天，当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德国时，无产階級分离涣散，政治觉悟不高，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組織松懈，人数又少。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階級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积极参加資產階級革命，并站在民主运动的极左翼。根据这一策略，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参加了民主团体，他們在民主团体中坚决地捍卫了革命无产階級的立場，对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沒有作任何原則性的让步，指出了他們的不彻底性，推动他們采取坚决行动。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活动场所，除了“新萊茵报”和科倫民主协会而外，还有科倫工人联合会。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力求通过工人联合会来提高科倫和全萊茵省工人的階級觉悟和組

織性。

在革命进程中，德国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提高了，他們日益深刻地了解到本階級的目的，并摆脱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影响。斗争的經驗证明，在同反革命的决战中，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首領不可能是可靠的同盟者。由于情况的改变，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虽然在許多一般的政治問題（如普魯士議會第二議院的选举）上仍旧同民主派一起行动，但实际上他們在着手建立无产階級的独立政治組織。为了这个目的，他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改組和加强科倫工人联合会。这些措施是在反对哥特沙克及其拥护者的派別活动和分裂活动的激烈斗争中得到貫徹的。（見本卷附录“科倫工人联合会分会的決議”，第 699—701 頁）

1849年春天，由于德国階級斗争日趋尖銳，匈牙利进行着革命战争，法国革命运动开始进入高潮，因而更加迫切需要建立无产階級的独立組織。1849年4月14日，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在德国工人中最有觉悟的先进分子的支持下，退出了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从而在組織上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袖們断絕了关系。（見本卷第 509 頁）接着，他們所領導的科倫工人联合会通过了退出萊茵省各民主团体联合会以及同全德工人联合会总会建立联系的決議。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組織上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断絕了关系，但是以后在和共同敌人作斗争时并没有拒絕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一起行动。

三月革命发生一年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改变了策略，这是因为他們考虑到这个时期中德国階級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德国工人意識中的变化。德国工人意識中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萊茵报”促成的。“新萊茵报”愈来愈明显地表明它是革命无产階級的

机关报。

在“資產階級的文件”、“孟德斯鳩第五十六”、“‘科倫日報’論選舉”等文章中，馬克思用具体事实說明普魯士資產階級對待工人是極端殘酷无情的，揭露了他們假意討好無產階級的企圖，揭露他們在選舉前許下的要一舉解決“社會問題”的蠱惑性諾言。馬克思反對“科倫日報”關於“社會問題”的混亂論點時，揭示了這一問題的具体的階級性。他證明，雖然資產階級希望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投票擁護國王賞賜的憲法，但與資產階級的願望相反，這些階級所關心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國，因為這種國家形式能使他們有更大可能來保衛自己的利益。“全社會最激進、最民主的階級不正是這些階級嗎？特別革命的階級不正是無產階級嗎？”（見本卷第256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貫堅持的爭取統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國的口號，不僅意味着要消滅腐朽的政治制度形式和反動的地主階級的統治，同時也要用革命的方式解決德國的統一問題，即結束妨礙德國經濟和政治發展的長期的分散狀態。

像在以前所寫的許多論文中一樣，馬克思和恩格斯堅決反對在奧地利和普魯士這兩個封建君主國之一的領導下“自上而下”地統一德國的計劃（見“法蘭克福議會”一文）。同時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也反對德國南部小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想把德國變為瑞士式的聯邦共和國的企圖。

恩格斯在被迫居留瑞士期間所寫的文章中（“昔日的公國”、“新的代表機構。——瑞士運動的成績”、“聯邦法院的選舉”、“聯邦委員會委員剪影”、“國民院”、“瑞士報刊”等）描繪出了瑞士政治生活的真實圖景，當時瑞士以資產階級聯邦共和國的典範聞名，就

像比利时以資產階級君主國的典范著称一样。恩格斯強調指出了当时小市民的瑞士的政治生活中地方的、州的局限性，指出了瑞士大多数政治活动家的特点：满怀偏見、目光短淺、打小算盘和专重小节。

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批駁了把德国变成瑞士式的联邦共和国的小資產階級計劃，证明德国的社会經濟和政治发展的特点坚决要求消除国家的分散状态、割据現象和小邦林立的局面，要求建立統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

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強調，革命的德国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不仅要反对內部敌人，而且还要反对外部敌人，首先是反对欧洲反革命的基本力量，即資產階級的英国和封建专制的俄国。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俄国沙皇制度，把它看作是欧洲封建君主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不摧毁这个支柱，欧洲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德国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統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用革命方法統一德国的主要內部障碍是霍亨索倫王朝的反动普魯士君主制度，这是旧的、封建社会腐朽力量的堡垒。“霍亨索倫王朝的丰功偉績”、“普魯士新宪法”、“新的軍法宪章”、“告我的人民”及其他文章，以鮮明的笔調描述了执政的普魯士王朝靠掠夺、欺詐、暴力起家的历史，指出了它在窒息人民解放运动中所起的卑鄙作用。

統一德国道路上的另一个障碍是封建专制的奥地利。只要哈布斯堡帝国存在，就根本談不上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談不上在整个德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繼續批評了全德国民議会，因为它不仅不坚决消灭德国反革命势力，反而包庇纵容它。“法兰克福蛤蟆坑”的

議員們一味以庸俗教授的腔調空談德國人民的基本權利，同時却放棄人民歷來的基本權利——起義的權利（見“法蘭克福議會”、“法蘭克福委員會關於奧地利事件的報告”、“維也納和法蘭克福”、“普魯士給法蘭克福諸君的耳光”等文）。後來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總算制定了德意志帝國憲法，但這個憲法只不過是一紙空文，因為德國各邦君主不願意承認它。

1849年春天，在萊茵省和德國西部其他地區爆發了維護帝國憲法的人民起義。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覺得這個運動的目的有局限性，但還是給以支持。他們說明，這一運動之所以具有群眾性，是因為“每向統一德國邁進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在人民看來，都是朝着消滅小邦割據局面和免除不堪忍受的苛捐雜稅邁進一步”。（見本卷第550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報”上歡迎人民群众的日益壯闊的鬥爭，在這一鬥爭中工人起了顯著的作用。恩格斯積極參加了愛北斐特的起義。（見“愛北斐特”一文）

指導群眾革命鬥爭的“新萊茵報”的剛毅勇敢和毫不調和的立場一開始就引起普魯士政府和司法當局的殘酷迫害。他們對報紙編輯進行了一連串的審訊。但是，1849年2月7日對“新萊茵報”的審訊和1849年2月8日對萊茵區域委員會的審訊，結果都違反了普魯士政府的初衷。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揭露性的發言贏得了旁聽的公眾的熱烈歡迎，使得陪審法庭只好宣判他們無罪，也使“新萊茵報”編輯的聲譽大大提高。

普魯士政府並沒有放棄用各種方法迫使“新萊茵報”沉默的計劃。1849年5月萊茵省零散的起義失敗後，普魯士當局借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國籍而下令把他驅逐出普魯士。警察當局對馬克思及該報其他編輯的迫害，使“新萊茵報”在1849年5月19日停刊。

在用紅色油墨印的最后一号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總結了該报为革命事业而进行的光荣斗争，他們着力指出該报所特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难道六月革命的灵魂不就是我們报纸的灵魂嗎？”（見本卷第 602 頁）在“新萊茵报”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保卫德国人民的真正民族利益的事业有机地結合在一起。該报編輯部完全有权說：“我們拯救了我們祖国的革命荣誉。”

在“致科倫工人”的告別书中，該报編輯們宣称：“無論何时何地，他們的最后一句話始終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見本卷第 619 頁）

馬克思的两篇經濟著作——“雇佣劳动与資本”以及与这一著作有密切关系的手稿“工資”，在本卷中占特殊地位。

“雇佣劳动与資本”以社論的形式連續发表在 1849 年 4 月的“新萊茵报”上，它是根据 1847 年 12 月馬克思在布魯塞尔德国工人协会所作的演讲写成的。馬克思发表这一著作的目的，是为了論述构成資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經濟关系。他力求給无产阶级一个理論武器，使它能深刻而科学地了解，在資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阶级統治和工人的雇佣奴隶地位的基础是什么。在“哲学的貧困”中馬克思用論战的形式闡述了自己的經濟观点，与“哲学的貧困”一书不同，在“雇佣劳动与資本”中，馬克思的經濟观点是用系統的、通俗的、每一个工人都能懂得的形式闡述出来的。同“哲学的貧困”相比，“雇佣劳动与資本”表明馬克思在制定經濟学說方面前进了一步。

在“雇佣劳动与資本”这一著作中，馬克思揭露了以剝削雇佣工人的劳动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质。馬克思证明資本和雇佣劳动的存在是互相制約的，同时他尽力強調指出这两

种关系的对抗性。同勞資協調的鼓吹者截然相反，馬克思揭露出二者利益的根本对立性。馬克思历史地考察了所有的經濟范疇，給資本下了一个定义，說資本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見本卷第487頁）在这一著作中，馬克思繼續發揮了为制定剩余价值理論而提出的基本原理。他得出結論說，資本的增长、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机器的广泛使用，——所有这一切，結果都只会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剝削，使物质财富的生产者——雇佣工人阶级更加貧困。因此，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已經大体表述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相对和绝对貧困化的原理，这是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最重要的原理之一。

在本版中，“雇佣劳动与資本”这一著作是按其在“新萊茵报”上发表的原样刊印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馬克思当时对资产阶级政治經濟学还没有作彻底的批判。彻底的批判只是到五十年代末才完成。因此，在“雇佣劳动与資本”一书中有些用語和整个句子，从馬克思后来的著作的观点来看，是不确切的，甚至是不正确的。1891年为广大讀者出版这一著作时，恩格斯做了許多更改，这些更改在本版中都以脚注說明。恩格斯指出，这些更改归纳起来只有一点：凡是“雇佣劳动与資本”中原来是說工人向資本家出卖自己劳动的地方，恩格斯都改为出卖劳动力。恩格斯在說明这些更改的意义时写道，这里問題并不在于詞句，而在于經濟理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論点，古典政治經濟学就因为不了解这一点而陷入絕境。馬克思从这个絕境中找到了出路。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二卷序言中写道，馬克思证明，“劳动并没有价值，劳动是一种創造价值的活动，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如同重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热不

能有特殊的溫度，電不能有特殊的電流強度一樣。作為商品買賣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勞動力一旦成為商品，勞動力的價值也就要由體現在勞動力這種社會產品中的勞動來決定。這個價值就等於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參看馬克思“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23—24頁）勞動力這一商品具有一個特性，即它能創造價值，成為價值的泉源，而且是大于本身價值的價值的泉源。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被資本家攫為己有。馬克思在五十年代末制定了剩餘價值的學說，並在“資本論”中作了經典性的論證，從而揭露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

同“僱傭勞動與資本”密切相關的手稿“工資”，大概是馬克思在布魯塞爾所做的最後幾次演講的提綱。這篇手稿雖然不完整，而且馬克思不準備發表，但是仍然有很大的意義，因為它在很多地方補充了“僱傭勞動與資本”的內容。同時，恩格斯在1891年為“僱傭勞動與資本”寫的序言中所做的說明，也完全適用於這篇手稿。

在這篇手稿中，馬克思想察了生產力的提高對工資的影響，並且得出結論說：資本中用於機器和原料的份額的增長，要比用於工人生活費的份額的增長快得多。在這篇手稿中，馬克思雖然還沒有提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概念，但已經非常接近他以後所製定的關於資本有機構成的原理。馬克思得出結論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新生產力的任何發展，都成為反對工人的武器。

馬克思批判了目的在於引誘工人放棄階級鬥爭的各種改善工人狀況的計劃，例如：建立儲蓄銀行，實行生產教育以及馬爾薩斯人口論等，這些批判都有很大意義。馬爾薩斯硬說，按照自然規律，人口比生活資料增長得快，因此他主張實行節育，以減少工人

之間的競爭。馬克思異常重視揭露“十分愚蠢、卑鄙和虛偽”的馬爾薩斯學說，因為它把社會現象變成自然現象，把無產階級的貧困看作是它本身的罪過，並主張因此懲罰它。

在關於工人聯合會這一節中，馬克思把工人階級的這種聯合看作是為推翻舊社會、徹底解決其階級矛盾而訓練工人階級的一種手段。馬克思分析了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係，揭露了對工人的剝削，同時也強調了僱傭勞動和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沒有這些就不會創造出解放無產階級和建立新社會的物質資料，無產階級本身也就不會發展到有力量在舊社會中實行革命並使它自身革命化的程度。

本卷末尾刊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報”停刊後於1849年5月到7月間所寫的一些材料和文件。其中有两个給報紙編輯部的聲明，以及恩格斯的“普法爾茨和巴登的革命起義”一文和馬克思論述巴黎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發動失敗的文章——“六月十三日”。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遺稿”這部分中，除馬克思的手稿“工資”以外，還刊載了恩格斯當時沒有發表的關於法國1848年12月總統選舉前夕情況的兩篇論文，即“法國工人階級和總統選舉”和“蒲魯東”。

在本卷附錄中刊載了許多文件，這些文件反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實際革命活動和對廣大人民群眾鬥爭的領導。在這些文件中，有關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倫工人聯合會中的活動的材料，也有關於他們所參加的民主宴會的報道。附錄中還包括關於司法當局和警察當局迫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材料，這些材料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編輯“新萊茵報”的時候，在組織人民群眾並對他們進

行政治教育的时候的处境是艰苦而紧张的。

收入本卷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闡明在 1848—1849 年革命进程中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提出的理論和策略原理提供了大量資料。

* * *

在全集第五卷說明中已經指出，要确定“新莱茵报”上哪一篇文章是馬克思或恩格斯写的，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文章既沒有署名，作者本人提供的佐证又很少，同时手稿也找不到。此外，許多文章又有两人合写的迹象。当不能确定某篇文章是出自馬克思的手笔还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时，在篇末就不注明作者是誰。

当原文沒有标题而由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时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

本卷中收入了第一版沒有收入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五十六篇文章。其中有几篇的俄譯文曾在苏联的杂志上发表过。其余文章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这在文章后面的編輯說明中都注明了。刊載在附录的文件也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48年11月—1849年7月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发表在“新萊茵报”上的文章

1848年11月9日—1849年5月19日

柏林的危机¹

科倫 11 月 8 日。情况看起来很混乱，其实很简单。

正如“新普魯士报”² 正确指出的，国王有“继承的天賦”权利的“雄厚基础”。

而国民議會却沒有任何基础。它唯有建立基础才行。

两个元首！

他們之間的中間环节是康普豪森，是协商論³。

只要两个元首不能或者不想协商，他們就会变成两个互相敌对的元首。国王有权向国民議會挑战，国民議會也有权向国王挑战。誰的力量大，誰的权利就大。力量要受到斗争的考驗。斗争要受到胜利的考驗。两种势力只有用胜利才能证明自己的权利，失败只能說明自己沒有权利。

国王直到現在还不是宪制国王。他是一个专制君主，要不要立宪制度，由他决定。

国民議會直到現在还不是宪制議會，而是制宪議會。它一直在努力建立宪制。放棄不放棄自己的努力，由它决定。

两方面，国王方面和国民議會方面，暂时还只是容忍立宪的仪式。

国王不顾議會的大多数而要求成立合他心意的勃兰登堡內閣，这个要求是专制国王的要求。

議會要求直接通过代表团禁止国王成立勃兰登堡內閣，这个要求是专制議會的要求。

不論是国王还是国民議會，都違背了立宪協議。

不論是国王还是国民議會，都回到了自己最初的立場，不过国王是有意識的，而議會是无意識的。

优势在国王方面。

权利在力量方面。

沒有力量的方面只是空談权利。

洛貝尔图斯內閣会等于零，因为一正一負正好抵銷。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8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11 月 9 日“新萊茵报”
第 138 号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昔日的公国⁴

紐沙特尔共和国 11 月 7 日。你们一定也很喜欢听听有关一个小国的某些事情。这个国家直到不久以前还在享受普鲁士统治的恩惠，但在普鲁士国王所统治的一切国家中，它却是第一个高举起革命旗帜并赶走家长式的普鲁士政府的国家。我所谈的就是昔日的“諾恩堡-瓦連迪斯公国”⁵。在这里，現任內閣首相普富尔先生曾以省长的身分开始了自己最初的政治活动，而在今年 5 月，当他还没有在波茲南荣获桂冠，还没有在柏林的首相宝座上得到不信任投票的时候，就被人民革职了。现在，这个小国家享有 «République et Canton de Neuchâtel» [“紐沙特尔共和国和紐沙特尔州”] 的光荣称号，看来最后一个紐沙特尔近卫兵在柏林洗刷自己綠軍装的时候已經快到了。应当承认，使我感到有趣而愉快的是，在我逃出普鲁士神圣的埃尔曼达德⁶ 五个星期以后，我又可以在一个 de jure [按法律來說] 还屬於普鲁士的領土上漫游无阻了。

紐沙特尔共和国和紐沙特尔州的情况无疑比已經寿終正寢的諾恩堡-瓦連迪斯公国要好得多。从下述情况可以看出这一点：在不久以前举行的瑞士国民院的选举中，共和党的候选人得了六千多張选票，而保皇党，或者像此地称之为“貝都英”^① 的候选人只得了約九百張选票。被选入大会議的人几乎全都是共和党人，只有

① 貝都英——原意是沙漠中的阿拉伯游牧人，轉意是在沙漠中巡迴傳教的教士。——譯者注

一个由贵族统治的小山村勒庞才把昔日普鲁士国王属下的诺恩堡公国的国家枢密官卡拉姆作为自己的代表派到纽沙特尔去，这位卡拉姆在几天以前不得不在纽沙特尔宣誓效忠于共和国。在这个州的工业最发达、共和情绪最浓的第一大城市——拉绍德封，旧的王国的“纽沙特尔立宪主义者报”如今已被“纽沙特尔共和主义者报”⁷取而代之；后面这家报纸很不坏，虽然它是用瑞士汝拉山脉一带使用的极端蹩脚的法文出版的。

汝拉山脉的钟表工业和特拉韦尔斯塔尔区^①的花边业是这个小国家的主要生活来源，这两种行业的情况现在也日益好转。尽管这里的皑皑白雪达一英尺之厚，山中居民往日的欢乐和活力却逐渐苏醒。而“贝都英”现在则神色忧郁，四处流浪，徒劳无益地在自己的裤子、衬衫和帽子上标示出普鲁士的颜色，感慨万千地幻想着可敬的普富尔回来，盼望着开头写着 «Nous Frédéric-Guillaume par la grâce de Dieu»〔“朕，弗里德里希-威廉，受命于天”〕字样的法令重现。在这里，在汝拉山脉，在海拔三千五百英尺的高地上，就像在我们莱茵河地区一样，普鲁士的颜色、白边黑帽给人一种忧郁的感觉，引起猥亵的嘲笑；如果不是瑞士的国旗和写着 «République et Canton de Neuchâtel» 的巨幅招贴，你一定会以为是在自己家里。此外，我高兴地告诉你们：德国工人在纽沙特尔的革命中也像在1848年的各次革命中一样，起了决定性的、非常光荣的作用。因此贵族才那样切齿痛恨他们。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11月7日
载于1848年11月11日“新莱茵报”
第14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法国称作：瓦尔·德·特拉韦尔。——编者注

新的代表机构。——瑞士运动的成績

伯尔尼 11 月 9 日。前天，联邦的新立法机关——瑞士的国民院和联邦院 [Ständerat] 在这里聚会。伯尔尼城尽一切力量最隆重、最殷勤地迎接会议的召开。载歌载舞、庆祝游行、鸣钟放炮、张灯结彩，一切庆贺的仪式应有尽有。会议在同一天，即前天开幕。按人口比例（伯尔尼选派二十名議員，苏黎世选派十二名議員，最小的州选派两至三名議員）普选产生的国民院，絕大部分是由带有激进色彩的自由党人組成的。坚决的激进党拥有大量的当选证，而保守党在总共一百多張票中只占有六七票。联邦院（其中每个州有两名議員，每个半州有一名議員），按其成員和性质看来，它与最后一届联邦代表会议 [Tagsatzung] 几乎沒有任何区别。各旧州 [Urkantöni] 又选派了宗得崩德⁸的一些忠实信徒，同时由于間接选举的結果，反动分子虽然是极少数，但是他們在联邦院的代表仍然比在国民院多。一般說来，联邦院是由于廢除了絕对当选证⁹和承认半州有表决权而革新了的联邦代表会议；它被新組成的国民院排挤到次要地位。联邦院扮演着忘恩負义的上議院或貴族院的角色，扮演着同力求革新的（如所預料的那樣）国民院相对抗的角色，扮演着自己祖先卖弄聪明和謹小慎微的才能的继承人的角色。这个可敬的庄严的机关現在就已分担了它的伙伴的命运，它的伙伴中有两个目前依然健在，一个在英国，一个在美国，而第三个已

經在法国寿終正寢。联邦院还没有来得及显示出自己生命的标志，报刊就已经瞧不起它，而只报道国民院的情况。几乎没有一个人谈论联邦院，如果它使人们谈论它，那对它更加不妙。

国民院本来应该代表瑞士的全体“国民”，可是它的第一次会议就表明，如果说它不是狭隘的州精神的榜样，那无论如何也是道地的瑞士人争吵和打小算盘的典型。选举国民院的議長需要投三次票，尽管只有三个候选人有真正当选的机会，而且三个都是伯尔尼人。这就是奥克辛本、丰克和諾伊豪斯三位先生；前两位是伯尔尼老激进党人的代表，第三位则是半保守的老自由党的代表。最后，在九十三票中奥克辛本先生获得了五十票，以极微弱的多数当选。苏黎世人和其他的 moderados [温和派]¹⁰ 推举精明老练的諾伊豪斯来与奥克辛本先生相抗衡，这种情况还可以理解。但是，同奥克辛本属于同一派别的丰克先生却被提出来作为奥克辛本的竞选者，并且两次参加投票，这种情况说明他们的党是多么松弛涣散。不管怎样，由于奥克辛本的当选，激进党人在党派竞争的第一个回合中取得了胜利。在以后的副議长的选举中，直到第五次投票才获得了绝对的多數票！与此相反，庄严的、經驗丰富的联邦院在第一次投票中就几乎一致地选出苏黎世的 moderado 富勒尔为議長。这些选举已经充分地证明，两个議院的精神多么不一致，不久以后它们之間就会发生分歧和冲突。

爭論的另一个有趣的对象，将是关于联邦的首都問題。瑞士人关心这个問題，是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物质利益上同这个問題有关；而外国人对这个問題感到兴趣，是因为关于这个問題的爭論最能说明陈旧的乡土观念和各州的局限性消除到什么程度。伯尔尼、苏黎世和琉森竞争得最为激烈。伯尔尼想极力证明（虽然

徒劳无益)，苏黎世有了联邦大学就应当滿足，琉森有了联邦法院 [Bundesgericht] 就应当甘心。无論如何伯尔尼是唯一合适的城市，因为它是由瑞士德語区进入瑞士法語区的要道，因为它是最大州的首府，因为它正在成为整个瑞士运动的中心。显然，为了能起某种影响，伯尔尼也应当有大学和联邦法院。但您試一試向瑞士人讲清这个道理，您就会知道，每一个瑞士人都是本州首府的狂热的拥护者！很可能是这样：較激进的国民院将投票贊成激进的伯尔尼，而庄严的联邦院則投票贊成庄严而賢明的苏黎世。这样一来，的确不容易找到出路。

三个星期以来，日内瓦群情激昂。在国民院的选举中，那些因为拥有讲究的別墅而使日内瓦周圍的村庄几乎全都处于封建依屬关系下的反动貴族和資产者，在他們的农民的帮助下选出了所有三个候选人。但委员会宣布这次选举无效，因为收回的选票比发出的选票多。只有这样宣布选举无效才使圣約尔維的革命工人安靜下来，他們本来已經成群結队地在街头游行，并且高呼：«Aux armes!» [“拿起武器来！”] 工人在后来八天中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威胁性，使得資产者宁肯完全不参加投票，也不願挑起他們认为必然会带来災禍的革命；不仅如此，政府也威胁說，如果反动的候选人再次当选，它就辞职。与此同时，激进党人更动了自已的竞选名单，提出了几个比較温和的候选人，弥补了原来宣傳鼓动方面的缺点，所以在新的选举中获得了五千到五千五百張选票，几乎比反动派在前次选举中所得的票数多一千票。反动派的三个候选人几乎完全沒有得到选票。得票最多的是杜福尔將軍，他获得了一千五百票。八天之后，举行了大会議的选举。城市选出了四十四名激进党人，应当选出四十六名大会議議員的乡村选出的几乎全是反动

分子。“日內瓦評論”¹¹还在繼續同資產階級報紙爭論下面這個問題：当选的这四十六名議員全都是反动分子呢还是其中一部分将投票贊成激进党政府。这一点不久就会見分曉。日內瓦的情况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如果这里由人民直接选出的政府被迫辞职，那末在重新选举时就很容易发生像在重新选举国民院議員时发生过的那种情况，即将有一个激进党政府与大会議中反动派的多数相对峙。但是不容置疑，日內瓦的工人正在等待着有利时机，以使用新的革命来巩固目前已受到威胁的 1847 年的成果¹²。

总的說来，瑞士比四十年代初迈进了很大的一步。但是，任何一个階級的变化都不像工人階級那样显著。在資產階級中間，特别是在古老的貴族家庭中，几乎仍然完全籠罩着旧的狹隘的地方精神，最多只是采取了比較現代的形式，而瑞士的工人却有了巨大的进步。过去他們同德国人不相往来，荒謬地炫耀自己“自由瑞士”的民族傲慢，怨恨“外国坏蛋”，并且不参加当前的运动。現在，这一切都变了。自从劳动条件恶化以来，自从瑞士民主化以来，特别是自从像巴黎六月战斗和維也納十月战斗这样的欧洲革命和搏斗代替了微小的騷动以来，瑞士工人愈来愈多地参加了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他們开始把外国工人，特别是德国工人看作自己的弟兄，再不以自己的“自由瑞士精神”而妄自尊大了。在瑞士法語区以及在瑞士德語区的許多地方，德国人和操德語的瑞士人亲密无間地組成統一的工人联合会，同时，瑞士人占絕大多数的一些联合会决定同还在筹备中的以及一部分已經成立起来的德意志民主联合会的組織合并。官方瑞士的激进党人中最激进的分子最多只是在幻想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海尔維第共和国，而从瑞士工人那里却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意見：欧洲大風暴即将来临，小小瑞士的

全部独立自主精神很快就会見鬼！这些无产者在談这些“叛变”思想的时候，非常冷靜、淡漠，毫不惋惜！我所遇見的所有瑞士人都非常同情維也納的战士，而工人的这种同情則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关于国民院、联邦院、夫賴堡教会人士的騷动¹³，根本无人提起，可是关于維也納，人們从早到晚都在談論。人們会以为，像退尔¹⁴时代以前一样，維也納又成了瑞士人的首都，瑞士人又变成奧地利人了。傳說紛紜，人們对这些傳說爭論不休，怀疑它們，相信它們，再次駁斥它們，推測各种各样的可能，最后，当英雄的維也納工人和大学生在文迪施格雷茨的优势力量和野蛮进攻下遭到失敗的消息被证实时，在瑞士工人中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似乎在維也納决定了他們自己的命运，好像他們祖国的事业在那里遭到了失敗。当然，这种情緒还不能认为是普遍的，但它在瑞士无产階級中間已經日漸扩大。这种情緒在許多地方已占优势，对于像瑞士这样的国家來說，这种情况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1 月 9 日

載于 1848 年 11 月 15 日“新萊茵报”
第 14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柏林的反革命

一

科倫 11 月 11 日。普富尔內閣是一个“誤会”；它的真正涵义是勃兰登堡內閣。普富尔內閣仅仅是內容介紹，而勃兰登堡內閣才是內容本身。

勃兰登堡在議會，議会在勃兰登堡。¹⁵

这就是勃兰登堡家族的墓志銘！¹⁶

查理五世皇帝使人感到驚訝的是，他还在活着的时候就下令埋葬自己。¹⁷ 但是，在自己墓碑上写上恶作剧的笑話，这比查理五世及其刑律¹⁸ 要更胜一筹。

勃兰登堡在議會，議会在勃兰登堡！

有一次，普魯士的某个国王蒞临議會。他不是真正的勃兰登堡。但是，两天以前出席議会的勃兰登堡侯爵，却是真正的普魯士国王。

警备部在議會，議会在警备部！这就是說，勃兰登堡在議會，議会在勃兰登堡！

也許勃兰登堡中的議會(大家知道柏林是在勃兰登堡省內)会战胜……議會中的勃兰登堡吧？勃兰登堡会不会像从前卡佩特在另一个議會中寻求保护那样，也在議會中寻求保护呢？¹⁹

勃兰登堡在議會，議会在勃兰登堡——这是一个寓意多么深长、包含着多少事件的語涉双关的公式啊！

大家知道，人民对付国王比对付立法議會要容易得多。历史上有过許多次人民反对国民議会的毫无結果的行动。其中只有两次重大事件是例外。英国人民通过**克倫威尔驅散了长期国会**，而法国人民通过**波拿巴驅散了立法团**。但是，长期国会长期以来就已是僕从，立法团則早已是僵尸。

在反对立法議会的叛乱中，或許国王比人民取得了更多的胜利？

在这方面，**查理一世、詹姆斯二世、路易十六和查理十世**都是前輩中很少令人欣慰的人物。

不过，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倒有比較令人慰借的先例。而不久前在**維也納**呢？

不应忘記，在**維也納**召开过**民族代表大会**，除波兰人而外，**斯拉夫民族的代表**都公开投入皇帝的陣营²⁰。

維也納权奸与国会之間的战争同时也就是**斯拉夫**国会反对**德意志帝国国会**的战争。相反地，柏林議會中的分裂并不是**斯拉夫人**引起的，而是**奴隶**^①引起的，而奴隶并不是政党，最多不过是政党的僕从。临陣脫逃的柏林右派²¹并没有使敌人的陣营更为强大，反而使它染上了**背叛**这种不治之症。

在奥地利，**斯拉夫党**同权奸一起赢得了胜利，現在它将同权奸爭夺胜利的果实。如果柏林权奸取得胜利，它就用不着同**右派**分享胜利或者为保卫胜利而反对**右派**了；它将先給右派一点甜头，然

① 俏皮話：《Slaven》——“斯拉夫人”，《Sklaven》——“奴隶”。——編者注

后再踢他們一脚。

普魯士國王從自己的觀點出發，**理直氣壯地**以**專制國王**的身分與議會相對抗。但是議會却**沒有理直氣壯地**進行活動，沒有以**專制議會**的身分來與國王相對抗。本來議會首先應當通過**逮捕**大臣們的決定，因為他們是**國事犯**——**出賣人民主權的國事犯**。本來議會應當**驅逐**一切違抗議會命令而服從其他命令的官吏，並宣布他們**不受法律保護**。

然而，國民議會在柏林表現出來的**政治軟弱性**在**各個省里**可能會變成它的**市民力量**。

資產階級是很願意通過**友好的協商**把**封建王國**變成**資產階級王國**的。資產階級在剝奪了封建黨派的有辱資產階級尊嚴的徽志和封號以及和封建所有制相關聯的、破壞資產階級占有方式的收入之後，它是很願意同封建黨派結成聯盟並同它一起奴役人民的。但是舊官僚不甘淪為資產階級的奴僕，因為到目前為止，它一直是資產階級的專橫導師。封建黨派不願為資產階級犧牲自己的特權和利益。最後，國王把舊的封建社會（他作為這個社會的畸形產物而高踞於這個社會之上）的因素看作是**自己的真正的、和他有血緣關係的社會基礎**，而把資產階級看作是**異己的、人為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它只能凋萎。

資產階級把“**受命於天**”的非凡的權利變成**以文件作根據**的平凡的權利，把貴族血統的統治變成**一紙公文**的統治，把王國的太陽變成資產階級的星燈。

因此，王權沒有接受資產階級的花言巧語的勸說。國王用徹底的反革命回答了資產階級的不徹底的革命。他把資產階級推回**革命的懷抱**，推回**人民的懷抱**，因為他宣布說：

勃兰登堡在議會，議会在勃兰登堡。

我們承认，我們不期望从資產階級那里得到符合形势要求的答复，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应当指出，国王在起而反对国民議會时也采取了伪善的、不彻底的态度，就在他試圖拋棄宪法这个累贅的外罩的同时，又把自己的脑袋藏到这个外罩下面去了。

勃兰登堡在設法使德意志中央政权給他发出实行政变的命令。近卫軍团已遵照中央政权的命令开进了柏林。柏林的反革命是按照德意志中央政权的命令行动的。勃兰登堡命令法兰克福議會給他发出这样的命令。議会在正想确立自主权的时候放棄了自主权。不言而喻，巴塞爾曼先生便双手抓住这个机会，以主人的身分扮演奴僕的角色。而且他竟因为主人扮演奴僕的角色而感到愉快。

不管柏林将遭遇到怎样的命运，**二者必居其一：国王或者人民**，而人民高呼着“**勃兰登堡在議會，議会在勃兰登堡**”这个口号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也許我們还要經歷一場艰苦的鍛炼，但这場鍛炼将是**彻底革命**的准备。

二

科倫 11 月 11 日。歐洲革命在完成自己的循環過程。它開始于意大利，在巴黎具有了全歐性質，在維也納，我們聽到了二月革命的第一個反響，在柏林，我們又聽到了維也納革命的反響。在意大利，在那不勒斯，歐洲反革命實行了它的第一次打擊，在巴黎——在六月的日子裡——它具有了全歐性質，在維也納，我們聽到了六月反革命的第一個反響，在柏林，它正在完成，並丟自己的臉。高盧雄雞將會再一次從巴黎用自己的叫聲喚醒歐洲。²²

但是在柏林，反革命在丟自己的臉。在柏林，一切都是丟臉的，甚至連反革命也不例外。

在那不勒斯，流浪漢同王權聯合起來反對資產階級。

在巴黎，發生了史無前例的極其偉大的歷史戰鬥。資產階級同流浪漢聯合起來反對工人階級。

在維也納，有許多民族期望從反革命那裡獲得自己的解放。除此而外，還有資產階級反對工人和大学生軍團^①的陰謀詭計，市民自衛團內部的傾軋。最後，人民方面的攻擊給宮廷方面的攻擊提供了借口。

在柏林完全是另一回事。資產階級和人民站在一邊，下級軍官站在另一邊。

^① 大学生軍團由維也納大學學生組成，是市民軍事組織中最激進的一個組織。
——譯者注

弗兰格尔和勃兰登堡，两个沒有头脑、沒有心肝、沒有主見的人物，不折不扣的丘八——这就是怨天尤人、自作聪明和犹豫不决的国民議会的对立面。

意志——哪怕是馱的、牛的、丘八的意志！**意志**——这就是同三月革命中那些意志消沉的抱怨派对抗的唯一法宝。像国民議會一样沒有意志的普魯士宫廷，在君主国中找到了两个最愚蠢的人，并对这两只獅子說：你們作意志的代表吧。普富尔还稍微有一点头脑。但是，在**絕對愚蠢**面前，三月胜利的清談家們終於惶恐地退却了。

“对付愚蠢，連諸神也束手无策”²³，——

惊愕的国民議會这样感叹道。

这些弗兰格尔，这些勃兰登堡，这些笨蛋只会**希望**，因为他们沒有自己的意志，因为他们总希望別人給他們下命令，他們实在太愚蠢了，毫不怀疑別人用顫抖的声音和发抖的嘴唇給他們下的命令，——他們也使自己**大为丢臉**，因为他们沒有**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而这是这些**攻城槌**所能干的唯一的事情。

弗兰格尔只会声明他仅仅承认服从命令的国民議會！勃兰登堡正在学习議会的風度。他用粗野的令人厌恶的下級軍官的行話触怒了議會之后，对于“比暴君还暴虐的行为”听之任之，并且服从国民議会的命令，**卑躬屈膝地請求**允許他发表他剛剛想要发表的演說。

“我情願做羊身上的一只虱子，
不願做这种沒有头脑的勇士！”²⁴

柏林的沉着使我們感到高兴，使普魯士下級軍官的理想遭到

了破灭。

可是国民議會呢？为什么它不主張 *mise hors la loi*〔宣布不受法律保护〕呢？为什么它不宣布弗兰格尔之流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呢？为什么没有一个議員在弗兰格尔的刺刀丛中挺身而出，要求驅逐弗兰格尔，并向士兵們发表演說呢？

让柏林国民議會浏览一下“通报”²⁵——1789—1795年的“通报”吧！

在这个时候我們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們应当拒絕納稅。弗兰格尔或勃兰登堡之流都知道，——因为这些英雄好汉正在向黑格人²⁶学习阿拉伯語，——他們佩着軍刀，領取制服和俸祿。但是軍刀、制服和俸祿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点他們就不知道了。

要战胜王权只有一种办法，这种办法只有在即将于12月发生的反对巴黎六月革命的事件到来之前才存在²⁷。

王权不仅反对人民群众，而且也反对資產階級。

因此，要用資產階級的方式来战胜它。

怎样用資產階級的方式来战胜王权呢？

应当用飢餓来制服它。

怎样用飢餓来制服它呢？

应当拒絕納稅。

你們好好想一想吧！普魯士亲王們、勃兰登堡們、弗兰格尔們全都不生产士兵吃的糧食。只有你們，只有你們自己才生产士兵吃的糧食。

三

科倫 11 月 13 日。正像法国国民議会的議員有一次发现官方指定的开会場所被封閉了而不得不到**體育館**去繼續开会一样，普魯士国民議会也被迫迁到**靶場**开会去了。²⁸

本报今天早晨出版的号外上，刊載了一篇以◎为代号的本报駐柏林記者所写的关于在靶場通过的決議的报道。根据这个決議，**勃兰登堡**已被宣布为**国事犯**。“科倫日报”²⁹在报道中对这一点只字未提。

同时，我們剛剛收到了一位**国民議会议員**的一封信。現将信中的一段照抄如下：

国民議会一致（二百四十二票）宣布：由于这一措施（解散市民自卫团），勃兰登堡已把自己置于国事犯的地位，同时，每一个积极地或消极地促使上述措施付诸实现的人，都应視為国事犯。

杜蒙的报道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是众所周知的。

由于国民議会宣布勃兰登堡为国事犯，納稅的义务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誰也沒有义务向叛国政府納稅。明天，我們將詳細地告訴我們的讀者，在最古老的立宪国家——英国，在发生类似冲突时人們是如何拒絕納稅的³⁰。其实，叛国政府本身向人民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它已立即停止向国民議会納稅（停发議員的薪俸等等），以使用**飢餓**来制服它。

上述那位議員繼續写道：

“市民自卫团决不交出武器。”

因此，斗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萊茵省的职責就是赶快用人員和武器支援柏林国民議會。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11、13 日

載于 1848 年 11 月 12 日和 14 日

“新萊茵报”第 141 号、第 141 号

增刊和第 14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这組連載文章中的第三篇
的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卡芬雅克和六月革命³¹

艾·日拉丹为专制帝王中的白痴、“小警察”³² 路易-拿破侖辯护得很拙劣，但是对卡芬雅克，对馬拉斯特先生的这把利劍却攻击得很不錯。从 11 月 7 日起，日拉丹先生在报上連續刊載了一系列痛罵这位**欧洲资产阶级的英雄**的文章。欧洲资产阶级爱上了这位英雄的阿拉伯睡帽³³，但是为了欧洲小店主当今的偶像——“西彼赫薩拉尔”^① 耶拉契奇，他們照例背信棄义地牺牲了自己的英雄。

我們現在把“新聞报”³⁴的这份 acte d'accusation〔起訴书〕全文介紹給讀者。我們与欧洲所有的大小报纸不同，我們对六月革命的評价已为历史所证实。我們认为有时回顾一下六月革命的主要关键和主要人物是必要的，因为六月革命是欧洲革命和反革命所圍繞着旋轉的軸心。正如我們在六月革命爆发时所說的，离开六月革命，就是向要波及全欧洲的反革命的頂点靠近。回到六月革命去——这才是欧洲革命的真正开端。那末，我們就来看一下戒严的发明者卡芬雅克！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13 日

載于 1848 年 11 月 14 日“新萊茵报”
第 142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① 即总司令。——編者注

萊茵省民主主义者 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³⁵

呼 吁 书

科倫 11 月 14 日。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号召萊茵省各民主团体立即召开会议，并在附近各个地区举行民众大会，发动萊茵省全体居民拒绝納稅；这是反抗政府以暴力对待普魯士人民代表会议的最好办法。

必須劝告居民，叫他們不要用任何暴力反抗可能按行政方式进行的征稅；同时应该建議居民在强制出售财产的情况下不要进行交易。

为了討論今后必須采取的措施，区域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召开各民主团体代表会议，請各位代表于本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九时出席(地点：科米迪安街埃塞尔大厅)。

区域委员会代表：

卡尔·馬克思 施奈德尔第二

1848 年 11 月 14 日于科倫

載于 1848 年 11 月 15 日
“新萊茵报”第 14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內閣在被告席上

勃兰登堡城根本不想知道勃兰登堡內閣，它向国民議會发出一封致謝书。

全国各地在自己的致意书中都只承认国民議会的权力。

內閣在犯新的叛国罪行，它破坏 *Habeas Corpus Act*³⁶，未經国民議會同意即擅自宣布戒严，并用武力从靶場驅散国民議會。

国民議会的会址是在人民群众中，而不是在什么由大块石头砌成的建筑物中。如果它被趕出柏林，它将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开会，在布勒斯劳^①，科倫或者它认为适当的其他城市。它在13日的會議上已經通过了这样的決議。

柏林人嘲笑戒严，他們根本不打算服从它。沒有一個人会放下武器。

武装起来的人們从各个地方赶来援助国民議會。

近卫軍拒絕服从命令。士兵們愈来愈經常地同人民举行联欢。

起义已席卷了西里西亚和图林根。

公民們，我們号召你們捐款給柏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相反地，不要向反革命政府繳納任何賦稅。国民議會曾經声明，拒絕納稅是有法律根据的。只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作出相应的决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編者注

議，因为它顾全官吏們的利益。饥饿疗法将教会这些官吏尊重公民的力量，将使他們成为好公民。

迫使敌人挨餓吧，不要納稅！向叛国政府提供各种反人民的手段是最愚蠢不过的了，而一切手段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金錢。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15 日

載于 1848 年 11 月 15 日“新萊茵报”
第 143 号号外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Extra-Blatt

zu Nr. 143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Wittmoed, den 15. November.

Das Ministerium ist in Auflagezustand versetzt.

Die Stadt Brandenburg will nichts wissen von dem Ministerium Brandenburg und schiekt eine Dank-Adresse an die Nationalversammlung.

Das ganze Land erkennt in seinen Adressen nur die Regierung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an.

Das Ministerium begeht neuen Hochverrath, indem es im Gegensatz zu dem Habeas-Corpus-Act ohne Genehmigung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den Belagerungszustand ausgesprochen und die Nationalversammlung selbst mit Bajonetten aus dem Schützenhause vertrieben hat.

Die Nationalversammlung hat ihren Sitz im Volke, nicht in dem Umkreis dieser oder jener Steinhausen. Vertriebt man sie aus Berlin, so wird sie in einem andern Dreie tagen, in Breslau, Köln oder wo es ihr qudünkt. Sie hat in ihrer Sitzung vom 13. diesen Beschluß gefaßt.

Die Berliner weigern sich über den Belagerungszustand und lassen sich in keiner Weise durch denselben einschränken. Niemand liefert die Waffen ab.

Von verschiedenen Gegenden sind Deputirte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zur Hilfe geeilt.

Die Gardes verweigern den Gehorsam. Die Soldaten fraternisiren immer mehr mit dem Volke.

Schlesien und Thüringen sind in vollem Aufstande.

Wir aber, Bürger, rufen euch zu: Schickt Geld dem demokratischen Centralausschuß nach Berlin. Zahlt dagegen keine Steuern an die conservativ-liberale Regierung. Die National-Versammlung hat erklärt, daß die Steuerverweigerung rechtlich begründet sei. Sie hat sie noch nicht beschossen aus Mitleid für die Beamten. Die **Hungerkur** wird diese Beamten die Macht des Bürgers kennen lehren, und sie selbst zu guten Bürgern machen.

Hungert den Feind aus und verweigert die Steuern! Nichts überdies als einer hochverrätherischen Regierung Mittel zum Kampfe gegen die Nation zu bieten und das Mittel aller Mittel ist — Geld.

Das Vaterland in Gefahr.

Heute Mittwoch den 15. November Mittags halb 1 Uhr

Versammlung

der Landwehrmänner und Reservisten aller Waffengattungen einschließlich deren Offiziere im Eiser'schen Saale.

Der Organ: Revue

Druck J. B. Drey, unter Postamt 17.

载有“内阁在被告席上”一文的“新莱茵报”号外的一页

声 明

科倫 11 月 16 日。11 月 16 日“科倫日報”把“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的呼喚書”和似乎由普魯士國民議會極左派在各省散發的關於拒絕納稅的“保證性的聲明”莫名其妙地聯繫在一起。我們對於極左派散佈的國民議會已作出拒絕納稅的決定的消息毫無所聞，特此聲明。

卡·馬克思 施奈德爾第二

寫於 1848 年 11 月 16 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48 年 11 月 17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 145 號

良心的懺悔³⁷

科倫 11 月 16 日。我們曾向右派預言，如果权奸获胜，等待着他們的将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先給他們一点甜头，然后再踢他們一脚^①。

我們弄錯了。斗争的勝負还未見分曉，他們就已經挨到了自己的主子的脚踢，而什么甜头都沒有尝到。

“新普魯士报”——“天佑吾王，天佑吾国”的“后备軍十字騎士”³⁸，目前当权者的官方机关报——在最近几天的某一号上，把議員茨魏費尔(科倫檢察长)和議員施林克(科倫上訴法院参事)称为——讀者，你猜猜看称为什么？——“革命之腹 [Magen]” (在“新普魯士报”上写的是：«Mägen»)。它談到了这两位先生的“难以形容的思想貧乏和言行輕率”。它发现甚至“罗伯斯比尔的囁語”也比这两位“中央机构的先生們”的幻想高超得多。Avis à Mess. Zweifel et Schlink! [特此通知茨魏費尔和施林克两位先生!]

在該报的同一号上，品托-汉澤曼³⁹被宣布为“极左派的領袖”，而这家报纸知道，对付极左派的領袖只有一种手段——战地法庭、絞索。Avis à M. Pinto-Hanseemann [特此通知品托-汉澤曼先生]，前任行动和警察大臣⁴⁰!

① 見本卷第 15—16 頁。——編者注

作为政府通报，“新普魯士报”实在太天真、太坦率了。它过于响亮地向各种党派泄露了 *santa casa*⁴¹ 的记录簿中秘而不宣的东西。

在中世紀，人們想要預見未來，就向味吉爾^①請教。在1848年普魯士霧月期間，人們为了不致因預見未來而絞盡腦汁，就向“新普魯士报”請教。我們不妨舉幾個新的例子。權奸給天主教徒准備了些什么東西呢？

請听吧！

在“新普魯士报”第115号上这样写道：

“认为国家〈即普魯士王国，三月时期以前的后备軍十字国家〉^②仿佛具有狭隘的教会性质，并从这种片面观点出发来领导宗教事务，这同样是不正确的。的确，这种指責如果是公正的話，那无疑会是一种贊揚。但它是不公正的，因为大家知道，我們政府已明确表示放棄旧的合乎福音的管理方式的良好立場。”

大家知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曾把宗教变成軍紀的一个部門，并用警棍来开导非国教徒。大家知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作为十二小先知之一，想通过艾希霍恩-博德尔施文克-拉登堡內閣用暴力使人民和科学皈依本生的宗教。大家知道，甚至在康普豪森內閣时期，波兰人还是照样被掠奪、被燒死、被鞭笞，不只因为他們是波兰人，同时还因为他們是天主教徒。波美拉尼亚人总是认为，应当用軍刀刺穿波兰的圣母像并且絞死天主教神甫。

① 味吉爾是古羅馬詩人，他的詩歌中蘊藏著無比豐富的智慧，人們用他的詩來測定吉凶。——譯者注

②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內的話或標點符號等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譯者注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期，迫害反对国教的新教徒的事实也是尽人皆知的。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把那些拒不接受他本人所发明的祈禱仪式和教义的新教牧师关进要塞。这位大人物是軍装和祈禱仪式的偉大发明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呢？艾希霍恩內閣呢？只要提一下艾希霍恩內閣就够了。

但是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

“我們政府已明确表示放棄旧的合乎福音的管理方式的良好立場。”

那末，萊茵省、威斯特伐里亚和西里西亚的天主教徒們，等着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复辟吧！过去別人用樹条抽打你們，今后将用蠅尾鞭抽打你們。你們將**“明确地”**認識到**“旧的合乎福音的管理方式的良好立場”**！

我們更不用說**犹太人**了，从他們的教派解放以来，他們，至少是他們的上层人物，到处都成了反革命的急先鋒。他們会有什么好結果呢？

等不到胜利，就会把他們扔回犹太人区去的。

在勃罗姆堡^①，政府对犹太人恢复了限制迁徙自由的旧規章，从而剝夺了犹太人享受 1789 年宣布的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从一个地方自由迁往另一个地方的权利。

这就是在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拉登堡庇护下的饒舌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績的“一个”方面。

11月11日的“新普魯士报”侈談物质福利，以誘惑“自由立宪

① 波兰称作：貝德哥什。——編者注

党”。然而就在当时，在談到立宪主义者的时候，它已經忧心忡忡地摇头不已。

“直到現在，我們的立宪主义者还非常害怕在他們的俱乐部和公众机关公开承认自己是反动派。”

但是，該报又立即以安慰的口气中肯地补充說：

“每一个人〈自由立宪主义者〉私下早就不再隱瞞：現在，唯一的生路就是合法的反动”，——

也就是把法律变成反动的，或者把反动派变成合法的，以便把反动奉为法律。

11月15日的“新普魯士报”对“立宪主义者”已經不再讲什么客气了，因为他們已打算把反动奉为法律，但是他們不肯接受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內閣，因为后者想 sans phrase〔露骨地〕进行反革命。

該报写道：“应当让普通立宪主义者听任自己命运的摆布！”

一同被捕，也一同上絞架！

特此通知普通立宪主义者！

在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拉登堡庇护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特殊立宪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官方的政府机关报，“天佑吾王，天佑吾国”的“后备軍十字騎士”一語道破了特殊立宪主义的奥秘。

“最简单、最直接、最保险的特效药”，当然是“把議会迁到另一个地方去”——从首都迁到兵营里去，从柏林迁到勃兰登堡去。

但是，正像“新普魯士报”无意中透露的那样，这种迁移会址的作法只不过是一种“試驗”。

“新普魯士報”說：“应当試驗一下，議會在遷到另一個地方以後，是否不僅可以恢復外在的行動自由，而且還可以恢復內在的自由。”

在勃蘭登堡，議會將有外在的自由。在那里，它不再受工作服的影響，而只是受大胡子長佩刀的影響^①。

而內在的自由呢？

議會在勃蘭登堡是否能擺脫十九世紀的偏見和有害的革命情緒而自由呢？它的心灵是否會變得如此自由，以致可以把封建的狩獵權和其他一大堆腐朽的封建義務、等級差別、書報檢查、捐稅不均、貴族特權、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熱中的專制王權和死刑，以及把

“那些外表上像有着
慈愛、希望和信仰的蒼白的惡漢”⁴²，——

即貪得無厭的容克地主、近衛軍中尉和鑽營奔走之徒對國民勞動的盜竊和揮霍等等，——把所有這些舊時恥辱的標志重新宣布為正式的信仰象徵，即使在勃蘭登堡，國民議會是否有足夠的內在的自由來做到這一點呢？

大家知道，反革命政黨曾宣布過一個憲政口號：“完成制憲工作！”

勃蘭登堡—曼托伊費爾—拉登堡內閣的機關報不願意再戴這個假面具了！

這家官方的機關報承認：“事態已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以致現在即使是如此殷切期待完成的制憲工作，對我們說來也無濟於事了。因為誰也不能再隱瞞：投意人民代表提出的，並且在拷問台和絞刑架的威脅下由這些代表用強

^① 工作服指穿工作服的勞工，同時也指革命者；大胡子長佩刀指警察。——譯者注

力逐条逐款地从国王那里夺来的文件，只有当它得到最粗野的暴力的保护的时候，才能被认为是**有约束力的**。”

于是，重新**逐条逐款地取消**柏林国民议会所争得的一点点人民的权利，就成了勃兰登堡国民议会的任务！

如果它不能**逐条逐款地彻底恢复**全部旧的废物，那末这就证明：即使它在勃兰登堡获得了“**外在的行动自由**”，它也还是没有恢复波茨坦所期望的**内在的自由**。

政府究竟应当怎样来反对灵魂上的痼疾，反对迁到勃兰登堡去的议会的**内在的不自由**呢？

“应当解散它！”——“**新普鲁士报**”这样喊道。

但是，**人民**——它忽然想到，——也许比议会更**没有内在的自由**吧！

它耸了耸肩说：“令人担心的是，新的初选是否会产生比上次选举更悲惨的结果呢？”

人民在初选中享有**外在的行动自由**。但是**内在的自由**怎么样呢？

That is the question! [问题就在这儿!]^①

要知道，新的初选产生的议会制定的条款可能比旧的条款更富有叛乱性。

那末，怎样着手反对“旧的”条款呢？

“后备军十字骑士”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

“拳头产生了它们（3月19日以后制订的旧条款），拳头也将以上帝和法律的名义消灭它们。”

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编者注

拳头将恢复“旧的良好管理方式”。

拳头是国王的最后論据，**拳头**也将是人民的最后論据。

让人民首先好好保护自己，不要受到貪得无饜的拳头的打击，这种拳头正从人民的口袋里掏出皇室費和……大炮。只要人民不再喂养这种耀武揚威的拳头，它馬上就会干癟。让人民首先拒絕納稅，然后再来数一数，看哪一边的**拳头多**。

一切所謂三月的成果，只有在能够得到最粗野的暴力的保护的时候，才能被认为是**有約束力的**。**拳头**产生了它們，**拳头**也将消灭它們。

“**新普魯士报**”就是这样說的，“**新普魯士报**”所說的話也就是波茨坦所說的話。因此，丢掉幻想！**人民应当肅清三月的妥协，否則，国王就要肅清人民。**

卡·馬克思写于1848年11月16日
載于1848年11月17日“**新萊茵报**”
第14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科倫日報”

科倫 11 月 16 日。“科倫日報”編輯部在 11 月 16 日的該報上登了一段絕妙的自白：

“我們今天害怕无政府状态，明天又害怕反动派，在这种經常搖擺不定的情況下，使人不禁想起了路德的一句話：‘人就像喝醉了的农夫，从这边爬上馬背，又从那边摔下去。’”

恐惧——这就是“科倫日報”的激情。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16 日
載于 1848 年 11 月 17 日“新萊茵報”
第 14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打倒捐稅!!!

科倫 11 月 16 日。今天除了“普魯士國家通報”、“福斯報”⁴³和“新普魯士報”以外，柏林的其他報紙都沒有收到。

市民自衛團在“樞密官區”⁴⁴被解除了武裝，但只是在這一個區。這裡指的是 10 月 31 日陰險地槍殺機器製造工人的那一個營⁴⁵。解除這個營的武裝是有利於人民事業的。

國民議會又被用武力趕出科恩市政廳⁴⁶。在這以後，議員們都轉移到了米連茨旅館，在那裡，他們終於以二百二十六票一致通過一項關於拒絕納稅的決議：

“在國民議會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繼續開會以前，勃蘭登堡內閣無權動用國家資金和徵稅。

本決議自 11 月 17 日起生效。

國民議會，11 月 15 日”

因此，從今天起捐稅就廢除了!!! 納稅是叛國行為，拒絕納稅是公民的首要職責!

卡·馬克思寫於 1848 年 11 月 16 日

載於 1848 年 11 月 17 日“新萊茵報”

第 145 號特別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艾希曼的命令

科倫 11 月 18 日。

众所周知的拒絕納稅的号召，使我有責任为此向我受委托管轄的萊茵省提出严重警告。

在国王正式闡明了把国民議會迁出柏林的有力理由以后，在大部分議員都承认了国王的权力，而德意志国民議會和法兰克福中央政权也都同意了这种承认以后，我不打算贊同萊茵省居民对政府这一行动所表示的意見。

我的職責要求我必須用我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反对任何侵犯法律和阻撓其实施的行为，因为不如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存在。我认为拒納維持秩序和法制所必需的捐稅的号召就是这种侵犯行为，因为这种捐稅是由法律規定的，因此也只能由法律来改变。

根据个人的切身經驗，我知道我省居民是很尊重法律的，因此我不能設想，他們竟会走上势必招致严重后果的破坏法律的道路；相反地，我确信他們将坚定不移地击退这种侵犯他們的荣誉和公共福利的行为。如果出乎所料，我的这种信心丧失了，那末我盼望所有省級和地方权力机关使用法律所授予它們的一切权力来迫使居民納稅，并毫不犹豫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萊茵省总督

(签名)艾希曼

1848 年 11 月 17 日于科倫

这就是前任大臣和現任总督艾希曼对“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①的答复。

当艾希曼先生給帖撒罗尼迦人发出这个文告的时候，他是否知道国民議會关于拒絕納稅的決議呢？

过去艾希曼曾經在普富尔政府里代表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

^① 見本卷第 24 頁。——編者注

派。現在他又以萊茵省首腦的身分代表他們。艾希曼——這是**執政派反革命勢力**在萊茵省的化身。

因此，艾希曼先生的命令與勃蘭登堡先生的命令具有同等的價值。艾希曼先生這條好漢在青年時代就毫不倦怠地熱心於把“國事犯”關進要塞，他遲早總會由於**叛國罪被交付法庭審判**，從而罪有應得地結束他的官場生涯。

和著名的君主主義者西里西亞總督**品德爾**先生完全相反，艾希曼總督先生在上述命令中宣布他是**國民議會的公開敵人**。因此，艾希曼先生已不再是總督了，就像他的頂頭上司勃蘭登堡已不再是大臣一樣。艾希曼先生自己解除了自己的職務。執行他的反革命命令的官員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如果萊茵省居民想要對國民議會給予比較實際的支持，而不單是呈遞致意書，如果他們不願意俯首帖耳地向鞭子屈服，他們就應當強迫**所有負責官員**，特別是行政區長官、縣長、市長和市政官員**正式聲明**：他們是否承認國民議會，是否打算執行它的決議？**Oui ou non?**〔是或不是？〕如果他們拒絕發表這種聲明，或者直接違抗國民議會的決議，那末，首先就應當把這些官員革職，然後，宣布他們是**國事犯**；應當任命各種臨時**安全委員會**來代行他們的職務，這些委員會的命令應當看成是唯一合法的命令。凡是反革命當局用暴力手段阻撓這些安全委員會成立和活動的地方，**都應當用一切暴力手段來還擊暴力**。消極反抗應當以積極反抗為後盾。否則這種反抗就像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犢的反抗一樣。

卡·馬克思寫於 1848 年 11 月 18 日
載於 1848 年 11 月 19 日“新萊茵報”
第 147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呼 吁 书⁴⁷

科倫 11 月 18 日。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号召萊茵省各民主团体通过并实施下列措施：

(1) 在普魯士国民議會本身已經作出拒絕納稅的決定以后，各地都应当用一切手段反对强行征稅。

(2) 各地都必須組織民团，抗击敌人。給貧民供应的武器和彈药，应由市鎮出錢或靠募捐来购置。

(3) 各地都應該要求地方当局正式声明，它是否承认并願意执行国民議会的決定。在遭到拒絕时，應該成立安全委员会，并尽可能同市鎮委员会取得協議。市鎮委员会如果反对立法會議，則应由該地全民投票重新选举。

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代表

卡尔·馬克思 卡尔·沙佩尔 施奈德尔第二

11 月 18 日于科倫

載于 1848 年 11 月 19 日
“新萊茵报”第 147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联邦法院的选举

伯尔尼 11 月 18 日。昨天我已經把前些时候选出的联邦法院八名法官的名字告訴了你們。在昨天的联席會議⁴⁸上又补选了几名：夫賴堡州的**若里**（夫賴堡州选出的国民院議員，該州的选举已宣布无效）、巴塞尔“瑞士国民报”⁴⁹的編輯**卡尔·布倫納**博士以及烏利州的**堯赫**律师。这样一来，联邦法院的名額就滿了——共十一名法官。**凱倫**被任命为院长，**卡·普菲弗尔**博士被任命为副院长。

正如你們所知道的，国民院已宣布夫賴堡州的选举无效，这是因为被允許参加投票的只是那些准备向瑞士联邦新宪法宣誓的选民。第二天，国民院几乎全体一致（七十三票对十三票）否决了丰克提出的由两院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議，批准了自己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仅在伯尔尼引起了当地人們的紛紛議論，而且也是引起瑞士德語区和法語区的激进党人激烈爭論的导火綫。事情是这样的：根据瑞士联邦宪法，第一届国民院应由全体年滿二十岁并在本州享有选举权的瑞士人选出。关于选举的一切其他的条例、章程以及比較詳尽的指示皆由各州自行規定。夫賴堡州政府所要求的宣誓，也是其他一些州授予选举权的条件；在这些州里，每一个第一次行使选举权的瑞士公民都要向州的宪法宣誓。显然，新宪法的起草者是打算在选举中保证普选权的；但是照宪法的字面意思来看，夫賴堡州政府有权利，而且当它和神甫所指使的一伙抱有

敌对情绪的多数处于对立地位时，它甚至有责任或者要求宣誓，或者提出辞职。德语区的激进党人遵循着立法者的意图，而以瓦得州^①为首的法语区的激进党人却想根据宪法的词句来挽救夫赖堡州政府，并且挽救他们所如此渴望的激进党人在国民院中的五个席位。法语区的激进党人宣称国民院的决定是间接赞助夫赖堡州主教的叛乱⁵⁰，这次叛乱会导致夫赖堡州激进党政府的垮台和宗得崩德政府在該州的复辟（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把伯尔尼和瑞士德语区其他地区的激进党人叫作“理论家”、“空洞的抽象概念的编造者”、“空论家”等等。的确是这样。瑞士德语区的激进党人多半是律师，他们往往过分坚持自己的法律观点，而受过法国革命熏陶的瓦得州居民和日内瓦人在政治上是比较强的，他们对法律条文并不那么尊重。

这个瑞士法语区派的最坚决的报纸是洛桑的“窝州新闻”⁵¹。保守的，甚至温和的自由党人也把它称做“被宣布为不间断的革命的机关报”。一般说来，这家报纸还算机智轻快，它公开举起红色共和国的旗帜，维护巴黎六月的起义者，把维也纳的拉图尔之死叫做“自主人民的司法的壮举”，并以辛辣的讽刺来嘲笑“瑞士信使报”⁵²，因为这家报纸对这类恐怖行为发出了绝望的哀号，伪装虔诚而实则反动。“窝州新闻”同时也是瓦得州政府中一个强大的党的机关报，甚至可以說是这个政府中多数派的机关报。瓦得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对自己的政府忠心耿耿，热忱爱戴，这在国民院选举过程中再次得到了证明。

根据“日内瓦评论”的半官方消息，日内瓦批准了教区代表会

① 法国称作：窝州。——编者注

議关于夫賴堡州主教的決定（这个決定你們大概早就知道了⁵³），但是附有一些由于政府过去同羅馬教皇所簽訂的條約而产生的不大的保留条件。教区的其他各州已經批准了这一決定。該报接着說，只要各州关于批准的決議一送到，馬利耶主教就会获釋，因为夫賴堡州声明，它打算停止已經开始的就主教不久以前参加暴动一事对他进行的刑事偵查。

人們焦急地等着关于瑞士联邦首都的投票結果。如果伯尔尼沒有选上（从联邦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中沒有一个是伯尔尼人这一情况就可以觉察出这种預兆），这里就会发生运动，其結果将是奧克辛本下台，政权轉入激进党多数派（施坦普弗利、尼格勒尔、施托克馬尔等人）手中，并且修改剛剛通过的瑞士联邦宪法。問題在于：根据宪法，如果有五万名享有选举权的瑞士公民要求修改宪法，那就应当解散两院，重新选举新的議員。单是伯尔尼本身就能够毫无困难地征集这样多的签名，还不算那些可能从先进的罗曼区各个州来的、醉心于建立一院制和更大程度的中央集权的远景的广大群众。但是，关于瑞士两院投票結果的任何預測都是徒劳无益的。无穷的分散性（这是联邦共和国的必然的历史产物）、难以描述的利益的互相交錯，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人們所奉为指南的各种动机的不可思議的混乱，——所有这一切使得有关可能性的任何猜測都变得毫无意义。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1 月 18 日

載于 1848 年 11 月 23 日“新萊茵报”
第 15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市 政 府

科倫 11 月 20 日。科倫市委員會向柏林呈遞了一份請願書，
汨汨地哀求國王解散內閣，以便拯救王權。

科倫市政府，resp. [或者]杜蒙先生之流面向國王，可是整個
萊茵省都背向國王，面向制憲議會。杜蒙先生，resp. 市政府想拯
救國王，而萊茵省只想拯救自己。好像拯救國王和拯救萊茵省是
并行不悖的！當帝王們依靠戒嚴和炮轟來拯救自己的時候，市政
府却想拯救國王。誰授權市政府去拯救國王，并向他呈遞表現了
科倫寄生蟲們十足奴才式的搖尾乞憐行為的請願書呢？在國王和
科倫市政府之間發生了種種事件之後，科倫市政府却只是哀求再
挨一頓腳踢。

如果科倫市政府關心柏林議員們的決議甚於關心國王的專制
野心和拯救國王，它早就應該下令占領科倫市各個城門，以便阻止
征稅和執行國民議會的意志。因此，應當立即解散科倫市政府。司
法部門和稅務部門的官吏，凡是不竭力阻止征稅者，應一律當作國
事犯看待。

如果科倫市不撤銷它的市政府並立即派兩名新的議員到柏林
去接替逃跑的議員的席位，它就應當挨鞭子。

卡·馬克思寫於 1848 年 11 月 20 日
載於 1848 年 11 月 21 日“新萊茵報”
第 148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呼 吁 书

科倫 11 月 20 日。

萊茵省的民主主義者們！

著名的檢察長茨魏費爾不對艾希曼總督發出法庭的傳票，反而通過法院偵查員洛伊特豪斯對你們的委員會發出傳票，指控它公開號召叛亂，要它明日出庭受審。

他們指望發生騷動。科倫衛戍司令部業已準備就緒。根據叛國內閣發布的命令，科倫將宣布戒嚴。

你們要粉碎這種企圖。不管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們都要保持鎮靜。

無論發生什麼情況，代表大會都要舉行⁵⁴。

萊茵省將戰鬥到最後一滴血，決不向軍刀統治屈服。

卡爾·馬克思 卡爾·沙佩爾 施奈德爾第二

寫於 1848 年 11 月 20 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48 年 11 月 21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 148 號增刊

評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內閣 就拒絕納稅問題发布的公告

科倫 11 月 21 日。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內閣已向王国各行政区政府发出了强行征稅的命令。

建立在違法基础上的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內閣建議对拒絕納稅的人采取暴力手段，而对无力納稅的人予以寬大处理。

这样一来，內閣就把不納稅的人分成了两类：一种人不納稅，是因为执行国民議会的意志；另一种人不納稅，是因为納不起稅。內閣的意图昭然若揭：它想分裂民主派，它想唆使农民和工人把自己算做是无力納稅的人，以便把他們同那些根据法律拒絕納稅的人分开，从而使后者失去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但是这个計劃是一定要破产的。人民懂得，他們对拒絕納稅負有連帶責任，正如过去他們对納稅負有連帶責任一样。

两种力量——納稅力量和征稅力量之間的斗争将进入决战阶段。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21 日

載于 1848 年 11 月 22 日“新萊茵报”
第 14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檢察長和“新萊茵報”

科倫 11 月 21 日。誰站在法律基礎上，是艾希曼總督還是“新萊茵報”編輯？應當把誰關進監獄，是“新萊茵報”編輯還是艾希曼總督？這個問題現在要由以茨魏費爾為代表的檢察機關來解決。以茨魏費爾為代表的檢察機關將站在勃蘭登堡內閣這一邊呢？還是檢察長茨魏費爾這個“新萊茵報”的老撰稿人⁵⁵將站在他的同事這一邊呢？這個問題現在要由公眾來解決。

早在國民議會通過決議以前，“新萊茵報”就堅決主張停止納稅了；早在立法機關維護法制以前，“新萊茵報”就已維護了法制。如果這種預先維護法制的行為是不合法的，那末“新萊茵報”編輯部在整整六天中就都是站在非法的基礎上，茨魏費爾先生就應該在六天之內對我們進行偵訊，到了第七天他則應當抑制一下他的審訊狂了。

但是到了第七天，當世界已經創造完畢，茨魏費爾先生已在慶祝安息日，國民議會已明令頒布了拒絕納稅的法律的時候，艾希曼總督建議茨魏費爾先生開始審訊那些煽動拒絕納稅的人。誰煽動拒絕納稅？是“新萊茵報”編輯部還是柏林國民議會？茨魏費爾先生應當逮捕誰？——應當逮捕他的那些老伙伴柏林議員，還是他的老同事“新萊茵報”編輯，還是地方行政長官艾希曼先生？直到現在茨魏費爾先生還沒有逮捕任何人。

因此，我們建議由另外一个茨魏費尔来逮捕茨魏費尔先生，因为他在安息日以前沒有逮捕“新萊茵报”編輯，在安息日以后又沒有逮捕艾希曼先生。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21 日

載于 1848 年 11 月 22 日“新萊茵报”
第 14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柏林和科倫的檢察机关

科倫 11 月 21 日。柏林檢察机关在**国事犯**面前放下了武器。首席檢察官澤泰先生沒有执行国民議会的要求，沒有采取应有的措施来对付**国事犯**勃兰登堡，却提出辞职。

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力图尽可能广泛地傳播国民議会的合法決議，并号召粉碎**国事犯**的計劃，竟被科倫檢察官控告为参加叛乱(?)。

“强权即公理”。——公理的代表到处都站在**强权**那一边。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21 日

載于 1848 年 11 月 22 日“新萊茵报”
第 14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法兰克福議會

科倫 11 月 22 日。法兰克福議會宣布，柏林議會关于拒絕納稅的決議是違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这样，法兰克福議會就站到勃兰登堡那边，站到弗兰格尔那边，站到独特的普魯士主义那边去了。法兰克福迁到了柏林，柏林則迁到了法兰克福。現在德意志議会在柏林，普魯士議會則在法兰克福。普魯士議會已变成了德意志議會，德意志議會則变成了勃兰登堡—普魯士議會。普魯士本应溶化于德意志，而法兰克福的德意志議會現在却希望德意志溶化于普魯士！

德意志議會呵！在柏林和維也納的严重事件以后，誰还会想到什么德意志議會呢？自从罗伯特·勃魯姆被害以后，就再也沒有一个人对高貴的加格恩的生平感到兴趣了。自从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內閣組成以后，就連鬼也不再对什么施梅林感到兴趣了。以“創造历史”为乐趣的教授先生們只好容許了对維也納的炮轰、对罗伯特·勃魯姆的杀害以及文迪施格雷茨的野蛮行为！关怀德意志文化史先生們竟听任某个耶拉契奇和他的克罗地亚人去实际运用文化！当教授們創造历史理論的时候，历史本身却繼續急遽向前奔馳，根本不顧教授先生們的历史。

前天通过的決議断送了法兰克福議會。这个決議把法兰克福議會抛入了国事犯勃兰登堡的怀抱。法兰克福議會犯了叛国罪，

应当交付法庭审判。全体人民一致起来抗議国王的专橫暴虐行为，这种抗議是用絕對合法的方法，即用拒絕納稅的方法實現的。而教授議會竟无理地宣布这种拒絕納稅、这种全民反抗为非法，既然如此，这个議會就把自己置于法律保护之外，就犯了叛国罪。

法蘭克福議會中所有已投票反对这种決議的議員的責任，就是退出这个“已經寿終正寢的联邦議會”。全体民主主义者的責任，就是把这些退出議會的“普魯士人”选为柏林德意志国民議會的議員，以代替离职的“德国人”。柏林国民議會不是一个“部分”，它是一个整体，因为它有权通过決議。而法蘭克福的勃兰登堡議會将变成一个“部分”，因为无疑还会有許多其他不願参与建立法蘭克福联邦議會的議員贊成一百五十名議員（他們的退出議會已是必不可免）的举动。法蘭克福議會呵！它害怕紅色共和国，下令建立紅色君主国！我們不要紅色君主国，我們不希望塗上鮮紅色彩的奥地利王冠把他的权力扩展到普魯士領土上来，因此我們宣布：德意志議會犯了叛国罪！其实，我們給予議會的荣誉太多了，我們賦予它的政治意义它早就丧失了。对法蘭克福議會已作了最严峻的判决：不理睬它的決議并——忘掉它。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22 日

載于 1848 年 11 月 23 日“新萊茵报”
第 15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到处戒严

科倫 11 月 22 日。我們曾經向科倫市政府預言，它向国王呈递請願书，得到的回答将是一頓脚踢^①。我們搞錯了。市政府的确遭到了脚踢，但不是遭到国王的脚踢，而是遭到曼托伊費尔—勃兰登堡的脚踢。Tant pis! [更糟!] 其次，我們还說过，在法兰克福議会的決議通过以后，左派的責任就是退出議會^②。据我們了解，退出議会的不仅有左派，而且还有中間派左翼，以便成立一个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Tant mieux! [更好!]

到处戒严——这就是三月革命的成果。杜塞尔多夫宣布戒严了！宣布城市戒严，是为了占領它！普魯士所有的城市都一个接一个地宣布戒严了，为的是重新占領它們。整个普魯士都应当重新占領，因为整个普魯士都憤怒地反对普魯士。怎样实行戒严呢？用解除市民武装的办法。像科倫这样已經解除了武装的城市，怎样才能再次宣布戒严呢？先把武器还給它。再次宣布科倫戒严——这就是說給科倫武器。戒严万岁！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22 日

載于 1848 年 11 月 23 日“新萊茵报”
第 150 号号外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見本卷第 43 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50 頁。——編者注

德意志中央政权⁵⁶和瑞士

科倫 11 月 24 日。在上一世紀的喜劇中，特別是在法蘭西的喜劇中，總有一個奴僕無時無刻不在挨耳光，在效果最好的幾場戲里，甚至被拳打腳踢，好讓觀眾開心。扮演這個奴僕角色自然是費力不討好的，但是，和我們法蘭克福帝國劇院舞台上出現的角色，和帝國外交大臣的角色比較起來，却令人羨慕不已。因為喜劇中的奴僕至少還有一種報復手段——俏皮，而帝國大臣呢？

我們從公論斷。1848 年沒有一個外交大臣功成名遂。帕麥斯頓和涅謝爾羅迭因為沒有人打擾他們而至今感到滿意。以自己的宣言甚至贏得了德國老處女和寡婦的眼淚的夸夸其談的拉馬丁，也不得不帶着他那鍛羽折毛的兩翼羞愧地退出了舞台。他的繼承者巴斯蒂德，僅僅一年前作為正式的戰爭宣告人還在“國民報”上和不太出名的“國民評論”⁵⁷上對基佐的懦弱政策表示義憤，可是現在，每當夜晚閱讀自己的 *oeuvres complètes de la veille*〔往日論著全集〕和痛苦地想到自己也一天天淪落到正直共和國的基佐的地步時，也默默地落淚了。但是，這些大臣們畢竟還有一樁事可以告慰自己：如果在大的方面他們不能夸功自詡，那末在小的方面，在丹麥、西西里島、阿根廷、瓦拉几亞以及其他無關緊要的問題上，他們卻可以吹噓一番。甚至普魯士的外交大臣阿爾寧先生同丹麥締結了一項不光彩的休戰協定，也感到心滿意足，因為他覺得

不仅自己受了騙，而且他也騙了別人，——这个受騙者原来就是……帝国大臣！

事实上，帝国外交大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完全起着消极作用的人物。他承受打击，但是决不打击任何人。自从他就职的第一天起，他就充当他所受当的替罪羊，所有他的邻邦的同僚都向他发泄私憤，他們每个人在外交生活中遇到了这种或那种小小的不愉快时也要迁怒于他。即使被毆打、被撕裂，他也会像一头被牵去屠宰的羔羊一样默不作声。有誰能說帝国大臣曾經用指头戳过他一下呢？的确，德意志民族决不会忘記施梅林先生那样坚决一貫地恢复昔日神圣羅馬帝国的傳統的勇敢行为。

我們是否还需要列举馮·施梅林先生的外交成就来证明他的頑强的耐性呢？我們是否需要重談馬克西·加格恩先生从法兰克福到什列斯維希的旅行，重談这值得重复的已經仙逝的索菲婭从默麦尔到薩克森的旅行⁵⁸呢？我們是否需要重新搬出同丹麦休战的大有教益的历史来呢？我們是否需要叙述一下在皮蒙特进行調解失败的建議和黑克舍尔先生为增长見識由帝国出錢而作的外交旅行呢？这样做沒有必要。这些事实記憶犹新，而且极有說服力，因此根本用不着提起。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甚至最有耐性的人总有一天也会表明他是有牙齿的，——一个德国庸人这样說。忠实于这一階級（我們可敬的国家偉人們称这一階級为德意志人口中善良的絕對多数）准則的馮·施梅林先生終于也感到需要表明，他也是“有牙齿的”。命定要做牺牲的羔羊开始寻找替罪羊了，而且认为它終于找到了这个替罪羊，这就是瑞士。瑞士是一个大約有二百五十万居民而且都是共和主义者的国家，是一个避难所，黑克尔和司徒卢

威从这里侵犯过德意志⁵⁹，扰乱过新的神圣罗马帝国——难道还能找到更好的同时又是更保险的机会来证明“大德意志”的牙齿是锋利的吗？

关于流亡者的阴谋活动的“强硬”照会立即送到了首府州⁶⁰ 伯尔尼。但是首府州伯尔尼意识到自己是无辜的，便用“小瑞士”的名义，以同样强硬的口吻回答了“大德意志”。这丝毫没有吓倒施梅林先生。他的牙齿以惊人的速度变得更加锋利了。10月23日他便写好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照会，并于11月2日送到了伯尔尼。这一次施梅林先生已用鞭笞来威胁秉性乖张的瑞士了。伯尔尼的行动比帝国大臣更为迅速，仅仅过了两天就作了答复，口吻和过去一样沉着而坚定。因而，施梅林先生现在应当采取“命令和措施”来对付瑞士了。正如他在法兰克福议会上所宣布的，他正在以最严肃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情。

如果这种威胁是我们今年多次看到过的帝国所玩弄的最寻常的无耻把戏，我们便根本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浪费笔墨了。但是，由于我们帝国的唐·吉珂德们，或者更确切些说，帝国的桑科们，在处理他们的巴拉塔利亚^①上的外交事务中行为轻率到了没法再轻率的地步，所以与瑞士发生的这次冲突自然也就给我们增添了各种新的麻烦。Quidquid delirant reges 等等。⁶¹

因此，我们要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帝国给瑞士的照会。

大家知道，瑞士人的德语说得很糟，写得也好不了多少。但是，和帝国内阁的学究气十足的、拙劣的词不达意的德语相比，从文体方面来看，首府州的复照简直可以说是出自歌德之手的完美

^① 巴拉塔利亚是塞万提斯的名著“唐·吉珂德”中的一个幻想的岛屿的名称，桑科·判扎被委任为该岛的总督。——译者注

无瑕的杰作。瑞士外交官(据说是联邦总理席斯)好像故意要写得特别简洁、流畅和精练,以便在这方面也和帝国摄政王的照会形成一个讽刺性的对比,而帝国摄政王的照会即使由耶拉契奇的某个红斗篷^①来写,一定也不会写得更坏。在帝国照会中常常碰到许多根本无法理解的词句,此外,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还有许多极端拙劣的词句。难道这些词句不正是用“光明磊落(帝国摄政王政府在国际交往中将始终把这种态度当做自己的义务)的語言”写成的嗎?

就内容而言,施梅林先生的照会也不见得更好些。在第一段中他提到了

“这一事实,即在对本年6月30日的德意志照会提出答复之前,在持续数星期之久的联邦代表会议的会议上,对这个照会进行了辩论,辩论的语调使得德意志的代表当时无法继续留在瑞士(你们看这就是文体的典范!)”⁶²。

首府州是相当宽宏大量的,它根据联邦代表会议的记录向“帝国摄政王政府”证明,“持续数星期之久的”辩论仅仅是在唯一的一天中举行了唯一的一次小会。我们看到,我们的帝国大臣宁愿相信他的糊涂的记忆力,也不愿意查考文件。关于这一点我们还会找到不少例证。

其实,帝国摄政王政府可以把首府州的这种客气表示和帮助帝国摄政王政府纠正记性坏这个缺点的意愿,看作是瑞士的“睦邻态度”的证明。事实上,如果帝国摄政王政府在照会中敢于用同样的方式谈论英国议会中的辩论的话,冷酷高傲的帕麦斯顿马上便会请它滚蛋!普鲁士和奥地利驻伦敦公使可以告诉它,关于他们的国家和照会公开谈了些什么,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些公使因此

^① 红斗篷指奥地利边防军马队的兵士,他们身披红色斗篷,头戴红色鸭舌帽。
——译者注

便不可能留在倫敦。这些学究甚至自己也不懂得，在独立自主的議会的辯論中，与他們有关的只是做出的决定，而根本不是在那里所讲的話，可是他們却想給瑞士上国际法課！这些邏輯学大师在同一个照会中武断地說，“瑞士应当知道，对出版自由的攻击不可能来自德意志方面”（只要把这句話轉載在“新萊茵报”上，就会成为一种辛辣的諷刺！），——他們竟敢侵犯一个国家机关（同时还是瑞士的最高权力机关）的辯論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原則是沒有任何爭論的。这里不牵涉到避难权和出版自由問題。瑞士应当知道，对这些权利的攻击不可能来自德意志方面。德意志不止一次地声明过，它不能容忍濫用这些权利。它断然认为，避难权不应当变成瑞士的行业（这是什么意思呢？），变成对德意志的战争状态（避难权是战争状态，——这是什么話！）。被迫害者的棲身所和强盜們的巢穴之間應該有所区别。”

“强盜們的巢穴”！难道黎納尔多·黎納尔丁尼以及哥特弗里德·巴塞在克韦德林堡出版的小說中所描写的所有匪首，都率領他們的婁罗下了亚不路息山，来到萊茵河畔，要伺机搶劫上巴登了嗎？或者卡尔·穆尔已从波希米亚森林开始出击了？是不是施因德汉斯⁶³还留下一个侄子，他想以“自己伯父的侄子”⁶⁴的身分从瑞士宣布要继承他的王朝的要求呢？完全不是这回事！被关在巴登監獄里的司徒卢威、司徒卢威夫人和几个沒有携带任何武器越境的工人——这就是在瑞士曾經有自己“巢穴”或者好像至今在那里还有这类巢穴的“强盜”。帝国当局并不满足于抓到了可以用来发泄它的忿怒的俘虏，它还恬不知耻地隔着萊茵河破口大罵那些幸而逃脫它的魔掌的人。

“瑞士知道，我們決不是要求它迫害出版物。問題不在于报纸和傳单，而

在于它们的作者，这些人在国境线上日日夜夜地对德意志进行卑鄙的走私战，大批偷运煽动性著作。”

“偷运”！“煽动性著作”！“卑鄙的走私战”！用词愈来愈雅致了，愈来愈带外交口吻了，——但是帝国摄政王政府不是“把使用光明磊落的语言当作自己的义务”吗？

的确，政府的语言是极其“光明磊落”的！它决不是要求瑞士迫害出版物，它所說的不是“报纸和传单”，而只是“它们的作者”。应当制止这些作者的活动。但是，正直的“帝国摄政王政府”，当在德意志对某家报纸，例如对“新莱茵报”，提起诉讼的时候，问题牵涉到谁呢——是已经送到大家手中而且已经无法收回的报纸呢，还是那些被关进监狱并交付法庭审判的“作者”呢？这个高贵的政府决不是要求迫害出版物，它只是要求迫害为出版机关撰稿的作者。好正直的人们！绝妙的“光明磊落的语言”！

这些作者“对德意志进行卑鄙的走私战，大批偷运煽动性著作”。“强盗们”的这种罪行确实是不可饶恕的，何况他们“日日夜夜”都在犯这种罪行，而瑞士竟对此不闻不问，这是对国际法的不可容忍的破坏。

有人从直布罗陀整船整船地把英国货偷运入西班牙，西班牙的神甫们却声明说，英国人对天主教会进行着卑鄙的走私战，因为他们“偷运煽动性的福音书”，例如圣经会出版的西班牙文的圣经。巴塞罗纳的厂主们也在诅咒用从直布罗陀秘密输入英国棉布的办法对西班牙工业进行的卑鄙的走私战。但是，只要西班牙公使对此稍微表示不满，帕麦斯顿就会回答他说：thou blockhead [你这个蠢货]，要知道，我们正是为了这一点才占领直布罗陀的呀！直到现在，其他各国政府都相当机敏、识趣和谨慎，没有在照会中埋

怨走私。但是，天真的帝国摄政王政府却用如此“光明磊落的語言”毫不隱諱地声明說，如果巴登的海关官吏沒有很好地执行他們的职责，就是瑞士破坏了国际法。

“最后，瑞士不会不知道，其他国家反对这一丑恶行徑的权利，不可能以瑞士当局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或願望来阻止这种行徑为轉移。”

看来，帝国摄政王政府肯定“不会不知道”，瑞士不惊动那些即使用偷运等等办法进行过走私战，但遵守国家法律的人的“权利，不可能以德意志当局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或願望来阻止”这种走私“为轉移”。帝国摄政王政府不妨深思一下海涅給那个老是埋怨发生大火災因而使他感到討厭的汉堡人的回答：

你們应当把自己的法律
和自己的消火唧筒改进⁶⁵，——

那时它就再也不会因自己磊落的語言而使自己充当別人的笑料了。

“爭論的只是一些事实”，——照会中繼續說。可見除了卑鄙的走私战而外，我們最后还会听到其他一些重要的事实。真想馬上就听到。

“崇高的首府州政府以不了解情况为理由，要求向它提供能够证实对瑞士当局提出的控告的真凭实据。”

每个人都很清楚，崇高的首府州政府的这个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或許帝国摄政王政府会乐于滿足这一正当的要求吧？

絕无此事！你們只消听一听：

“但是，在各国政府就众所周知的事情的談判中，采用辯論程序是不合各国人民的习惯的。”

这就是給妄自尊大的、小小的瑞士上的一堂严峻的国际法課。

瑞士以为它也可以对大德意志帝国摄政王政府采取傲慢的态度，像过去小小的丹麦所做的那样。它不妨回忆一下同丹麦的休战并放得更谦逊一些，否则它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

向邻国要求引渡刑事犯，自然要诉诸辩论程序，尽管该犯的罪行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辩论程序，或者更确切些说，瑞士在采取措施（不是对付逃到这个国家来的刑事犯的措施，不是反对付流亡者的措施，不，这只是对付它本国的在民主选举权基础上选举出来的官吏的措施）以前要求得到的简单罪证，难道“不合各国人民的习惯”！真的，“光明磊落的语言”一点也不阴险狡猾！这是**最坦率地**供认没有任何证据。

接着便提出了一大堆列举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的问题。

“难道有谁怀疑德国煽动者在瑞士所做的事情吗？”

当然没有人，正像谁也不怀疑施梅林先生在法兰克福所做的事情一样。非常清楚，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大部分都有“事情”做。问题只在于他们究竟做的**什么事情**，这一点显然施梅林先生本人是不知道的，否则他就会说出来。

“难道有谁怀疑流亡者刊物的存在吗？”

当然没有人。但是，要知道施梅林先生本人曾经宣布，对出版自由的攻击不可能来自德意志方面。要是发生了这种攻击，瑞士也一定会击退它。既然如此，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把它从“光明磊落的语言”翻译成普通人的语言，那就只能有一个意思：瑞士应该取消流亡者的出版自由。A un autre, Monsieur de Schmerling! [不是这样吗？冯·施梅林先生！]

“难道德意志应该向欧洲证明到穆坦茨朝圣的事实吗？”

当然不应该，机智的“帝国摄政王政府”！但是，证明这些朝圣是司徒卢威入侵的原因或者是使帝国政府有更多根据向瑞士提出控诉的其他举动的原因，对帝国摄政王政府说来，丝毫也不是丢脸的事情，可惜也决不是容易的事情。

首府州这一次也非常客气。它的作法超出了“各国人民的习惯”。它提醒施梅林先生说，到穆坦茨朝圣⁶⁶恰好与黑克尔有关，黑克尔是反对第二次入侵的，他甚至到美国去了，为的是消除对他的意图的一切怀疑。在朝圣者中还有德意志国民议会的一些著名的议员。首府州真够有礼貌，甚至面对着施梅林先生的蛮横无礼的照会，它也没有提到第二个同时也是有决定意义的理由。这就是“朝圣者”重又回到德意志去了，在那里帝国摄政王政府随时都可以根据任何一个应受惩罚的行为或他们在穆坦茨所搞的一切“阴谋”来对他们进行审讯。可是这类事情并没有发生。这个事实最有力地证明，帝国摄政王政府没有任何材料来控告朝圣者，因此它也就更没有理由在这方面责难瑞士当局了。

“或者是在比尔斯费尔德举行的会议？”

“光明磊落的语言”是件美妙的东西。谁如果像帝国摄政王政府一样，把“在国际交往中”严格使用这种语言“当作自己的义务”，那末他只需要证明一下，在比尔斯费尔德举行了一般的会议或者是流亡者的会议，就有充分理由来谴责瑞士当局粗暴地破坏国际法了。当然，一般的常人首先应该证明在这些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违反国际法的事情。但是，要知道，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众所周知到如此程度，以致我敢打赌，在“新莱茵报”的读者中，知道施梅林先生究竟谈的是什么会议的人，甚至连三个也找不到。

“而那些有可能在国境綫附近，在萊茵斐尔頓、苏尔查赫、哥特利宾和劳芬等地搞阴謀活动的歹徒們的武装呢？”

謝天謝地！我們終於知道了一些关于流亡者所干的“事情”的比較确定的說法！起初我們猜想馮·施梅林先生不知道流亡者在干什么事情，这对他是不公道的。他不仅知道他們在干什么事情，而且还知道他們在什么地方干这些事情。他們在什么地方干这些事情呢？在萊茵斐尔頓、苏尔查赫、哥特利宾和劳芬——在国境綫附近。他們在干什么事情呢？“搞阴謀活动！”

“他們在搞阴謀活动！”他們的这些阴謀是对整个国际法的駭人听聞的蹂躪！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国际法不致遭到蹂躪，帝国摄政王政府在干什么呢？該不是在“横行霸道”^①吧？

但是馮·施梅林先生談的是“武装”。由于流亡者搞阴謀活动（这使整个帝国胆战心惊）的許多城市都屬於阿劳州，所以首府州便效法阿劳州。首府州又做得过分了，超出了“各国人民的习惯”。它要通过“辯論程序”来证明，当时在阿劳州只有二十五个流亡者，其中只有十个人参加了司徒卢威的第二次自願远征，而且他們还是沒有携带武器越境进入德国的。这就是全部的“武装”。难道这有什么意义嗎？留下来的其余十五个人恰好是最危險的人物。他們留下来显然只是为了以后能毫无阻碍地繼續“搞阴謀活动”。

这就是“帝国摄政王政府”对瑞士的郑重其事的控告。此外它再也不能提供任何东西，而且它也认为沒有必要这样做，因为这“不合各国人民的习惯”等等。如果瑞士竟恬不知耻地认为自己并没有被这些控告所吓倒，那末帝国摄政王政府的“决定”和“措

^① 俏皮話：«ihr Wesen treiben»——“搞阴謀活动”，«ihr Unwesen treiben»——“横行霸道”。——編者注

施”就会立即产生毁灭性的效果。全世界的人都希望知道，这些决定和措施将具有什么性质，尤其是因为施梅林先生在筹划这些决定和措施时做得非常秘密，甚至对法兰克福议会也不愿意透露关于这件事情的任何细节。然而瑞士报刊已经证明，施梅林先生所能采取的一切压制措施使德意志受到的损害将比瑞士大得多。根据各种消息看来，瑞士人正以最大的沉着态度等待着帝国摄政王政府的“措施和决定”。法兰克福的大臣先生们是否能够保持这样沉着的态度呢，特别是如果这时收到了英国和法国的照会的话。这我们倒要看一看。只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所有这一切必将像对丹麦的战争那样，以新的耻辱而结束，不过这一次耻辱将只能由官方德意志来承受。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1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1 月 26 日“新莱茵报”
第 153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曼托伊費尔和中央政权

科倫 11 月 24 日。曼托伊費尔大臣昨天向在柏林的帝国專員們宣布：普魯士政府不服从法兰克福議会关于組織一个有声望的內閣的決議⁶⁷，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对內政策。

这样一来，曼托伊費尔就同意这样一种看法：法兰克福議会关于拒絕納稅^①的決議也沒有任何意义和效力，因为它只是同国家的对內政策有关。

不过，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內閣可能帮助把萊茵省变成普魯士的对外政策問題。

写于 1848 年 11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11 月 26 日
“新萊茵报”第 153 号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① 見本卷第 49 頁。——編者注

德利加爾斯基——立法者、 公民和共產主義者⁶⁸

科倫 11 月 24 日。杜塞爾多夫宣布戒嚴。勃蘭登堡—弗蘭格爾內閣找到**施皮格爾**先生和**德利加爾斯基**先生作代表算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前者是一個普通的行政區長官，後者則集各種不同的品質於一身：他不僅在官銜上是中將師長、杜塞爾多夫市區和整個行政區的“最高”立法者，而且他還是一個作家，據他自己說，他還是一個“公民”和——**共產主義者**，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天佑吾王，天佑吾國”。這兩位先生，不管身分是單色的還是多色的，都覺得在杜塞爾多夫，法定秩序只有用**非常手段**才能維持。因此他們認為，“為了維持法定秩序”他們“不得不”宣布整個杜塞爾多夫地區戒嚴。

我們早就知道，勃蘭登堡政府只有靠**非常手段**才能維持；我們知道，如果國內不實行戒嚴，勃蘭登堡政府早就喪失了自己的地位。因此，戒嚴狀態也就是勃蘭登堡政府的**合法狀態**。

馮·普富爾首相在 9 月 29 日的協商議會上宣稱：“先生們，戒嚴狀態就是**戰爭狀態**。”當時指的是科倫城和科倫要塞，指的是暴動，司法機關的決定無法執行，合法當局——市民自衛團已不能維持安寧，街壘已經修築起來；力量只能用力量來對付。至少戒嚴的擁護者們曾經是這樣斷言的，至少他們力圖用似乎是查明了的事

實來掩飾外表。現在這件事做起来要簡單得多了；杜塞爾多夫沒有發生暴動，法院的活動絲毫沒有遭受破壞，市民自衛團時刻準備執行合法的命令，甚至無須引證當時曾被當做主要依據的過了時的1809年條例，因為杜塞爾多夫不是要塞。但是，杜塞爾多夫以少有的毅力表示贊成拒絕納稅，僅僅根據這一點，兩個勃蘭登堡就可以恢復法定秩序，即宣布該城不受法律保護了。

我們用不着去詳細研究作為宣布戒嚴借口的罪狀；我們要向司法當局指出，這些罪狀純系捏造，因為根本提不出法律上所要求的證據來證實它們。這是誣告，應按刑法典第三六七條及以下各條加以懲處。為了維護法定秩序，我們想在這裡指出施皮格爾先生和德利加爾斯基先生的一些違法行為。

在這兩位先生宣布戒嚴“從而使最高權力轉歸軍事當局掌握”之後，“共產主義者和公民”德利加爾斯基發布了如下的命令：

(1) 各個合法存在的權力機關繼續保留其職能，它們所採取的措施將得到最堅決的支持。

這就是說，既然各個合法存在的權力機關是依法存在的，那末就應該取消，但是要保留它們的職能，以便支持馮·德利加爾斯基先生。

德利加爾斯基在給他的“同胞們”的呼喚書中說：“我希望所有正直的居民都會幫助我執行法律，各個權力機關都會堅決地支持我這樣做。”

德利加爾斯基先生不僅制定法律，而且還根據自己的裁奪運用法律。各個合法存在的權力機關就是他的近衛軍。而杜塞爾多夫地方法院的“獨立”的法官們、檢察長先生及其同僚們竟對這一切聽之任之！他們被解除了職務，却毫不覺得這是違法。他們對立法者德利加爾斯基稱頌備至，並且還因為付出這種代價而能夠

照旧領薪感到高兴。諸位先生，难道在軍刀制度下发布逮捕令，进行审讯，你們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嗎？也許，逮捕拉薩尔先生（可惜他过于坚信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司法机关的保护，不愿意躲避戒严）只不过是德利加爾斯基先生的私人报复行为？也許已經根据第一一四、一二三、一二四各条悄悄地对这个人和他的同謀者提起訴訟并进行偵查了？

德利加爾斯基先生的**第二条**法律是：

“解散一切追求政治目的和社会目的的团体。”

4月6日法令的第四节与德利加爾斯基先生有什么关系呢？既然这一节規定：“所有普魯士人都享有不經警察局事先許可进行結社的权利，只要不是追求違背現行法律的目的”，这就是說，这显然是那些应当尽速收回的、与德利加爾斯基的法律不相容的“成果”之一。

第三条和第四条法律。馮·德利加爾斯基先生控制市內交通和飯店營業時間。他頒布禁止集会的法令，仿佛杜塞尔多夫已变成了巴黎。但是，德利加爾斯基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仅因为他是一个警察，而且还因为他表現出一个夜巡邏的无庸置疑的天才：他还控制着工余休息時間。

第五条法律。

“市民自卫团在改組以前应予解散，并且必須在今天交出武器。”

这条法律在許多方面都是違法的。我們来分析一下：

(a) 市民自卫团**应予解散**。根据一般法律，即根据10月17日的市民自卫团法，市民自卫团只有根据国王的命令才能解散。也許馮·德利加爾斯基先生持有別人不知道的秘密的敕令？那末，

他為什麼不像公布郵政總局局長毛倫布勒歇爾的聲明⁶⁹那樣把它公布出來呢？誠然，這個捏造的聲明立刻就遭到了杜塞爾多夫市民自衛團的駁斥。但是馮·德利加爾斯基先生並沒有什麼敕令，他是憑借自己的最高權力行事，擅自攫取國王的職權，他不過是一個僭望王權的“公民和共產主義者”。

(b) 市民自衛團**不僅被解除職務**。馮·德利加爾斯基先生並不滿足於僅僅攫取行政區長官的職權。如果要說違法，那末僅僅解除自衛團的職務一事就足以說明這一點了。10月17日法律的第四節規定：

如果某個市鎮或區的市民自衛團拒絕遵守當局的命令，或者干涉市鎮、行政或司法當局的活動，那末行政區長官在說明理由後可以暫時解除它的職務。

因此，只有行政區長官才能解除市民自衛團的職務，不管中將、師長、公民、以至共產主義者，即使是“普魯士皇家共產主義者”都絕不能解除市民自衛團的職務。

可是，德利加爾斯基先生有他充分的理由，無視級別，以專制君主的身分來獨斷獨行。即使他只是以行政區長官的身分來對待市民自衛團，他也不能**解除後者的武裝**。但是

(c) “市民自衛團必須在今天交出武器。” 僅僅解除職務還絕不等於說有權沒收武器。不然被暫時解職的軍官也應交出他們的佩刀。但是德利加爾斯基先生是對的。如果允許市民自衛團保留武器，也許它就不會讓德利加爾斯基解除它的職務，它就會按法律第一節的規定去執行它的使命。

(d) 馮·德利加爾斯基先生要求把武器交給**他**。因為他已經感到他的使命就是要當專制君主，所以，關於實施建立市民自衛團

的法律的敕令也不能制止他這樣做，敕令的第三節規定：

“國家交給市鎮的武器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由市鎮支配，直到上述時間為止。”

杜塞爾多夫的“市政管理局和市鎮委員會”並沒有反對德利加爾斯基先生的命令。它們不是抗議這種違法行為和維護市鎮的權利，而是號召市民們對他們的新的獨裁者要“奉公守法”。

第六條法律。

“凡被揭露公開以武力反抗合法當局的命令或實行叛變致使軍隊遭到危險或使軍隊遭到危害者，交軍事法庭懲處。”

按照人身保護法⁷⁰的規定，任何人都不能交由依法成立的法庭以外的法庭去審理。軍事法庭和非常委員會都是非法的。以懲罰相威脅或使用法律規定的懲罰以外的懲罰都是不容許的。根據這條法律，這項規定不論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或在任何情況下，甚至在戰爭或暴動的情況下，都不能停止生效。因為根據第八節規定，即使在此種情況下也只能暫時取消第一節和第六節，而且只有根據內閣的決定并由內閣負責才能這樣做。雖然如此，但是馮·德利加爾斯基先生還要設立軍事法庭來對付平民。因此他下令捕人，為了捕人而破壞住宅的不可侵犯也就毫不奇怪了！如果說這些決定也能暫時停止執行，那末無論如何它們不是由馮·德利加爾斯基先生停止的。“杜塞爾多夫日報”斷言逮捕拉薩爾沒有遵照規定的手續，“科倫日報”則肯定這次逮捕是按照法院偵查員的指示進行的，究竟哪種說法值得相信，反正都是一樣。“科倫日報”當然是站在警備司令方面，侮辱法院偵查員。不管怎樣，這次逮捕是非法的，因為在非法的制度下不可能有合法的行動。在戰時狀態下，民事審判權就得失效。如果法院偵查員要繼續執行他的職務，

他就得登上**軍法官**的寶座，**軍事條令**就會成為他的法典。杜塞爾多夫檢察人員很了解他們的這個新地位；事實上如果他們還承認他們享有萊茵刑事訴訟程序規定的職權，那末即使根據 Habeas Corpus Act〔人身保護法〕第九節，他們也早就應該起來干涉了。第九節規定：

“對超越職權破壞上述各項決定的文武官員，不需事先征得當局的同意即可起訴。”

要完全認清我們萊茵各機關的力量，還要看總檢察官**尼科洛維烏斯**先生是否同意杜塞爾多夫檢察人員的做法，因為所有法警官員，甚至法院偵查員都在他的監督之下。為了促使**尼科洛維烏斯**先生行使他的職權，處理杜塞爾多夫事件，昨天曾派一個代表團去見他，他似乎回答說：他手裡沒有能夠據以進行干涉的法律條文。雖然這些話我們都是從最可靠的方面得知的，但是，我們仍然說：“**尼科洛維烏斯**先生似乎回答說”。我們還不敢相信這件事，因為否則我們就要認為，**尼科洛維烏斯**先生把 Code pénal⁷¹ 及今年 3 月以來頒布的一切法律都忘得一干二淨了。

卡·馬克思寫於 1848 年 11 月 24 日

載於 1848 年 11 月 26 日“新萊茵報”
第 153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对“新萊茵报”提出的三个訴訟案

科倫11月24日。目前对“新萊茵报”提出的訴訟案就有三起，还不算根据莫須有的“与新聞业活动不相容的”政治罪行对恩格斯、德朗克、沃尔弗和馬克思进行的审讯。——据灵通的消息說，除了上述审讯以外，法庭对“下流报纸”——这是 *ci-devant* [前任] 檢察官和現任檢察长黑克尔 (*c'est du Hecker tout pur* [这是真正的黑克尔])⁷² 对本报的官方称呼——至少还准备提出一打审讯。

第一个罪行。粗暴地触犯六名普魯士皇家宪兵和 *in partibus infidelium* [在異邦的] 人民代表——科倫檢察机关之王、檢察长茨魏費尔先生⁷³ 的少女般貞洁的“礼貌”。这位人民代表目前既不在柏林开会，也不在勃兰登堡开会，而在萊茵河畔的科倫开会。“萊茵河畔啊！在萊茵河畔我們的葡萄正在成长！”⁷⁴ 从我們这方面来讲，我們也认为萊茵河比施普累河好，迪什旅館比米連茨旅館好⁷⁵。

Va pour la délicatesse des gendarmes! [就算讲礼貌是宪兵的特性吧！] 至于茨魏費尔先生的“礼貌”，对我們來說就是 *«noli me tangere!»* [“別碰我！”] 对于复选人的无礼貌的不信任投票（据傳聞，复选人迫使茨魏費尔先生取消自己的候选資格），我們曾表示道义上的憤慨。我們作为茨魏費尔先生少女般貞洁的“礼貌”的忠实的保护者，請求他公开駁斥克列維的魏茵哈根先生的声明。魏

茵哈根先生在“新萊茵报”上发表了一个由他本人署名的声明。他在声明中断言，他可以把有損茨魏費尔先生的“荣誉和礼貌”的事实公諸于世，他甚至可以証明这些事实。但是，由于茨魏費尔先生用 Code pénal [刑法典] 的条文作掩护，所以魏茵哈根先生不敢公布这些事实。根据这一条文，任何揭发，即使有真凭实据，如果不可能由法庭的判决或确凿的文件来加以证实，一律都要被控告为誣蔑。因此，我們向茨魏費尔先生的“荣誉和礼貌”呼吁！

第二个罪行。索性的黑克尔和二重化的黑克尔。

第三个罪行。这是在 1848 年犯下的罪行。根据帝国内閣的要求对这个罪行提出了控訴，**罪行——施納普汉斯基！罪犯便是小品文！**⁷⁶

据說，帝国内閣在其起訴书中把“新萊茵报”称为一切“坏报刊”中最坏的报纸。我們則认为帝国政权是一切滑稽可笑的政权中最滑稽可笑的政权。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24 日

載于 1848 年 11 月 26 日“新萊茵报”
第 153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联邦委员会委员剪影

伯尔尼 11 月 24 日。让“新莱茵报”的读者了解一些关于现在已经确定在两院监督下管理瑞士并且刚刚开始其活动的人物的详情细节，也许是不无兴趣的。联邦委员会的五个委员已无保留地同意自己当选，只是富勒尔先生一人同意在春天以前暂时担任这一职务，而第七个人（蒙钦格尔）毫无疑问也会表示同意。

联邦委员会主席**富勒尔**先生是典型的苏黎世人。如果是在法国，人们会说他具有 *l'air éminemment bourgeois* [高度的资产阶级外表]。服装、举止、容貌——所有这一切，一直到银边眼镜，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自由的帝国城市的公民”。他作为首府州的主席以及联邦代表会议的议长，的确变得有点文明气了，但毕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省人”。“瑞士的雅典”（苏黎世的小市民喜欢这样称呼他们这个只有一万居民的小城市）的最有才学的律师之一——富勒尔先生的主要功绩，就在于他以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温和的自由主义导致了苏黎世九月政府的垮台⁷⁷，使进步党重新担负州的领导。作为联邦代表会议的议长，他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在内部事务上温和进步，在对外问题上严守中立——这就是他所奉行的政策。他现在之所以当了联邦委员会的主席，与其说是由于一定的意图，不如说是由于一种偶然情况。人们本来乐意选举一个伯尔尼人来担负这个职务；不过那就只能在奥克辛本和

諾伊豪斯这两个人之間进行選擇了。奧克辛本是大多数人所厌恶的，諾伊豪斯到現在即 1848 年还是采取五六年前的保守立場，因而根本沒有被选入联邦委员会。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就不得不选举一个苏黎世人。要选苏黎世人，富勒尔无疑是最适当不过的候选人了。因此，不能认为富勒尔确实代表联邦議会的多数派，但他至少是瑞士德語区的多数派的代表。

副主席德律埃在各方面都同富勒尔相反，他是瑞士法語区所能选出的最好的代表。富勒尔对于多数派，尤其对于激进的少数派來說是过于温和，德律埃对多数派來說則太激进。富勒尔是温和的資產階級自由主义者，德律埃則是紅色共和国的坚决拥护者。德律埃在自己州里最近发生的各次革命事件中所起的卓越作用是尽人皆知的。他在各方面对自己的州(瓦得州)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虽然人們不大曉得。德律埃是路易·勃朗型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者，第一流的国家法专家，全瑞士最有毅力和最勤勉的活动家。他是联邦委员会中能够逐渐获得越来越大影响和产生最良好作用的人物。

奧克辛本是反对琉森的志願軍的首領，是通过对宗得崩德作战的決議的联邦代表會議的議長。在这次战役中他是伯尔尼后备軍的上校。由于他过去的活动，不仅在瑞士，而且在整个欧洲他都是遐邇皆聞的。但是，从二月革命以来，他的活动不大为人所知。二月革命的某种程度上的社会主义性质、法国临时政府的措施以及法国无产階級的一切运动——所有这一切几乎吓倒了这位会被法国人列入“国民报”派的 *démocrate pur* [純粹的民主党人]。他漸漸地接近温和派。特别是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日益傾向于所謂严守中立的、实际上不过是对反动派采取保守和纵容政策的旧

制度，而在对宗得崩德的战争以前以及在这次战争期间，他在对外政策方面都曾经表现得坚强有力。担任首府州主席的奥克辛本，便迟迟不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并在意大利问题上至少是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此外，由于他在担任联邦代表会议议长期间非常感情用事，结果往往对激进派抱有成见。这样一来，他便在激进派中间，特别在瑞士法语区的激进派中间为自己树立了許多敌人。如果在选举伯尔尼州的联邦委员会委员时不是仅仅限于在奥克辛本和诺伊豪斯之间进行选择，那末奥克辛本得的票就会少得多。

阿尔高的弗雷-埃罗泽上校被认为是瑞士最有才干的军事活动家之一。在反对宗得崩德的战役中，他是总参谋长。如同瑞士的大多数参谋人员一样，他长期以来参加本州的政治生活，因而非常熟悉民政管理机关的事务。他在新的岗位上无疑会卓有成效地从事军事部门的工作。按政治观点来说，他属于本州的彻底的自由派。

德森的国务参事弗兰西尼，无疑是全瑞士最受尊敬的社会活动家之一。多年来他一直在本州孜孜不倦地工作。1830年，还在六月革命以前，受蔑视的、在政治上被认为是落后的德森首先在全瑞士（而且没有通过革命）用民主宪法代替了寡头政治的旧宪法，这主要是他的功绩。同时他还领导了再度推翻窃据政权的僧侣和寡头政治家的1840年革命。这位弗兰西尼在这次革命后还改组了被反动派弄得混乱不堪的管理机构，进行了反盗窃、欺诈、贿赂和贪污的斗争，最后，还在贫瘠多山的地区许可的条件下，重新举办在僧侣统治时期完全衰落了的教育。这样，他就剥夺了神甫们赖以影响人民的主要手段。结果，德森人对自己政府的信任便一年年不断地提高。此外，弗兰西尼还是瑞士最有学识的经济

学家之一，是瑞士統計学界的优秀著作（“瑞士統計学”，1827年罗迦諾版；“瑞士新統計学”，1848年版）⁷⁸的作者。他是个彻底的激进派，在联邦委员会中，与其說他接近奥克辛本和富勒尔，不如說他接近德律埃。德森人对自己政府的这位多年的领导者评价很高，特别是因为他那种“光荣的貧困”。

左洛图恩的政府参事**蒙欽格尔**是本州最有威望的活动家。从1830年起，他几乎一直是这个州出席联邦代表會議的代表，多年来实际上领导着这个州。用瑞士法語区的半激进报纸“洛桑日报”⁷⁹的話來說，他善于 *cachez sous les apparences de la bonhomie un esprit fin et pénétrant* [用温厚来掩盖乖巧而銳敏的智慧]。就是說，他善于在温厚的老实人的外表掩盖下玩弄一些小詭計，而这种小詭計在帝国城市中被认为是一种外交才能。此外，他是一个富勒尔类型的温和的进步派。他要求瑞士只关心自己本身的事务，把大的欧洲政治交給上帝和帕麦斯顿勋爵去管。因此，他对至今只給瑞士带来麻煩的外国流亡者的态度是相当不怀好意的。他同“瑞士的雅典人”埃歇尔博士一起，最近在德森再一次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一般說来，富勒尔和蒙欽格尔在联邦委员会中最典型地代表了瑞士德語区“有教养的”居民的偏見和局限性。

最后是圣加倫的奈弗先生，关于他我知道的非常有限。据說，奈弗对本州的管理工作的改善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成績卓著。根据瑞士报纸来判断，一般說来，在圣加倫州居住的都是最富裕和最有才学的人。可是这些有才学的人的不幸就在于：人們很少知道他們，不管怎样，他們显然都缺乏主动性。不过作为行政活动家的奈弗先生，在他活动范围内看来是不无功績的。按其政治观点來說，他介于富勒尔和奥克辛本之間；他

比前者较为坚决，但是按照后者过去的活动来看，他又不如后者。

从联邦委员会的这些成员无疑可以看出，瑞士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将执行怎样的政策。它将继续执行旧联邦代表会议和首府州伯尔尼在奥克辛本，后来在丰克（如果没有奥克辛本他就等于零）的领导下所执行过的政策。在对内政策方面——严格遵守瑞士联邦的新宪法，这个宪法对各州的主权范围仍然规定得过于广泛。在对外政策方面——严守中立，当然究竟保持比较严格的中立还是比较温和的中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譬如对奥地利就保持特别严格的中立。温和派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奥克辛本先生很可能在大多数问题上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德律埃和弗兰西尼作为少数派，而且还有永远当少数派的美妙前景，如何能同意被选入联邦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如何能协同一致地进行管理，只有瑞士人，或者熟悉瑞士是怎样进行管理的人，才能了解这一切。在这个一切行政机关都是集体讨论问题的国家，人们都信守这样一个原则：各守己职。即使你今天不是少数派，你仍然有可能做些有益的事情；也许经过一两年，由于死亡、辞职等等原因，你会变成多数派。这是执政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这一事实的自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政党都力图（就像在立法议会中一样）选派一个或几个候选人，以便至少在委员会中站稳脚跟，在不能获得多数以前保证自己的少数地位。如果候选人不同意被选举，政党也不反对这种在比较大的国家里必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联邦委员会绝不像 *Commission du pouvoir exécutif*⁸⁰，德律埃的地位和赖德律-洛兰的地位也有巨大的差别。

瑞士的报刊一致断言：联邦委员会是由有才能的第一流的人组成的。虽然如此，我怀疑：除了德律埃和弗兰西尼以外，这个委

員会的哪一个委員能够在一個比較大的国家里起杰出的作用；除了弗雷-埃罗澤和奧克辛本以外，其余的三个委員是否能够在一個比較大的国家里被提拔担任稍微重要的，即使是第二流的角色。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1 月 24 日

載于 1848 年 11 月 29 日“新萊茵报”
第 15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法兰克福委员会关于 奥地利事件的报告

科倫 11 月 27 日。四十年前，曾有过描写“深受屈辱的德国”⁸¹的人物。好在这些人物都已 *ad patres* [見老祖宗] 去了。要是現在，他們便写不出这样的书了，因為他們会連书名都想不出来，而如果又重彈老調，选用旧的书名，那他們就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要知道，德国永远具有——用英国詩人的話來說，«beneath the lowest deep a lower still» [“在最深度下面的更深度”]。^①

原来我們以为，同丹麦簽訂那样的休战协定已經是空前的奇耻大辱了。原来我們觉得，在帝国大使劳麦在巴黎、黑克舍尔在意大利、專員施泰德曼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发表演說以后，在給瑞士发出两个照会以后，德国的屈辱已經到了尽头。但是，两个帝国專員关于奥地利問題的演說证明，我們是想錯了。德意志帝国專員們以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礼行为来对待德意志的荣誉，旧自由派先生們是多么昏庸无能、胆小怕事、背叛成性，这从剛出版的“奥地利事件調查委员会报告及其他”⁸²中，特别是从其中的二十个文件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10 月 13 日，韦尔凱尔先生和莫斯累先生受中央政权的委托，

① 弥尔顿“失乐园”。——編者注

离开法兰克福去“調停維也納事件”。不了解中央新外交手腕的人，这几天都在等待这两位先生到达維也納的消息。当时还不知道帝国专员們有他們自己的旅行路綫。帝国摄政王使者艾塞勒和柏塞勒⁸³取捷徑，經過慕尼黑前往維也納。他們以“約卜西之歌”⁸⁴中的道路图为指南，于10月15日晚上抵达維也納。一直到10月17日中午，他們同巴伐利亚的大臣們和奧地利的代办在感人的團結气氛中研究了維也納事件。在給施梅林先生的第一封信中，他們汇报了他們初步調查的結果。在慕尼黑，他們两位忽有所悟。他們殷切企望“第三位同事”（尽可能是一位普魯士人）的光临，“因为这样一来，我們就将更出色地完成偉大使命”。但是“同事”先生并没有来。三人同行的希望破灭了。这可怜的一对只得独自登場。現在“偉大使命”怎么样了呢？偉大使命装在韦尔凱尔先生和莫斯累先生的口袋里，到巴騷旅行去了。还在作出奧地利之行的重大决定以前，“偉大使命”就有言在先了。“在那里，在那边非常可怕！”⁸⁵

韦尔凱尔給施梅林写道：“这里，在奧地利边境，居民也絕不是沒有革命情緒和恐怖情緒的，〈不仅如此，〉甚至克累姆斯的国民自卫軍也不可靠，仅仅由于守护桥梁的軍隊的干涉，才使这座桥梁在皇帝經過之前没有被国民自卫軍破坏，皇帝才幸未被俘。”

哪一位讀者的心腸竟坚如铁石，竟不充分尊重高尙的政治学百科全书的心灵 [Staats-Lexikon-Seele]⁸⁶的这种感情呢？这两位先生从18日中午至20日早晨在巴騷稍事歇息，便动身往林茨去了。

10月13日，他們离开法兰克福，20日晚上，他們已到达林茨。这种令人难以想像的迅速行动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們的“偉大使命”的重要性嗎？也許有特別的指令要他們这样匆忙吧？恰好七天

以后，这两位先生到达了林茨，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由于这个城市有“受过维也纳密使们的感化的为数众多的工厂居民”，所以韦尔凯尔先生在逗留巴骚期间产生了一种诚惶诚恐的预感；但是如今在这里连他和他的同事先生所想像的绞架的影子也根本没有发现。相反地：

“在军官之率领下，全体国民自卫军，及其乐队……庄严隆重地排列成队，手持迎风飘扬之德国国旗，同围拢来之人民一道欢迎吾等，并不停地欢呼。”

这样一来，林茨——革命的索多玛——就变成了一个善良的城市，它十分纯朴，用隆重的方式接待了我们卓越的帝国专员们。可是，在韦尔凯尔—莫斯累给施梅林先生的报告中，维也纳却被描绘得非常阴森可怕，简直像是罪孽深重的哥摩拉^①，像是混乱的火焰地狱等等。

21日，这两位先生乘轮船去克累姆斯。途中他们向法兰克福报告说，在林茨，曾为他们安排了仪仗队，警备队在他们前面列队欢迎，还有类似的隆重措施。与此同时，他们还写了三封信，分别寄给文迪施格雷茨、克劳斯大臣和帝国国会主席团。

如果有人对我们的帝国专员们八天多的活动不完全满意，那末他最好立刻在10月21日夜間同他们一起到施塔姆美尔斯多夫去，到文迪施格雷茨的司令部去看看。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自己的专员为代表的中央政权的全部丑态。韦尔凯尔—莫斯累说，“文迪施格雷茨颇为粗暴地拒绝了我们的任何干涉。”换句话说，他们挨了一顿闷棍，不得不马上滚蛋。“不仅如此，他甚至连我们的

^① 索多玛和哥摩拉是两座城市的名称，据圣经传说，这两座城市由于居民罪孽深重而被地震和“火雨”所毁灭。——译者注

全权证书也不愿意看”——韦尔凯尔向他的大臣施梅林这样抱怨道。除了这些不快以外，文迪施格雷茨连一滴葡萄酒，甚至连一小杯烧酒也不肯给站在她面前的中央政权的化身赏光。

于是，我们的专员们又乘上马车，悲哀地哼着：“啊，你，德意志，等等”⁸⁷，动身……到维也纳去？——上帝保佑！——到奥里缪茨^①去，到“宫廷”去。他们做得真妙。要没有这一着，整出帝国的滑稽剧就会不完而散，调停的滑稽剧就会缺少最后一幕。如果说文迪施格雷茨像对待不懂事的小学生那样来对待他们，那末在奥里缪茨他们却受到了“皇帝和皇族的殷勤得多的接待”（见报告第11页，第六封信）。他们被邀请出席了宴会，“吾等”——他们接着给施梅林先生写道——“承蒙陛下的恩惠，受到盛情的接待”。这里表现出来的不是德国式的奴隶性格，——绝对不是——这是出自肺腑的感激，这种感激之情在下面这首歌的歌词中得到了适当的表现：“在经受了如此的苦难之后，等等。”⁸⁸

但是，在享受了各种款待以后，毕竟还得去完成声名狼藉的“伟大使命”。我们这两位专员写信给大臣韦森堡男爵说：

“閣下（10月25日的信就是这样开头的），我们恭请您仁慈地给吾等指定一个对您方便之时间，以领吾等对您感激之情，感激陛下和閣下对本使团及吾等之厚意接待，并请将您对完成吾等之使命有关的下列各项事情之意见及决定示知吾等。”

“下列各项事情”只是噜噜嗦嗦地说明，专员们希望允许他们到维也纳去进行调停。

这一封信，像给韦森堡的第二封信一样，是用上一世纪的竟尚

^① 捷克称作：奥洛摩茨。——编者注

詞藻的公文体裁写成的，其中极尽阿諛奉承之能事，簡直使人想馬上讀一下韦森堡的回信。在通信中，这两位专員和奥地利大臣比較起来，就像是两个粗野的庄稼汉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貴族一样，他們跪在光滑的鑲木地板上，对后者行可笑的屈膝礼，并力求使用文雅的詞句。

在給上述那封信的回信中，韦森堡写道：

“二位尊貴的先生：迟复今日来函，敬希鉴諒……至于二位欲再次消除維也納糾紛的善良願望，敝人首先必須將彼处近况告知二位。今之事态非与某党派商談所能解决，唯一之办法乃鎮压叛乱”等等。（參看报告第 16 頁）

随后他退还了他們的全权证书。

在 10 月 27 日的信中，他們再次提出自己的要求：

他們說：“吾等认为有刻不容緩之責，再次敬請閣下，并通过閣下敬請帝国政府，在可靠之保护下，速派吾等携善意及調停之委托与建議，前往維也納，以期在此可怕之危机中，使用体现于吾等及本使团身上之安撫作用与个人影响。”

我們已經知道，“这种安撫作用与个人影响”在他們离开法兰克福大門以后的十四天中发生了怎样的效力。

这种作用和影响給了韦森堡以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致他在自己的复信中对他們的請求避而不答。他告知了他們一些来自維也納的，有一半还是不真實的消息，并譏諷地指出：

“况且，类似維也納无产者之叛乱，非用强制手段实难鎮压下去之事实，已为不久前法兰克福事件所再度证实！”

韦尔凱尔先生和莫斯累先生根本无法反駁这种論点。因此，他們只得放棄进一步的嘗試，只好带着他們的“安撫作用与个人影响”坐待事态的发展。

10月28日，他們又向施梅林作了關於他們的“偉大使命”的報告。根據韋森堡的建議，他們把緊急報告交給韋森堡派到法蘭克福去的一個信使。信使動身了，但緊急報告卻沒有發出。直到11月6日，緊急報告才送到法蘭克福。如果他們沒有出席御宴，如果皇族，特別是卡爾大公沒有和他們作友好的談話，專員們必然會因這樣多的失利而失去理智了。

接着，沉默了兩天。在經過這樣多的辛勞之後，“安撫作用”終於沉溺於禮拜六的休息中了。

可是，10月30日，韋森堡把關於維也納投降的官方消息通知他們。他們的決定被採納了。誠然，在10月28日，他們還認為（報告第14頁），“看來，他〈文迪施格雷茨〉正像這裡〈奧里繆茨〉有勢力的人物一樣，**過分**熱衷於不僅要鎮壓維也納，而且要对迄今所發生的非法行為進行報復性的懲罰。”可是，後來韋森堡向他們保證說，——在這以後帝國專員還敢再有絲毫懷疑！——“奧地利政府將根據能保證它得到它的臣民的好感的原則來利用這個勝利”。

充滿了帝國精神的韋爾凱爾—莫斯累感嘆道：“由此看來，可以預料，吾等之建議**畢竟**產生了一定之影響！”畢竟產生了影響？呵，那當然。在八天當中，你們用絕妙的方法來供韋森堡、卡爾大公以及索菲婭之流開心。你們成了幫助陛下腸胃消化的工具，**韋爾凱爾—莫斯累**啊！

“於是，在大臣做出了這種保證之後，吾等認為，吾等之使命業已完成，明日〈10月31日〉吾等將取道布拉格歸國。”

這就是韋爾凱爾—莫斯累先生的最後一次報告的結束語！

事實上，你們是對的，你們的和解與調停的“偉大使命”確實已經完成了。你們為什麼現在到維也納去呢？難道人道主義的聖

徒——文迪施格雷茨和耶拉契奇——不是这个城市的主宰嗎？难道紅斗篷和帝国军队不是在用掠夺、纵火、杀人和暴力等等每个人都懂得的語言宣傳和平与宪法自由的福音嗎？

你們的“安撫作用”究竟有多么大，你們的任务究竟完成得多么出色，被枪杀者临死前的呻吟、暴力受害者絕望的惨叫可以证明这一点，在监牢里被摧殘受折磨的成千上万的人可以证明这一点，**罗伯特·勃魯姆**的斑斑血迹向我們說明了这一点。

你們的任务在于：为了弥补文迪施格雷茨、耶拉契奇和韦森堡演出的三部曲之不足，在奥里繆茨帮助再演一出滑稽剧。这一任务已被你們出色地完成了：你們以极嫻熟的技巧从头到尾扮演了“**受愚弄的舅舅**”这一角色，如果不是某种更坏的角色的话。

写于 1848 年 11 月 27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11 月 28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 154 号

新聞數則

科倫 11 月 28 日。“新萊茵報”在 11 月 17 日曾經寫道：

“我們更不用說**猶太人**了，從他們的教派解放以來，他們，至少是他們的上層人物，到處都成了**反革命的急先鋒**。——他們會有什麼好結果呢？等不到勝利，就會把他們扔回猶太人區去的。”^①

當時我們曾引證了**勃羅姆堡**^②政府的命令。今天我們認為有必要報道一個更為確凿的事實。共濟會柏林“三君主”總分會（大家知道，**普魯士親王**是普魯士共濟會的最高首腦，就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是普魯士教會的最高首腦一樣）宣布停止共濟會科倫“**密納發**”分會的活動。為什麼？因為這個分會吸收了猶太人入會。**特此通知猶太人！**

勃蘭登堡內閣給各個行政區政府的通告偶然落到了我們的手里。該通告要求各個行政區政府**大規模搜捕各個俱樂部的領導人**。

據可靠消息透露，科倫、杜塞爾多夫、亞琛等地將收到我們皇恩浩蕩的君主的聖誕節禮物——由奧地利人組成的帝國軍隊。看來，這將是**克羅地亞人、奧地利邊防軍馬隊、捷克人、拉斯人、塞爾維亞人**等，其目的是為了像在維也納一樣，在萊茵省也建立“秩序

① 見本卷第 30 頁。——編者注

② 波蘭稱作：貝德哥什。——編者注

和安宁”。可是，据说萊茵省并不是同俄国接壤，而是同法国接壤。
特此通知皇恩浩蕩的君主！

写于 1848 年 11 月 28 日

載于 1848 年 11 月 29 日

“新萊茵报”第 15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曼托伊費尔的机关报和約翰。 ——萊茵省和普魯士国王

科倫。“新普魯士报”证实了由我們轉述过的曼托伊費尔关于法兰克福中央政权和法兰克福議会的声明^①。曼托伊費尔的机关报写道：

“帝国摄政王的宣言可能是出于最良好的願望。可是我們普魯士人应当坚决拒絕它——普魯士人民在做这件事时应当跟国王一样坚决。”

曼托伊費尔的机关报說出了我們衷心希望的話。

关于如何对待法兰克福議会決議的約束力，这家官方报纸这样教导我們：

“除了我們的国王以外，我們普魯士人不知道有別的主人。在法兰克福議会的決議中，只有国王也贊同的決議對我們才有約束力，仅仅是因为陛下〈普魯士的風格！〉贊同了这些決議，而不是因为別的什么緣故。”

我們“普魯士人”!!! 我們萊茵省居民很幸运，在維也納买卖人口的大市場上得到了一位萊茵河下游的“大公”，不过他后来并没有履行他在被宣布为“大公”时所許下的那些条件⁸⁹。对于我們来

^① 見本卷第 63 頁。——編者注

說，“普魯士国王”只是由于柏林国民議会的決議才存在，可是對我們这位萊茵河下游的“大公”來說，柏林国民議會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對我們來說，任何“普魯士国王”都不存在。我們所以落到了萊茵河下游的大公的手里，是因为販賣人民的結果！當我們成長到能够不承認販賣人口的生意的時候，我們將要求“萊茵河下游的大公”拿出他的“領地所有証”來！

寫于 1848 年 11 月 29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11 月 30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 156 号

意大利的革命运动

科倫 11 月 29 日。在民主派半年来几乎接連不断地遭到失敗之后，在反革命获得一連串空前的胜利之后，终于又出现了革命政党即将胜利的征兆。意大利的起义曾經是 1848 年欧洲起义的序幕，意大利的失敗曾經是維也納陷落的前奏。現在，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意大利第二次站起来了。托斯卡納建立了自己的民主政府，羅馬也剛剛給自己爭得了这样的政府。

倫敦的 4 月 10 日，巴黎的 5 月 15 日和 6 月 25 日，米兰的 8 月 6 日，維也納的 11 月 1 日⁹⁰——这就是欧洲反革命的几个重要日期，是标志着欧洲反革命不久以前胜利进军所迅速經過的几个阶段的四个里程碑。

在倫敦，在 4 月 10 日，不仅宪章派的革命实力被摧毀，而且二月胜利的革命影响也受到第一次打击。那些正确评价英国和它在現代历史中的地位的人，决不会因为大陆的革命暂时对英国还毫无影响而感到惊奇。英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通过工业和貿易控制着大陆上那些正处于革命动荡中的人民，同时，由于它控制着亚洲、美洲和澳洲的市場而不大依靠同这些国家的貿易；英国又是現代資產階級社会的矛盾，即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充分发展和极端尖銳的国家。和其他任何国家比較起来，英国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通过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的。先于其他任何国家

解决问题和消灭矛盾是英国的使命。但英国不必像大陆上各国临时政府一样，要经过摸索方能达到这个目的。英国不向大陆抄襲革命——时机一到，它自己会把革命教给大陆。

这就是英国的状况，这就是这种状况的必然结果。因此，4月10日“秩序”的胜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谁不记得，这个“秩序”的胜利，这个对二月和三月冲击的第一次回击，在各地给了反革命以新的支持，煽起了所谓保守派的奢望！谁不记得，伦敦特别警察的这种行动马上在德国各地为所有市民自卫团所仿效！谁不记得，这个表明爆发的运动并不是不可抗拒的第一个证明，给人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巴黎在5月15日随即补充了英国保守政党的胜利。4月10日筑起的堤坝挡住了达到了最高点的革命巨流的进路。5月15日从发源地摧毁了巨流的力量。4月10日证明二月运动并不是不可抑制的；5月15日证明巴黎的起义运动是可以阻止的。革命的心脏受到破坏，它的外围自然要遭到失败。普鲁士的情况和德意志各个小邦的情况愈来愈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革命运动还保存着相当的力量，使得人民能够在维也纳取得两次胜利：第一次也是在5月15日，第二次是在5月26日。专制制度在那不勒斯取得的胜利（也是在5月15日），由于它的过火行为，反倒对巴黎秩序的胜利起了对抗作用。毕竟还是少了一些什么；不仅应该使革命运动在巴黎遭到失败，而且还应该使巴黎本身的武装起义失去它所享有的不可战胜的荣誉。只有那时反革命才能得到安宁。

这种事情果然在巴黎6月23日到26日的四天战斗中发生了。整整四天的炮击结束了街垒不可攻克、武装的人民不可战胜

的局面。难道卡芬雅克不是用自己的胜利证明，无论在大街或隘路，无论是攻击街垒或摧毁鹿砦与棱堡，作战规律大体上是一样的吗？难道他不是证明，四万名未经训练、没有大炮和曲射炮、缺乏弹药供应的武装工人，抵抗一支由十二万老兵和十五万国民自卫军组成的、拥有很多精良的大炮并且得到充分的弹药供应的有组织的军队，最多只能坚持四天吗？卡芬雅克的胜利是七倍以上的优势兵力对少数战士的最粗暴的镇压，是历史上最可耻的胜利，而且为这个胜利流的血愈多（尽管他拥有巨大的优势力量），这个胜利就愈可耻。然而，全世界却把这个胜利叹为奇迹，因为这个优势力量所取得的胜利夺去了巴黎人民和巴黎街垒不可战胜的荣誉。卡芬雅克的三十万士兵对这四万工人的胜利不仅意味着战胜了四万工人，实际上他们是战胜了欧洲的革命，虽然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从这一天起涌现了多么难以遏止的反动急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阻难的因素了。保守力量用榴弹和霰弹战胜了巴黎的人民，而且在巴黎能够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重演。民主派在遭到这次彻底失败之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可能完成从容的退却，并且尽力保卫自己在出版方面，在民众大会上以及在议会里的阵地，保卫这些已经不能扼守的阵地。

下一个重大的打击便是**米兰的陷落**。拉德茨基重新占领米兰，的确是巴黎六月胜利之后第一个具有欧洲意义的事件。米兰大教堂圆顶上的双头鹰不仅象征着整个意大利的失败，它还意味着欧洲反革命重心的恢复，即**奥地利的复活**。意大利被击溃了，奥地利复活了，——反革命还能奢望比这更大的胜利吗！事实正是这样，随着米兰的陷落，意大利的革命活动顿时减弱了，马米阿尼在罗马垮台了，皮蒙特的民主派被压倒了。与此同时，奥地利的

反动派也重新抬头，加紧进行活动，从中心（拉德茨基的司令部）出发，把阴谋活动扩展到各省。只是在现在，耶拉契奇才转入了进攻，只是在现在，反革命与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大联盟才完全实现。

我不谈反革命曾经取得某些地方性的胜利和占领个别省份这些小插曲，也不谈法兰克福的失败等等事件。这一切都具有地方性的，也许是一国的意义，但是绝对没有欧洲的意义。

在库斯托查那一天创始的业绩⁹¹，终于在11月1日便完成了：正如拉德茨基进入了米兰一样，文迪施格雷茨和耶拉契奇现在也进入了维也纳。卡芬雅克的办法被用来对付德国最大和最活跃的革命策源地，而且很有成效。和巴黎的革命一样，维也纳的革命也淹没在血泊中，埋葬在遍地硝烟的废墟里了。

但是，很有可能，11月1日的胜利同时就是反方向运动的开始和危机迫近的契机。使维也纳的功绩在普鲁士完全再现的企图已经遭到了失败。在最有利的情况下，甚至当国家不再支持制宪会议的时候，国王也只能指望得到不彻底的非决定性的胜利。不管怎样，维也纳的失败最初给人的沮丧印象，被这种想依样画葫芦的笨拙企图冲淡了。

现在，正当欧洲北部不是已经像1847年时那样再度受到奴役，就是在为捍卫最初几个月的胜利成果而同反革命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意大利突然又行动起来了。利伏诺这个在米兰陷落的推动下走向胜利的革命的唯一的意大利城市，终于以自己的民主高潮席卷了整个托斯卡纳，并且建立了一个具有鲜明的民主性质的政府。这个政府比君主政体下存在过的一切政府都要民主得多，就是在共和国里，这样民主的政府也是少有的。这个政府号召建立意大利制宪国民议会以此来回答维也纳的陷落和奥地利的复

活。这个民主政府投給意大利人民的革命火花燃起了燎原大火：羅馬的民众、国民自卫軍与軍隊团結一致举行起义，推翻了看風轉舵的反革命政府，建立了民主政府，由于他們的努力而获得通过的各项要求中的第一項要求就是，建立以意大利民族原則为基础的政府，也就是通过了圭拉奇所提出的关于派遣代表参加意大利制宪議会的建議。

皮蒙特与西西里島会跟着起来，这是无庸置疑的。它們会像去年那样跟着起来。

往后将会怎样？意大利的第二次觉醒会不会和过去一样，在三年之内成为欧洲民主力量新高漲的曙光？看来大有可能。反革命已經惡貫滿盈了。法国准备投入冒險家的怀抱，只要能够摆脱卡芬雅克和馬拉斯特的羈絆。德国处于空前的分裂状态，奥地利被击潰了，普魯士正处于內战的前夕——二月和三月的所有一切幻想，都被急剧的历史进程无情地踐踏无遺了。

的确，从反革命的新胜利的經驗中再也沒有什么可学的了！

但願人民在即将来临的事变中，**及时地、大胆地**运用最近六个月来的教訓。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29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11 月 30 日“新萊茵报”
第 156 号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德国教授們的可耻行徑

科倫 11 月 29 日。德国教授們的奴才本性在柏林和哈雷的學者先生們身上得到了它的理想表現。甚至俄国的农奴也会为这种奴才的思想方式感到羞耻。一个恭而敬之地吞食达賴喇嘛粪便的虔誠的佛教徒听到关于柏林和哈雷佛教徒的消息时会大为驚訝；他会觉得这些佛教徒在“天賦”王权面前表现出这种出卖节操的行为是难以置信的；只有把柏林和哈雷的教授們亲笔签名的 11 月 24 日和 21 日給普魯士国王的奏折拿給他看时，他才会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討論的自由被消灭了，議員們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議會的身价和民族的荣誉遭到了蹂躪，目的在于終止这种恐怖統治的最善意和最正义的建議被那些需要恐怖的人的反抗粉碎了。”

柏林的八十名教授，其中包括亨格施坦堡、雪恩来因、埃林堡、伯克、格林兄弟等等，就是用制造这种无耻謊言的手段，来显示他們这些天生的奴才对主子的忠誠的。他們給国王上了一个奏折，在奏折里，这些駑子學者們对勃兰登堡內閣的暴力行为表示贊成。

哈雷的十九名教授的奏折的内容也是如此，不过他們还极其可笑地談什么“自己职业的重要性”。

这两个奏折的实质就是对拒絕納稅表示異常疯狂的憤恨。这是可以理解的！捐稅一消失——享受特权的學問也就要破产。只

要这些貪得无饜的坏蛋教授們的錢袋稍微受到一点威胁，整个科学就要大发雷霆。他們的壟断的基础是“天赋”王权。他們給国王上奏折保证他們的忠誠，其实这意味着：他們要終身矢忠于自己的壟断。如果人民将来取得了最后胜利，那末，不管“他們的科学职业具有怎样的重要性”，这些先生很快就会站到現在被他們百般詛咒的人民主权方面来。可是，到那时人民会向他們喊道：“太晚了！”——并迅速消除享受特权的学者們的一切卑鄙行为。

写于 1848 年 11 月 29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11 月 30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 156 号

劳麦先生还活着

科倫 12 月 6 日。不久前，我們曾提到过哈雷和柏林的教授們向国王表示忠順的奏折。今天，我們可以向大家报道：馮·劳麦先生，即駐 in partibus [外国] 的帝国大使、此刻正在巴斯蒂德和卡芬雅克的会客厅里等待接見的人，声明他贊同上述奏折，因而完全参与了教授們的可耻行徑。对于劳麦先生之流的帝国大使，实际上也不可能期待別的东西。不过，他之所以发表这种声明，看来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在德国，好几个月以来劳麦先生被人置諸脑后。为了摆脱这种被人忘却的境况，他不擇手段，于是貪婪地抓住了他的柏林的同党們給他的机会，急忙发表了仓卒草就的声明。劳麦的这一杰作登載在最近一号“普魯士国家通报”上。

写于 1848 年 12 月 6 日

載于 1848 年 12 月 7 日

“新萊茵报”第 16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反革命的第二阶段

科倫 12 月 6 日。反革命进入了它的第二阶段。国民議会被解散了。“陛下”已直截了当地宣布了欽定宪法。

5 月間开始的伪善的“协商”把戏已被戳穿了，現在最后一块遮羞布已經撕掉了。

三月革命被宣布为沒有发生过的事情，“天賦”王权在庆祝自己的胜利。

权奸、容克地主、官僚以及一切穿制服和不穿制服的反动派，都由于愚笨的人民最終又被驅入“基督教德意志”国家的畜栏里去而一致欢呼。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2 月 6 日

載于 1848 年 12 月 7 日“新萊茵报”
第 162 号号外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国民院

伯尔尼 12 月 6 日。在这个欧洲暴风雨时期，誰还去注意瑞士呢？大概除了那个觉得在莱茵河左岸，从康斯坦察到巴塞尔的每一个丛林后面都埋伏有志願兵的帝国政府以外，誰也不会去注意。但是，瑞士是我們的重要邻邦。今天，立宪制的比利时是正式的模范国家⁹²，可是在我們所經歷的这个暴风雨时代，誰又能保证，明天瑞士不会变成这种正式的模范国家呢？現在我已經知道，有不少一本正經的共和主义者总在幻想从莱茵河彼岸把具有大大小小的联邦委员会、国民院、联邦院等等的瑞士的政治制度通盘搬来，就是說要把德国变成一个幅員广大的瑞士，这样他們就可以当上大会議的議員，或者巴登、黑森、拿騷的州議会的議員，温文尔雅地过和平而安靜的生活了。

所以，我們德国人无论如何要关心瑞士。瑞士人現在所想、所說、所做的一切，最近就有可能拿来作为我們效法的典范。因此，我們不妨預先稍微熟悉一下，瑞士联邦的二十二个州在自己联邦共和国內究竟倡导了些什么样的風俗习惯，培育了些什么样的人物。

自然，我們首先應該熟悉一下瑞士社会的精华，即那些被瑞士人民选为代表的人物；我指的是正在伯尔尼市政厅开会的国民院。

無論誰，只要他走上国民院的讲台，都会对瑞士人民派到伯尔尼来討論全民性共同事务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感到驚訝。沒有在瑞

士大部分地区呆过的人，未必会了解，为什么在这个幅員只有几百平方英里，人口不过二百五十万的小国能有这样一个五花八門的議會。但是，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瑞士是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人們說着四种不同的語言：德語、法語、意大利語（或者更确切些說，是倫巴第語）和罗曼語，在这里，同时存在着文明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从最先进的机器工业直到地地道道的畜牧生活。瑞士国民院集所有这些民族和各个文明发展阶段的精华于一身，所以完全不像是一个国家的議院。

在这个半宗法制的議院中，根本談不上有固定座位和独立政党。激进派曾經作过一次小小的尝试，想占据最左面的座位，但是，看来他們沒有成功。誰想坐在哪里，就坐在哪里，并且往往在一次會議期間更換三四次座位。但是，大部分議員都有自己喜欢的經常座位，因此，議會終究还是相当明显地分成了彼此不同的两部分。坐在前面三条半圓形議席上的人們，个个臉部輪廓突出，大多蓄有鬍須，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穿巴黎时装，这是瑞士法語区和瑞士意大利語区的代表，或者，如当地人所称呼的那样，是“罗曼人”，坐在这些議席上的人几乎全都說法語。坐在罗曼人后面的是一些五光十色得出奇的人物。的确，那里看不见穿瑞士民族服装的农民，相反地，这些人物都穿着带有某种文明象征的服装；有时，甚至还可以看到多少有些时髦的燕尾服，穿这种服装的人的外貌多半文质彬彬。再后面是半打彼此极为相像的、穿便服的瑞士軍官，他們都有一副与其說是威武，不如說是庄重的仪表。他們的打扮和穿着都显得有些过时，而且，一般地說，他們都同“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中的哀杰克斯⁹³有些相像。最后是基本群众，他們的面孔和服装难以描繪，都是些多少上了岁数的旧派先生；他們彼此

极不相像，各有特点，大多数都可以上漫画。这些人代表着各种小资产者、campagnard endimanché〔穿节日服装的农民〕和各州的寡头政治。他们个个都仪容可恭，人人都严肃得可怕，一律戴着笨重的银边眼镜。这是瑞士德语区的代表，他们来自较小的州和大州边远地区，是议院的基本群众。

坐在议院主席席位上的是琉森的著名博士罗伯特·施泰格尔。几年前，在济格瓦特-弥勒政府时期，他曾被判处死刑。现在他是瑞士联邦议会的议长。施泰格尔个子不高，矮小而结实，独特的脸形在银发黑须的烘托下给人以一种快感，虽然他老戴着银边眼镜。他很沉着地，也许有些过于矜持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辩论。只有“罗曼人”（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罗曼人）说话十分文雅，具有演说家的风度。在瑞士德语区的居民中，伯尔尼人最喜欢模仿罗曼人的气派，他们也最接近罗曼人。在他们身上还能感到一些激昂热情的气质。瑞士雅典人的后裔苏黎世人说话庄重有力，半似教授，半似行会制度时期的师傅，但总带“知识分子腔”。军官们发言郑重而缓慢，不太熟练，而且内容贫乏，可是，声音坚决果断，就像是他们的全副武装的营队正在他们后面待命而立。最后，这个议院的基本群众推出的发言人都多少善于思考，小心谨慎，能仔细地权衡所有论据的利弊，而归根到底总是维护本州的利益；他们差不多个个发言都很不连贯，常常用他们自己的语法规则造句。当辩论涉及经费问题时，倡议多半是由他们，特别是由那些旧州的代表提出的。在这方面，乌利州在两院中已经获得了完全应得的声誉。

因此，一般说来辩论是贫乏、沉静、平庸无奇的。在国民院中，有才干的、在更大的会议上也能受到欢迎的演说家寥寥无几。我

只知道两位——魯維尼和杜福尔。爱特尔大概也可以算是一位。誠然，几位具有更大影响的議員的发言我还没有听到，但是不管从他们在議會中的成就或者是从报上关于他们演說的报道来看，都无法使我们对之寄予过多的希望。据说只有諾伊豪斯是个卓越的演說家。其实，在这至多只代表几十万人，并且只能討論最瑣碎的地方性問題的會議上，演說才能怎么能够得到發揮呢？已經寿終正寢的联邦代表會議，与其說是个立法會議，倒不如說是个外交會議。从这个會議上可以学到怎样发混乱的指示和怎样摆脱窘境的本領，但是引导和掌握會議的办法是学不到的。因此，国民院議員們的发言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局限于論证表决的根据，并且每个人都要闡述一番自己贊成或反对的主要理由，每个人都毫不害羞地重复前面发言人早已重复得令人作嘔的老調。特别是大部分議員的发言都带有宗法式的坦率的特点。如果这些先生中誰得到了发言机会，那他就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去瞎扯一通，对于辯論中涉及的所有事件都要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見，那怕关于这些事件的辯論早已結束。几位主要发言人极力想从这些头脑簡單的人的胡說八道中掌握住辯論的綫索，可是在會議結束後，你只会觉得，从来还没有听到过比这更无聊的演說。小市民 *physique* [在外表上] 給會議带来了某些新东西，因为很少見到他們打扮得这样古雅，但 *au moral* [在精神上]，他們在这里，和在任何別的地方一样，都是枯燥乏味，毫无热情，更談不到聪明机智了。只有一位魯維尼的发言具有感人的热情的力量；杜福尔是能以清晰准确的法語发言而使人敬佩的唯一的一个人。巴塞尔州弗雷的发言是風格幽默的范例。貝諾特上校有时也頗为成功地运用了这种幽默風格。瑞士法語区的居民絲毫沒有一点法国人的風趣。自从阿尔卑斯山脉

和汝拉山脉存在以来，在他們这一边从未創造出一个差强人意的双关語，从未有过一次流暢而中肯的反駁性发言。瑞士法語区的居民不仅 sérieux [严肃]，而且 grave [严峻]。

这里我想較詳細地描述一下关于德森事件和居住在德森的意大利流亡者的辯論。这一事件发生的情况是人所共知的：居住在德森的意大利流亡者的所謂阴謀，成了拉德茨基采取令人不能容忍的措施的一种借口；首府州伯尔尼往德森派去了享有广泛权限的联邦政府全权代表，而且还派去了一队士兵；由于在維尔特林^①和瓦列·因泰尔維爆发了起义，有些流亡者就想回到倫巴第去，尽管瑞士边防崗哨戒备森严，他們还是成功了；他們越过了国境，但是并没有携带武器，他們参加了起义。起义失敗后，他們又没有携带武器从瓦列·因泰尔維返回德森地区。在这里他們被德森州政府驅逐出境。这时，拉德茨基在边境地带加强了鎮压，并对联邦政府全权代表加倍地施加压力。

联邦政府全权代表要求无例外地驅逐所有流亡者出境，德森州政府拒絕这样做，首府州批准了全权代表的命令；于是，德森州政府便向当时正在开会的联邦議會提出申訴。国民院有责任討論这个申訴，并研究双方所提出的，主要是关于德森人如何对待全权代表和瑞士軍隊的实际材料。

被委托处理这个问题的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員，建議把所有意大利流亡者驅逐出德森，把他們集中在瑞士內地的一个地区，禁止新的流亡者进入德森，并且批准首府州的命令，延长其有效期限。委员会报告人是琉森的卡济米尔·普菲弗尔先生。可是，当我穿

① 意大利称作：瓦尔特林納。——編者注

过密密麻麻的听众，挤到旁听席时，普菲弗尔先生已经结束了他那十分枯燥无味的报告，接着发言的是皮奥达先生。

德森国务秘书皮奥达先生是委员会中少数派的唯一代表。他建议只驱逐那些参加了最近这次起义的流亡者出境，因为对他们问罪有名。这位反“宗得崩德”⁹⁴战争时期的少校营长皮奥达先生，别看他金发碧眼、外貌温和，当日在艾罗洛附近表现得英勇非凡，在敌军人数众多、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和作战地势优越的情况下，坚守了阵地一个星期。皮奥达的发言和他的外貌一样，温和文雅、富于感情。他精通法语，而且说得非常流利，不带任何土音。最先我以为他是瑞士法语区的居民，后来才晓得他是意大利人，感到非常惊讶。但是，当他谈到那些对德森人的非难时，当他为了反驳这些非难，描述瑞士军队在德森的行动就像在敌国境内的所作所为一样时，当他开始激动时，他就表现出一种如果说不是激情，那也是活灵活现的纯粹意大利人的能言善辩的特点。他时而使用了古代文句，时而又流露出独特的、不免过于夸张的现代演说家的慷慨激昂的风度。应该承认，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方面他善于适可而止，因此他的发言的这些部分就更显得绘声绘色。然而，整个说来，他的发言未免过于冗长和过于激动。瑞士德语区的居民们穿着贺雷西的 *aes triplex* [三层青铜盔甲]^①，所以，善良的皮奥达的所有精辟警句、所有高尚感情都被他们又宽又硬的胸膛顶回去了，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继皮奥达之后，苏黎世的阿尔弗勃德·埃歇尔博士先生走上了讲台。A la bonne heure [大家注意]——这正是 *comme il en*

① 贺雷西“颂歌”。——编者注

faut pour la Suisse〔瑞士所需要的〕人物！埃歇尔博士先生是联邦政府駐德森的全权代表，国民院副議長。如果我沒弄錯的話，他是著名的机械专家埃歇尔工程师的儿子。他父亲开凿了林特运河，并且在苏黎世附近修建了一座規模巨大的机器制造厂。埃歇尔博士先生与其說是苏黎世人，不如說是“瑞士的雅典人”。他的燕尾服和坎肩是由苏黎世最好的 marchand tailleur〔裁縫〕縫制的，使人感到他具有一种模仿巴黎时装杂志上的服装式样的可嘉的、有时是不无成效的意图，但是終究仍能觉察到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地方局限性的影响，这种地方局限性迫使裁縫們不得不遵循这里习惯的服装式样。真是凭衣識人。他的淡色头发剪得很細致，可是小市民的味道十足，髻須也是这样，因为我們瑞士的阿基比阿德当然也要留髻須——这是想装得酷似阿基比阿德第一的、出身“名門”的苏黎世人的一种怪癖。当埃歇尔博士先生代替施泰格尔几分钟，坐上主席席位时，他便竭力显示他那种既威严又文雅冷漠的風度，这时，恐怕馬拉斯特先生都要羡慕他呢。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尽力利用这几分钟，让自己那在硬梆梆的长凳上坐酸了的脊背在这軟綿綿的圈椅上休息一下。一句話，埃歇尔先生像一般瑞士雅典人所能够作的那样，举止非常文雅，同时，他还富有、漂亮、健壮，年紀不超过三十三岁。——对伯尔尼的太太們來說，这位苏黎世的阿基比阿德真是一种莫大的危險。

此外，埃歇尔先生还說一口又流利、又漂亮的德語，这对一个在瑞士本土出生的雅典人說来，一般是不很容易的。他会說一些談諧的成語，虽然带有多立斯口音，但是不出語法錯誤，这就更不是瑞士德語区选出的任何一个国民院議員都能做到的了。像所有瑞士人一样，他說起話来，神气十足。要是埃歇尔先生已經七十

岁，他的讲话就不会像前天的发言那么神气了。但是，他是这个议院中最年轻的議員之一。此外，他还有一种瑞士人所没有的品质。瑞士德语区的每个居民，不管讲什么话，不分任何场合，终生都是使用一种手势。例如，凯伦博士先生是右手侧平举，成直角。军官们也是这种手势，只有一点不同，军官们的手是前平举，而不是侧平举；阿劳的唐纳先生每说三个字就一鞠躬；富勒尔先生也这样鞠躬，时而向前，时而转身半面向左或向右。总之，如果把所有说德语的国民院議員集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电报密码体系。埃歇尔先生的手势是，一只手前平举，儼然像抽水机上的杠杆一样，不断地伸缩。

至于说到埃歇尔博士先生发言的内容，那我就没有必要再赘述他发言后全权代表们的抱怨了，何况这些抱怨几乎全都由大多数德国报纸从“新苏黎世报”上转载了。这篇发言没有丝毫新东西。

意大利式的热情代替了苏黎世式的庄重神气：继埃歇尔博士先生之后发言的是鲁维尼上校。鲁维尼是个出色的军人，德森州一切军事组织的成績都应当归功于他。1840年革命时期，他曾指挥军队作战；1841年8月，由于他的机智和毅力，在一天内就粉碎了那些已被推翻的政治寡头们和神甫们企图从皮蒙特进犯并实行反革命政变的企图。在反宗得崩德的战争中，他由于被宾登人遗弃而成了唯一的俘虏。鲁维尼从座位上跳起来，为自己州的同胞辩护，反驳埃歇尔的攻击。埃歇尔先生的责难虽然言过其词，但表面上语调却很平静，好像小学教师讲话一样，然而不能说它不尖酸刻薄，相反地，每个人都明白，空谈家深奥难懂的发言本身就是颇令人难于忍受和感到侮辱的了。

魯維尼以老兵和德森人的全部热情反駁了埃歇尔。德森人作为瑞士人只是由于偶然性，而作为意大利人则是由于天性。

“难道这里不是有人直接責难德森人，說他們‘同情意大利的自由’嗎？是的，这个責难是对的。德森人同情意大利，我为此而驕傲，并且将日日夜夜不停地禱告上帝，祝这个国家从它的压迫者之下解放出来。是的，与埃歇尔先生所說的相反，德森人是安靜而和平的人民。但是，如果他們每日每时都不得不看到瑞士士兵同奥地利人，同無論在什么时候只要提到他的名字就不能不使我的内心深为痛苦的那个人的警察队伍，同拉德茨基的雇佣兵在那里亲密交往，称兄道弟的話——他們怎能保持安靜呢？要知道，在他們看来，克罗地亚人干的尽是丑恶不堪、殘酷无情的勾当。是的，德森人是安靜而和平的人民。但是，当有人把那些与奥地利一鼻孔出气的、有时也像克罗地亚人一样橫行霸道的瑞士士兵派到他們那里去的时候，他們当然不能再安靜和平下去了！〈随后他列举了許多說明瑞士軍队在德森的所作所为的事实。〉处在外国人束縛与奴役之下已够沉痛、够悲伤了，但是，当你身受这种屈辱的时候，总还可以盼望有一天会把外国人赶走。然而，当你的弟兄和同盟者奴役你的时候，就是說，当他們把絞索套到你脖子上的时候，这就实在……”

主席的鈴声打断了发言人的讲话。这是在提醒魯維尼注意秩序。他又讲了几句話，便气冲冲地断然結束了自己的发言。

在热情洋溢的魯維尼之后，格劳宾登的米歇尔上校走上讲台。宾登人，除了說意大利語的米佐克斯^①居民以外，自古以来，对待自己的邻居——德森人，就不怀好感。米歇尔先生也忠实于自己故乡的这种傳統。他以极其庄重和慈善的口吻說話，企图詆譏德森人的声明，对德森的人民群众极尽誣蔑誹謗之能事，甚至根本不近人情地非难德森人，說他們（完全公正地）把他們在艾罗洛的失敗归咎于米歇尔的同胞——宾登人。在发言結束时，他客气地提

^① 意大利称作：梅佐科。——編者注

議要德森政府負擔一部分边防費用。

根据施泰格爾的提議，辯論到此暫時停止。

第二天早晨，最先发言的是苏黎世的貝尔格上校先生。貝尔格上校先生（用不着我描写他的外貌了，因为前面我已經說过，在瑞士德語区，所有軍官彼此外貌非常相似）是駐德森的苏黎世营营长，关于这个营的凶暴横蛮，魯維尼先生已引了許多例子加以說明。自然，貝尔格先生有責任替自己的营辯护。但是，由于他很快就为为此而收集的所有事实和理由說完了，于是，他便轉而对魯維尼进行異常激烈的人身攻击。

他說：“魯維尼在这里談到軍队的紀律，并使最优秀、最坚强的一个营的紀律受到怀疑，他應該感到慚愧。因为我要是发生了像魯維尼先生发生过的那种事情的話，我早就提出辞职了。在反宗得崩德战争中，魯維尼先生和他在数量上超过敌人的軍队被打得一敗塗地。而在接到进攻命令时，他却說什么不可能，因为他的軍队士气不振等等。其实，这件事情我本来不打算在这里，而是在别的場合同魯維尼先生談的。我喜欢和論敌当面交鋒。”

貝尔格先生在发表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許多挑衅性的声明和侮辱性的言論时，有时口吻非常自信，神气十足，有时語調激昂，憤憤不平。显然，他想模仿魯維尼的慷慨陈辞的風度，結果却大丢其臉。

由于在我的报道中曾两次提到艾罗洛事件，而現在又碰到它，那我就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簡略地談一談。杜福尔对宗得崩德的作战計劃是这样的：在主力軍进攻夫賴堡和琉森的同时，德森人應該穿过圣哥达，而宾登人則應該經上阿尔卑斯进入烏澤恩山谷，解放并武装当地热爱自由的居民，用这种声东击西的办法，切断瓦里斯与諸旧州的联系，截断宗得崩德的琉森主力軍。这个計劃沒

有实现，第一是由于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烏利人和瓦里斯人就已占领了圣哥达，第二是由于宾登人行动迟缓。宾登人根本没有把天主教自卫团动员起来，而已动员起来的部队又受天主教居民的影响，他们在迪先提斯最高法院会议上表示拒绝继续进攻。这样一来，德森便不得不孤军作战。然而，要知道，这个州的武装组织还很年轻，全德森的军队总共只有三千人左右。与宗得崩德相比，德森势孤力薄便是显而易见的事了。与此同时，烏利、瓦里斯和温特瓦尔顿各州得到了装备有大炮的两千人的部队的增援，这些州的军队于1847年11月17日突破圣哥达，冲进了德森。德森的军队正列成梯阵，驻扎在比林索那与艾罗洛之间的勒文蒂纳河谷一带，后备队伍则驻在罗迦诺。宗得崩德的军队在浓雾掩蔽下占领了艾罗洛周围的所有高地。雾散天晴时，鲁维尼才发现，没响一枪一炮，他的阵地已完全丧失。但是，他还准备反攻，经数小时的搏斗（在搏斗中，德森人表现得无比英勇），他的军队由于寡不敌众，被迫退却。起初，有几支部队掩护撤退。但是，由于被敌人左右包抄和受到居高临下的炮击，德森的新兵很快就仓皇逃散，溃不成军，只是过了八个小时，直到莫埃沙附近，才算压住了阵脚。熟悉圣哥达道路的人一定清楚，从山上往下冲锋的军队占有多么大的优势，特别是在有炮兵的时候；同时也完全可以理解，从山上往下退却的军队，在那区区狭谷中，既无立足之地，又无法展开自己的队伍，何况实际参加这一战斗的德森人，在数量上不仅不比宗得崩德的军队多，而且恰恰相反。这一次其实并没有产生深远后果的失败，自然不能归咎于鲁维尼，而是由于：第一，他的军队人数不多，缺乏训练；第二，地势不利；第三，这是最主要的，宾登人没有及时支援，他们没有到上阿尔卑斯去，却在迪先提斯安闲无事地大饮

特飲維爾特林葡萄酒，直到后来，才 *post festum* [放馬后炮]^①，派了两个营經圣伯納德山口去支援德森人。可是那些在紧要关头見死不救的人，那些在夫賴堡和琉森战役中以三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取得了小小胜利的人，却因为宗得崩德以优势兵力取得了唯一的一次胜利而責难德森人！

你們知道，貝尔格这次对魯維尼的攻击导致了决斗，在决斗中，罗曼人向苏黎世人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还是言归正傳，繼續談辯論的情况吧。土尔高州的凱倫先生登上讲台，表示支持多数派的提議。凱倫先生是典型的瑞士人，高个子，寬肩膀，一張愉快而富有表情的面孔，头发梳得有些矯揉造作——老实的瑞士人会以为想像中的奥林帕斯山的丘必特就是这个样子。論服装，他有点像学者，他的眼神、語調和举止都显示出一种不屈不撓的果断精神。凱倫先生被认为是瑞士最有才干、最有洞察力的律师之一。这位联邦法院院长用“他所特有的邏輯”，用他那故弄玄虛的言辞，开始詳細地叙述自己对德森問題的看法。但他很快就使我感到非常无聊，于是，我觉得倒不如到“意大利咖啡館”去喝一杯瓦里斯酒。

当我回来时，在凱倫之后，日內瓦的阿尔梅拉斯，瓦得州^②的洪貝格尔，布朗施奈以及日內瓦的卡斯托蒂都已相继发了言。他們都是地方上的或多或少有权势的人物，他們在瑞士才初露头角。正在讲台上发言的是瓦得州的爱特尔。

瑞士人的个子比一般人高大，就像瑞士的牛比一般牛粗壮一样。所以在瑞士，爱特尔先生的个子不算高，虽然在法国可能算得

① 直譯：在节日之后。——編者注

② 法国称作：窩州。——編者注

上是个 *jeune homme fort robuste* [非常魁梧的青年人]。他面目清秀，淺色的胡須，淺色的卷髮；他和瓦得州所有居民一樣，比瑞士羅曼語區的其他居民要更像法國人。我沒有必要補充說，他是瓦得州極端激進的紅色共和派的最知名的代表之一。而且他還年輕——絕不比埃歇爾大。愛特爾先生很激烈地反對聯邦政府的全權代表：

“他們在德森作威作福，似乎德森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只是一個省份，而他們是管轄這個省份的總督。如果這些先生們在法語州里的行為也是這樣的話，那早就請他們滾蛋了！但是，這些先生們對於德森人心平氣和地忍受他們那種以勝利者自居的派頭和狂妄，不僅不知感謝上帝，反而埋怨接待不周！”

愛特爾先生發言很精彩，但有些冗長。他像所有瑞士法語區的人一樣，缺乏機智。

老施泰格爾也從主席的席位上替多數派的提議說了幾句話，接着，我們的阿基比阿德-埃歇爾又上台重複他以前講過的那些話。而且，這次他還想賣弄演說技巧。然而，就是隔三里遠也聽得出，這是小學生在學習朗讀：

“或者我們保持中立，或者我們不保持中立。但是，不管中立不中立，我們都應該一貫到底。瑞士固有的忠誠要求我們必須履行自己的諾言，哪怕這諾言是對專制暴君許下的。”

埃歇爾先生不知疲倦的手就像抽水機一樣，從這新穎而令人信服的思想中，滔滔不絕地抽出了一大堆莊嚴的豪言壯語。在這之後，阿基比阿德洋洋自得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隨後走上講台的是最高法院院長，阿勞的唐納先生。他身體瘦削，中等個子，發言時高喉嚨大嗓子，講的盡是些毫無意義的瑣

事。他的发言不外是千百次地重复同一个語法錯誤。

下一位发言人是法語州瓦里斯的莫里斯·巴尔曼先生。从外表看来，誰也不敢相信，在1844年，以卡貝馬頓、里德馬頓和其他的馬頓們^①为首的上瓦里斯人在該州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他在庞-德-特里延特附近会那样勇敢地战斗。巴尔曼先生外貌显得沉靜，像小市民，但是絲毫不令人感到不快；他說話緩慢，断断续续。他反对貝尔格对魯維尼的人身攻击，表示贊成皮奥达的提議。

德森的巴塔里尼先生外貌有点像小市民，嘴巴刻薄的人会把 他比作“費加罗”中的巴尔托洛医生⁹⁵。为了维护本州的利益，他用法語对中立問題作了长篇发言，其中包含着許多完全正确的原則，但是沒有引起听众的特別注意。

突然，会场鴉雀无声，談話和走动頓時停止。出現了一种庄严的靜寂。全体与会者的目光都注視着一位沒有髯須、秃头、鷹鼻的老头，他用法語开始了自己的发言。这个小老头身穿普通的黑西装，文人打扮，极像学者。他那富于表情的面孔，銳利的炯炯目光很引人注意。这正是杜福尔將軍，就是那位靠自己的深謀远虑的战略，几乎沒有流血就把宗得崩德鎮压下去了的杜福尔。他和会场里瑞士德語区的軍官多么不相像啊！所有这些米歇尔、齐格勒、貝尔格等等，这些有勇无謀的莽汉，这些愚蠢的丘八，同这位矮小的、貌不惊人的杜福尔相比，簡直給人一种迥然不同的特殊印象。一眼就可以看出，杜福尔是对宗得崩德进行的全部軍事行动的决策人，而那些自命不凡的哀杰克斯只不过是完成他的决定的簡單工具而已。真的，联邦代表會議做了正确的选择，找到了合适的

^① 俏皮話：《Matten》〔馬頓〕是前面两个人名的組成部分，同时有“高山上的草地”的意思。——編者注

人材。

可是，当你听杜福尔发言时，你才会真正感到惊讶呢。这位一生中只从事建立炮兵学校、起草操作规程、视察炮台，从未参与议会辩论，而且从未当众作过演说的工程部队的老军官，在这里发言时却表现了惊人的镇定、轻松，用语精辟、确切、明了。在瑞士国民院中，没有人能和他匹敌。杜福尔这篇关于德森问题的 maiden-speech [初次议会演说]，就其形式和内容而论，即使在法国议会中也一定会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篇发言在各方面都大大胜过了卡芬雅克^① 那篇给他带来巴黎最优秀律师声誉的长达三小时的发言，——根据“通报”发表的发言全文可以做这样的论断。至于谈到语言的优美，这篇发言就更值得加倍赞扬，因为它是出自日内瓦人之口。日内瓦的民族语言，是根据加尔文教精神改革了的法语，发音拖得很长，而且很粗硬，词汇贫乏，单调一律，平淡无力。而杜福尔发言，用的不是日内瓦人的语言，而是真正的最纯洁的法语。此外，他的观点具有军人（在这个字的最好的意义上说）的高尚气度。所以，瑞士德语区的军官们的职业妒忌心，勾心斗角的竞争，拘泥小节的州的局限性就更加相形见绌了。

杜福尔说：“人人言必谈中立，这使我非常高兴。但什么是中立呢？中立就是我們不做或者不容许做能给瑞士与其邻国的和睦关系带来威胁的事。不能少于这一点，但也不能多于这一点。所以，我們有权利让流亡者避难，并且我們以这种权利而自豪。我們认为，这是我們对那些遭受不幸的人应尽的义务。但是，必須有一个条件：流亡者必須服从我們的法律，他們不能从事危害我們国内外安全的活动。我完全了解，遭专制暴政驱逐的爱国者，在我国領土上也力求为自己祖国的自由而斗争。我并不因此責难他們，但是，在这

^① 高德弗魯阿·卡芬雅克。——編者注

种情况下，我們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行动。所以，如果流亡者用笔或者用枪进行斗争，去反对邻国政府的话，我們并不因此就驅逐他們，那样做是不公正的；我們只是叫他們远离国境地区，让他们集中居住在一个地方。这是由于顾及到我們自己的安全和尊重邻邦。必須这样做，但是也不能超过这个限度。如果我們不仅反对潜入別国領土的志願兵，而且也反对志願兵的父老兄弟，反对那些安分守己的人，那我們就是做得过分了，我們就不是保持中立，而是站在別国政府那边，站在专制制度那边去反对这个制度的牺牲者了。〈从所有議席上发出喝彩声：“讲得对！”〉正是現在，当拉德茨基，这位所有与会者中間未必会有人同情的拉德茨基，要求我們不公正地叫所有流亡者远离边境地带时，当他想采取威胁手段，甚至采取敌对的措施来实现自己的要求时，我們更不应该滿足比較强大的对方的不合理要求，因为这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們向占优势的力量让步，似乎我們采取这种决定，只是因为比較强大的对方要求我們这样做。〈喝彩声：讲得对！〉”

可惜，我不能更詳尽、更准确地复述这篇发言。这里沒有速記員，我只能凭記憶来写。只要补充一点就够了：杜福尔的演說天才，他发言的平易近人以及他所引用的确凿論据，使所有到会的人都驚訝不已。随后，他宣布支持皮奥达的提議，便在全場一致的掌声中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在国民院辯論中，我从未听見過有人鼓掌。这样，就事成定局。在杜福尔发言之后，便沒有什么再要說的了，于是皮奥达的提議被通过了。

但是，这並沒有使那些涉及其切身利益的小州的騎士們滿意。当表决是否停止辯論时，他們有四十八票要求繼續辯論。投票贊成停止辯論的只有四十二人，于是辯論繼續进行。瓦得的維昂先生提議，把这件事提交联邦委员会解决。瓦得的皮泰先生表示贊成皮奥达的提議。皮泰先生是个美男子，典型的法国人，講話流利，冗长，好高談闊論。当联邦主席富勒尔先生登上讲台时，看来，辯論已接近尾声了。

富勒尔先生年华正茂，他可以补阿基比阿德-埃歇尔的不足。埃歇尔代表瑞士的雅典人，富勒尔先生则代表苏黎世；埃歇尔像一位教授，富勒尔则更像是行会制度时期的师傅。他们两位合在一起，便使人们对苏黎世有了完整的概念。

富勒尔先生当然是位主张绝对中立的人。因此，在杜福尔发言之后，他感到自己的体系受到严重的威胁，于是便拿出最后一着来，以保证赢得大多数。虽然富勒尔先生只是在三天以前才当上了联邦主席，但是他却证明，他把辩论归结为对政府信任问题的本事并不亚于杜沙特尔和汉泽曼。他声明说，联邦委员会迫不及待地等候国民院做出决定，因为这一决定会使瑞士的整个政策发生决定性的转变等等。他稍微粉饰了一下这种 *captatio benevolentiae* [哗众取宠的企图]，就逐渐把话题转到叙述自己和联邦委员会多数派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上面去。他说，中立政策是不容动摇的，处理这一问题的委员会多数派的意见也就是联邦委员会多数派的意见。他说这些话时，威风凛凛、斩钉截铁，使人感到每一个字都贯穿着对政府信任的问题。这里有必要提一句，在瑞士，与君主立宪政体和新的法兰西宪法不同，执行机关不是与立法机关平行而独立的，它只不过是立法机关的表现者和工具。应该注意到，这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惯例，即当立法会议的决定与执行机关的意图有分歧时，执行机关便提出辞职；相反地，通常它只能唯命是从地执行这种决定，坐待好时光的到来。由于执行机关也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它的成员也是形形色色的，所以，即使执行委员会的少数派在某些问题上获得立法委员会多数派的支持，也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况且在这里，至少有两名联邦委员会的委员支持皮奥达，反对富勒尔，这就是德律埃和弗兰西尼；所以，富勒尔向议会

发出的呼吁，从瑞士的习惯和观点看来，是完全不符合议会制度的精神的。但是，横竖还不是一样！联邦主席先生的举足轻重的讲话，重新给了小州的骑士们以勇气，当他回到座位上去时，他们甚至发出了瞬息即逝的“叫好声”，并要求停止辩论。

但是，老施泰格尔做得非常公正，预先给了少数派的报告人皮奥达先生以发言机会。皮奥达像以前一样，说话沉着、彬彬有礼。他再次驳斥了所有的非难，给辩论做了扼要的总结。他满腔热情地替他的朋友鲁维尼辩护。他那充满热情的娓娓动听的言辞，也许使得鲁维尼悠然神往。但是，绝不应该忘记，鲁维尼为瑞士保住了自己的州。最后，他谈到了艾罗洛事件，并且对于在这里曾提起这件事，而且是最出乎他的意料的那些人提起这件事，表示遗憾。

他说：“我们的确在艾罗洛打了败仗，但是，我们是如何失败的呢？我们是孤军作战，而诸旧州和瓦里斯是倾全力突然袭击我们人口稀少的小州的。虽然我们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他们还是把我们打败了。我们的确是被击溃了。但是，难道你们〈面向米歇尔〉有资格因此责备我们吗？先生们，我们之所以被击溃是由于你们的过错。你们本来应该到上阿尔卑斯去，从侧翼袭击宗得崩德军队，正是因为你们没有到那里去，正是因为你们把我们弃而不顾，所以我们才被击溃了。是的，你们去了，先生们，但是，当你们终于到达时，已经太晚了，一切都已经完了！”

米歇尔上校愤怒地跳了起来，面红耳赤地说，这完全是撒谎和诬蔑。场内发出激怒的呼声，主席也摇了铃，要求他遵守秩序，他这才比较冷静地讲下去。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他应当到上阿尔卑斯去，他只知道，接到命令后，他第一个去支援了德森人。

皮奥达像往常一样，不慌不忙地回答他说，他并不想责难米歇尔先生本人，他只是一般地谈到格劳宾登人，而格劳宾登人有责任从上阿尔卑斯方面支援德森人这一点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如果米

歇尔先生不清楚这件事情，那很可能是由于他那时只指挥一个营，所以总的作战计划他可能不知道。

这段小插曲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些先生们在会外作了各种各样的私人解释，最后发表了双方满意的声明，才算收场，辩论也就此结束了。表决是按有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的。法语区的议员和四五位德语区的议员投票赞成德森人，大多数德语区的议员则投票反对德森人。德森允许别人避难的权利被剥夺了，拉德茨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议会宣布不惜任何代价严守中立，富勒尔先生可以沾沾自喜，并对国民院感到满意了。

使瑞士国家精华聚于一堂的瑞士国民院就是这个样子。我认为，他们与其他立法者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他们具有一种美德：更大的耐心。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2 月 6 日
载于 1848 年 12 月 10 日“新莱茵报”
第 165 号和第 165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反革命政变

科倫 12 月 7 日。国民議会被解散了。人民代表“奉天命”被驅散了。

內閣不仅厚顏无耻地举行了政变，而且在說明采取这种暴力行为的理由时还发出了恶毒的嘲笑⁹⁶。

国民議會长期以来軟弱怯懦，現在它自食其果了。它曾听任反人民的阴謀活动在好几个月中从容地策划、加强和巩固，而現在它成了这种阴謀活动的第一个牺牲品。

同时，人民也在贖取他們在 3 月間以及后来在 4 月和 5 月間由于寬大，更确切些說，由于糊塗所犯下的罪过，贖取他們进行所謂“消极反抗”所犯下的罪过。現在，他們获得了教訓，可以預料，这种教訓對他們是大有好处的。他們下一次的胜利将会結束“協商”政策及一切空話和偽善。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2 月 7 日
載于 1848 年 12 月 8 日“新萊茵报”
第 16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資產階級和反革命

一

科倫 12 月 9 日。我們从不隱瞞這一點。我們的基础不是法制的基础，而是革命的基础。現在，政府方面拋棄了法制的偽善面目。它站到了革命的基础上，因為現在反革命的基础也是革命的基础。

1848 年 4 月 6 日頒布的法律的第六節規定：

“頒布一切法律時的表決權，以及確定國家預算和批准稅收權，無論如何都應屬於未來的人民代表。”

1848 年 4 月 8 日頒布的法律的第十三節規定：

“根據本法律召開的議會，其使命是通過同國王協商的辦法制定未來的憲法；議會在其存在期間享有原先各個國家等級的權利，特別是批准稅收的權利。”

現在，政府驅散了協商議會⁹⁷，擅自強迫國家接受 soi-disant〔所謂〕憲法⁹⁸，並且自己給自己批准人民代表拒絕給它批准的捐稅。

普魯士政府用沉重的一擊消滅了康普豪森之歌，一種莊嚴的法制的約卜西之歌⁹⁹。為了復仇，這部史詩的創造者——偉大的康普豪森，以這個普魯士政府的使者的資格繼續安閑地留在法蘭克福，並且為了這個普魯士政府的利益繼續同巴塞爾曼之流進行

陰謀活動。發明了協商論的康普豪森，為了拯救法制基礎，即為了首先用欺騙手段使革命失去其應享的榮譽，同時還發明了以後必然要把法制基礎連同協商論一起炸毀的地雷。

這個人推行了間接選舉制，而這種選舉制產生了這樣一個議會，當這個議會突然發怒的時候，政府就可以聲色俱厲地對它說：**Trop tard!**〔太晚了！〕這個人召回了反革命的首領普魯士親王，並且不惜用官方的欺騙手腕把親王的逃跑說成是增長見識的旅行¹⁰⁰。他使舊普魯士關於政治罪行的立法和舊普魯士法院繼續有效。在康普豪森執政時期，舊官僚機構和舊軍隊贏得了喘息和重整旗鼓的時間。舊制度的一切主要活動家仍然盤踞着原來的位置，凜然不可侵犯。在康普豪森執政時期，權奸們在波茲南進行了戰爭，而他本人則在丹麥進行了戰爭。對丹麥的戰爭無非是分散德國青年們的“過分的愛國激情”¹⁰¹的避雷針，此外，這些青年在回國以後還受到了警察的應有的感化；這場戰爭應當給弗蘭格爾將軍和他那臭名遠揚的近衛軍團帶來某種聲望，而且一般地還應當恢復普魯士軍閥的名譽。這個目的剛一達到，就不惜任何代價，即通過可耻的停戰來結束這場裝模作樣的戰爭，這種停戰是同一個康普豪森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德國國民議會的同意下實行的。對丹麥戰爭的結果是：任命了“兩個馬爾克的總司令”¹⁰²，3月間從柏林被趕出去的近衛軍團又回到了柏林。

而波茨坦的權奸在康普豪森的庇護下進行的波茲南戰爭怎樣呢！

波茲南戰爭是一個比反對普魯士革命的戰爭更大的事件。這是維也納的陷落、意大利的失敗、六月英雄們的失敗。這是俄國沙皇對歐洲革命的第一次決定性勝利。而這一切都是具有思考力的

历史之友¹⁰³、大辯論的騎士、協商主義的英雄、偉大的康普豪森的庇護下發生的。

因此，在康普豪森執政時期，在他的幫助下，反革命占領了一切有決定意義的障地；在協商派議會進行辯論的時候，反革命為自己組織了隨時準備投入戰鬥的軍隊；在行動大臣漢澤曼-品托¹⁰⁴執政時期，舊警察領到了新的制服，進行了資產階級反對人民的既殘酷又小氣的鬥爭。在勃蘭登堡執政時期，根據這些前提作出了結論。為此，只需要一種東西——胡子和軍刀，而不是腦袋。

當康普豪森辭職的時候，我們說過：

“他根據資產階級的精神播下了反動的種子，將根據貴族和專制制度的精神收穫反動的果實。”¹⁰⁵

我們並不懷疑：普魯士大使康普豪森閣下現在已把自己列入封建主之中，他將心平氣和地容忍對他所產生的“誤會”。

可是不應當產生錯覺；不應當把世界歷史的首創精神加在某一個康普豪森、某一個漢澤曼身上，這是一些平庸的人物。他們只不過是階級的傳聲筒。他們的言論，他們的行動，只不過是把他們推向前台的那個階級的官方回聲。他們只不過是在前台上代表了大資產階級。

這個階級的代表在那已經安然長眠、只是由於康普豪森才暫時蘇醒過來的**聯合議會¹⁰⁶**中形成了自由主義反對派。

有人責難這個自由主義反對派的先生們，說他們在三月革命以後背叛了自己的原則。這是一種誤會。

聯合議會所唯一代表的大地主和大資本家，一句話，那些有錢的人，都發了財，並成了比較有學識的人。一方面，隨着普魯士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即隨着工業、商業和農業的發展，舊的等級差

別失去了自己的物质基础。

貴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資產階級化了。他們拋棄了信义、愛情和信仰，大都开始販賣甜菜、燒酒和羊毛。羊毛市場成了他們的主要競爭場所。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专制国家的旧社会基础已經消失，它已成了束縛新的資產階級社会及其改变了的生产方式和改变了的需求的桎梏。資產階級从自己的物质利益出发，必然要提出参与政权的要求。只有它自己才能利用各項法律来满足它的商业和工业的要求。它必然要从既不学无术而又妄自尊大的腐朽的官僚手中把照管它的这些“最神圣的利益”的权力夺取过来。它必然要要求监督国家財政的权利，因为它自己是財富的創造者。資產階級在剝夺了官僚对所謂教育的壟断权以后，在意識到它在真正理解資產階級社会要求方面优越于官僚以后，它也想获得同它的社会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資產階級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討論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做“出版自由权”。它必然要取得毫无阻碍地結成社團的可能。它把这叫做“結社自由权”。同样，它必然要取得信仰自由等等，而这是自由竞争的必然后果。普魯士資產階級在1848年3月前夕曾走上了实现自己全部願望的正确道路。

普魯士国家遇到了財政困难。它的信貸已經枯竭。这就是召开“联合議會”的秘密。誠然，政府曾对自己的命运进行过反抗，无情地解散了“联合議會”，但是，缺少金錢和信貸归根到底必然要把它推入資產階級的怀抱。正像封建貴族一样，天賦国王們也早已把他們的特权兌換成了硬幣。在基督教德意志的各个邦中，解放农奴是这种历史交易的头一桩大生意，君主立宪則是这种历史交易的第二桩大生意。《L'argent n'a pas de maître》〔金錢沒有主

人],但是,只要 démonétisés [失去了金錢], maîtres [主人]就不再是 maîtres 了。

由此可見,“聯合議會”中的自由主義反對派只不過是一種反對不再適合資產階級利益和需求的那種政體的資產階級反對派。為了反對宮廷,它就必須要討好^①人民。

也許,自由主義反對派真的以為,它是為了人民而當反對派的。

因此很自然,只有在為人民爭取權利和自由的幌子下,它才能從政府手中為自己爭得權利和自由。

如前所說,當二月風暴襲來的時候,這個反對派曾走上了正確的道路。

① 雙關語:«Hof»——“宮廷”,«den Hof machen»——“討好”。——編者注

二

科倫 12 月 11 日。當三月革命的洪水——en miniature〔縮小規模的〕洪水——泛濫過去後，在柏林地面上留下的不是什麼龐然大物，不是什麼革命巨人，而是一些舊型生物，一些低矮的資產階級人物——“聯合議會”的自由派，覺悟的普魯士資產階級的代表。資產階級最發達的省份，即萊茵省和西里西亞，提出了新內閣的基本人選。尾隨其後的有萊茵省的大群律師。隨着資產階級被封建主排擠到次要地位，萊茵省和西里西亞在內閣里也向舊普魯士各省讓位了。勃蘭登堡內閣只是通過一個愛北斐特的托利黨人，才與萊茵省保持了一點聯繫。漢澤曼和海特男爵！在普魯士資產階級看來，這兩個名字體現着 1848 年三月和十二月之間的全部差別！

普魯士資產階級被拋上了國家政權的高峰，但並不是像它所希望的那樣，是由于**同王權成立和平協定**的結果，而是由于發生了**革命**的結果。它應該不是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去反對王權，即反對自己，因為**人民運動**替它掃清了道路。但是在它看來，王權只是它用來掩蓋自身的塵世利益的一種神明屏障。它自身的利益和與這些利益相適應的政治形態的不可侵犯性，譯成憲法的語言應該是**王權的不可侵犯性**。因此，德國資產階級特別是普魯士資產階級就朝夕盼望**君主立憲政體**。所以，雖然二月革命及其在德國的回聲是對普魯士資產階級有利的，因

为这个革命使普魯士資產階級掌握了国家的政柄，但同时这个革命也打碎了它的如意算盘，因为此时它的統治已受到它所不願意并且也不能履行的那些条件的束縛了。

資產階級只是袖手旁觀，讓人民為它作戰。因此，轉交給它的權力，也就不是一個統帥在戰勝自己的敵人後掌握的權力，而是一個受勝利了的人民委託來保護人民利益的安全委員會掌握的權力。

康普豪森還感覺到了這種情況的種種不便，並且他的內閣的全部軟弱性都是從這種感覺和引起這種感覺的那些情況中產生的。因此，他的政府的那些最無恥的行徑好像還帶有几分羞愧的色彩。漢澤曼的特權卻就是肆無忌憚的無恥和橫蠻了。色調上的差別就是這兩個藝術家之間的唯一差別。

普魯士的三月革命既不應該和 1648 年的英國革命混為一談，也不應該和 1789 年的法國革命混為一談。

在 1648 年，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結成了同盟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封建貴族和反對占統治的教會。

在 1789 年，資產階級和人民結成了同盟反對君主制度、貴族和占統治地位的教會。

1789 年的革命只有 1648 年的革命來做它的原型（至少就歐洲來說），而 1648 年的革命則只有尼德蘭人反對西班牙的起義來做它的原型。這兩次革命中的每一次革命都比自己的原型前進了一個世紀；不僅在時間上是如此，而且在內容上也是如此。

在這兩次革命中，資產階級都是實際上領導運動的階級。無產階級和那些不屬於資產階級的城市居民階層，不是還沒有與資產階級不同的任何單獨的利益，就是還沒有組成一些獨立發展

的階級或一個階級的幾個部分。因此，在它們起來反對資產階級的地方，例如 1793 年和 1794 年在法國，它們只不過是為實現資產階級的利益而鬥爭，雖然它們採用的是非資產階級的方式。**全部法蘭西的恐怖主義**，無非是用來消滅資產階級的敵人，即消滅專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儈主義的一種平民方式而已。

1648 年的革命和 1789 年的革命，並不是英國的革命和法國的革命；這是歐洲範圍的革命。它們不是社會中某一階級對舊政治制度的勝利；它們宣告了歐洲新社會的政治制度。資產階級在這兩次革命中獲得了勝利；然而，當時資產階級的勝利意味著新社會制度的勝利，資產階級所有制對封建所有制的勝利，民族對地方主義的勝利，競爭對行會制度的勝利，財產分配制對長子繼承制的勝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制對土地所有者隸屬於土地制的勝利，教育對迷信的勝利，家庭對宗族的勝利，進取精神對游俠怠惰風氣的勝利，資產階級法權對中世紀特權的勝利。1648 年的革命是十七世紀對十六世紀的革命，1789 年的革命是十八世紀對十七世紀的勝利。這兩次革命不僅反映了它們本身發生的地區即英法兩國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整個世界的要求。

普魯士的三月革命却完全不是這樣。

二月革命在事實上消滅了君主立憲政體，在思想上消滅了資產階級政權。普魯士的三月革命却要在思想上建立起君主立憲政體，在事實上建立起資產階級政權。三月革命決不是歐洲的革命，它不過是歐洲革命在一個落後國家里的微弱的回聲。它不僅沒有超過自己的世紀，反而比自己的世紀落後了半世紀以上。它一開始就是一種**繼發性的現象**，大家都知道，繼發性病症比原發性疾病更難醫治，並且對機體更加有害。當時的問題不是要建立一個新

社会，而是要在柏林复活那种早已在巴黎死亡了的社会。普魯士的三月革命甚至不是民族範圍的、德意志範圍的革命，它一开始就是普魯士地方性的革命。維也納起义、加塞尔起义、慕尼黑起义——总之任何省区发生的起义，都是同它并駕齐驅的，都同它爭夺首位。

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因其完成了創造工作而充滿了无限的自豪感；1848年的柏林革命却以它落后于时代而自夸。这次革命的光芒好像遥远星球的光芒一样，在发出这种光芒的那个星球消逝了十万年以后，才达到我們地球上居民的眼中。普魯士的三月革命对于欧洲來說就是这样一個星球，不过是縮小了規模的表現——一般說來，它在一切方面的表現都是縮小了規模的。它的光芒是一个早已腐朽了的社会所发出的光芒。

德国資產階級发展得如此萎靡、畏縮、緩慢，以致当它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峙的时候，它本身已經是同无产階級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階級相近的阶层相对峙的了。它不仅看見，在它后面有一个階級对它采取敌視态度，而且看見，在它前面整个欧洲都对它采取敌視态度。与1789年法国的資產階級不同，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現代社会反对代表旧社会的君主制和貴族的階級。它降到了一种等級的水平，既脫离国王又远离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对于每一方的态度都犹豫不决，因为它总是在自己前面或后面看見这两个敌人；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是屬於旧社会的了；它不是代表新社会的利益去反对旧社会，而是代表已經陈腐的社会内部更新了的利益；它操纵革命的舵輪，并不是因为它有人民为其后盾，而

是因为人民在后面推着它走；它居于领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它代表新社会时代的首創精神，而只是因为它反映旧社会时代的不滿情緒；它是旧国家的一个底层，这个底层并没有为自己打通道路，而是被地震的力量抛到了新国家的表上层上；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啣嚙，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識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來說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來說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談代替思想，害怕世界大風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風暴來謀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錢；沒有首創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沒有負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詛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踏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沒有眼睛，沒有耳朵，沒有牙齒，衰頹不堪，——这就是普魯士資產階級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魯士国家政柄时的形象。

三

科倫 12 月 15 日。獲得了政權即建立了康普豪森內閣的資產階級，立即把**協商論**宣布為普魯士的 *contrat social* [社會契約] 的“最廣泛的”基礎，這種理論絕不是空洞的理論，相反地，它是在“黃金”生活之樹上生長出來的。

三月革命絕沒有使天賦君主屈服於人民的主權。這次革命只是迫使王權，迫使專制國家同資產階級進行勾結，同自己的老對手進行協商。

王權為了資產階級而犧牲貴族，資產階級為了王權而犧牲人民。在這種情況下，君主制將變成資產階級的君主制，而資產階級將變成君主制的資產階級。

在三月以後，只存在兩種力量。它們彼此互為防備革命的避雷針。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最廣泛的民主基礎上”**進行的。

這就是**協商論的秘密**。

組成三月革命後第一屆內閣的那些經營油類和羊毛生意的商人¹⁰⁷，喜歡扮演用自己的平民服的衣襟去掩蓋赤裸裸的王權的角色。當他們一想到下面這些事情就感到莫大的欣慰：他們將有可能進入宮廷，他們將本著自己的純潔寬大精神，忍心拋棄自己那副嚴峻的羅馬姿態——聯合議會的羅馬姿態，為了填平威脅要吞沒王權的深淵而犧牲自己以往的聲譽。康普豪森大臣儼然以充當憲制國王的**產婆**而自詡！這位好漢顯然已深為他本身和他自己的寬

大精神所感動。國王及其黨羽硬着頭皮忍受這種屈辱性的保護，*bonne mine à mauvais jeu* [強顏歡笑]，等待好日子的到來。

半瓦解的軍隊、擔心失去職位和薪俸的官僚、馴服了的封建等級（它的首領作了一次增長見識的憲政旅行），只用幾句甜言蜜語和幾個屈膝禮就輕而易舉地愚弄了 *bourgeois gentilhomme* [醉心貴族的小市民]。

普魯士資產階級徒有其名地執掌了政權；它絲毫不懷疑：舊國家的各種力量都已毫無二心地情願受它支配了，所有這些力量統統都死心踏地地迷信資產階級本身的萬能了。

資產階級不僅在內閣中，而且在整個君主國範圍內，都為上面這種痴心妄想所陶醉。

三月以後，普魯士資產階級的唯一英雄功績就是讓市民自衛團進攻手無寸鐵的無產階級，而且往往是血腥地進攻；這種功績難道沒有在軍隊、官僚以至封建主中間找到自願而忠實的幫凶嗎？資產階級的地方代表、**市鎮委員會**（它們的那種討厭而卑劣的奴才本性後來受到了文迪施格雷茨之流、耶拉契奇之流和韋爾登之流的皮鞭的踐踏，這可以說是罪有應得）所能作到的唯一努力，這些市鎮委員會在三月革命以後所立下的唯一英雄功績，就是它們對人民提出的宗法式嚴厲警告；難道它們沒有使那些默不作聲的行政區長官們和沉思不語的師長們驚嘆佩服嗎？在這以後，普魯士資產階級能夠懷疑軍隊、官僚和封建主的舊恨已經溶化在它們對資產階級——這個抑制自己 and 無政府狀態的寬宏大量的勝利者——所表示的必恭必敬的忠誠中了嗎？

事情是很明顯的。現在擺在普魯士資產階級面前的只有一個任務，就是好好安排一下自己的統治，消滅碍事的無政府主義者，

重新恢复“安宁和秩序”，重新征收在三月風暴时期沒有征收的捐稅。此外还應該做的只有一点，这就是把資產階級政权和决定这个政权的三月革命的**生产費用縮減到最低限度**。普魯士資產階級在其反对封建社会和王权的斗争中，被迫以人民的名义为自己要求了一种武器——結社权、出版自由等等，現在，当受騙的人民已不再利用这种武器去**拥护**資產階級而流露出要利用它去**反对**資產階級这种危險意图的时候，难道不应当把人民手中的这种武器摧毀嗎？

資產階級确信：在它同王权进行**协商**的道路上，在它同屈从自己命运的旧国家成立协定的道路上，显然只有一个障碍，一个唯一的障碍，这就是人民——*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¹⁰⁸，就像霍布斯所說的那樣。**人民和革命！**

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人民根据革命提出自己的强烈要求。革命是人民轉在資產階級名下的一張期票。資產階級由于革命而取得了政权。在它取得政权的那一天，這張期票的支付期限就滿了。資產階級必然要**拒付**這張期票。

革命——它在人民的口里的意思是：你們資產階級在組織Comité du salut public, 公安委員會，我們把权力交給这个委員會并不是为了让你們为自己的利益而去同王权**达成協議**，而是为了要你們**違背**王权的意志来捍卫我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革命是人民对資產階級同王权达成協議的抗議。因此，同王权达成協議的資產階級必然要**抗議**革命。

这就是在偉大的**康普豪森**执政时期发生的事情。三月革命沒有得到承认。柏林国民代議机关**否决**了关于承认三月革命的提案，从而确认自己是**普魯士資產階級的代議机关**，是**协商派議會**。

这个議會把已經发生的事情宣布为沒有发生。它在普魯士人民面前大声宣布：人民并不是同資產階級联合起来实行革命去反对王权，人民实行革命是为了使王权同資產階級联合起来去反对人民自己！这样，革命人民的**权利的法律根据**便被消灭，而为保守的資產階級找到了**法制基础**。

法制基础！

勃律盖曼以及以他为代表的“**科倫日报**”曾为“法制基础”不知費了多少唇舌，进行了多少捏造，作了多少訴苦和埋怨，多少次失去了它，又把它重新找到，破坏了它，又把它修补好，把它从柏林迁到法兰克福，又把它从法兰克福迁到柏林，把它縮小，又把它扩大，并把它从普通的基础变为鑲木地板，又从鑲木地板变为双层底（大家知道，这是游艺場上魔术家的主要工具），再从双层底变为无底陷阱，以致对于我們的讀者來說，法制基础归根到底合法地变成了“**科倫日报**”的基础。讀者們可能把普魯士資產階級的箴言同約瑟夫·杜蒙先生的箴言混为一談，可能把**普魯士**世界历史的必然观念同“**科倫日报**”的专橫的固执观念混为一談，并且可能把法制基础仅仅看作是“**科倫日报**”所賴以成长的基础。

法制基础，而且是普魯士的法制基础！

但是三月以后，大辯論的騎士康普豪森、联合議会的被复活了的幽灵以及協商派議会所賴以立足的**法制基础**究竟是什么呢？是1815年的宪法呢，还是1820年的省議會法？或者是1847年的敕令？抑或是1848年4月8日的选举法和協商法？¹⁰⁹

都不是。

“法制基础”只不过意味着：革命並沒有获得自己的基础，旧社会也沒有失去自己的基础，三月革命只不过是“推动”在旧普魯士

國家內部早就在醞釀的王權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勾結”的一個“事故”，國王本人在以往頒布的敕令中早就承認了這種勾結的需要，只是認為這種勾結在三月以前並不是“刻不容緩”的。總之，“法制基礎”意味着：資產階級在三月以後，仍然企圖像在三月以前那樣的基礎上同國王進行談判，就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革命，好像聯合議會未經革命就達到了自己的目的。“法制基礎”意味着：人民權利的合法根據——革命，在政府和資產階級之間所締結的 *contrat social*〔社會契約〕中並不存在。資產階級從舊普魯士的立法中引伸出自己的要求，為的是不讓人民從新普魯士的革命中引伸出任何要求。

不言而喻，資產階級的思想白痴們，資產階級報紙的下流作家及其同流們，把資產階級利益的這種點綴物冒充為資產階級的真正利益，並以此自欺欺人。在勃律蓋曼這種人的頭腦中，關於法制基礎的詞句已變成了一種真正的實體。

康普豪森內閣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即**中介和過渡**的任務。它是踩在人民的肩上爬上去了的資產階級和已經不再需要人民支持的資產階級之間的**中介人**；它是貌似保衛人民反對王權的資產階級和真正保衛王權反對人民的資產階級之間的**中介人**；它是已脫離革命的資產階級和已形成為反革命核心的資產階級之間的**中介人**。

按照其作用來說，康普豪森內閣由於它那種少女般的羞怯心理的緣故，而僅限於**消極反抗**革命。

誠然，它在理論上否認了革命，但在實踐上它只是**反抗**了革命的要求，只是對舊國家政權的恢復**採取了容忍**的態度。

與此同時，資產階級決定：它已經到了應當由**消極反抗**變為積

极进攻的轉折关头。康普豪森內閣的辞职并不是因为它犯了这种或那种錯誤，而仅仅因为它是三月革命后的**第一屆內閣**，因为它是**三月革命的內閣**，由于它的来历的关系，它还必須用人民独裁者的假面具来遮盖它的資產階級代表的真面目。它的这种二重来历和曖昧性质还使得它有义务对自主的人民保持一定的客气、拘謹和慎重的态度，而这一套已成了資產階級的累贅，由协商派議會直接产生的第二屆內閣就不需要考虑这一套了。

因此，康普豪森內閣的辞职对于下流政客們來說是一个謎。继之而来的是**行动內閣**，即**汉澤曼內閣**，因为資產階級打算从**消极地**把人民出卖給国王的时期，过渡到**积极地**使人民屈服于通过同国王协商而实现的資產階級政权的时期。**行动內閣**是三月革命以后的**第二屆內閣**。这就是它的全部秘密。

四

科倫 12 月 29 日。

“先生們！在金錢問題上，是沒有溫情可言的！”¹¹⁰

漢澤曼用寥寥數語便概括了聯合議會的全部自由主義。這個人是協商派議會本身所產生的內閣的必不可缺的首領，就是說，他是應當把消極反抗人民變成積極進攻人民的內閣即行動內閣的必不可缺的首領。

任何一屆普魯士內閣中都沒有過這樣多的資產者的名字！漢澤曼、米爾德、梅爾克爾、屈韋特爾、吉爾克！甚至這個內閣的宮廷標記馮·奧爾斯瓦特也屬於自由派的，即迎合資產階級的科尼斯堡反對派的貴族。只有羅特·馮·施萊根施坦在這幫可鄙的家伙中間代表舊的、官僚化的普魯士封建貴族。好一個羅特·馮·施萊根施坦呵！這是已經仙逝的希爾德布蘭特所寫的一部已被遺忘的盜俠小說的早已過時的書名！¹¹¹ 可是，羅特·馮·施萊根施坦只不過是資產階級這塊鑽石上所鑲的一副封建框子。資產階級內閣中的羅特·馮·施萊根施坦，就像是用大字寫下的題詞：“普魯士封建貴族、軍隊、官僚追隨于普魯士資產階級這顆剛剛升起的明星之後。”這些強大的力量讓普魯士資產階級來支配自己，資產階級便把它們安置在自己的寶座前面，正像舊紋章上面在君主的寶座前安置一只狗熊一樣。羅特·馮·施萊根施坦正就是資產階級內閣的這樣一只狗熊。

6月26日，漢澤曼內閣向國民議會作了自我介紹。從七月起它才開始真正存在。六月革命是行動內閣的背景，就像二月革命是中介內閣的背景一樣。

普魯士資產階級利用巴黎資產階級對巴黎無產階級的血腥勝利來反對人民，而普魯士國王則利用克羅地亞人在維也納的血腥勝利來反對資產階級。普魯士資產階級為奧地利的十一月而悲痛，是普魯士人民為法國的六月而悲痛的**報應**。德國庸人們沒有遠見，目光短淺，竟把自己同法國的資產階級混為一談。他們沒有摧毀任何寶座，他們沒有消滅封建社會，更不要說肅清封建社會的殘余了；他們無須保存自己親手建立起來的社會。在六月以後，就像在二月以後一樣，就像在十六世紀初一樣，也就像在十八世紀一樣，他們按照自己固有的那種老奸巨滑和投機取巧的習慣，打算從別人的勞動中攫取四分之三的收益。他們沒有意料到：在法國的六月後面，有奧地利的十一月在窺伺着他們，而在奧地利的十一月後面，又有普魯士的十二月在窺伺着他們。他們也沒有意料到：在法國，推翻了王位的資產階級看到自己面前只有一個敵人——無產階級，而同王權鬥爭的普魯士資產階級却只有一個唯一的同盟者——人民。這並不是說他們二者之間沒有對立的敵對利益，而是因為**共同的利益**，即反對同時壓迫他們二者的第三種勢力的需要，還把他們二者結合在一起。

漢澤曼內閣把自己看作是**六月革命的內閣**。在普魯士的每一個城市里，庸人們為了對抗“紅色強盜”，都把自己裝扮成“正直的共和黨人”，——然而，他們仍然是真誠的保皇黨人，並且沒有注意到，他們的所謂“紅色強盜”却帶着**黑白色**¹¹²的帽徽。

漢澤曼在其6月26日的就職演說中，輕易地擺脫了康普豪森

的那種神秘而模糊的“最廣泛的民主基礎上的君主制”。

“在兩院制基礎上的君主立憲以及由兩院和國王共同行使立法權”——他把自己的有鼓舞力的前輩的神秘莫測的口號變為這樣一個冷酷的公式。

“改革同新的國家憲法相抵觸的最必要的關係，解除在君主國大部分地區阻礙有利地利用財產的束縛，改革訴訟程序，改革稅務立法，特別是取消免稅權等等”，並且首先要“加強國家權力，這是為了保衛所爭得的〈公民所爭得的〉自由不受反動派的侵害〈即利用自由為封建主服務〉和不受無政府狀態的侵害〈即利用自由為人民服務〉所必需的，是恢復被破壞了的信任所必需的”，——

這就是內閣的綱領，這就是成立了自己的內閣的普魯士資產階級的綱領，這個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漢澤曼。

在“聯合議會”中，漢澤曼是一個最激烈和恬不知恥地反對信任的人，因為“在金錢問題上，先生們，是沒有溫情可言的！”但是在內閣中，漢澤曼卻宣布“恢復被破壞了的信任”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因為——這一次他是向人民說話，正像過去是向王位說話一樣：“先生們！在金錢問題上，是沒有溫情可言的！”問題在於，過去指的是給錢的信任，而現在指的是造錢的信任；過去指的是封建的信任，是對上帝、國王和祖國的百依百順的信任，而現在指的是資產階級的信任，即對企業家的活動、對資本產生利潤的能力以及對實業家的支付能力的信任，對商業的信任。這裡說的不是信仰、愛情和希望，而是信用。

“恢復被破壞了的信任！”漢澤曼在這句話中表明了普魯士資產階級的固執思想。

信用是建立在对下列事实的确信上的：資本將繼續剝削雇傭勞動，資產階級將繼續剝削無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將繼續剝削小資

產階級。因此，無產階級的任何政治運動，不管它的性質如何，即使它是直接由資產階級領導的，都在動搖着信任、信用。因此，“恢復被破壞了的信任”，在漢澤曼口中就意味着：

鎮壓無產階級中和一切社會階層中的一切政治運動，因為這一階級和這些階層的利益並不是直接同自認為掌握國家政權的那個階級的利益相一致的。

因此，漢澤曼在主張“恢復被破壞了的信任”的同時，還提出要**“加強國家權力”**。不過他把這種“國家權力”的本質搞錯了。他本來想要加強為信用服務即為資產階級的信任服務的國家權力，而實際上他只是加強了由於不享有任何信用因而要求信任，並且在特別困難的場合下訴諸霰彈的國家權力。他本來想要節省資產階級權力的生產費用，結果反而使資產階級為普魯士封建權力的復辟付出了億萬的沉重代價。

對於工人們，漢澤曼言簡意賅地說，在他的口袋里有一種能包治他們百病的萬應靈丹。但是，在他從口袋里掏出這種萬應靈丹以前，首先要恢復“被破壞了的信任”。要恢復信任，工人階級就應當放棄他們對政治的迷戀和對國家事務的干涉，回到自己習慣的舊生活方式中去。如果工人階級聽從這一勸告，使信任得到恢復，那末這種神秘的萬應靈丹馬上就會見效，其所以會見效，只是因為不再需要它了，不必應用它了，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疾病本身——破壞資產階級的秩序的行為將被消除。什麼病也沒有了，還要藥幹什麼呢？要是人民固執己見，——那有什麼了不起，漢澤曼會**“加強國家權力”**即警察、軍隊、法院、官僚制度，他會唆使自己的熊去咬人民，因為“信任”會變成“金錢問題”，而

“在金錢問題上，先生們，是沒有溫情可言的！”

汉澤曼可能觉得这是可笑的——但是他的綱領却是一个真誠的、充滿善意的綱領。

他想加强国家权力，不仅是为了反对无政府状态，即反对人民，而且还为了反对反动派，即反对王权和封建利益，因为后两者可能企图同資產階級的錢袋以及資產階級“最必需的”即最起碼的政治要求对立起来。

行动內閣的組成情况本身就是对这个“反动派”的一个抗議。

行动內閣同普魯士以往的一切內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真正首相是財政大臣。几百年来，普魯士国家对下面这一事实諱莫如深：軍事、对內对外政策、教会和学校，甚至宮廷事务部以及信仰、希望和爱情，都是受平凡的財政支配的。行动內閣把这个不愉快的資產階級真理奉为金科玉律，让汉澤曼先生来当自己的首領，而汉澤曼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全部內閣綱領，正像他的在野时的綱領一样，可以概括为下面一句話：

“先生們！在金錢問題上，是沒有温情可言的！”

普魯士的君主制变成了“金錢問題”。

現在，我們放下行动內閣的綱領，进而来談談它所采取的行动。

說什么要“加强国家权力”以反对“无政府状态”即反对工人階級和所有不滿意汉澤曼先生綱領的城市居民阶层，这种威胁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可以这样說：如果除去提高甜菜糖稅和燒酒稅不談，行动內閣所采取的唯一重大的行动就是，实行反对所謂无政府状态即反对革命运动的反动政策。

根据普魯士法，或者，在該法律不适用时根据 Code pénal [刑法典]对报刊案件进行的无数审讯，根据同样“充分的理由”（这是奥尔斯瓦特的公式）所实行的无数逮捕，在柏林实行警察制度¹¹³，

而且每兩幢住宅就有一個警察監管，警察對結社自由的侵犯，唆使兵痞毆打不順從的公民，唆使市民自衛團毆打不順從的無產者，實行戒嚴以示恫吓，——漢澤曼時代的所有這些豐功偉績至今記憶猶新。因此沒有必要詳細敘述它們了。

屈韋特爾把行動內閣這一方面的活動概括如下：

“一個真正想要自由的國家，必須有相當數量的警察人員作為執行權力”，

對於這件事，漢澤曼本人也嘟囔了一番他那套固定不變的解釋：

“這也將大大地促進信任的恢復，促使陷入癱瘓狀態的商業活動活躍起來。”

因此，在行動內閣執政時期，舊普魯士警察機構、檢察機關、官僚制度、軍隊等都“加強了”——都是像漢澤曼所想像的那樣，在資產階級供養下，也就是說在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情況下加強了。總之，它們都“加強了”。

與此相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情緒，可以由下面一件事物來說明。為了回擊一些反動分子對沙洛頓堡的一些民主分子的毆打，人民在柏林衝擊了首相官邸。行動內閣已經變得如此家喻戶曉了。第二天，漢澤曼就提出了一項懲辦暴徒和禁止露天集會的法律。他就是这样狡猾地陰謀策劃反對反動派的。

因此，行動內閣的真正的、明顯的和人所共知的活動具有純粹的**警察**性質。在無產階級和**城市**民主派看來，這個內閣和協商派議會（它的多數是由內閣代表的）以及普魯士資產階級（它的多數構成了協商議會的多數），無非是代表**舊的、稍微刷新了的警察和官僚**的國家而已。此外，還加上對資產階級的憤慨，因為資產階級已占統治地位，而且通過**市民自衛團**變成了警察的一個組成部分。

人民心目中的“三月的成果”就是如此。这些成果就在于自由派資產者老爷們也担負了**警察**的职能。这样一来便出現了双重警察！

不是在行动內閣的行动中，而只是在行动內閣所制定的构成法草案中，才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行动內閣仅仅是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加强警察**”这一旧国家的最完备的表现，并使之行动起来。

在汉澤曼內閣所提出的**市政条例、陪审法庭和市民自卫团法**的各种草案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財產，始終是那些**依法享有权利**的人和那些**不享有权利**的人之間的分界綫。誠然，所有这些法案都向王权作了极其奴顏婢膝的让步，因为資產階級內閣指望王权成为无害的同盟者，可是这样一来，資本对劳动的統治就更加殘酷无情了。

由协商議會批准的市民自卫团法被用来反对資產階級本身，并且必然为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装提供法律根据。誠然，資產階級以为这个法律只有在市政条例公布和宪法頒布以后，即在它的統治巩固以后才会生效。普魯士資產階級从市民自卫团法所获得的經驗，应当使它学会一些东西；它应当懂得：直到現在它所做的自以为是反对人民的一切，完全是反对它自己的。

这样，在人民看来，汉澤曼內閣的实质在**实践上**是实行旧普魯士的警察专权，而在**理論上**則是按比利时的样式¹¹⁴来对資產者和非資產者进行侮辱性的区分。

現在我們来談談內閣綱領的另一个方面，即**反对反动派的斗争**。

在这方面，內閣所表現出的善良願望多于行动。

屬於**資產階級**善良願望的有：把封建主的私有領地分成小塊賣給私有者，使銀行機關服從自由競爭的原則，把 Seehandlung¹¹⁵變成私人機構等等。

行動內閣的不幸在於：它在經濟上對封建黨派的一切攻擊，都是在**強制公債**的庇護下進行的，而它的一般改良企圖在人民看來，只是為了必須充實加強了的“國家權力”的國庫而採取的純財政措施。結果，漢澤曼招致了一派人的憎恨，同時又得不到另一派人的承認。實際上，不能否認，只是當對於財政大臣來說是最親切的“**金錢問題**”，即**財政部**所理解的**金錢問題**要求他這樣做的時候，他才敢於認真地攻擊封建特權。在這種有限的意義上，他向封建主說：

“先生們！在**金錢問題**上，是沒有溫情可言的！”因此，甚至他的反對封建主的肯定的**資產階級**意向，也像他的為“**活躍商業活動**”所採取的否定的措施一樣，帶有警察的色彩。要知道，用政治經濟學的語言來說，**警察就是國庫**。漢澤曼向國民議會建議提高甜菜糖稅和燒酒稅，並通過了一項甜菜糖稅和燒酒稅的法律，這種做法，激怒了西里西亞、各個馬爾克、薩克森以及東普魯士和西普魯士等地的大財主，即激怒了“上帝、國王和祖國”的擁護者們。這種措施不僅在舊普魯士各省激起了同工業有聯系的土地所有者的憤怒，而且也引起了萊茵省釀酒廠的**資產階級**廠主們同樣強烈的不滿，因為他們看到，這樣一來，同舊普魯士各省比較起來，他們被置於更為不利的競爭條件之下。除此以外，這一措施也引起了舊普魯士各省的工人階級的反對，因為對於工人階級來說，這一措施意味著，而且也只能意味著一種**生活必需品的漲價**。這樣，實行這一措施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充實“加強了的國家權力”的國庫！這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因為這是行動內閣所採取的**反對封建**

主的唯一的一件**真正**見諸實行的行動，是這方面唯一的真正變成了法律的法案。

漢澤曼的關於取消等級稅和土地稅免納權的“法案”¹¹⁶，正像他的所得稅法案一樣，引起了地主——“上帝、國王和祖國”的崇拜者的拚命叫囂。他們罵他是**共產主義者**，而且直到今天，普魯士的“十字騎士”一提到漢澤曼的名字還要給自己畫三次十字。在十字騎士聽來，這個名字就像弗拉·迪亞沃洛¹¹⁷的名字一樣。取消土地稅免納權這個由普魯士大臣在協商派議會的光輝時期所提出來的唯一重要措施，由於**左派的原則局限性**而遭到了失敗。然而，正是漢澤曼先生本人使這種局限性成為正當的。難道在制訂憲法和舉行效忠憲法的宣誓以前，左派應當開辟新的財源來支持“**加強了**的**國家權力**”的內閣嗎？

par excellence〔主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內閣竟是这样不走運，以致連它的最激進的措施都受到協商派議會中的激進議員的阻撓。它竟是這樣貧弱，以致它向封建制度舉行的整個十字軍征討，僅表現為受到一切階級同樣憎恨的**提高稅收**，而它的在深思熟慮之後制訂出來的全部財政政策的不成熟的果實只是**強制公債**。這兩種措施歸根到底僅僅為**反革命向資產階級本身的進攻提供了補助金**。但是，**封建主已經肯定資產階級內閣是“居心叵測”的**。因此，甚至普魯士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財政鬥爭也表明了，資產階級由於威信掃地和軟弱無力，甚至**募集金錢**也只有為了**反對自己本身**才能辦到，而在**金錢問題上，先生們，是沒有溫情可言的！**

資產階級內閣不僅使城市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封建主都來反對它，它還推開了受封建制度壓迫的**農民階級**，并使這一階級對它採取敵視態度，在這方面，**協商派議會**熱心地幫了它的

忙。总之，不应当忘記，这一議会在其存在的一半時間內，把汉澤曼內閣看作它的真正代表；今天的資產階級受难者曾是汉澤曼昨天的童僕。

在汉澤曼執政期間由帕托夫所提出的关于廢除封建义务的法案(參看我們过去对这个法案的批評¹¹⁸)，是資產階級想廢除封建特权，廢除这些“同新的国家宪法相抵触的关系”的极其軟弱的意图的可怜果实，是資產階級在任何一种財產遭到革命的侵害时所流露出的恐惧。可怜的、胆怯的和狹隘的利己主义使得普魯士資產階級瞎了眼睛，以致它竟拋开了自己必要的同盟者——农民。

6月3日，議員哈諾夫提出一个提案：

“一切正在进行的有关調整地主和农民之間的关系以及有关贖买义务等方面的談判，在以正当原則为基础的有关这方面的新法律頒布以前，根据一方面的要求，立即予以停止。”

只是在**9月底**，也就是在四个月以后，在普富尔內閣时期，协商議会才通过了停止地主和农民之間的談判的法案，而且否決了所有自由派的修正案，并决定：“原定的現行义务暫時仍然有效”和“有爭執的付款和欠稅予以征收”。

在**8月間**（如果我們沒有弄錯的話），协商派議会认为南施蒂尔关于“**立即廢除徭役**”的提案“并不是刻不容緩的”；既然如此，既然协商派議会要农民放棄他們在三月以后爭得的那种实际地位而往后退，农民还能认为为这个議会而战是刻不容緩的嗎？

法国資產階級是靠解放农民起家的。它在农民的帮助下征服了欧洲。普魯士資產階級完全沉溺于它的最狹窄的眼前利益，甚至輕率地丟掉了农民这个同盟者，并把他变成了封建反革命手中的武器。

資產階級內閣倒台的官方历史是尽人皆知的。

在这个內閣的保护下，“国家权力”极度地“加强了”，人民的力量极度地瘫痪了，以致屈韦特尔—汉澤曼这一对孿生子在7月15日不得不向君主国的所有行政区长官呼吁，反对官僚們特别是地方官員們的反动阴谋；以致后来除了协商派議會以外，“**貴族和大地主會議**”¹¹⁹也在柏林开会以保护本身的特权；以致最后为了同所謂的柏林国民議會相对抗，于9月4日在上劳西茲^①举行了中世紀遺留下来的“**市鎮代表會議，保护受威胁的地主所有权**”。

政府和所謂国民議会在这些反革命抬头的日益明显的征兆面前表現出来的毅力，仅仅在一紙宣言中得到了应有的反映。資產階級內閣拥有刺刀、枪彈、監獄和警察，仅仅是为了对付人民，“为了恢复被破坏了的**信任和活跃商业活动**”。

在**施魏德尼茨**，兵痞們叛变性地动用武器直接反对市民自卫团中的資產階級，这一事件¹²⁰终于使国民議會从冷漠的态度中苏醒过来。8月9日，国民議會决定采取英勇的行动，即采取**施泰因—舒尔茨軍令**，作为激发普魯士軍官們的**礼仪感**的最后强制手段。¹²¹多好的强制手段呵！但是，难道保皇党的荣誉不是禁止軍官們遵循資產階級荣誉的要求嗎？

9月7日，即在协商派議會通过了**施泰因—舒尔茨軍令**一个月以后，議會再次决定：它的決議是有效的決議，应由大臣們付諸实施。汉澤曼先生迴避了这件事，并于9月11日提出辞职，他事先任命自己为年俸六千塔勒的銀行經理，因为——**在金錢問題上，先生們，是沒有温情可言的！**最后，在9月25日，协商派議會怀着感激之情听到了**普富尔**用温和的措詞承认**施泰因—舒尔茨軍令**，然

① 波兰称作：上魯日伊察。——編者注

而由于弗兰格尔的平行的軍令和軍隊向柏林的集結，施泰因—舒尔茨軍令这时已成了笑柄。

只要对照一下上述日期和了解一下施泰因—舒尔茨軍令的历史，就足以断定：这个軍令并不是汉澤曼辞职的**真正**原因。不害怕承认革命的汉澤曼难道还害怕什么紙上宣言嗎？过去汉澤曼每当公事包从他的手里掉了的时候，他总是重新把它撿起来，难道这一次汉澤曼由于庸人的刺激而把它放在大臣席位上让任何一个想拿的人去拿嗎？不，我們的汉澤曼不是空想家！汉澤曼不过是受了騙，就像他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受了騙一样。有人使他相信了一点：在任何条件下，王权都是不会让他下台的。有人强迫他丢掉了最后一点声望，好最終把他用作供容克地主們发泄怒火的牺牲品，并摆脫資產階級的保护。此外，同俄国和奥地利商定的作战計劃要求：內閣首脑应当由权奸撇开协商派議會而自行任命的將軍担任。在資產階級內閣时期，旧“国家权力”已經“加强”到足以采取这个 coup〔坚决行动〕的地步了。

普富尔辜負了人們的期望。克罗地亚人在維也納的胜利甚至使勃兰登堡这样的人也变成了有用的工具。

在勃兰登堡內閣时期，可耻的协商派議会被驅散了，它遭到了嘲笑、奚落、侮辱和迫害，而人民在决定性的时刻仍然**漠不关心**。議会的**失败**意味着**普魯士資產階級、立宪主义者的失败**，就是說，意味着**民主派的胜利**，不管后者为这种胜利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而欽定宪法呢？

好像过去曾經說过：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間絕不应有“一块紙片”¹²²。現在換了一种說法：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間**只能有一块紙片**。普魯士的**真正**宪法就是**戒严**。法国的欽定宪法只包含有一

条廢除了这个宪法本身的条文，即第十四条¹²³。而普魯士欽定宪法的每一条都仿佛是它的第十四条。

国王用这个宪法給自己欽定了新的特权。

他授权自己可以 *in indefinitum* [无限期地] 解散議會。他授权大臣們在議會休会期間頒布任何法律（包括关于所有权等等的法律）。他准許議員可以控告大臣們的这种行动，但是在戒严的情况下，控告者有成为“内部敌人”的危險。最后，他授权自己，如果春天反革命的势力扩大了，就用一种从中世紀等級差別中有机地产生出来的基督教德意志的 *Magna Charta*¹²⁴ 去代替这块悬在空中的“紙片”，或者干脆結束玩弄宪法的把戏。甚至在后一种場合下，資產階級中的保守派也会无动于衷，而只是禱告：

“主給的，主又拿去了，主的圣名遐邇傳揚！”

普魯士資產階級以及一般德国資產階級从三月到十二月的历史证明：在德国不可能发生純粹資產階級的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資產階級政权，可能发生的不是封建专制的反革命，就是社会共和的革命。

可是，有生命力的那部分資產階級必将从他們的淡漠态度中苏醒过来——首先，来年春天反革命将要提出来的会使这部分資產階級感到惊愕的駭人听闻的賬目，就是这方面的保证。要知道，汉澤曼說得有道理：

先生們！在金錢問題上，是沒有温情可言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2 月
9、11、15 和 29 日

載于 1848 年 12 月 10、15、16
和 31 日“新萊茵报”第 165、
169、170 和 18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反革命的新同盟者

科倫 12 月 11 日。反革命势力获得了新的同盟者——瑞士联邦政府。

还在五天以前，我們就从可靠方面获悉，最近流行的一些关于德国流亡者准备侵入巴登、国境上已有军队出现、在廖拉赫附近志愿兵和帝国军队之间发生了荒诞无稽的所谓会战等等奇怪的傳聞，是瑞士联邦委员会的統治党，即富勒尔—奥克辛本—蒙钦格尔党和德意志帝国政权之间“商量好的”，目的是为了給这个統治党采取对付流亡者的措施制造借口，从而促进同帝国政权建立良好的关系。

我們沒有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訴我們的讀者，因为我們当时还不能馬上相信这种阴谋的可能性。我們等待着证实，而沒有等多久也就证实了。

引人注意的是：散播这些傳聞的是法兰克福的报纸，而不是巴登的报纸。其实，巴登的报纸应该最先和最清楚地知道本地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福报”¹²⁵ 在 12 月 1 日就已从伯尔尼得到消息，說联邦委员会就流亡者問題发出了通令，并且派出了一个全权代表，可是伯尔尼的报纸，其中有一些（如“宪法之友”和“瑞士”）是和联邦委员会的成員有直接联系的，却到 12 月 3 日

才刊登了这个消息。

現在，我們終於看到了“瑞士”报上发表的給各州政府的通令。如果說过去我們对瑞士加入新神圣同盟^①这一点还可以采取怀疑态度，那末現在一切疑問都消除了。

通令首先提到关于政治流亡者最近已經武装起来，准备再度侵入巴登領土的傳聞。全瑞士和全巴登都知道这些傳聞是捏造的，而通令却以这些傳聞为根据来对流亡者采取新的非常措施。联邦議会关于德森的決議之所以被提及，只是为了論证联邦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不是責成它采取这些措施；相反地，肯定地承认了德森和北部各州的状况有重大的差異。

其次作了如下指示：

(1) 凡参加过司徒卢威进军或根本不能提出安分守己的个人保证的流亡者，应解离国境各州。

(2) 所有流亡者都必须受到严密的监视。

(3) 属于第一条情况的流亡者名单，应呈报联邦委员会和国境各州。

(4) 执行一般拘留規程时可能发生的例外問題，由联邦政府代表施泰格尔博士解决，并且应该遵行他的一切指示。

此外还要求“严格”执行这些指示，不然的話，一旦需要調动军队，經費将由有关的国境州負担。

整个通令措辞尖刻，极尽侮辱流亡者之能事，并且以下面这些话作結束：

“瑞士不应该成为外国政党的集合点，这些政党对于它們在中立地区的

^① 新神圣同盟——指1848—1849年期间欧洲反革命势力企图在反对革命运动的斗争中恢复1815年的神圣同盟。但是这次并没有締結新的盟約。——譯者注

地位抱着极为错误的观念，并且常常粗暴地破坏殷勤接待它们的国家的利益。”

只要把这些尖刻的辞句和 11 月 4 日的照会的措辞比较一下；只要注意到通令所根据的那些传闻显系故意捏造；只要注意到，根据今天从国境给我们的来信，联邦政府的代表施泰格尔博士已经结束了对于使帝国政权最伤脑筋的阿尔高州的视察，并且发现了所说的流亡者早已被拘留起来，在这里他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已来到利斯塔尔）；此外，只要注意到，根据 11 月 4 日的照会，所有国境各州早已克尽了自己的职责，瑞士报刊（例如“瑞士信使”、“巴塞尔州人民报”¹²⁶、“国民报”等等）早就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只要回想一下，在长期不明情况和听到关于封锁国境的矛盾百出的消息之后，现在我们在两三天内获得的瑞士报纸和信件都一致断定，对瑞士不会采取任何强制的办法，并且发布给某些国境崗哨的对越过国境的人加强监视的命令经过二十四小时后已被取消；——只要把所有这一切加以对照，就足以判断事实是不是完全证实了我们上面的报道。

本来大家就知道，富勒尔、奥克辛本、蒙钦格尔等先生早已渴望一劳永逸地粉碎“流亡者的阴谋”。

我们祝贺施梅林先生交上了这些新朋友。万一某个时候他在瑞士以流亡者的身分出现（要知道，在本届联邦委员会三年任期期满以前，这种事情是很可能发生的），但愿他的这些朋友不把他列入“不能提出个人保证”的流亡者之中。

写于 1848 年 12 月 1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2 月 12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66 号

“新萊茵報”的誹謗

科倫 12 月 13 日。“新萊茵報”在 7 月 4 日發表的文章，成了定于本月 20 日在陪審法庭對本報發行負責人科爾夫、總編輯馬克思和編輯恩格斯進行審訊的理由，這篇文章的末尾是這樣寫的：

“總之，行動內閣所採取的行動，中間派左翼內閣所採取的行動就是如此，它是一個向舊貴族、舊官僚、舊普魯士的內閣過渡的內閣。只要漢澤曼先生一扮演完過渡的角色，他就會被解職。”

“但是，柏林的左派應該懂得，只要舊政權能占據一切真正有決定意義的障地，它是能夠放心地讓左派在議會里獲得小小的勝利和擬定大大的憲法草案的，只要在議會外解除了 3 月 19 日革命的武裝，它是會在議會里大胆地承認這一革命的。”

“左派總有一天會相信，當它在議會里獲得勝利的時候，它在實際上卻遭到了失敗。德國的發展或許也需要這種對比吧。行動內閣在原則上承認革命，是為了在實際上實行反革命。”¹²⁷

事變證明：“新萊茵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誹謗了普魯士政府和它的忠實僕從。

卡·馬克思寫于 1848 年 12 月 13 日

載于 1848 年 12 月 14 日“新萊茵報”
第 168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們的审判

一

科倫 12 月 21 日。本地陪审法庭非常审判庭今晨开始对哥特沙克、安內克和埃塞尔进行审判。

被告們带着镣铐，像最普通的刑事犯一样，从新监狱被押送到戒备森严的法庭。

我們的讀者都知道，像現在这样組織的陪审法庭，我們絕不能把它看做是某种保障。資格限制使一定的階級享有从自己的人当中挑选陪审員的特权。編制陪审員名單的方式使政府有权操纵壟斷，从特权階級中挑选出自己愜意的人。这就是說，行政区长官先生从全区的陪审員名單中挑选出一些人，編制成清册；然后政府的司法代表再加以清刷，把这个名單縮減到三十六人（如果我們沒有記錯的話）。最后，当陪审法庭真正組成的时候，檢察机关有权第三次对最后的名單，对这个經政府两次蒸餾过的階級特权的产物进行清刷，只留下最后所需要的十二个人，而把其余的都删除。

在这样組織起来的陪审法庭上，那些公开反对特权階級和現存国家政权的被告要是不直接落到自己死敌的手中，那簡直是奇迹了。

人們会反駁我們：但是陪审員們是有良心的呀！还可以要求

比良心更多的保障嗎？啊哈，mon dieu [我的天啊]！良心是由人的知識^①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

共和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不同于沒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一个除了資格以外沒有別的本事的陪審員，他的良心也是受資格限制的。

特权者的“良心”也就是特权化了的良心。

因此，在我們看来，現今这样組織的陪審法庭是維護某些人的特权的机关，而絕不是保障一切人的权利的机关，特別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檢察机关最广泛地运用它的权利，从最后的名单中把它所不中意的最后十二个人的名字也删掉，——可是，尽管如此，我們仍然絲毫也不怀疑被告們将被**宣告无罪**。我們的保障就是**起訴书**。讀了起訴书，你就会以为这是哥特沙克及其同志們用譏諷的口吻发表的辯护詞。

我們就来簡要地評述一下这份只有对梅利奈及其同志們的起訴书（在安特卫普进行的里斯康士审判案）¹²⁸才能与之媲美的**起訴书**吧！

在科倫有个工人联合会¹²⁹。哥特沙克曾是这个联合会的主席，安內克和埃塞尔曾是这个联合会的委员会的委員。起訴书告訴我們，工人联合会

“有自己專門的由哥特沙克主編的机关报——‘工人报’；沒有亲自出席联合会會議的人，可以从这份報紙上了解到联合会的那种以討好无产階級为目的、把人們引向共产主义和引向推翻現存制度的危險傾向”。

① 俏皮話：《Gewissen》——“良心”，《Wissen》——“知識”。——編者注

可見，可以了解到的是**傾向**，而不是**違法行為**。證明就是：在逮捕哥特沙克等人之前，檢察機關並沒有對“工人報”提起訴訟，而在逮捕了哥特沙克以後，這份報紙也只是由於本地檢察機關所導演的駭人聽聞的審判被定了一次罪；本地檢察機關控告該報破壞了它的名譽¹³⁰。

然而起訴書也承認：“‘工人報’本身在它關於此事〈即關於工人聯合會及其委員會和分會的會議〉的報道中似乎絲毫也沒有設法掩蓋什麼東西。”

如此說來，既然不能因為“工人報”“報道”了工人聯合會會議的情況而對該報進行審訊，那末也就不能因為工人聯合會舉行了這些會議而對該會本身進行審訊了。

加于“工人聯合會”的罪名也只不過是加于“工人報”的罪名——**這個聯合會有不良傾向**。難道對不外是一種傾向進行**傾向性的審判**也算是三月的成果嗎？直到現在，我們的**九月法令**¹³¹還沒有頒布。哥特沙克等人的被捕和坐上被告席，決不是因為“工人報”的違法報道或工人聯合會的違法集會。起訴書沒有隱瞞：使法庭機器開動起來的不是工人聯合會過去的活動，而是——請聽吧：

“在德國成立的許多民主團體的代表們今年6月14日至17日在法蘭克福舉行了代表大會。哥特沙克和安內克以科倫工人聯合會代表的身分出席了會議。大家知道，代表大會曾公開表示贊成民主共和國，當6月25日（星期日）又決定在居爾岑尼希舉行工人聯合會全體大會的時候，本地當局在等待這個運動的回聲”。

本地當局在等待法蘭克福運動的回聲。但在法蘭克福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運動呢？民主主義者代表大會公開表示贊成民主共和國這種不良傾向。就是說，在等待這種“傾向”的“回聲”並準備和這種回聲作鬥爭。

大家知道，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和为执行其决定而选出的柏林中央委员会¹³²，在举行会议时并没有受到过政府方面的任何阻挠。

可见，尽管有不良倾向，德意志各邦政府还是不得不承认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以及大会所推选的民主派组织的合法性。

但是，科伦当局“依然等待”法兰克福运动的回声。他们等待机会来揭露哥特沙克及其同志們的违法行为。为了制造这个机会，警察局于6月25日派遣“警官鲁特尔和休涅曼”去参加工人联合会在居尔岑尼希举行的全体大会，并且“特别责成他们注视那里将要发生的一切”。“订书匠约翰·马尔泰泽”也偶然地出席了这次全体大会。正如起诉书深为遗憾地指出的，他“假如没有在警察局任职的话，就可以是主要的见证人”了。换句话说，也就是，假如他不是雇佣警探的话，他就是主要的见证人。最后，也许是出于爱国狂热的最纯洁的动机，“见习法官冯·格罗特”也光临了这次大会。他转述安内克在全体大会上的演说“比谁都详细，因为他在开会时当场把安内克的演说记了下来”。

这样，很明显，科伦当局曾等待：6月25日哥特沙克及其同志們将要犯罪。于是采取了各种警察手段，以便在这种罪行发生时加以证实。既然当局有所“等待”，那它也就不喜欢白等。

“根据”被派去证实等待中的罪行的警官們的“秘密报告”和根据其他助手的报告，

“当局于7月2日对哥特沙克和安内克在这个公开大会上发表的〈讀为：被等待到的〉叛乱性的演说提起訴訟。7月3日他們被逮捕，他們的文件也被沒收了。

7月5日，在傳訊了許多证人和收到了一些新材料以后，审讯扩大到工

人联合会领导者們以前的全部活动，因此工人联合会的某些会员，如箍桶匠埃塞尔及其他一些人，也受到了法庭的审讯。对被告的审讯所提供的結果，一部分牵涉到被告在工人联合会中的言論，一部分牵涉到他們的文件和他們所散发的印刷品。”

审讯所真正提供的結果是——这一点我們将在明天根据起诉书本身来加以証明——等待于6月25日发生的运动只是当局的运动（这是法兰克福运动的一种回声），哥特沙克及其同志們由于辜負当局6月25日的等待必須受到六个月严格的审前羈押。沒有比辜負当局获得救国奖章的希望更危險的事了。誰也不願意自己的等待落空，而国家政权的代表人物更是如此。

如果說，表演6月25日的罪行的整个方式证明当局是这幕刑法学戏剧的唯一編导者，那末，了解一下审讯的材料，我們就能够恰如其分地评价使这个序幕拖延六个月之久的那种狡黠的伎俩。

現在我們从“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們的傾向性的政治审判”（瑪·弗·安內克发表，“新科倫报”发行）¹³³这本书中逐字逐句地摘引几段如下：

“在偵查开始以后五六一个星期，接替盖格尔先生（这位先生已高升为警察厅长）的法院偵查員洛伊特豪斯宣布偵訊結束。可是，檢察官黑克尔在了解了案情以后，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偵查員也曾表示贊同。經過了十四天，偵查再度結束。黑克尔先生在再一次从容不迫地研究了案件以后，**又提出了許多新的要求**。但是，法院偵查員以及高等法院都拒絕滿足这些要求。于是黑克尔先生便向檢察院上訴，这一級审理机关下令滿足他的一部分要求，而对另一些要求則加以拒絕。例如，他提出的**只根据从安內克的文书夹中找到的德国各地的人名单**来对这三四十个人进行审讯。这一要求就遭到了拒絕……

当审讯的規模順利地扩展到这样大而无無論如何不能再拖延下去的时候，高等法院便在9月28日下令把案件轉交檢察院审理。10月10日檢察院批

准起訴，10月28日总檢察官签署了起訴书。

于是，这个案件就这样順利地滑过了10月9日开审的陪审法庭例行季度审判庭。

11月27日指定成立非常审判庭。但就連这次审判庭的审判也竭力想滑过去：偵查文件被送交司法部同时还呈請将案件移交别的陪审法庭。可是，司法部没有找到这样做的充分根据；11月底，被告哥特沙克、安內克和埃塞尔的案件就最后被移交給12月21日成立的本地陪审法庭非常审判庭审理。”

在表演这个冗长的序幕的期間，首席法院偵查員盖格尔已受命代理警察厅长的职务，而檢察官黑克尔也荣升为檢察长。既然黑克尔先生由于他的这个新职务，已于非常审判庭开始前不久由科倫調往爱北斐特，那末他就不会和被告同时出席陪审法庭了。

二

科倫 12 月 22 日。据以证实“等待的”罪行的居尔岑尼希全体大会是在哪一天举行的呢？是在 6 月 25 日举行的。6 月 25 日是巴黎的六月起义者彻底失败的日子。当局是在哪一天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們提起訴訟的呢？是在 7 月 2 日，也就是普魯士資產階級和它当时的同盟者——政府——怀着复仇的狂热庆祝惩治自己的政敌的时刻到来的时候。7 月 3 日，哥特沙克和他的同志們被捕。7 月 4 日，以拉登堡为代表的当今的反革命內閣加入了汉澤曼內閣。在同一天，柏林协商派議会的右翼决定举行政变：它利用部分左翼人士逃走的机会，就在那次會議上干脆取消了多数票通过的关于波兰的决定。¹³⁴

把这些日期对照一下可以說明很多問題。我們大概可以根据证人的证詞来断定，“某”人在 7 月 3 日曾經宣称：“哥特沙克及其同志們的被捕，給公众造成了良好的印象。”但是，只要翻閱一下上述日期的“科倫日报”、“德意志报”和“卡尔斯卢厄日报”¹³⁵ 就会深信，这些天在德国，特别是在科倫，接連不断听到的并不是莫須有的“法兰克福运动”的“回声”，而是“卡芬雅克运动”的“回声”。

我們的讀者还記得，6 月 25 日当工人联合会在居尔岑尼希举行全体大会的时候科倫当局曾“等待”过“法兰克福运动”的回声。他們还記得，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們的审讯不是根据哥特沙克等人在 6 月 25 日以前所犯的某种真正罪行，而完全是根据当局等待

他們在6月25日**必将**犯下的某种可感触到的罪行。

对6月25日所寄与的希望并没有实现。于是1848年的6月25日就突然变成了1848年。因此就把**1848年的运动**归罪于被告們。哥特沙克、安内克、埃塞尔被控的罪名是：

“在**1848年間**〈注意这种說法的伸縮性〉，他們在科倫进行**阴謀活动**，企图改变和推翻現存政府，并且用煽动公民們互相殘杀的办法来挑起国内战争，或者是〈注意！〉通过在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说、刊印著作和张贴标語等手段煽动人們从事暗害活动和追求类似的目的。”

这么說来，究竟是进行了**阴謀活动**“或者是”任何**阴謀活动**都没有“进行”。但是，不管怎样，他們煽动人們“从事暗害活动和追求**类似的目的**”，也就是說，从事暗害活动和类似的事情！这是多么美妙的法律文体啊！

檢察院关于起訴的决定就是**这样**写的。

在起訴书的最后一段中，**沒有提到阴謀活动**的字眼，“**这样一来**”哥特沙克、安内克和埃塞尔就被控为：

“在**1848年間**，他們通过在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说和刊印著作的手段公然煽动自己的同胞用**暴力**改变宪制，举行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煽动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然而这些煽动都没有获得成功。这种罪行在刑法典第一〇二条及第八十七和九十一条中已有規定。”

那末，当局在**1848年間**的7月2日以前为什么不告发他們呢？

而且，在談到“**用暴力改变宪制**”以前，这些老爷似乎应该先证明确实存在着某种宪制。王权驅散了协商派的議会，这恰恰证明了宪制已不存在。如果协商派比王权强大的話，他們也許会用相反的方法证明同样的事情。

至于煽动“举行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煽动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起诉书援引的证据是：

- (1) 被告們在 1848 年間的一些演說，
- (2) 未刊印的文件和
- (3) 已刊印的文件。

关于第一点。演說給起诉书提供了下述 corpus delicti [罪状]：

在 5 月 29 日的會議上，埃塞尔宣称“共和国”是“使工人摆脱穷困的手段”。这就是煽动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哥特沙克曾宣称：“反动派将导致共和国的建立。”有些工人訴苦說他們无法“維持自己的生存”。哥特沙克回答他們道：“你們必須学会团结，学会区别自己的朋友和隐蔽的敌人，必須学会独立地进行自己的事业。”

这就是公然煽动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和煽动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

起诉书用下面几句话扼要地叙述了自己的論据：

“证人，即为了了解以前各次大会情况而被傳訊的工人联合会的會員和非會員，对于哥特沙克和安內克，特别是对于哥特沙克，一般都只是加以贊揚。照他們的說法，哥特沙克始終謹防过火行动，力求平息众怒，而不是煽动群众。固然，他同时也指出，共和国是他追求的最終目的，但要达到这个目的，靠街头騷乱是不行的，只有靠說服大多数人民，使他們相信除了共和国之外就没有生路。这样，非常明显，为了逐步摧毁現存制度的基础，他当然就不得不一再抑制粗野的民众的急躁情緒。”

被告平息众怒，而不是煽动群众，正是这一点清楚地证明了他們想逐步摧毁現存制度的基础的恶毒傾向，即按照不利于当局的方向来合法地利用出版自由和結社权的恶毒傾向，而起訴书竟把

这叫做“煽动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和煽动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

然而,当局“等待中的”6月25日的全体大会终于来临了。起诉书說,关于这次大会,“有証人的詳細的証詞”。但是这些詳細的証詞究竟說了些什么呢?說哥特沙克做了一个关于法兰克福事件的报告,討論了科倫三个民主团体的合并問題¹³⁶,說哥特沙克致了“閉幕詞”,这个閉幕詞引起了馬尔泰澤和見习法官馮·格罗特的特別注意,講話的結尾达到了“高潮”,他說:“等待时机比輕举妄动需要更多的勇气。在反动派采取能够推动共和国成立的步驟以前,必須等待。”这就是公然煽动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和煽动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

至于安內克,起诉书加給他的罪名“沒有別的,只是在討論三个团体(科倫的三个民主团体)的合并問題时他十分热烈地主張合并,并且称出席大会的人为‘共和主义者公民’”。

主張科倫的三个民主团体“合并”就是公然“煽动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

而“共和主义者公民”这一称呼啊!馬尔泰澤和馮·格罗特两位先生可能感到这样的称呼对他們是个侮辱。可是,难道馮·德利加尔斯基將軍不是称他自己和杜塞尔多夫的公民为“共产主义者公民”嗎?

如果这就是从“等待中的”6月25日全体大会上所能挑剔出的一切,那就难怪当局要使用“在1848年間”这个公式了。当局也正是这样做的。他們为了竭力搜罗有关这一年的运动的情报,就扣留了許多信件和印刷品,沒收了三期“工人报”,可是这三期报纸每期只要花四个分尼就可以在任何一条街上买到。

然而，当局从他們所沒收的信件中可以看出，1848年在德国籠罩着多么厉害的“政治狂热”。在他們看来，卡尔·亨克尔教授从瑪尔堡寄給哥特沙克的一封信是特別“狂热”的。他們向黑森选帝侯国政府檢举了这封信，并且欣然获悉目前正在对一位教授提起訴訟。

最后，从信件和印刷品中还可以看出，1848年在头脑中和在紙面上都充滿了形形色色的狂热，并且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簡直就像是“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和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

总之，哥特沙克及其同志們曾进行了这一切活动，可是当局只是用沒收被告們的印刷品和信件的办法才探悉了这个惊人的运动的“回声”！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2 月 21 和 22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8 年 12 月 22 和 23 日“新萊茵报”
第 175 和 176 号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普魯士反革命和普魯士法官

科倫。1848年革命运动的主要成果不是人民赢得了东西，而是他們失去了东西，——他們丟掉了幻想。

1848年的六月、十一月、十二月是欧洲各国人民的意識在失望和觉醒的历程上的几个巨大的里程碑。

在束縛着德国人民的最后一些幻想中，占首要地位的是他們对法官的迷信般的尊敬。

普魯士反革命的毫无詩意的北風，也把这朵人民幻想之花摧殘了；这朵花的真正的祖国是意大利——永恒的羅馬。

萊茵上訴法院、柏林高級法庭和閔斯德、勃罗姆堡、拉提博尔^①等地的地方法院对埃塞尔、瓦尔德克、泰梅、基尔希曼、吉尔克等人所采取的行动和有关的声明，再一次证明了法国国民公会一直是各个革命时代的灯塔。法国国民公会用一紙法令解除一切官吏的职务，从而奠定了革命的始基。上面提到的那些法院向全欧洲证明，法官們也不过是一些官吏。土耳其的僧侶裁判官和中国滿清的吏部可以大胆地签署不久前这些“高貴的”法院所发布的反对自己同事的指令了。

我們的讀者都已知道柏林高級法庭和拉提博尔地方法院的指

^① 波兰称作：貝德哥什、拉威布日。——編者注

令。今天我們且来看看**閔斯德地方法院**的指令¹³⁷。

但是我們先要簡單地談一談在柏林設有**办事处**的**萊茵上訴法院**这个**萊茵法学界**的 *summus pontifex* [泰斗]。

大家都知道，**萊茵的法学家們**（少数可嘉者例外）认为普魯士**协商派議會**的当务之急不外乎是帮助政府祛除它那陈腐的偏見和根深蒂固的仇恨。他們用事实向**协商派議會**证明，他們以往的反对派立場和1789年以前的**法国議會**的反对派立場未必有多少区别；两者都只是以自由主义的詞句为掩飾来頑强地維護自己的**狹隘利益**。無論是1789年**法国国民議會**中的自由派議員，或是1848年普魯士**国民議會**中的**萊茵省自由派法学家**，都是一群奴顏婢膝的**勇敢者中最勇敢的人**。**萊茵普魯士的檢察官員**因自己的“政治狂热”而比旧普魯士的**偵查員**高出一筹。自然，在**协商派議會**解散以后，**萊茵的法学家們**也應該保持自己的声誉。**萊茵普魯士上訴法院**沒有让旧普魯士**高級法庭**专美于前。**高級法庭**的庭长**米勒**曾寄給**高級法庭樞密顧問瓦尔德克**一份諮文，于是**萊茵普魯士上訴法院**院长**澤泰**也把这样的諮文送給了**首席監察顧問埃塞尔**（不要和科倫那两位“心地善良的埃塞尔”^①混淆起来）一份。但是，**萊茵普魯士的法院**究竟要比旧普魯士的法院高明。**萊茵上訴法院**院长比他的对手高超的地方，就在于他犯了一个非常笨拙的**錯誤**，他还在把信寄給**埃塞尔先生**本人之前，就已通过“**德意志改良报**”¹³⁸向柏林的公众披露了这封信。我們深信，**全萊茵省**将会給我們**白发蒼蒼的可尊敬**的同乡**埃塞尔先生**写一封洋洋大观的致意书作为对**澤泰先生**这封信的回答。

① 指科倫的律師**埃塞尔第一**和**埃塞尔第二**。——編者注

在“丹麦王国”¹³⁹里不是有些烏七八糟，而是一切都是烏七八糟！

現在來看看**閔斯德**的情形。

我們的讀者已經聽說**閔斯德**地方法院抗議該院院長**泰梅**回院供職的事。

事情的經過是这样的：

反革命內閣曾經直接或間接地授意高等樞密法庭、萊茵上訴法院和勃羅姆堡、拉提博爾、**閔斯德**等地的地方法院說，國王不願意讓**瓦爾德克**、**埃塞爾**、**吉爾克**、**基爾希曼**和**泰梅**回到他們的高等法官的職位上去，因為他們還繼續在柏林開會並參與通過了關於拒絕納稅的決定。因此，上述各機關應當對他們的行為提出抗議。

各高等法院（起初萊茵上訴法院曾猶豫不決，因為大演員獲得成功的秘訣是最后出場，而不是最先出場）都毫無例外地一致遵從這種授意，紛紛把抗議書由柏林寄往柏林。**閔斯德**地方法院真是愚蠢之至，它竟把對**泰梅**的抗議書直接送給了國王（所謂的立憲國王），這份抗議書公然宣稱：

“他參加國民議會（該議會這時業已停止活動）非法的黨派會議，就等於公開反對陛下的政府，而投票贊成關於拒絕納稅的決定，就等於站到革命立場並企圖在我們祖國燃起無政府狀態的烽火。”

隨後又說道：

“在做出了這樣的事情以後，上面所說的**泰梅**如果仍在本地法院供職，那是違背我們的法律意識，違背公眾所提出的地方審判庭庭長應當毫無瑕疵這一要求的，也是和他在教導初等司法官員方面的職責，和他對下級司法官員的地位不相稱的。因此，我們認為我們良心上的義務就是忠心耿耿地向陛下表達我們的殷切願望，即不願再與**泰梅**院長保持共事關係。”

在奏折上簽名的是法院全體官員，只有法院的唯一顧問，司法

大臣林泰倫的女婿除外。

在泰梅沒有遭到懦夫們的任何反对，又在那里履行自己的职务以后，这位司法大臣就在 12 月 18 日把上面所引的奏折的副本送到閔斯德，請泰梅先生“亲自裁夺”。

12 月 19 日早晨，如“杜塞尔多夫日报”所报道的，泰梅第一次出席了地方法院全体人員大会，并坐在自己的院长席上。同他并排坐着的是副院长馮·奥尔費斯。在會議开始以后，他立即要求发言，作了內容大致如下的簡短的讲话：

“他接到司法大臣的手諭以及附来的一份公文的副本，也就是‘高貴的同事們’（他現在荣幸地屬於他們之列）的声明；这个声明对他回来供职一事表示抗議。司法大臣把这个声明送給他，是为了让他了解它的內容，并‘为了請他对此亲自加以裁夺’。‘高貴的同事們’的抗議显然是以他的政治活动为根据的；但是，关于这种政治活动，以及一般地关于他的政治观点，他不打算在这里談，因为他沒有义务向‘高貴的同事們’报告这些事情。至于他的‘裁夺’，那末他在这里坐在自己的院长席上这一点就已經表明了，而他也必須向‘高貴的同事們’担保，只要沒有法庭的判决，他就决不离职。但是，他不认为政治观点的不同会破坏法院同仁之間的关系；从他这方面來說，至少他将尽一切可能来防止这一点。”

这对于这些勇敢者中最勇敢的人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靂。他們一个个坐在那里哑口无言、呆若木鸡，就像是有人把美杜莎^①的头扔进了吏部一样。

好一个勇敢的閔斯德地方法院啊！它出于自己的服务热忱，竟对許多人进行审讯并把他們投入監獄，因為他們願意执行国民議会关于拒絕納稅的决定。勇敢的地方法院由于就泰梅先生的事

① 希腊神話中的一个蛇发女妖。——譯者注

件发表了声明，而且是直接在御前发表的，它就以一方的身分出現，在审理案件之前說出了偏見，因而对于他方决不能起公断人的作用。

大家知道，似乎是由于柏林的普通人民对普魯士国民議會施加了压力，勃兰登堡內閣才举行了第一次政变¹⁴⁰。为了不对議員們施加任何压力，甚至在議員們回到自己的固定住所以后，內閣还有加无已地对他們繼續进行那在柏林时就开始了的“野蛮的狩猎”¹⁴¹！

司法大臣林泰倫在他的指令（这个指令我們将在下面发表）中說：

“許多人故意散布一种謬見，說什么以往施行的各种刑律，特别是制裁叛国罪的刑律，从今年3月起已經失去效力；这种謬見大大促进了无政府状态的扩大，而且可能已对个别法院发生了有害影响。”

林泰倫先生和**完全受制于他的各高等法院的大部分活动**，再一次证明：自从强行解散国民議會以后，在普魯士起作用的只有一条法律，就是柏林权奸的专横。

1844年3月30日，普魯士政府頒布了臭名远揚的法官紀律法。根据这条法律，只要內閣的一紙法令就可以撤換法官或免除法官的职务。最后一届“**联合議會**”廢除了这条法律，并重新确定了以下的原則：只有根据法庭的判決，才能撤換法官或免除法官的职务。欽定宪法确认了这个原則。而一些法院按照司法大臣林泰倫的方法行事，想用**道德压力**来迫使自己的一些政治上受到損害的同行辞职，它們这样做难道不是在肆意踐踏上述那些法律嗎？这些法院把每个政治观点不合乎它們的普魯士王国的“**荣誉**”标准的人都从自己的队伍中排挤出去，它們这样做，难道不是在把自己

变为軍官联合会嗎？

难道規定**人民代表不受法庭審訊和享有不受侵犯的特权的法律**，在我們这里是不存在的嗎？

真是有名无实！

如果說**普魯士宪法**由于它特有的条款和产生的方式而沒有把自己廢棄，那末**柏林高級法庭**是它的最后保障这一簡單的情况却会把它廢棄的。宪法由**大臣們的責任心**来保障，而**大臣們的无責任心**則由为他們欽定的法院即**柏林高級法庭**来保障，这个高級法庭的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就是**米勒先生**。

因此，高級法庭的最近几个指令正好是公然廢除欽定宪法。

在**奥地利**，政府要洗劫銀行这一直接威胁¹⁴²（維也納人民在大义凜然地痛击金融封建主义的時刻並沒有触动銀行）使**資產階級**相信，由于它背叛无产階級，遭受打击的恰恰就是它在背叛时打算加以保障的东西，即**資產階級的財產**。在**普魯士**，**資產階級**看到，由于它怯懦地对政府采取信賴态度，对人民背叛地采取不信賴态度，**資產階級財產的必要保障——資產階級的司法**在受到威胁。

由于法官处于依附地位，**資產階級的司法**本身也成了依附于政府的司法，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法紀**本身已让位于官吏的专橫。La bourgeoisie sera punie par où elle a peché——**資產階級**将受到它用来为非作歹的工具即**政府**的懲罰。普魯士各高等法院的諂媚的声明不过是这些法院即将按专制精神进行改造的最初征兆，——关于这一点，司法部不久前发布的下述指令就是证明：

“在今年10月8日的通令中，我的前任大臣已經提醒，司法机关的首要任务在于維護法律的尊严和使人遵守法律，它們为国家服务的最好行动就是执行这项任务，因为真正的自由只有在法律的基础上才能确立。遺憾的是，

从那时以来，許多地方都发现了极为严重的嘲弄法律和秩序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在国内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用暴力反抗政府当局的举动，而这种举动并不是在各地都遭到了坚决有力的回击。鉴于这种可悲情况，现在当国王陛下政府已经采取坚决措施来拯救危在旦夕的国家的时候，我再度向全国司法机关和檢察官先生們呼吁，号召他們克尽职守，毫不容情。无论誰犯了罪，都应立即受到法律惩治。

无论根据地方当局的个别通知还是根据官方报纸的报道，我都不得不深为遺憾地指出，个别司法官員把他們的职业要求于他們的特殊义务置之不顾，他們有的放任自己去干一些显然是非法的活动，有的則沒有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而这种勇气和大无畏精神是跟恐怖主义順利进行斗争所特別不可缺少的。我认为对这种人也要定罪，必要时还应毫不松懈、毫不迟疑地提起訴訟，因为保卫司法的官員是受托维护法律的尊严的。他們自己違法，那就是犯下了双重的罪行；而对于他們的訴訟特別需要加速进行，因为执行司法的权能不应再留在这类官員手中。按照現行的規章，在未征得上級机关同意之前，对于某些犯罪官員不得进行正式审讯或采取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的暂时解除职务的措施；因此，在罪犯中有这些官員的情况下，不必等待特殊的許可，而应该立即着手查明事实，作为审讯的根据，然后再尽快地取得所要求的批准。对于見习法官和編制外的官員則不应忘記，解除他們的国家职务是要遵循特殊的規章的。

許多人故意散布一种謬論，

說什么以往施行的各种刑律，特別是制裁叛国罪的刑律，从今年3月起已經失去效力；

这种謬論大大促进了无政府状态的扩大，而且可能已对个别法院发生了有害的影响。鉴于普魯士司法官員現在一般說来还保留着优良的精神，只要指出法律在沒有經過立法途徑廢除或改变以前一直有效这个著名的法律原則，以及指出本月5日頒布的宪政法令第一〇八条的条文，就可以滿怀信心地认为，可敬的普魯士司法部門的官員們，只要完全忠实于真正合乎道义的和国家的自由，是会把尊重法律和秩序看得高于一切的。

只要遵循这些原則，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我們就能滿怀信心地前进，确信我們能战胜犯罪行为、战胜无政府状态。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大力促使显赫一时的普魯士国家恢复自己的道义力量，并且在我們当中杜絕——用法兰克

福一位剛毅果敢的議員的話來說——寡廉鮮耻的事情和粗野的暴行。

各法院院长先生以及科倫的总檢察官先生应当对自己屬下的官員发出相应指示,并通知我因什么过失对哪些官員給予了免职处分并开始审訊。”

司法大臣林泰倫

1848年12月8日于柏林

将来当革命终于在普魯士取得胜利的时候,它不需要像二月革命那样用特殊的法令来廢除旧法官的終身制。它将在萊茵上訴法院、柏林高級法庭和勃罗姆堡、拉提博尔、閔斯德等地的地方法院的真实可靠的声明中发现这个等級放棄自己特权的举动。

卡·馬克思写于1848年
12月23日左右

載于1848年12月24日
“新萊茵报”第17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辟 謠

杜蒙先生的文化流氓无产階級以最动人的消极抵抗态度对待“新萊茵报”給它的所有悶棍，以“新萊茵报”編輯所沒有写过的文章为凭向警察告发他們，企图以此来进行报复。于是，根据 12 月 25 日的“科倫日报”，弗莱里格拉特便成了紐約出版的“德意志快邮报”上那篇科倫通訊的作者，因此他也就参加了 11 月 3 日为祝賀“科倫日报”老板們而举办的虛囂乐会。“科倫日报”的編輯显然是不甘心让“馬尔泰澤”专美于前的^①。

写于 1848 年 12 月 26 日

載于 1848 年 12 月 27 日

“新萊茵报”第 17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見本卷第 154 頁。——編者注

新“神圣同盟”

科倫 12 月 30 日。还在几个月以前，普魯士、奥地利和俄国就結成了新的“神圣同盟”，这件事全世界都已經知道了。条約最近就要公諸于世。依靠“上帝和鞭子的恩典”的君主們的这个同盟的灵魂是俄国。但同时俄国的全部政治和外交活动，除少数例外，都是由德国人或俄籍的德国人进行的。的确，凡是有专制政体和反革命进行活动的地方，我們总会遇見德国人。但我們在任何地方所遇見的德国人，都沒有在不断反革命的中樞——俄国的外交界所遇見的的那样多。在这里占头把交椅的涅謝尔罗迭伯爵是德国的犹太人；其次，駐柏林的公使馮·美延多尔夫男爵，是从爱斯兰来的，而他的助手，皇帝的侍卫官，卞肯多尔夫伯爵上校，也是爱斯兰人。在奥地利工作的庫尔兰人麦迭姆伯爵以及他的几个助手，其中包括馮·方通先生，都是德国人。俄国駐倫敦公使馮·布隆諾夫男爵也是庫尔兰人，他是梅特涅和帕麦斯頓的中間环节和中介。最后，以俄国代办身分在法兰克福进行活动的布德堡男爵是里夫兰人。这只是随便举出的几个例子。这样的例子我們还能举出好几十个，更不用說那些以彼得堡沙皇为后台，在德国身居高位和要职，同时又領俄国的优厚奉祿的人了。

沒有必要說明（因为这已經众所周知的事了），奥地利大公妃、現在的皇太后索菲婭在人民敌人陣营和神圣同盟陣营中扮演

着什么样的角色。索菲娅本人又处在米哈伊尔大公妃、保尔·维尔腾堡亲王的女儿叶列娜大公妃的最强有力的影响之下。叶列娜使尼古拉和索菲娅同臭名昭彰的路德维希大公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些人物的圈子里，好几个月以前就已经讨论和通过了一项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奥地利的军法皇帝^①应当娶大公夫妇唯一在世的女儿^②为妻，借以使新“神圣同盟”亲密无间，团结一致，并使俄国能够日益接近自己的目的——在德国建立鞭子的绝对统治。

写于 1848 年 12 月 30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2 月 31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83 号

① 军法皇帝(或戒严皇帝)指弗兰茨·约瑟夫。——译者注

② 指叶卡特琳娜·米海依洛夫娜。——译者注

革命运动

科倫 12 月 31 日。从来还没有一次革命运动像 1848 年的革命运动这样以如此动人的序曲开始。羅馬教皇給 1848 年的革命运动以宗教的祝福，拉馬丁的風神之琴輕輕地奏出了优美慈爱的曲調，歌唱了所有社会成員和各族人民的 «fraternité»——手足情誼。

“拥抱吧，亿万人民！
普天之下共亲吻。”¹⁴³

現在，被趕出羅馬的教皇在殘暴的白痴斐迪南的保护之下穩坐在加埃塔；这个意大利的 «iniciatore» [“倡議者”]¹⁴⁴ 正在运用計謀，伙同他在自己的黄金时代曾以开除教籍相威胁的、意大利历来的死敌奥地利来反对意大利。不久前在法国举行的总统选举，对于叛徒拉馬丁的不得人心作了統計学上的证明。沒有比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更仁慈、更人道和更軟弱的事变了；沒有比这种軟弱性的人道主义的必然后果更殘酷的东西了。意大利、波兰、德国和首先是在六月战敗的那些人們就是证明。

然而，随着法国工人在六月的失敗，六月的胜利者自己也战敗了。賴德律-洛兰和山岳党的其他領袖被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的政党即“国民报”派排挤掉了；而“国民报”派則被王朝反对派即梯也尔-巴罗排挤掉了；如果三次复辟的循环沒有完結，如果路易-

拿破侖不只是一个空的投票箱（通过这个投票箱，法国农民声明他们参加社会革命运动，而法国工人则诅咒过去几个革命阶段的一切活动家：梯也尔—巴罗，拉马丁和卡芬雅克—马拉斯特），而是一个更有用的东西，那末这个王朝反对派也应该让位给正统主义者¹⁴⁵。但是我们要指出如下的事实：革命的法国工人阶级失败的必然结果，便是刚刚镇压了无产阶级的法国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失败。

法国工人阶级的失败和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也就是那些用谋求解放的英勇行动来回答高卢雄鸡的叫声的民族遭受新的奴役。波兰、意大利和爱尔兰又一次遭到普鲁士、奥地利和英吉利的警察制度的掠夺、侮辱和残暴的蹂躏。法国工人阶级的失败和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也就是欧洲各国曾经一度与人民结合起来用反对封建制度的流血起义来回答高卢雄鸡的叫声的中等阶级的失败。那不勒斯、维也纳、柏林！法国工人阶级的失败和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也就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文明在同野蛮作斗争中的失败。在瓦拉几亚俄国人及其工具——土耳其人开始对罗马尼亚人实行压迫；在维也纳，克罗地亚人、潘都尔兵、捷克人、奥地利边防军马队和其他的歹徒扼杀了德国的自由，而沙皇目前在欧洲则处处出头露面。因此，打倒法国资产阶级，争取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争取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就是欧洲解放的口号。

但是，英国这个把许多民族变成自己的雇佣工人，并用自己的巨手来扼制整个世界，并且一度担负欧洲复辟费用的国家，这个在自己内部阶级矛盾发展得最尖锐最明显的国家，好像是一座使革命巨浪撞得浪花四溅的岩石，它想用饥饿来扼杀还在母腹中的新

社会。英国統治着世界市場。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經濟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水風浪。每个国家內的工业和貿易关系都依賴該国和其他国家的交往，都受該国和世界市場的关系的制約。但是英国統治着世界市場，而資产階級又統治着英国。

因此，欧洲的解放——不管是各被压迫民族爭得独立，还是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都取决于法国工人階級的胜利的起义。但是法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必然要遭到英国資产階級的破坏，遭到大不列顛在工业和貿易上的世界霸权的破坏。如果要把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社会改革进行到底，那無論現在或将来都不过是一种虛无飄渺的善良願望。而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毀，只有世界大战才能給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的有組織的政党提供条件，来进行胜利起义以反对它的强大的压迫者。只有当宪章派成了英国政府的首脑的时候，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領域进入現实的領域。但是，凡是有英国参与的**欧洲战争**都是世界战争。这场战争将在加拿大和意大利、东印度和普魯士、非洲和多瑙河流域进行。而欧洲战争将是法国胜利的工人革命的第一个結果。像在拿破侖时代一样，英国将成为反革命大軍的首領，但由于这场战争，英国本身将被投入革命运动，将成为革命运动的領袖并贖偿它对十八世紀革命所犯下的罪过。

法国工人階級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就是 1849 年的前景。

卡·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12 月 31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1 月 1 日“新萊茵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第 184 号

資產階級的文件

科倫 1 月 4 日。大家知道，在資產階級統治最發達的英國，社會慈善事業採取了最高尚、最慷慨的形式。由資產階級社會舉辦的、讓過剩的工人居民能夠苟延殘喘的英國 workhouses〔習藝所〕這種社會機構，以十分微妙的形式把善舉和資產階級對被迫向它乞求善舉的不幸者所施加的**報復**結合起來了。窮人不僅只能得到少得可憐的、幾乎僅夠維持體力再生產的生活資料，而且他們的活動也只限於令人厭惡的、使他們的精神和肉體都愚鈍的、非生產性的、無意義的勞動，例如拉磨子。為了使不幸者明白他們真的犯下了彌天大罪，明白他們不但沒有像通常那樣成為給資產階級帶來利潤的被剝削的對象，反而像堆在倉庫里的酒桶使酒商擔負一筆開支一樣，使他們的天生的需求者增加了一筆費用，——為了使他們感到自己真的罪孽深重，就奪去了他們的一切，奪去了甚至對慣犯也加以保留的東西：奪去了同妻室兒女團聚、消遣、同別人交談的機會等等。但是就連英國資產階級的這種“殘酷的善舉”也絲毫不是建築在慈悲的基礎上，而是建築在非常實際的、很容易加以計算的基礎上的。一方面，如果大不列顛全境的赤貧者一下子都被拋到街頭，資產階級制度和商業就會受到很大的損害。另一方面，英國工業有時處在狂熱的過度生產時期，有時又處在商業滯銷時期，在前一種情況下，現有勞動力的供應難以滿足對勞動力的需

求，而勞動力終究是必須獲得的，而且愈便宜愈好，在后一種情況下，生產遠遠超過需求，工人大軍勉強有一半人能夠為了掙得一半的工資而從事有用的勞動。為了在興旺時期經常有現成的後備軍，而在商業雕蔽時期又可以在這種慈善機構中把後備軍變成沒有意志、沒有反抗力、沒有要求和欲望的機器，難道還能想出比辦workhouses〔習藝所〕更高明的辦法嗎？

普魯士資產階級却不同於英國資產階級，並且勝過英國資產階級。它不是像不列顛資產階級那樣在政治上狂妄自大到令人不禁想起瀆神的羅馬風尚的地步，而是對御座、祭壇、軍隊、官僚和封建制度表示至高無上的崇敬和基督徒般的溫和恭順；它不是努力通過貿易活動去征服全球，而是按中國方式在國內經營小本生意，像庸人那樣縮手縮腳地拘泥於早已過時的、因循守舊的半行會制度，對工業中永無止境的偉大發明精神總想加以斥責。不過，普魯士資產階級有一點已經接近自己的不列顛的典范，這就是**對待工人階級的無恥殘酷**。如果說，普魯士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作為一個集團，在這一點上也落后於不列顛人的話，那末，這不過是因為整個說來，作為一個**全國性的階級**，由於缺乏勇氣、智慧和毅力，它從來也沒有爭得過什麼東西，而且以後也永遠不能爭得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它並不具有全國規模，它只是作為**一省、一城、一地**的資產階級，作為一群**私有者**而存在，就**這種形式**來說，它對付工人階級比英國資產階級還要殘酷。為什麼人民從復辟時期起就那樣懷念不久前被他們禁錮在地中海孤島上的拿破侖呢？因為智者的專制要比愚者的專制好受些。所以，英國工人比起德國工人來可能有些民族自豪感，因為壓迫他們的主人也壓迫着整個世界，可是德國工人的主人，即德國資產者，本身就是**奴隸之一**，而天下最

可怕、最卑賤的事，莫过于做奴隶的奴隶。

我們把在光榮的科倫市從事城市建築工作的無產者必須簽字的“工人手冊”逐字逐句地轉載在下面，作為證明我國資產階級卑鄙無恥地對待工人階級的历史文件。

工人手冊

第一條 每一個工人都必須無條件服從所有身兼警官的市監工的指示和命令。凡不服管教或拒不從命者，應立即開除。

第二條 未經建築工程監工的特許，任何工人不得從一工段轉到另一工段，或擅離工地。

第三條 凡竊取他工段的大車、獨輪車或其他用具用於自己工段工作的工人，應予以開除。

第四條 凡酗酒、喧嘩、吵架、爭辯或毆鬥者，應立即予以開除。此外，在必要情況下，肇事人應由司法機關依法懲處。

第五條 凡遲到工地十分鐘以上者，於半日內不予分配任何工作；遲到三次即可開除。

第六條 請求辭工或被開除的工人，應在所規定的下一個發工資的日子，按本人所完成的工作量領取工資。

第七條 工人被解雇，應載入工人手冊。如工人系被開除，得視情況禁止其再在原建築工地或一切城市建築工地就業。

第八條 開除工人及開除的原因，每次都應報知警察當局。

第九條 如工人欲對工地監工提出控訴，則應推舉由三名工人組成之代表團將控訴書呈交負責城市建築工程的首長。該首長應就地調查控訴內容，並自行裁奪。

第十條 工作時間定為早六時半至十二時，午後一時至傍晚天黑。〈真是妙筆！〉

第十一條 工人必須同意上述條件，才能獲得工作。

第十二條 工資於每星期六下午在建築工地發給。

具有绝对支配权的建筑工程总监工

于科伦

工人 { 签字
或画押

{ 分配于某工段,担任某项
工作等等

建筑工程监工签字

全俄专制君主对他的臣民所下的俄国式圣旨，能比这更富于亚洲精神吗？

对于市监工，甚至对“一切身兼警官的市监工”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凡不服管教或拒不从命者应立即开除”。可见，首先必须消极服从！其次，根据第九条，工人有权将“控诉书”呈交“负责城市建筑工程的首长”。“这位总监的裁夺是不容上诉的，只要从等级制的角度来看，就可以想见，这种裁夺自然是不利于工人的。如果他做出裁夺，如果工人被列入了全市性的黑名单，那末这些工人就倒了霉，他们从此就要受警察局监视。而他们的最后一点市民自由的外表也就消失无余了，因为根据第八条，“开除工人及开除的原因，每次都应报知警察当局”。

仁慈的先生们，如果你们解雇了工人，如果你们向工人宣布废除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来换取你们的工资所依据的那份合同，那末废除这种民事合同同警察局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城市工人是苦役犯吗？或许，有人向警察局告密，说他们是对自己的天然上司，对你们这些明智的、显赫的、有势力的人没有表示应有的尊敬？如果有人向警察局告密，说你们破坏了什么供应合同，或者没有按时支付期票，或者在新年喝得酩酊大醉，难道你们不会嘲笑这样的人吗？当然会嘲笑的！但是，如果事情出在工人身上，你们就不会认为自己同他们有着民事合同关系，你们就会刚愎自用，地以天然

的主人的姿态統治他們！而為你們效勞的警察局就应当掌管工人記過簿。

根据第五条，凡是迟到**十分钟以上**的人，都要受到**半个工作日**沒有工做的处分。处分和过错是多么不相适应啊！你們迟到了整整几个世紀，而工人却不能在六点半以后迟到**十分钟**，迟到了就得失去**半个工作日**？

最后，为了使这种家长式的专橫不受任何破坏，使工人听凭你們随意处置，你們尽量使你們的走狗任意决定处分的輕重。根据第四条，在“**必要情况下**”，即在你們认为是必要的情况下，在开除和报告警方以后，“肇事人应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根据第五条，工人三次于六点半后迟到十分钟，即“**可**”开除。根据第七条，如工人被开除，“**得視情况禁止其再在原建筑工地或一切城市建筑工地就业**”等等，等等。

我們城市的卡托們^①，这些对柏林奴顏婢膝的偉人們，在他們的这个刑法典中为疯狂的资产者的胡作非为打开了多么方便的大門啊！

从这个模范法律的例子可以看出，**我們的資產階級**如果当了政，会賜給人民什么样的宪章。

卡·馬克思写于 1849 年 1 月 4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1 月 5 日“新萊茵报”
第 187 号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① 卡托(M. Porcius Cato)是古羅馬的执政官、監察官，他拥护旧习，捍卫貴族特权，以严酷著称。——譯者注

合众国的預算和基督教 德意志的預算

科倫 1 月 6 日。普魯士政府究竟花了國家多少錢，我們終於在几天前弄清楚了。“普魯士國家通報”終於用 1849 年國家預算的例子向我們表明，以前的預算一直在怎樣卑鄙地欺騙我們。對這份新年禮物感到震驚的，只有那些一向把我們的天賦政府的一言一語奉為神聖真理，把 1820 年以來國家財政方面的彌天大謊當做我們這個警察國家的預算已經十分完善的證據的人。

普魯士的面積約五千平方英里，人口稍微超過一千六百萬。

北美合眾國現在的領土幾乎等於整個歐洲的面積，人口在兩千一百萬以上。

要考察普魯士 1849 年度的預算，除了北美自由合眾國的預算以外，再也找不到更合適的出發點了。

把兩個預算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普魯士資產者為了如願以償地得到一個天賦政府，為了在戒嚴時期或非戒嚴時期受這個政府的雇傭兵的虐待，為了受那幫目中無人的官員和容克地主的蔑視，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另一方面，那個意識到自己力量並決定利用自己力量的剛毅的資產階級，只須付出多么微小的代價就能維持自己的政府。

兩個預算本身就已充分證明：一方面胆小怕事、目光短淺、庸

庸碌碌，而另一方面則意識到自己的优点、預見性和力量。

合众国 1848 年的全部开支共計 42 811 970 美元。这个数目包括在距中央政府所在地两千英里以外进行的战争，即墨西哥战争所需的費用。运送军队和一切軍需品需要多么巨大的費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合众国的收入共計 35 436 750 美元，其中 31 757 070 美元得自关税，3 328 642 美元得自出卖国有土地，351 037 美元得自其他各种偶然收入。由于軍費开支，一般收入不能抵偿全部支出，于是就发行公債来弥补赤字，公債券是按照高于 *al pari*〔票面价額〕的价格认购的。請到金融市場去打听一下，“基督教德意志”政府在这种优惠条件下是否能弄到一千塔勒！

在合众国，財政年度是从 7 月 1 日开始的。在 1849 年 7 月以前，由于进行墨西哥战争，开支比平时还会大大增加（当然不是按普魯士規模增加）。但是，波克总统在給国会的咨文中答应，在下一財政年度，即到 1850 年 7 月 1 日为止的那个財政年度，提出一个普通的和平时期的預算。

这个强大的国家，即北美資產階級共和国，在和平时期的开支究竟是多少呢？

是 33 213 152 美元，其中包括国債利息（3 799 102 美元）和应该在 1850 年 5 月 30 日付給墨西哥的 3 540 000 美元。

如果除去預算中的这两笔特殊开支，那末合众国整个政府和管理机构一年的开支还不到两千六百万美元。

而普魯士公民在和平时期每年向国家交納多少錢呢？

答案是相当令人痛心的。給我們作出这一答案的是“普魯士国家通报”。它宣称：每年九千四百万塔勒以上！

总之，北美共和国两千一百万居民虽然有錢，甚至很富，但交給国庫的还不到两千六百万美元，就是說折合普魯士貨幣还不到三千八百万塔勒；而一千六百万普魯士人虽然比較穷，每年却必須向国庫投入九千四百万塔勒，而国庫还感到不滿足。

但是，我們可不能不主持公道！

北美共和国只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任期四年的总統，誠然，这个总統为国家所做的事要比一打国王和君主加在一起所做的事还多，但是他每年只能得到三万七千塔勒（折合普魯士貨幣）的微薄薪俸。在这区区三万七千塔勒中，反映出了基督教德意志人“天佑吾王，天佑容克”的心情的全部哀伤。根本沒有侍从和宮廷珠宝商，根本沒有人像在沙洛頓堡大街上那样为宮廷貴妇用清水潑道，根本沒有用公民的錢兴办的猎場等等。噢，这多么可怕！但最可怕的是这些北美人，这些上帝的棄儿，看来甚至还没有意識到这是可怕的，这是野蛮的。

我們这里就完全不同了。虽然我們花的錢甚至比他們多两三倍，但是我們却由于具有他們所沒有的而且靠三万七千塔勒根本不可能有的东西而感到心滿意足。我們因为有上帝賜福的富丽堂皇的宮廷而感到欢欣愉快，人民每年为这个宮廷所花的錢的确实数目我們不知道，大致估計一下至少有四五百万塔勒。

美国人真是傻得出奇，他們尽可能把錢积蓄起来，以便过豪华的生活，把錢花在自己身上。而我們則认为拋棄自己的享受，即自己的錢財，使別人能够过豪华的生活，是基督教德意志人的天职。除了这种豪华以外，靠人民掏腰包而穷奢极侈的宮廷，对于大量落魄的伯爵、男爵以及一般“貴族”等等，什么样的善举沒有做出来啊！这些人大多数只会消費，不会生产，如果不从国家那里以体面

的形式得些施舍，那他們終究会完全破产。如果我們要一一举出我們制度的善举和优点，就是花一天時間也說不完！

由于这种微不足道的預算，美国人在其他許多方面也大大落后于我們！

譬如說，如果总督伯提歇尔先生是在他們那里，他就不能从国库得到三千塔勒的贈礼。他們一定会說，他完全可以滿足于自己的厚祿。伯爵和男爵們也根本不可能得到額外的子女教育費。在这种場合，北美共和国会对这些可敬的先生說：alors il faut s'abstenir d'avoir des enfants!〔那就別生孩子好了!〕如果那里有一个“許澤尔”，那他就得不到每年六千塔勒的奖賞，而應該滿足于自己的薪俸，并且这份薪俸也許甚至会减少到三千塔勒。一个人，一个普魯士人，一个基督教德意志的將軍，就只應該靠这点錢过活嗎？多么邪恶的居心啊！Apage!〔真是荒唐之至!〕

美国人也同汉澤曼先生一样，在金錢問題上是沒有温情可言的。

他們最多只会給唐·卡洛斯一頓 whippings〔鞭笞〕，但永远也不会給他七十万塔勒，让他能够同自己的大貴族和僧侶們一起去过心滿意足的生活，为梅特涅的正統主义而斗争。能够这样做的只有天赋王权，因为人民的腰包在任何时候都是理应为它敞开的。

美国人向国家交納微不足道的捐稅，因而只有一万人的常备軍，这支常备軍在战时可以很快地扩充为由坚强的軍人組成的两百万大軍。美国人甚至很不懂得这样一种乐趣，即把大部分稅款用来供养一支軍队，这支軍队在平时可以用来對我們实行戒严，殘酷地鎮压我們，伤害我們，向我們开枪，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祖国的光荣和荣誉。

但是說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这些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竟如此頑固，他們根本不想了解我們基督教德意志的制度，甚至认为少納稅比多納稅好。

德国資產者也是这样頑固，他們竟一口咬定，說不可能出足够的錢来維持天賦王权，来供养它的由士兵和官吏构成的大軍以及那群領养老金的人，来支付作为奖賞的額外報酬等等。

北美富裕的共和主义者同普魯士資產者之間的对比关系，正像他們的預算一样，是三千七百万比九千四百万。一个过着自己的生活，一个过着天賦的生活；这也就是他們之間的區別。

写于 1849 年 1 月 6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1 月 7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 189 号

新年賀詞

科倫 1 月 8 日。如果牧师和圣詩頌唱者、教堂杂役和風琴演奏者、理发师和夜巡邏、田地看守人和掘墓人等等向我們恭賀新禧，那末这是古往今来的习俗，我們一点也不会大惊小怪。

但是 1849 年的新年不以老习惯为滿足。这一年一开始就显得有点不平常，連普魯士国王也发表了新年賀詞。

这一次的新年文告既不是告普魯士人民，也不是“告我所寵爱的柏林人”¹⁴⁶，而是“告我的軍隊”。

在这个新年文告中，国王以自己的軍隊而“自豪”，因为“当〈三月〉叛乱破坏了我想审慎引导我的百姓建立的自由主义制度的和平发展时”，軍隊一直是忠心耿耿的。

以前还說三月事件是“誤会”等等，現在已經不需要什么掩飾了，于是三月“誤会”也就变成了“叛乱”。

从国王的新年賀詞中，我們嗅到一种气息，这种气息也从“十字騎士”^①的字里行間散发出来。賀詞中說的是“叛乱”，于是报纸也依样画葫芦，写了一些誰也不知道的“三月罪犯”的事件，說什么犯罪的恶棍在三月間破坏了柏林宮廷生活的安宁。

如果我們問，三月“叛乱”为什么会引起这样大的憤慨，那末我

① 指“新普魯士报”，見注 38。——譯者注

們會聽到這樣的答复：“因为它破坏了自由主义（!!）制度的和平发展，等等。”

假如你們这些三月叛乱者沒有安息在弗里德里希斯海茵¹⁴⁷，那末現在就賞給你們“鉛彈和火药”，或者終身苦役。要知道，你們这些邪恶分子破坏了“自由主义制度的和平发展”！可是，关于普魯士王国的“自由主义制度”的发展，关于揮霍行为的极端自由主义的发展，关于虛伪和普魯士王国的狡猾詭譎的“和平”傳播，关于警察和兵营精神、密探活动、欺詐行为、假仁假义、厚顏无耻的和平发展，以及最后，使所謂的上层階級过极端荒淫无耻的生活而給人民造成的令人厌恶的、使人愚蠢的影响的和平发展，关于所有这一切，是否还需要再提醒一下呢？这样的提醒是不必要的，因为只要环顾一下四周，只要多少注意一下，我們就可以重新看到“被破坏了的发展”的盛况，就能欣赏到上述“自由主义制度”的再版。

国王的祝賀文告接着說道：“我的軍隊不唯保持其昔时的英名，且又爭得近日的光荣。”

可不是嗎！它为自己爭得了大概只有克罗地亚人才能进一步妄求的光荣。

但是，它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为自己爭得了这种光荣呢？第一，“当德国需要我們出师什列斯維希的时候，軍隊以新的桂冠裝飾了自己的旌旗”。

由維登布魯赫少校递交的普魯士給丹麦政府的照会¹⁴⁸，就是使普魯士的新的光荣能閃閃发光的基础。作战的方式从头到尾都完全符合照会的精神，照会向丹麦王兄保证，普魯士政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想法，它不过是丢給共和主义者一点釣餌，遮盖一下其他人的耳目，以便贏得時間。而贏得時間，就是贏得一切。然后就

可以很好地达成協議。

曾經在長時間內迷惑了社會輿論的弗蘭格爾先生，像晝夜盜賊那樣偷偷離開了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他害怕被別人認出來，因此換了一身便服。在漢堡，一切旅館老板都公開表示不能接待他。他們珍惜自己的房舍、門窗，更甚於珍惜為人民所鄙棄的、以這位值得稱頌的先生為代表的普魯士軍隊的桂冠。也不應該忘記，進行這次極像舊帝國法庭的訴訟程序那樣既沒有好處又沒有意義的戰役（參看當時的“新萊茵報”¹⁴⁹）的唯一成績就是犯了一個戰略上的錯誤。

這次戰役唯一令人感到驚奇的是**丹麥人**的不平凡的勇敢，他們頑強地牽着普魯士軍隊的鼻子走，完全切斷了普魯士同世界市場的联系。

使普魯士在這方面獲得絕頂光榮的，除了這些以外，還有同丹麥的和談以及和談的結果——在馬爾摩簽訂的休戰協定¹⁵⁰。

如果羅馬皇帝聞一聞從廁所稅中得來的錢，還能說：«non olet» [“沒有臭味”]，那末相反地，普魯士在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得到的桂冠，却鑄着不可磨滅的字樣：«olet!» [“臭不可聞！”]。

第二，“我的軍隊在鎮壓波茲南大公國的叛亂中，戰勝了種種困難和危險”。

所謂“戰勝了種種困難”，就是說：第一，普魯士利用了柏林的甜言蜜語給波蘭人造成的崇高幻想，波蘭人把“波美拉尼亞人”當做反對俄國的德國戰友，因此毫無顧慮地解散了自己的軍隊，而允許波美拉尼亞人開進國內，直到當普魯士人開始極其殘酷地蹂躪手無寸鐵的人的時候，他們才重新集中已經分散的戰鬥力量。而什麼是普魯士人的英雄功績呢！“光榮的”普魯士軍隊的英雄功績

不是在戰爭之中，而是在戰爭之后獲得的。當梅洛斯拉夫斯基被介紹給六月的勝利者的時候，卡芬雅克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普魯士人怎麼會在米洛斯拉弗城下一敗塗地（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用親自聽說此事的人所提供的材料來證實）。三千個好幾用鑷刀和長矛武裝起來的波蘭人，曾兩次打垮兩萬名組織嚴密和裝備良好的普魯士人，兩次迫使他們退却。普魯士騎兵在狼狽逃竄時，把普魯士步兵撞得東滾西倒。波蘭的起義者將反革命兩度趕出城外以後，守住了米洛斯拉弗。但是對普魯士人來說，比他們在米洛斯拉弗城下的失敗更可恥的，就是他們經過以前的敗北而終於取得的弗勒申^①城下的勝利。如果一個拿着手槍的膽小鬼遇上一個手無寸鐵然而像海格立斯那樣力大無窮的敵人，那末這個膽小鬼一定會逃開，而在距離相當遠的地方把自己的全部子彈射完。普魯士人在弗勒申城下就是這樣做的。他們逃到一定的距離以外，然後再用霰彈、裝有一百五十粒彈丸的榴彈和榴霰彈來轰擊手持鑷刀長矛的人，而鑷刀和長矛，大家知道，對遠處的東西是毫無辦法的。到現在為止，只有英國人曾經用榴霰彈來轰擊東印度半野蠻的居民。而只有被波蘭人的勇敢精神吓得魂不附體並且意識到自己軟弱無力的普魯士糾糾武夫，才會拿榴霰彈來對付那些被稱做同胞的人。他們必須設法在一定距離以外大量殺傷波蘭人，這是不言而喻的。離波蘭人過近是太可怕了。這就是弗勒申城下光榮的勝利！但是，如我們已經指出的，普魯士軍隊的英雄功績是在戰爭之后開始建立的，正像獄卒的英雄功績只是在宣判以後才開始建立一樣。

① 波蘭稱作：弗熱斯尼亞。——編者注

普魯士軍隊的**这个**光荣，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关于这一点，有几千波兰人作保证。他們由于普魯士的背信棄义和黑白色的阴險狡詐而被榴霰彈和尖头子彈等等所杀害，或者后来被打上了硝酸銀烙印¹⁵¹。

关于反革命軍隊的第二个桂冠，被普魯士英雄燒毀的城市和乡村以及在自己家中被他們用枪托打死和刺刀刺死的波兰居民完全可以作证，普魯士人的掠夺和种种暴行也可以作证。

永垂不朽的光荣归于波茲南的这些普魯士勇士！那不勒斯的劊子手¹⁵²很快就循着他們开辟的道路前进了，这个劊子手枪杀了忠心耿耿的首都民众，在二十四小时內任凭他的丘八們在首都搶劫掠夺。荣誉和光荣归于在波茲南战役中大显身手的普魯士軍隊！因为这次进军成了文迪施格雷茨之流所率领的克罗地亚人、奥地利边防軍馬队、奥尔托汉人及其他匪帮的光輝范例，激起了他們建立这类功績的热情。布拉格（6月）、維也納、普勒斯堡^①等地的情况就表明了这一点¹⁵³。

归根到底，甚至普魯士人对波兰人所表现的**这种**勇气，也只不过是他們害怕俄国人的結果。

“三是吉利的数字”。因此，“我的軍隊”也应获得三次光荣。而机会也就来了。因为“軍隊参与建立德国南部之秩序〈！〉，又給普魯士的名字增加了新的光荣”。

只有居心不良或患着縮小狂的人才不会否认“我的軍隊”出色地为联邦議會尽了警察宪兵的责任，使它在重受洗礼以后，变得摩登起来，要求把自己称为中央政权了。同样不容爭辯的是，在歼灭

① 斯洛伐克称作：布拉的斯拉发。——編者注

南德的葡萄酒、肉、苹果酒等等方面，普魯士的名字也无疑获得了光荣。瘦骨嶙峋的勃兰登堡人、波美拉尼亚人等等养肥了他們的爱国的肚子，酒徒过了酒癮，他們在留駐南德期間，以极其英勇的精神消灭了房东供給他們的一切，以致普魯士的名字在这里家喻户晓。可惜的是他們还没有偿付膳宿費，不然的話名声一定会更加响亮。

“我的軍隊”的光荣实在不胜枚举。但是还不能不提一下，“每当我下詔軍隊，赤胆忠心、**紀律严明**的軍隊总是时刻准备为我效劳”。还有一点也可以大加贊揚，傳諸后世，这就是：“我的軍隊以英武的精神和**昂揚的士氣**滌除了一切卑鄙譏言。”

这个賀詞对“我的軍隊”贊不絕口，它稱贊軍隊“紀律严明”和“士氣昂揚”，它再一次着重提到軍隊在大公国^①的英雄功績，从而令人愉快地回想起軍隊在美因茲、施魏德尼茨^②、特利尔、爱尔福特、柏林、科倫、杜塞尔多夫、亚琛、科布倫茨、閔斯德、敏登等地所获得的桂冠。而我們这些不屬於“我的軍隊”的人，因此就能使自己的狹隘的忠臣思想開闊起来。原来，枪杀老人和孕妇，盜窃（在**奧斯特洛沃**附近发生的盜窃已經有案可查），用枪托和軍刀殘害和平居民，毀坏房屋，用藏在大衣里面的武器在夜間襲击手无寸铁的人們，拦路搶劫（請回想一下諾依維特附近所发生的事情），——原来，这些以及諸如此类的英雄行徑在基督教德意志的語言中就叫做“**紀律严明**”、“**昂揚的士氣**”！士氣和紀律万岁！因为在这面旗帜下进行的掠夺的牺牲者是再也不会复活了。

仅仅从我們所提到的普魯士国王新年賀詞中的这几个地方，

① 即波茲南。——編者注

② 波兰称作：斯維德尼察。——編者注

就已經可以看出，这个文件無論从它的意义或精神來說，都足以同不倫瑞克公爵 1792 年的宣言¹⁵⁴ 相媲美。

卡·馬克思写于 1849 年 1 月 8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1 月 9 日“新萊茵报”
第 190 号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匈牙利的斗争¹⁵⁵

科倫 1 月。当意大利去年夏秋两季的反革命进攻遭到第一次反击的时候，在匈牙利平原上，压迫者同直接导源于二月革命的运动的斗争的最后阶段正在结束。新的意大利运动是 1849 年运动的序幕，而对马扎尔人进行的战争则是 1848 年运动的尾声。也许，这个尾声还会演成一幕正在暗中准备着的新悲剧。

这个尾声像 1848 年革命悲剧中迅速交替的最初几场一样，像巴黎和维也纳的陷落一样，具有英雄豪迈的特点；这种特点使它迥然不同于 6 月至 10 月间发生的那些可怜的或微不足道的事件。1848 年的最后一幕通过恐怖主义正转入 1849 年的第一幕。

在 1793 年以后，在 1848 年的革命运动中，一个被占优势的反革命包围的民族敢于用革命的激情来对抗怯懦的反革命的狂暴，用 *terreur rouge* [红色恐怖] 来对抗 *terreur blanche* [白色恐怖]，这还是第一次。长时期以来，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革命性质，第一次看见了一个敢于代表本族人民接受敌人的挑战而进行殊死斗争的人——路德维希·科苏特；对于本民族来说，他体现了丹东和卡诺的形象。

敌人的优势的确大得惊人。整个奥地利，首先是一千六百万狂热的斯拉夫人，反对四百万马扎尔人。

群众性的起义，全国都来制造武器，发行纸币，迅速镇压一切

阻碍革命运动的人，不断革命——总而言之，在被科苏特所武装、组织和鼓舞的匈牙利，我们重新看到了光荣的 1793 年的一切基本特征。维也纳缺少这种所谓在死亡的威吓下二十四小时内就能整装待发的革命组织，否则文迪施格雷茨永远也进不了这个城市。我们看看他能否战胜这种革命组织进入匈牙利。

现在我们就来比较详细地观察一下正在进行的斗争和斗争中的各个党派。

奥地利君主国是由于企图仿照法国国王(直到路易十一为止)曾经在法国采用过的办法把德国联合为统一的君主国而产生的。由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都有一种可怜的地方局限性，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具有一种同这一切相适应的小商贩性质，所以这种企图没有成功。哈布斯堡王朝没有得到整个德国，只是得到了德国南部的一些土地。当时在那里，不是在同分散的斯拉夫各民族直接进行斗争，就是德国封建贵族和德国市民阶级共同统治着被压迫的斯拉夫各民族。在这两种情况下，各省的德国人都需要外来的支援。对他们来说，联合起来反对斯拉夫人就是这种支援，于是，通过把有关各省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合并起来的方法，实现了这种联合。

这样就产生了德意志奥地利。为了判定我们的说法是否正确，只要随便拿一本历史教科书来读读就够了。那里讲到奥地利君主国是怎样产生的，它在反对斯拉夫人的不断斗争中怎样瓦解了又重新兴起。

匈牙利加入了德意志奥地利。马扎尔人在匈牙利进行的斗争同德国人在德意志奥地利进行的斗争一样。楔入奥地利大公国和施梯里亚的斯拉夫野蛮人中间的德国人和以同样方式楔入莱达河

流域的斯拉夫野蛮人中間的馬扎尔人联合起来了。像德国貴族在南部和北部，在波希米亚^①、莫拉維亞、克倫地亞和克萊納統治了斯拉夫民族，同化了他們，从而把他們卷入了欧洲运动一样，馬扎尔貴族也在南部和北部，在克罗地亚、斯拉窩尼亞和喀尔巴阡山附近地区上統治了斯拉夫民族。德国貴族和馬扎尔貴族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的敌人是天然的同盟者。馬扎尔人同奧地利的德国人之間的同盟是必要的。只要有一个大事件，只要有一次對他們两者的强有力的进攻，就会使这个同盟成为不可分割的。土耳其人征服拜占庭帝国就是这样的事件。土耳其人威胁匈牙利，其次也威胁維也納，因此，匈牙利曾在几世紀中同哈布斯堡王朝不可分割地联結在一起。

但是，他們的共同敌人逐渐衰弱了。土耳其帝国开始衰落，而斯拉夫人也无力起来反对馬扎尔人和德国人了。在斯拉夫土地上掌权的一部分馬扎尔貴族和德国貴族被斯拉夫族同化了，于是，各斯拉夫民族自己也願意保持这个要愈来愈坚决地維護貴族、反对不断发展的德国資產階級和馬扎尔資產階級的君主国。民族矛盾消失了，哈布斯堡王朝也改变了政策。这个在德国市民階級支持下登上了德意志皇帝宝座的哈布斯堡王朝，現在却开始比其他任何王朝都更坚决地維護封建貴族，反对資產階級。

奧地利参加瓜分波兰，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加里西亞的名門豪紳和达官显貴，即波托茨基家族、留博米爾斯基家族、查尔托雷斯基家族，把波兰出賣給奧地利，而成为哈布斯堡王朝最可靠的支柱，以此換得了哈布斯堡王朝對他們的領地的保护，以免受

① 即捷克。——編者注

下层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侵犯。

但是，城市资产阶级愈来愈富裕，其影响也愈来愈大，和工业齐头并进的农业的进步也改变了农民对地主的地位。资产阶级和农民反对贵族的运动愈来愈带有威胁性。由于农民到处都是民族局限性和地方局限性的体现者，农民运动必然带有地方性质和民族性质，所以与农民运动一起又产生了民族之间的旧的斗争。

在这种形势下，梅特涅完成了他的杰作。他消除了贵族（除了最有势力的封建贵族以外）对国家事务的任何影响。他把那些最有势力的金融贵族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削弱了资产阶级，——他必须这样做，财政状况要求他这样做。于是，他依靠上层封建贵族和金融贵族，依靠官僚和军队，在比他的一切竞争者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实现了君主专制的理想。他利用每一个民族的贵族和其他各民族的农民的帮助，把各该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同时他又利用各民族的贵族对各该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恐惧心理，把各民族的贵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各种不同的阶级利益，民族局限性和各种地方偏见，尽管错综复杂，总是处在适度的抗衡状态中，使老奸巨滑的骗子手梅特涅有可能自由地施展他的伎俩。他唆使各族人民互相倾轧究竟收到了什么效果，加里西亚的大屠杀¹⁵⁶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梅特涅利用染上了宗教狂热病和民族狂热病的卢西族¹⁵⁷农民，把为了农民利益而掀起的波兰民主运动镇压下去了。

1848年首先在奥地利造成了极可怕的混乱局面，使所有这些由于梅特涅的罪过直到当时还互相奴役的民族一度获得自由。德国人、马扎尔人、捷克人、波兰人、莫拉维亚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卢西人、罗马尼亚人、伊利里亚人、塞尔维亚人互相间都发生

了冲突，同时，在这些民族的每一个民族内部，各个不同阶级之间也进行着斗争。但是，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很快就有了头绪。斗争者分成了两大阵营：德国人、波兰人和马扎尔人站在革命方面，其他民族，即除了波兰人以外的一切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萨克森人，则站在反革命方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民族划分呢？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种划分符合这些民族过去的全部历史情况。这是解决所有这些大小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开始。

直到现在为止，奥地利过去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1848年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奥地利各个大小民族中，只有三个民族是进步的代表者，它们积极地影响历史，并且现在还保持着生命力，这就是德国人、波兰人、马扎尔人。因此，他们现在是革命的。

其他一切大小民族，在最近的将来都要在世界革命的暴风雨中灭亡。因此，它们现在是反革命的。

至于波兰人，我们介绍读者看一看我们所写的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那篇文章¹⁵⁸。为了压制波兰人的革命精神，梅特涅早就求助过卢西人；卢西人所不同于波兰人的，是他们的方言稍有差异，而主要的区别是他们信奉正教；他们自古以来就属于波兰，他们只是从梅特涅那里才知道，波兰人是他们的压迫者。似乎在旧波兰，波兰人本身没有遭受过同卢西人一样的压迫，似乎在奥地利统治下，梅特涅不是他们共同的压迫者！

波兰人和卢西人的情况就是这样。由于自己的历史情况和地理位置，他们同奥地利本土是截然分开的。因此，为了更好地分析其他各民族的混乱情况，我们在叙述中只好把他们撇在一边。

可是，我们还要指出一点，波兰人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认识和真

正的革命精神，因为他们现在同自己以前的敌人——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结成同盟来共同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反革命。一个斯拉夫民族能把自由看得比斯拉夫的民族特征更珍贵，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它的生命力，从而保证它是有前途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奥地利本土。

奥地利位于苏台德山和喀尔巴阡山的南部，易北河上游谷地和多瑙河中游地区。在中世纪早期，奥地利是一个完全居住着斯拉夫人的国家。按语言和风俗来看，这些斯拉夫人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弗拉基亚和马其顿的斯拉夫人属于同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同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不同，被称为南方斯拉夫人。除了这些有血缘关系的斯拉夫民族以外，从黑海到波希米亚森林和提罗耳阿尔卑斯山的整个广大地区中，只是在巴尔干南部居住着为数不多的希腊人，在多瑙河下游地区零零星星地散居着一些说罗马尼亚语的瓦拉几亚人。

德国人从西面，马扎尔人从东面分别楔入这些密集的斯拉夫人中间。德国人侵占了波希米亚西部地区，沿着多瑙河两岸一直伸展到莱达河东岸地区。奥地利大公国、莫拉维亚部分地区、施梯里亚大部分地区都德意志化了。这样就把捷克人和莫拉维亚人同克伦地亚和克莱纳的居民隔开了。马扎尔人用同样的方法清除了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中部直到德国边境的斯拉夫人，并占领了这个地区。马扎尔人在这里把斯洛伐克人和某些卢西人居住的地区（在北部）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隔离开来，统治了所有这些民族。最后，土耳其人模仿拜占庭人的榜样，征服了在多瑙河和沙瓦河南面的斯拉夫人，从此南方斯拉夫人的历史作用也就永远结束了。

胡斯战争，即捷克民族为反对德国贵族和德意志皇帝的最高权力而进行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战争，是南方斯拉夫人独立干预历史进程的最后一次尝试。这一尝试失败了，从此以后，捷克人便一直受着德意志帝国的束缚。

相反地，打败了斯拉夫人的胜利者——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却在多瑙河地区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性。如果没有德国人、特别是马扎尔人的帮助，南方斯拉夫人就会像在一部分斯拉夫人中确实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变成土耳其人，或者至少也会像至今斯拉夫族的波斯尼亚人的情况那样变成伊斯兰教徒。对奥地利的南方斯拉夫人说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值得为此把自己的族别改成德意志民族或马扎尔民族以资酬劳。

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土耳其人的入侵，是八世纪阿拉伯人入侵的再版。在维也纳城下和匈牙利平原上，不止一次地重演了查理·马尔泰尔的胜利¹⁵⁹。就像当年在普瓦提埃附近一样，也像后来蒙古人入侵时期在瓦尔施塔特附近¹⁶⁰一样，现在危险又威胁着整个欧洲的发展。当问题涉及拯救欧洲发展的时候，像奥地利的斯拉夫人这样几个早就分崩离析和衰弱了的民族能起什么作用呢？何况问题还在于拯救它们自己。

内部情况是和外部情况相适应的。作为动力的阶级，运动的代表者，即资产阶级，到处都是德国的或马扎尔的资产阶级。斯拉夫人好容易才开始形成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而对南方斯拉夫人来说，这种现象也只是极个别的情况。由于有了资产阶级，德国人或马扎尔人便掌握了工业，掌握了资本，德国的文化也发展起来了；在精神方面，斯拉夫人也受德国人的支配，连克罗地亚的斯拉夫人也是如此。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匈牙利，不过时间较迟，因而

程度也较弱罢了。在这里，馬扎尔人同德国人一起领导了精神和貿易的发展。但是，匈牙利的德国人尽管仍然保持着德国的語言，然而在精神、性格和习俗方面，都成为道地的馬扎尔人了。只有新迁去的农民移民、犹太人和特兰西瓦尼亚的薩克森人是例外，他們坚持在異国保留他們那种不必要的民族特性。

如果說馬扎尔人曾在文明方面稍微落后于奥地利的德国人，那末最近他們已經用政治活动出色地弥补了自己的缺陷。在 1830 年至 1848 年这个时期中，只有匈牙利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比整个德国更活跃，并且，匈牙利旧宪法的封建形式也比德国南部宪法的現代形式更能用来为民主利益服务。誰在这里领导了这个运动呢？馬扎尔人。誰支持奥地利的反动派呢？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

为了反对馬扎尔人的这个运动，同时也为了反对在德国重新兴起的政治运动，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建立了自己的宗得崩德——**泛斯拉夫主义**。

泛斯拉夫主义不是产生在俄国或波兰，而是产生在布拉格和阿格拉姆¹⁶¹。泛斯拉夫主义，这是奥地利的，其次是土耳其的一切弱小的斯拉夫民族为了反对奥地利的德国人、馬扎尔人，可能也是为了反对土耳其人而結成的同盟。土耳其人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被考虑进去，而作为一个也是处于完全衰落状态的民族，完全可以不考虑他們。泛斯拉夫主义按其基本傾向來說，是要反对奥地利的革命分子，因此，它显然是反动的。

泛斯拉夫主义很快就以双重的叛卖行为暴露了这种反动傾向：它使至今仍站在革命方面的唯一的斯拉夫民族——波兰人成了它的可怜的民族局限性的牺牲品；它把自己和波兰出卖給俄国

沙皇。

泛斯拉夫主义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由俄国統治的从厄尔士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直到黑海、爱琴海和亚得利亚海的斯拉夫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除了德語、意大利語、馬扎尔語、瓦拉几亞語、土耳其語、希腊語和阿尔巴尼亞語以外，还要包括将近一打斯拉夫語和主要方言。这一切不是用直到現在把奥地利联合在一起并促进了它的发展的那些因素联合起来的，而是用斯拉夫民族特征的抽象性质和所謂的斯拉夫語（当然这是大多数居民的共同語）联合起来的。但是，要不是在某些思想家的头脑里，哪里会存在这种斯拉夫的民族特征呢？要不是在帕拉茨基先生、盖伊先生及其同僚的幻想中以及部分地在已經沒有任何一个斯拉夫人能够了解的俄国教堂的古斯拉夫祈禱仪式中，哪里会存在什么“斯拉夫語”呢？事实上，所有这些民族都处在文明发展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上，从波希米亚的相当发达的（多亏德国人）現代工业和文化，直到克罗地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几乎是游牧性质的野蛮状态；所以，事实上所有这些民族的利益是极为对立的。事实上，这十个至十二个民族的斯拉夫語，是由同样数目的方言組成的，这些方言大部分互不相通，甚至可以归为不同的几大类（捷克語、伊利里亞語和塞爾維亞-保加利亞語）。由于这些民族十分輕視文学，而且其中大多数不开化，这些方言已变成了真正的民間土話，除了少数例外情形，这些方言都以某种異族的，即非斯拉夫的語言作为自己的标准語。所以，泛斯拉夫主义的統一，不是純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鞭子。

哪些民族應該領導这个庞大的斯拉夫国家呢？恰好是那些一千年来分散得七零八落的民族（其他的非斯拉夫民族往这些民族中間灌輸了具有生命力和发展能力的因素）；恰好是那些只是由于

各非斯拉夫民族的胜利武器才从土耳其暴政的蹂躏下被拯救出来的民族；恰好是那些到处被隔离的、丧失了自己的民族力量的、只有几千人或最多不过两百万人的弱小民族！这些民族已经衰弱到这种程度，以致像保加利亚人这样一个在中世纪时最强悍的民族，现在在土耳其却只以温和敦厚和心地善良著称，并以被称为 dobre chrisztian〔善良的基督徒〕为荣！在包括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这些民族中间，能够找到一个民族具有为人民所保持的、并被认为超乎琐碎的地方纠纷之上的民族历史传统吗？

八世纪和九世纪曾经是泛斯拉夫主义的时代，当时南方斯拉夫人还统治着整个匈牙利和奥地利，并且威胁着拜占庭。如果那时他们都未能抵挡住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入侵，如果甚至在他们的两个敌人——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彼此进行着激烈斗争的时候，他们都未能获得独立，并建立起巩固的国家，那末现在，在经受了一千年的压迫和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以后，他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在某一个角落找到一个或几个残存的民族，即被那个后来成了历史发展的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挤和征服了的以前的居民的残余。这些按黑格尔的说法是被历史进程无情地蹂躏了的民族的残余，这些残存的民族，每次都成为反革命的狂热的代表者，并且以后还会是这样，直到它们被完全消灭或者完全丧失其民族特性为止；其实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伟大历史革命的抗议。

在苏格兰，盖尔人就是这样，他们是1640年至1745年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柱。

在法国，布列塔尼人就是这样，他们是1792年至1800年波旁

王朝的支柱。

在西班牙，巴斯克人就是这样，他们是唐·卡洛斯的支柱。

在奥地利，泛斯拉夫主义的南方斯拉夫人就是这样；这只是残存的民族，只是一千年来极度混乱的发展的产物。这些同样处于极度混乱状态中的残存民族把整个欧洲运动的倒退视为唯一的救星，它们想使这个运动不是从西向东，而是从东向西地进行，在它们看来，俄国的鞭子是解放的工具和统一的纽带，——这一切都是完全自然的事情。

可见，南方斯拉夫人早在 1848 年以前就明显地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性质；1848 年向全世界揭露了他们的这种反动性质。

当二月风暴爆发的时候，是谁进行了奥地利革命呢？是维也纳还是布拉格？是布达佩斯还是阿格拉姆？是德国人和马扎尔人还是斯拉夫人？

的确不能否认，在有教养的南方斯拉夫人中存在过一个不大的民主党派，它虽然不放弃自己的民族特征，但愿意把这种特征献给争取自由的斗争。这种幻想也曾在西欧的民主主义者当中博得了同情，并且当斯拉夫的民主主义者还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时，这种同情是完全正当的。这种幻想由于轰击布拉格而破灭了。在这个事件以后，所有的南方斯拉夫民族都效法克罗地亚人把自己交给奥地利反动派支配。那些还继续胡说什么民族平等、民主的奥地利等等的南方斯拉夫运动的领导者们，不是变成了像许多报纸的无耻文人一样的愚蠢的空想家，就是变成了像耶拉契奇一样的恶棍。他们的民主誓言并不比奥地利官方反革命势力的民主誓言更有价值。简言之，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特征的恢复实际上是从最残酷地镇压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革命开始的；这是南方斯拉

夫运动的领导者们对俄国沙皇的第一次有力的效劳。

如果不算上层贵族、官僚和军阀，奥地利的权奸就只能从斯拉夫人那里得到支持。斯拉夫人在意大利的陷落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斯拉夫人袭击过维也纳，现在斯拉夫人又从四面八方进攻马扎尔人。他们的思想家是帕拉茨基为首的捷克人，他们的军事首脑是以耶拉契奇为首的克罗地亚人。

这就是他们对德国民主刊物的报答。6月间，当文迪施格雷茨屠杀捷克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德国民主刊物到处都对他们表示同情。而这同一个文迪施格雷茨现在却成了他们的英雄。

总括起来说：

在奥地利（波兰和意大利除外），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在1848年，像近千年来一样，掌握了历史主动权。他们是革命的代表者。

一千年来一直被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牵着走的南方斯拉夫人在1848年所以要起来为恢复自己的民族独立而斗争，是为了与此同时把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镇压下去。他们是反革命的代表者。此外还应该加上两个民族，也是早已走向衰落和丧失了任何历史活动能力的民族：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和罗马尼亚人。

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是在反对南方斯拉夫人的斗争中通过联合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方法建立起来的。现在这个王朝却想在反对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斗争中联合南方斯拉夫人来苟延残喘。

政治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谈谈军事方面。

纯粹是马扎尔人居住的地区，还不到整个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三分之一。从普勒斯堡^①到多瑙河和蒂萨河北面，直至喀

^① 斯洛伐克称作：布拉的斯拉发。——编者注

尔巴阡山脉，居住着几百万斯洛伐克人和为数不多的卢西人。在南面，在沙瓦河、多瑙河和德拉瓦河之間，居住着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再往东去，沿着多瑙河，是有五十多万人口的塞尔維亞移民区。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和薩克森人把这两个斯拉夫地区联合起来了。

这样一来，馬扎尔人便受着天然敌人的三面包圍。如果占据着山口的斯洛伐克人表现得不是那么冷淡，那末他們在他們的地区特别适于游击战争的情况下会成为非常危险的敌人。

但是，在目前条件下，馬扎尔人在北面只需要頂住加里西亚和莫拉維亞方面的军队的进攻。相反地，在东面，大批的羅馬尼亚人和薩克森人动员起来了，并同駐扎在当地的奥地利军队汇合起来了。他們的陣地非常巩固，一方面因为这是山地，另一方面因为他們占領着大部分城市和要塞。

最后，在南面，被德国移民、瓦拉几亚人以及奥地利的一个軍所支持的巴納特的塞尔維亞人，有寬广的阿利布納尔沼澤作掩护，要进攻他們几乎是不可能的。

克罗地亚人有德拉瓦河和多瑙河作掩护，同时又有一支拥有全部后备物資的强大的奥地利军队的支援，所以，他們早在10月以前就已經推进到匈牙利本土，并且現在他們坚守着他們在德拉瓦河下游的防御战綫，并不費很大力气。

最后，現在文迪施格雷茨和耶拉契奇正以密集的纵队从第四方面，即从奥地利方面向前推进。馬扎尔人被敌人的数倍于己的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包圍起来了。

現在的斗争很像1793年反对法国的斗争，不同的是，人口稀少的、仅仅处于半文明状态的馬扎尔人的国家，在物資供应方面远

不如当时的法兰西共和国。

匈牙利制造的武器和弹药质量必然很差；特别是制造大炮的工作总是无法迅速安排妥当。这个国家比法国小得多，因此，每让出一寸土地都意味着更大得多的损失。马扎尔人所剩下的只是他们的革命热忱、他们的勇敢精神以及科苏特给予他们的强有力的、动作迅速的組織。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奥地利已经取得了胜利。

“如果我们不能在莱达河上击溃奥皇军队，那我们就在拉布尼茨河^①上击溃他们；如果不能在拉布尼茨河上击溃他们，那就在佩斯城下击溃他们；如果不能在佩斯城下击溃他们，那就在蒂萨河上击溃他们。总之，无论如何我们要击溃他们。”¹⁶²

科苏特是这样说的，并且他正尽一切可能去履行自己的诺言。

即使布达佩斯陷落了，马扎尔人也还有广大的下匈牙利草原。这个地方好像是故意为进行骑兵游击战争而创造的。在这里的沼泽地中，有许多几乎无法接近的地方，马扎尔人能够在这里坚守下去。马扎尔人几乎人人都是优秀的骑手，他们具有进行这种游击战争的一切特质。奥皇军队如果敢于进入这个荒凉地区，他们就必須从加里西亚或奥地利取得全部粮食补给，因为在这里他们确实什么东西也找不到。如果是这样，那就很难说他们能在这里坚持下去。以密集队形前进在这里是不可能的；而分散为流动队，就必然遭到复灭。它的笨重装备必然使它逃不出敏捷的马扎尔人骑兵队的手掌，而且，即使奥皇军队能够取胜，他们也根本无法追击马扎尔人的骑兵队；而被击溃的奥皇军队的每一个士兵所遇到的

^① 匈牙利称作：列普策河。——编者注

每一个农民、每一个牧人都将是他的死敌。在这些草地上作战就像在阿尔及利亚作战一样，笨拙的奥军要花费多年的功夫，才能结束这场战争。而马扎尔人只要能够坚持几个月，他们就会得救。

马扎尔人的处境远不像被收买的患着黑黄色的¹⁶³狂热症的人想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坏。他们还没有被打败。即使他们倒下去，那也是像1848年革命的最后一批英雄一样光荣地倒下去，而这种失败只是暂时的失败。那时，极其残酷野蛮的斯拉夫反革命将会立刻席卷奥地利君主国，而权奸将会看到，他们的伙伴们都是些什么人物。只要法国无产阶级的起义（路易-拿破仑正在竭尽全力挑起这一起义）一取得胜利，奥地利的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就会获得解放，他们就会向斯拉夫的野蛮人伸报血海深仇。那时爆发的大战将驱散这个斯拉夫的宗得崩德，甚至将从地球上消灭掉这些顽固的小民族的名字。

在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中，不仅那些反动阶级和王朝，而且那许多反动民族也要完全从地球上消失。这也将是一种进步。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1月8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9年1月13日“新莱茵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第194号

瑞士报刊

伯尔尼 1 月 11 日。瑞士的政治报刊一年比一年更积极。现在，除了二十来种文学性的杂志以外，瑞士二十二州还有九十八种政治性报纸。这些报纸不像德国的甚至也不像法国的那种大型的报纸。除了瓦得州出版的某些报纸以外，其他报纸的篇幅通常都是对开或者四开的；其中只有十多种报纸每日出版，一小部分是每周五次，大部分是每周三次，有的甚至是每周一次。除了少数例外，所有这些报纸在内容和文字上都给人留下一种贫乏得可怜的印象。的确，在这里各州的故步自封的条件下，在只有这里才会发生的烦琐论战的条件下，难道卓越的记者天才能够得到发挥吗？难道真正有天才的记者能够在这种贫乏的环境中工作，能够满足于这种每周出三次的四开小报的圈子吗？

瑞士报刊最大的特点就是粗暴无礼。这里的报纸相互之间进行诋毁谩骂，肆无忌惮地进行人身攻击。如果那位把 Code pénal [刑法典] 第三七〇条¹⁶⁴ 看得神圣不可侵犯的莱茵检察官来到这个国家，那他连三天也呆不下去。

但是一切仅限于此而已。如果把这种无礼行为，这种没有任何俏皮味道的无礼行为去掉，那就什么也没有了，或者说只剩下最卑贱的奴性，即奴颜婢膝地对待由太古时候阿尔卑斯山的牧人、孤陋寡闻的农夫和讨厌的市僧组成的，既不多又分散而且还极度高

傲的民族所具有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故步自封的奴性。很明显，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而这种情况也不会破坏论战的自由，因为每一个派别，甚至是最进步的派别，都有自己的机关报。在瑞士这种故步自封的条件下，各党派本身的特点就是故步自封，报纸也像各党派一样故步自封。因此，这里到处都表现出目光短浅，缺乏远见；因此，没有任何一家报刊代表那种先进的，但是甚至在德国也早已是尽人皆知的派别；因此，连最激进的报纸也不敢稍稍离开自己党派所规定的仅仅在最近的将来要实现的那种故步自封的纲领，不敢批评瑞士民族故步自封方面最故步自封的东西。凡是褻瀆民族圣物的人，都会受到宗法式的私刑制裁。不然，正直的瑞士人要拳头干什么用呢？

瑞士报刊的平均水平就是如此。瑞士罗曼语区和伯尔尼的最好的报纸高于这个水平；瑞士东部的大部分报纸则低于这个水平。

我们现在就从瑞士首都的报刊谈起。伯尔尼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瑞士的报刊。在这个城市中，已经集中了伯尔尼州的全部报刊，这些报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取得首都报纸所特有的影响。

反动党派的，或者照这里的说法，贵族党派的主要机关报，是“瑞士观察家”，“伯尔尼报”很恰当地把它称为替外国服务的瑞士军官的机关报。这家可敬的报纸（每周出版三次）赞扬瑞士克罗地亚人在意大利的英雄功绩，辱骂激进派，拥护雇佣兵条约¹⁶⁵，谄媚贵族，歌颂拉德茨基和文迪施格雷茨，为杀害罗伯特·勃鲁姆辩护，诽谤一切国家的革命，向政府告密出卖流亡者。这家高贵的报纸实际上不用编辑也行，因为它只是汇集了名门世家纨绔子弟以及在市政委员会中钻营肥差美缺的人的各种消息和小品。能同这

家报纸并驾齐驱的，要算“伯尔尼新闻”了。这家报纸前面几版完全是广告，后面几版完全是歌颂贵族土地所有者的假仁假义、营私舞弊的文章。“蜜蜂”的作用，应该相当于这派人的“喧声报”¹⁶⁶。但是由于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贵族先生们哭的时候总比笑的时候多，所以这个“蜜蜂”的幽默就显得非常乏味和可怜。

温和派或自由派的机关报，即奥克辛本派的机关报，首先要算“伯尔尼宪法之友”。这家报纸被公认为是奥克辛本的半官方机关报。它是由从前的一位教授卡尔·海尔佐克博士编辑的。这家报纸的编辑多少有点经验，但根本谈不上有才华。它只限于替政府和联邦委员会的行动辩护，因为这些行动都出自奥克辛本派。在有关东部各州，特别是有关诸旧州 [Urkanton] 的问题上，它自然会表现出惊人的自由思想，而对于外交政策问题，它不时发出令人难以想像的叫嚣，企图用威严的语句来偷运最无原则的中立政策。不太知名的“联邦报”所持的方针，接近于皮蒙特人巴希用蹩脚的法文出版的法文报“瑞士”所持的方针。这家报纸同政府的联系不像“宪法之友”那样密切，但是同样热衷于歌颂执政的自由派多数，并且还心劳日拙地攻击瑞士法语区的革命报刊“窝州新闻”。该报的编辑直接参加了意大利问题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该报表现得比较规矩。——上述三家报纸都是每日出版。

激进派所掌握的报纸最多。激进派的主要机关报是“伯尔尼报”，它的编辑是大会议副议长、联邦院议员尼格勒尔律师。这家报纸是该州德语区最坚决的激进派的机关报，这一派在州委员会 [Regierungsrat] 中的代表是财政部长施坦普弗利。该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在尚须清除大堆垃圾的该州的立法和行政方面实现民主；在瑞士全境实现最大限度的集中；一有可能就放棄中立

政策。

“伯尔尼报”的撰稿人都是伯尔尼激进派中最知名的人物。因此毫不奇怪，该报不仅是本州最好的报纸，而且也是整个瑞士德语区最好的报纸。如果编辑和撰稿人能完全自由地写作，该报会办得更为出色，它会公开主张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海尔维第共和国，并且还会带上鲜明的革命色彩。但是现在不可能这样做，这个派别暂时也不允许这样做。除了“伯尔尼报”以外，从1月1日起又出版了一种日报——“联邦海尔维第”，这家报纸是以前在普伦特卢特^①（汝拉山脉）出版的“海尔维第”的继续，“海尔维第”是汝拉激进派及其领导者、州委员会委员施托克马尔上校的机关报。老“海尔维第”无疑是一家红色报纸；而新报将更坚决地坚持这个方针。

“瑞士报”（前“自由瑞士人”）也是站在激进主义立场上的，但是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因此它只要求实现一些有利于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的经济改革。但是总的说来，这家报纸也已经越过了通常的瑞士各州的故步自封（如中立、各州主权等等）的界限。除了上述三种日报以外，伯尔尼的激进派还办了一家在瑞士是唯一的，很不错的幽默报纸，即耶尼主办的“全景”。“全景”（每周出版一次）只是报道瑞士的，特别是伯尔尼州的生活。正因为这样，这家报纸才能在国内成为一种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诺伊豪斯政府的垮台。现在，它又在努力使奥克辛本派执政的时间不致太久。由于耶尼用无情的讽刺来破坏直到奥克辛本为止的一切执政者的威信，所以他在诺伊豪斯政府时期受到无数次

^① 法国称作：波尔兰特留伊。——编者注

审判和誣告，在諾伊豪斯政府垮台以后还收到許多恐吓信，受到許多迫害。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直到如今，伯尔尼的要人們都还心惊胆顫地等待这家每星期六出版的新报纸。勃魯姆被枪杀后，該报照例登出了一幅諷刺画，画着一个断头台和一把斧头，四周圍着許多殘破的王冠，下面的題詞是：“唯一的救星”。为了回答庄重的伯尔尼資产者对这幅諷刺画的憤慨，該报在下一号又登了一幅諷刺画，画的是一个路灯杆上挂着一頂王冠，下面的題詞是：“Suaviter in modo, fortiter in re〔柔和其表，剛強其实〕——紀念梅森豪澤”。

国民院和大会議議員約·奧·魏茵加特主办的“湖乡通报”，在新年前是社会主义派的唯一代表。“湖乡通报”鼓吹一种多愁善感、慈悲为怀的社会主义和紅色革命的奇異的混合体。它对伯尔尼州宣傳社会主义，而在談到外国时才提紅色革命。就这家周报的文章而論，它是全州最糟的报纸。其实，魏茵加特先生虽然流露出一种基督教的慈悲心腸，但是他在政治上却是最坚决的激进主义的拥护者。从新年开始，“湖乡通报”遇到了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另一家周报“独立主义者”。这家周报給自己提出了一个实在是費力不討好的任务：在伯尔尼州和瑞士全国寻找一种基础，来宣傳社会主义原理和提出至少能消除最令人憤慨的混乱現象的措施。但是，無論如何，“独立主义者”总是全瑞士唯一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来在本国宣傳自己思想的报纸。如果它成功的可能性同它在高級和最高級权力机关中已經引起的狂怒成正比，那末这家报纸的前途就大有可观了。

伯尔尼以外的报纸，我只想提一家：“进化报”¹⁶⁷，志願軍領導者貝克尔現在把它更名为“革命报”。这家在瑞士出版的所有报纸

中最坚决的报纸号召大家一定要实现新的欧洲革命，它竭力在周围寻找支持者。极其珍视自己的太平处境的资产者，为了对此表示感谢，非常仇视这家报纸。除了在瑞士、伯桑松和亚尔萨斯的德国流亡者以外，这家报纸没有多少读者。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更详细地谈谈伯尔尼州以外各地出版的报纸¹⁶⁸。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1 月 11 日
载于 1849 年 1 月 17 日“新莱茵报”
第 19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孟德斯鳩第五十六

一

科倫 1 月 20 日。“可敬的”約瑟夫·杜蒙让一个不但不取報酬反而付出酬金的匿名作者在來件照登欄中开導初選人，这个匿名作者还对“新萊茵報”作了如下的一番訓誡：

“民主派机关報‘新萊茵報’老是注意本報以‘致初選人’為題發表的短評，說什麼這些短評是從‘新普魯士報’上轉載的。

為了回答這個謠言，我們特此聲明：這些短評都按廣告收費，除第一篇轉載自‘議會通訊’以外，其餘各篇都是在科倫寫的，直到現在為止，短評的作者不但沒有讀過‘新普魯士報’，而且沒有見過它。”

我們了解，對孟德斯鳩第五十六來說，確保自己的**所有權**是多麼重要。我們也了解，對杜蒙先生來說，聲明他甚至為了本階級即**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印發傳單和廣告也要“收費”一事，是多麼重要。

至於匿名作者，他會知道法國的一句成語：«Les beaux esprits se rencontrent» [“英雄所見略同”]。如果說他靠自己的智慧創造出來的東西竟和“新普魯士報”、“普魯士同盟”¹⁶⁹的論斷一模一樣，那也怨不得他。

我們從未讀過他發表在“科倫日報”上的廣告，我們只是走馬觀花地瀏覽過杜蒙印刷所印刷的，從四面八方我們飛來的傳單。

但是現在把兩者比較一下，我們發現這種廢紙原來既是廣告又是傳單。

為了向匿名的孟德斯鳩第五十六贖罪，我們忍受極大痛苦讀完了他在“科倫日報”上發表的全部廣告，並把他的精神上的私有財產作為“公共財產”提交普魯士公眾審議。

真聰明啊！

孟德斯鳩第五十六所研究的主要是社會問題。他找到了一條解決社會問題的“最方便、最簡單的道路”，並用最肉麻、最無恥的騙人的熱情來推銷他的莫里遜藥丸^①。

“解決這個問題〈即解決社會問題〉的最方便、最簡單的道路，就是接受去年12月5日的欽定憲法，加以修改，然後讓所有的人向憲法宣誓，從而使憲法生效。這對我們說來是唯一的生路…… 因此，誰要是衷心同情自己苦難弟兄的遭遇，誰要是想使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人吃飽穿暖，——簡言之，誰要是想解決社會問題，那就不要選舉那些反對憲法的人。”（孟德斯鳩第五十六）

請投勃蘭登堡—曼托伊費爾—拉登堡的票吧，這樣，社會問題就能通過“最方便、最簡單的道路”得到解決。請投杜蒙、康普豪森、維特根施坦，甚至康佩斯、梅維森之類 *dii minorum gentium*^② 的票吧，這樣，社會問題就能解決！一票一個“社會問題”！誰“想使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人吃飽穿暖”，那就請投漢澤曼和施圖普的票吧！每投一票，社會問題就減少一個！接受欽定憲法——*voilà la solution du problème social!*〔這就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办法！〕

毫無疑問，不僅孟德斯鳩第五十六，而且他在“市民聯合會”¹⁷⁰中的庇護者，都不會等到接受和修改¹⁷¹欽定憲法，向憲法宣

① 一種號稱能治百病的藥丸。——譯者注

② 直譯是“小神”，轉意是“二流貨”。——編者注

誓并加以批准之后，再来“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吃飽穿暖”。为此已經采取了措施。

几星期以来，这里流傳着各种告示，在这些告示中資本家通知手工业师傅、小店主等說，鉴于目前的局势以及信貸增长的情况，从博爱的观点出发，貸款利息将由四厘提高到五厘。——这是解决社会問題的第一个办法！

此地的市政委员会本着同样的精神，为那些将要餓死或者不得已向城市出卖劳力的不幸的人制定了“工人手册”（参看“新萊茵报”第187号^①）。讀者大概还記得，在这个欽賜給工人的宪章中說，失去工作的工人按合同应受**警察局**監視。——这是解决社会問題的第二个办法！

三月事件以后不久，科倫市政委员会馬上就开办了一个物美价廉、設備齐全、房間既漂亮又暖和的餐厅。欽定宪法頒布以后，撥出了另外一个由慈善机关管理的**地方**来代替这个餐厅，这里不生火炉，餐具不全，而且不許立刻进餐，一夸特淡而无味的清湯要卖八分尼。——这是解决社会問題的第三个办法！

当維也納工人还控制着城市的时候，他們保护了逃亡资产者的銀行、房屋和財產。但是这些资产者回来以后，却向文迪施格雷茨告发这些“强盜”，要求把他們絞死。失业工人請求市政委员会帮助，結果都被送到同匈牙利作战的軍隊里了。——这是解决社会問題的第四个办法！

布勒斯劳^②市政委员会和政府眼看着那些失去生理上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而在济貧院中寻求庇护的不幸的人死于霍乱而无动于

① 見本卷第176—180頁。——編者注

②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編者注

衷，只是当瘟疫威胁着他們自己的时候，他們才注意到他們的殘酷的慈善事业的牺牲者。——这是解决社会問題的第五个办法！

在柏林的“天佑吾王，天佑吾国”协会中，有一个欽定宪法的朋友曾經表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实现自己的計劃还不得不討好“无产階級”，实在是一件难堪的事情。

这就是“解决社会問題的办法”的謎底！

我們的朋友海涅說：“普魯士暗探之所以这样危險，是因为他們什么时候也拿不到錢，——他們始終只是希望得到錢。”而普魯士資產者之所以这样危險，是因为他們什么时候也不給錢，而始終只是答应給錢。

英国和法国的資產者在选举中常常花很多錢。他們賄选的手段是举世皆知的。而普魯士的資產者——“噢，他們真是再聪明不过了！”他們德行高尚、举止庄重，因此不会乱花錢，他們付出的是“解决社会問題的办法”。这样不必破費分文！但是，正如杜蒙正式证明的那样，孟德斯鳩第五十六至少向“科倫日报”付出了广告費，并且还奉送了——已經是 gratis〔免費〕奉送——一种解决“社会問題”的办法。

可見，归根到底我們这位孟德斯鳩的 *petites oeuvres*〔小小作品〕的实际部分就是：請投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拉登堡的票！請选举康普豪森—汉澤曼！請把我們送到柏林去，讓我們的人在那里先站稳脚跟！这就是解决社会問題的办法！

流芳百世的汉澤曼解决了这个問題。为了恢复信貨，他先恢复了秩序。然后，正像 1844 年当“我敬爱的西里西亚紡織工人需要帮助而且应当給以帮助”的时候一样，就用火药和鉛彈来解决“社会問題”！

因此，請投欽定憲法的朋友的票！

但是，孟德斯鳩第五十六接受欽定憲法，只是为了以后能够修改它和向它宣誓。

最亲爱的孟德斯鳩啊！你既然接受了憲法，那就只能在它原有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就是說，你只能按照国王和第二議院的願望修改它，而第二議院是由容克地主、金融貴族、高級官員及僧侶組成的。这种唯一可能的修改，已經由欽定憲法本身預先規定好了。这种修改就是拒絕实行宪制，恢复旧式的基督教德意志的等級制度！

这就是在接受欽定憲法以后唯一可能和唯一被允許的修改，这种修改是高瞻远矚的孟德斯鳩不能不同意的。

可見，归根到底孟德斯鳩第五十六的 *petites oeuvres* [小小作品]的实际部分就是：請投汉澤曼—康普豪森的票！請投杜蒙—施图普的票！請投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的票！請接受欽定憲法！請选举接受欽定憲法的复选人！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解决“社会問題”为借口的。

其实，既然是欽定憲法，那又何必要借口。

但是，我們这位孟德斯鳩在实际指导如何解决“社会問題”，即談到他的巨著的基本內容之前，自然也有一个理論部分作为開場白。我們现在就来看看这个理論部分。

这位深思远慮的哲学家首先向我們說明，什么是“社会問題”。

“那末，实在說来，什么是社会問題呢？

人們應該而且希望生存。

要生存，就要有住所、衣服和食物。

大自然根本不生产住所和衣服，而野生的食物也非常少，远不够用。

因此，人們自己就要設法滿足這些需求。

這些都要靠勞動獲得。

因此，勞動是我們生存的第一個條件——沒有勞動我們就不能生存。

原始人每個人都自己蓋自己的小屋，用獸皮為自己縫制衣服，為自己採集果實以供食用。原始時代的情況就是這樣。

如果人們除住所、衣服、食物以外沒有其他需要，也就是說，如果人們僅僅滿足自己生理的需求，那他們就同禽獸處在同一个階段了。因為禽獸所做的也是這些。

但是，人是高於禽獸的生物，所以他要生存就需要更多的東西，他需要歡樂，需要提高到能享受精神財富的水平。而這些只有生活在社會中才能得到。

人們一生活在社會中，他們的生活條件就完全改變了。他們很快就發現，如果一個人只做一種固定的工作，工作起來就會容易得多。於是，一些人專門做衣服，另一些人專門造房子，還有一些人專門搞食物，一些人供給另一些人所沒有的東西。這樣一來，各種行業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一些人成了獵人，另一些人成了手工業者，還有一些人則成了農民。但是人們並沒有到此為止，因為人類還必須前進。人們開始創造發明。發明了紡紗和織布，學會了打鐵和制革。發明得愈多，手工業的種類就愈多，由手工業供應犁、鋤的農業就愈來愈容易耕作。一些勞動部門幫助另一些勞動部門，所有勞動部門都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後來，又開始同毗鄰的民族交往。一個民族有另一民族所需要的東西，而另一民族又有這一民族所沒有的東西。交換開始了。這樣就產生了商業，因而也出現了人類活動的新部門。於是文化也一步一步地提高了。從最初的簡單的發明起，經過許多世紀，終於達到了我們今天的發明水平。

這樣，在人們中間就產生了科學藝術，生活也愈來愈豐富多彩。醫生治病，教士傳教，商人經商，農民種地，花匠栽培花草，泥水匠建造房屋，木匠製造家具，磨坊主磨面，麵包師則用面粉烘烤麵包。一種行業同另一種行業緊緊地結合在一起，誰也不能離群索居，誰也不能單靠自己來滿足自己的需求。

社會關係就是如此。

這種關係完全是自然而然地產生的。如果你們今天鬧革命，把這些關係

彻底破坏，到明天你們又重新开始生活，那末也会重新建立起和現存关系一模一样的关系。几千年来地球上一切民族的情况都是这样。如果現在有誰想把工人同資产階級区别开，那就是弥天大謊。我們大家都在工作，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尽自己的力量、尽自己的才能工作。医生看病是工作，音乐师为舞蹈者伴奏是工作，商人写单据也是工作。大家都在工作，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崗位。”

多聪明啊！有耳朵的人都听着！

那末，实在說来，到底什么是生理問題呢？

每一个生物体都有一定的重量、密度等等。每一个有机体都由各种不同的組成部分构成；每一个組成部分都有特殊的作用，而相互作用的各个器官則紧紧地結合在一起。

“这就是生理关系。”

不能否认，孟德斯鳩第五十六具有出奇的簡化科学的才能。奖給孟德斯鳩第五十六一份专利证书(沒有政府担保的)吧！

劳动的产品只能由劳动来生产。不播种就沒有收获，不紡綫就得不到棉紗，余此类推。

整个欧洲都将怀着贊叹的心情向这位偉大的天才致敬。他在这里，在科倫，沒有“新普魯士报”的任何帮助而独自发现了这些真理。

在劳动过程中人們相互之間发生一定的关系，进行或簡或繁的分工。一些人烤面包，另一些人打铁，一些人煽动 [wühlen]，另一些人抱怨 [heulen]¹⁷²，孟德斯鳩第五十六写文章，杜蒙則从事刊印。亚当·斯密啊，这才是你應該請教的人呢！

劳动和分工是一切人类社会生存的条件，——孟德斯鳩第五十六的这些发现使他得出結論：“等級的划分”是同自然相适应的；說“資产階級和无产階級”有区别是“弥天大謊”；就算“革命”今天

把現存“社会关系”彻底破坏，那“**也会重新建立起和現存关系一模一样的关系**”；最后，誰要是衷心“同情自己苦难弟兄的遭遇”，誰要是想得到孟德斯鳩第五十六的尊重，那他就絕對必須选举符合曼托伊費尔和欽定宪法精神的复选人。

“几千年来地球上一切民族的情况都是这样”!!! 在埃及有过劳动和分工，因此有**等級**；在希腊和羅馬有过劳动和分工，因此有**自由民和奴隶**；在中世紀有过劳动和分工，因此有**封建主和农奴、行会、等級**等等。在我們这个时代也有劳动和分工，因此也就有**階級**，其中一个階級占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資料，另一个階級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才能生存，而出卖劳动也只有当购买劳动能使雇主階級发财时才有可能。

既然如此，那末“**几千年来地球上一切民族的情况**”都和現在在**普魯士**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这难道不非常清楚嗎？因为**劳动和分工**总是以某种形式存在的呀！或者实际上正好相反：社会关系，所有制关系，总是由于劳动方式和分工的經常改变而被推翻的？

在1789年，資产者并没有向封建社会呼吁說：貴族呀，你們还做貴族吧；农奴呀，你們还做农奴吧；师傅呀，你們还做师傅吧；因为没有劳动和分工，就沒有社会！不呼吸空气，就沒有生命！因此，就呼吸污浊的空气吧，不要把窗子打开，——孟德斯鳩第五十六的論調就是这样。

只有像在愚昧鄙陋的环境中生活了一輩子的德意志帝国的庸人那样无耻的人，才会在剛剛往自己的笨脑袋里塞进（而且是浮皮了草和加以歪曲地塞进）一点諸如劳动和分工之类的政治經濟学的起碼知識，就对那些使本世紀的人們絞尽脑汁的問題发表神諭

般的議論。

“沒有勞動和分工，就沒有社會！

因此

請選舉普魯士欽定憲法的朋友做復選人，而且僅僅選舉欽定憲法的朋友。”

怀着感激心情的後代，總有一天會出於責任感，為解決了社會問題的孟德斯鳩第五十六（不要和馮·羅伊斯-什雷茨-格累茨-羅賓斯坦-艾貝斯瓦爾得·亨利希二百八十四世^①混淆起來！）修建一座富麗堂皇的大理石墳墓，並把這個墓志銘刻在墓碑上。

孟德斯鳩第五十六並不向我們隱瞞“問題的症結所在”，以及一旦他被宣布為立法者後，他想做些什麼。

他教訓我們說：“國家應該設法使每個人都能受到足夠的教育而有可能學會一種有用的東西。”

孟德斯鳩第五十六從來沒有聽說過，在現存條件下，由於分工的關係，簡單勞動正在代替複雜勞動，童工正在代替成年工，女工正在代替男工，自動機器正在代替獨立的工人；隨着現代工業的發展，工人的教育逐漸成為多餘的和不可能的了。我們且不把科倫的孟德斯鳩送到聖西門或傅立葉那里去，而把他送到馬爾薩斯和李嘉圖那里去。讓我們這位笨伯在改善現代關係以前，在發表神諭般的議論以前，先去研究一下這些關係的最基本的原理吧。

“對於因疾病或衰老而陷於貧困的人，應該由市鎮予以照顧。”

孟德斯鳩，如果市鎮本身陷於貧困，那怎麼辦呢？要知道，由於同憲法一起經欽定的一億稅額以及像瘟疫一樣流行的戒嚴狀

^① 暗指羅伊斯-羅賓斯坦-艾貝斯道弗·亨利希七十二世。——編者注

态，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如果新的发明和商业危机摧毁了整个整个的生产部門，国家应该帮助和关怀受害者。”

不管科倫的孟德斯鳩对当世的情况了解得多么差，他总不能不注意到，“新的发明”和商业危机就像普魯士內閣的法令和法制基础一样是經常不断的。在德国，只有在同其他民族的竞争使采用新发明成为生死問題的时候，才会采用新发明。难道应当把新产生的工业部門搞垮来帮助将要灭亡的部門嗎？因发明而产生的新工业部門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它們比将要灭亡的部門生产的商品更便宜。鬼曉得要它們去支持将要灭亡的部門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至于国家或政府，那誰都知道，它們只是看来在給錢。要它們給錢就得先給它們錢。請問孟德斯鳩第五十六，誰应当給它們錢呢？是将要灭亡的工业部門，难道还嫌它們灭亡得不够快嗎？是新产生的工业部門，难道要它們先天不足嗎？或者是那些同新发明无关的工业部門，难道要它們由于发明了新的捐稅而破产嗎？孟德斯鳩第五十六，請你把这些好好想一想吧！

那末商业危机呢，最亲爱的孟德斯鳩？当欧洲爆发商业危机的时候，普魯士国家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設法用强行征稅或类似的措施，从通常的稅源中榨取最后一文錢。可怜的普魯士国家啊！要使普魯士国家幸免商业危机的禍害，那它除了国内劳动以外，还需要到九霄云外去寻找第三种收入的来源。当然，如果用国王的新年賀詞、弗兰格尔的軍令或者曼托伊費尔的政令就能把泥土鑄成金錢，那末“拒絕納稅”也就不会使普魯士的“亲爱的臣民”恐慌万状，而且就是沒有欽定宪法，社会問題也能解决了。

大家知道，“新普魯士报”曾把我們的汉澤曼宣布为共产主义

者，因為他曾想取消免稅規定。我們這位從來沒有讀過“新普魯士報”的孟德斯鳩，也在科倫通過**獨立思考**想到要把一切威脅欽定憲法的人宣布為“共產主義者”和“紅色共和主義者”！因此，你必須選舉曼托伊費爾，不然你就不僅是勞動和分工的私敵，而且還是共產主義者和紅色共和主義者。你必須承認勃律蓋曼的最新的“法制基礎”，不然你就是反對 Code civil¹⁷³！

費加羅，tu n'aurais pas trouvé ça [你萬沒有想到這一點]①！

關於孟德斯鳩第五十六，明天我們再來詳細地談！

① 博馬舍“瘋狂的日子，或費加羅的婚禮。”——編者注

二

科倫 1 月 21 日。孟德斯鳩第五十六想施展出一个老奸巨滑的馬販所能施展出的全部狡猾手段，來向初選人推銷“贈馬”^①，即欽定憲法。他是馬市上的孟德斯鳩。

誰不想要欽定憲法，誰就是想要共和國，——不單是一般的共和國，而且是紅色共和國！可惜在我們的選舉中，很少涉及到共和國，更不用說紅色共和國了。涉及的只是：

你們贊成舊的**專制制度**和刷新了的**等級制度**，還是希望實行資產階級的**代議制**？你們想要一種適合於前幾世紀的“現存社會關係”的政治制度，還是希望要一種適合於本世紀的“現存社會關係”的政治制度？

可見，這裡根本沒有涉及反對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係的鬥爭，這種鬥爭在法國正在進行，在英國正在醞釀，這裡涉及的是反對那種使“**資產階級所有制關係**”遭受危險的政治制度的鬥爭，因為這種制度把國家的權柄交給“**封建的所有制關係**”的代表人物，即天賦國王、軍隊、官僚、容克地主以及同他們有聯繫的一小撮金融貴族和市僧。

由於欽定憲法的幫助，社會問題正按照這些先生的精神來解決。這是絲毫也用不着懷疑的。

^① 德國諺語“贈馬不看歲口”，意思是說不要計較贈品的好壞。一般用這個諺語時是指壞的贈品，而“贈馬”也就成了“次貨”的代名詞。——譯者注

在**官吏們**看来，什么叫做“**社会問題**”呢？这就是保持他們的薪俸和照旧統治人民的地位。

在**貴族和貴族大地主**看来，什么叫做“**社会問題**”呢？这就是保存封建地主原来享有的特权，让**貴族**在軍隊和民事官厅中占据收入最多的肥差美缺，以及直接从国庫中拿錢来供养他們。除了这些可以感触到的**物质的**，因而也是“**最神圣的**”利益以外，“天佑吾王，天佑吾国”的先生們自然还要保持那些使他們的門第同**資产者、农民和平民**的下等門第有所区别的**社会特权**。旧的国民議會之所以被驅散，正是因为它胆敢侵犯这些“**最神圣的利益**”。我們在前面已經說过，上述先生們的所謂对欽定宪法进行“**修改**”，无非是要实行**等級制度**，就是說，实行一种能代表封建貴族、官僚、天赋王权的“**社会**”利益的政治制度。

再說一遍，絲毫用不着怀疑，欽定宪法正按照**貴族和官僚**的精神来解决“**社会問題**”，就是說，它将贈給这些先生一种統治形式，使这些半神半人能够剝削人民。

但是，欽定宪法是不是按照**資产階級**的精神来解决“**社会問題**”呢？換句話說，**資产階級**是不是能得到一种国家体制，使他們能自由地管理本階級的共同事务，如商业、工业、农业的利益；使他們能最有效地使用国家的資金，最節約地組織財政管理，对外有效地保护本国的劳动，对内开发国家財富的一切資源，清除其中的封建污泥呢？

难道在历史上可以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資产階級**在天賦国王存在的同时能够确立一种符合于它的物质利益的政治制度形式嗎？

为了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資产階級**曾不得不在英国两次赶走

斯图亚特王朝，在法国赶走世襲的波旁王朝，在比利时赶走拿騷家族的代表¹⁷⁴。

这种現象如何解釋呢？

任何一个世襲的天賦国王，都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而是旧社会在新社会内部的体现者。国家政权掌握在天賦国王手中，就等于国家政权掌握在殘存的旧社会手中，就等于国家政权掌握在其利益同资产階級利益极端敌对的封建等級手中。

而“天賦国王”正好是欽定宪法的基础。

正如社会上的封建分子把天賦国王看成是自己的政治領袖，天賦国王也把封建等級看成是自己的社会基础，看成是臭名远揚的“王权支柱”。

因此，每当封建主以及他們所掌握的軍隊和官僚的利益同资产階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天賦王权就不得不实行政变，于是就造成革命的危机或反革命的危机。

国民議會为什么被驅散了呢？只是因为它代表资产階級的利益而反对封建主义的利益，因为它想廢除阻碍农业发展的封建关系，想使軍隊和官僚服从商业和工业的利益，想制止侵吞国家資財的現象，想取消貴族和官僚的封号。

所有这些問題主要是同资产階級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

由此可見，尽管三月事件或其他事件迫使天賦王权不得不屈服，并且違反自己的意志披上了资产階級王权的外衣，但是政变和反革命危机却是天賦王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难道在一种必然导致政变、反革命危机和戒严的国家制度之下，能够恢复信貨嗎？

多荒唐啊！

資產階級的工業必須打破專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枷鎖。反對專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革命，恰好證明資產階級的工業已經發展到了緊要關頭：不是爭得適合於自己利益的国家制度，就是滅亡。

欽定憲法所保障的官僚監護制度對工業來說無疑是死路一條。請回想一下普魯士的礦業管理機關和工廠規章等等吧！如果英國工廠主把自己的生產費用同普魯士工廠主的生產費用比較一下，那他首先就會發現普魯士工廠主由於必須遵守官僚命令而受到的時間上的損失。

哪一個糖廠主會忘記普魯士同荷蘭在 1839 年訂立的通商條約¹⁷⁵？哪一個普魯士工業家不會因回想起 1846 年而羞愧？那時普魯士政府為了討好奧地利政府而禁止某一整個省份向加里西亞輸出商品；那時破產在布勒斯勞像瘟疫一樣盛行，而普魯士內閣則故作驚訝地宣稱，說它並不知道輸往加里西亞的東西有那麼多，等等。

欽定憲法將使這種人來執掌權柄，並且這種“贈品”本身，也是出自這些人之手。因此，請大家好好地考慮考慮這一點。

加里西亞的事情又使我們注意到另外一點。

當時普魯士政府同奧地利和俄國結成聯盟，使西里西亞的工業和商業做了反革命的犧牲品。這種手腕是會經常使用的。普魯士—奧地利—俄國反革命勢力的銀行老板就是英國，天賦王權以及它的“王權支柱”永遠都必須從它那里尋找國外的支持。而德國工業最可怕的敵人也是英國。我們認為，這兩件事是有充分說服力的。

在國內，工業被官僚桎梏所束縛，農業為封建特權所限制；在國外，貿易被反革命出賣給英國，——這就是欽定憲法庇護下的普

魯士國民財富的命運。

被驅散了的國民議會的“財政委員會”，在報告中充分闡明了天賦政府管理國家財政的真相。

這個報告只是作為一個例子指出為了鞏固搖搖欲墜的“王權支柱”，為了資助外國的那些專制王權的覬覦者（唐·卡洛斯）而從國庫中提取的款額。但是，為了使貴族能夠過更體面的生活，為了使封建王權的“支柱”能夠經常堅強有力而從其他公民的腰包中榨取出來的這筆錢，同那個與曼托伊費爾憲法同時經過欽定的全部國家預算比較起來，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數目。為了使少數人能統治多數人，首先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為了使盡量多的人圖一己私利而損害公共利益，就要有尽可能龐大的官僚隊伍；為了避免“新普魯士報”所說的那種現象，即財富使臣民變得過分無禮，就要用最無經濟效果的方式來揮霍國家的資金；為了使天賦政府在很容易預見到的危機時刻能夠單獨地對付人民，就要從流通中抽出尽可能多的國家資金，而不是對工業進行投資，——這就是欽定國家財政制度的基本要點。利用征收來的稅款使國家政權作為一種壓迫的、獨立的和神聖的力量來同工業、商業和農業對立起來，而不是把政權**降低為**資產階級社會的簡單的**工具**，——這就是欽定普魯士憲法的基本原則！

什麼人送什麼禮！今天的普魯士政府怎樣，它所贈送的憲法也就怎樣。要弄清**這個政府對資產階級採取的敵對態度**，只要看一下它的**工商業條例草案**就夠了。在進到成立協會的借口之下，政府企圖退到行會制度。競爭使生產出來的東西愈來愈便宜，它使生產具有愈來愈高的發展水平，就是說使**資本不斷增加**，**分工系統更加發展**，**採用機器的範圍不斷擴大**。每實行一種新的分工，都

要使手工业者先前的手艺降低价值，每采用一种新机器，都要排挤掉千百个工人，每一次扩大生产，即增加新的投資，都要使許多小商販和小資產階級的企业遭到破产。政府答应在封建行会机构的帮助下保护手工业不受工厂生产侵害，保护学得的手艺不受分工侵害，保护小資本不受大資本侵害。因此，在同英国的竞争进行的斗争中经过千辛万苦才勉强保住自己未遭完全失败的德国人民，特别是普魯士人民，应该束手做英国的牺牲品！因为他们将被迫接受一个同现代生产资料相矛盾，并且已被现代工业摧毁了的工业組織。

自然，任何人都沒有我們这样不喜欢資產階級統治。当洋洋得意的当代“办事人物”^①把時間浪費在无謂的爭吵上的时候，我們就在德国首先提出了反对資產階級的主張。

但是我們向工人和小資產者說：宁肯在现代資產階級社会里受苦，也不要回到已經过时了的旧社会去！因为现代資產階級社会以自己的工业为建立一种使你們都能获得解放的新社会創造物质資料，而旧社会則以拯救你們的階級为借口把整个民族抛回到中世紀的野蛮状态中去！

我們知道，天賦政府的社会基础是中世紀等級和中世紀制度。这个政府不适合于现代資產階級社会。它不得不試图按照自己的样子来建立一个社会。因此，它企图以行会制度代替自由竞争，以手紡車代替紡紗机，以鋤头代替蒸气犁，是完全合乎邏輯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普魯士資產階級同它的英国、法国、比利时的先驅們完全相反，竟大声宣布說欽定宪法（以及天賦王权、官僚

① 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共产主义者称为“冷酷的理論家”，而把自己叫做“办事人物”。——譯者注

和容克地主)是自己的口号呢?

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由于害怕革命而投入了反革命怀抱,好像反革命不是革命的序幕似的!

此外,资产阶级中有一小部分人对本阶级的共同利益漠不关心,他们一味追求自己特殊的、甚至同本阶级相敌对的利益。

这就是金融贵族、国家的大债权人、银行家、食利者。这些人的财富是随着人民的贫困而增长的。此外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福利是同旧的国家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杜蒙和他的文化流氓无产阶级。这就是那些沽名钓誉的教授、律师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他们只有在把出卖人民利益给政府作为有利行业的国家里,才能获得高官厚禄。

这就是常同政府进行有利交易的个别厂主;就是从对人民群众的普遍剥削中获得巨额利润的商品供应者;就是在政治生活的大漩涡中愈来愈失去其作用的市僧;就是在旧机关的保护下假公济私的市政委员;就是因出卖革命而成为大人先生和雄鹰勋章骑士的油商;就是成了皇家银行经理的,破了产的呢绒商和铁路业投机商¹⁷⁶等等,等等。

“这些人就是钦定宪法的朋友。”资产阶级要是衷心同情自己的这些苦难弟兄,要想配受孟德斯鳩第五十六的尊重,——那就请选举

符合钦定宪法精神的复选人。

卡·马克思写于1849年1月20—21日

载于1849年1月21和22日

“新莱茵报”第201和20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普魯士逮捕科苏特的命令

科倫 1 月 21 日。我們剛剛收到下面这份登在“奥佩恩区报”上的頗有教益的文件：

“逮捕令。据克拉科夫奥地利王国政府委员会通知：匈牙利已采取措施，企图使科苏特假借别人的名字取道布勒斯劳前往汉堡。据估计，科苏特的路线是梅斯洛维茨——格雷维茨——科捷尔^①。

奉西里西亚省总督先生的指示，特命令各警察机关、地方法院和宪兵队严密注意科苏特的行踪，该犯特征见后。一旦科苏特出现在你们地区，应以逮捕，并押送我处作下一步处理。”

（接着，像前面已经说过的，是科苏特的特征。）在这个頗有教益的文件上签字的是：

“王国地方行政长官霍夫曼

1849 年 1 月 17 日于奥佩恩”

我們的讀者对此将作何感想？上西里西亚的天賦的曼托伊費尔們竟同意在偉大的鼓动家科苏特遭到失敗和順利越过国境时逮捕他，并将他引渡給劊子手，让后者用鉛彈和火药去尽快地赦免他。如果科苏特真的被引渡，那将是史无前例的**最卑鄙的負义行为，最可耻的破坏国际法的行为。**

誠然，按照德意志联邦的旧法律，在德意志奥地利要求之下，普魯士有責任把那些因在**德意志联邦境內**进行的活动而被控的政治流亡者引渡給奥地利。但是革命消灭了德意志联邦的旧法律，

^① 波兰称作：梅斯洛維策、格利維策、科茲列。——編者注

甚至在普富尔政府时期，来自維也納的流亡者在柏林也是沒有危險的。但是对于匈牙利，普魯士是沒有这类义务的。匈牙利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普魯士引渡那些仅仅因在匈牙利境内进行的活动而被控的匈牙利流亡者，那这种行为的卑鄙无耻并不亚于把俄国或波兰的流亡者引渡給俄国。

甚至在博德尔施文克的統治下，也沒有人敢把从加里西亚和克拉科夫进入普魯士境内的流亡者引渡給奥地利。那时我們这里还是君主专制政体，而現在，我們是立宪国家！

况且，如果科苏特进入普魯士領土，那他并不是政治流亡者，他是进入中立区的交战一方。

德意志奥地利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联盟，它同另一个独立国家匈牙利进行战争。至于为什么进行战争，这同普魯士无关。甚至在1831年也沒有任何人敢把进入普魯士境内的波兰人引渡給俄国。那时我們这里还是君主专制政体，而現在，我們是立宪国家！

我們請社会輿論注意普魯士政府对科苏特的这种善良意图。我們深信，这足以掀起一个声援这位1848年最偉大的活动家的浪潮，足以造成一个对政府表示憤慨的風暴，这种浪潮和風暴甚至連曼托伊費尔也不敢加以反对。

但是，科苏特还在德布勒森执掌政权，他受到全体匈牙利人民的热烈拥戴，科苏特的勇敢騎兵还馳騁在匈牙利的普什塔草原¹⁷⁷上，文迪施格雷茨还无可奈何地在泥濘的蒂薩河岸上躑躅，因此你們的逮捕令与其說会引起恐惧，倒不如說会引起嘲笑！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1月21日
載于1849年1月28日“新萊茵报”
第20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

一

科倫 1 月 25 日。我們虽然不是經常看到，但是偶尔也能滿意地看到，从革命和反革命这两股洪流冲击以后留下来的积层下面冒出一个旧的三月革命以前美好时期的路标。山岳已移，沟壑已平，丛林已傾，而路标屹立如故，焕发着昔日的光彩，上面依然写着原来的字样：“通往席尔达¹⁷⁸！”

柏林“国民报”¹⁷⁹第 21 号就像这种路标一样，向我們伸出一只木手，上面写道：“致初选人。通往席尔达！”

“国民报”在它的忠告中首先向初选人宣称：

“普魯士人民第二次实现自己辛苦爭得的普选权〈似乎这种在每一村庄都有不同解釋的欽定的所謂普选权同 4 月 18 日爭得的选举法¹⁸⁰是一样的！〉的日子已經到来，从这个普选权中一定会产生一些人，他們将第二次表达不是个别等級和階級的，而是全民的精神〈！〉、意見〈！！〉和意志〈!!!〉。”

我們不来評論这段話的佞屈聱牙、生拼硬湊、夸張而又拙劣的風格。这家报纸說，普选权應該向我們揭示出，所謂不是个别等級和階級的，而是全民的意志究竟是什么。

妙极了！但“全民”是由誰組成的呢？

由“个别等級和階級”組成。

“全民意志”又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由个别的、互相矛盾的“个别等级和阶级的意志”构成，就是说，正好是由那种被“国民报”描写为“全民意志”的直接对立面的意志构成的。

看！“国民报”的逻辑性多么强！

“国民报”认为，存在着一种统一的全民意志。这种意志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各种意志的总和，而是一种统一的、一定的意志。这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多数人的意志。

而多数人的意志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从多数人的利益、生活状况和生存条件中产生的一种意志。

可见，要有同样的意志，这些多数人就要有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生活状况、同样的生存条件，或者他们至少必须在自己的利益上、在自己的生活状况上、在自己的生存条件上，暂时互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说得明白一点，所谓人民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是个别等级和阶级的意志，而是唯一的一个阶级和在社会关系即在工业和商业关系方面都从属于这个唯一的统治阶级的其他阶级以及阶级的某些部分的意志。

“从这里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所谓全民意志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吗？

当然是这样。普选权正是一根磁针，它虽然摆动了几次，但最后总是指向这个负有统治使命的阶级。

而心地善良的“国民报”却像 1847 年那样，还在喋喋不休地谈

論想像中的“全民意志”。

再往下看。“国民报”讲完了这个高明的开场白以后，又提出了一个使我们大为惊讶的意味深长的意见：

“1849年1月的情况，同1848年5月那种充满希望和到处是高昂情绪〈为什么不添上一个祈禱情绪呢？〉的日子比起来是不同了。”

那时的一切都装饰着鲜花，
太阳的光芒也在发笑，
鸟儿唱着热恋的歌，
人们都在希望，在思考。——
他们想：181

“那时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都认为应当立即全部实现那些伟大的改革；如果本着当时的精神，适应着从那时以来已经提高了的文化水平和认识水平，在1807—1814年奠定的基础上继续进一步加以建设的话，这些改革早就在普鲁士实现了。”

“那时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国民报”的天真真是既伟大又可赞！那时近卫军怀着切齿的仇恨撤出柏林，那时普鲁士亲王不得不换上邮差服装从柏林狼狈逃走，那时人民在王宫前面迫使国王向三月革命牺牲者的尸体脱帽致敬，而高等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不得不按住因国王受到这种屈辱而引起的愤怒，——“那时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

的确，抱这样的幻想已经是有些过分了！但是现在，在不得不承认自己受骗之后，竟然还向全世界宣扬这种已经受过骗的轻信。——说实在的，*c'est par trop bonhomme*〔这就太愚蠢了〕！

在哪一点上“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呢？

就是大家一致认为：“应当实现那些伟大的改革，如果……继

續进一步加以建設的話，这些改革早就……实现了。”

在这一点上，大家是——不对，應該說似乎是——一致的。

这就是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三月革命的偉大成果！

而这些“改革”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本着当时的精神，适应着从那时以来已經提高了的文化水平和認識水平，把 1807—1814 年的基础”加以发展。

就是說，一方面本着 1807—1814 年的精神，同时又本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精神。

很简单，所謂“当时的精神”，就是指当时法国人对当时普魯士容克君主国所施加的全然是物质的压力，也就是指当时同样也不如意的普魯士王国的財政赤字。只是为了使資产者和农民能够納稅，只是为了至少在表面上給普魯士王国的臣民实行一些法国人在他們所占領的德国地区大量实行的那种改革，——总而言之，只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实行了一些殘缺不全的所謂城市条例、贖买条例、軍事制度等等。所有这些改革只有一个特点，这就是比法国 1789 年的革命，甚至比英国 1640 年的革命落后了整整一个世紀。难道这一点應該成为曾被革命席卷了全国的普魯士的基础嗎？

旧普魯士一向妄自尊大，总是把自己当做世界历史的中心，事实上，历史总是把这个“理性的国家”在污泥里拖来拖去。旧普魯士的这种妄自尊大自然不会理睬这样一个事实，即普魯士在沒有挨到法国人的悶棍之前，总是安然地坐在 1807—1814 年尙未发展的基础上，連动也不想动一下。它也不会理睬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光荣的、官僚容克的普魯士君主专制王国在去年 2 月受到法国人一个新的有力的刺激，而不得不堂而皇之地从“1807—1814 年的

基础”上滚下去的时候，这些基础早就被遗忘了。它也不会理睬这样一个事实，即对普鲁士君主专制王国说来，问题根本不在于这些基础，而仅仅在于防止法国的刺激造成更大的后果。所有这一切，妄自尊大的普鲁士都不去理睬，而当它突然受到一个刺激的时候，它就会喊叫起来，把腐朽了的 1807—1814 年基础召来，就像孩子呼唤保姆一样！

好像 1848 年的普鲁士，在领土、工业、商业、交通、文化和阶级关系方面，不是和“1807—1814 年基础”上的普鲁士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国家！

好像从那时起不是已经有两个全新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和自由农民进入了普鲁士的历史；好像 1848 年的普鲁士资产阶级不是在所有各方面都同“基础”时代的怯懦的、温和的、怀着感激心情的小资产阶级有所不同！

这一切都无所谓。英武的普鲁士人除了他们的“1807—1814 年基础”以外，不需要知道任何事情。这就是一个能在上面进一步加以建设的基础，——而有了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一个最巨大的历史变革的开始，只不过是一场最渺小的玩弄所谓改革的骗局的终结，——在旧普鲁士，人们对革命的看法就是如此！

在对祖国的历史作一些自以为是的、愚昧无知的幻想这一点上，“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诚然，谢天谢地，只是柏林一个城市是这样！

让我们再往下看。

“那些不得不放弃特权和优越地位的……在将来必须同全体同胞平等相处的等级和阶级，看来准备这样做了，——它们深信，旧制度已经不可能存

在，并深信这是合乎它們自身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

請看这个甜言蜜語、心地善良的資產者是怎样再一次歪曲革命的！貴族、僧侶、官僚、軍官“看来准备”放棄自己的特权，但这并不是懾于武装的人民，也不是因为对欧洲革命一感到畏懼就在自己队伍中不可抑制地发生的愈来愈严重的精神瓦解和組織瓦解使得他們无力反抗，——不是的！和平、善良、互利的2月24日和3月18日¹⁸²的“协定”（用康普豪森先生的話來說），使“他們深信”，这是“合乎他們自身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

三月革命，甚至2月24日的革命，都是合乎容克地主、教会法庭顧問、厅长和近卫軍中尉先生們的真正利益的，——这真是一个大发现！

可惜的是，“現在情况已經变了。从旧制度中得到好处并成为旧制度維護者的那些人，不但沒有像他們的職責〈！〉所要求的那樣亲自去帮助清除旧廢墟，建造新房舍，反而想去加固那些基础已經完全动搖了的破房子，并且想用一些表面上适合于新时代的形式来加以裝飾”。

“現在情况已經变了”，已經不同于似乎是5月的那种情况了，換句話說，現在的情况已經不同于5月所沒有的那种情况了，或者說，現在的情况正好就是5月的情况。

柏林“国民报”就是用这样的文字来写文章的，并且还以此自豪。

总而言之，1848年的5月同1849年的1月只是表面上有所不同。以前反革命分子似乎是意識到了他們的職責，而現在他們是真正沒有意識到，并公开承认这一点，——这使和平的資產者感到悲痛。要知道，反革命分子的職責就是为了自身的、正确理解的利益而放棄自己的利益！他們的職責就是切断自己的血管，但是他

們沒有这样做，——正确理解的利益的維護者抱怨說。

到底为什么你們的敌人現在不去做那些你們认为終究是他們的職責的事情呢？

这是因为你們在春天沒有尽到你們的“職責”，因为当你們强大的时候，你們的行动却像个胆小鬼，你們在那个会使你們壮大并把政权交給你們的革命面前发抖了；因为你們自己絲毫不去触动旧廢墟，而沾沾自喜地对着鏡子欣賞自己不彻底的成就上面的光环！現在，当反革命突然强大起来并且蹂躪你們的时候，当你們脚下的基础完全动搖了的时候，你們却要求反革命做你們的僕人，要他們清扫那些由于你們无力和胆小而沒有清扫的廢墟，——他們是强者，难道他們應該为你們这些弱者牺牲自己嗎？

真是天真幼稚的蠢貨！你們等着吧，不久人民就要起来了，他們会一下子把你們連同你們現在軟弱无力地对之狺狺吠叫的反革命一齐打倒！

二

科倫 1 月 27 日。我們在前一篇文章中沒有考慮到一個似乎總可以為“國民報”稍加辯白的情況：“國民報”不能自由講話，它處在戒嚴的壓迫下。既然是戒嚴，它自然不得不唱出這樣的調子：

讓我沉默吧，別叫我講，
因為秘密已如義務臨降，
我本要向你傾訴衷腸，
只是命運不允許這樣!!! 183

然而，就是在戒嚴時期，辦報也不是為了發表違背自己心意的言論，何況戒嚴同我們前面所談到的那篇文章的前一半毫無關係。

“國民報”的文筆既誇張又晦澀，這怨不得戒嚴。

“國民報”在 3 月以後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天真幻想，這也怨不得戒嚴。

“國民報”把 1848 年革命變成 1807—1814 年改良的尾巴，這也根本不是戒嚴強迫它這樣做的。

總而言之，戒嚴決沒有迫使“國民報”對 1848 年革命和反革命發展的進程產生荒謬的想法，關於這些想法，我們在兩天以前已經向它指出過。戒嚴針對的只是現在，而不是過去。

所以，在我們批評這篇文章的前一半時，我們根本沒有考慮到戒嚴這回事。正因為這樣，我們今天就把戒嚴考慮進去。

“國民報”在講完它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開場白以後，就對初選

人說道：

“問題在于巩固既得的进步，保持已有的成就。”

什么“进步”？什么“成就”？所謂“进步”，是說“如今一切都变了”，已經不同于“似乎”是5月的那种情况了嗎？所謂“成就”，是說“从旧制度中得到好处……的那些人……沒有像他們的职责所要求的那样亲自去帮助清除旧廢墟”嗎？或者是指那些“加固破房子，并且想用一些表面上适合于新时代的形式来加以裝飾”的欽定“成就”嗎？

“国民报”的尊貴的先生們，戒严决不能成为替荒謬和糊塗的言論辯解的理由。

現在非常順利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进步”，只是一种回到旧制度的退步，我們正沿着这条进步的道路愈走愈远。

我們現在仅有的“成就”（这完全不是普魯士所特有的成就，也不是“三月的”成就，而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結果），就是最普遍、最坚决、最殘忍、最凶暴的反革命，但是，这种反革命只是欧洲革命的一个阶段，因此，它的必然后果一定是一个新的、普遍的、胜利的革命回击。

也許“国民报”对这一点知道得和我們一样清楚，只是由于戒严而不敢这样說？讓我們来听一听：

“我們不要繼續革命；我們是一切无政府状态、一切暴力和专橫的敌人；我們要法制、安宁和秩序。”

尊貴的先生們，戒严最多不过是迫使你們沉默，却不会迫使你們說話。所以，对上面引证的这句话我們是这样看的：如果这话是你們說的，那就对了；如果这话是戒严当局說的，那你們何苦去做它的机关报。你們或者是革命者，或者不是。如果你們不是革命

者，那我們就是死敌；如果你們是革命者，那就應該**沉默**。

但是，你們的話說得那么肯定，你們过去的行为又是那么規矩，所以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戒严同这个声明毫无关系。

“我們不要繼續革命。”这就是說：我們要繼續反革命。因为历史事实证明，对于暴力反革命或者根本不能战胜，或者只有用革命来战胜。

“我們不要繼續革命。”这就是說：我們认为革命已經結束，已經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革命在1849年1月21日以前，即在上述文章写好以前所达到的目的，正好就是反革命。

“我們是一切无政府状态、一切暴力和专横的敌人。”

这就是說，也是一切革命后直到新制度巩固以前都必然产生的那种“无政府状态”的敌人，是2月24日和3月18日“暴力行动”的敌人，是无情地摧毁腐朽的制度及其衰弱的法制基础的那种“专横”的敌人！

“我們要法制、安宁和秩序！”

真的，为了拜倒在“法制、安宁和秩序”面前，为了抗議革命并为反对无政府状态、暴力和专横的疯狂叫囂帮腔，真是選擇了一个良好时机！这个时机选得很恰当，因为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在刺刀和大炮的保护下，革命被正式誣蔑为**刑事犯罪**；正好是在这个时候，根据国王签署的詔书毫不掩飾地在实行“无政府状态、暴力和专横”；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宮廷权奸强加于我們的“法律”总是被用来**对付我們**，而不是**保护我們**；正好是在这个时候，所謂“安宁和秩序”就在于使反革命得到“安宁”，以便恢复它自己的旧普魯士的“秩序”。

不对，先生們，通过你們的口說話的并不是戒严当局，而是讲

柏林話的，目光短淺、軟弱無力而又懷有許多善良願望的名副其實的奧迪隆·巴羅。

任何一個革命者都不會這樣輕率、這樣幼稚、這樣膽小，竟在反革命高奏凱歌的時候背棄革命。如果他不能講話，那就行動。如果不能行動，那就寧可一言不發。

也許“國民報”的先生們在實行一種狡猾的政策？也許他們表現得如此溫和，是為了在選舉前夕再把一部分所謂溫和派吸引到反對派方面來？

早在反革命開始向我們猛撲的第一天，我們就說過，從現在起僅僅存在着兩個黨：“革命者”和“反革命者”；僅僅存在着兩個口號：“民主共和國”或“專制君主國”^①。一切處在中間的已經不是黨，而僅僅是派。反革命的一切行動都證明了我們所說的話。選舉就是我們這些話的最光輝的證明。

當這兩個黨的矛盾已經非常尖銳的時候，當鬥爭進行得非常殘酷的時候，當這種鬥爭僅僅由於有組織的丘八們的力量占壓倒優勢而不能用武力解決的時候，任何中介的政策都將終止。在這樣的時刻，只有奧迪隆·巴羅本人才能扮演奧迪隆·巴羅的角色。

但是我們這些柏林的巴羅們卻有自己的保留、自己的條件、自己的解釋。他們是抱怨派[Heuler]¹⁸⁴，但絕對不是單純的抱怨派；他們是帶有保留的抱怨派，是靜悄悄的反對派中的抱怨派：

“但是，我們想要人民覺醒了的自由精神和平等原則所要求的那種新法律；我們想要真正的民主立憲制度（即真正的無稽之談）；我們想要的不是僅僅靠刺刀和戒嚴來維持的安寧，而是另一種安寧，這種安寧是在政治和精神

^① 見本卷第146頁。——編者注

上〈！〉都有充分根据的思想的安静，是由于根据事实和措施确信人民每一阶级都有自己的权利而产生的一种安宁，等等，等等。”

我们不必劳神去抄完这些为适应戒严状态而编造的句子了。要说明问题，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想要”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一小束革命成果，例如，一点儿民主，甚至一点儿宪政，几项新法律，取消一些封建设施，实行资产阶级平等，等等，等等。

换句话说，“国民报”的先生们和以“国民报”为机关报的前柏林左派集团的先生们想要从反革命手中得到的东西，正是构成反革命驱散他们的原因的东西。

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

这些先生们“想要”的东西，全是那些除了进行新的革命以外他们用别的方法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而新的革命他们又不想要。

因为新的革命还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和上述微小的资产阶级要求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这些先生们不喜欢革命是完全理所当然的。

幸而历史的发展很少关心巴罗先生们“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巴黎的真巴罗在2月24日“想要”得到的不过是一些微小的改革，不过是自己取得一个部长职位而已。在他刚刚等到这些的时候，巨浪就把他卷走了。于是，他和他的全体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的信徒，就在革命的浪潮中消失不见了。现在也是这样，现在他终于重新取得了部长职位，他又“想要”各种东西了。然而，他所要的东西，一件也没有实现。自古以来，一切巴罗的命运都是如此。柏林的巴罗们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不論戒严也好，不戒严也好，他們仍將用他們善良的願望來煩擾大家。他們所能做到的，最多不過是在紙上實現自己的某些願望。然後他們不是被國王撤職，就是被人民撤職。總之，他們的差事是丟定了。

卡·馬克思寫於 1849 年 1 月 25—27 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49 年 1 月 26 和 28 日“新萊茵報”
第 205 號和第 207 號增刊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巴黎状况

巴黎 1 月 28 日。人民起义的危险暂时被消除了，因为议院投票反对立即禁止俱乐部活动，即反对禁止一切俱乐部活动。但是新的危险即政变的危险又出现了。

只要读一读今天的“国民报”就会发现，每一行字里都流露出对政变的恐惧。

“今天的投票对内阁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如果奥迪隆·巴罗先生、福适先生以及 tutti quanti [同他们一路的人] 还要死抓住自己的部长职位不放，那就让他们试试看。”

“国民报”的精神似乎还很振作。但是，请听听这段话的末尾吧：

“……不要公开地起来反对宪法的精神和字句！”

奥迪隆·巴罗先生、福适先生以及 tutti quanti 公开地起来反对宪法干什么呢？巴罗和福适从什么时候起对 1848 年宪法感到欢欣鼓舞呢？

“国民报”已经不是威胁部长们，而是说服他们，劝他们辞职，而且还说服总统，要他免他们的职。这样的事竟发生在一个三十年来一直认为经过这种表决后部长们辞职就应是理所当然的国家里，真是不可思议！

“国民报”说，希望共和国总统会明白，议院的多数同内阁是完

全不一致的，只有使內閣辭職，總統才能加強他同多数的联系，阻碍他同多数建立亲密关系的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內閣。

此外，“國民報”還竭力使內閣有可能不失體面地下台：它希望取消對部長們的譴責。議院的表決，已經够他們受的了。除非部長們真的以某種行動破壞了憲法，那時才能採取最後手段。

“國民報”最後感嘆道：是啊，大家都敦促內閣辭職；依我們看來，內閣本身的聲明，也未必能使它繼續執政。巴羅先生今天晚上聲明，如果國民議會投票反對立即執行建議，以後的事件將由國民議會自己負責。真是妙極啦，如果不再負責，那就不應該再執政。既然內閣不願對事件繼續負責，它也就不應該再領導這些事件。巴羅先生推卸了責任，就等於公開提出了辭職申請書。

簡單地說，“國民報”不相信內閣會自動辭職，也不相信總統會免它的職。

但是，如果內閣不想承認國民議會的表決，那它除了實行政變以外別無出路。

依靠軍事力量解散國民議會，準備君主制復辟，——“國民報”對於內閣繼續執政所擔心的也就是這些。

因此，“國民報”和紅色報刊力勸人民千萬不要輕舉妄動，不要為暴力措施造成任何小小的借口，因為每爆發一次叛亂，都只能鞏固正要倒台的內閣，都只对保皇派反革命有利。

政變已經日益迫近，尚加爾涅同別動隊軍官之間的衝突就是證明。《Bouchers de Cavaignac》〔“卡芬雅克的屠夫們”〕沒有表示出絲毫想幫助保皇派實行政變的願望。因此他們必須解散。他們滿腹牢騷，尚加爾涅則威脅他們，說要用軍刀來對付他們，並監禁他們的軍官。

从表面上看，情况是复杂化了，但事实上却非常简单，正像革命前夕常见的那种情况一样简单。

国民议会同总统及其部长们之间的冲突表面化了。法国不能在最近十个月中对它进行管理的那些软弱无能的人的统治下继续存在下去了。赤字，工商业受压抑的状况，使农业破产的苛捐杂税，已经愈来愈无法忍受了。目前更加迫切需要采取重大的、坚决的措施。但是新组成的各届政府一届比一届更加软弱无能，更加没有作为。最后到了奥迪隆·巴罗，他已经无能到了极点，六个星期来简直一事无成。

但是这样一来，他倒使情况变得异常简单了。在他以后再也不可能出现任何一个“正直的”共和国的内阁了。混合政府（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¹⁸⁵），“国民报”的政府，以前的左派政府，——所有这一切都试过了，都用旧了，都被抛弃了。现在轮到梯也尔，而梯也尔则意味着公开的君主制复辟。

不是君主制复辟，就是红色共和国，除此以外别无他路。危机还可以拖几个星期，但终究是要爆发的。尚加尔涅-蒙克^①和他的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整装待命的三十万人，看来也不想久等了。

这就是“国民报”担忧的原因。它已经意识到自己无力把握局势。它知道，只要以暴力更换政府，就会使它的最凶恶的敌人执政。在它看来，君主制也好，红色共和国也好，都只能使它遭到毁灭。因此，它对和平的协议忧虑重重，对部长们却表示殷勤关切。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为了使红色共和国得到最后的胜利，法

① 蒙克（Monk 1608—1670）是英国的将军，在查理二世复辟时，曾起主要作用，所以“蒙克”二字常用来称呼以军官身份为帝制复辟实行政变的人。——译者注

国是不是必須在一个短时期內度过君主制阶段。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可能性不大。

有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这就是“正直的”共和国已經支离破碎,在它以后——当然,也許会插入几支短短的間奏曲——可能出現的只是紅色共和国。

写于 1849 年 1 月 28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1 月 31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 209 号

*巴黎局勢

科倫 1 月 30 日。昨天早上我們在本報號外中宣稱：巴黎正在醞釀着一場暴風雨。第一議院初選人中的一些抱怨派，在我們的傳單下面寫道：“這是撒謊！”“你們吓不倒我們！”以及諸如此類的下流咒罵。

這些可憐的人兒把我們的號外看成了單純的競選手段，好像第一議院和第二議院，甚至整個普魯士的運動就能促使我們捏造歐洲革命的歷史似的！

施圖普——是第一議院的復選人！食利者馮·維特根施坦——是第一議院的復選人！司法官馮·格羅特——是第一議院的復選人！但是，巴黎的革命怪物居然又敢咆哮！Quelle horreur〔多可怕啊〕！

本報今天也談到了巴黎的局勢：

“人民起義的危險暫時被消除了，因為議院投票反對立即禁止俱樂部活動，即反對禁止一切俱樂部活動。但是，新的危險即政變的危險又出現了。”“如果內閣不想承認國民議會的表決，那它除了實行政變以外別無出路。依靠武力解散國民議會，準備君主制復辟，——‘國民報’對於內閣繼續執政所擔心的也就是這些……政變已經日益迫近，尚加爾涅同別動隊軍官之間的衝突就是證明……從表面上看，情況是複雜化了，但事實上却非常簡單，正

像革命前夕常見的那種情況一樣簡單。國民議會同總統及其部長們之間的衝突表面化了…… 不是君主制復辟，就是紅色共和國，除此以外別無他路…… ‘正直的’ 共和國已經支離破碎，在它以後——當然，也許會插入幾支短短的間奏曲——可能出現的只是紅色共和國。”

在我們的號外中，我們曾預言 29 日會發生危機。

下面刊登的巴黎 29 日的通訊向讀者表明，我們的報道是多麼確切，今天我們把法國局勢闡述得多麼準確。

寫於 1849 年 1 月 30 日

載於 1849 年 1 月 31 日“新萊茵報”
第 209 號特別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科倫日报”論选举

科倫 1 月 30 日。“科倫日报”终于也获得了选举总结，这种总结多少给该报的伤口涂上了一点药膏。

“民主派的选举总结，——最可敬的勃律盖曼兴高采烈地嚷道，——民主派的选举总结（即“新莱茵报”的总结）简直夸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现在从四面八方收到了抗议书。”

从四面八方！“科倫日报”想用自己的“抗议”把我们压下去。两页压缩了的关于各地选举结果的综合报道，其中每一条消息都表明“新莱茵报”“令人难以置信的夸大”，每一条消息都证明立宪派的胜利，——这大概会使我们羞愧满面了吧？

不然。

“我们现在从四面八方收到了抗议书。”

最可敬的勃律盖曼没有“夸大”。他真的收到了总计达四份之多的抗议书：来自西方（特利尔）、北方（哈姆）、南方（济克堡）和东方（阿恩斯貝尔格）！难道这不是“从四面八方收到的”反对民主派的夸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选举总结的抗议书”吗？！

暂且让“科倫日报”深信立宪派在这四个决定性的地方获胜而高兴吧。可惜这种兴致已经被伤心的事情破坏了，因为在许多地方立宪派终究由于“群众太容易受引诱”而告失败。

立宪派已经天真地承认他们无力“引诱”“群众”！

不过“科倫日報”总还可以得到一点安慰。什么安慰呢？就是“德意志報”駐科布倫茨的記者是它的患难朋友。这位朋友在現在这种慘状之下找到了不愧登在“科倫日報”头条新聞地位上的恰当的詞句：

“請注意，在这里也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政治問題同社会問題比起来退居到次要地位，它**完全被社会問題吞沒了。**”

几天前，“科倫日報”对社会問題还是不聞不問的。关于这个彼岸的东西，它或者緘默不語，或者用一种极其輕蔑的口吻（极尽“科倫日報”在这方面之能事）去談它。对于社会問題，“科倫日報”以往总是抱着无神論者对待神灵所抱的那种怀疑态度。但突然它遇到了一件像“一千零一夜”中的漁夫所遇到的那种事情：正像在漁夫面前从一个由海底撈出的启封的瓶子中钻出一个巨大的妖怪一样，在发抖的“科倫日報”面前，从选票箱里也突然地、令人畏惧地钻出一个巨大的“社会問題”的幽灵。最可敬的勃律盖曼吓得跪倒尘埃。他最后的希望幻灭了，幽灵一口吞沒了他在漫长岁月中情意纏綿地倍加爱护的整个“社会問題”、法制基础和其他一切。

“科倫日報”的政策真聪明！它企图用它的**社会的失敗**来掩盖它的**政治的失敗**。

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社会方面也被它击败了，——这个发现是“‘科倫日報’在初选后得到的”最偉大的“經驗”！

但是，也許“科倫日報”早就热衷于“社会問題”了吧？

事实上，孟德斯鳩第五十六就曾在“科倫日報”上宣称，社会問題是无限重要的，承认欽定宪法就是解决社会問題的办法^①。

① 見本卷第215頁。——編者注

但是，承認欽定憲法——這首先就是“科倫日報”稱之為“政治問題”的東西。

可見，在選舉以前是政治問題吞沒社會問題，在選舉以後則是社會問題吞沒政治問題。可見，區別就在這裡，初選後所獲得的經驗也就在這裡，就是說，選舉以後認為正確的東西，同選舉以前認為是不可動搖的真理的東西，正好是對立的。

“政治問題被社會問題吞沒了！”

還在選舉以前，我們就尽可能具體地證明，根本沒有這樣一種所謂“社會問題”，因為每一個階級都有自己本身的社會問題，而且同這種社會問題同時存在的，還有這個階級的一定的政治問題^①。關於這些，我們暫且不談。在嚴肅莊重的“科倫女人”^②面前，我們暫且不談這些淺薄的見解，而來盡力研究一下這家信念堅定、思想深刻的報紙的思維過程和闡述手法。

“科倫日報”認為，所謂社會問題，就是如何幫助小資產階級、農民和無產階級的問題。

現在，當小資產階級、農民和無產階級在初選中擺脫了大資產階級、高等貴族和高級官員的影響時，“科倫日報”宣告說：“政治問題被社會問題吞沒了！”

這對“科倫日報”真是一個最好的安慰！就是說，工人、農民和小資產者以顯著的多數票擊敗了大資產階級和其他著名的立憲派的代表，擊敗了“科倫日報”的候選人，這根本不是“立憲派”的失敗，而只不過是“社會問題”的勝利！而立憲派遭到了失敗，這也不是民主派獲得勝利的證明，而只是政治同物質問題相比退到了次

^① 見本卷第 225—231 頁。——編者注

^② 指“科倫日報”。——譯者注

要地位的證明。

我們的鄰居，這位政論家的論據真是深刻充分！這些小資產者已經瀕于死亡，難道他們會因為欽定憲法而歡呼嗎？這些農民不是在抵押貸款和高利貸的重壓下喘不過氣來，就是在封建義務的壓迫下呻吟，而欽定憲法正是為了剝削農民的金融貴族和封建貴族的利益而發明的。難道農民會為自己的剝削者而歡呼嗎？最後，這些無產者既苦於我們的官僚的立法狂，又苦於我們的資產階級的發財迷。難道他們有理由為欽定憲法促使這兩個搜刮民脂民膏的階級進一步勾結起來而歡呼嗎？

難道這三個階級所最關心的不是要消滅不代表這些階級而只代表它們的直接敵人和剝削者的第一議院嗎？

其實，“科倫日報”說得對：社會問題吞沒了政治問題。不久以前才參加政治運動的那些階級，將為了“社會問題”的利益而投票反對自己本身的政治利益，贊成欽定憲法！

小資產者和農民，尤其是無產者，是否能找到一種比民主共和國更好的國家制度形式來保衛自己的利益呢？全社會最激進、最民主的階級不正是這些階級嗎？特別革命的階級不正是無產階級嗎？“反正一樣，社會問題吞沒了政治問題，”——“科倫日報”揚聲說道。

如果相信“科倫日報”，那末社會問題的勝利同時也就是欽定憲法的勝利。

但是，“科倫日報”的“社會問題”還有完全不同的特點。請讀一下“科倫日報”關於第一議院的選舉及其“幸運結局”的總結，所謂“幸運結局”就是約瑟夫·杜蒙先生當了復選人。這樣，“科倫日報”本身的社會問題就解決了，而且同這個事實比起來，在選舉平

民的第二議院時可能出現的一切次要的“社會問題”都將退居次要地位。

但願現在在巴黎威嚴出現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政治問題”的無情風暴，不要摧毀“科倫日報”的脆弱的“社會問題”！

卡·馬克思寫於 1849 年 1 月 30 日

載於 1849 年 2 月 1 日“新萊茵報”
第 210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康普豪森

科倫 2 月 3 日。根据完全可靠的消息，在議院開幕前，勃兰登堡內閣將辭職。在議院開幕時，康普豪森先生將以新首相的身分出席會議。

我們本來就相信，為此正在進行某種準備，因為幾天以前，這個圓滑的國家要人在此地的朋友們曾經放出風聲，說他似乎已經對政治厭倦了：

唉，無謂的奔忙已使我十分倦怠；
為什麼一会儿快樂，一会儿悲哀？
啊，甜蜜的世界，
來吧，請進入我的胸懷。186

因此，據說他想回到安靜的家庭生活中去，把自己的思想限制在波瀾較少的領域——油類投機買賣。

每一個有遠見的人都會明白：康普豪森先生已感覺到重新被請出來拯救王室的必要，並且“為自己的寬大精神所感動”，希望再次以他獨具的優點充當“憲制國王的產婆”。

議院中的資產階級反對派將歡慶這個議會的“勝利”。德國人是健忘的，而且不記前仇。去年還在反對康普豪森先生的那個左派，將以感激的心情歡迎他的就任，把這當做是王室方面的巨大讓步。

为了使人民不致再次受騙，我們簡略地提一下这个“有思想的”国家要人的最杰出的活动。

康普豪森先生复活了在3月18日被埋葬了的**联合議會**，并且就未来宪法的某些基本原则同它达成了協議。

康普豪森先生这样一来也就达成了有关**法制基础**，即有关間接否定革命方面的協議。

康普豪森先生接着又用**間接选举**来为我们造福。

康普豪森先生把普魯士亲王的逃跑变成了增长見識的旅行，并把他从倫敦召回来，于是再一次拋棄了革命，拋棄了革命的一个主要成果。

康普豪森先生組織了市民自卫团，但他一开始就把这个人民的武装变成了一个阶级的武装，并使人民和市民自卫团作为两种敌对的力量互相对立起来。

康普豪森先生同时还容許旧普魯士的官僚和軍隊改組，让它们一天比一天更有能力来准备反革命政变。

康普豪森先生容許用榴霰彈屠杀几乎手无寸铁的波兰农民，这是一件流芳万世的偉績。

康普豪森先生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以便使过度的爱国主义激情得到发泄，并且借以恢复普魯士自卫軍的名声。在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他就用一切力量在法兰克福帮助实行在馬尔摩簽訂的卑鄙的休战协定，因为这是弗兰格尔进军柏林所必需的一步。

康普豪森先生只是在萊茵省取消了旧普魯士的几項反动法律，但是在一切旧的省份都完整地保存了普魯士法的一切警察式的立法制度。

康普豪森先生是第一个阴谋反对德国統一（当时无疑是革命

的統一)的人,首先他召集了他的柏林協商議會,以此同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相對立,接着又千方百計地反對法蘭克福議會的決議和影響。

康普豪森先生要求他的議會把議會的制憲全權限制為“協商的”全權。

康普豪森先生又要求議會稟奏王室,承認對議會的全權所作的這種限制,即議會是一個可以被任意延期或解散的制憲議會。

康普豪森先生接着又要求議會拋棄革命,甚至把這件事當做是否信任內閣的問題提出來。

康普豪森先生向他的議會提出了一個和欽定憲法沒有多大區別的憲法草案,這個草案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公憤。

康普豪森先生常常自夸他是起中介作用的首相,但是,這種中介作用不過是使在王權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共同背叛人民而已。

康普豪森先生最後便辭職了,因為這種背叛已經完全商量妥當,並且已經準備就緒,只等行動內閣及其便衣警察加以實行了。

康普豪森先生後來又任所謂的中央政權大使,並且在以後歷屆內閣中都擔任這個職務。當克羅地亞人、盧西人、瓦拉幾亞人的軍隊在維也納蹂躪德國土地的時候,當他們在德意志的這個最好的城市中大肆燒殺,並且令人發指地用那種連梯利血洗馬格德堡時¹⁸⁷都沒有用過的辦法來蹂躪這個城市的時候,他仍然是大使。他雖然是大使,但是卻袖手旁觀。

康普豪森先生在勃蘭登堡主閣時仍然是大使,因此他參加了普魯士的反革命,並同意在不久前頒布的普魯士通告上署名。而這個通告竟明目張膽地公開要求恢復以前的聯邦議會¹⁸⁸。

康普豪森先生現在終於又要組閣了,這是為了掩護反革命的

退却,同时也是为了給我們长期保证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成果。

上面这些就是康普豪森的丰功偉績的一部分。如果他現在又当了首相,那他一定会急速增大这些丰功偉績一覽表的篇幅。我們也将把这些偉績尽可能准确地記下来。

卡·馬克思写于 1849 年 2 月 3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2 月 4 日“新萊茵报”
第 213 号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報”審判案¹⁸⁹

馬克思的發言

諸位陪審員先生！

今天的審判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因為作為對“新萊茵報”提出控告的根據的 Code pénal [刑法典]第二二二條和第三六七條，是當局能夠用來迫害報刊的萊茵省法律中唯一的兩條，當然，直接號召叛亂是另外一回事。

你們大家都知道，檢察機關迫害“新萊茵報”的癮頭特別大。可是，直到目前為止，雖然檢察機關費盡了心機，但除了說我們違反了第二二二條和第三六七條的規定以外，它還無法控告我們犯了別的什麼罪行。因此，為了報刊的利益，我認為有必要詳細地談談這兩個條文。

在做法律分析以前，請允許我發表一點個人的意見。檢察官稱被指控的文章的下面這個地方是卑鄙無恥的：“茨魏費爾先生不是把執行權和立法權集中於一身了嗎？也許檢察長的榮譽可以用來遮蓋人民代表的過失吧？”諸位先生！有人可以是一個很好的檢察長，同時卻是一個不好的人民代表。也許茨魏費爾先生所以是一個好的檢察長，正是因為他是一個不好的人民代表。檢察機關大概不太了解議會的歷史。在制憲議會的討論中占如此顯著地位

Zwei
politische Prozesse.

Verhandelt vor den Februar-Rifsen in Köln.

I.

Der erste Preßprozeß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II.

Prozeß des Kreis-Ausschusses der
rheinischen Demokraten.

Köln, 1849.

Verlag der Expedition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載有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科倫受审时
发言全文的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的扉頁

的关于不能兼职的問題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对执行机关的代表的
不信任，是怀疑执行机关的代表会为了現存政府的利益而輕易牺
牲社会的利益，因此，他最不适合于当人民的代表。具体地說，檢
察官的情况怎样呢？哪一个国家不承认这个职位同人民代表的崇
高称号是不相容的呢？請你們回忆一下在法国和比利时报刊上，
在法国和比利时議會中对阿貝尔、普路古尔姆、巴魏的抨击——这
种抨击就是要反对总檢察官和議員由一人兼任这种极其矛盾的現
象。这种抨击从来沒有受到法律制裁，甚至在基佐內閣时期也是
这样，而路易-菲力浦的法国和列奥波特的比利时被认为是典范的
立宪国家。不錯，在英国对 attorney-general〔檢察长〕和 solicitor-
general〔副檢察长〕是另外一种情况。但他們的地位和 procureur
du roi〔最高陪審員〕的地位有本质的区别。他們或多或少地已經
是法官了。諸位先生，我們不是立宪主义者，我們站在我們的原告
先生們的观点上，是为了从他們自己的立場出发，用他們自己的武
器来打击他們。因此我們才引证立宪慣例。

檢察官想用关于道德的陈辞濫調把議會历史的整整一个时期
一笔勾銷。我坚决駁斥他非难我們卑鄙无耻的說法，我认为这种
非难是出于他的无知。

現在我开始对案件做法律方面的分析。

我的辯护人^①已經向你們证明，如果不是根据 1819 年 7 月 5
日的普魯士法律，控告我們侮辱了檢察长茨魏費尔就根本站不住
脚。Code pénal 第二二二条只談到关于 «outrages par paroles»,
口头的侮辱，沒有談到书面的或报刊的侮辱。1819 年的普魯士法

① 施奈德尔第二。——編者注

律只是为了补充，而不是要取消第二二二条。只有当 Code 規定要对这类口头侮辱的行为加以惩罚时，普魯士法律才能把第二二二条的規定扩大到对书面的侮辱也要加以惩罚。只有在第二二二条关于口头侮辱所規定的情况和条件下才能談得上书面的侮辱。因此，有必要弄清楚第二二二条的确切含义^①。

我們来看看对第二二二条所做的解釋 (Exposé par M. le conseiller d'état Berlier, séance du février 1810 [国务委员会委員貝利耶先生在 1810 年 2 月的會議上所作的說明])：

«Il ne sera donc ici question que des *seuls outrages* qui compromettent la *paix publique*, c-à-d. de ceux dirigés contre les fonctionnaires ou agents publics dans l'exercice ou à l'occasion de l'exercice de leurs fonctions; dans ce cas ce n'est plus un particulier, c'est l'ordre public qui est blessé... La hiérarchie politique sera dans ce cas prise en considération: celui qui se permet *des outrages ou violences* envers un officier ministériel est coupable sans doute, mais il commet un moindre *scandale* que lorsqu'il outrage un magistrat».

这段話翻譯过来就是：

“总之，这里所指的只是破坏**社会秩序**、**社会安宁**这样一些侮辱行为，即当官員或負責人員在执行职务时或者由于执行职务而受到的侮辱，在这种情

① 第二二二条宣称：«Lorsqu'un ou plusieurs magistrats de l'ordre administratif ou judiciaire auront reçu, dans l'exercice de leurs fonctions ou à l'occasion de cet exercice, quelque outrage par paroles tendant à inculper leur honneur ou leur délicatesse, celui qui les aura ainsi outragés sera puni d'un emprisonnement d'un mois à deux ans». (“如果行政机关或司法部門的一个或几个負責人員在执行职务时或由于执行职务而遭到某种口头侮辱，使他們的名誉或尊严受到損害，侮辱他們的人应判处一个月到两年的徒刑。”) (着重号是馬克思加的。——編者注)

況下，受到損害的已經不是個人，而是社會秩序…… 在這種情況下就要考慮到政治等級制度了：誰敢侮辱負責人員或對他們施加暴力，那末毫無疑問，他就是犯了罪，但是他引起的亂子比起侮辱法官來要輕一些。”^①

諸位先生，從這段解釋中你們可以看出，立法者制定第二二二條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只有”當侮辱官員的行為破壞了社會秩序、社會安寧的時候，才能適用這一條。但什麼時候社會秩序、*la paix publique* [社會安寧] 才會遭到破壞呢？僅僅是在發生下面情況的時候：有人企圖發動暴亂推翻法律，或者阻撓現行法律的實施，即反抗執行法律的官員，妨礙官員，使他無法執行職務。反抗可能只是發發牢騷，說些侮辱人的話，但是也可能達到採取暴力行動，進行暴力反抗的程度。Outrage，侮辱——這只是情節最輕的 *violence*，不服從、暴力反抗。因此，在解釋中就談到了 «*outrages ou violences*»，“侮辱或暴力行為”。按意思，這兩個詞是相同的；但是 *violence*，暴力行為只是對執行職務的官員進行的情節較重的 *outrage*，侮辱的一種形式。

就是說，這個解釋指出，必須是：（1）在官員執行職務時受到的侮辱，（2）當面對他進行的侮辱。在其他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說是實際上破壞了社會秩序。

在有關 «*outrages et violences envers les dépositaires de l'autorité et de la force publique*»，即有關“對享有國家威信和被授予國家權力的人所進行的侮辱和暴力行為”的整整一章中，你們都可以看到這個規定。這一章的各條款規定了不服從行為的輕重的順序：面部表情，言語，威脅，暴力行為；後者按其嚴重程度不同

^① 着重號是馬克思加的。——編者注

又有所區別。最后，各条款还規定，如果这些不同形式的不服从行为发生在法庭上，得加重处分。在法庭上引起的“乱子”被认为是最大的乱子，是以最不能容忍的方式破坏了对法律的遵守、paix publique〔社会安宁〕。

因此，只有(1)当着官員的面，(2)在官員执行职务的时候对他进行了**书面的**侮辱，第二二二条才能适用。諸位先生，我的辯护人已經向你們举出了类似的例子。例如，如果他現在在陪审法庭的审判会上用书面形式侮辱了审判长等等，那他本人就要受到第二二二条的惩处。但是，对于在官員执行职务以后經過了很長時間，而且又不是当着他的面对他“进行了侮辱”的一篇報紙上的文章，Code pénal〔刑法典〕中的这个条款無論如何是不适用的。

对第二二二条所做的这种說明，能够向你們把 Code pénal 中似乎存在的漏洞，似乎存在的不彻底的地方解釋清楚。为什么我可以侮辱国王，却不能侮辱檢察长呢？为什么 Code 和普魯士法不同，不对侮辱陛下的行为規定处罚呢？

因为国王从不亲自执行官員的职务，而总是交給別人去执行，因为国王从不直接和我打交道，而只是通过他的代表。从法国革命中产生的 Code pénal 的专制制度，同普魯士法的那种宗法式的拘泥迂腐的专制制度有天壤之別。只要我真的妨碍了国家权力，哪怕只是侮辱了执行自己职务，对我实现国家权力的官員，拿破侖的专制制度也会立即置我于死地。但是，官員在不执行这种职务的时候，他就成了市民社会的普通一員，沒有任何特权，沒有任何特别的防禦手段。而普魯士的专制制度却用官員来同我对抗，把官員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似乎官員的品质是和这种专制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就像天惠是和天主教的神甫結

合在一起一样。普魯士官員对普魯士俗人，即非官員來說，始終是神职人員。对这种神职人員的侮辱，即使不是在他执行职务的时候，不是当着他的面，而是当他已經回到私生活中的时候，这仍然是对宗教的玷污，是一种褻瀆行为。官职越高，对宗教的玷污罪行就越重。因此，侮辱国王，侮辱陛下是对国家神职人員的最大侮辱，根据 Code pénal，从刑法观点看来，这是决不許可的事情。

但是有人会说，既然 Code pénal 第二二二条所說的仅仅是 «dans l'exercice de leurs fonctions» 对官員的 outrages，即在官員执行职务时对官員的侮辱，那就用不着证明，立法者这里所指的是要官員**亲自在場**。这是按第二二二条治罪的任何一种侮辱行为所必需的条件。可是，第二二二条对 «dans l'exercice de leurs fonctions» 还作了如下的补充說明：«à l'occasion de cet exercice»。

檢察长把这句話解釋成：“在他們的职务方面。”諸位先生，我要向你們指出，这样翻譯是錯誤的，而且是同立法者的意思直接矛盾的。請你們看看同一章的第二二八条。那里写道：凡犯有 «dans l'exercice de ses fonctions ou à l'occasion de cet exercice» **毆打官員罪者**，一律判处两年至五年的徒刑。可以把这句話翻譯成“在他的职务方面”嗎？难道能够給以**某方面的**毆打嗎？难道这里不需要有官員亲自在場这样一个前提嗎？我能毆打一个不在場的人嗎？显然，这句話應該翻譯成：“凡犯有**由于**官員执行他的职务而**毆打官員罪者**”。但是，在第二二八条中一字不差地重复了第二二二条的句子。显然，«à l'occasion de cet exercice» 这两条的意义是相同的。因此，这些补充不但不排除把官員**亲自在場**作为条件，相反地，是以官員亲自在場为前提的。

法国立法的历史在这方面还向你們提供了另一个有力的证

明。你們都記得，在波旁王朝復辟初期，法國各黨派在議會中，在法庭上彼此之間發生過劇烈的衝突，在法國南部甚至動起了刀子。當時的陪審法庭無非是勝利了的黨派對付失敗了的黨派的戰地法庭罷了。反對派的報刊無情地斥責陪審法庭的判決。第二二二條沒有提供任何武器來反對這種不受欢迎的論戰，因為第二二二條只適用於在法庭上當面侮辱陪審員這樣的事件。因此，1819年制定了一條新法律，懲治一切攻擊 chose jugée，已經宣布了的判決的行為。Code pénal〔刑法典〕沒有規定法庭的判決具有這種不可侵犯性。如果第二二二條談到了執行職務“方面”的侮辱，難道能夠用新法律來補充嗎？

但是，«à l'occasion de cet exercice» 這個補充說明是什麼意思呢？這個補充說明的目的是為了使官員在執行職務的**前後**不久不受到攻擊。如果第二二二條只談到在官員執行職務的當時對官員的“侮辱或暴力行為”，那末，比方說，我可以在法院執行官查封財產以後把他從樓梯上推下樓去，然後就說，我只是在他對我執行完了法院執行官的職務以後才侮辱了他的。再比方說，我可以半路襲擊騎馬到我家來執行法警職務的治安法官，把他痛打一頓，逃避根據第二二八條應給予我的懲罰，借口說我打他不是在他執行職務的時候，而是在他執行職務之前。

因此，加上«à l'occasion de cet exercice》，**由於**執行職務這樣一個補充說明，是為了保證執行職務的官員的安全。它所指的侮辱和暴力行為，雖然不是直接發生在執行職務的當時，但必須是在這**前後**不久，而且——這點很重要——這些行為要和執行職務有**密切**的關係，即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有被侮辱的官員**親自**在場。

即使我們在文章中侮辱了茨魏費爾先生，第二二二條也不適

用于我們的文章，這是否還需要進一步地加以證明呢？當被指控的文章寫成的時候，茨魏費爾先生**並不在場**；那時他不是住在科倫，而是住在柏林。在這篇文章寫出來的時候，茨魏費爾先生執行的不是檢察長的職務，而是協商派¹⁹⁰的職務。因此，他不可能作為正在執行職務的檢察長而受到侮辱和詈罵。

除了我上面的全部論述以外，還可以用別的办法來證明，第二二二條不適用於“新萊茵報”上那篇被指控的文章。

這就是 Code pénal [刑法典] 中關於**侮辱和誹謗**的區別。你們可以在第三七五條中找到這種區別的精確解釋。在“誹謗”這一條的後面是這樣說的：

«Quant aux injures ou aux expressions outrageantes qui ne renfermeraient l'imputation d'aucun fait précis» (在關於“誹謗”的第三六七條中是這樣說的：«des faits qui, s'ils existaient», 事實，如果它們是真正的事實)，«mais celle d'un vice déterminé... la peine sera une amende de seize à cinq cent francs». “對於帶有譴責某種缺陷，而不是譴責某種行為的詈罵和侮辱性言詞……罰款十六到五百法郎。”

在第三七六條中我們還讀到：

“所有其他的詈罵和侮辱性言詞……都應受一般的行政處分。”

那末，誹謗指的是什麼呢？指的是把**某些事實**歸罪於某人的詈罵。侮辱指的是什麼呢？指的是譴責某種缺陷和一般的侮辱性言詞。如果我說：“你偷了一個銀匙子”，那末照 Code pénal 的理解，我就是對你進行了誹謗。如果我說：“你是一個小偷，你有偷竊的習慣”，那我就**侮辱**了你。

可是，“新萊茵報”上的文章根本沒有對茨魏費爾先生進行這樣的譴責，說茨魏費爾先生是人民的叛徒，說茨魏費爾先生發表了

卑鄙的声明。这篇文章說得很具体：“据說，似乎茨魏費尔先生还声明說，他将要在一星期內在萊茵河畔的科倫城里取消3月19日革命的成果，取消俱乐部，取消出版自由，取消倒霉的1848年的其他一切产物。”

由此可見，在这里归咎于茨魏費尔先生的的是一个十分肯定的声明。所以，如果說在这里必須在第二二二条和第三六七条之中選擇一条来运用，那末自然應該選擇关于誹謗的第三六七条，而不是关于侮辱的第二二二条。

为什么檢察机关不把第三六七条而把第二二二条用到我們身上呢？

因为第二二二条最不明确，它使人們有更大的可能用欺騙手段达到譴責所想要譴責人的目的。侵犯«délicatesse et honneur»，侵犯尊严和名誉是极不明确的概念。什么是名誉？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侵犯尊严和名誉？这完全要以我所接触的那个人为轉移，以他的文化程度、个人偏見和自負心理为轉移。在这里，除了 *noli me tangere* [含羞草]，除了妄自尊大的自以为不可侵犯的官員的虛榮心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标准。

但是，即使是关于誹謗的一条，即第三六七条也不适用于“新萊茵報”上那篇文章。

第三六七条要求«fait précis»，肯定的事实，要求«un fait qui peut exister»，真正能成为事实的事实。但是要知道，我們並沒有譴責茨魏費尔先生，說他取消了出版自由，封閉了俱乐部，在某个地方取消了三月的成就，而只是把一个普通的声明归咎于他。而第三六七条是指責某人有如下行为：如果这种行为确已发生，就会引起刑事警察或違警警察对此人的追究，或者至少引起公民对他

的鄙視或憎恨。

但是，仅仅一个想这样做或那样做的**声明**并不能成为刑事警察或違警警察对我进行迫害的借口。甚至不能說这个声明一定会引起公民对我的憎恨和鄙視。自然，口头声明可能是很卑賤的、值得鄙視和憎恨的思想的反映。但是，在感情冲动的情况下，难道我不能作出以我根本无力采取的行动相威胁的声明嗎？只有行为才能证明这种声明的**严重程度**。

此外，“新萊茵报”写的是：“**据說**，似乎茨魏費尔先生声明說……”。为了誹謗某人，我自己絕不会把自己的論断置于怀疑之下，絕不会像在这里一样用“**据說**”这样的詞；我一定会說得很肯定。

最后，諸位陪審員先生，根据第三六七条，构成**誹謗罪**的对某种行为的指責会引起«citoyens»公民对我的憎恨和鄙視，其实这些«citoyens»，这些公民在政治事务中一般都不再存在了。在这些事务中存在的只有政党的信徒。在这个党的成員中使我遭到憎恨和鄙視的东西，在那个党的成員中却会受到热爱和尊敬。本屆內閣的机关报“**新普魯士报**”譴責茨魏費尔先生，說他像**罗伯斯庇尔**^①。在这家报纸看来，在它的党看来，我們的文章沒有使茨魏費尔先生遭到憎恨和鄙視，相反，却为他解除了压在他身上的憎恨，压在他身上的鄙視。

應該特別注意这一点，不仅在今天这个場合要这样，而且在一切場合，只要檢察机关企图把第三六七条运用到政治性的論战上，都應該注意这一点。

① 見本卷第 28 頁。——編者注

諸位陪審員先生，一般說來，如果你們要像檢察機關所解釋的那樣，把關於誹謗的第三六七條運用于報刊，那末你們借助刑事立法就可以把你們在憲法中所承認的和通過革命才取得的出版自由取消。這樣你們就是批准官員們的恣意專橫，給官方的一切卑劣行為大開方便之門，專門懲罰對這種卑劣行為的揭露。既然如此，何必還要虛偽地承認出版自由呢？如果現行法律和社会发展剛剛達到的階段發生顯著的矛盾，那末，諸位陪審員先生，你們的職責恰恰就是要在過時的律令和社会的迫切要求的斗争中講出自己分量的話。那時你們的任務就是要超過法律，直到它認識到必須滿足社會的要求為止。這是陪審法庭的最高尚的特權。諸位先生，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文字本身就便于你們執行這個任務。你們只是應當根據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政治權利、我們的社會要求來解釋它。

第三六七條結尾說道：

«La présente disposition n'est point applicable aux faits dont la loi autorise la publicité, ni à ceux que l'auteur de l'imputation était, *par la nature de ses fonctions ou de ses devoirs, obligé de révéler ou de réprimer*». “本規定不適用於法律允許公佈的行為，也不適用於控訴人由於其職務或職責必須加以揭露或阻止的行為。”^①

諸位先生，毫無疑問，當立法者談到揭露的職責時，他指的不是自由報刊。但是，他同樣也很少想到，這一條有一天會被運用于自由報刊。大家知道，在拿破侖統治下是沒有任何出版自由的。因此，如果你們想把這條法律運用于完全不是為此而制定的這種政

① 着重號是馬克思加的。——編者注

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阶段，那你们就把它**全部**运用起来，按照现代的精神来解释它，使第三六七条的最后一句也施惠于报刊。

如果按照检察机关对第三六七条所作的那种狭隘的解释，那末这一条就排斥了对真理的证明，只允许根据官方文件或者已经做出的法庭判决来进行揭露。如果是这样，那何必还要报刊 *post festum* [放马后炮]，在已经宣判之后来揭露呢？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如果你们这样来解释第三六七条——其实，如果你们不想为了政府当局的利益取消出版自由，你们就应当这样来解释它，——那末 *Code* [法典] 同时也给你们提供了反对报刊滥用职权的武器。根据第三七二条，如果某人进行揭露，那末对他的司法上的追究和关于是否诽谤问题的判决必须延期进行，直到对所揭露的事实调查清楚为止。根据第三七三条，属于诽谤性的揭露要受到惩罚。

诸位先生！只要粗略地看一看被指控的那篇文章，就可以确信，“新萊茵报”抨击地方检查机关和宪兵，毫无侮辱或诽谤之意，它只是在履行它的揭露职责。对证人的讯问已经向你们证明，我们关于宪法所报道的完全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但是，“新萊茵报”上的那篇文章的全部实质在于，它预言了随后到来的反革命，抨击了汉澤曼内阁。这个内阁在上台时曾经发表了一个奇怪的声明，说什么警察愈多，国家就愈自由。这个内阁曾经以为贵族已被战胜，现在它只有一个任务，这就是为了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剥夺人民的革命成果。因此它就为封建反革命准备了基础。在那篇被指控的文章中，我们只不过是揭露了汉澤曼内阁和德国各邦政府的系统反革命活动在我们周围的一

种明显表现。

不能把在科倫的逮捕看作是孤立的現象。只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当时所发生的事件，就足以证明这不是孤立的現象。在这次事件发生以前不久，就开始了柏林报刊的迫害，为此并使用了旧普魯士法的条款。过了几天，即7月8日，杜塞尔多夫人民俱乐部的主席尤·符尔夫被捕，这个俱乐部委员会的許多委員的住宅受到搜查。后来陪審員宣告符尔夫无罪，其实当时任何一个政治性的控訴都沒有得到陪審法庭的批准。同一天，即7月8日，在慕尼黑禁止軍官、官員和編制以外的官員参加人民集会。7月9日，布勒斯劳“德意志”协会主席法肯海恩被捕。7月15日，檢察长施納澤在杜塞尔多夫市民联合会发表演說，正式向人民俱乐部起訴，根据他的要求，人民俱乐部主席在9日被捕。你們看，这就是檢察机关公正无私的例证，这就是檢察长同时以某个党派的信徒的身分出現，而一个党派的信徒又同时以檢察长的身分出現的例证。尽管我們由于抨击茨魏費尔而开始受到法律追究，我們仍然揭穿了施納澤的阴谋詭計¹⁹¹。固然，他很小心，沒有进行答辯。同一天，当檢察长施納澤慷慨激昂地发表反对杜塞尔多夫人民俱乐部的演說时，国王下令解散了民主主义者斯图加特区域联合会。7月19日，海得尔堡的民主大学生联盟被解散。7月27日，在巴登的所有民主团体被解散以后不久，維尔騰堡和巴伐利亚的所有民主团体也被解散。难道我們應該对德国各邦政府这种公然反对人民的叛变阴谋保持緘默嗎？巴登政府、維尔騰堡政府和巴伐利亚政府敢于做的，当时普魯士政府还不敢做。它所以不敢，是因为普魯士的国民議会开始觉察到反革命的阴谋，并且坚决反对汉澤曼內閣。但是，諸位陪審員先生，坦率地說，如果普魯士的人民革命不立刻粉

碎普魯士的反革命，那末在普魯士也將完全取消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我深信我的話是正確的。由於實行戒嚴，這種自由現在就已被部分地取消了。在杜塞尔多夫和西里西亞的某些地區，有人竟敢恢復了書報檢查制度。

但是，不僅德國的一般情況和普魯士的一般情況使我們有責任抱着極端不信任的態度去注視政府的每一個行動，去公開揭露政府所採用的制度的任何一個微小的症狀。科倫的地方檢察機關也給我們提供了特殊的理由，使我們把這個檢察機關作為反革命的工具在輿論面前揭露出來。在7月一個月里，我們就不得不揭露了三次非法逮捕事件。前兩次國家檢察官黑克爾保持了沉默。第三次他企圖為自己辯解，但是在我們進行了回擊以後，他便啞口無言了。理由很簡單：他沒有什麼可說的。¹⁹²

在上述情況下，檢察機關敢於斷言我們在這樣的場合不是在进行揭露而是在进行吹毛求疵的惡意誹謗嗎？這樣的觀點是以某種奇怪的誤解為基礎的。至於我本人，諸位先生，我可以向你們保證，我寧肯去研究重大的世界歷史事件，寧肯去分析歷史的進程，也不願意同當地的要人、憲兵和檢察機關打交道。儘管這些先生們以為自己很偉大，但在現代的巨大鬥爭中他們却算不了什麼，根本算不了什麼。如果我們決定同這樣的敵手交鋒，我認為，從我們這方面來說，這是一個真正的犧牲。但是首先，報刊的義務正是在於為它周圍左近的被壓迫者辯護。此外，諸位先生，直接同個人、同活的個體及其個人生活發生接觸的下級政權機關和社會權力機關是奴隸制度這一建築的主要支柱。所以，只是一般地同現存關係、同最高權力機關作鬥爭是不夠的。報刊必須反對某一具體的憲兵、某一具體的檢察官、某一具體的行政長官。為什麼三月革命

会失败呢？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听众发出叫好声。）

恩格斯的发言

諸位陪審員先生！前面的发言人所談的主要是对侮辱檢察長茨魏費爾先生一事提出的控告；現在請允許我提請你們注意对誹謗憲兵一事提出的控告。首先談談提出控告时所依据的那些法律條款。

刑法典第三六七條規定：

“凡在公共場所或公共集會上，或在真實的和正式的文件中，或在已刊印的或未刊印的文章中（只要這些文章已經張貼、出售或分發），指責某人有如下列行為者則犯有誹謗罪：如果這種行為確已發生，就會引起刑事警察或違警警察對此人的追究，或至少引起公民對他的鄙視或憎恨。”^①

第三七〇條對此作了如下補充：

“如果指責所根據的事實按照法定手續查明屬實，則提出這種指責的人不受任何懲罰。——只有以法庭判決或其他真實文件為根據的證據，才算是合法證據。”^②

諸位先生！檢察機關已就這些法律條文向你們作了自己的解釋，並要求據此宣判我們有罪。有人已經向你們指出，這些法律是在這樣的時期製定的：當時檢查機關嚴密控制着出版界，政治情況與現在截然不同。因此，我的辯護人^③表明了這樣的看法：你們不應該認為自己是受這些陳舊的法律約束的。檢察機關的代表同意

^① ^② 着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③ 施奈德爾第二。——編者注

這種看法，至少對於第三七〇條是這樣。他這樣表示：“陪審員先生，對於你們來說，最主要的當然是確定所審查的事實的真實性是否已經得到證明。”——我要感謝檢察官的這種承認。

如果你們不持有這種看法，即第三七〇條至少由於它對實據的限制而已經過時，那末毫無疑問，你們一定會同意這樣的看法：上述兩條應該另做別的解釋，而不是像檢察機關解釋的那樣。陪審法庭的特權是：陪審員可以不依賴傳統的審判實踐解釋法律，而按照他們的健全理智和良心的啟示去解釋法律。根據第三六七條對我們提出控訴，是因為我們指責這些憲兵有下面這種行為：如果這種行為確已發生，就會引起公民對他們的鄙視和憎恨。如果你們按照檢察機關的意旨解釋“憎恨和鄙視”這兩個詞，那末，只要第三七〇條還有效，出版自由就會完全被取消。在這種情況下，報刊怎麼能履行自己的首要職責——保護公民不受官員逞凶肆虐之害呢？只要報刊向輿論揭露這種逞凶肆虐的行為，就要受到法庭的追究，而且如果按照檢察機關的願望辦事，還要被判處徒刑、罰款和剝奪公民權；只有下述情況例外，即報刊可以公布法庭判決，就是說，只有當揭露已經失去任何意義的時候，才能進行揭露。

和第三六九條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上述法律條款（至少是根據檢察機關的解釋）是多麼不適合於我們今天的情況。第三六九條規定：

“至於通過外國報紙而成為舉世周知的誹謗，凡將這些文章寄往報社者……或協助這些報紙運入國內和在國內散發者，均應交付法庭審判。”^①

諸位先生！根據這一條法律，檢察機關就必須每日每時把普

① 着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魯士王國的郵政官員交付法庭審判。難道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有哪一天普魯士郵局不在由於遞送某種外國報紙而協助“運入和散發”檢察機關所認為的那種誹謗嗎？但是，檢察機關並沒有想到對郵局提出控訴。

其次，諸位先生，請你們注意，這些條款是在這樣的時候制定的：當時由於實行書報檢查制度，在報刊上不可能對官員進行誹謗。因此，按照立法者的意思，這些條款應該是防止對私人而不是對官員的誹謗，這些條款也只有在那種情況下才有意義。但是，自從獲得出版自由時起，官員的行為同樣可能成為舉世周知的事情；這就根本改變了整個情況。正是現在，當舊的法律和新的社會政治情況之間存在着這種矛盾的時候，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陪審員應該挺身而出，對舊的法律作新的解釋，使它適合於新的情況。

但是，正如我已經說過的，檢察機關自己承認，對你們來說，諸位先生，最重要的是——不管第三七〇條怎樣規定——實據問題。因此，他們也就企圖削弱我們所援引的以證人的供詞為基礎的實據。我們看一看“新萊茵報”上那篇被指控的文章，就可以確信，事實是否證實了該文所提出的指責，這些指責是否真的含有誹謗的成分。文章開頭是這樣寫的：

“早晨六七點鐘的時候，有六七个宪兵来到了安內克的住宅，他們一進門就馬上粗野地把女僕推開”，等等。

諸位先生，你們已聽到安內克關於這一問題的供詞。你們還記得吧，我曾想專門就粗野地對待女僕的問題再向見證人安內克提出一個問題，但審判長認為這個問題是多餘的，因為這一事實完全能夠成立。我現在要問你們：我們在這一點上誹謗了憲兵嗎？

再往下看：“在前室里，他們不但催逼，而且動起手來。有一個

憲兵把一扇玻璃門打得粉碎，他們把安內克推下樓去。”諸位先生，你們已經聽到見證人安內克的供詞；你們會記得見證人埃塞爾的敘述吧，他談到了憲兵是怎樣把安內克從屋中“匆匆”帶出並推進馬車的。諸位先生，我要再問一次：這裡有什麼誹謗呢？

最後，在文章中有一處未經逐字證實。這就是下面的一段：“這四個法庭的得力骨干中，有一個一早起來就喝了不少‘精神’^①、甘露和燒酒，走起路來已經有點搖搖晃晃。”

諸位先生，我同意一點，就是根據安內克的話的正確意思，能成立的只是：“根據憲兵的行為斷定，完全可以認為他們是醉漢。”也就是說，能成立的只是憲兵的**舉動**像醉漢。但是，諸位先生，請你們注意我們在兩天以後對國家檢察官黑克爾的反駁的答復：“要說侮辱，也許只侮辱了一位憲兵先生；報道中說這位先生一早起來就喝得幾分醉意，有點**搖搖晃晃**。但是，如果審訊證實——我們毫不懷疑這一點——當局的代表先生們確曾對被捕者態度粗野，那末，在我們看來，我們當時只是以極其關懷的心情和報刊應有的公正態度，並且也是為了我們所責難的先生們自己的利益，指出了**唯一可以減輕過失的情節**。可是，現在檢察官卻把這種為博愛精神所驅使而指出唯一可以減輕過失的情節的做法說成是侮辱！”¹⁹³

諸位先生，從這裡你們可以看出，我們是堅決主張對上述事實進行偵查的。如果沒有進行偵查，這不是我們的過失。至於談到對酗酒的責備，那末，請問，如果有人說一個普魯士王國的憲兵喝酒有些過度，這對他來說，有什麼了不起呢？這能不能叫做誹謗？關於這一點，我願意向全萊茵省的輿論界請教。

^① 雙關語：《Geist》意指“精神”，同時也指“烈性酒”。——編者注

這些所謂的被誹謗者甚至沒有被指出名字，沒有被确切指明是誰，檢察機關怎么能說這是誹謗呢？這裡指的是“六七个宪兵”。他們是誰？他們在什麼地方？諸位先生！你們是否知道，**确实**有某个宪兵由于这篇文章而受到了“公民的憎恨和鄙視”呢？法律明确地要求确切指明被誹謗者是誰；但是，在被指控的文章的那一段話中，任何一个宪兵都不可能看出对自己的侮辱，頂多是整个普魯士王国宪兵队可以认为自己受了侮辱。它能够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是因为报上写着：这一团体的成員采取非法行动和粗野态度，却逍遙法外。但是，諸位先生，不能认为对普魯士王国宪兵态度粗野的一般指責是犯罪。我要求檢察機關給我指出，法律中有哪一条規定了对普魯士王国宪兵队的侮辱、詈罵、誹謗（如果这里一般談得上誹謗的話）是有罪的。

檢察機關认为，被指控的文章只是不可遏止的誹謗狂的一个证明。諸位先生，这篇文章你們已經讀过了。你們是否在这篇文章中發現，我們把当时科倫所发生的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違法行为看成是孤立現象，我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这些事件，为了发泄我們对下級官員的所謂仇恨而大加渲染呢？相反地，我們不是指出，这些事实是那时反动派在整个德国同时进行的突襲长鏈上的一个环节嗎？难道我們仅限于攻击科倫的宪兵和檢察機關而沒有力求揭露事情的本质，分析事情的根源，想到柏林的秘密內閣¹⁹⁴嗎？当然，攻击柏林的大秘密內閣，并不像攻击科倫的小檢察機關那样危險，今天我們出庭受审，就是这一事实的证明。

請你們看一看文章的結尾。那里写道：“总之，行动內閣所采取的行動，中間派左翼內閣所采取的行動就是如此，它是一个向旧貴族、旧官僚、旧普魯士的內閣过渡的內閣。只要汉澤曼先生一

扮演完過渡的角色，他就會被解職。”

諸位先生，也許你們還記得去年8月間所發生的事件吧，還記得漢澤曼先生怎樣成為多余的人而被“解職”（不錯，是在體面的自願退職的形式下），普富爾—艾希曼—基斯克尔—拉登堡的內閣，道道地地的“舊貴族、舊官僚、舊普魯士的內閣”，是怎樣替換了他的吧。

再往下看：“柏林的左派應該懂得，只要舊政權能占據一切真正有決定意義的障地，它是能夠放心地讓左派在議會里獲得小小的勝利和擬定大大的憲法草案的。只要在議會外解除了3月19日革命的武裝，它是會在議會里大膽地承認這一革命的。”

這一見解是多麼正確，當然用不着我來證明。你們自己也知道，當左派的威力在議會內增長起來的時候，人民黨的威力却在同等程度上在議會外被消滅了。為了向你們表明革命確實被解除了武裝，舊政權確實占據了一切有決定意義的障地，我是否還需要向你們列舉一些事實呢？這些事實如下：普魯士丘八在無數城市的獸行至今未受到懲辦，時而在这里時而在那里實行戒嚴，在很多場合下解除了市民自衛團的武裝，最後，弗蘭格爾向柏林舉行了英勇的進軍。

最後是一個光輝的預言：“左派总有一天會相信，**當它在議會里獲得勝利的時候，它在實際上却遭到了失敗。**”

這個預言一字不差地應驗了！左派終於在議會里獲得了多數的那一天，成了他們實際失敗的一天。正是左派在議會里所獲得的勝利，引起了11月9日的政變，國民議會開會地點的變更和延期舉行，最後又導致了國民議會的解散和欽定憲法的頒布。當左派在議會里獲得勝利的時候，它確實在議會外遭到了完全的失敗。

諸位先生，这种一字不差地被证实了的政治預言，是我們从在整个德国同时也在科倫发生的暴行中得出的結果、总结、結論。既然如此，还有人敢說这是盲目的誹謗狂嗎？我們的罪行就是正确地指出了确凿的事实并从中得出了正确的結論，而为了对这一罪行負責，今天我們出庭受审。諸位先生，整个案件实际上不就是这样嗎？

总之，諸位陪審員先生，此刻你們必須在这里解决萊茵省的出版自由問題。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問題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決，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問一問每个官員——从大臣到宪兵，——他們的荣誉或他們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伤，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者擇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談，——那末，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結了。如果你們想这样做，那你們就宣判我們有罪吧！

发表于 1849 年 2 月 7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2 月 14 日“新萊茵报”第 221 号，并印成单行本“两个政治审判案”（1849 年科倫“新萊茵报”出版科出版）发表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对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 委员会的审判¹⁹⁵

馬克思的发言

諸位陪審員先生！如果本案是在12月5日以前起訴的話，檢察机关提出的控告我还能够理解。而現在，在12月5日以后，我完全无法理解，檢察机关怎么还敢根据已被王权本身蹂躪了的法律来控告我們。

檢察机关的代表根据什么来批評国民議會，批評关于拒絕納稅的決議呢？根据1848年4月6日和8日的法律。但是，当政府在12月5日擅自确定了宪法，并迫使国家接受新的选举法的时候，它干了什么勾当呢？它蹂躪了1848年4月6日和8日的法律。这些法律对于政府的拥护者來說已不复存在了，——为什么对政府的反对者还应当存在呢？12月5日政府站到了革命的立場上，也就是站到了反革命的立場上。对于它，只存在着革命者或者同謀者。它自己把所有依靠現行法律、捍卫現行法律免遭任何破坏的公民群众都变成了叛逆者。在12月5日以前，对国民議會开会地点的变更、对国民議会被强行解散、对柏林的戒严，可以持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而在12月5日以后，无可爭辯的事实是，这些措施成了反革命的开端，因此允許采取一切斗争手段来反对那个本

身已不再承认那些使它成为政府的条件的派别，既然它本身已不再承认这些条件，所以国家也就不能再承认它是政府了。

諸位先生！国王本来至少能够保存法制的外表，但是他忽视了这一点。国王可以驅散国民議會，然后委托內閣向全国宣布：“我們决心实行政变——形势迫使我們这样做。形式上我們違犯了法律的規定，但是也有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危机时刻。在这种时刻，就有一种不可違犯的法律——保存国家。當我們解散国民議會的时候，还没有任何宪法，所以我們不可能違背宪法。但是，有两个构成法——1848年4月6日和8日的法律。实际上，現在只有一个唯一的构成法——选举法。我們号召全国人民根据这一法律进行新的选举。在这种初选产生的議會面前，我們將作为責任內閣出現。我們希望，这一議會将承认政变是出于形势所迫的救国行动。它将追认这次政变。它将宣布：我們为了救国而違犯了法律的字句。让議會来决定我們的命运吧。”

如果內閣这样做的话，它就有了形式上的理由把我們送交你們的法庭审判。国王也就拯救了法制的外表。但是，他不可能这样做，他不願意这样做。

在国王眼里，三月革命是暴力行动。一种暴力行动只能用另一种暴力行动来鏟除。內閣既然反对根据1848年的四月法律进行新的选举，也就是不承认自己是責任內閣，也就是撤銷了它本来对之負責的那个法院本身。这样，內閣从一开始就把国民議會向人民的申訴变成了空洞的外表，变成了虛构，变成了欺騙。內閣既然发明了一个以有資格限制的选举法为基础的第一議院作为立法議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那末它就廢除了那些构成法，拋棄了法制基础，伪造了人民选举，剝夺了人民对国王的“救国行动”表示

某种意见的可能性。

因此，諸位先生，不能否认事实，未来的历史学家誰也不会否认这种事实：国王实行了革命，他推翻了現存的法律制度，他不能訴諸被他自己可耻地蹂躪了的法律。当順利进行革命的时候，可以絞死自己的敌人，但不能对他們作出法庭判决。可以把他們作为战败了的敌人清除掉，但不能把他們当作罪犯来审判。在实行了革命或反革命以后，不能用已被推翻了的法律去反对这种法律本身的維護者。这是一种怯懦的法制伪善，諸位先生，你們一定不会用自己的判决来批准这种伪善的。

諸位先生，我已經向你們說过，政府伪造了人民对“国王的救国行动”的意见。尽管如此，人民还是表示反对国王，拥护国民議會。第二議院的选举是唯一合法的选举，因为只有这种选举才是根据 1848 年 4 月 8 日的法律进行的。而且，几乎所有贊成拒絕納稅的人都再次被选入了第二議院，許多人是第二次、第三次当选。甚至和我一起被控告的施奈德尔第二也当选为科倫的代表。可見，关于国民議會是否有权决定拒絕納稅的問題，实际上已經由人民解决了。

但是，撇开这个最高判决不談。諸位先生，你們大家也一定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这里沒有通常意义上的犯罪行为，这里根本沒有应受你們法律制裁的違法行为。在通常情况下，社会权力是現行法律的执行者，只有違犯这些法律或以暴力阻止社会权力去执行这些法律的人才是罪犯。現在的情况是，一个社会权力違犯了法律，另一个社会权力——不管它是怎样的社会权力——捍卫法律。这两种国家权力之間的斗争，既不屬於私法范围，也不屬於刑法范围。究竟誰有理，是国王有理还是国民議会有理，——这是一

个历史問題。所有陪審員，所有普魯士法院加在一起也不能解决这个問題。只有一种力量能够解决这个問題——这就是历史。因此，我不明白，怎么能够根据 Code pénal [刑法典] 把我們帶到被告席上来。

这里的問題在于两种权力之間的斗爭，而两种权力之間的斗爭只有力量^① 才能解决——关于这一点，諸位先生，革命报刊和反革命报刊都已經同样地承认了。政府本身的机关报在斗爭結束前不久宣布了这一点。“新普魯士报”——現任內閣的机关报——已頗为明显地承认了这一点。在危机发生前几天，这家报纸大約說过如下的話：現在問題不在于法律，而在于力量；所有的人都将相信，旧的天賦王权还拥有力量。“新普魯士报”正确地估計了形势。力量反对力量。它們之間的斗爭必然由胜利来解决。反革命已获得胜利了，但是目前还只是演完了第一幕。在英国，斗爭持續了二十多年。查理一世不止一次地获得胜利，但是，到头来还是上了断头台。諸位先生，誰又能向你們担保：現任內閣以及过去和現在都是現任內閣手中的馴服工具的那些官員，将来不会被本屆議院或它的继承者宣判为国事犯呢？

諸位先生！檢察机关的代表企图用4月6日和8日的法律来論证他的控告。我曾經不得不向你們证明，正是这些法律会取消對我們的控告。但是，不瞞你們說，我过去从未承认，而且将来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些法律。对于人民选出的代表來說，这些法律从未发生过效力，更不用說給三月的革命指出道路了。

4月6日和8日的法律是怎样产生的呢？是經過政府同**联合**

① 双关語：«Gewalt»的意思是“力量”，也是“权力”。——編者注

議会的协商而产生的。有人想用这种办法来保存同旧的法律秩序之间的傳統联系，并以此扼杀正是廢除了这种秩序的革命。康普豪森一类的人物认为拯救法律发展的外表非常重要。他們是怎样拯救这种外表的呢？通过一系列明显而荒謬的矛盾。諸位先生，請你們試試看，能否在旧的法律观点上停留一分钟！难道单是一个康普豪森大臣，一个責任大臣，一个沒有官运的大臣的存在，不就已经是非法行为嗎？康普豪森作为一个責任首相的地位是非法的。这位从法律观点看来并不存在的官員竟召集了联合議會，以便利用它来通过法律，但是，这个議會本身並沒有合法的权力来通过法律。这种自相矛盾、不駁自倒的玩弄形式的把戏竟被称为发展法律和保存法制基础！

諸位先生，我們暫且撇开事情的形式方面不談。联合議會是什么呢？它是旧的、过时了的社会关系的代表。进行革命正是为了反对这种社会关系。可是，有人却建議让这些被战胜了的社会代表来批准构成法，而这些法律是应当承认、指导和組織革命去反对这个旧社会的！多么荒謬的矛盾！要知道，联合議會已經同旧王权一起被推翻了。

諸位先生，在这里我們面对面地遇到了臭名远揚的法制基础。因此，我必須談談这个問題，因为人們十分公正地把我們看做法制基础的反对者，因为4月6日和8日的法律所以能够存在，完全应当归功于对法制基础的形式上的承认。

联合議会所代表的首先是大地产。而大地产是中世紀封建社会的真正基础。与此相反，現代資產階級社会，我們的社會，是以工业和商业为基础的。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經失去了它过去的全部生存条件，它依賴于商业和工业。因此，在我們这个时代，农业是

根据工业原则经营的，而旧的封建主已淪为经营牲畜、羊毛、谷物、甜菜和燒酒等等的工厂主，已淪为像所有商人一样经营这类工业品的人！尽管他们死死抱住自己的旧成见不放，实际上他们正在变成资产者，用尽可能少的费用生产尽可能多的东西，在价格最低廉的地方买进来，在价格最昂贵的地方卖出去。所以，这些先生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赢利方式证明，他们那种传统的高傲自大完全是虚伪的。土地所有权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因素是以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为前提的。联合议会代表的就是这种早已不存在的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早已不复存在，而这种方式的代表人物虽然死死抱住旧的特权不放，但是他们分享新社会的福利并不比别人少些，并且同样地剥削新社会以自肥。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已经改变了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它也要取得政权，它要从代表衰亡社会的利益的人物手中夺取这种政权，因为这种政权的全部组织是在完全不同的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于是就产生了革命。由此可见，革命既反对专制王权，反对旧社会的这个最高政治表现，也反对等级代表制，因为等级代表制所代表的是一种早已被现代工业消灭了的社会制度，或者最多是些日益被资产阶级社会所超过、排挤和破坏的高傲的等级残余。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竟能想出荒唐的主意，让联合议会——这一旧社会的代表——对这个用革命方法确定了自己权利的新社会颁布法律呢？

据说这是为了保存法制基础。可是，诸位先生，你们怎样理解保存法制基础呢？保存那些属于前一个社会时代的、由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社会利益的代表人物所创立的法律，——这只能意味着把这种与共同需要相矛盾的利益提升为法律。但社会不是以

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 Code Napoléon [拿破仑法典] 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你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像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一样。

旧法律是从这些旧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它们也必然同旧社会关系一起消亡。它们不可避免地要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旧法律，实质上不是别的，只是用冠冕堂皇的词句作掩护，维护那些与时代不相适应的私人利益，反对成熟了的共同利益。**这种保存法制基础的做法**，其目的在于使那些现在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私人利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其目的在于强迫社会接受那些已被这一社会的生活条件、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交换以及物质生产本身宣判无效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使那些专门维护私人利益的立法者继续掌握政权；其结果会导致滥用国家权力去强迫大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因此，这种做法时刻与现存的需要发生矛盾，它阻碍交换和工业的发展，它准备着以**政治革命**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危机**。

这就是信奉法制基础和保存法制基础的真正含义。有人就是依据这种关于法制基础的高谈阔论（这种论调不是有意地欺骗别人，就是无意地自我欺骗）来论证联合议会的召开的，他们强迫这一议会给那个由于革命而成为必需的并由这一革命所产生的国民

議會制造了构成法。現在，他們又想根据这些法律来审判国民議會！

联合議會代表封建社会。与此相反，国民議會代表現代资产阶级社会。它由人民选举出来，以便独立地制定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应当适应同过去一直存在的政治制度和以往存在的法律发生了冲突的那种生活关系。因此，国民議會从一开始就是自主的制宪議會。如果說它不顾这些竟然采取了协商主义的观点，那末这不过是对国王的純粹形式上的謙让，純粹是一种客气。在这里，我没有必要去研究国民議會是否有权違反人民意願而采取协商立場的問題。它主張双方都必须抱有誠意，以避免与国王发生冲突。

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同联合議會协商通过的4月6日和8日的法律，从形式上說是无效的。从事实上看，这些法律也只有这样一种意义：它們表述和規定了能使国民議會成为人民主权的真正表現的那些条件。联合議会的立法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它使国王不致丟臉地宣布：**我敗了！**

諸位陪審員先生，現在我来比較詳細地分析一下檢察官的发言。

檢察官說：

“国王让出了完全由他掌握的一部分权力。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放棄某种东西也不会超过借以表現这种放棄的那种詞句的直接含义。但1848年4月8日的法律并没有賦予国民議會拒絕納稅的权利，也沒有規定国民議會一定要設在柏林。”

諸位先生！国王所掌握的是**殘缺不全**的权力；国王放棄权力是为了拯救他的**殘缺不全**的权力。諸位先生，你們都記得，国王即位后曾立刻在科尼斯堡和柏林正式立下誓言，决不同意立宪政体。

你們都記得，1847年，在聯合議會開幕時，國王曾莊嚴地宣誓，說他不容許把一塊紙片放在自己和自己的人民之間。可是，1848年三月事件以後，國王在他欽定的憲法中親自把自己宣布為立憲國王。他把這種毫無根據的異邦讒語——一塊紙片放在了自己和自己的人民之間。檢察機關的代表敢於斷言國王是自願如此露骨地推翻自己的莊嚴保證嗎？國王是自願在整個歐洲面前承擔允許協商或允許憲法這種令人難以容忍的不徹底行為的罪名嗎？國王作了讓步，這是革命迫使他不得不作的。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遺憾的是，檢察機關的代表所作的通俗的比喻什麼也證明不了。事實上，如果我要放棄，我就只放棄那一定要放棄的東西。如果我給你們送禮而你們竟根據我的禮單要求我繼續把東西送來，那你們就實在太無恥了。但是，在三月事件以後送禮的正好是人民，受禮的是國王。不言而喻，禮物的性質應當由送禮者決定，而不是由受禮者決定，應當由人民決定，而不是由國王決定。

國王的專制權力被摧毀了。人民勝利了。雙方簽訂了停戰協定，而人民受了騙。人民受了騙——諸位先生，這一點檢察機關的代表本人已經不辭勞苦地向你們證明了。為了反駁國民議會有拒絕納稅的權利，檢察機關的代表已詳盡地向你們作了說明：如果1848年4月6日的法律中有過某種類似規定，那末，我們在1848年4月8日的法律中就絕對找不到這種規定了。就是說，有人利用了這個間歇時期，以便在兩天以後從人民代表手中剝奪在兩天以前才賦予他們的權利。檢察機關的代表還能更成功地敗壞國王的信義嗎？他還能更確凿地證明有人想欺騙人民嗎？

接着，檢察機關的代表說：

“變更國民議會開會地點和延期召開會議的權利是從執行機關的特權中

产生的，并且这是所有立宪国家所公认的。”

談到**执行机关变更立法議會开会地点**的权利問題，我請求檢察机关的代表哪怕是举出一条法律或一个例子来证明一下这种說法。例如，在英国，国王本来可以根据旧的历史权利在他所願意的任何一个地方召开議會。法律并没有規定倫敦是議会的法定会址。諸位先生，你們知道，在英国，最重要的政治自由一般都是由习惯法确认的，而不是由成文法批准的；例如，出版自由就是如此。但是，如果某一个英国内閣突然想起要把議會从倫敦迁移到温卓尔或里士滿，那末只要一說出这种想法，就足以使人相信这是不可能實現的。

不錯，在立宪国家中国王有权**延期召开議會**。可是不要忘記，另一方面，在所有宪法中都明文規定，議會會議可以延期**多久**，在多长时期以后又应召开。普魯士没有任何宪法——它还尚待制定；也沒有召开延期举行的議會會議的决定期限——因此，国王也就沒有延期召开議会的权利。不然，国王就可以把召开議会的日期推迟十天、十年，以至于无限期地延期。有什么保证能使議会在某个时候召开，或者使議會能毫无障碍地举行會議呢？議會是否能与国王并存是由国王任意决定的，立法权——如果这里一般还談得上立法权的話——成了虛設。

諸位先生！从这个例子中你們可以看出，用衡量立宪国家現存关系的尺度来衡量普魯士国王和普魯士国民議會之間的冲突会导致什么結果。这将导致**承认专制王权**。一方面授予国王以宪法执行机关的权利，另一方面却沒有任何法律、任何慣例和任何根本規定，对国王实行一个宪法执行机关所应受的限制。对人民代議机关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你应当在**专制国王統治下起制宪議會**的

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是**执行权与立法权**相对立，而且宪法的分权原则根本不适用于**普魯士国民議會**和普魯士国王，这一点是否还需要加以说明呢？假定說，你們沒有考虑到革命，你們奉行的是正式的**协商論**。可是，即使按照这种理論來說，互相对立的也是两个独立自主的权力机关。不容置疑，在这两个权力机关中，必然是一个消灭另一个。两个独立自主的权力机关不可能同时肩并肩地在**一个国家里**行使职权。这是一种类似化圓为方問題^①的荒誕事情。两个最高权力机关之間的斗争必須用物质力量来解决。可是，我們不准备在这里研究协商是否可能的問題。仅仅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两个权力机关相互之間发生关系，是为了簽訂条約。就連康普豪森本人也設想过条約簽訂不成的可能性。他曾在讲台上向协商派指出，如果达不成協議，国家将遭到危險。危險本来在于协商的国民議会对国王所采取的根本立場，而現在，在事后，人們竟要国民議会对这种危險負責，同时，却否认国民議会的这种根本立場，把国民議会变成制宪議會！他們想用逃避困难的办法来解决困难！

諸位先生，我认为我已經向你們证明了：国王既无权变更开会地点，也无权延期召开协商派議會。

但是，檢察机关的代表并不限于分析国王是否**有权**变更国民議會开会地点的問題；他还千方百計地证明这种变更是**适宜的**。他大叫大嚷地說：“如果国民議會听从国王，迁移到勃兰登堡去，难道是不适宜的嗎？”檢察机关的代表认为，这种行动所以适宜，是

^① 求作一正方形，使其面积等于一已知圓的面积；一般指不能解决的問題。——譯者注

由于議會本身的处境决定的。据他說，議會設在柏林是不自由的等等。

可是，难道国王迁移議會的目的不是很明显的嗎？难道国王本人不是已經透露了有关这种迁移的所有被正式列举出来的理由的真正含义嗎？問題根本不在于討論是否自由，問題在于：或者解散議會并欽定一部宪法，或者召集唯唯諾諾的代理人建立一个虛設的代議机关。当来到勃兰登堡的議員出乎意外地达到了法定人数时，他們就扔掉了一切假面具，宣布解散国民議會。

不过，不言而喻，国王无权宣布国民議會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除了議會本身，誰也不能决定，它究竟有无必要的討論自由。当国民議會一旦做出了不合国王心意的決議时就宣布議會是不自由的，它无力对它的决定負責，并取消这个議會，——对国王來說，还有什么比这更方便的事情呢！

檢察机关的代表还談到，政府有責任維護国民議會的尊严，使它避免受到柏林居民恐怖主义的損害。

这种論证簡直是对政府的一种恶毒的嘲笑。我且不談人們是怎样对待个别人的，而这些人終究是被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人們对这些代表极尽侮辱之能事，对他們进行最卑劣的迫害，对他們采取某种类似“野蛮的狩猎”¹⁹⁶的行动。但是，我們且不談这些个别的人。就以对待国民議會的工作來說，人們是怎样維護它的尊严的呢？他們把国民議會的档案交給丘八們任意糟蹋，这些丘八把各个部門的文件、国王的信函、法律草案和各种文稿用来点烟斗、生炉子，丢在地上踩来踩去。

甚至連查封财产时所必需的手續也沒有遵守，甚至連清单也沒有开，就把档案搶走了。

显然，有人企图消灭人民花了很大代价才得到的一切东西，以便有更多的机会誹謗議會，以便毀掉政府和貴族所切齿痛恨的改革計劃。在干了这一切勾当以后，还硬說政府把国民議會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是出于对它的尊严的亲切关怀，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現在，我来談談檢察机关的代表关于拒絕納稅的決議的**正式效力問題**所提出的論据。

檢察机关的代表說，为了使拒絕納稅的決議成为正式合法的決議，議會應該把它呈交**国王批准**。

但是，諸位先生，国王和議會並沒有直接关系——代表国王的是勃兰登堡內閣。这样一来，議會就得和这个勃兰登堡內閣——檢察官竟然要求干这样荒唐的事情——进行談判，以便宣布这一內閣犯有叛国罪，以便拒絕向它納稅！除了要国民議會无条件地服从勃兰登堡內閣的一切要求以外，上述要求还能有什么意思呢？

檢察机关的代表說，拒絕納稅的決議之所以沒有正式效力，还由于只有經過**二讀提案**才能成为法律。

一方面，对待国民議會不遵守必須履行的**极重要的形式**，另一方面，却要求国民議會遵守**无关紧要的手續**。沒有比这更简单的了！某一項不合国王心意的提案通过了一讀，但是有人用武器的力量来阻止二讀，于是法律依旧无效，因为沒有通过二讀。檢察机关的代表忽略了当时出現的特殊形势，当人民代表在會議厅里通过这个決議时，他們正受到刺刀的威胁。政府接二连三地采取暴力行动。它肆无忌惮地違犯极重要的法律，Habeas Corpus Akte，市民自卫团法¹⁹⁷。它在戒严的幌子下任意实行无限制的軍事专

制。它甚至把人民代表本身都给赶跑了。而当一方蛮横无礼地违反一切法律的时候，却要求另一方甚至最严格地遵守会议规则！

检察机关的代表说：“国民议会不愿意和解”，它“没有寻求和解”。诸位先生，我不知道，这是故意歪曲——我远不愿意设想检察机关的代表会这样做——还是简单地由于不了解情况。

如果说人民因为某种原因而责备柏林国民议会的话，那正是因为它无论如何要实行和解。如果说这个议会的议员本身感到后悔的话，那正是后悔自己太热衷于协商了。正是这种协商热狂使议会渐渐地脱离了人民，正是这种热狂使议会丧失了自己的全部阵地，最后，正是这种热狂使议会在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时候遭到了国王的打击。当国民议会终于想表现意志的时候，它已经处在孤立和无力的状态中，这正是由于它在必要的时候没有意志，并且不善于表现意志。当国民议会背弃了革命并批准了协商论时，当它从革命的国民议会的立场堕落到模棱两可的协商派团体的地位时，它第一次表现了这种协商的热狂。当它把普富尔虚假承认施泰因提出的军令¹⁹⁸信以为真的时候，它的调和主义的软弱性达到了极点。这一军令的公布本身变成了一出滑稽剧，因为它最多不过是弗兰格尔军令的可笑的回声。可是，议会不去超过这个军令，而是双手牢牢抓住这个经普富尔内阁修改后变得软弱无力和空洞无物的军令。为了避免和国王发生任何严重的冲突，议会装出一副向旧的反动军队示威的可怜相来代替真正的示威。实际上连解决冲突的影子都没有，而议会却假仁假义地宣布冲突已经真正解决。这个议会竟这样缺乏斗争欲望，竟这样热心地企求调和，而检察机关的代表却把它描绘成一群爱闹事的莽汉！

我是否还需要指出一个证明这个议会的热心于调和的本性的

征候呢？諸位先生，請你們回忆一下国民議會就停止贖买法^①同普富尔达成的協議。如果議會不能消灭軍隊中的敌人，它首先應該与农民結成朋友。可是，它也放棄了这种做法。它认为，最重要的，比保存自身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寻求和解，避免与国王冲突，無論如何要避免冲突。而有人却指責这个議會，說什么它不願意和解，說什么它沒有寻求和解？

甚至当冲突已經爆发时，議會还試圖和解。諸位先生，你們都知道中間派拥护者翁魯的小册子¹⁹⁹。从这本小册子中你們應該看出，为了避免破裂，什么办法沒有使用过：派代表团去覲見国王，国王却不許他們覲見，个别代表企图說服大臣，而大臣却以貴族的傲慢态度拒絕接見他們；議會想实行让步，但是这些让步却遭到了耻笑。甚至到最后，只有准备战争一条路可走的时候，議會还力图媾和。而檢察机关的代表却責难这个議會，說它不願意和解，說它沒有做过和解的尝试！

在冲突发生**以前**，甚至在**冲突期間**，当柏林国民議會还认为同国王的友好协商和和解是可能的并极力促其实现的时候，它显然是沉醉于痴心妄想，它沒有认清自己的地位，沒有认清自己存在的条件。

国王不願意和解，他也不可能希望和解。諸位陪审員先生，关于3月間所爆发的，并且以后在国民議會和国王之間繼續进行的那种斗争的性质，我們不要自己欺騙自己。这里的问题不是內閣和議會反对派之間的普通的冲突，也不是已經当了大臣的和想当大臣的两帮人之間的冲突，也不是一个立法議會中的两个政治派

^① 見本卷第143頁。——編者注

別之間的党派斗争。也许国民议会中的多数派議員或者少数派議員是这样想的。可是，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协商派的意见，而是国民议会所处的实际历史情况，这种情况是由于欧洲革命和因此而引起的三月革命所形成的。这里所发生的不是在一个社会基础上的两个派别之间的政治冲突——这是两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具有政治形式的社会冲突，——这是旧的封建官僚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斗争，是自由竞争的社会和行会制度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是土地占有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是信仰的社会和知识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旧社会的相应的政治表现是天赋国王、监护一切的官僚和独立的军队。这一套旧政权机构的相应的社会基础是享有特权的贵族土地占有制及其农奴和半农奴、小规模的宗法式的或者在行会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工业、彼此隔绝的等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尖锐对立，而首先是乡村对城市的统治。旧的政权机构——天赋国王、监护一切的官僚和独立的军队——感到：一旦侵犯了旧社会的基础，即享有特权的贵族土地占有制、贵族本身、乡村对城市的统治、乡村居民的依附地位以及和这一切生活条件相适应的法律，如市政条例，刑事立法等等，它自己的物质基础就会从它的脚下消失。而国民议会就是实行了这种侵犯。另一方面，这个旧社会感到：一旦国王、官僚和军队丧失了封建特权，政治权力就会从它手中滑掉。而国民议会就是想消灭这些特权。因此，军队、官僚和贵族联合起来唆使国王实行政变，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国王知道，他自己的利益是和旧的封建官僚社会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他也允许别人推动他去实行政变，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国王是封建贵族社会的代表，正像国民议会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一样。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条件，

要求把官僚和军队，把这些过去的商业和工业的统治者降低为商业和工业的工具，变成资产阶级交换的简单机构。资产阶级社会不能容忍农业受封建特权的限制，工业受官僚监护的限制。这是同它的自由竞争的生活原则相矛盾的。它不能容忍对外贸易的条件不受国民生产的利益的调节，而受宫廷对国际政策的考虑的调节。它必须使财政管理服从于生产的需要，可是，旧国家却必须使生产服从于天赋国王的需要，使它成为给那些作为王权堡垒和王权社会支柱的人们缝缀的补丁。正像现代工业实际上消灭了一切差异一样，现代社会也必须消灭城乡之间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一切障碍。在这个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可是已不再有等级了。它的发展就在于这些阶级的斗争，可是这些阶级却联合起来反对等级及其天赋王权。

因此，天赋王权，这个旧的封建官僚社会的最高政治表现和最高政治代表，不可能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出任何真诚的让步。它的保全自身的本能，它所依赖的站在它后面的社会，将经常驱使它收回已经作出的让步，保存自己的封建性质，冒险实行反革命政变。在每一次革命以后，反革命总是王权赖以复辟的生存条件。

另一方面，当现代社会还没有摧毁和消灭旧社会赖以强行保全自己的那种正式的遗留下来的权力以前，当它还没有摧毁和消灭这个社会的国家权力以前，它是不可能高枕无忧的。天赋王权的统治——这也就是过时的社会成分的统治。

这样看来，在这两个社会之间不可能有和平。它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使得它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个社会必然获得胜利，而另一个社会必然要遭到失败。这是它们之间唯一可能的和解。因此，在这两个社会的最高政治代表之间——在国王和人民

代議机关之間，也不可能有和平。所以，国民議會只得二者擇一：或者对旧社会让步，或者作为独立的力量反对国王。

諸位先生！檢察机关的代表把拒絕納稅說成是一种“动搖社会基础”的措施。其实，拒絕納稅与社会基础沒有絲毫关系。

諸位先生，一般說来，究竟为什么賦稅、同意納稅和拒絕納稅在立宪主义历史中起着这样重要的作用呢？其实原因非常簡單。正像农奴用現錢从封建貴族那里贖买了特权一样，各国人民也要从封建国王那里贖买特权。国王們在与別国人民进行战争时，特別在与封建主进行斗争时需要錢。商业和工业越发展，他們就越需要錢。但是，这样一来，第三等級，即市民等級也就跟着发展起来，他們所拥有的貨幣資金也就跟着增长起来，并且也就借助于賦稅漸漸从国王那里把自己的自由贖买过来。为了保障自己的这些自由，他們保存了經過一定期限重新确定稅款的权利——同意納稅的权利和拒絕納稅的权利。在英国历史中，可以特別詳細地探求出这一过程。

所以，在中世紀社会中，賦稅是新生的資產階級社会和占統治地位的封建国家之間的唯一联系。由于这一联系，国家不得不对資產階級社会作出让步，估計到它的成长，适应它的需要。在現代国家中，这种同意納稅的权利和拒絕納稅的权利已經成为資產階級社会对管理其公共事务的委员会、即政府的一种监督。

因此，部分的拒絕納稅是每一个立宪机构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每当否决預算的时候，都要发生这种拒絕納稅的事件。例行的預算只适用于一定的期限；除此以外，如果議會會議延期召开，那末議會必須在极短的間歇时期以后重新召开會議。在这种条件下，国王就不能成为独立的。在新議會中沒有多数支持內閣，或者国

王沒有根据新議會的精神任命內閣以前，否決預算就意味着坚决拒絕納稅。由此可見，否決預算是拒絕納稅的議會形式。在我們所探討的冲突中，这种形式是不适用的，因为宪法还不存在——它还尙待制訂。

但是，像現在所探討的这种形式的拒絕納稅，即不仅否決新預算，而且甚至禁止繳納目前的賦稅，也不是什么絕无仅有的事情。在中世紀就經常采用这种办法。甚至旧的德意志帝国国会和旧的封建的勃兰登堡各等級也曾經通过拒絕納稅的決議。在現代立宪国家中，更是不乏其例。1832年，拒絕納稅在英国导致了威灵頓內閣的垮台。而且，諸位先生，請注意，在英国并不是議會通过拒絕納稅的決議，而是人民本身以自己的权力宣布并实现了这一行动！而英国是历史上的立宪主义国家。

我决不想否认这一点：使查理一世上了断头台的英国革命就是从拒絕納稅开始的。以宣布北美脱离英国而独立告終的北美革命也是从拒絕納稅开始的。拒絕納稅在普魯士也可能是非常不愉快的事件的先兆。但是，使查理一世上了断头台的并不是約翰·汉普敦，而是他自己的頑固不化，他对于封建等級的依賴性，他想用强力压制新生社会不可抗拒的需要的狂妄想法。拒絕納稅只是国王和人民之間分裂的标志，只是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冲突已經达到緊張而危險的程度的证明。并不是拒絕納稅引起了分裂和冲突——它只是证明了分裂和冲突的存在。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它将导致推翻現存政府，推翻現存政治制度。但这根本不会触及社会基础。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拒絕納稅正是社会对于威胁其基础的政府所采取的一种自卫手段。

最后，檢察机关的代表指責我們，說我們在被指控的呼吁书中

比国民議會本身跑得更远。“首先，国民議會沒有公布它的決議。”諸位先生，我是否有必要认真地回答，为什么拒絕納稅的決議甚至在法令匯編中都沒有发表呢？

此外，他指出，国民議會并不像我們这样，号召使用暴力，总的說来，它不像我們这样站在革命立場上，而是想坚持合法的基础。

过去，檢察机关的代表把国民議會描繪成非法的，現在却又认为它已經合法了——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把我們描繪成罪犯。可是，如果征稅被宣布为非法的，难道我不应当用暴力来反抗用暴力实行的非法行为嗎？因此，甚至从这种观点出发，我們也完全有权利以暴力还击暴力。不过，說国民議會想坚持純粹合法的基础，想坚持消极反抗的立場，这是完全正确的。在它的面前有两条道路：或者是革命道路——它沒有走这条路，这些先生們不願意拿自己的脑袋去冒險，——或者是局限于消极反抗的拒絕納稅。国民議會正是踏上了这一条道路。但是，人民在实行拒絕納稅时必须站到革命的立場上来。国民議會的行为並沒有預先决定人民的行为。国民議會本身沒有任何权利——人民委托給它的只是維護人民自己的权利。如果它不根据交給它的委托来行动——这一委托就失去效力。到那时，人民就亲自出台，并且根据自己的自主的权力来行动。比如說，如果某一个国民議會把自己出卖給某一个叛变的政府，人民就必须把两者——既把政府，也把国民議會一起赶走。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利用革命来回答它。这一点人民不需要征得任何国民議會的同意。普魯士政府企图出卖国家，这一点国民議會本身已經承认了。

諸位陪審員先生，我現在簡單地概括一下我的发言。在国王亲手撕毀了 1848 年 4 月 6 日和 8 日的法律以后，檢察机关的代表

不能再抬出这两条法律来反对我們。这些法律本身解决不了任何問題，因为它们們是联合議会随意捏造出来的。国民議会所通过的拒絕納稅的決議，無論形式上和事实上都具有法律效力。我們在呼吁书中比国民議会跑得更远。这是我們的权利和我們的义务。

最后，我再說一遍，只是戏剧的第一幕結束了。两个社会——中世紀社会和資產階級社会——之間的斗争将以政治形式繼續进行。只要議会重新召开，同样的冲突又将重新发生。內閣的机关报“新普魯士报”已經預言：当选的还是那批人——这就是說，必須第二次驅散議会。

可是，不管新的国民議会选择什么样的新的道路，必然的結果只能是：**不是反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新的胜利的革命！**也許，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反革命完成之后才有可能。

发表于 1849 年 2 月 8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2 月 25 和 27 日
“新萊茵报”第 231 和 232 号；
并印成单行本“两个政治审判
案”（1849 年科倫“新萊茵报”
出版科出版）发表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拒 絕 納 稅 案

科倫 2 月 9 日。如果說陪審員前天關於本報一案的判決對報刊具有重大的意義，那末昨天宣判馬克思、施奈德爾、沙佩爾無罪，便對萊茵各法院審理的一切關於拒絕納稅的案件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案件的事實本身非常清楚，不應該有任何懷疑。在被指控的那個文件中說：

“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號召萊茵省各民主團體通過並實施下列措施：

(1) 在普魯士國民議會本身已經作出拒絕納稅的決定以後，各地都應當用一切手段反抗強行徵稅；

(2) 各地都必須組織民團，抗擊敵人……

(3) 各地都應該要求地方當局正式聲明，它是否承認並願意執行國民議會的決定。在遭到拒絕時，應該成立安全委員會……市鎮委員會如反對立法議會，則應由該地全民投票重新選舉。”^①

這個文件用不着加以解釋。不管拒絕納稅的決定有無法律效力，這裡的問題顯然是唆使暴動和內戰。被告也直認不諱，說“敵人”（見第二項措施）一詞系指內部敵人，指政府的武裝力量。雖然如此，政府當局因為沒有任何希望根據 Code [法典] 中這一條來

^① 見本卷第 39 頁。——編者注

定罪，所以選擇了比較溫和的起訴條文：號召叛亂和反抗政府當局的代表（見第二〇九條及以下各條）。

於是，需要解決的是一個純政治性的問題：被告是否有权根據國民議會關於拒絕納稅的決定，用上述方式號召反抗政府當局、組織武裝力量同國家的武裝力量進行鬥爭，並且自行任免國家官員。

經過極簡短的討論之後，陪審員對這個問題作了肯定的答復。

在作出這種判決以後，拉薩爾和康塔多爾大概很快也會被釋放。科倫檢察院對待他們的態度，大概不會跟陪審員對待馬克思、施奈德爾和沙佩爾的態度不同。

順便指出，我們明天還要來談拉薩爾問題。看來，現在有些好心人想把拉薩爾一案拖到下次開庭期（3月）結束時再審理，就是說，再賜給他加上三個月的前審羈押。但是，希望科倫陪審員的判決能戳穿這種仁愛的計劃。關於拉薩爾在杜塞爾多夫監獄受到怎樣的待遇，我們明天將要報道一些令人愉快的細節。^①

卡·馬克思寫於1849年2月9日
載於1849年2月10日“新萊茵報”
第218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① 見本卷第316頁。——編者注

政治案件

魏瑪区消息，2月3日。当天的“法兰克福报”登载了下面的报道：

“我們的第一地方陪审法庭对当前的政治案件进行宣判的日子终于临近了。在审讯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延期以后，据我們所知，法庭终于明确规定于本月15日开庭。开庭后，首先将听取对去年10月間在本地和耶拿被捕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拉弗里博士、罗泰碩士、大学生阿美隆格、奥托博士和文学家耶德的起訴。在当时的大批被捕者中間，檢察官能够勉强拼凑一些材料来起訴的，只有这几个人。对这次被捕的魏瑪文学家戴茵哈尔特的偵查所提供的材料是如此之少，以致他在刑事法庭牢獄有損健康的条件下蹲了两个月以后，檢察官仍然无法对他提出任何控訴。当时被捕的耶拿碩士朗格，在獄中四次吐血，后来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中被送到耶拿他的父母那里。此后不久，經過刑事法庭一連三天的审讯之后，于今年1月7日死去了。我們的陪审員将会大吃一惊，因为提交法庭作为控告上述諸人的罪证的，将不是那个大肆宣傳和到处談論的叛国計劃，而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希望人民在不久将来的胜利中，不要像在3月里那样幼稚和健忘，让屠杀自己的所有劊子手仍旧留在原来职位上。可以有把握地說，人民一定会馬上把这帮反动官吏首先是那帮嗜血成性、虛伪奸詐，而且还被叫做“法官”的司法人，送到宾夕法尼亚監獄²⁰⁰拘留半年，然后再把他們送去修筑铁路和公路，以便作进一步的治疗。）

写于1849年2月9日左右

載于1849年2月10日

“新萊茵报”第21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科倫日報”的分工

科倫 2 月 10 日。上星期我們甚至未能關心一下我們最好的朋友，我們最近的鄰居，雖然我們很願意這樣做。別的事情——誰都知道是什麼事情²⁰¹——占去了我們的全部時間。現在我們就來趕快彌補這個損失，首先看一下同我們毗鄰的政論家。

“科倫日報”分工之協調是罕見的。在該報的后一部分，即第三版和第四版，高貴的沃尔弗斯为比利时大肆吹嘘，尽一切可能使亨利五世能重新登上祖宗的宝座并欽定一个“比利时式”的宪法。这一部分我們暫且不談，現在來看看該報的正面，即第一版。在这一版上，我們的朋友許金占居一个地下室。在这个地下室里，他以散文和詩歌形式把自己的空談的幻想或幻想的空談方面的新作提供給愛好者。有趣的“政治對話”是大家都知道的，在这里，天才的作者，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企图从德国教授的猪皮里引出一个麦菲斯托費尔，但是他只引出了瓦格納²⁰²。在地下室上面的第一层楼上，杜蒙先生開設了寬敞的政治沙龙，由勃律盖曼和施万貝克（不要同魏斯勃劳特混淆起来）这两位大人物招待宾客。勃律盖曼負責哲学部分，負責在各种災難中拯救原則，負責在一切地震中保护法制基础，負責哀歌体即辞世詞和安魂曲。施万貝克負責的是吟誦部分，是高尙的抒情詩、精神的憤慨、頌歌和風暴。他的欣喜若狂的詞句，达到了奥林帕斯山的最高峰，它的步伐虽然并不总是

那么穩健，但节奏始終未乱。的确，“科倫日報”所富有的那种謹严的六脚韵，几乎全都出自施万貝克之手。

今天第一个投入我們眼帘的，正好是这个高尚的施万貝克。在一篇 de dato〔标明的日期是〕科倫 2 月 7 日的論文中，他向我們描述了专制制度的惨痛后果和革命的惨痛后果。

偉大的施万貝克大发雷霆，他埋怨普魯士人民不是根本沒有参加选举，就是选得很糟。

“这个国民議會应该完成建立君主立宪国家的工作；但是这个議會中的一部分人将破坏这一工作，因为他们已經不是君主派；另一部分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他們还没有成为立宪派，所以也会破坏这一工作。这两种人之所以都将破坏这一工作，正是因为他們都不是君主立宪的拥护者，——这难道还有人怀疑嗎？狂風将从对立的两极吹来，被克服了的过去将同遥远的、可能是不可达到的未来展开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誰知道会不会丧失現在！”

請注意，这些經典詞句的风格有多么强大的力量！每一个句子都簡短而有力，每一个詞都发出精神的憤慨。請你們尽可能生动地設想一下“被克服了的过去”同“遥远的、可能是不可达到的未来”之間的斗争。你們誰不会觉得，你們似乎亲眼看到“被克服了的过去”终于赶上了“可能是不可达到的未来”，它們像两个泼妇一样彼此揪住对方的头发，正是由于一方的不可达到性和另一方的被克服性，当狂風从对立的两极吹来的时候，現在愈来愈多地丧失了！

你們千万不要以为这都是些小事。如果我們可以对这些大人物加以評論，那我們就要說：勃律盖曼通常是詞不达意，而施万貝克正好相反，是因詞害意。

的确，当发现这个不仅受普魯士国王委托而且也受“科倫日

報”委托来完成建立君主立宪国家这一工作的議會，是由不是太左就是太右的人組成，因而不能实现这个崇高目的的时候，誰能不在高尚的憤慨中因詞害意呢？何况这件事发生在“狂風从对立的两极吹来”以及“科倫日報”在“丧失現在”的时候！

人民选举的代表并不喜欢“科倫日報”认为他們“應該喜欢”的东西，这对“科倫日報”說来已經够伤心了。但是，如果人民嘲笑扮演珈桑德拉²⁰³的施万貝克，并且不去从“民族的偉大中心”中选举君主立宪的典范人物，而去选举那些或者已經不再是君主派的人，或者尙未成为立宪派的人，那对于人民來說就更糟了。Tu l'as voulu, Georges Dandin!〔你想要的是这个嗎？乔治·唐丹！〕^①——当被克服了的过去同可能是不可达到的未来之間的强烈冲突使現在瀕于灭亡的时候，施万貝克痛苦地这样喊道！

“換句話說，反动的标志和新的革命的，或者說得更确切些，不断革命的标志，并没有晚一点出現。”

在作出这一卓越的发现以后，珈桑德拉-施万貝克就把視綫轉到奥地利。施万貝克的視綫是經常集中在奥地利的。奥地利是他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他以前曾因維也納蠱惑宣傳的暴戾而感到憤慨，在这里，他現在正在消灭馬扎尔人，在这里，高尚頌歌的作者終於表現了一点温情，对那些曾被战地法庭賜予鉛彈和火药的人們表現了一点良心上的責备。因此，这位充滿預感的先知就在他的每一篇社論中投給奥地利一瞥溫柔的目光。

“其实，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指奥地利〉絕对的官僚制換成了絕对的民主制，后来又換成了絕对的軍事权力，最后仍然是一切如故！”

① 莫里哀“乔治·唐丹”。——編者注

革命的后果是多么可悲，由于人民永远不听那些没有得到公认的珈桑德拉的話而造成的結局又是多么令人痛心！“最后仍然是一切如故！”固然，梅特涅的傳統政府同現在的反革命軍事專政有很大的區別；但梅特涅時代的好心腸的奧地利人民的變化尤其大，他們現在已經成了充滿革命狂熱的人民；此外，從歷史上可以看出，反革命總是只會導向更徹底的、流血更多的革命。但是這有什麼意義呢？“最后仍然是一切如故”，暴政依然是暴政。

那些坐在酒吧間空談政治而照施萬貝克的說法却構成“德意志民族偉大中心”的庸人，那些每逢革命遭到暫時的挫折就大喊大叫“起義有什麼好處，我們還不是同從前一樣”的笨蛋，那些只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的淵博的歷史專家，——所有這些人如果知道偉大的施萬貝克同他們的觀點完全一致，那他們定會欣喜若狂。

珈桑德拉對奧地利作了這番必不可少的觀察以後，便把視線重新轉到普魯士來，他準備展望一下未來。他按照應有的方式權衡了反動分子和革命分子的輕重。他依次仔細地審察了君主政體及其屬僚、弗蘭格爾、戒嚴（他懷着善良的願望希望解除戒嚴）和“普魯士同盟”²⁰⁴。接着他說：

“但是，綜上所述，我們仍然應該承認，從數量上說，我們的反動派並沒有多大力量。糟糕的是人民的偉大中心非常習慣於專制制度，甚至根本不能理解自治問題，而這一切又僅僅是因為懶。你們這些大批沒有參加選舉的人……你們都是專制制度的真正擁護者！……世界上再沒有比這種懶得不願參加自由的政治生活的人民更討厭的東西了。”

“德意志人民的偉大中心”，你們不配有自己的施萬貝克！

像下面所說明的，這個“懶得不願參加自由的政治生活”的“人民的中心”，不是別人，正是資產階級。這是多么痛心的自供啊！但

是，这种痛心很快就因为对民族偉大中心的可耻的“淡漠”所表示的自滿的精神憤慨而減輕了。

“但是，更糟得多的是革命的可悲的后果。在我們的人民中，幻想家、空想家、狡猾的煽动家〈天真的自供！〉以及沒有任何政治認識的輕率的群众，比我們所能想像的要多得多。1848年第一次向我們表明：在这个平靜、正直、思想健全的人民中間隱藏着大量的无政府主义分子，这个人民怀有某种模糊的革命傾向，人們开始把实行革命这种方便的手段〈无疑，比起在“科倫日報”上写思想深刻、充滿頌歌的社論来要“方便”得多〉当做……万应灵药。”

“中心”太懶，而外圍、“賤民”、“輕率的群众”又太急。“狡猾的煽动家”同“大量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結合在一起，当然不能不在施万貝克的心灵中引起忧郁的預感，何况資產階級又受着“懶”和“淡漠”的支配！

“事物的自然过程就是如此：打击引起反击。”

珈桑德拉在作出这一新的、偉大的、将来一定会成为几章动人的变奏曲的主題的哲学发现以后，就来結束自己的文章，并且作出了如下的結論：

“只有当民族的偉大中心，当有力量和有教养的資產階級統一和强大到足以制止这种右傾和左傾的时候，才能打开通往真正自由的政治生活的道路。我們手头有一份德国北部的报纸，上面……写道：‘……資產階級現在已經对两个极端派即左派和右派取得了胜利，未来完全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我們担心这种高兴暫且还为时过早。如果这还需要证明，那末就看普魯士的选举吧。”

这种哀泣表现出当代珈桑德拉对这个不願按“科倫日報”指示前进的邪恶世界的堕落所产生的极大的精神憤慨。在“被克服了的过去”、“遙远的、可能是不可达到的未来”和可疑的“現在”这些方面，施万貝克研究的結果就是：真正的、决定性的斗争不是发生

在封建官僚的君主制同資產階級之間，也不是發生在資產階級同人民之間，而是發生在君主制同人民之間，發生在**君主派**同**共和派**之間，而**資產階級**，**立憲派**則退出了戰場。

我們不想花很多時間去討論，資產階級是不是真的處在鬥爭之外，它這樣做是因為懶呢還是因為弱，也不想去討論普魯士的選舉說明什麼。單是“科倫日報”承認如下一點就已經夠了：在現在正在進行的鬥爭中，資產階級已經不再是站在最前列，引起鬥爭的利益已經不再是資產階級的利益，鬥爭的焦點在於要君主專制政體還是要共和制。

現在請大家翻一翻去年 11 月以來的“新萊茵報”，看看我們是不是在每一號上和在每一個場合，如在維也納反革命勝利時，在柏林反革命勝利時以及在欽定憲法頒布時，都曾經寫過，看看我們是不是在“資產階級和反革命”這一長篇論文和在初選以前寫的其他一系列論文中曾經非常詳細地說明過：德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和怯懦決定了反革命的可能，而反革命則把資產階級推在一旁，使封建社會的殘余同現代社會的一個極端之間，君主制同共和制之間的直接鬥爭成為不可避免的。我們在三個月以前認為是德國整個革命進程的歷史必然結果的東西，“科倫日報”卻以混亂、模糊的預言形式把它重新提出來，當做江湖術士對即將於 3 月 5 日舉行的選舉的結果之預測。這些混亂、模糊的預言竟被當做一種發現，立即作為標上△記號的浮夸傲慢的社論推薦給善意的讀者。天真的“科倫女人”啊！

卡·馬克思寫於 1849 年 2 月 10 日
載於 1849 年 2 月 11 日“新萊茵報”
第 219 號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拉 薩 尔

一

科倫 2 月 10 日。昨天我們曾經答应^① 回头再談談拉薩尔問題。拉薩尔被关在杜塞尔多夫監獄已經十一个星期，可是直到現在才結束了对一些簡單的、誰也不会否认的事实的偵查，直到現在高等法院才作出决定。事情竟被輕而易举地弄到这种地步：如果高等法院和檢察院想使用最高限度的法定期限，那它們就可以把这个案子拖到杜塞尔多夫陪審法庭下次开庭期結束的时候，从而使囚徒再享受三个月的审前羈押！

这算是什么审前羈押呵！

大家知道，不久以前科倫各民主团体的代表团向总檢察官尼科洛維烏斯呈递了一份由数千公民签名的請願书，其中提出了下列請求：（1）加速对关在杜塞尔多夫獄中的政治犯案件的偵查；（2）在审前羈押期間对待政治犯要有礼貌。尼科洛維烏斯先生答应尽可能注意这些合理的要求。

但是，下面就有一个例子，說明杜塞尔多夫監獄怎样对待总檢察官先生，怎样对待法律以及最普通的礼貌。

1 月 5 日，一个獄吏粗暴地把拉薩尔辱罵了一頓，末了还跑到

^① 見本卷第 308 頁。——編者注

典獄长那里去訴苦，硬說拉薩尔辱罵了他。

过了一小时，典獄长在法院偵查員陪同下来到拉薩尔的牢房，一进门也不向拉薩尔打打招呼，就为刚才的事情对他进行申斥。拉薩尔打断了他的話，指出有教养的人进到别人房間时是要打招呼的，他认为自己有权要求典獄长遵守这个礼节。

典獄长先生认为这太过分了。于是就气势汹汹地向拉薩尔逼近，一直把他挤到窗口，并且揮动拳头，放开嗓門厉声喊道：

“听着，你在这里是**我的**一个犯人，仅仅是一个犯人；你必须服从監獄規則，如果你不願意，那我就下令把你关进**禁閉室**，可能你还要受到**更坏**的待遇！”

拉薩尔再也忍不住了，他向典獄长声明，典獄长沒有任何权利根据監獄規則来处罚他，因为他是未决犯；叫喊是沒有用的，也证明不了什么；虽然这所房子是監獄，但**这里**总还是**他的**房間，如果典獄长（用手指着他）到**他这里**来，那必須向他打招呼。

这时典獄长完全失去了理智。他冲到拉薩尔面前，向他揮动着手臂喊道：

“不准乱指！不然我就馬上給你一个耳光，让你……”

拉薩尔立即請法院偵查員做这件聞所未聞的无礼举动的見证人，并且請求他保护。法院偵查員劝典獄长冷靜一点，但是典獄长还是三番五次地嚷着要打拉薩尔的耳光，后来好不容易才平靜下来。

在发生了这样一件有教益的事件以后，拉薩尔就要求国家檢察官馮·阿蒙对典獄长莫萊特先生提出控訴。的确，典獄长的暴行不仅是粗魯的举动和严重的侮辱，同时也是越职。

馮·阿蒙先生回答說，对于獄吏的越职問題，不經行政当局預先批准不能提出控訴。他建議拉薩尔去找政府，同时还引证了

1844年的某个旧敕令。

所謂欽定宪法的第九十五条宣称：

“对因越职而違反法律之文武官員提出控訴，不需經当局預先批准。”

这同一宪法的第一〇八条又明文規定，廢除一切与該条款相矛盾的法律。但是拉薩尔向国家檢察官提出第九十五条也无济于事，——馮·阿蒙先生固执地坚持他对权限爭議問題的看法，并且临走的时候向拉薩尔提出一个宝贵意見：“您大概忘記了，您是一个未决犯！”

我們說，这个所謂宪法仅仅是用来对付我們的，完全不是用来对付官老爷的，难道說得不对嗎？

总之，用打耳光、关禁閉和**体罰**（因为这正是莫萊特先生留作后备的那种“更坏的待遇”）来威胁，——这就是向代表团許諾的对待政治犯“要有礼貌”！

順便指出，根据法律，拘留獄**一定要同徒刑獄分开**，拘留獄的囚犯所遵守的制度应当同刑事犯所遵守的制度完全不同。但是杜塞尔多夫沒有專門的拘留獄，于是未决犯在被非法关进徒刑獄以后，还必须遵守为**已被判决的囚犯所規定的獄規**，也可以被关进禁閉室和受到体罰！为了对拉薩尔达到这个值得贊揚的目的，莫萊特先生召集了一次紀律委员会會議，这次會議应当使拉薩尔先生获得这些享受。但是看来偵查員和檢察官先生还能冷靜地对待这一切，或者是躲到权限爭議問題的后面去了！

拉薩尔已經向总檢察官发出呼吁。我們也把事情的全部真相公諸于世，希望輿論界支持在押人的申訴。

此外，我們听說，对拉薩尔的单独囚禁終於取消了，他現在至少是同康塔多尔关在一个牢房里。

二

科倫 3 月 3 日。大家都还記得这样一个轰动一时的案件：一个不幸的少女因被控**杀害婴儿**而被送交**陪审法庭**。陪审員判她无罪。接着她又因**隐瞒怀孕**而被送到**違警法庭**。在公众的哄笑声中，高等法院关于送交法庭审判的决定只好宣布无效。

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正在走着它的光荣的先驅者的老路。

由于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 2 月 22 日的决定，**拉薩尔、康塔多尔和韦耶尔斯**以发表叛逆性的言論的罪名被送交**陪审法庭**。对于这一点我們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但是同一个高等法院却又作出决定，再次把**拉薩尔**交給**違警法庭**进行审判，理由是他在**諾伊斯的演說**²⁰⁵中号召“**以暴力反抗官員**”（构成第二〇九、二一七条所指的罪行）。

我們先来核对一下事实。

在那些构成把拉薩尔送交陪审法庭审判的理由的情节中，同样也有这篇在**諾伊斯**发表的演說。高等法院指出，拉薩尔在这篇演說中“**号召武装反对政府当局**”（构成第八十七、九十一、一〇二各条所指的罪行）。

可見，为了同一篇演說，拉薩尔既被送交陪审法庭审判，又被送交**違警法庭**审判。如果陪审員把他开釋，他还要受到**違警法庭**的审判。如果**違警法庭**不审判他，那他无论如何还要受到审前羈押，直到**違警法庭**判他无罪为止。总之，不論陪审員如何判决，拉

薩爾总是得不到自由的，而普魯士國家也就得救了。

我們再說一遍，**为了同一篇演說**，拉薩爾既被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送交陪審法庭審判，又被送交違警法庭審判。事實原來是**同一个**。

但問題不仅仅在这里。

如果我在演說中“号召武装反对政府当局”，难道这不就是說我在号召“以暴力反抗官員”嗎？要知道，政府当局的**存在**正是通过它的**官員、軍隊、行政機關、法官**表現出來的。如果撇开政府当局的这个肉体，它就只不过是一个影子，一个想像，一个虛名。不以暴力反抗它的官員，就不可能推翻政府。如果我在演說中号召**革命**，那末我用不着再加上一句：“**你們要用暴力反抗官員**”。如果照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的办法去做，那末**凡是**因为唆使推翻政府而根据第八十七、一〇二条被送交陪審法庭審判的人，以后都必須一律根据第二〇九、二一七条再送交違警法庭審判。

难道在 Code d'instruction criminelle²⁰⁶ 中不是已經有一条作了下面的規定嗎？

«Toute personne acquittée légalement ne pourra plus être reprise ni accusée à raison du même délit»？

翻譯过来意思就是：

“凡依法宣判无罪者，不得因同一違法行为再次送交法庭審判或对他起訴。”

但是，不論是在陪審員宣判无罪**之后**因同一違法行为把我送交違警法庭審判，还是**从一开始**就宣布陪審員的判決无效，就是說，从一开始（1）就一方面把我送交陪審法庭審判，（2）同时又因同一違法行为把我送交違警法庭審判，——不管怎样，这絲毫也不

能改变事情的本质。

我們要問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是不是过分的爱国热忱使它的司法视觉迟鈍了？我們要問法院偵查員艾貝迈尔，他对拉薩尔是不是完全不怀私仇？最后，我們要問杜塞尔多夫檢察机关的某位官員，他是不是說过：“宣判康塔多尔和韦耶尔斯无罪对我们沒有多大关系，但是拉薩尔我們无论如何要抓在自己手里。”

我們怀疑拉薩尔是否也願意长期被載入 *par excellence* [道地的]“国家臣民”的清册中。

拉薩尔一案对我们說来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关系到我們的一位同胞、一位党的朋友的自由和权利。其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这里涉及这样一个問題：**陪审法庭处理政治犯罪的特权**是否要同一切所謂**三月成果**遭到同样的命运，領取薪俸的法官今后是否还可以把不領取薪俸的陪审法庭任意貶到空头法庭的地位，就是說，如果陪审员认为某一事实不是政治犯罪或違法行为，那他們是否可以把这一案件立即作为普通的違法行为交給違警法庭审理。究竟为什么把这些罪行和違法行为从普通法庭职权范圍中划出来交給陪审法庭呢？显然是人們沒有考虑到領取薪俸的法官們的廉洁和奉公守法，而設想他們在政治审判案中会保护任何东西，只是不保护被告的利益。

关于拉薩尔問題，我們以后还要談。^①

卡·馬克思写于 1849 年 2 月 10 日
和 3 月 3 日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載于 1849 年 2 月 11 日和 3 月 4 日
“新萊茵报”第 219 和 237 号

① 見本卷第 531 頁。——編者注

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²⁰⁷

一

科倫 2 月 14 日。我們一再指出，在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以後出現的甜蜜幻想，例如幻想達到各族人民的普遍友愛，建立歐洲聯邦共和國和實現永久和平，實質上只是掩蓋了當時思想界的領導人物們極端的張惶失措和庸碌無能。這些人看不到或者不願看到，為了捍衛革命需要做些什麼；他們不能或者不想採取任何真正革命的措施；一些人的故步自封和另一些人的反革命陰謀——這一切就使得人民僅僅得到的只是一些溫情脈脈的漂亮話，而不是採取革命行動。夸夸其談的惡棍拉馬丁，就是這個在詩意盎然的美麗辭藻和華而不實的悅耳言詞掩蓋下背叛人民的時代的典型人物。

進行過革命的各族人民都懂得，他們當時由於輕信浮華的言詞和虛夸的保證，付出了多么大的代價。結果不是革命的安全得到保障，而是到處成立了暗中破壞革命的反動議會；不是實現了過去在街壘上所許下的諾言，而是反革命在那不勒斯、巴黎、維也納和柏林得勝，米蘭的陷落和反對匈牙利的戰爭發生；不是各族人民結成兄弟同盟，而是“神聖同盟”在英國和俄國的庇護下重新恢復。那些在 4 月和 5 月里還興高采烈地歡迎這些浮華言詞的人，現在只好滿面羞愧地回味他們當時怎樣受了這些傻瓜和惡棍的欺

騙了。

沉痛的經驗使人們認識到，要實現“歐洲各族人民的兄弟同盟”，不能依靠空洞的言詞和美好的意願，而必須通過徹底的革命和流血的鬥爭；問題不在於歐洲各族人民在一個共和國的旗幟下結成同盟，而在於革命的各族人民結成反對反革命民族的同盟，這種同盟不是在紙上，而只有在戰場上才能實現。

這種沉痛的、然而必要的經驗使整個西歐不再相信拉馬丁的漂亮話了。相反地，在東歐却還有一些貌似民主和革命的派別，繼續做這種漂亮話和柔情蜜意的應聲蟲，繼續宣揚關於歐洲各族人民友愛的福音。

這些派別（我們撇開某些愚昧無知的德國空想家如阿·盧格先生等等不談）就是各斯拉夫民族的民主泛斯拉夫主義者。

我們看到的民主泛斯拉夫主義的綱領，是一本小冊子：“對斯拉夫人的號召。俄國愛國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會代表米哈伊爾·巴枯寧著”1848年克頓版²⁰⁸。

巴枯寧是我們的朋友。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批評他的小冊子。

我們就來看看，巴枯寧怎樣在他的呼喚書中一開頭就陷入了去年3月和4月的幻想：

“革命生活的第一個特征，就是高呼憎恨舊的壓迫，高呼同情和熱愛一切被壓迫民族。各族人民……終於體驗到了舊的外交所帶給人類的恥辱，並且已經認識到，只要歐洲還有一個民族受着壓迫，各民族的幸福安寧就無法得到保障…… 打倒壓迫者！——響起了一致的呼聲。光榮歸於被壓迫的人們，歸於波蘭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各族人民！不應當再進行侵略戰爭，但必須把最後一次戰爭，即爭取各族人民徹底解放的光榮的革命鬥爭進行到底！廢除各種暴君會議基於所謂歷史的、地理的、貿易的和戰略的考慮強行劃定的各種人為的界綫！除了各族人民本身的主權意志根據其民族特點所確定的

界綫，即根据正义和民主的精神划定的自然界綫以外，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界綫。这就是各族人民一致的呼声。”(第6頁和第7頁)

从这段話中我們已經完全可以重新看到革命最初几个月中的那种一味耽于幻想的狂热。这里一个字也沒有提到实际存在的妨碍这种普遍解放的障碍，一个字也沒有提到其差别如此之大的各个文明发展阶段，以及由这一点所决定的各族人民的不同政治要求。“自由”一詞代替了这一切。这里根本沒有談到现实，即使不得不談一談的时候，现实也被描繪成为由那些“暴君會議”和“外交家們”任意制定的某种絕對不中用的东西。书中簡單地把絕對不能違反的、无条件地要求“自由”的冒牌的人民意志同这种可憎的现实对立起来。

我們已經看到，它們中間誰更有力。冒牌的人民意志所以如此可耻地受到欺騙，正是因为它輕信那种脫离实际存在的关系的如此荒誕的抽象概念。

“革命已經以其充分的权力宣布解散那些专制国家，如普魯士邦……奥地利……土耳其帝国……和暴君們的最后希望——俄罗斯帝国……革命已經宣布这一切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欧洲共和国总联邦。”(第8頁)

在这里，在西方，我們真正應該感到奇怪的是，当这一切美好計劃剛一付諸实现就遭到了失敗的时候，居然还有人认为这些計劃是某种值得贊揚的偉大的东西。要知道，糟糕的是，正是由于：革命虽“以其充分的权力宣布解散那些专制国家”，但同时它又“以其充分的权力”根本不去动手实现自己的法令。

当时召开了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完全贊成这些幻想。請听：

“我們亲身体驗到我們有共同的历史〈？〉和血統关系。我們宣誓，决不

容許別人再把我們的命運分開。我們詛咒那個長期使我們成為它的犧牲品的政策，我們自己給自己確立了完全獨立的权利，并莊嚴地宣誓，一切斯拉夫民族今後都應該獲得這種獨立。我們承認波希米亞^①和莫拉維亞的獨立……我們向德國人民，向民主的德國伸出友誼之手。我們代表我們那些居住在匈牙利的人，向馬扎爾人，向我們種族的凶惡敵人建議結成兄弟同盟……在我們的解放同盟中，我們也沒有忘記我們那些呻吟在土耳其人壓迫之下的兄弟。我們莊嚴地詛咒那個曾經三度瓜分波蘭的罪惡政策……我們說出了這一切，我們要同各民族的一切民主主義者〈？〉一起要求：實現各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第10頁）

民主泛斯拉夫主義居然到現在還提出這些要求：

“當時我們對我們的事業充滿信心……正義和人道完全在我們這一邊，而在我們敵人那一邊的只是違法 and 野蠻。這不是我們所醉心的那種虛無飄渺的幻想，而是唯一正確和必要的政策即革命政策的思想。”

“正義”、“人道”、“自由”、“平等”、“博愛”、“獨立”——直到現在除了這些或多或少屬於道德範疇的字眼外，我們在泛斯拉夫主義的宣言中沒有找到任何別的東西。這些字眼固然很好聽，但在歷史和政治問題上却什麼也證明不了。“正義”、“人道”、“自由”等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這種或那種要求，但是，如果某種事情無法實現，那它實際上就不會發生，因此無論如何它只能是一種“虛無飄渺的幻想”。布拉格代表大會以後許多斯拉夫人所起的作用，本來應當打破泛斯拉夫主義者的幻想；他們本來應當認識到，用一切善良願望和美好幻想絲毫也不能左右鐵的現實，他們的政策同法蘭西共和國的政策一樣，很少能說是“革命的政策”。但是，他們直到現在，即1849年1月，還向我們端出那一套陳詞濫調，殊不知由於

① 即捷克。——編者注

实行了血腥的反革命，西欧已对这一套陈词滥调的内容绝望了！

关于建立“各族人民的普遍的兄弟同盟”和划定“各族人民本身的主权意志根据其民族特点所确定的界綫”問題，我們再說一句話。美国和墨西哥是两个共和国；这两国的人民都是自主的。

根据道德的理論，这两个共和国本来应当是“兄弟的”和“結成联邦的”国家，但是，由于得克薩斯問題，在它們之間爆发了战争；美国人民的“主权意志”依靠美国志願軍的勇敢，从“地理的、貿易的和战略的考虑”出发，把自然确定的边界綫向南推移了几百英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次战争虽然有力地打击了巴枯宁以“正义和人道”为依据的理論，但它完全是为了文明的利益进行的。巴枯宁是否要譴責美国人进行这种“侵略战争”呢？富饒的加利福尼亚从对它毫无作为的懶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摆脱出来，这有什么害处呢？如果精力充沛的美国佬迅速地开发那里的金砂矿床，增加流通手段，在短時間內在太平洋沿岸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稠密的人口，开展广泛的貿易，建立許多大城市，开辟輪船交通，鋪設从紐約到旧金山的铁路，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触現代文明，在历史上第三次为世界貿易开辟新的方向，那有什么不好呢？当然，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薩斯的某些西班牙人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遭到侵害；“正义”和其他道德原則也許会受到一些破坏；但是同那些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比較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們要順便指出，这种不顾各族人民的历史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而硬要把它們联合起来建立各族人民普遍的兄弟同盟的理論，早在革命前很久就受到了“新萊茵报”編輯們的批評，而且当时批評的是这些編輯的好友——英国和法国的民主主义者。这可以在当时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民主报刊上找到证明。²⁰⁹

至于专门谈到泛斯拉夫主义，我们在“新莱茵报”第194号^①上已经指出，如果撇开民主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真诚的自我欺騙不谈，泛斯拉夫主义的目的实际上无非是要给那些在历史、文学、政治、贸易和工业方面都依附于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零散的奥地利斯拉夫人一个据点，这个据点一方面是俄国，另一方面是由斯拉夫人的多数所统治的、依附于俄国的奥地利联合君主国。我们已经论证过，那些几百年来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而被历史拖着走的小民族，必然要成为反革命的民族，而且它们在1848年革命中所采取的全部立场的确都是反革命的立场。既然民主泛斯拉夫主义的宣言不加区别地要求一切斯拉夫人都获得独立，我们应该再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指出，对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民主主义者来说，政治上的浪漫和温情是可以原谅的。除了波兰人以外（由于很明显的理由，波兰人不是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些人全都属于这样的民族，这些民族或者像南方斯拉夫人一样，由于其全部历史状况必然是反革命的民族，或者像俄罗斯人一样，距离革命还很远，因此它们至少在目前还是反革命的。这些由于在国外所受的教育而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派别，企图把自己的民主主义观点同自己的民族感情调和起来，大家知道，这种感情在斯拉夫人身上表现得非常强烈；因为现实世界，他们本国的实际状况不能为这种调和提供任何根据，或者只能提供一些假想的根据，所以除了彼岸的“梦想的空中王国”²¹⁰、美好愿望的世界，幻想的政治以外，他们就一无所有了。如果克罗地亚人、潘都尔兵和哥萨克人是欧洲民主的先鋒队，

^① 見本卷第200—204頁。——編者注

如果西伯利亚共和国大使在巴黎呈递国书，那該多好啊！当然，这是美妙的前景；但是，就連最激烈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也不要要求欧洲民主必須等待这种前景的实现，目前恰好正是宣言专门为其要求独立的那些民族，是民主的特別凶恶的敌人。

我們重复一遍，除了波兰人、俄罗斯人——充其量还有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以外，沒有一个斯拉夫民族是有前途的，原因很简单：其他一切斯拉夫人都沒有具备为独立和維持生命力所必需的历史、地理、政治和工业的条件。

那些从来沒有自己的历史，从达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即最低阶段的时候起就陷于異族統治之下，或者只是由于異族的压迫才被**强迫**提高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民族，是沒有生命力的，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什么独立的。

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命运正是这样。捷克人（我們把莫拉維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也算在內，尽管他們的語言和历史有所不同）从来沒有自己的历史。从查理大帝时代起，波希米亚就并入了德国。有一个短时期，捷克民族曾經获得了解放，建立了大莫拉維亚帝国，但是很快又被征服了，在五百年中它一直像皮球一样，在德国、匈牙利和波兰之間被抛来抛去。此后，波希米亚和莫拉維亚最后并入了德国，斯洛伐克地区則留給了匈牙利。这个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民族”还要要求独立嗎？

所謂南方斯拉夫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伊利里亚的斯洛文尼亚人、达尔馬威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紹克人²¹¹的历史何在呢？从十一世紀开始，他們就連政治独立的最后一点影子也丧失了，他們分別受到德国人、威尼斯人和馬扎尔人的統治。現在竟有人想把这些破烂的碎片拼凑成一个坚固、独立并且有生命力的民族！

不仅如此。如果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像波兰人、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一样，是一个紧密的实体，如果它們能够联合成一个拥有一千二百万到两千万人口的国家，那末他們的要求倒会有一些认真的性质。但事实上情况恰好相反。德国人和馬扎尔人已經像一个大楔子楔入他們中間，直抵喀尔巴阡山的最边缘，差不多已到达黑海；他們用一条寬达六十到八十英里的广闊地带把捷克人、莫拉維亞人和斯洛伐克人同南方斯拉夫人隔开。居住在这个地带以北的五百五十万斯拉夫人，同居住在这个地带以南的五百五十万斯拉夫人，被一个由于历史和必然性的緣故而成为同盟者的一千万到一千一百万德国人和馬扎尔人的紧密实体分开了。

但是，为什么五百五十万捷克人、莫拉維亞人和斯洛伐克人不能建立一个国家，另外的五百五十万南方斯拉夫人也不能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一起建立另一个国家呢？

請随便拿一張精确的語言分布图来，看一看捷克人和在語言上与捷克人相近的邻族的分布情形。他們像楔子一样插在德国中間，但两边都受到德国人的压迫和排挤。波希米亚三分之一的居民讲德語；在波希米亚捷克人和德国人的比例是34比17。但是正是捷克人应当成为計划中的斯拉夫国家的核心，因为莫拉維亞人也同德国人混杂得很厉害，而斯洛伐克人則同德国人和馬扎尔人混杂在一起，在民族关系上他們已經完全衰落了。如果到头来这个国家仍然受德国城市资产阶级的統治，那这算是什麼斯拉夫国家呢？！

南方斯拉夫人的情况也是如此。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把德国和匈牙利同亚得利亚海隔开，但德国和匈牙利出于“地理上和貿易上的考虑”，是不能让别人把它們同亚得利亚海隔开的。誠

然，这种地理上和貿易上的考虑对于巴枯宁的幻想来说并不是一种障碍，然而这种考虑毕竟是存在的，并且对于德国和匈牙利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像从但澤到里加的波罗的海海岸对于波兰一样。在问题关系到各大民族的存在和其一切资源的自由发展的地方，悲天憫人地对某些分散在各个不同地方的德国人或斯拉夫人表示关切，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何况这些南方斯拉夫人到处都同德国人、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混杂起来了，在这里，随便翻开語言分布图就会看出，计划中的南方斯拉夫国家会变成許多零零碎碎的小块，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整个国家也要落入的里雅斯特、阜姆、薩拉的意大利资产者和阿格拉姆、萊巴赫、卡尔施塔特、澤姆林、潘切沃、威斯基尔欣^①的德国资产者手中！

但是，奥地利的南方斯拉夫人不能并入到塞爾維亞人，波斯尼亞人、摩爾拉克人²¹²和保加利亞人中去嗎？当然，如果除了上述的困难以外，奥地利边疆居民对居住在沙瓦河和烏納河东岸的土耳其斯拉夫人沒有世仇的話，这样做是可能的。但是，尽管他們属于同一个族系，这些許多世紀以来一直把对方看作騙子手和土匪的人彼此之間的仇恨，甚至比斯拉夫人和馬扎尔人之間的仇恨还要大得多。

其实，如果能够帮助奥地利的斯拉夫人获得他們的所謂“权利”，德国人和馬扎尔人的处境会十分令人愜意！那样一来，在西里西亞和奥地利之間，会插入一个独立的波希米亞-莫拉維亞国家；奥地利和施梯里亞同它們通向亞得利亞海和地中海的天然出口的联系就会被“南方斯拉夫共和国”切断；德国的东部就会像被老鼠

^① 克羅地亞稱作：里耶卡、薩達爾、薩格勒布；斯洛文尼亞稱作：柳布梁納；克羅地亞稱作：卡爾洛瓦茨；塞爾維亞稱作：澤蒙、潘切沃、貝拉茨爾克瓦。——編者注

啃碎了的面包一样，被弄得支离破碎！这一切就是对德国人的报
答，因为德国人曾經努力使頑固的捷克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开化起
来，在他們那里建立貿易和工业以及多少还过得去的农业和文化！

然而，正是这种以开化为名而加在斯拉夫人身上的羈絆，构成
了德国人和馬扎尔人的滔天罪行！請大家听听下面的話吧：

“你們的憤怒是正当的，你們有权要求对那种万恶的德国政策进行报复，
因为这种政策只想使你們遭到灭亡，使你們世世代代遭受奴役”……（第 5
頁）

“……馬扎尔人，我們种族的凶恶敌人，一共才不过四百万人，他們却吹
噓要把羈絆加到八百万斯拉夫人的身上……”（第 9 頁）

“我知道馬扎尔人对我們的斯拉夫弟兄干下的一切坏事，我知道他們对
我們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我知道他們如何鄙視我們的語言，如何踐踏我們
的独立。”（第 30 頁）

德国人和馬扎尔人对斯拉夫民族所犯下的駭人听闻的滔天罪
行究竟是什么呢？我們这里不談瓜分波兰的事情，这个問題与此
无关，我們只談据說是斯拉夫人所蒙受的“世世代代的不公平待
遇”。

德国人在北方从斯拉夫人手中重新夺回了起初屬于德国而后
来屬于斯拉夫人的由易北河至瓦尔塔河的那片地区；所以要夺取
这片地区，是由于从瓜分卡罗林君主国而产生的“地理上和战略上
的考虑”。这些斯拉夫地区已經完全德意志化；这已是既定事实，
而且已經无法挽回，除非泛斯拉夫主义者能够找到已經消亡了的
索布語、温德語和奥博德里特語，并把这些語言强加于莱比錫、柏
林和施特廷^①的居民。但上述夺取行为是有利于文明的，这一点至

① 波兰称作：茲杰辛。——編者注

今还没有人否认过。

在南方，当德国人发现各斯拉夫部族的时候，它们都已经零零散散。这是那些曾经占据过后来为马扎尔人所占领的地区的非斯拉夫族的阿瓦尔人所干的事情。德国人强迫这些斯拉夫人纳贡，并同他们进行了多次的战争。德国人也同阿瓦尔人和马扎尔人进行了这样的战争，结果从他们手中夺取了由恩斯河至莱达河整个地区。德国人在这里强迫他们德意志化，而各斯拉夫地区的德意志化过程则和平得多，是通过移民和比较发达的民族影响比较不发达的民族来实现的。德国的工业、德国的贸易和德国的文化自然也把德国的语言带到了这些地区。至于说到“压迫”，那末斯拉夫人所受到的德国人的压迫，并不比德国人民大众所受的压迫更重。

至于说到马扎尔人，那末要知道，在匈牙利住着大量的德国人，但是马扎尔人从来没有理由抱怨“万恶的德国政策”，虽然他们总共只有“约四百万人”！如果说“八百万斯拉夫人”在八个世纪中一直被迫忍受四百万马扎尔人所加在他们身上的羁绊，那末，单单这一点便能充分证明：究竟谁具有更大的生命力和更富有精力——是人数众多的斯拉夫人呢，还是为数不多的马扎尔人！

当然，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滔天“罪行”在于，他们妨碍了这一千二百万斯拉夫人受土耳其人同化！要不是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把这些在历史上起了如此微小的作用的零散的小民族凑在一起，并领导他们去同穆罕默德和苏雷曼的军队作战，要不是他们的这些所谓“压迫者”决定了为保护这些弱小民族而进行的各次战役的结局，那末，这些民族会落到什么地步呢！直到今天还受着“七十万奥斯曼人蹂躏”的“一千二百万斯拉夫人、瓦拉几亚人和希腊人”

的命运不是非常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嗎？（第8頁）

最后，在欧洲几个大君主国一般地说已經成了“历史的必要性”的时代，德国人和馬扎尔人把所有这些弱小民族联合成为一个大的国家，从而使这些民族能够参預历史的发展（否則他們光靠自己始終是无法过問历史的发展的），能否认为这是“罪行”和“万恶的政策”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难免踐踏几朵嬌嫩的民族鮮花。但是，沒有暴力，沒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如果亚历山大、凱撒和拿破侖也是一些像泛斯拉夫主义者現在为了維護其衰弱不堪的被保护人而要求的那种軟心腸人，那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而波斯人、賽尔特人和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羅馬帝国的居民在哪方面不如捷克人、奧古林人和奧地利边防軍馬队呢？

但是現在，由于工业、貿易和交通的长足进展，政治上的集中成了比当时即比十五和十六世紀更加迫切的要求。凡是还能集中的一切，都正在集中。正是現在，出現了泛斯拉夫主义者，他們要求我們“解放”这些已經半德意志化的斯拉夫人，要求我們消灭斯拉夫人的一切物质利益强加于这些斯拉夫人的集中。

一句話，德国人和馬扎尔人对上述斯拉夫人所犯下的“罪行”，原来是最好的、值得感激的行为，原来是我国人民和匈牙利人民在自己历史上可以夸耀的行为。

至于說到馬扎尔人，那末这里还必須特別指出，他們从革命开始的时候起，对待目空一切的克罗地亚人就过于迁就和軟弱。大家都知道，科苏特除了沒有让他們的代表在議會中用克罗地亚語发言以外，对他們作了一切可能的让步。唯一可以責备馬扎尔人的地方，就是他們对这个本性就是反革命的民族让步太多了。

二

科倫 2 月 15 日。昨天我們在文章的最后曾經指出，奧地利的斯拉夫人從來沒有過自己的歷史，在歷史、文學、政治、貿易和工業方面他們都依賴於德國人和馬扎爾人，他們部分地已經被德國人、馬扎爾人和意大利人同化了，一旦成立許多獨立國家，統治這些國家的也不會是他們，而是他們城市中的德國資產階級和意大利資產階級，最後，無論是匈牙利，還是德國，都不會容許割去和單獨成立這種沒有生命力的小的中間國家。

但是這一切也許還不會有決定意義。如果斯拉夫人在他們受壓迫的某一個時期開始新的革命歷史，那末他們僅用這一點就足以證明自己是有生命力的。從這個時候起，革命就會要求他們求得解放，而德國人和馬扎爾人的局部利益就會在歐洲革命的更重要的利益面前消失。

可是這種情形過去恰好一次也沒有發生。斯拉夫人——我們再一次提醒大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總是把波蘭人除外，——恰好是經常充當反革命的主要工具。他們在家里受壓迫，在外邊，在斯拉夫人影響所及的一切地方，他們卻是一切革命民族的壓迫者。

請不要反駁我們，說我們在這裡似乎是在維護德國人的民族偏見。德國、法國、比利時和英國的報紙上有事實為證，正是“新萊茵報”的編輯們，早在革命以前很久就最堅決地反對過德國人的民族局限性的一切表現²¹³。雖然和其他一些人不同，他們沒有人云亦云地對德國的一切亂加指責，但是他們歷史地指出和無情地揭

露了德国由于它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由于它的工业不发达，而在历史上无疑起过的那种卑鄙作用；他们向来承认，西方那些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英国人和法国人，同落后的德国人比较起来有许多长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有权不赞成斯拉夫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并像我们谴责我们自己的民族一样来严厉谴责其他民族。

直到现在人们总是说，**德国人**是全欧洲专制制度的雇佣兵。我们丝毫不打算否认德国人在 1792—1815 年反对法国革命的历次可耻战争中，在 1815 年以后压迫意大利和 1772 年以后压迫波兰的过程中所起的可耻作用；但是，谁在背后为德国人撑腰呢？谁利用他们来作自己的雇佣兵或先锋队呢？是英国和**俄国**。要知道，俄国人直到现在还在吹嘘，说他们用无数的军队决定了拿破仑的垮台。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有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在以自己的优势兵力把拿破仑由奥得河击退到巴黎的那些军队中，有四分之三是斯拉夫人，俄国的斯拉夫人或奥地利的斯拉夫人。

但是，德国人压迫过意大利人和波兰人呀！在瓜分波兰的时候，是一个斯拉夫国家和一个半斯拉夫国家彼此之间进行竞争；镇压考斯丘什科的军队大多数是由**斯拉夫人**组成的；吉比奇和帕斯凯维奇的军队完全是**斯拉夫军队**。在意大利，只有 *tedeschi* [德国人] 在一个长时期内享有压迫者的臭名。但是，再问一次，可以最好地被用来进行压迫、而其残暴行为都算在德国人身上的那些军队又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还是**斯拉夫人**。请到意大利去问一问，是谁镇压了米兰的革命。现在已经不会有人对你说，这是 *tedeschi* 干的，——自从 *tedeschi* 在维也纳进行了革命以后，人们已经不再仇视他们了，——人们会说，这是 *croati* [克罗地亚人] 干的。现在

意大利人用这个名称称呼一切奥地利军队，就是说，称呼他们最痛恨的一切：i croati！

但是，如果斯拉夫人无论在什么地方认真地参加了1848年的运动，如果他们迅速地加入到革命民族的行列中来，那这些责难就会是多余的、不公正的。只要大胆地进行一次民主革命的尝试，纵然遭到失败，也可以使各族人民忘却他们许多世纪的耻辱和怯懦，也可以使一个即使是深受鄙视的民族的名誉马上得到恢复。德国人在去年已经有过这种体验。但是当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马扎尔人举起革命旗帜的时候，斯拉夫人却像一个人一样全都站到反革命的旗帜下面了。走在前面的是很久以来一直对马扎尔人坚持其反革命的分离主义打算的南方斯拉夫人，其次是捷克人，他们后面是武装起来的、准备在决定关头投入战斗的俄国人。

大家知道，在意大利，马扎尔的骠骑兵曾经大批投向意大利人；在匈牙利，整个整个的意大利营听从匈牙利革命政府的指挥，并且现在还在匈牙利旗帜下作战；大家知道，德国兵团在维也纳是怎样对待人民的；甚至在加里西亚，这些兵团也决不是可靠的部队；大家知道，曾有大批波兰人，不分奥地利的波兰人，还是非奥地利的波兰人，在意大利、维也纳和匈牙利同奥地利的军队作过战，并且现在还在喀尔巴阡山地区作战；但是有谁听说过捷克军队和南方斯拉夫军队举行过起义来反对黑黄旗^①呢？

恰恰相反，至今大家所知道的只是：其基础已经动摇的奥地利，由于斯拉夫人的黑黄色狂热才得到了保全，暂时获得了巩固；正是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达尔马西亚人、捷克人、莫拉维亚人和卢西人给文迪施格雷茨和耶拉契奇提供了军队去镇压维也纳、

^① 即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编者注

克拉科夫、里沃夫和匈牙利的革命。現在我們又从巴枯宁那里得知，驅散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會的并不是德国人，而是加里西亞的、捷克的、斯洛伐克的斯拉夫人，而且“只是斯拉夫人”！（第33頁）

1848年革命強迫歐洲的一切民族表明態度：是擁護這次革命，還是反對這次革命。在一個月內，已經成熟到能夠進行革命的一切民族都進行了革命，而沒有成熟到能夠進行革命的一切民族都聯合起來反對革命。在那個時候，應當把東歐民族的混亂狀態弄清楚。當時的問題在於：哪個民族將在這裡發起革命，哪個民族將發揮最大的革命毅力，從而保證自己的未來。斯拉夫人仍然是那樣無聲無息，而忠實於自己以前的歷史作用的德國人和馬扎爾人則領導了運動。於是，斯拉夫人就完全投入了反革命的懷抱。

而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會的情況怎樣呢？

我們再重復一遍：奧地利斯拉夫人中間的所謂民主派，不是惡棍，就是空想家，而那些在本民族中不能為從國外輸入的思想找到基礎的幻想家又經常被那些惡棍牽着鼻子走。在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會上，空想家們占了上風。當貴族泛斯拉夫主義者圖恩伯爵和帕拉茨基等人覺得這種空想是一種危險東西的時候，他們就這些空想家出賣給了文迪施格雷茨和黑黃色反革命。這個為充滿了幻想的布拉格青年所維護的幻想家代表大會竟被本民族的士兵們所驅散，人們竟用一種斯拉夫人的軍事代表大會來和這個想入非非的斯拉夫人代表大會對抗，這是多么辛辣而難堪的諷刺啊！佔領了布拉格、維也納、里沃夫、克拉科夫、米蘭和布達佩斯的奧地利軍隊，才是真正的、積極的斯拉夫人代表大會！

斯拉夫人代表大會的結果，證明了這次代表大會的幻想是多么沒有根據和虛無飄渺。如果是在其他任何一個民族那里，轟擊

像布拉格这样一个城市的事件一定会引起对压迫者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可是捷克人怎么样呢？他们却去亲吻那些把他们抽打得遍体鳞伤的鞭子，他们却热烈地向他们的兄弟在它下面被处死刑、他们的妻子在它下面遭到凌辱的那面旗帜宣誓。布拉格的巷战对奥地利的民主泛斯拉夫主义者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们为了他们的可怜的“民族独立”的前途，竟把民主和革命出卖给奥地利君主国，出卖给这个正如巴枯宁本人在第二十九页上所說的“为在欧洲的心脏系统地实行专制制度效力”的“中心”。我们总有一天还要无情地报复斯拉夫人这种出卖革命的怯懦而卑鄙的行为。

这些叛徒们也终于开始明白，他们受了反革命的欺骗，根本谈不到“斯拉夫的奥地利”，以及“各民族平等的联邦国家”，更不用说为奥地利斯拉夫人建立民主的机关。耶拉契奇这个并不比奥地利斯拉夫人中的其他大多数民主主义者更坏的恶棍，痛心疾首地悔恨他这样被人利用了，而斯特拉蒂米洛维奇为了不再被人利用，宣布要公开起义反对奥地利。现在斯拉夫菩提树²¹⁴所属各团体又在到处反对政府，他们根据沉痛的經驗一天比一天深刻地认识到，他们上了别人的什么圈套。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他们无力在自己的祖国反对由他们自己改组过的奥地利军阀，他们遭到了被他们所出卖的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遺棄，他们遭到了革命的欧洲的遺棄，他们将被迫忍受那种在他们的帮助下加在维也纳人和马扎尔人身上的军事专制制度。“要服从皇帝，这样奥皇军队就不会像对待造反的马扎尔人一样来对待你们。”拉亚契奇总主教的这句话表明，在最近时期中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

波兰人的行动截然不同！八十年以来他们一直受压迫，受奴役，遭到破产，他们始终站在革命方面，并且宣布，波兰的革命化同

波兰的独立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巴黎、維也納、柏林，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波兰人都参加了历次革命和革命战争，不管是反对德国人、斯拉夫人、馬扎尔人，或者即使是反对波兰人都是一样。波兰人是沒有任何泛斯拉夫主义欲望的唯一斯拉夫民族。他們能够成为这样的民族，是有充分理由的：压迫他們的，主要是他們自己的所謂斯拉夫兄弟，而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仇恨甚至超过对德国人的仇恨——他們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正是因为波兰的解放同革命密切地联系着，正是因为“波兰人”和“革命者”两个詞成了同义語，波兰人就赢得了全欧洲的同情，保证了他們民族的复兴，而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俄国人却受到全欧洲的憎恨，整个西方都用流血的革命战争来反对他們。

奥地利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們当然明白：他們的願望，一般說来凡是可以实现，都已經在俄国保护下重新恢复起来的“奥地利联合君主国”中实现了。如果奥地利瓦解了，那末等待着他們的前途将是德国人和馬扎尔人的革命恐怖主义，而决不会像他們所想像的那样，是在奥地利統治下受奴役的一切民族的解放。因此，他們只有指望保全奥地利，而且为了使斯拉夫人在这个国家中保持多数，指望加里西亚仍然屬於奥地利。可見，泛斯拉夫主义的利益是同波兰的复兴直接相矛盾的，因为沒有加里西亚的波兰，不是从波罗的海一直伸展到喀尔巴阡山的波兰，就不是波兰。但是，正因为如此，“斯拉夫的奥地利”是极其虛无飄渺的幻想，因为正像奥地利直到最近几个月的全部历史所证明的，如果沒有德国人和馬扎尔人的統治、沒有維也納和布达佩斯这两个中心，奥地利就要重新瓦解。所以，泛斯拉夫主义的实现只能是俄国对奥地利的庇护。因此，公开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拚命保全“联合君主国”，是完全正

确的；这是唯一能够挽救一点什么东西的手段。但是所谓的民主泛斯拉夫主义者面临着一种极其困难的抉择：他们或者是放弃革命，借助于“联合君主国”至少部分地挽救民族特性，或者是放弃民族特性，通过瓦解“联合君主国”的办法挽救革命。在那个时刻，东欧革命的命运，是取决于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立场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紧要关头，由于自己微不足道的民族希望，把革命出卖给了彼得堡和奥里缪茨！

如果德国的民主派在它的纲领中把归还亚尔萨斯、洛林和在一切方面都倾向于法国的比利时的要求列入头条，借口说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德国人，那我们将怎么说呢？如果德国的民主派打算成立泛日耳曼德国—丹麦—瑞典—英国—荷兰同盟，以便“解放”说德语的一切国家，那他们会是多么令人可笑呵！幸运的是，德国民主派的发展已经超过了这些幻想。1817年和1830年，德国的大学生曾经醉心于这类反动的幻想，而现在全德国都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只是在德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这类虚无缥缈的幻想之后，德国的革命才有了可能，德国人民才开始起了一些作用。

但是，泛斯拉夫主义的幼稚性和反动性并不比泛日耳曼主义少些。当你们读到去年春季的布拉格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历史时，你们会感到，你们被抛回三十年以前去了：三色饰带、古式服装、古斯拉夫的祈禱仪式、原始森林时代及其风俗的完全复原；“同盟会”是真正的德国大学生联合会²¹⁵，斯拉夫人代表大会是瓦特堡纪念大会²¹⁶的再版；还是那一套话，还是那些幻想，而且还是那首悲伤的歌曲：“我们建筑了美丽的大厦”²¹⁷等等。谁想读一下这首译成了斯拉夫散文的著名歌曲，就让他读一读巴枯宁的小册子。

德国大学生联合会的会员们曾经长期受着强烈的反革命情

緒、极端的仇法情緒和最狹隘的民族情感的支配，后来他們全都成了他們仿佛曾經醉心过的事业的叛徒。和这些人一样，只是更迅速些罢了（因为 1848 年是革命的年度），民主泛斯拉夫主义者的民主外貌很快就变成了狂热地仇恨德国人和馬扎尔人的情緒，变成了間接反对复兴波兰（留博米尔斯基）和直接参加反革命的行动。

如果个别誠实的斯拉夫民主主义者現在号召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参加革命，把奥地利君主国当作主要的敌人，甚至为了革命的利益同馬扎尔人一起前进，那末这会使我們想到这样一件事情：一只母鸡，絕望地在池塘边跑来跑去，看样子是它所孵出来的那些小鴨突然离开了它，跑到它所不能跟去的另一个天地去了。

但是，我們不要沉溺于幻想。一切泛斯拉夫主义者都认为，民族特性，即虛构的全体斯拉夫人的民族特性，是高于革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同意参加革命，可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允許他們不顾最迫切的物质需要，把一切斯拉夫人毫无例外地联合成为一些独立的斯拉夫国家。如果我們德国人也提出这种荒誕无稽的条件，那我們在三月里不知要走到哪里去了！但是革命是不允許向它提出任何条件的。或者做一个革命者，接受革命的一切后果，不管这种后果是什么，或者投入反革命的怀抱，有朝一日会不知不觉地（也許是事与願違地）发现自己同尼古拉和文迪施格雷茨处在同一个陣营中。

我們和馬扎尔人應該保障奥地利斯拉夫人的独立，——巴枯宁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像卢格那种类型的人真的会私下对他許下这种諾言。他們竟要求我們和欧洲的其他革命民族保证反革命势力可以直接在我們的大門口肆无忌惮地存在，保证他們有策划阴谋和武装起来反对革命的自由权利；我們应当在德国的中心建立一个反革命的捷克国家，我們应当在俄国楔入德国、波兰和匈牙利

的、設在易北河、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地区的前哨部队的援助下粉碎德国、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力量！

我們不打算这样做。对于那些以最反革命的民族的名义向我們所說的关于博爱的悲天憫人的漂亮話，我們的回答是：恨俄国人，过去是現在仍然是德国人的**首要的革命激情**；自从革命开始以来又加上了对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仇恨，只有对这些斯拉夫民族实行最坚决的恐怖主义，我們才能够同波兰人和馬扎尔人一道保障革命的安全。我們現在知道，革命的敌人集中在什么地方：他們集中在俄国和奥地利的斯拉夫地区；無論什么花言巧語或关于这些国家的渺茫的民主未来的指示，都不能阻止于我們把我們的敌人当作敌人来对待。

如果巴枯宁最后还要叫喊：

“的确，斯拉夫人不應該**喪失**任何东西，而應該**得胜**！的确，他應該生存下去！而且我們将会生存下去。只要有人對我們的哪怕是**最小一部分**权利提出異議，只要我們**共同机体上的一个器官**还同我們分开或者同我們脫离，我們將斗爭到底，我們將无情地进行**殊死的斗爭**，直到斯拉夫民族終于成为偉大的、自由的和独立的民族为止”，——

如果革命的泛斯拉夫主义认真地接受这些話，并在凡是涉及虛构的斯拉夫民族特性的地方都放棄革命，那末我們也就知道我們該怎么办了。

那时候就要斗爭，对出卖革命的斯拉夫民族“无情地进行殊死的斗爭”，进行歼灭战，实行无情的恐怖主义——而这样做不是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是为了革命的利益！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2 月 14—15 日
載于 1849 年 2 月 15 和 16 日“新萊茵报”
第 222 和 22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博德尔施文克及其伙伴 治理下的普魯士財政

科倫 2 月 16 日。3 月間“被免職的”大臣馮·博德尔施文克又打算从他幽居的洞穴里爬到地面上來。馮·博德尔施文克当选为第二議院的議員了。泰尔托夫农民联合会选得可真好啊！

民主派的报刊过去一直很少評論以前的大臣和以前的其他要人，現在却應該算一下这些先生們的旧賬。因此，我們想使我們的讀者和檢察官都回想一下同馮·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担任財政大臣时的活动有关的一些事实。

馮·博德尔施文克先生任財政大臣的时间是 1842 年春到 1844 年 5 月 3 日。

他很喜欢說，他如何如何克尽职守。他为人“坦率”。例如，他在 1842 年 10 月 24 日向等級委员会²¹⁸坦率地說：“普魯士財政應該是有限公开的，这种公开就是在法令汇编中每三年公布一次国家預算。”接着他解釋了普魯士国家預算是如何以及用什么方法編制的。普魯士国家預算“主要是根据編制預算以前三年中各主管部門結算的平均数字”編制的。

10 月 26 日，这同一个馮·博德尔施文克先生又坦率地說，近七年来的收入，增加了 5 500 000 塔勒以上，并且估計还会繼續增加（“国家报”第 306 和 307 号）。当时不得已而只好相信大臣先生的

話，因為“有限的公開”給普魯士的財政蒙上了一層難以看透的黑幕。現在至少應該懷疑一下財政大臣先生當時提出的保證是否可靠，因為有關以前財政管理方面的許多事情近來已經大白於世了。

法令匯編中公布的財政預算，應該以各主管部門的專門預算的平均數為根據，而各主管部門的專門預算又是以前三年的實際收入為根據而編制的。如果是這樣，那末在法令匯編中公布的每一份預算都應該包括接近於前三年實際收支的平均數字。如果不是這樣，那末照博德爾施文克先生自己的話說，預算就是**不正確的，是偽造的官方文件。**

1844年法令匯編（第96頁）²¹⁹中公布了一個由馮·博德爾施文克先生簽署的預算。這個預算的收入部分和支出部分都是57 677 194塔勒。這個數目理應表示前幾年收支的平均數。但是事實上，前幾年的收入和支出都多得多。後來政府把1840—1843年財政部門的統計材料²²⁰告訴了第一屆聯合議會的議員。

根據這個材料，數目是：

	收 入	支 出
1843年……	73 822 589 塔勒	79 102 787 塔勒
1842年……	73 876 338 塔勒	75 269 431 塔勒
1841年……	71 987 880 塔勒	74 185 443 塔勒
	219 686 807 塔勒	228 557 661 塔勒

因此，收入的實際平均數是73 228 935塔勒，支出的平均數是76 185 887塔勒。可見，馮·博德爾施文克先生所說的收支數字縮小了很多，即**每年隱瞞了15 551 741塔勒的收入和18 508 693塔勒的支出。**如果精確計算一下，這些數字當然是會有些出入的，因為各主管機關專門預算的三年平均數字，並不是做每一個預算

草案時都必須重算一遍，所以這種平均數字可以適用於 1841 年，甚至可以適用於 1838 年。但是，這也不會使隱瞞的數字降低很多，因為 1840 年的收入也是 71 059 475 塔勒，而支出甚至達到 77 165 022 塔勒。關於 1839 年和 1838 年，我們沒有官方的數字。然而因為在和平時期，在財政立法完全相同的條件下，國家收入的改變不是跳躍式的，而是漸進的，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認為，1838 年和 1839 年國家的收入至少有 70 000 000 塔勒。

可見，馮·博德爾施文克先生的預算，大概同他的許多先驅者和 1848 年以前的兩個後繼者的預算一樣，是偽造的。馮·博德爾施文克先生一定知道，他公布的东西是不正確的。國家財政的實際情況他不會不知道。這個數字同實際情況相差太大，以致布勒斯勞的廳長貝爾鳩斯和後來的畢洛夫-庫梅洛夫甚至根本沒有看見決算就公開指出這些數字是不確實的。自然，如果馮·博德爾施文克先生坦率地說出了真相，他對省議會委員會所作的報告和演說就會受到另一種待遇。在普魯士財政“有限公開”的情況下，他可以吹噓，而在完全公開的情況下，他只能等着丟臉和受責備。他洋洋得意地談到收入增加了 5 500 000 塔勒，但是關於自 1840 年至 1843 年**支出**超過收入 14 976 401 塔勒一事，却諱莫如深。雖然國家在這四年中不得不拿出 290 746 282 塔勒來，但是就連這筆巨大的款項也抵償不了為數 305 722 683 塔勒的龐雜支出。何況這種開支既不是為了戰爭，也不是為了在國外大力保衛本國工商業的利益，又不是為了建立艦隊，更不是為了大力振興國內的農業和手工業！豪華的王宮建築，官員中的寵臣，給容克地主和官僚的贈禮，以及軍隊的給養和各種檢兵典禮等等，這一切使國家付出了駭人聽聞的代價。但是，馮·博德爾施文克先生當然不是那種會

承認這一切的人。因此他就編造了假預算，想使人民相信，收入和支出都比實際情況要少得多。

但是編造假預算永遠都是一種冒險的事情。普魯士法律對這類瀆職行為規定要嚴加懲處。發表在法令匯編上的那些預算案，都是正式文件，這是沒有任何懷疑的。普魯士法雖然對國家官員編造假的正式文件沒有規定特別的處分，但是1831年6月3日的指令（參看康普茨“年鑑”第37卷第407頁²²¹）規定，應把這種行為視為欺騙和瀆職，並予以應得的處分。普魯士司法機關從那時起也就這個問題表示了意見。普魯士法關於瀆職行為作了如下的規定（第二篇第二〇章第三三三節²²²）：

“凡故意破壞有關所任職務之指示者，**應立即免職**；此外，應按其所犯罪行及造成損失之大小，處以相當罰款、監獄監禁或要塞監禁，並剝奪擔任公職之權利。”

免職、禁止擔任任何公職，此外，還要罰款和剝奪自由——**按照法律**，這就是一切編造假預算的人應有的下場。——因此，如果馮·博德爾施文克先生不能消除別人對他公布假預算的重大懷疑，那末法官就**必須**對他採取上述處分。我們要求他，也要求檢察官，把這件事加以澄清。

罰款、監獄監禁或要塞監禁，應該按所犯罪行及造成損失之大小來規定。馮·博德爾施文克先生同他在職務上的先驅者和後繼者一起給國家造成的損失非常嚴重，規模也非常大，只有各部大臣和其他身居要職的官員才能為全民造成這樣的損失。我們要在這裡指出這個數目，同時順便指出，這裡也涉及到各部大臣的其他瀆職行為。

1820年1月17日的敕令規定，普魯士國家預算中的必要**開支**

是 50 863 150 塔勒。并且接着就一字不差地說：

“上述我所认为必要的管理經費数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此事各主管部門的負責人务需亲自对我負責，整个內閣的責任更为重大，总的說来，我所允許的数目为达到預算中所規定的目的已綽綽有余。”

至于“必要的管理經費数目”究竟是多少，在后面的“管理經費”同國債方面的开支的对比中有明确的規定。管理經費包括从國庫中撥出来但不是用作支付國債利息或偿还國債的一切款項。我們知道，按照至今尚未廢除的 1820 年 1 月 17 日的敕令，这种开支不得超过 50 863 150 塔勒。敕令是在 1820 年的法令匯編中公布的，并且从来沒有人怀疑过，說在君主立宪政体宣布成立以前这类敕令在普魯士是沒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凡是超过法定数目的，就是違法行为，就是大臣的瀆职。

向第一屆联合議會提出的关于 1840 年至 1846 年国家預算执行情况报告和向現在已被解散了的国民議會提出的关于 1847 年財政管理的报告都表明，从 1840 年到 1847 年，所有大臣年年都違反了自己的職責。他們每年所开支的管理經費都超过了，并且大大超过了法律規定的数目。为了叙述得更加連貫，我們在这里不是只談馮·博德尔施文克先生一人，而是要談到 1840 年到 1847 年的历任財政大臣。这些大臣是：阿尔文斯累本伯爵——从 1835 年到 1842 年，馮·博德尔施文克——从 1842 年到 1844 年，弗洛特韦尔——从 1844 年 5 月 3 日到 1846 年 8 月 16 日，馮·杜厄斯堡——从那时起直到三月革命推翻內閣为止。所有这些大臣在同样程度上都犯了这种罪行。只要叙述一下事实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瀆职的高官們是怎样破坏了萌芽中的国家福利。

我們已經知道，經常的开支，即除了用在國債方面的以外的全

年开支,按照法律不能超过……50 863 150 塔勒。

但是, 1840 年支出了 …… 77 165 022 塔勒

其中应扣除:

(a) 偿还国债 …… 8 579 345 塔勒

(b) 似乎是交入国库 …… 613 457 塔勒

共計 …… 9 192 802 塔勒

因此, 管理經費是 …… 67 972 220 塔勒

所以, 这一年非法支出 …… 17 109 070 塔勒

1841 年支出 …… 74 185 443 塔勒

其中偿还国债和交入国库 …… 14 419 563 塔勒

所以, 管理經費 …… 59 765 880 塔勒

法定数目 …… 50 863 150 塔勒

超过法定数目 …… 8 902 730 塔勒

1842 年支出 …… 75 269 431 塔勒

沒有交入国库分文

偿还国债支出 …… 8 684 865 塔勒

所以, 經常开支应为 …… 66 584 566 塔勒

超过法定数目 …… 15 721 416 塔勒

1843 年开支 …… 79 102 787 塔勒

交入国库和偿还国债 …… 8 261 981 塔勒

所以, 管理經費 …… 70 840 806 塔勒

法定数目 …… 50 863 150 塔勒

超过法定数目 …… 19 977 656 塔勒

1844 年开支 …… 78 243 308 塔勒

其中交入国库、支付国债利息和

偿还国债 …… 9 252 605 塔勒

所以, 經常开支 …… 68 990 703 塔勒

法定数目 …… 50 863 150 塔勒

就是說, 超过法定数目 …… 18 127 553 塔勒

1845 年开支	77 903 361 塔勒
没有交入国庫分文	
偿还国債	<u>7 267 082 塔勒</u>
所以,經常开支	70 636 279 塔勒
法定数目	<u>50 863 150 塔勒</u>
就是說,超过法定数目	19 773 129 塔勒
1846 年开支	78 562 335 塔勒
没有交入国庫分文	
偿还国債	<u>7 423 831 塔勒</u>
管理經費	71 138 504 塔勒
法定数目	<u>50 863 150 塔勒</u>
所以,超过法定数目	20 275 354 塔勒
1847 年开支	80 392 730 塔勒
其中救济費	6 207 650 塔勒
偿还国債	<u>7 209 192 塔勒</u>
共計	<u>13 416 842 塔勒</u>
所以,管理經費	66 975 888 塔勒
法定数目	<u>50 863 150 塔勒</u>
就是說,超过法定数目	<u>16 112 738 塔勒</u>
以上几年共超支	135 999 646 塔勒

最近八年来,在阿尔文斯累本、博德尔施文克、弗洛特韦尔和杜厄斯堡諸大臣的治理下,从国庫中,即从人民的財富中,从穷人的資金中,非法动用了几乎一亿三千六百万塔勒!而这些先生們竟还逍遙法外,挂着星章和勳章,有的人,例如弗洛特韦尔,甚至还身居要职!前几天报上有一則消息,說有一个司法官——他被认为是民主主义者——因被控沒有把五十塔勒交給應該交給的人而遭到逮捕。一个是五十塔勒,一个是一亿三千六百万塔勒!

也許,1820年規定的数目同近来的国家的需要已經不相适应

了。如果是这样，那政府就應該公开說明，并且**依法規定**新的預算。但是政府不想这样做，而且也不敢这样做。它所以不想这样做，是由于它的专制主义的願望；它所以不敢这样做，是因为怕道出財政部門的秘密。有維多利亞女王蒞臨的閱兵、洗礼、婚礼、教堂、耶路撒冷的主教管区、过时的几乎被遺忘了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敕令、騎士的城堡、头盔、近卫軍軍官、容克地主、僧侶和官僚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人民的災星在普魯士財政中起过什么作用和起着什么作用，这是不應該让人民知道的。所以**普魯士的財政**是秘密的，而大臣們甚至当着現存法律的面成了罪犯。誠然，現在还没有找到审判他們的法官。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执政时的普魯士財政使国庫空虛到什么程度，这从下面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來：

1840年：往年結余現金	16 949 157 塔勒
年收入	71 059 475 塔勒
共計	88 008 632 塔勒
年支出	77 165 022 塔勒
尚余現金	10 843 610 塔勒
1841年：往年結余現金	10 843 610 塔勒
年收入	71 987 880 塔勒
共計	82 831 490 塔勒
其中除去年支出	74 185 443 塔勒
尚余現金	8 646 047 塔勒
(阿尔文斯累本編制的发表在法令汇编中的收支一覽表，不論收入或支出部分，都是 55 867 000 塔勒！)	
1842年：往年結余現金	8 646 047 塔勒
年收入	73 876 338 塔勒
共計	82 522 385 塔勒

	年支出	75 269 431 塔勒
	尚余現金	7 252 954 塔勒
1843 年:	往年結余現金	7 252 954 塔勒
	年收入	73 822 589 塔勒
	共計.....	81 075 543 塔勒
	年支出	79 102 787 塔勒
	尚余現金	1 972 756 塔勒
1844 年:	往年結余現金	1 972 756 塔勒
	年收入	75 976 613 塔勒
	共計.....	77 949 369 塔勒
	年支出	78 243 308 塔勒
	赤字	293 939 塔勒
1845 年:	年收入	77 025 034 塔勒
	除去 1844 年赤字.....	293 939 塔勒
	尚余	76 731 095 塔勒
	年支出	77 903 361 塔勒
	因此, 赤字.....	1 172 266 塔勒
1846 年:	年收入	75 721 698 塔勒
	除去 1845 年赤字.....	1 172 266 塔勒
	尚余	74 549 432 塔勒
	年支出	78 562 335 塔勒
	因此, 赤字.....	4 012 903 塔勒
	(根据 2 月 3 日指令召集了第一屆聯合議會, 但是議會沒有批准信貸。)	
1847 年:	年收入	79 518 543 塔勒
	除去 1846 年赤字.....	4 012 903 塔勒
	尚余	75 505 640 塔勒
	年支出	80 392 730 塔勒
	因此, 赤字.....	4 887 090 塔勒

为了抵敷必需的开支, 从国庫中支取了 4 000 000 塔勒, 这样

一来,进款就要增加到 83 518 543 塔勒。于是,旧政府是带着一个有赤字的国家儲金总局和一个空虚的国庫进入 1848 年的。在这六年中(1840 年到 1847 年),現金从結余 16 949 157 塔勒变成了亏空 4 887 090 塔勒,就是說,减少了 21 836 247 塔勒。

八年中的收入共計……………598 988 170 塔勒

支出……………620 824 417 塔勒

因此,赤字如上所述是……………21 836 247 塔勒

这种現金不断减少的情况已經不能再否认了,虽然政府拼命加以掩飾,把收入和支出的余額一年一年地往下推,并且在統計中不談已經出現的赤字,反而假造盈余。可見,普魯士的財政是在“和平时期”,在非常“安宁”和“有秩序”的情况下,被普魯士政府弄得破了产。当 1848 年运动开始、金融市場陷入蕭条状态的时候,国家对私人不但不能有所支持,反而要他們为自己的繼續存在作出新的牺牲。这一切,資产者先生們都應該感謝普魯士的前任各届大臣和他們的同謀者。如果他們不犯下这种瀆职罪,那就不会出现赤字,而会有 136 000 000 塔勒的現金,从而也就能够維持信貸。这就是普魯士刑事立法第三三三节所指的那种罪行所造成的損失。

国家儲金总局出現了赤字,而收入又怎样呢!我們已經指出,收入一年一年地从 71 000 000 增加到 80 000 000。但是这仅仅是純收入,这仅仅是各主管部門除去管理費用以后上繳的款子。在稅务、关卡、邮政、林务等部門中,凡有关这些管理部門的薪俸、办公費等等都早已扣除,只有純結余才列为收入。但是,国家既要拿一笔錢去支付稅务、林务、邮政等部門的職員薪俸和办公費,同时还要用一笔錢去作为給总督們和現役將軍們的賞賜和贈礼。这些

預先列銷的管理費用，在 1847 年預算中達 20 887 541 塔勒。如果加上這個數目，那末年收入就有 90 000 000 到 100 000 000，而年開支甚至超過 100 000 000 塔勒。人民付出了這樣大的一筆錢，而結果却是一個空空的國庫！

我們已經看到，1820 年 1 月 20 日的敕令中對大臣的職責作了規定。馮·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明知故犯地——只能是這樣——違反了這種規定。因此，他也就再一次觸犯了上述普魯士法第二篇第二〇章第三三三節。按照法律，他應受的處分是**撤職、罰款或要塞監禁和剝奪擔任任何公職的權利**。由於他給國家造成了極大的損失，所以應該按照法律所許可的最高限度來剝奪他的自由。

前任大臣馮·阿尔文斯累本、弗洛特韦尔和馮·杜厄斯堡的情況也都是這樣。

必須責令前任大臣先生們賠償給國家造成的損失，賠償非法支出的 136 000 000 塔勒，這一點在民法中就有規定。關於這個問題，刑事立法（普魯士法第二篇第二〇章第三四一節）中寫道：

“凡官員無力償還因瀆職而故意使國家或第三者受到之損失者，該官員須在刑滿後留在國家機關內進行強制工作，直至其以某種方法償清損失為止。”

再說一件小事情！根據各年預算，從預算結余中交入國庫的款項是：

1840 年·····	613 457 塔勒
1841 年·····	2 837 000 塔勒
1843 年·····	1 000 000 塔勒
1844 年·····	2 000 002 塔勒
共計·····	6 450 459 塔勒

根据国庫決算，自 1840 年 7 月 1 日起从預算結余中交給国庫的只有 6 423 332 塔勒。因此，国家儲金总局中列为**撥給国庫的錢比国庫收到的錢多 27 127 塔勒**^①。請問馮·阿尔文斯累本先生、馮·博德尔施文克先生、弗洛特韦尔先生和馮·杜厄斯堡先生，这 27 127 塔勒到哪里去了呢？但願不是被私吞了？

能为这些前任大臣先生找到一个檢察官和审判庭嗎？而目前馮·博德尔施文克先生还是第二議院的議員！

卡·馬克思写于 1849 年 2 月 16 日

載于 1849 年 2 月 17 日“新萊茵报”
第 22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① 在“新萊茵报”上誤印为“17 127 塔勒”；編輯部在“再論普魯士的財政”一文(見本卷第 370 頁)中作了更正。——編者注

施 泰 因

科倫 2 月 16 日。布勒斯勞的“法定秩序拥护者同盟”（“天佑吾王，天佑吾国”同盟）給尤利烏斯·施泰因博士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說道：正像布勒斯勞的勇敢的庸人一样，“新萊茵报”被施泰因先生的保守演說弄糊塗了，“新萊茵报”“认为对民主事业來說他已經不存在了”。

我們是坚决立場的拥护者。我們从不巴結某一个議會政党。我們所代表的党，即人民的党，在德国暂时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是，当問題在于同現存政府作斗争的时候，我們甚至同我們的敌人結成联盟。我們注意到，在迄今存在于德国的精神发展的可悲条件下形成的那个官方普魯士反对派是个事实。因此在竞选斗争中，我們甚至把我們自己的观点放到次要地位²²³。現在，在选举以后，我們又坚持我們过去的那种不但对政府而且对官方反对派也不調和的观点。

“法定秩序拥护者同盟”弄錯了。我們并不认为施泰因、瓦尔德克先生之流“对民主事业來說已經不存在了”。我們一直认为，施泰因、瓦尔德克先生之流不是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对民主派來說是一件好事。

在本报最初几号的一号中，我們曾經說过，除了三四个人以外，柏林协商議會中的极左派在国民公会中只能构成一个极右

派²²⁴。我們从来沒有把施泰因和瓦尔德克算在这三四个人之內。

关于施泰因先生本人，我們还記得这样的事情：他曾經作为狂热的立宪主义者起来反对共和主义者，他曾經在“西里西亚报”²²⁵上对工人阶级的代表进行真正的告密，并为此目的利用了一个同他志同道合的教师，这个人现在是“法定秩序拥护者同盟”的盟員。

协商派議会的所謂民主派，也像这个議會本身一样可怜。可以預料：为了再度当选，这班先生将承认欽定宪法。这班先生的观点的特征是：在选举以后，他們会在民主俱乐部中否认他們在选举以前在复选人會議上所坚持的东西。这种狡猾的自由主义的小聪明从来不是革命者的外交所固有的。

写于 1849 年 2 月 16 日

載于 1849 年 2 月 18 日
“新萊茵报”第 22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科倫日報”駐維也納記者

科倫 2 月 17 日。世界历史上又少了一个謎！大家知道，用△作記号在“科倫日報”上写編輯部文章、同时以△作記号在同一家“科倫日報”上发表維也納通訊的施万貝克先生，在这些文章和通訊中竭力誹謗馬扎尔人，責难他們胆怯、下流，不仅打敗了他們，而且屡次消灭了他們，并热烈欢迎联軍在战地法庭的伴随下进入匈牙利各个城市 and 各个州。

现在，施万貝克先生本人解开了这个謎；像阿基里斯一样，只有我們的施万貝克自己能够治疗他所击破的伤口。

这个謎的謎底究竟是什么呢？——害怕韦尔登。这就是要侮辱維也納人和馬扎尔人，散布关于奥地利人战績的可耻謠言，向克罗地亚人和潘都尔兵搖尾乞怜和阿諛奉迎的原因。

因为，——大名鼎鼎的施万貝克說，——因为，他說：

“直到現在为止，卫戍司令韦尔登男爵总是直截了当地把那些敢于怀疑奥皇軍队在君主国各个据点上的胜利进展的人叫做撒謊者，并封之以恶棍的光荣称号。”（“科倫日報”第 40 号）

由于尊敬韦尔登，“科倫日報”的讀者們不得不讀了两个月标着△作記号的关于匈牙利战争的虛构的維也納通訊。

关于普斯庫亨，歌德曾經这样說过：

“鯨魚身上还生虱子,我又怎能免俗。”²²⁶

科苏特也能把这句話应用于施万貝克。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2 月 17 日

載于 1849 年 2 月 18 日“新萊茵报”
第 22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澤 特

科倫 2 月 17 日。任何一个小地方都有它的 esprit fort [賢者]; 科倫檢察机关里也有这样的人。科倫檢察机关的 Esprit fort 是一个叫做澤特的人, homo novus atque ignotus [一个新的不知名的人](换言之, 一个深思熟虑的思想家)。

有两种勇敢: 卓越的勇敢和智慧貧乏的勇敢, 后者从自己的官职中, 从它在斗争时可以使用特权武器等等这种意識中汲取力量。科倫檢察机关的 esprit fort 在他昨天控告金克尔²²⁷的起訴詞中表现了哪一种勇敢, 在庭审记录公布以后, 公众自己就会得出結論。同时公众将考虑到, 澤特先生还年輕。

可是, 如果我们不立即向欧洲公众介绍我們的 esprit fort 的一句格言, 那我们就忽視了我們新聞工作者的职责。我們知道, 科倫檢察机关的狄摩西尼企图用以后的解釋把他起訴詞中的这个地方修飾一下。但是我們非常重視充滿灵感的天才的那种直接启示, 不願使这种启示因为解釋——較晚的反射的結果——而被歪曲和削弱。

副国家檢察官澤特先生声明:

用德語來說: «Sie dürfen Alles, was ich sage, widerlegen, aber sie dürfen meinen Vortrag nicht kritisieren». [“你可以反駁我所說的一切, 但无权批評我的起訴詞。”]

用法語來說: M. *Saedt*, substitut du procureur du roi s'adressant à l'accusé:

«Libre à vous de réfuter tout ce que je viens de dire, mais il ne vous appartient pas de critiquer le réquisitoire d'un substitut du procureur du roi». (Avis à la «Réforme», à la «République» et à la «Révolution»²²⁸.)

〔副王国檢察官澤特先生向被告說:

“你可以反駁我所說的一切,但无权批評副王国檢察官的起訴詞。”(茲通知“改革報”、“共和国報”和“革命報”。))

用英語來說: The queen's counsel, Mr. *Saedt*, to the defendant:

«You may refute all I say, but you have no right to criticize my speech». (NB. Our English contemporaries, principally the «Northern Star»²²⁹, are requested to publish the above.)

〔王室顧問澤特先生向被告聲明:

“你可以反駁我所說的一切,但无权批評我的起訴詞。”(注意! 我們請求我們的同時代的英國人,特別是“北极星報”,轉載這些話。))

用意大利語來說: Sig. *Saedt*, accusatore publico, replicò:

«Dite quanto volete in rifutazione di questo che ho detto, ma vi è difeso di criticare il mio requisitorio». (Avviso all'«Alba», al «Contemporaneo» ed alla «Concordia»²³⁰.)

〔國家起訴人澤特先生反駁說:

“你可以隨便反駁我所說的話,但无权批評我的起訴詞。”(茲通知“黎明報”、“現代人”和“協和報”。))

用西班牙語來說: El fiscal, Sennor *Saedt*, dijo, hablando al acusado:

«Sennor, Vmd puede refutar todo que ho dicho; pero el que vengo de decir por requisitorio, es defendido de tocarlo». (Pregamos los jornales radicales de Madrid de publicar esas lineas.)

〔檢察官澤特先生向被告說：

“閣下可以反駁我所說的一切，但无权涉及我在起訴詞中所說的話。”（我們謹請馬德里的各家激进報紙轉載一下这几句話。）〕

用丹麥語來說：«De Kunne gjensige alt hvad jeg siger, men De have intet Ret at kritisere mit Requisitoire (Angreb)». (De danske demokratiske Tidender ville vaere meget glaedt at meddele det danske Publikum den foregaaende Bewiis af de preussiske Magistraters Saudhed.)

〔“你可以反駁我所說的一切，但无权批評我的起訴詞。”（丹麥的各家民主報紙會樂意向丹麥公眾介紹這個證明普魯士官員的誠實品質的聲明。）〕

讓澤特先生本人去決定：他的格言用哪一種語言表達聽起來最悅耳。

寫于 1849 年 2 月 17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2 月 18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 225 號

“科倫日報”論馬扎尔人的斗爭

科倫 2 月 17 日。

“我終於摸到了海底，
我的錨牢牢地扎在这里”，——

勇敢的施万貝克捧着新教贊美詩集引吭高歌。这个义憤填膺的卫道者不顾“奥地利照会”和“憤激若狂的心情”，终于在“科倫日報”第一版上出来替文迪施格雷茨說話了。

請听：

“德国的所謂民主报刊，在奥匈冲突中竟站在馬扎尔人方面…… 真是稀奇的事情！德国民主派竟站在这样一个貴族等級方面，对于这个等級來說，尽管已經到了十九世紀，它自己的人民还始終是 *misera contribuens plebs* [可怜的納稅人民]；德国民主派竟站在人民的最无耻的压迫者方面！”

我們記不大清楚，我們是否让讀者注意过勇敢的施万貝克的一个特点：他慣于只說出結論，而不說明前提。上面的几句话正好是这样的結論，可是对賴以得出这个結論的前提却秘而不宣。

但是，即使馬扎尔人真的是“人民的最无耻的压迫者”的“貴族等級”，那又該得出什么結論呢？难道文迪施格雷茨这个杀害罗伯特·勃魯姆的凶手就会因此而变得稍微好一点嗎？难道“联合君主国”的騎士們、德国的死敌和施万貝克的好朋友——文迪施格雷茨、耶拉契奇、施利克等一伙人想鎮压“貴族等級”并实行自由的农

民土地所有制嗎？难道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在为争取莱茵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和 Code Napoléon [拿破侖法典] 而斗争嗎？

1830 年波兰人起义反对俄国，当时的問題是否在于“貴族等級”領導了起义呢？当时首要的問題是赶走外国人。当时整个欧洲都站在这个无疑領導了这一运动的“貴族等級”方面，因为波兰的貴族共和国比起俄国的专制政体来終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难道 1830 年法国規定的使二十五万人壟断了选举权的选举資格，实质上不是和貴族的統治一样，是对 *misera contribuens plebs* 进行政治奴役的工具嗎？

姑且认为匈牙利的三月革命是純粹貴族革命吧。难道奥地利“联合”君主国因此就有权压迫匈牙利的貴族，从而也压迫匈牙利的农民，就像它过去压迫加里西亚的貴族，并在后者的帮助之下压迫加里西亚的农民（見 1818 年里沃夫議會會議記錄）一样嗎？但是，偉大的施万貝克当然不屑知道，大多数匈牙利貴族也同大多数波兰貴族一样，都是純粹的无产者，他們所享有的全部貴族特权只不过是不能對他們施以体罰而已。

偉大的施万貝克当然不屑知道，匈牙利是从三月革命时起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完全廢除了农民的封建义务的唯一国家。偉大的施万貝克宣布馬扎尔人是“貴族等級”、“人民的最无耻的压迫者”、“貴族”。可是这同一个偉大的施万貝克却不知道或者不願意知道，馬扎尔的豪紳显貴們，如埃斯特哈济之流，从战争一开始就开了小差，并且跑到奧里繆茨致敬去了^①；也正是馬扎尔軍隊中的“貴族”軍官們从斗争开始直到今天每日每时都在出卖民族的事

^① 1848 年 10 月 7 日維也納革命胜利后，奧皇斐迪南一世和他的反动臣僕第二次从維也納逃到奧里繆茨。——譯者注

业！否則为什么大多数众議院議員（其中一共只有十一个豪紳显貴）直到現在还留在德布勒森城科苏特那里呢？

第一版上的施万貝克，在社論中高唱頌歌的施万貝克就是这样。但是第三版上的施万貝克，曾經六次冲击列奥波特施塔特^①、四度占領埃塞格^②、屢次强渡蒂薩河的施万貝克，作为战略家的施万貝克也想发表自己的意見。

“可是随后战争发生了悲慘的、簡直令人可憐的轉变。几乎没有經過战斗，馬扎尔人就一个接一个地退出了自己的全部陣地；他們甚至沒有进行任何抵抗，就放棄了設防的首都，于是耶拉契奇的克罗地亚人就迫使他們退到蒂薩河后面。”

“几乎没有經過战斗”——就是說，馬扎尔人把奥地利人阻挡在莱达河与蒂薩河之間的地区达两个月之久以后，他們是“几乎没有經過战斗”而撤退的。英勇的施万貝克估計一个統帅的作用，不是根据其战斗的物质結果，而是根据其人力損失的多寡！

“他們沒有进行任何抵抗，就放棄了設防的首都！”但是應該知道，欧芬^③的西面固然已經設防，但东面却沒有任何工事。多瑙河已經封冻，于是奥地利人的騎兵和輜重就渡到河的对岸，占領了佩斯，从那里用炮火轰击毫无防御的欧芬。

如果多伊茨沒有設防，莱茵河又已經封冻，法国軍隊趁此机会在維塞林格和沃林根地区渡过莱茵河，并在多伊茨附近架起一百門大炮对准科倫，那末勇敢的施万貝克大概也会劝恩格斯上校保卫科倫，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士兵吧。好一个勇敢的施万貝克！

① 維也納的一个区。——編者注

② 克罗地亚称作：奥謝克。——編者注

③ 匈牙利称作：布达。——編者注

“耶拉契奇的克罗地亚人迫使”馬扎尔人“退到蒂薩河后面”。这些“克罗地亚人”总计有二十五万到三十万名士兵，其中包括文迪施格雷茨、耶拉契奇、圭茨、乔里奇、西姆尼奇、努根特、泰奥多罗維奇、普赫納等人的部队，以及驻扎在德拉瓦河畔和巴納特地区的一些非正规部队，对于这一点，偉大的施万貝克能否认嗎？而所有这些都是“耶拉契奇的克罗地亚人”？！不过，作为克罗地亚人的同族，而且对历史和地理只是一知半解的施万貝克是克罗地亚人的崇拜者，这一点倒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我們也决不认为奥地利大本营的官方公报是一种福音书”。相反，施万貝克常常在公报中，比如說在施利克的公报中发现

“一些必須由讀者用各种各样的猜測来加以填充的空白，而結果毫不奇怪<!!>，这些猜測所描繪的事态比实际情况要糟得多!!!”“我們也怀疑普赫納的公报把事情說得过于乐观了。如果相信这些公报，那末他对‘叛乱將軍’的征討應該是接近于胜利的完成。可是使我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我們突然讀到了普赫納的呼吁，他在呼吁中恳求薩克森人和瓦拉几亚人为了神圣的一切而不要丧失勇气；我們也意外地知曉，被击潰了的貝姆突然出現在格尔曼施塔得^①附近，即薩克森人聚居地区的中心，而可怜的德国人<!!>却終于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得去向俄国人寻求保护。于是在官方的公报和事变之間就有了一个不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完全是由官方公报的不精确<!!>所造成的。”

施万貝克公民承认，奥地利的公报以及后来的“科倫日報”曾厚顏无耻地謊报奥地利人的战績；而当謊言已經十分明显，絕對无法否认的时候，热爱真理的施万貝克就把这称为“官方的公报和事

① 羅馬尼亞称作：錫比烏。——編者注

变之間的一个不大的矛盾”。

“但是，如果說我們決不把奧地利軍隊的公報當作神諭來看待，那末這絲毫也不能使匈牙利的捷報在我們的〈觀察了上述“不大的矛盾”的〉眼睛中贏得什麼東西。這些捷報是通過幻想編造出來的，它們如果不是這樣滑稽可笑，那末讀起來也許很舒服。”

這些“捷報”真是如此“滑稽可笑”，直到現在，它們除了偉大的施萬貝克自己所被迫承認的以外，什麼也沒有報道出來。也許托卡依現在掌握在施利克的手中？是否有一個奧地利人在索爾諾克渡過了蒂薩河呢？奧皇軍隊在十四天之內是否前進了一步呢？

我們剛才收到的奧地利的第22號公報（見下文）²³¹使施萬貝克公民的任何回答都成為多餘的了。從這份公報中我們了解到，奧地利人甚至還沒有到達第20和21號公報所說的那些地點。

“無可奈何：匈牙利戰爭正飛速地走向結束。”這是很明顯的。施萬貝克還在十四天以前就已經寫道：“匈牙利戰爭正走向結束。Parturiunt montes, nascetur ridiculus mus”〔雷聲大雨点小〕。寫這幾句話的時候，正是施萬貝克第一次宣告奧地利人勝利地進入德布勒森城的時候。從那時起已經過了十四天，儘管說馬扎尔人“大言不慚”，但奧地利人直到現在甚至還沒有渡過蒂薩河，更不用說占領德布勒森了。

“從四面八方潰退下來的成群的匈牙利人加入了貝姆的隊伍，於是他的隊伍變成了一支特蘭西瓦尼亞的人數不多的奧皇軍隊所不能抵擋的大軍；這一點不應該使任何人感到驚奇。”

決不應該！但是使我們感到驚奇的是：正當匈牙利人占據着蒂薩河與馬羅什河戰綫，而施萬貝克公民雖然熱誠禱告也無法使一個奧地利人穿過這條戰綫的時候，怎麼可以說是“從四面八方潰

退下来的成群的匈牙利人”；其次使我們感到惊奇的是：“潰退的人群”居然能突然組成一支大軍，而追击他們的軍隊竟不立即赶来，把他們从新的陣地上攆走。也許偉大的施万貝克认为，在他那朦朧的幻想中被打得一敗塗地的匈牙利人会头也不回地一直从多瑙河逃到阿柳塔河^①，而不管后面是否有人在追击他們。

施万貝克公民把自己变成了十九世紀的卡諾，因为他发现了一种新的迂迴运动，用这种迂迴运动可以使从四面八方潰退下来的人群突然变成一支常胜大軍。

当然，这支新的常胜大軍会使情况大大复杂化。但是，——施万貝克写道，——

“我們要看俄国在这里怎样使用它的否决权”。

現在正向俄国求援来反对馬扎尔人的勇敢的施万貝克，就是去年3月22日曾經发表了一篇义憤填膺的文章反对俄国沙皇的那个施万貝克。当时这位施万貝克宣称，如果俄国干涉我們的事情（要知道馬扎尔人的事情无疑也是我們的事情），那末他施万貝克就要发出震撼沙皇宝座的呼声。正是这个施万貝克在“科倫日報”中一直負有这样一种責任，即用及时表現出来的仇俄情緒和用适当的謹慎的自由思想来挽救“科倫日報”在安全的东欧各国中的自由主义声誉。但东欧的糾紛显然使他感到很苦恼，于是为了完全听任因奥地利照会而产生的“激憤若狂的心情”的驅使，他便呼吁俄国人到特兰西瓦尼亚来結束斗争。

对这篇从头到尾以文迪施格雷茨的精神大声說教的文章的最

^① 羅馬尼亚称作：奥尔特河。——編者注

好回答，就是讀者在下面可以讀到的奧地利軍队的第 22 号公报。施万貝克在这篇文章中显得对地理和战略一无所知，而且常常要依賴“新萊茵报”；为了向他說明这份公报的含义，我們把我們对公报的評論也一并刊載出来。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2 月 17 日

載于 1849 年 2 月 18 日“新萊茵报”
第 22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羅馬宣布成立共和國²³²

意大利的制憲議會不是法蘭克福的國民議會。意大利人知道，一個分成許多封建小國的国家要想達到統一，非消滅各邦君主的權力不可。意大利人在1848年最先開始了運動，而在1849年又是他們最先開始的。這是怎樣的進步啊！正像法國已經沒有拉馬丁一樣，意大利再也沒有庇護九世了。充滿幻想的歐洲革命時期，富於遐想、良好願望和華麗辭藻的時期，在炮擊、大屠殺和流放中莊嚴地結束了。奧地利的照會、普魯士的照會、俄國的照會是對拉馬丁的呼喚的最適當的答復。

德國人憑着自己的徹底性和頑強精神，習慣於用皮蒂婭的那種傲然睨視一切的态度從上面向下觀看肤淺的意大利人。把意大利的1848年同德國的1848年作一對比，會是對德國人的最好的答復。在作這樣的對比時，首先必須考慮到，革命的意大利曾受到德國和法國的威脅，而革命的德國在自己的行動中却絲毫沒有受到阻礙。

羅馬共和國！——這是1849年革命的序幕。

寫於1849年2月21日左右

載於1849年2月22日

“新萊茵報”第228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再論旧普魯士的財政

科倫 2 月 21 日。我們必須補充一下本報第 224 号刊載的我們那篇評論博德爾施文克之流和普魯士財政部門的文章。^① 我們曾在那篇文章的結尾指出，記入國庫表冊中的款項，比根據國家儲金總局的決算撥給國庫的款項少了 27 127 塔勒（上次誤印為 17 127）。後來，我們在政府公布的報告中發現了一項記載，這項記載可以解決這筆錢下落不明的謎。

原來，1844 年的行政開支中為數 2 000 002 塔勒的所謂儲蓄，並沒有以現款撥交國庫，而是用這筆錢購買了普魯士的國庫債券。由於當時國庫債券的行市不利，在購買時虧損了 27 127 塔勒。普魯士大臣們是——或者以前是——一些出色的財政家！這一點從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來。因此，關於這 27 127 塔勒的去向，我們就不必再質問前任的大臣先生們了。我們可以告訴他們的只有一點：他們的善於經營的本領在這件事情上使我們遭到的損失不只是 27 000 塔勒，而是 400 000 塔勒以上。這種責難首先是針對弗洛特韋爾先生的，因為他當時是財政大臣。也許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但是對於國家來說，它的大臣們使它遭受損失是由于自己無能还是由于心懷惡意，這反正都一樣。研究這個問題可能只有這

^① 見本卷第 343—354 頁。——編者注

位大臣的親屬有興趣。

當時的國庫大臣馮·梯勒在其 1847 年 4 月 6 日關於國庫的報告書中完全公開地宣稱，在國庫方面確定了以下兩條基本規則：

(1) 國庫的現金永遠應當是硬幣；

(2) 除了軍備開支以外，不得從國庫支取任何金額。

至於第一條規則，那末既然一般地必須有國庫存在，那當然只有在國庫中存有**現金或貴重金屬**的情況下，國庫才有意義。一個無法依靠人民的政府，為了以防萬一，必須在所謂的艱難時期擁有某種後備。當政府的信用在交易所里也開始動搖的時候，政府必須有資金儲備，以便擺脫這種困難的境況，而這只有靠現金或貴重金屬才能做到。黃金和白銀在任何時候都能開啟資產階級的心扉。而國家證券的貶值則是使交易所的“尊嚴”也要喪失的最有效的辦法。當國家的信用大降，以致需要國庫來支持的時候，沒有比向交易所拋出國庫債券並為其找尋買主更有失體面的了。觀察過大交易所生活的人都知道，在國家信用下降時向金融投機商拋售國家證券，這些投機商會表現出何等蔑視的表情和姿態。話又說回來，這種投機商人可能是商業樞密官，甚至還是非常“善意的”樞密官。

可見，購買國庫債券是普魯士政府所能採取的最不成功的措施。

馮·梯勒先生在上述的報告書中聲明，他被迫接受了 1 972 875 塔勒的國庫債券，而不是 2 000 002 塔勒的現金。我們認為，所謂他似乎是“被迫”這樣做的解釋沒有任何意義。不過，如果報告可靠的話，國家證券就是由國家儲金總局購買的。否則，全部金額會以現金轉交國庫。因此，弗洛特韋爾先生看來是和這個成功的財政措施有着密切的關係。

小資產階級的慳吝使人竭力在利息上面打算盤，但是不能使人考慮全國範圍的重大財務問題。這種慳吝怎樣導致加倍虧本的可恥的結局，這從以下的數字中可以看出來。

在買進時比票面價格虧損了…………… 27 127 塔勒
 應當加上在賣出時的更大的虧損。從 1848 年 3 月到
 7 月初，國庫債券的行市搖擺於 66%（“買主”）（4 月
 4 日）和 83.5%（“賣主”）（3 月 21 日）之間。而因為
 在賣出時剛出現大量的證券，行市就立即下跌，所以
 應該認為政府賣出它的國庫債券沒有高於債券價格
 的 70%。由此可見，在賣出時虧損了，虧損數目大約
 不少於票面價值 1 972 875 塔勒的 30%，也就是…… 591 840 塔勒

總計…………… 618 967 塔勒

的虧損。從這裡應當減去三年的利息（每年 69 048
 塔勒），共…………… 207 144 塔勒

這樣，純虧損的金額大概是…………… 411 823 塔勒
 幾乎損失了全部金額的 1/4，並且國家的信用由於國庫債券行市的
 下跌而受到了更嚴重的破壞。

我們之所以詳談普魯士財政大臣和國庫大臣弗洛特韋爾一梯勒之流的英明手段的這個小小的范例，僅僅是因為這個例子是對我們上面談到的那篇文章的一個很好的補充。否則，當許多重大事件為我們提供了十分豐富的材料的時候，我們就不會研究這類小事情了。

卡·馬克思寫於 1849 年 2 月 21 日
 載於 1849 年 2 月 23 日“新萊茵報”
 第 229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告 密

科倫 2 月 22 日。“总邮报”²³³的前任編輯曾經是基佐的雇傭間諜(參看塔謝羅的“往事迹評”²³⁴)和梅特涅的義務間諜,而圖爾恩-翁特-塔克西斯的整個郵政系統也是這樣。這個全國性的出租馬車系統對德國工業起着壓制的作用,它同鐵路進行鬥爭,把我們拉向後退;在三月革命以後,這個系統的存在已經毫無意義,立即把它消滅應該是未來的德國制憲議會(大家知道,設在聖保羅教堂的議會^①從來就不是制憲議會)的首要措施之一;這個系統從約瑟夫二世時起就不外是奧地利特務的隱身處而已。在“總郵報”這家屬於昔日圖爾恩-翁特-塔克西斯公爵的告密者的帝國機關報上,主編格·馬爾滕(對於這個人舊“萊茵報”²³⁵早已作了相當清楚的介紹)作了如下的聲明,同時他肯定說他是轉載我們所不閱讀的一家報紙的巴黎通訊²³⁶。

“我們必須承認一件使德國人丟臉的事情:有這樣一些德國人,他們在我們當中進行鼓動,這種鼓動的形式即使不說是最無恥的,也是最廣泛的。這裡有一個紅色分子特別委員會,它疾速地向各省分發一切旨在破壞人類社會秩序的煽惑性的文章。這些德國人不僅參與這件有利於法蘭西的不光彩的事情,而且還使猖狂的宣傳繼續在全德國撒開它的羅網。由同一個革命廚房的魔鍋中製造出來的革命傳單,泛濫在萊茵河流域的整個德國地區;關於這些

① 即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編者注

傳單，‘新萊茵報’本來可以談出很多東西，可是它寧願對這個問題完全保持沉默。在巴登南部，下層居民已經受了好幾個月的來自巴黎的鼓動。本地民主派和在瑞士的流亡者之間的聯繫也同樣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對於這種卑鄙無恥的告密，我們作如下的回答：一、我們從來沒有隱諱我們同法國、英國、意大利、瑞士、比利時、波蘭、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民主派的聯繫；二、那些確實是因為我們而“泛濫在萊茵河流域的德國地區”（豈止這一地區！）的“革命傳單”，是我們自己在科倫這裡印刷的。做這件事我們並不需要巴黎的幫助；許多年來，我們已經習慣於讓我們的巴黎朋友從我們這裡得到的援助多於我們從他們那裡得到的援助。

寫於 1849 年 2 月 22 日

載於 1849 年 2 月 23 日

“新萊茵報”第 229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御前演說

一

科倫 2 月 28 日。昨晚过于匆忙地向“新萊茵報”讀者披露的御前演說，使“科倫日報”万分恐慌和苦恼；現在证明已披露的御前演說是与原話无異的。一夜之間，只有一段話，即关于柏林戒严的那一段話，有了更动。这样一来，勃兰登堡內閣就把本质的东西删除了，把自己的言論的鋒芒削弱了。

我們昨晚披露的这一段話的原話如下：

“为了恢复法定秩序，有必要在首都及其近郊宣布戒严。只要目前尚受到威胁的社会安全(为了保障社会安全，必須采取这一措施)还没有得到强硬的法律的經久可靠的維護，戒严就不能取消。这些法律的草案将立刻提交給你們。”²³⁷

这一段話虽然也是遮遮掩掩，但还是泄露了御前演說的全部秘密。直截了当地說，这段話的意思就是：只要**普遍**戒严被欽定为全王国的法律并成为我們的立宪慣例，**特別**戒严就会取消。这一套“强硬的”法律将以关于結社和出版的九月法令²³⁸开始^①。

① 在报上接着轉載了御前演說的全文。——編者注

二

科倫3月1日。我們首先要指出，御前演說受到了“科倫日報”的滿堂喝彩。該報對御前演說中所提到的政府的一些行動提出了某些批評意見，但是對御前演說本身根本沒有提出任何批評意見。

“國王的御前演說是真正憲政的御前演說”，——這家精明的報紙的社論是這樣開頭的，這篇社論實質上不過是解釋御前演說罷了。

“憲政的御前演說”！其實，對於那些曾經在聯合議會中期待“國王的肺腑之言”、枯燥的訓誡性的真誠談吐的人來說，或者對於那些希望看到勃蘭登堡和弗蘭格爾的那種一邊不時碰响馬刺和洋洋得意地捋捋胡子、一邊自吹自擂的姿態的人來說，這個文件應該是非常“憲政的”。

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在執行自己的任務方面，曼托伊費爾比康普豪森能干得多，他完全拋棄了1847年的“天才的演說姿態”。資產階級的大臣提出了資產階級式的肤淺的、艱澀的、在形式上和內容上都枯燥無味的文件。貴族的大臣則以最大的溫順服從枯燥無味的憲政形式，企圖利用這種形式，用輕快平穩的語調來嘲弄兩院和整個立憲政體。

至於御前演說的實質，正如我們昨天所提到的，關於保持戒嚴的那一段話被掩蓋起來了，因此演說的實質幾乎一點也沒有留下。這是內閣在演說中坦白地和誠實地向議會表明態度的唯一的

一段話。

只有“科倫日報”或柏林“國民報”才把御前演說的其余部分也当做真話。誰要以虔敬的心情和鄭重的態度來觀察前天在柏林演出的那出憲政的戲劇，誰就太天真老實了，當然也就永遠不能了解：怎麼可以把這種神聖的行為變成猥褻的笑柄。但是，那些像曼托伊費爾先生那樣對這整出憲政的喜劇很少感到興趣的人，就不會糊塗到這種地步，以致于 *au sérieux* [認真地] 看待大臣在前天代表上帝庇佑的君主送給白廳²³⁹ 的洗耳恭聽的公眾的文件。

我們認為，如果我們向可惜很不習慣於微妙的智力遊戲的德國公眾說明曼托伊費爾先生的御前演說的真實含義，那會使曼托伊費爾先生感到高興。

你們以為，曼托伊費爾會吹噓他所實行的反革命的順利結局，會像笨拙的騎兵班長弗蘭格爾之流那樣，荷槍實彈和用鋒利的馬刀等來威協議會。恰恰相反！曼托伊費爾對於這一切只是用幾句話順便提了一下，就像是談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一樣。

“第一議院和第二議院的諸位議員先生，你們還記憶猶新的那些事件，迫使我在去年 12 月解散了為協商憲法而召集的議會。同時，由於我堅信絕對必須徹底恢復鞏固的公共法律秩序，我賜予了全國一部憲法，這部憲法的內容完全符合我在去年 3 月所許下的諾言。”

曼托伊費爾先生這樣說，就像在談論一件最微不足道的瑣事一樣——就像在談用新禮服來換舊禮服，任命一個編制外的官員或逮捕某個“煽動者”一樣。強迫有自主權的議會遷移、延期和解散，宣布戒嚴，實行軍刀制度——總之，整個政變，都被說成是“我們還記憶猶新的那些事件”。這就完全跟高貴的總督耶拉契奇一模一樣，他也是極其從容不迫地談論他的披着紅斗篷的士兵怎樣

活活地燒死某个农村居民。

于是就以欽定的所謂宪法来“完全实现我在去年3月所許下的諾言”！你們认为狡黠的曼托伊費尔竟糊涂到认真地說这些话嗎？Allons donc〔算啦〕！

这样的开头使人大为惊愕。但是应当善于利用这种最初的惊奇，以便随后再贈送一些更令人惊奇的东西。曼托伊費尔先生是这方面的能手！

“从那时起，几个月以前还籠罩着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紧张状态已让位于比較安靜的气氛。受到这样严重破坏的信用又逐漸重新恢复。商业和工业开始摆脱曾經威胁它們的蕭条而恢复元气。”

当可尊敬的議員們听见这些话的时候，他們用什么样的眼光面面相覷啊！商业和工业在恢复元气！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同一个曼托伊費尔既然能欽定宪法，为什么不能欽定一个“商业和工业”的高漲呢？曼托伊費尔在說出这种难以置信的断語时所表现的过于自信的态度真正是令人吃惊的。Mais nous marchons de surprise en surprise〔但意外的事情接踵而来〕：

“諸位，你們知道，我授予你們以修改宪法的权利。現在你們的工作就是在彼此間以及跟我的政府把此事协商好。”

当然罗，諸位，“协商”！但是諷刺也就在于，像曼托伊費尔欽賜給“我的人民”的这样两个議院是永远不能够“在彼此間协商好”的！那末究竟为什么要想出个第一議院来呢？諸位，如果你們竟出乎意料之外地在彼此間协商好了，那末你們还得跟“我的政府”达成協議。而你們跟它是什么也协商不好的——曼托伊費尔担保这一点！

可見，第一議院和第二議院的諸位議員先生，你們修改宪法就

已經够忙了。“我”根据經驗确信，在两个締約者之間达成協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力求在三个不容許协商的要素之間达成協議是适当的。我担保你們会这样永无休止地进行协商性的辯論而毫无进展；否則曼托伊費尔就会答应担任“国民报”的撰稿人了。

好啦，諸位先生就“协商”吧！

但是，即使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之外，你們終于解决了那由于礼貌而不得不称为你們的任务的事情，你們还是决不会因此而前进一步。所以，“我的政府”“为实施宪法”而頒布了将近一打法律，这些法律使这部宪法的最后一点自由主义的影子也消失了。这些法律中有两个行会規章²⁴⁰。这两个規章堪称是1500年的規章，它們可以向你們这个如此成功地勾結起来的代議机关提出十年的伤脑筋的工作。“所有这些法律都将立刻提交你們批准。”

好啦，諸位先生就“批准”这些法律吧！

但是随后“我的政府”会立刻提交給你們一些有关戒严的法案——九月法令、gagging laws²⁴¹、禁止俱乐部活动法令等等。而在你們“批准”这些法令以前（应当相信事情永远达不到此种地步），戒严应繼續保持下去。

你們认为你們所要做的工作就止于此嗎？——决不是，最重要的还在后面：

“此外，你們还要討論各种法律——为实施宪法所必需的一部分——，这些法律草案將陸續提交給你們。我特別建議你們严密注意下述草案：新市政条例，关于县、行政区、省的机构的新条例，国民教育法，教会管理法，所得稅法，土地稅法，关于田賦贖买法和关于无偿廢除某些田賦的法律，以及創立农业銀行的法律。”

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大約有三打构成法，好几千条条文，諸位先

生，你們要做的事情如此之多，以致修改宪法、批准預定的法律、討論提出的草案等工作頂多只能完成一半。即使这样，你們也得表現出真正超人的工作能力。可是在目前，各地还在繼續戒严，而且在还没有戒严的地方也要实行戒严（誰妨碍我們在全普魯士“按地区”实行戒严呢？）；在目前，欽定的所謂宪法和欽定的补充法令仍然有效，至今还在实行的根本不适用的市政条例仍然有效，同样情形的县、行政区、省的代議制也仍然有效，将像以前一样沒有受教育的自由，高等貴族仍然免納土地稅，农民还要服徭役。

但是为了使你們不能抱怨，除了这一切未完成的工作以外，还要提交給你們 1849 年和 1850 年的**两份預算**。你們会被这么多的工作激怒得从自己座位上跳起来吧？那就更好，第一議院和第二議院的諸位議員先生。这样，“我的政府”就将根据欽定的所謂宪法，永世地征收現行的各种賦稅。何况，联合議会所批准的二千五百万已經剩下不多了，如果“我的政府”还需要錢用，那它就会自己决定怎么办。

但是，如果你們想要步被解散的国民議会的后尘，那末，諸位先生，我提醒你們，普魯士軍隊的“組織、战斗力和忠誠”是“經受了严重的考驗”的，特別是在去年 11 月大肆搜捕協商派的时候“經受了严重的考驗”。

好啦，第一議院和第二議院的諸位議員先生，現在已經采取了一切措施，使你們既不能在彼此間協商好（由于两院的成分），也不能跟“我的政府”協商好（由于“我的政府”的成分）；已經提交給你們这样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材料，你們即使别的任何事情一概不管，也不能搞清楚这些材料的一小部分，这样，就保持住了官僚封建的軍事专制制度，——在这样的時候，你們要記住祖国所期待于你們

的是什么：

“第一議院和第二議院的諸位議員先生！現在，祖國信賴地希望，由于它的代表和我的政府的通力合作，能使重新建立起來的法定秩序得到鞏固，以便有可能享受憲政的自由和這種自由的平靜發展。保衛這些自由和法定秩序——這兩個社會福祉的基本條件，將永遠是我關注的對象。我指望在這件事情上能得到你們的幫助。依靠上帝的保佑，你們的活動一定會使普魯士的尊嚴和榮譽得到提高，普魯士的人民同自己的君主們緊密地團結一致，已經不止一次地順利渡過了艱難的時刻；同時，你們的活動也會為祖國創造出一個在狹義上和廣義上都是和平幸福的未來！”

公民曼托伊費爾的御前演說就是這樣。而居然有一些毫無風趣的人竟把這種巧妙表演的喜劇稱為“憲政的御前演說”！

真的，如果說有什麼事情能促使曼托伊費爾先生丟掉他的公事皮包的話，那就只有這種對他的最善良的意願的曲解了！

寫于 1849 年 2 月 28 日—3 月 1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3 月 1 日和 2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 234 和 235 號

卢 格

科倫3月9日。“德意志总汇报”²⁴² 刊載了該报的老撰稿人、性格如波美拉尼亚人、聰慧如薩克森人的阿尔諾德·卢格先生的下述声明：

“柏林3月5日。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現任委員德斯特尔、賴辛巴赫和赫克札梅尔宣称，即将出版一种名为‘民主总汇报’的新的民主派报纸，这家报纸将‘真正’是柏林党的机关报。这一声明很可能引起疑惑，使人以为‘改革报’和‘閱报室’这两种报纸似乎不真正是党的机关报，而在声明的开头甚至还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两种报纸都被查封了。中央委员会宣称并认为弗兰格尔暂时停止这两家报纸的出版是彻底查封两报，声明的这一部分的全文如下：‘民主派最近几个月来在德国各地所經受的种种严重的考驗，不仅使它深信必須有坚强的組織，而且也使它感到需要**有固定的、属于党的机关报作为它在报界的代表**。当局依靠軍刀制度，得以在許多地方〈“軍刀制度”其实只統制着柏林！〉查封了一些民主派的机关报，**因为某些个别人不能够忍受如此重大的牺牲来使这些暴力措施无效**’。至于軍刀制度，每个人都知道所謂‘許多地方’只是柏林。甚至整个民主派也只有消灭軍刀制度，才能使这些措施‘无效’，因为弗兰格尔已經使柏林和柏林的邮局不接納民主派的机关报。就让中央委员会指出那些手段——必要时也可以說是‘牺牲’，借助于这些手段它处在我們的地位就可以使这种暴力无效吧！可是，即使按照弗兰格尔的意見，‘改革报’和‘閱报室’也并没有‘被查封’。然而我确信，凡是收到上述通告的民主派都会把通告解釋成，似乎‘改革报’和‘閱报室’都已經停刊，代之而起的将是‘民主总汇报’。我认为必須消除这种誤解。‘改革报’并未彻底被查封，一旦柏林取消戒严，它就会重新开始在柏林出版，而且正是作为民

主派的**真正的**机关报出版；根据已被解散的国民议会的左派和德国民主主义者上届中央委员会的明确的决议，这一机关报同由本届中央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德斯特尔和赫克札梅尔）所钦定的新报纸一样地‘属于’党。

‘改革报’编辑部

阿尔诺德·卢格”

笔者附言：“请求德国各报的可敬的编辑部转载我们的这个声明。”

我们感到非常满意的是，我们从这个值得注意的声明中知道，*ci-devant* [以前的]法兰克福的“事变的理智的编辑”²⁴³，现在的发行人——毫无疑问是“作为一个发行人”——决不自认为他满意于钦定“在柏林”发行新的民主派报纸²⁴⁴，即应该“真正”成为“柏林党”的机关报的报纸。

法兰克福的“事变的理智的编辑”和“改革报”²⁴⁵的柏林编辑阿尔诺德·卢格先生断言，“改革报”“本身”也曾经是“柏林党”的机关报；根据民主主义者“上届”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改革报”“曾属于”（如法国人所說，*elle avait été* [老早以前它是]）“党”的。不错，“上届”中央委员会“真正”不再存在了，但是正因为如此，重新出现的“改革报”才能仍然是已故的中央委员会和“已被解散的”国民议会的已被解散的左派的“真正的”机关报。

还是让阿尔诺德·卢格先生去反对来自刚刚钦定的柏林“民主总汇报”的发行竞争吧；在柏林以外，谋求“柏林党”的机关报这个光荣称号的报刊肯定是比较少的。我们至少一向认为“改革报”是“柏林党”的“真正”机关报；我们也能充分地珍视爱国志士卢格由于上述“牺牲”而做的自我克制。可是结果却出现了非常奇怪的矛盾。高贵的印刷厂主卢格站在法制基础上，以便保持自己的“改革报”成为党的“真正的”（*sans garantie du gouvernement* [未得政府保障] 而享有专利权的）机关报。另一方面，哲学家卢格却又站

在叛变的立场上来反对“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以便“真正”有可能以自己的精神（以书商的精神）来造成更多的“牺牲”。

下述事实可以作为这个矛盾之谜的解答：

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已经向卢格声明，愿意把“改革报”当做自己的《Moniteur》^①，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位卢格不发表一切议论并停止写作。

写于 1849 年 3 月 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3 月 10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242 号

① 《Moniteur》（“通报”）全名为《Le Moniteur universel》（“总汇通报”），1789 年在巴黎出版，是代表法国政府的报纸，这里借指正式机关报。——译者注

經濟狀況

科倫 3 月 6 日。对英国人來說，从沒有比他不知道怎样处理自己的金錢的时候更为不幸的了。这就是一切大投机买卖、一切盈利的企业的秘密所在，但同时也是一切破产倒閉、一切金融危机和商业停滯的秘密所在。

在 1840 年、1841 年和随后的几年中，新的亚洲市場除了与欧洲大陆进行一般的貿易以外，对英国的輸出提出了特別的需求。工厂主和出口商有充分理由在曼彻斯特的交易所中向亨利·璞鼎查爵士高呼“万岁”。可是好景不常。广州、孟买和加尔各答很快就为滞銷的商品所充斥，而在这方面已經沒有出路的資本为了扭轉危局，重又在國內寻找用途。它涌入铁路建筑部門，从而为投机倒把开辟了活动场所，使投机活动很快就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

根据保守的統計，新的投資总額估計有六亿，如果不是英格兰、爱尔兰和大陆某些地区的馬鈴薯歉收，棉花价格暴漲，和因这两种情况而造成的工业品銷路縮減，以及铁路事业方面的狂热的投机倒把使英格兰銀行于 1845 年 10 月 16 日把貼現率提高了 50%，那末新的投資总額也許增加得更多。

在不列顛人对本国銀行万能所具有的迷信的恐惧心理支配下，貼現率的这点点提高，或者換句話說，銀行經理的这种不信任表示，立刻引起了相应的反应：精神普遍頹喪了，信貸受到了限制，

继表面繁荣之后发生了大量的破产现象。结果，假若不是随即废除了谷物法²⁴⁶，从而意外地巩固了已经动摇的信用并重新又激发起了企业主的事业心，那末马上就会爆发像 1825 年和 1836 年那样大规模的商业危机。

这一重大措施所产生的短时期的影响，使贸易界满怀奢望，因此它轻易地忘记了几乎降临的灾难。俄勒冈冲突²⁴⁷的消除预示当时仍然兴旺的对美贸易将继续下去，英国在旁遮普的胜利²⁴⁸保证了印度斯坦的安宁，这一切自然也使得人们又振作起来。虽然在 1845 年的歉收以后，1846 年又遭到了同样的歉收，虽然各地都还不得不靠以前的积蓄来勉强为生，不得不支付经营企业所需贷款的 12—15% 的利息，但是郎卡郡和约克郡的所有的纺纱厂仍然不停地开工，仿佛歉收、铁路方面的投机倒把和市场上的商品充斥现在突然都变成了一瞬间就可以解决的纯粹的小事。

然而这一切好景很快就消逝了。其实，早在 1847 年 9 月，当包林博士在自由贸易论者布鲁塞尔会议上以令人捧腹的激动神色过高评价废除谷物法的神奇影响时²⁴⁹，伦敦就已有有人指出，甚至“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万能措施”也已经不能挽救国家免除人们早就怀着恐惧等待来临的灾难。不得不向命运屈服，而伦敦一些像里德·厄尔文公司那样在毛里求斯岛上拥有将近百万英镑地产的公司，由于这部分英国殖民地的悲惨状况，开始纷纷地倒闭和破产，同时又殃及东印度和西印度的许许多多较小的公司。

同时，工厂区的首脑们确信他们在估计废除谷物法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上犯了错误。商业活动在世界各地都停顿了，而恐怖也在这同一时刻笼罩了伦敦的西蒂^①、利物浦、曼彻斯特、里昂等地

① 伦敦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译者注

的交易所。

于是，在1845年10月被各种事件擋住了的危机终于在1847年9月爆发了。信用扫地了。精力消耗尽了。英格兰銀行不援助国内的銀行；这些銀行也停止了对商人和工厂主的信貸。銀行家和出口商开始限制自己同大陆的交易，而大陆上的商人也开始对欠了他們債的工厂主施加压力；工厂主自然竭力想靠批发商来改善自己的境况，而批发商則压榨小店主。每个人都力求靠損害別人的利益来摆脱困境，而商业危机的灾难也就逐渐震撼了全世界，从倫敦西蒂的巨賈到最末一个德国小店主，无一幸免。

这是1848年2月24日**以前**的事！在1847年的最后四个月，英国经历了最不景气的日子。铁路业的投机商破产了；在殖民地商品的貿易方面，从8月10日到10月15日，倫敦有二十家第一流的商行相继倒閉，这二十家商行的資產总額为五百万，所生股息約占全倫敦的百分之五十；而在工厂区，11月15日曼彻斯特的一百七十五家紡紗厂中充分开工的只有七十八家，一万一千名工人被抛到街头，灾难达到了頂点。

1847年就这样結束了。1848年間大陆受到了英国这次危机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这一次自然更加显得严重，因为政治上的动蕩也未能促使英国的这一非常事变的后果得到消除。

現在我們来談談現代經濟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即革命对貿易活动的影响。

英国貿易出口統計表在这方面給我們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說明，因为在英国支配着世界貿易的情況下，这些統計表的内容就是用数字表明的政治和貿易状态，或者更确切地說，是用数字表明的各国的支付能力。

因此，如果我們看見，1848年4月的輸出額縮減了1 467 117英鎊，5月又縮減了1 122 009英鎊，1847年的輸出總額達到51 005 798英鎊，而1848年總共只有46 407 939英鎊，那末，由此就可以作出對革命非常不利的結論；並且，當我們看到1848年1月和2月即革命爆發前夕的輸出額確實是比1847年多294 763英鎊的時候，就會更容易地得出這樣的結論。

但是，這種看法是絕對錯誤的。因為，第一，在1月和2月中，即正是在區分危機的頂點和革命的那兩個月中，輸出額有所增加，這很容易解釋，因為那時美國人用賣給英國大批糧食所得的錢購買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的英國工業品，這樣就至少在短期內防止了可能出現的赤字。第二，在英國的貿易史上，我們可以找到特別顯著的例證來說明，輸出額的縮減不是緊接在危機之後，而只是在危機已擴展到大陸上以後才發生的。

因此，1848年頭兩個月的輸出額有所增長這一點絕不應使我們產生錯誤的認識，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地來看看輸出額在全年內的普遍縮減。

我們已經指出，1848年的輸出額比1847年的輸出額下降了4 597 859英鎊。這自然是頗大的縮減，這種縮減變成了那些在政治上宛如狂吠的惡犬、在貿易上宛如年邁的老太婆的反動分子反對革命的口實，遺憾的是，他們竟成功地利用了这个口實來同一切不熟悉經濟問題的人們進行爭辯。

然而，駁倒這幫人的謬言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了，因為只要翻閱一遍近三十年來的出口統計表，就可以看出，由於商業危機和革命的同時影響所造成的1848年輸出額的縮減，同前幾年輸出額的下降沒有絲毫聯繫。

1825年的輸出總額是38 870 851英鎊，在這一年的商業危機以後，1826年的輸出額下降到了31 536 724英鎊。因此輸出額縮減了7 334 127英鎊。1836年的輸出額是53 368 572英鎊，在這一年的危機以後，1837年的輸出額下降到了42 070 744英鎊。因此，輸出額縮減了11 297 828英鎊。再沒有比這更能說明問題的了！

這兩次商業危機固然都是完全由工業品的生產過剩引起的，但在規模上根本不能同剛剛結束的危機相比。在這兩次商業危機以後，輸出額的縮減總數比1848年的輸出額下降的總數大一倍，而1848年是這樣一個年頭，在這一以前，亞洲市場就已為貨物所充斥，發生了兩次歉收，投機活動的規模達到空前未有的地步，在這一年中，舊歐洲的每個角落都掀起了革命！

的確，1848年對於貿易還是很仁慈的！革命使得各地的貿易停滯了，出賣貨物困難而危險，不少人在債務的重壓下破了產。但是，去年路易-菲力浦當政時，也和今年共和國時期一樣，在巴黎同樣很難盤點出兩萬或三萬法郎這樣很少幾個錢。在德國南部，在萊茵，在漢堡和柏林，無論發生革命與否，我們也一樣地遭到破產，而意大利的貿易無論是在教皇庇護的統治時期或是在米蘭、羅馬和巴勒摩的英雄們的統治時期，都同樣處在被壓迫的境地。

因此，硬說貿易的重新活躍是反革命暫時勝利的結果，同樣也是可笑的。法國人之所以在倫敦的拍賣中肯多付百分之二十五的價錢來收購羊毛，並不是因為路易-菲力浦的一些大臣重新掌了權，——不是的，他們之所以要付昂貴的價錢，是因為他們需要羊毛，而他們之所以需要大量羊毛，他們的需求之所以增加，正是因為在路易-菲力浦統治的最後幾年中這種需求縮減得非常厲害的緣故。需求的這種波動在全部貿易史上都可以看到。

而英国人之所以又整天地在一切矿山中，在一切鍛铁場中，在一切紡紗厂中，在自己的一切港口上工作，并不是因为某个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根据战地法庭的判决处死了一些維也納人，——不是的，他們之所以这样工作，是因为广州、紐約和圣彼得堡的市場需要用工业品去供应，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开辟了一个似乎可以永无止境地进行投机买卖的新市場，是因为继 1845 年和 1846 年的歉收之后出現了 1847 年和 1848 年的两次丰收，是因为英国人消灭了铁路业方面的投机活动，是因为貨币重又回到了自己往常的軌道上，而英国人将工作下去……直到爆发新的商业危机。

但是首先我們不應該忘記，决不是君主制国家最近几年中对英国的工业产品提出了主要的需求。那个几乎毫不間断地向英国产品提出了最大量需求的国家，那个現在还在吞食曼彻斯特、里昂、哈里法克斯、諾定昂、罗契得尔等地市場上和現代工业的所有大通航港口上的一切貨物并以自己的船舶来活跃海洋的国家，是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即北美合众国。正当現在世界上的一切君主制国家都搖搖欲墜的时候，这个国家却大大地昌盛起来了。

如果說德国的某些工业部門的狀況在最近几年內有所好轉的話，那末这也只应归功于英国的繁荣时期。但願德国人能从全部經濟史中知道，他們沒有自己的經濟史，他們必須为英国的危机付出代价，而在英国的过度生产时期，他們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好处。而他們的各个基督教德意志政府給他們的恩典只是加速破产而已。

写于 1849 年 3 月 6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3 月 7 日
“新萊茵报”第 239 号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英国士兵的誓言

科倫 3 月 7 日。“新普魯士报”万分得意地援引英国士兵的誓言，并且由于发现英国士兵只宣誓效忠于女王而并不宣誓效忠于宪法，感到无比高兴。它說，我們在普魯士这个最年輕的立宪国家中，为什么要一反最古老的立宪国家的先例，迫使士兵对宪法宣誓呢？

但是，“新普魯士报”却忘記告訴自己的讀者，英国士兵对于民法是处在怎样的地位。

英国士兵在犯了一切不是純粹紀律的过失时，都由普通法院、治安法院、petty sessions [小型审判庭]、quarter sessions [季度审判庭]²⁵⁰ 或陪审法庭进行审讯，他們和其他公民发生任何糾紛时，都被当做普通公民看待，——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但还不止于此。在英国，每一个公民，不管他是官員、士兵或者是其他什么人，都要对自己的一举一动負法律責任，而不能借口某項行动是按照自己上司的命令作出的。举例來說，发生了叛乱。召来了軍隊。不論是否根据法律提出了驅散民众的要求。民众拒不散去。不論民政官(通常是治安法官或选任的市政官)是否准許軍隊进行武装干涉。士兵开枪射击，有人被打死。尸体由負責調查現場情况的專門驗尸委员会檢驗。如果驗尸委员会认为軍隊的

武装干涉并非出于不得已的情况，它就会对所有肇事者，即对准許軍隊进行武装干涉的民政官、命令开枪射击的軍官和所有确实开枪射击的士兵作出蓄意謀杀的裁决。

如果民政官沒有准許軍隊进行武装干涉，那末裁决的結果則不涉及民政官。但对于軍官和士兵的裁决并不因此而改变。

这个关于蓄意謀杀的裁决也就是正式的起訴书，据此就可以把所犯的刑事罪交由普通的陪审法庭审理。

由此可見，英国的士兵在法律上絕沒有被看成是机械地照命令办事的沒有意志的机器。相反地，法律认为他是 «free agent» [“自由行动者”]，是有自由意志的人，他随时都应当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对自己的一举一动負責。如果被控告的士兵为自己辯护，說他是奉命射击的，他必須“服从命令”，那末他就会受到英国法官严厉的斥責！

普魯士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在普魯士，只要士兵声明他是奉自己的直接上司的命令开枪的，那就可以使他免受任何懲罰。在普魯士以及在法国，官員違犯了法律，只要能证明他这是按照規定的官阶制中相应的上司的命令做出的，就可以完全免受任何法律处分。

我們并不认为，短短的几句誓言就可以改变一个人，就可以使一个黑白色近卫軍中尉变成“宪政自由”的維護者，——应当认为，“新普魯士报”是会相信我們所說的这一点的。

为“天佑吾王，天佑吾国”而奋斗的先生們，根据自己親屬們的切身經驗，在最近十二个月当中已能愉快地看到，宣誓具有怎样的意义。因此，只要能够像上面所說的使“我的英勇軍隊”在法律方面处于跟英国士兵完全相同的地位，那末，無論“新普魯士报”要軍

队对国王宣誓、对达赖喇嘛宣誓或是对那个还不知是誰的人宣誓，
我們都毫不反对。

写于 1849 年 3 月 7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3 月 9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 241 号

三月同盟

科倫 3 月 10 日。法兰克福的所謂“帝国議會”的法兰克福的所謂“三月同盟”²⁵¹，竟厚顏无耻地給我們寄来了如下一封石印的信件：

“三月同盟决定編制一份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給我們支配的所有报纸的名单，并分发給和我們有联系的一切同盟，以便在这些同盟的协助下，使上述报纸优先得有有关的公告。

在把这份名单通知你們时，我們认为沒有必要提請你們注意收費的‘公告’对报纸來說是整个企业的收入来源的意义。

其次，鉴于艾森曼博士先生在維尔茨堡发行的民主立宪派报纸‘德意志人民报’有竞争不过反民主报刊的危險，而編輯先生又声明他除了已作过的牺牲外，不能再作新的牺牲，所以，中央三月同盟决定建議各同盟給該报以友好的支持。

中央三月同盟理事会

1849 年 2 月底于法兰克福”

“新萊茵报”也被列入了随信附来的报纸名单——据说这些报纸都“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給三月同盟支配”，“三月同盟”的拥护者都应当把“有关的公告”优先供給这些报纸刊登——，并且还加了一个光荣的星标。

現在我們特向 ci-devant [以前的]“帝国議會”的这个所謂“三月同盟”的一切愚頑的和极愚頑的^① 成員作如下的声明：“新萊茵

报”从未奢望充当某个議會政党、尤其是人所不齿的法兰克福帝国俱乐部的政党的机关报；我們报纸的版面从来没有提供給这个俱乐部的所謂“三月同盟”支配；“新萊茵报”根本就不想知道这个“三月同盟”。因此，既然“三月同盟”也把我們的报纸列入确实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給它支配的报纸的石印名单，并称为它的机关报之一，那末这簡直是对“新萊茵报”的誣蔑，是“三月同盟”的庸俗吹嘘。“三月同盟”的品德高尚的爱国志士們对此自然会感到“心安理得”。

从“三月同盟”“决定”推荐“艾森曼博士”的“民主立宪派”报纸（德意志的 [teutsche] 报纸：“德意志人民报”）来看，“三月同盟”列举我們的报纸就更加荒謬。誰能不为偉大的“德意志的”[«teutsche»] 超級蒙难者艾森曼的悲惨遭遇而惋惜呢？把自己的獄中回忆录以一万二千盾卖給了巴伐利亚的“民主立宪的”国王的艾森曼“博士”，不能“再作新的牺牲”并在发行方面有“竞争”不过那些反对“三月同盟”的非欽定的普通报纸的危險，哪个正人君子能不为此感到震惊呢？請爱国志士們想一想：既然蒙难者艾森曼（他是一万二千盾的拥有者，他是薪資五塔勒的議員）竟不得不吁求社会的“援助”，可見“德意志人民报”的情况不知糟糕到了什么地步。不管怎样，既然“民主立宪派”的艾森曼之流竟盜用“新萊茵报”的名义来写求乞信，而“新萊茵报”又是德国唯一抨击爱国志士和帝国求乞議會中的“无耻的可憎的求乞者”的报纸，那就可見他們的情况是非常非常不妙的。

对于財迷心窍、耽于竞争的爱国志士們关于“收費的公告对报

① 原文中的 «linkische und äußerst linkische» 同 «linke und äußerst linke»（“左的和极左的”）相似。——編者注

紙來說是**整個企業的收入來源**的意義”這個齷齪的意見，我們當然不打算回答。“新萊茵報”在一切方面都始終和愛國志士們不同，而尤其和他們不同的是，它從來沒有把政治運動看做投機勾當或收入來源。

卡·馬克思寫於 1849 年 3 月 10 日

載於 1849 年 3 月 11 日“新萊茵報”
第 243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維也納和法蘭克福

科倫 3 月 12 日。帝國國會擬於 3 月 15 日在克累姆西爾討論憲法委員會所起草的憲法草案。戰地法庭的那些皇家的惡棍認為，這個時機最適宜於把早已炮制好的“天賦”憲法拋給帝國國會，從而結束他們一直忍耐到今天的，在克累姆西爾上演的人民代議制的全部滑稽劇²⁵²。

欽定憲法的全套詭計，還是去年夏天由那些受過和未受過塗聖油儀式的反革命分子在雪恩布龍—維也納、波茨坦—柏林、倫敦（在這裡，梅特涅好像是神聖同盟的一只十字圓網蛛，坐在慢慢在奮起爭取自由的各族人民周圍編結起來的蛛網的正中）和巴黎策劃好了的。這套詭計之所以先由波茨坦國王施行，完全是由於普魯士的形勢造成的，普魯士有可能比奧地利先走這一步。

11 月，奧地利官方把羅伯特·勃魯姆的血淋淋的頭拋到那些坐在聖保羅教堂開會的人們的腳跟前。在此以前數天，韋爾凱爾和莫斯累這一對最可愛的學生的帝國專員滿載羞辱從文迪施格雷茨的前廳和奧里繆茨的慶祝宴會上回來了；除了極可尊敬的韋爾凱爾和莫斯累，任何別的人要是受了這樣的羞辱，是會寧願開槍自殺，也不會仰人鼻息的。但這一對外交場中的學生子却不是這樣，他們還夸耀自己的迂迴旅行^①。

^① 見本卷第 78—84 頁。——編者注

國民議會的大多數人都表示 «satisfait», 即表示滿意，這種表現跟路易-菲力浦時代的法國議院一模一樣，後者甚至在官方做出最卑鄙齷齪的事情的時候，在官員們的營私舞弊行為被確凿證實的時候，還聲稱自己 «satisfait», 即表示滿意。

就讓被殺害的羅伯特·勃魯姆的鮮血濺在這些坐在聖保羅教堂里開會的人們的臉上吧。不錯，他們的臉紅了，但這不是由於內心慚愧或者是由於義憤填膺和慷慨激昂，而是由於興高彩烈和心滿意足。當然，又派了幾名帝國專員到奧地利去。但他們得到的結果只是：那里用比以前更加鄙視的態度對待所謂的國民議會議員和被他們出賣了的德國。

«Mocht nix, 's is olles Aans!» [“沒有關係，反正是一樣！”]——這就是這些先生過去和現在的座右銘。

我們記得，在普魯士政府發生政變前不久，巴塞爾曼、西姆桑、當然也有“高貴的”加格恩先生以及其他人都曾以帝國專員的身分到過柏林。

而現在我們又看見帝國專員到了奧地利，到了奧里繆茨，他們在來到這裡時，像在柏林一樣，帝國國會已被解散，而皇上靠克羅地亞人、奧地利邊防軍馬隊、古楚耳人等的幫助，給人民欽定了一部“天賦”憲法。

凡是在人民的自由即將遭到扼殺的地方，所謂中央政權的專員就像嗅得出獵獲物的兀鷲一樣馬上就會出現。嗅覺從來沒有欺騙過他們。

現在，這個法蘭克福蛤蟆坑總該相信，厄運馬上就要臨到它的頭上。它要自食其果了。在它進行卑鄙勾當的地方將樹起一塊墓碑，行人可以在上面讀到：“由於胆怯畏縮、學究式的愚鈍和懦弱成

性，在人民的幸災樂禍的嘲笑或完全冷漠輕視的氛圍中，自己作孽而死。”

但是，在這些卑賤的小商販中，有一部分人居然現在還敢以法蘭克福出產的“基本權利”來自吹自擂，自以為他們完成了偉大的事業。他們像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和饒舌的洗衣婦一樣喋喋不休地侈談“基本權利”，可是神聖同盟及其幫凶的“基本力量”却愈加團結起來，並愈來愈大聲地嘲笑教授和庸人關於基本權利的空談。一些人把自己的“基本權利”在一塊紙片上確認下來，而另一些人，即反革命分子諸公，則用磨得鋒利無比的馬刀、大炮和斯拉夫的紅斗篷把自己的“基本力量”巩固起來。

只要德國人民在德國國土上任何一個地方企圖利用自己歷來的基本權利——起義反對封建的或市僧立憲的暴政的權利，法蘭克福就會急忙派出“帝國軍隊”，以使用駐紮軍隊、搶劫、屠殺和種種軍事騷擾來懲治和鎮壓人民，以便使反革命的工具保持正常狀態，即靠損害人民和踐踏人民的“基本權利”來把它好好地養肥，使它更有力量，好繼續建樹英雄業績。

在類似的情況下，法蘭克福諸君總是有必要的力量，因為他們從我們的愛民如子的君主們的上述“基本力量”的武庫中借用了這種力量。

因此，毫不奇怪，為什麼法蘭克福蛤蟆坑要熟視無睹地保持緘默和不聲不響地看着受過塗聖油儀式的先生們宣布自己的“基本權利”，即令這些先生們的“天賦的”基本權利是直接反對它的。

所以，現在它也得同樣安靜地看着，奧地利的塔梅爾蘭^① 怎樣

① 指奧皇弗蘭茨-約瑟夫一世。——編者注

靠上帝和索菲婭的恩典，賜給自己心愛的“臣民”（其中有大量德國人）以十三條基本權利，同時隨着這次變革，又一次賞給法蘭克福的英雄們一記響亮的耳光。真是活該！

寫於 1849 年 3 月 12 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49 年 3 月 13 日
“新萊茵報”第 244 號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三个新法案

科倫 3 月 12 日。普魯士王权认为它大显威風的时候终于来到了。“未被削弱的”天賦国王²⁵³今天賜給我們三个新法案——关于俱乐部和集会、关于招貼²⁵⁴和关于出版的法案，議會就要根据这些法案把令人非常愉快的一系列九月法令橫加在我們头上。

明天我們將原封不动地发表我們所收到的这些草案及其說明的全文。我們还要回过来談論(而且不止一次地)普魯士国家制度的这些絕妙的产物。今天我們只簡略地談談这三个法案。

一、俱乐部法。“一切會議均应于召开前二十四小时提出申請。”这样一来，凡因意外的重大事件而举行的紧急會議都要遭到禁止，但正是这样的會議是最重要的。应当准許一切人出席會議，这就是說，要禁止征收抵补組織會議的开支的入場費。社团开会时，必須把會場的四分之一的地方让給非社团人員。这就是說，社团必須出較高的租金来租賃較寬敞的會場，让警察局的雇佣密探有可能用喧嘩、叫嚷和起哄来阻撓問題的討論并破坏整个會議。如果这一切都沒有达到預期的結果，那末“警察当局的代表”还有权用任何借口“立即解散”任何會議，就像“警察当局”的最高首脑、我們的皇恩浩蕩的国王陛下曾“立即解散”協商議會一样。一旦警察局宣布解散會議，所有出席會議的人都必須立即离开會場，不然他們就会遭到和柏林的協商騎士們同样的命运，即被人用刺刀攆

出会场。

不错，俱乐部活动是不需要得到“预先批准”的，但是必须向地方当局预先提出许多申请书和履行很多手续，以致仅仅因这个缘故，俱乐部的活动就几乎不可能开展。至于召开露天集会、组织示威游行等等，那就需要得到警察局的预先批准。而为了杜绝佩戴红色丝带、帽徽和帽子的现象，还钦命重新颁布关于搜捕佩戴黑红黄三色²⁵⁵徽章的人的旧法令。

笃爱真理、言而有信的霍亨索伦一年前用颤动的声调向我们保证的“结社和集会的权利”就是这个样子！

二、招贴法。凡属政治性内容的招贴，除关于合法的，即业经批准的会议（可见，一切会议仍然只是被恩“准”的）的通告外，一律禁止张贴。这就是说，俱乐部理事会在风暴时期也没有权利即使通过招贴来号召民众保持镇静；而凡此种种都是为了使受害者一个也不能逃脱耀武扬威的丘八之手！其次，在街头出卖或分发印刷品，如果未经有关方面的许可，也在禁止之列，但这种许可又可能随时被撤销！换句话说，普鲁士王权想用修订版的 *crieurs publics* 法令²⁵⁶ 来造福我们；这个法令是吓破了胆的法国众议院在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专制最坏时期被迫通过的。

可是，制定这项法令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据说招贴和报贩会妨碍市内交通，此外，招贴还有损公共建筑物的外观！

三、出版法。但是，和那些想用来堵塞出版言路的美妙的法案相比，这一切还算不了什么。谁都知道，从 1830 年起，霍亨索伦家族对人民的关怀主要表现在，他们力图使普鲁士的宗法家长制度同路易-菲力浦式的精致的现代奴役制度结合起来，以使用这种办法来改进普鲁士的宗法家长制。他们保留了笞刑并补充以大槓

船苦役，保留了书报检查制度，同时又賜給我們九月立法的最精美的杰作。总之，讓我們能够同时享受封建奴役制度、官僚警察制度和現代資產階級法定的殘酷手段这三者的好处。而这一切的总和就叫做“众所周知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自由主义”。

具有許多复杂条文的霍亨索倫新出版法案賜給了我們一个最完美的綜合物：(1) Code Napoléon [拿破侖法典]，(2) 法国的九月法令和主要是(3) 值得頌揚的普魯士法。

第九节系抄自 Code。在施行普魯士法的地区，以往对图謀罪和教唆罪(即使教唆成功)的懲罰都輕于对現行犯的懲罰。这些地区現在都采用了 Code 的条文。根据这一条文，凡教唆犯罪得遂者与犯罪者同等論处。

第十节。法国的九月法令規定：企图侵害市民社会中的財產和家庭所依据的基础者，或挑撥公民相互仇恨或歧視者，皆处以两年以下的徒刑。試对照 loi du 9. sept. 1835 [1835年9月9日的法令]，第八条：

Toute attaque contre la propriété... toute provocation à la haine entre les diverses classes de la société sera punie etc. [凡屬企图侵占財產者……凡屬挑撥社会各階級間的仇恨者，皆处以……等等。]

区别仅仅在于：普魯士的譯文——挑撥一般公民相互仇恨，等等——比原文糟十倍。

草案的以下各节的制定，只是为了重新把出色的普魯士法賜給萊茵省，这部普魯士法我們充分領教了三十二年，而在3月18日以后不久才被廢除的²⁵⁷。順便說一下，国王还准备把我們本萊茵省的法律所根本沒有的以下各种新罪名欽定給我們：

1. 用明知是虛假的消息或用在法律上不能得到证实的事实来

挑撥人們仇恨和輕視国家机关或政府者。

2. 发表在形式上势必〈!〉煽起对合法存在的宗教团体〈根据欽定宪法, 甚至土耳其人和多神教徒也都算是合法存在的宗教团体!〉的仇恨和歧視的“言論”者。

这两种新的罪名是要在我們这里采用(a)旧普魯士的“煽动不滿”和(b)旧普魯士关于褻瀆宗教的概念; 这两种罪行都处以两年以下的徒刑。

3. 侮辱陛下和不敬重〈!!〉

(a) 国王〈!〉

(b) 王后〈!!〉

(c) 王儲〈!!!〉

(d) 王室的其他成員〈!!!!〉

(e) 某个德意志邦的元首〈!!!!!!〉者

处以为期一个月至五年的徒刑!

4. 还有一条大有教益的法令, 根据这条法令, 即使是对证据确凿的事实做出的論断, 但只要被論断的事实证明是蓄意侮辱者, 也应按侮辱罪論处!

5. 侮辱

(1) 两院中的一院

(2) 两院的議員之一

(3) 国家机关〈Code 未規定有对整个社团的侮辱罪〉

(4) 官吏或军队的代表〈这一切都是“就他們的职务方面而論”的〉

处以九个月以下的徒刑。

6. 对私生活的侮辱或誹謗。Code Napoléon [拿破侖法典] 只

規定对公开进行的或到处散布的侮辱或誹謗加以惩治。新法案則企图把在私人談話中、在自己房屋中、在自己家庭中、在私人通信中所发表的任何意見都置于警察局和檢察机关的監督之下并加以惩治，——也就是說，新法案企图組織最卑鄙的无孔不入的特务活动。有无限权威的法兰西皇室政权的軍事专制总还尊重私人交談的自由；这个政权——至少在它的立法中——是禁止擅入私人住宅的。普魯士的家长立宪制的監視和惩罚竟推广到了私人生活，推广到了私人生活中最忌諱的領域——甚至連野蛮人也认为是不可侵犯的家庭关系的領域。然而，正是这同一法律以前曾有三項关于任何侮辱家庭关系的言行都要处以两年徒刑的規定！

这就是想恩賜給我們的最新“成果”。彼此相互补充的这三个最殘酷的法律，达到了暴戾恣睢和背信棄义的頂点。这三个法律就是“未被削弱的”国王用欺詐手段向議院勒索的取消柏林戒严状态的賠償！

这一切的目的是昭然若揭的。至于出版法案，則沒有欽賜給旧有各省什么新貨色。普魯士法本身本来就已經够恶劣的了。眞命天子完全是对我們萊茵省的居民发泄怒气的。我們好容易才摆脱了普魯士法，由于廢除了普魯士法，我們才終于有可能稍微比較自由地喘一口气，自从我們被束縛于普魯士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可是現在有人想把这部最可耻的普魯士法再度强加在我們头上。

天賦国王在解釋这个美妙的文件时通过他的奴才曼托伊費尔的嘴，非常清楚地說明了他的意图：国王想“尽可能建立統一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說，他想排除可恨的法兰西法律，而在各地普遍施行可耻的普魯士法。其次，国王想把由于“1848年4月15日的指令”廢除了“有关侮辱陛下的刑事法規”而“在萊茵省大部分地区”

(請听!)造成的“缺陷弥补起来”!

这就是說，新的刑事法規要剝夺在我們萊茵省居民这里所剩下来的所謂 1848 年革命的唯一成果——我們自己的立法行动不受任何限制。

总之，无论如何要使我们成为**普魯士人**，即成为合乎皇恩浩蕩的君主的心意的普魯士人，忍受普魯士法的管束、驕橫的貴族的欺凌、官吏的压迫、軍刀制度的統治和棍棒的毒打并接受书报檢查制度的俯首帖耳的普魯士人。这些法案还只是一个开端。我們知道有一个反革命計劃，而我們的讀者如果知道根据这个計劃要搞什么活动，一定会大吃一惊。我們毫不怀疑，柏林諸公一定会对萊茵省居民再次感到大失所望。

我們还要不止一次地回过来談这些可耻的法案，单就起草这些法案一事，**大臣們**就該坐上被告席。但有一点我們今天就應該指出：如果議院同意了和这些法案哪怕稍微有一点相似的东西，那末，萊茵省的議員就該馬上退出議院，因为議院通过这样的决議，就是打算把自己的选民抛回到旧普魯士立法的宗法式野蛮状态中去。

卡·馬克思写于 1849 年 3 月 12 日
載于 1849 年 3 月 13 日“新萊茵报”
第 244 号特別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政府的挑衅

科倫 3 月 12 日。加冕的和未加冕的先生們打算以 1849 年 3 月的加倍的欢乐来补偿他們在 1848 年 3 月所受的痛苦。为了这个目的，他們用尽一切手段，要在三月事件周年紀念的时候，尽量在德国各地制造騷乱，从而使反革命先生們能够得到新的借口来采取暴行。因此，几个星期以来立宪派和貴族的报纸天天都在散布荒誕无稽的謠言，說什么正在大規模地准备三月起义，說共和主义者的志願部队多次越过法国和瑞士的国境实行进犯（在瑞士有十五个半德国共和主义者）；而且总是引用“可靠的消息”、“无可怀疑的事实”和“确凿的报道”来证实这些謠言，以便使盲从的庸夫俗子們极度惊慌。在这当儿，“天賦”的滑稽家們却安然坐在后台，为奴才报刊有系統地傳播的荒誕消息所产生的影响而感到欢欣鼓舞，当胆小的庸夫俗子們对这种人为的騷乱 *au sérieux* [信以为真] 的时候，他們就得意洋洋地流露出蔑視的微笑。

巴登，也就是貝克，受命为这次运动打开場鑼鼓。巴登卖身求荣的新聞記者立即唯命是听地彈起了这一套关于进犯、叛乱和其他愚蠢行为的无聊的老調。維尔騰堡和巴伐利亚赶紧来帮腔。卖身求荣并且已經出卖了自己的、毫无用处的、小商人气质的法兰克福的“日报”不甘落后，而且也不能落后，他們以自己在全帝国的作用自夸。无論是黑森人，盲人和明眼人^①，还是施梯維式的汉諾威

人，無論是像腊腸一样的細高个的不倫瑞克人，还是其他各族人民（居住在德国的殉难者和殉教者），都必须唱一个調子。这一点可尊敬的弗兰格尔—曼托伊費尔做得最好。为居住在伯桑松的德国流亡者預备了四百張伪造的护照，此外，向黑白色国家^②的各个角落发出了指示，并且派遣了密使，責成他們通过报刊和口头宣傳尽量喧囂，說三月叛乱分子共和主义者就要来到了。

但是許多基督教德意志的报纸沒有考虑这些非常狡猾的指示，它們一开始便过分地喧囂起来。为了糾正这个錯誤，它們把鼓播得更紧更响，散布更加厚顏无耻的謊言。

自然，汉澤曼先生馬上就参加到这一伙高声怪叫的人当中来了，在他新創办的报纸²⁵⁸上对他們阿諛奉承，大加支持。汉澤曼在第一議院里給自己戴上了反对派議員的假面具，同时他又在設法消除他的伪装的反对派面貌所产生的印象，他以曼托伊費尔—勃兰登堡政府的忠实卫士的身分，在自己的报纸上刊登了关于危险的三月起义的非常荒唐的消息和通訊。我們只須举出一个例子来看看就够了。以最后消息的形式在他的报纸上刊載的科倫通訊中散播了下面这些捏造的謊言：

“几天以来，可以說我們是在极度混乱的状态下生活。假如你从街上走过，你就会看見甚至在白天也有成群的工人在閑逛，他們有时哀求乞討，有时搶劫；特别是他們常常侵犯一些小酒鋪和小香烟鋪。事情已經弄到这样的地步：我們的市政厅也不得不用大批軍警来守卫。晚間在街上任何人也不能保証自己沒有危險。最糟糕的是，工人們的情緒被人为地激动起来，以便在3月18日掀起真正的起义。”

① 双关語：«Hesse»——黑森的居民，«blinder Hesse»——“盲人”。——編者注

② 普魯士。——編者注

只要在科倫这里把这篇文章轉載出来，就可以彻底揭露它的挑畔的和可笑的性质。

在科倫的白天，特别是晚上，可以看到的景象是**各兵种士兵之間經常不断的流血毆斗**。显然，有人蓄意以**对工人的誹謗**来掩盖就“我的英勇军队”提出的质問。

政府在公开准备政变，以便完成反革命事业。因此，人民有充分的权利准备起义。但是人民清楚地懂得，法国特别是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危急局势，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为起义打下基础。因此，人民决不会接受那种笨拙的挑畔。

写于 1849 年 3 月 12 日

載于 1849 年 3 月 14 日

“新萊茵报”第 24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霍亨索倫王朝的总改革計劃

科倫 3 月 14 日。“只要普遍戒严被欽定为全王国的法律并成为我們的立宪慣例，特別戒严就会取消。这一套‘强硬的’法律将以关于結社和出版的九月法令开始。”

这是我們在刊登御前演說时所加的按語（“新萊茵报”第 234 号^①）。那末內閣在議會首先采取的行动是什么呢？它出現在議會之前，并宣称：

“我們將使你們摆脱戒严状态，但你們要成立管制集会、結社、出版的常設战地法庭，作为交换。”

我們絲毫也不能隱諱，議會左派的胆怯行为从一开始就帮助了內閣轉入进攻。

我們要把臭名远揚的三个法案同九月法令，同三月以前的刑事立法草案，同普魯士法 *en détail*〔詳細地〕加以比較。但是，首先我們且把前天本报号外中业已提及的旧普魯士改革派的总計劃^②告訴給我們的讀者。

就在柏林的非官方報紙公布臭名远揚的三个法案的那一天，“新普魯士报”这家勃兰登堡先知的《Moniteur》（“正式机关报”）登出了“对于目前正在开会的所謂人民代議机关的重大任务的意

① 見本卷第 375 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401—406 頁。——編者注

見”。霍亨索倫王朝和它的勃兰登堡內閣的出身太“高貴”了，不能在“政权”的太阳正高照“未被削弱的”王冠的时候，还来玩弄假仁假义的把戏。在这样的时刻，国王的心已不能克制，在表达自己內心深处的欲望和思想时使用了极其粗野的詞句来侮辱平民大众。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自己的力量滿怀胜利信心的时候，在如歌德所說的“醉若登仙”的时刻，命运——何必隱諱这个——冷酷无情的命运不止一次地借助于非常事变，肆意把“我們善良的国王”、我們“圣明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作的預言、威胁和他所宣布的心願都一概化为烏有，尽管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把王冠戴在自己头上时所說的話，跟拿破侖戴上倫巴第的铁制王冠时所說的話一模一样^①。但是，誰都知道，就連神仙也得依从铁面无情的天命。不管怎样，国王的心也跟女人的心和其他任何人的心一样，总觉得如果能擯除一切障碍，让自己內心深处的思想任意翱翔，并使世界（哪怕是只在口头上、文字上）服从于自己內心的願望，那倒是件无比快意的事情。

仅就这一点而言，“新普魯士报”流露出的多少反映了国王情緒的心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已經很值得注意了；从另一方面來說，这种心情的流露也使人民了解到，人們期待他們去做什么，而在必要时，将迫使他們去做什么——当然是为了人民本身的正确理解的利益。

“新普魯士报”（第59号附刊）为了使讀者便于了解霍亨索倫王朝的总改革計劃，把这个計劃加以分段标题，这无论如何总算是對讀者的一种值得称頌的照顾。难道它不能用默示录的形式，即

① 見本卷第471—472頁。——編者注

学約翰启示录的方法，把国王的决定曉諭給世人嗎？好吧，我們也就这样按題分段地來談吧！

“目前正在开会的所謂人民代議机关的重大任务”可歸結为以下几点：

(1) 清洗两院中的政治犯。A Jove principium^①。对于那想按照国王的心意来办事的議会的第一条訓誡，就是按照国王的心意来改組。因为它目前的成分还是犯上不恭的普选制（尽管是間接的普选制）的可悲的产物。

那末国王的心要求的是什么呢？

“新普魯士报”道出了秘密，现在的人民代議机关有“污点”，这种污点使它不配和不能“整个地作为普魯士的荣誉、普魯士的忠誠和爱国热忱的体现者”。它身上滿是缺陷，而要想在陛下的眼中成为“清白无辜”的，它就必須去掉这种缺陷。

“这种污点，这种缺陷就在于，議員中間有这样一些人，他們参与了翁魯派的犯罪的恶行，特别是参与了該报关于拒絕納稅的决定。”

随后又說：“政府由于其本身的令人遺憾的軟弱，或由于不信任那确实深受革命思想方式熏染的司法机关，所以沒有把这些人交付法庭懲办。議会的任务就是糾正这种疏忽，这种錯誤；做到这一点，特別是一切参加議会的法官和法学家的天职，即令是为了挽回本等級已失去的荣誉也得这样做。必須呈請政府——但願这是議会組成后的首要措施之一——訓令司法大臣立即下令审讯和懲办这些罪犯。此項清洗工作乃是两院順利地繼續进行活动的首要的和最必需的条件。”

国王的内心願望是想誅灭一切侮慢地拒絕納稅的罪犯的九族。王国政府太軟弱了，它难以实现这个願望。普魯士王国的人

① 直譯为“从丘必特开始”，意即“擒賊先擒王”。这句话摘自古羅馬詩人味吉尔的作品“牧歌”。丘必特是古希臘神話中的主神。——譯者注

民真是厚顏无耻，冥頑不化，竟然为了对国王慈父般的心公开表示憤慨，又把犯人和罪人选做自己的代表。現在兩院的任務就是强迫王国政府实现陛下本人的宿願。議會必須恭請內閣允許它把一切害群之馬和根本不配出入宮廷的分子从自己中間驅逐出去。首先是文人和伪君子、“法官和法学家”應該拯救自己的“等級”，因为自从曼托伊費尔无端怀疑普魯士的西密斯^①，以为她无视国王的明确提示，可能变成了瞎子的时候起，他們等級的“荣誉”就开始丧失了。但是，在决不把真命天子的任何任性要求当作法律，不打算绝对服从国王本人的圣諭的人民的 eyes 中，法官等級怎么能挽回自己的荣誉呢？

如所周知，在一切宗教中，懺悔、牺牲、乃至自我牺牲，是祈禱式即膜拜的真正本质。因此，“所謂的”人民代議机关为了证明它是国王的心的代表——而国王的心是有生命、有个性、有人格的，真正人民的心——，就必須在御座前首先牺牲自己这个人民主权的代表者的身分。

它必須赶走一切不合陛下心意的議員，把他們监禁起来，并交给劊子手，以作为祭祀专制王权的贖罪供品。这样，它首先就可以贖偿自己的罪过，即它产生于人民的主权这一原罪。同时它也可能贖偿自己侮慢陛下因而是褻瀆神圣的罪孽深重的既往。它要淨身，以便蒙受圣眷，成为整个王权的真正代表。它将由“所謂的”人民代議机关变成真正的人民代議机关（在更高的、普魯士王国的意义上来說）。国王就是真正的普魯士人民。因此，真正的普魯士人民——决不应学外国的坏习惯，把它跟全国居民的表面总数混为

^① 西密斯（Themis）是希腊神話中的司法女神，一般用她来代表公正无私的裁判。——譯者注

一談——推选代表只是为了使国王的意願以人民的意願的形式返回于国王，从而使国王自己的高貴心灵中最隱秘的要求通过議会的法案和決議的形式，变成既平凡又为人人所应遵守的现实。

所以，我們期待于柏林的两院的是，它們将以自我牺牲即赶跑拒絕納稅的罪人的举动来开始自己对国王的膜拜。

“新普魯士报”毫不諱言，甚至到了那时候，两院在国王陛下前面也还不能算是清白无辜的。它必須再作另一部分牺牲，但已不是由团体来承担了。这一部分牺牲取决于个别有关的議員是否确实意識到自己的罪孽和是否痛恨自己。

“新普魯士报”感叹道：“不錯，經過这次清洗，不可能把那样一些議員都统统清除掉，这些議員在承认自己在国难中的一分罪責并表示悔改，立誓和公开保証尽力同他們自己要負一部分罪責的罪行作斗争以前，鉴于他們以往的政治活动和国务活动，最好把他們清除掉。但是，自然也談不到根据法律把这些替革命干过事，特别是在3月18日和11月8日期間以显要官員的身分被利用来干这种事情的人〈純粹是普魯士的語法！〉都毫无例外地根据法律从議會中清除掉。不过，如果他們沒有发生上述那种所希望的轉变，那末最好是他們自己的意識能把他們阻止于議會以外。当然，在实现这种〈最崇高的〉願望时，也应该区别对待，例如突然搖身一变而为国家栋梁的萊茵商人們和旧普魯士〈封建〉家族出身的人們就不相同，旧普魯士家族的显赫声名历来是同我們王朝的历史，同君主国的开国基地〈西里西亚不也是开国基地么？〉密切联系着的。”

我們早就对“萊茵商人們”談过这一点了。霍亨索倫封建王朝只是强忍心头的 dégoût〔厌恶〕，才把这批資產階級恶棍选为自己的下賤工具，只等时机一到，就給他們几記耳光，同他們一刀两断。汉澤曼！康普豪森！屈韦特尔！跪下吧！跪在王宮之前，跪在人民面前，沉痛地低下罪孽深重的头来，穿上悔罪人的衣服，庄严地宣誓，公开地表示你們悲痛已极，后悔不該一时胆大妄为，竟用資

产阶级立宪的阴谋来准备唯有“我的英勇军队”才应该干的反革命活动；你们这些吝啬小气的家伙、贪图小利的农奴、俗不可耐的油商、狡黠圆滑的铁路业投机商，你们不仅挽救了御驾，还居然敢用那种只适合于葬礼的念悼文的声调吹嘘这番救驾之功。跪下吧！穿上悔罪人的衣服！要不就隐退到修道院里去！

至于“旧普鲁士家族出身的人”，优秀民族的这些天意命定的高贵的后裔，我们希望最近的将来在“国家通报”上读到他们中的某些人——阿尔宁、奥尔斯瓦特、博宁、普富尔——的讣告。除非他们自愿去死，我们才能相信他们的悔悟。不能期望汉泽曼之流的莱茵商人会有这样伟大的精神。汉泽曼是个最糟糕的伏尔泰信徒，是个鼠目寸光的人，而更主要的是个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温情可言的人。

所以，退出议会，离开舞台吧，你们这些3月18日的活纪念碑，国王的磨难、屈辱、不彻底性和软弱无能的活见证！退出议会，要不就自甘充当3月18日的替罪羊！

至于那些投票赞成拒绝纳税的人，两院自己将用他们在御座之前举行百牛大祭，以表示自己洗心革面和幡然悔悟，从而也证明他们有资格完成国王钦定给“所谓人民代议机关”的下一步“任务”。

（待續^①）

卡·马克思写于1849年3月14日

载于1849年3月15日“新莱茵报”
第24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① 本文的續篇是“霍亨索倫王朝的出版法案”一文（見本卷第432—440頁）。

——編者注

书报检查

科倫 3 月 14 日。德国的日刊终究是全世界最软弱、最无力、最胆怯的刊物！人们在它的面前可以做出种种最卑鄙无耻的下流勾当来侮辱它，而它对这一切都可以緘默不言，忍气吞声。假如偶然有人不知道，由于上帝的恩典，在许多地方长出了多么瑰丽的三月的紫蘿兰，那末，从报纸上当然也决不能了解到有关这方面的任何一点情况。

在杜塞尔多夫，公民和共产主义者德利加夫斯基在去年秋天想借口戒严来恢复书报检查制度^①。书报检查制度只存在了两天；随后掀起的公众的怒潮迫使丘八老爷们放棄了恢复书报检查制度的企图。

但旧有各省的情况又怎样呢？

三个月以来，书报检查制度在两个不同的地区气焰万丈，而旧普魯士的所有报刊却安然容忍这种聞所未聞的侵犯它的权利的行为！

請听。

西里西亚罗森堡^② 3 月 7 日。在“罗森堡-克罗茨堡电讯”第 19 号第一版上登載了如下的声明：

① 見本卷第 64—69 頁。——編者注

② 波兰称作：奥列斯諾。——編者注

“我們請求本報諸位可敬的讀者不要責難本號出版誤期和報道不完備。我們請求讀者注意：我們目前仍然處於戒嚴的條件下，‘電訊’最近一個時期的檢察官是本地的王國行政長官扎克先生，他已當選為第二議院的議員，自從扎克先生啟程前往柏林以後，本報要直接通過軍事的書報檢查。

編輯部啟”

再聽：

在愛爾福特，從 11 月 25 日起，也同樣毫無阻礙地開始實行書報檢查制度。愛爾福特出版界的檢察官起初是弗·沃·胡特施坦納爾先生。現在他是警局督察員，過去他是在書報檢查制度條件下標榜自由主義的“巴門日報”的編輯，偽裝的自由主義者甚至是民主主義者，稍後，他便成了敦克爾的部下和普魯士警察局的專職密探。雖然此公甚至把從倒臺的柏林“國民報”〈！〉上轉載來的文章也盡行刪除，但他的公務活動仍然被認為不夠普魯士化，於是上面就派了一個軍官來接替他的職位。因此，在愛爾福特也同樣實行軍事的書報檢查制度。

不僅如此，對於在外地即沒有實行戒嚴的地區出版的報紙和雜誌，也實行了書報檢查制度。2 月 7 日的“愛爾福特通報”刊載了如下的文告：

“茲奉王國衛戍司令部命令，仰愛爾福特市民知照，如有人散發或張貼對政府的措施表示懷疑或對這些措施採取敵對態度的外地出版之印刷品，從而造成居民和當今立憲政府的关系疏遠或使人產生對某些居民階級之痛恨，因而在本市引起人心騷動和秩序混亂，‘警察當局應對其治以應得之罪’并‘立即逮捕’。

市政府。警察局

1849 年 2 月 5 日於愛爾福特”

恢復書報檢查制度，用軍事的書報檢查制度代替普通的書報

检查制度,这些措施本来是跟报刊休戚相关的。可是,邻近的几个城市——布勒斯劳、柏林、莱比锡——的报刊却把这一切都看做理所当然的事情!确实,德国的报刊还依然是“好报刊”。

但我們要問我們在柏林的那些醉生梦死的議員,他們究竟要拖到什么时候才提議把大臣們交付法庭审判?

写于1849年3月14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9年3月15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246号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十 亿

科倫 3 月 15 日。二月革命以后不久，在巴黎就感到銀根緊張。宣布了 respect de la propriété〔尊重財產〕的規定，而可怜的小資產者就把这看做是保护自己利益的措施。临时政府之所以更情願同意这个 respect de la propriété 的規定，是因为銀行立即給了它五千万的无息貸款。临时政府主要是由“国民报”派²⁵⁹的小資產者組成的，所以銀行的慷慨欺騙了它。五千万很快就用光了。当时，股东和持有銀行券的人最巧妙地利用了 respect de la propriété 的規定，从銀行里把自己的黄金提取淨尽。小資產者也想为自己的利益利用 respect de la propriété 的規定，于是前去找自己的銀行家，要办理以他們的 propriété〔財產〕即他們的工业企业、店鋪或工厂为抵押的期票兌現；銀行家借口銀根緊張，拒絕办理期票兌現。于是小資產者又跑去央求其他的銀行家，想从他們那里得到期票保证并在銀行中兌現；銀行家拒絕这样做。好一个 respect de la propriété！可見虽然銀行家自己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尊重，但正是他們首先違反了这个 respect de la propriété 的規定。于是哀号四起，到处喊叫信貸和信用遭到了破坏。但是，小資產者却怎样也不願放棄自己的 respect de la propriété 的幻想；他們认为，将来恢复了“安宁和秩序”，信用也就会恢复，那时他們就可以用自己的 propriété 作抵押来使自己的期票兌現了。大家都知道得很清

楚，六月战斗以后，安宁和秩序都恢复了，但在依法律手續同破产的债务人达成协议以后，全部 propriété〔财产〕都落入了銀行家的腰包，而小资产者只是当他們的«propriété»〔财产〕已經化为烏有的时候，才懂得了«respect»〔“尊重”〕的意义。但是，因大资产階級造成的金融危机而受害最大的，无疑是工人。正当临时政府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想出了臭名远揚的四十五生丁稅²⁶⁰的时候，墙上出現了一張工人署名的招貼，开头一句話是：avez-vous besoin de l'argent? (你們需要錢嗎?) 這張招貼直截了当地要求收回 1825 年作为賠償送給流亡者的十亿。当时的流亡者都是誰呢？正是那些在国外挑起和支持反法战争、后来由外国人护送回到法国的人。那些享受了賠償的流亡者是誰呢？是奥尔良公爵（即剛被推翻的国王）和正統派（即早已被推翻的国王的拥护者）。制宪議會和国民公会沒收了叛国的流亡者的财产；在两次复辟²⁶¹以后回国的国王和流亡者賜給了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以賠款。国王們又再度被逐，制宪議會和国民公会的决定又重新生效，因此，这笔賠償金应当由人民来享受是完全自然的。工人們兴高彩烈地讀着这样来解釋关于归还十亿的要求的招貼；他們成千成万地聚集在招貼的旁边并各抒己見地討論它的內容。这种情况繼續了一整天；次日，墙上的招貼不見了。正統派和奥尔良派感到危机四伏，于是重金雇用了一批人，命他們于夜間把这張招貼撕毀，不留絲毫痕迹。当时，所有的人都浸沉在新組織計劃的狂热中。每个人都只是想，怎样能发明一种新制度，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馬上就在“国家”中加以实行。临时政府产生了一个倒霉的念头，想对农民課以四十五生丁稅。工人們以为这四十五生丁稅将产生跟归还十亿——征收地产稅——同样的結果，所以就放棄了关于十亿的念头。“辯論日

报”²⁶²和沒有脑筋的“国民报”支持他們的这种想法并在社論中解釋說：真正的資本是“土地”，是天賦的地产；临时政府为工人征收这种賦稅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当开始征稅的时候，农民到处都对城里的工人表示憤慨。农民說，“怎么？我們的景况本来就比工人的景况坏：我們得出重利借錢来种地和养家，可我們除了給資本家納稅和付息以外，还得出錢来养活工人！”

农民离开了革命，因为革命不但不保护他們的利益，反而只使他們受到損害。工人識破了反动政党想出来的征稅的險恶用心，他們現在开始明白了 *respect de la propriété*〔尊重財產〕的全部用意，因为形式上的財產和实际上的財產之間的区别显露出来了，从而他們知道了，資產階級的資本抽掉了土地本身的所謂基础，这块土地的形式上的所有者就成了資本家的臣僕，而賦稅却单单落在債台高筑的臣僕的头上。再加上实际的土地所有者又拒絕信貸、查封財產和用諸如此类的措施，使农民感到了他的威力，于是农民就对革命深恶痛絕。作为大地主而在农村有很大勢力的正統派利用了这种情况，于是保皇党分子开始为亨利五世密謀种种詭計。在对革命是这样可悲的情况下，5月15日²⁶³来临了。巴尔貝斯关于十亿的要求，虽然是改头換面的，但仍然像火星一样重又惊起了人民并燃起了一場大火。甚至六月战斗也未能根除关于十亿的念头，現在，当在布尔日开始审訊巴尔貝斯²⁶⁴的时候，这个念头就更是有加无已地吸引住农民。要求正統派即自己的地主和吸血鬼归还他們农民所征集的十亿法郎，这要比拿破侖誘人得多。爭取归还十亿的宣傳鼓动已經遍及全法国，如果这个問題由全民投票来决定，那末贊成归还的票数就要比贊成拿破侖的票数还多。要求归还十亿，这是吸引农民参加革命的第一个革命措施。来自各

地的請願書和這些請願書的口吻證明，革命已經深入人心。在克柳尼，人們不僅要求歸還十億，而且還要求歸還這十億自 1825 年以來的年息三厘的全部利息。從布尔日的審訊開始以來，這類請願書大量增多，使得布尔日的法官以及他們一伙的反動政黨開始惶惶不安。阿熱、安塞、馬侖、聖維巴爾德、維特爾和許多其他市鎮現在都通過自己的議員把請願書遞交議院。報紙每天在 *rappel du milliard* [歸還十億] 的標題下，公布所有投入這個波瀾壯闊的運動的新市鎮的名稱。很快，在所有的牆壁上，在一切市鎮上，都可以見到：*rappel du milliard*。如果當前的選舉在這個口號下舉行，那我們要看，資本家們——不管他們自稱為什麼，是正統派、奧爾良派或干脆就是資產者——能用什麼來同這十億對抗，他們是否能擊敗那些想靠這十億進入新議院、以便使這些錢用來造福於工农的民主派候選人。但這還不是全貌。路易-拿破侖到處向農民許願，答應不僅歸還按四十五生丁稅繳納的稅款，而且還要減低一切賦稅。所有的請願書都要求把十億主要用于這個目的。至于歸還十億的法律根據，那倒有先例可援，這就是：緊接着 1830 年七月革命以後，突然停止了十億下欠余款的支付。當時之所以沒有要求歸還已經交付了的稅款，完全是因為這些錢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落入了路易-菲力浦本人和他的家族的腰包。

反革命政黨既不能否認這種要求的正義性，它暫時只好推諉說實現這一要求有困難。困難似乎在於要尋找出那些從這項賠償金中多少不等地撈了一大筆錢的人。但這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了。我們就先從得大筆錢的人找起。在名單的開頭，我們可以找到奧爾良公爵（後來的路易-菲力浦）和他的妹妹阿黛拉伊德女士，他們得了五千萬，而只要動用一些不久前國民會議還給王室的無數財

产,这五千万很容易就收回了。

孔代亲王得了三千万,但是誰继承了这笔财产呢?是奧馬尔公爵和德·菲雪尔女士。这样一来,一开头就已經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王室在法国占有大量的地产和森林,而农民已經开始計算,这几千万沒有在 1830 年就归还給他們,使他們遭到了多大的損失。

写于 1849 年 3 月 15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3 月 16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 247 号

法兰克福三月同盟和“新萊茵报”

科倫 3 月 15 日。我們再回过头来談談倒霉的三月同盟^①这个无愧于所謂“三月革命”的后裔。有人責备我們，說什么我們攻击三月同盟，就是“危害自由的事业”。但是，难道我們不是在 1848 年 12 月就已經使“科倫日报”大吃一惊，揭露了三月同盟是**不自覺的反革命工具嗎？**²⁶⁵ 难道我們不是早就已經对“三月同盟”說出了我們对“三月同盟”的看法嗎？如果三月同盟是个革命政党的組織，如果它哪怕只是三月起义的真正的、健康的产儿，那我們也就閉眼不看无疑是它所干的这种**用文告进行投机**的蠢事了。第一，如果不把呼吁看做活动，可以說三月同盟沒有进行任何活动；其次，三月同盟像个幼稚的莽汉一样，动搖于立宪派（我們认为这些人是比馮·拉多維茨騎士的俱乐部²⁶⁶更坏的反动分子）和某些被全帝国和解的空想計劃搞昏了头脑的**真正正直的民主派之間**。在这种中央商务同盟^②中，按其本性來說，总是犹豫不决占上風的；这种同盟也許能煽起人民的不滿，但在紧要关头它会背叛人民，然后又因自己所犯的錯誤而痛哭流涕。所以，商务同盟总是“万事亨通”！而这个同盟的好見怪的脾气却向来很少引起我們的同情；显

① 見本卷第 394—396 頁。——編者注

② 俏皮話：《Central-Märzverein》是“中央三月同盟”，《Central-Commerzverein》是“中央商务同盟”。——編者注

然这些自由派还仍然把自由出版看做仅仅为个人争得的权利。例如，艾森曼先生曾公开宣称自己是永恒不渝的立宪主义者，即共和主义的敌人，而这正是在把“新萊茵报”說成是“純德国式爭吵”的典型的那次三月同盟的會議上宣称的。就是說，要求我們根据对統一的最荒謬的理解，来支持一个荒謬地理解德国統一的人的报纸，不管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出于礼貌，只要这些老爷們在法兰克福的使命不一定要他們“留在原地”，那末他們要我們“带到”多远，我們就把他們“带到”多远。在这些老爷当中有一些“有思考力的历史之友”²⁶⁷。他們不会不知道，不仅在德国，而且不論是在何地何时，同一切三月同盟的意願相反，还在真正的革命开始以前，斐揚派²⁶⁸就被消灭了。正是那个在省的大学区的小飯館中“率先”高喊反对波拿巴的福格特，定将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波拿巴手下的一名不称职的帝国的巴罗²⁶⁹，这对社会共和国的拥护者們有什么好处呢？

卡·馬克思写于 1849 年 3 月 15 日

載于 1849 年 3 月 17 日“新萊茵报”
第 24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第二議院的奏折草案

科倫 3 月 16 日。下面我們向本報讀者介紹第二議院的奏折草案，這是御前演說的枯燥無味、奴性十足的翻版。它的作者是臭名遠揚的紅色土地^①騎士、勇敢的(!)馮·芬克。

奏折起草委員會“感激地承認〈舊約的筆調〉，由於去年 12 月 5 日憲法的頒布，確立了法律秩序”。委員會居然以“普魯士人民”的名義來表示這種感激。為什麼在委員會看來，人民會感謝用軍刀欽定的十二月憲法呢？因為人民“渴望”“恢復社會的法律秩序”。不幸的騎士芬克啊！他所承擔的任務是表明自己是“法制基礎”的維護者，遵守法制是他的專職。但是，在踐踏了 1848 年 4 月 6 日和 8 日的法令從而摧毀了這種法制基礎本身的勃蘭登堡內閣面前，怎樣聲明承認“法制基礎”呢？再也簡單不過了！內閣欽定一個新的法制基礎即戰地法庭，同時也欽定一個戰時狀態的憲章、法典和哲理——12 月 5 日的憲法。起初，內閣消滅了“社會的法律秩序”。然後，政府宣布了另外一種靠克羅地亞人的刺刀維持的“社會的法律秩序”，宣布了 quelconque〔隨便什麼樣的〕法制基礎。但奏折起草委員會以普魯士人民的名義，芬克以普魯士奏折起草委員會的名義，迫不及待地急忙祝賀隨便什麼樣的（任何的、

① 即威斯特伐里亞。——編者注

不管哪一种)“社会的法律秩序”的恢复! 法制基础死亡了! 法制基础万岁! 假若普魯士政府明天被推翻, 假若柏林成立了 Comité du salut public [公安委员会], 那末在最前前往致賀的人当中, 在参加婚礼的宾客当中, 必定会有一个“法制基础的捍卫者”, 一个以感激的声調承认恢复了随便什么样的“社会的法律秩序”的芬克。

幽灵要乘馬急行²⁷⁰, 奏折起草委员会也要乘馬急行。先是“感激”(遵照“新普魯士报”的指示) 12月5日的政变! 然后是宣布軍法宪法为“今后普魯士邦的現行根本法”! 最后則庄严地宣誓, 要“以虔敬和矢忠于国王陛下的精神来进行修改”, 也就是要以欽賜者的精神来修改。这样一来, 可以預料, 一定会迫使我們退回到“联合議會”以前的时代中去!

至于柏林的“戒严”, 奏折起草委员会就只会玩弄陈詞濫調, 說什么“若沒有法定秩序, 真正的自由是不可思議的”。而“法定秩序!”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 从华沙事件²⁷¹中就可以了解。要是普魯士不要錢也能存在, 或者它不求助于这些令人討厭的議會吹牛家也能得到金錢, 那你再看吧! 至于“在柏林城外”宣布的不定期戒严, 委员会則认为还是以“等待国王陛下政府的下一步通知”为宜。而在目前, 宣布了戒严的爱尔福特和西里西亚地区必須靜心忍耐。只要爱尔福特和罗森堡的軍事书报檢察官^①不“抽掉”芬克所拟定的奏折草案, 芬克就已經很 satisfait [滿意]了。这倒用不着耽心!

随后, 芬克以奏折起草委员会的名义允諾, 而委员会又以第二議院的名义允諾, 第二議院則以人民的名义允諾: “集中全力”来尽

① 見本卷第 416—418 頁。——編者注

可能比較令人滿意地完成普魯士王國政府給予“所謂人民代議機關”的任務。那就祝君成功吧！

“我們也很高興地承認，普魯士軍隊在鬥爭的日子里表現出了軍人的勇敢，在嚴酷考驗的日子里表現出了忠誠。”

以帝國法庭²⁷²的精神向丹麥的進軍！在米洛斯拉弗和弗勒申城下的會戰！在安哈爾特、美因茲、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勝利！²⁷³還不止于此！芬克很高興地承認“我的英勇軍隊”的忠誠，但正是這支軍隊殺害了他芬克的前輩并燒毀了舊國民議會的檔案。芬克完全有理由高興。若沒有“普魯士軍隊在嚴酷考驗的日子里”的“忠誠”，我們的芬克就決沒有機會靠起草這個奏折草案來使自己的英名留芳千古了。順便指出，奏折起草委員會在這一點上也像小學生般地遵從“新普魯士報”編制的霍亨索倫王朝的總改革計劃中所包含的那些指示。

但德國問題呢？

“普魯士”將不惜“任何犧牲”，必定要以不同于弗里德里希大帝兼併西里西亞的別種方式來兼併小德意志的土地^①。在“掠奪”方面，現代的普魯士不愧是“和平”進步的維護者。此外，奏折起草委員會“希望”“德國各邦政府和德國國民議會之間達成協議”。我們則希望德國各邦政府不必對這個帝國神學師資培養所特別客氣。

其次，奏折起草委員會還表示了這樣的心願，即希望“丹麥國王關於停止休戰的聲明不至于破壞和平”。芬克知道得很清楚，丹麥的這個停止休戰的聲明不會比普丹戰爭本身更嚴重。普魯士軍

① 即除奧地利以外的整個德意志。——編者注

队以帝国军队的名义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行动，而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军队则以帝国军队的名义在德国南部行动；前者在这里，后者在那里，都宣布成立了战地法庭！

对瓦德馬尔亲王的逝世表示哀悼，保证决心作自我牺牲（通过这种手法，所有这些馮·博德尔施文克輩、里德尔輩、馮·澤肯多尔夫輩、阿尔宁輩、哈尔科特輩、倫納德伯爵輩、康普豪森輩、芬克輩、格律恩輩及其他的流氓坏蛋都成了普魯士的萊喀古士和梭倫），虔誠信賴，崇敬法律，总体精神，正义，天命，国王的心和普魯士的前途，“以及德意志的前途”，——所有这一切，都被奏折起草委员会当做餐末的甜食（由殷勤的馮·芬克帮忙預备好的）端出来款待大家！

倘若某个馮·芬克靠着这点可怜的烹飪技术，就胆敢以委员会的名义、議會的名义、人民本身的名义，把这个人民代議机关和人民变为欧洲戏院最賤楼座观众的笑柄，那末白痴也应该在这种人民代議机关和这种人民中享有公民权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3 月 16 日

載于 1849 年 3 月 16 日“新萊茵报”
第 247 号特別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三月十八日

科倫 3 月 18 日。坦白地告訴我們的讀者，我們今天沒有找到社論的題材。柏林的三月革命这种对維也納革命的微弱反应，从来沒有使我們感到兴奋。1848 年 3 月 19 日柏林曾歌頌：“耶穌是我的庇护人！”我們奉劝威武的柏林人，在今年的 3 月 18 日應該說：“弗兰格尔是我的庇护人。”

“新萊茵报”将只紀念 6 月 25 日²⁷⁴。

但“科倫日报”即“科倫的資產階級”将要做些什么呢？

在 1848 年 3 月 22 日，“科倫日报”对馮·“阿尔宁”先生的主要指責是，他不該封閉“萊茵报”。康普豪森那时还不是內閣大臣。我們指出这一点是为了把真象弄清楚。

对于康普豪森和我們在科倫共事²⁷⁵的那一段最幸福的日子，我們至今記憶猶新。那时康普豪森對我們的態度和現在我們對他的態度——這就是 1848 年三月革命的秘密。

卡·馬克思寫于 1849 年 3 月 18 日

載于 1849 年 3 月 18 日“新萊茵报”
第 249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新普魯士报”論三月十八日

科倫 3 月 18 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机关报“新普魯士报”为 1849 年 3 月 18 日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話：

庆祝自己革命的周年紀念的人民是加倍不幸的；人們生来好作孽，但以自己的罪孽为荣并庆祝自己的罪行，这乃是受了惡魔的唆使。

同一家报纸在同一号上刊载的小品文中，把 3 月 18 日和 19 日的斗争称为“血腥的滑稽戏”！“我的人民”之所以受到这种应得的褒奖，是由于他們进行了不彻底的革命的結果。

接着，报纸报道說，弗兰格尔数日前曾“巡視”了弗里德里希斯海茵²⁷⁶。

但不知弗兰格尔先生在 1850 年 3 月 18 日又将“巡視”什么，知道这点是有点意思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49 年 3 月 18 日

載于 1849 年 3 月 18 日“新萊茵报”
第 249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霍亨索倫王朝的出版法案

一

科倫 3 月 21 日。依照我們的諾言^①，我們現在回过头來談談霍亨索倫王朝關於出版自由和結社權利方面的改革草案，談談這些浸透着戒嚴精神的法案。今天我們只是把這些法案跟過去被萊茵省等級會議²⁷⁷（當時尚在康普豪森反對派庇護之下）所否決的刑法方案作一個對比，並且指出，萊茵省居民應該感謝柏林三月起義的是哪些輝煌的“成果”，柏林大公的“未被削弱的”國王恩賜給萊茵省法律的是哪些浸透了暴戾恣睢的普魯士法精神的革新。

在持有特許紀念狀²⁷⁸的聯合議會中，來自波美拉尼亞省拉曼徹的容克地主塔敦-特利格拉弗兩年前曾挺身捍衛出版自由。威斯特伐利亞新出現的“勇敢的”芬克騎士的戰友舉起自己的長矛說：“不錯，對著作家先生們要公開審判，但是要真正公開的審判”：

“出版自由——同時旁邊還有絞架！”

十一月內閣的欽定法律草案，是本著國王特許狀的精神所表演的三月以前的那套老把戲的重演。“強大的普魯士王權”對 Code pénal [刑法典] 的可恨的條文，對萊茵省陪審法庭宣判拒絕納稅的

① 見本卷第 415 頁。——編者注

拥护者和叛乱分子无罪做的回答是：“不错，要公开审判，但是要真正公开的审判”：

“出版自由——同时旁边还有絞架、普魯士法的絞架！”

Code pénal [刑法典]的条文并不知道霍亨索倫陛下的感情脆弱不堪。虽然有各种資格限制并經過警察当局的精心挑选，但在萊茵省将找不到一个陪審員会同意对侮辱陛下这样駭人听闻的罪行判处比侮辱“私人”为重的惩罚，即超过五法郎罚款的惩罚。帝王专制政体认为声称它的“陛下”可能受“侮辱”乃是有失尊严的事情；但是，臣民之父的基督教德意志意識——这种意識显然是决不能同拿破侖的妄自尊大相比拟的——重又“深感需要”在自己的萊茵大公国中恢复对自己旧普魯士尊严的维护。“强大的”王权不敢廢除萊茵省的訴訟程序，但它在这种訴訟程序上移接了普魯士法的大有希望的嫩枝，并宣称要进行：

“公开的、真正公开的审判——同时旁边还有普魯士法的絞架！”

关于这个在最近将来要被欽定为对萊茵 Code [法典] 的补充的“公开审判”，法案第二十二节这样写道：

“凡預定发行之出版物，若……其內容含有可以依据行政当局的命令予以追究的罪行或过失，不論在何处发现該出版物，纵令該出版物已經开始发行，警官皆有权予以沒收。”

警察有权在邮政局或編輯部沒收他們所不喜欢的报纸，纵令“已經开始发行”，即在警察的“預防措施”“本身”理应結束，而“按照法律”，事情已屬於司法机关的权限范围之內的时候，警察也有权沒收。凡是在出版物、报纸等的“內容含有”可以“依据行政当局的命令”即按警察局的命令予以“追究”的“罪行或过失”的一切場

合，亦即凡是当警察想要滿足其庖代檢察官的烏凱馬尔克²⁷⁹般的僭望并认为需要照例搬出一些“罪行或过失”或一般“可以予以追究”的行为来替这种欲望辯解的时候，警察都有这种沒收之权。最后，凡是这种印刷品，c'est-à-dire [也就是說] 国王和他那神圣的埃爾曼达德²⁸⁰ 认为必須沒收的一切著作，不論警察在何处发现，他都可以加以沒收；这就是說，警察可以侵入民宅，可以干預家庭生活的秘密，在沒有任何根据需靠戒严或克罗地亚部队来保卫財產的地方，警察都可以在宪制法定秩序的掩护下，对和平公民的私有財產进行警察式的掠夺。法案在这里指的是一切“預定”要发行的出版物，“纵令”这些出版物已經开始发行。因此，“不言而喻”，法案規定有权沒收那些尚未开始发行、还不能成为据以指控犯有“罪行或过失”的根据的出版物；这样一来，法案就把警察式的掠夺也推用到那些在法律上完全不“应予以追究”的私人占有物上了。法国的九月法令，卡芬雅克軍事专政的軍刀檢查制度，甚至连那些“冒天下之大不韙”提交給旧有各省的等級會議及其委员会的刑法草案，至少总还尊重“远不能成为据以犯有指控罪行或过失”的根据的私有財產。相反地，在柏林的三月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出版法案，却对公民的財產和私有物組織公然无忌的警察式的劫夺，并且为了基督教德意志的警察道德，把毫不牵涉到刑法的私人关系粗暴无礼地公諸于世。

“公开的、真正公开的审判——同时旁边还有普魯士法的絞架！”

随着这种公开审判的改进，普魯士法的条文也有了改进。

期待已久的关于侮辱陛下的法律，在第十二节中作了如下的“制定”：

“凡通过語言、文字、印刷品或以符号、图画或其他某种描写形式表现出对国王陛下之不敬者，处以两月至**五年**的徒刑。”

如果萊茵的臣民不知道，維也納民族交易市場²⁸¹上欽定給他們的霍亨索倫大公要求人們对他的“尊敬”要达到什么程度，就請他們去查一下关于柏林刑事立法的說明吧。

依照普魯士法，侮辱陛下的最重懲罰在此以前是**两年**監獄監禁或要塞監禁，而对陛下**表示不敬**的最重懲罰則是一**年**監獄監禁或要塞監禁(普魯士公法第二篇第二〇章第一九九、二〇〇节)。

可是，这些条文对于“强大的普魯士王权”的君主感情來說，似乎还不是充分的保障。还在 1847 年提交給联合委员会²⁸²的“普魯士各邦刑事立法草案”中就已經規定，“凡**蓄意**通过語言、文字或以图画等形式对国王的名譽表示任何侮辱者(第一〇一节)，罰苦役**六个月至五年**”；可是，“凡本身虽不能算作侮辱国王、但有失对陛下**应有之尊敬**的言論或行为”(第一〇二节)，处以**六星期至一年**的徒刑。在官方关于这个草案的說明中指出，虽然薩克森等級會議(对 1843 年的类似草案)建議在“表示不敬”之前加上“蓄意”二字，使这种說法的含义精确，以免那些“决无对国王表示不敬之意图”的言論和行为受制于这条法律，但是，据说政府必定会拒絕加上“蓄意”二字，因为这会“抹杀侮辱陛下和表示不敬之間的差別”，因为“蓄意”表示“不敬”應該定罪为“侮辱”。

現在打算欽定給我們的出版法仍然是以这种說明作为依据的。从这种說明自然可以得出結論：現在和侮辱陛下同样处以两月至**五年**徒刑的“表示不敬”，正是“**非蓄意的**”侮辱。

同时“說明”也指出，当时只是根据萊茵省等級會議的建議才把“表示不敬”的最重懲罰定为一年。

“三月的成果”对萊茵省居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普魯士法一移入 Code pénal [刑法典], 就給萊茵省居民欽定了这样一些新的罪名, 如处以两年徒刑的侮辱陛下之罪和处以一年徒刑的“表示不敬”之罪²⁸³。在 1843 和 1847 年的法案中, 被侮辱的陛下的身价抬高到了五年, 而所表示的不敬則不得不根据萊茵省等級會議的建議, 保持一年的刑期。在继三月起义之后所取得的戒严的成就之下, “表示不敬”(即令是非蓄意的)却提高为五年徒刑, 而萊茵省法律則又补充了一些新的罪名, 这些新罪名使萊茵省法律接近了旧普魯士法的美德。

“出版自由, 在戒严条件下的公开审判——同时旁边还有絞架!”

二

科倫 3 月 22 日。

曼托伊費尔关于草案第十二节的說明指出：“关于侮辱陛下之律令尤其不可缺少，因为在萊茵省的大部分地区，有关侮辱陛下的刑法都已根据 1848 年 4 月 15 日的敕令廢除了，这个缺陷从那时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弥补。”

曼托伊費尔的說明断言，霍亨索倫王朝的出版法的这一部分（它甚至超过旧普魯士法与 1843 年和 1847 年的刑法草案所体现的圣諭）对于萊茵省特別需要。1848 年 4 月 15 日的敕令，即“陷于毁灭的王权”（見本月 20 日的“新普魯士报”）在三月起义的压力下所作的諾言，在萊茵省“廢除”了好容易才照普魯士法所欽定下的补充条文，重新恢复了本来就不很純粹的 Code pénal〔刑法典〕。但是，为了适当地弥补这个在三月里所赢得的“缺陷”，并用文件来证明霍亨索倫陛下越来越善于提高自己的身价，“强大的”十一月內閣提供給萊茵省居民的不是三月以前的普魯士法的旧条文，——不是的，而是一个衡量对国王陛下的尊敬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超过以往的刑法草案所創制的各种惩罚的一倍左右。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国王駕崩，国王万岁〕！在 1848 年 3 月以前，臣民之父的“未被削弱的”尊严，按普魯士法，价值为一年徒刑；到 1849 年 3 月，侮辱“陷于毁灭的”王权，价值就已經提高到五年徒刑。在 1848 年 3 月以前，萊茵省的法律只是从宗法式的普魯士法中补充了一些条文；在 1849 年 3 月，則欽定給萊茵省法律以曼托

伊費尔的十一月成就：

“出版自由，軍刀檢查制度——同时旁边还有絞架！”

但萊茵省法律的“缺陷”还表現在別的方面。所以柏林的出版改革草案第十二节又作了如下的补充：

“凡以上述方式〈通过語言、文字、符号、图画或其他描写形式〉侮辱王后者，亦同等論处〈两月至五年的徒刑〉。凡以这种方式侮辱王位继承人〈？〉或王室之其他成員……者，处以一月至三年的徒刑。”

我們已經指出，旧普魯士法对侮辱“国家元首本人”的行为只处以两年徒刑。出版法案显然进了一步，因为它对侮辱次要人物王后的行为都处以五年徒刑，对侮辱次要人物王位继承人（？）和“王室”的“其他”成員的行为都处以三年徒刑。

萊茵省法律既很少知道什么侮辱“国家元首本人”，也同样很少知道什么侮辱“王后”等等。以前，萊茵省的报纸可以逍遙法外地杜撰一些什么“宫廷期望发生意外事件”，这有时——根据医学性质的原因——也可以算是一种不敬的表示。

最后，联合委员会原蒙特許的刑事立法草案认为侮辱“王后”輕于侮辱“国家元首”，因此不是处以五年徒刑，而是处以（第一〇三节）三年徒刑。而关于对侮辱“王后”和侮辱王室其他成員皆予以同等懲罰的問題，1847年草案說明宣称，萊茵、西里西亚、薩克森和波美拉尼亚諸省的等級會議本来想对这些人物加以区分，但对于政府來說，这种可悲的“詭辯”是不能接受的。

然而，强大的曼托伊費尔內閣却不认为旧萊茵、西里西亚、薩克森的等級會議的“詭辯”有損它的尊严。难道油腔滑調的海特男爵不是屬於当时特蒙批准的詭辯家嗎？曼托伊費尔—海特的出版法案“确定”了王后和王室其他成員之間的詭辯的差別；它是按

照三月以后一般国王尊严感的日漸加强来确定这种差别的。旧萊茵、西里西亞、波美拉尼亞的等級會議要求在王后和王室其他成員之間加以区分，以便使侮辱后者所受的同等懲罰（三年徒刑）得以減輕。强大的曼托伊費爾—海特內閣接受了这种区分，但只是为了把对侮辱王后罪的处刑标准提高到侮辱“国家元首”罪的重新提高了的处刑程度。

君主尊严的概念也用这样的方式发展，对上述同一节的补充也就可以证明；根据这一补充条文，侮辱任何一个“德意志邦的元首”，都跟侮辱“王位继承人”一样要处以三年徒刑。

依照萊茵省法律，侮辱第三流的“国家元首”視同侮辱私人（罰款五法郎），其治罪只是根据受侮辱者的申訴，而不是因为这种罪行具有公法性质。根据 1843 年萊茵省等級會議“触犯圣怒”否决了的刑事立法草案和 1847 年再度提出的法案，侮辱外国君主及“王后”者，处以两月的徒刑至两年的苦役；可是普魯士的等級會議建議完全取消这一条，而威斯特伐里亞的容克地主反对派則认为最初的处刑标准过高。最后，曼托伊費爾—海特內閣弥补了萊茵省法律在三月以后的这些严重缺陷，把萊茵—威斯特伐里亞有資格限制的代議机关所抨击的刑期从两年提高到三年，并挺身尽力捍卫联合議会的波美拉尼亞的唐·吉訶德：

“出版自由，真正公开的审判——同时旁边还有絞架！”

最富煽动性的出版改革草案的第十九节簡直是可笑到极点了：

“如有人通过語言、文字、印刷品、符号、图画或其他某种描写形式侮辱……（1）两院中之一院（“作为議院而論”），（2）开会期間某一議院之議員，（3）其他某一政治团体、公共机关或公務人員，处以九个月以下的徒刑。”

尽管曼托伊費尔—海特用刺刀驅散了协商議会和两院等“政治团体”，可是他們却为了“維護这些議会”而把一些新罪名塞进萊茵省居民的“有缺陷”的 Code pénal [刑法典] 中。出于上帝和国王的恩典，曼托伊費尔—海特內閣欽定給全国一部国产宪法，以便給萊茵省法律欽定一种前所未聞的新罪名——“侮辱議院”。

“出版自由，公开审判——同时旁边还有絞架！”

萊茵省的居民小心点吧！以往各次企图把普魯士法移入萊茵省法律的历史，以及霍亨索倫王朝对三月諾言的**进一步發揮**，都向他們表明，應該从萊茵河彼岸的成就中期待什么东西。

以前用战地司法蓄意侵犯 Code [法典] 的目的，不外是要使萊茵省完全成为旧普魯士的省份之一，因为在萊茵省沒有彻底服从于普魯士法的棍棒制度以前，就不能达到完全归并的地步。可是，新法案在用普魯士法的长处来弥补萊茵省法律的“缺陷”的借口之下，还改进了旧有各省的普魯士法，即消除了普魯士法中的过于温和这一“缺陷”。

不管現在的議院是多么不中用，我們仍然不认为它会通过这些法案。但我們推想，在这种情况下，会欽定給我們一付絞杀出版物的霍亨索倫絞架，而我們所希望的也正是这个。

卡·馬克思写于 1849 年 3 月 21—22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3 月 22 和 23 日“新萊茵报”
第 252 和 253 号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柏林关于奏折問題的辯論

科倫 3 月 25 日。坦白地告訴我們的讀者，我們沒有特別的兴致來比較詳細地分析柏林的所謂第二議院的辯論。已被解散的協商議會的辯論雖然意義微小和毫無生氣，但它究竟還具有現實意義；儘管這些辯論所涉及的問題對於歐洲的命運沒有任何影響，儘管其所涉及的法律事先就已經被認為會遭夭折，但辯論終究還是涉及了我們最切身的利益，它像一面準確的鏡子那樣反映出了普魯士反動勢力的成長。而現在的議院所進行的辯論，除了要使已完成的反革命合法化以外，別無任何其他目的。所談論的不是現在——由於禁止議員對政府提出質問，不可能討論這類問題——，所談論的是過去，即 12 月 5 日至 2 月 26 日的暫時空位時期²⁸⁴；假如議院絕對不承認這次空位，它就會被強迫解散，它的工作又會徒勞無益。

現在，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和反革命正手持武器進行決戰，俄國人正駐紮在東方邊境上，而法國也正在準備一場必將震撼全世界的新革命，在這種時候，那有閑情逸致去注意這樣的會議！

關於奏折的辯論，是我們所看到過的一切辯論中最枯燥無聊的了。當然，全部辯論都是圍繞着承認或者不承認欽定的所謂憲法這個問題兜圈子。但這個議院承認與否，又能有什麼意義呢？這個在戒嚴條件下，在順利實現的反革命的壓制下選出來的，在戒嚴

条件下躲在柏林的某个后院里开会的議院，这个为了不致被驅散，不敢說出半个不字的議院，对这个文件承认与否，究竟又能有什么意义呢？似乎这种承认或不承认能够稍稍改变欧洲革命的进程似的，可是欧洲革命必定要把現行各种欽定和非欽定的宪法一概化为灰烬！

在全部辯論中唯一值得注意的，就是右派的稚气自負和左派的怯懦軟弱。

保皇派諸公真是本性难移。当他們的事情剛剛靠唯命是从的軍閥的帮助而又暂时好轉的时候，他們就以为又回到了旧时的乐土，于是开始用蛮横无礼的腔調說話，其蛮横程度为警察国家以往任何时候所不及。

相反，左派諸公却降低自己的要求，右派提高多少，他們就降低多少。在左派的所有发言中，都可以感觉到由于大失所望而产生的沮丧情緒，都可以感觉到过去国民議会的議員們的那种消沉情緒，正是这个議會始則把革命引入泥潭，继而自己也沉沒在这个泥潭之中，在行将灭頂之际又痛苦地哀号：人民还没有成熟！

甚至极左派的議員也不是直接把自己跟整个議会对立起来，而是繼續指望他們仍能在議會本身中并通过議會来爭得一点东西，仍能糾合一个有利于左派的多数。他們不是在議會中采取議會外的立場——在这种議院中唯一值得采取的立場，而是接二連三地让步，以迎合議会的隨風轉舵的习气；他們不是尽可能地鄙棄宪制观点，而是向它頻送秋波，以謀求可貴的和平。

一般辯論圍繞着承认或不承认所謂的宪法這個問題兜圈子。左派既然自认为是前協商議會中主張拒絕納稅的多数派的繼承者，那他們本應該一开始就对 12 月 5 日的政变提出最坚决的抗

議。但他們做了些什么呢？他們表示准备承认国民議会的解散是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准备拒絕关于欽定的畸形宪法是否合法的原則爭論，决心为了仁爱而寬恕自己所受到的拳打脚踢和种种侮辱，并立即着手来修改宪法！

自然，右派以应有的鄙視态度否決了这个胆怯的提議，并强迫左派参加原則的爭論。

左派是罪有应得。为什么这些先生认为他們必須在絕對不能搞出任何名堂的地方去搞出一点名堂来呢？为什么他們硬要自己相信：能够用議會方式爭得那只有用革命方式即用武力才能爭得的东西呢？这些先生确实“由于議會活动而提高了水平”，議員瓦尔德克向我們娓娓动听地叙述了这种水平，在这种水平上，*esprit de corps*〔等級精神〕出現了，而革命毅力——*s'il y en avait*〔如果說以前曾有过它的話〕——却消失了。

称为左派的这个烏合之众的第一个发言人是馮·貝尔格先生。但是切莫认为，在我們面前的又是那个去年曾用各种正中要害的辛辣俏皮話使右派恼恨的矮小而精神飽滿的神甫。貝尔格先生不再扮演神甫的角色——他現在是以牧师的姿态出現。

他认为，最好能把奏折草案写得使“最大多数人都能接受”。議院應該向全国表明，“它的代表并不打算为了对几条原則的徒劳的爭論而牺牲国家的福利”。貝尔格先生在講話結束时指出，草案中缺少“我們〈？〉所遵循的和解精神”和“協商”的願望。他預言說，議院通过关于奏折的辯論不会“在祖国确立和平及对美好前途的希望”。

的确！难道幽里希地区和杜倫的选民派貝尔格先生到柏林来，是要他把人民爭取自己制定自己的宪法的权利的斗争宣布为

“对几条原則”的徒劳无益的“爭論”嗎？是要他用虔誠的語調來鼓吹“和解”与“協商”，要他在只有戰爭可談的時候來侈談“和平”嗎？

人們之所以選舉您貝爾格神甫先生，並不是因為您是一個布道者，而是因為您**投票贊成拒絕納稅**。選舉您出來不是為了要和平，這種選舉从一开始起便是對政變的宣戰。派您去柏林，不是要您去提議和解和協商，而是要您在那裡**表示抗議**。而現在，您當上了議員，您就把人民主權和“專制王權”之間的鬥爭宣布為對几条原則的徒勞无益的爭論！

大多數投票贊成拒絕納稅的議員之所以再度當選，並不是因為他們從1848年5月到11月的全部活動都使選民感到滿意，而是因為他們作出過關於拒絕納稅的決定，從而站到了革命的立場上，因為可以期望，政府給他們飽享的悶棍將最終擦亮他們的眼睛，使他們看清楚，要想爭得任何一點東西，就應該對王權和政府採取怎樣的行動。人們曾希望，由於這一切，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會向左跨出哪怕是一步也好。

與此相反，看來11月間所施的懲罰收到了效果。這些先生不但沒有向左轉，反而向右轉了。他們以抱怨派²⁸⁵的最善意的激情，宣揚和解和協商。他們聲言準備忘記和寬恕他們所身受的暴力，他們主張和平。他們在自己的提議被否決時受到侮辱性的嘲笑，完全是罪有應得。

下一個站起來發言的人是西里西亞的地主**倫納德伯爵**。

倫納德先生認為，3月里沒有發生任何變革，只不過增添了一個新要素。王權依舊是王權，但是一個人民有發言權的等級(!)代議機關作為“決定性的要素”補充了進來。在其他方面則一切仍如往昔。(的確，這也就正是以天佑吾王、天佑吾國的憲法形式欽定

給我們的東西，和必須加以修改的東西。)議員應該“代表人民總體的憲法，也就是說，人民和君主一起，而不是人民反對君主”。(那末試問，如果議員本來就“代表”君主的話，又何必還要一個君主呢?)從這種新的國家理論出發，倫納德先生還向議院作了如下的聲明：議院的存在決不是“為了跟國王零零碎碎地討價還價”——即不是為了跟國王協商，——“為了跟它進行關於言辭或甚至，如果願意的話，關於權利的爭執”；政府和議院決不是“訴訟雙方的律師”。議員如果對自己的職權不是這樣理解，就會“在理論上進行內戰”。

倫納德先生的話是說得夠明顯的了。在瀆神的立憲國家中，議會通過自己的委員會即內閣來操縱國事，而國王則只有表示同意和簽字的權利。在受考驗的日子裡，即在康普豪森、漢澤曼和普富爾時期，我國也曾經是這樣。但是，在天賦的普魯士君主立憲王國中，情形卻恰恰相反：國王通過自己的大臣來操縱一切，而議院若是除了同意天賦國王的心願外，還胆敢有所別的作為，那它就要倒霉！

倫納德先生繼續說道：“在王權和人民之間不存在任何嫌隙的最鮮明的證據是，目前各省都以萬眾一心的熱忱在討論德國問題…… 這樣熱忱的原因……多半是由於我們歷代的天賦王權、豪俠重義的和戰無不勝的〈特別是在香櫞、在耶拿附近²⁸⁶和在1848年3月18日那天〉霍亨索倫王朝的尊嚴和偉大。〈會場活躍並有叫好聲！〉”

下述情況就可以證明這種熱忱：3月19日，即倫納德先生說這些話的那一天，在居爾岑尼希有五千人^①宣告要“打倒德意志皇帝”；此後不幾天，在法蘭克福否決了普魯士國王作為世襲皇帝的

① 見本卷第693—694頁。——編者注

候选資格，前天在法兰克福投票贊成一般世襲皇帝政权的，只有四票微弱的多数；这两点也可以证明这种热忱。

不，这个完全不像狐狸的倫納德^①最后高呼道：“誰也不能用烈性毒药来毀灭那萌生于正在痊愈的創伤上的**新生命**，不能把业已形成的裂痕（这就是說，裂痕毕竟存在！）变为不可逾越的鴻沟！”

非常值得尊敬的倫納德！我們希望，恶徒們任何时候也不能“用烈性毒药来毀灭萌生于創伤上的新生命”——这个創伤是你那靠封建特权而装滿了黄金的錢袋于去年春天遭受到的，而由于你又重沐天恩，它“現在正在痊愈”，——不能把因此在你的收入和支出之間“业已形成的裂痕变为不可逾越的鴻沟”！

現在走上讲坛的是雅科比先生。这位議員的发言虽然比貝尔格坚决，他的結論虽然說得比較明白和确切，但他也还是不能不玩弄外交辞令。照这位发言者的意見，在奏折中承认宪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决不能馬馬虎虎和不适时宜地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宪法尙未修改，未經最后批准和未經宣誓保证。仿佛对这样一部宪法在什么时候一般可能是恰当的和适时的！

对于协商議会的被强迫解散，雅科比先生也“不想再重新挑起旧的爭执”。至于这种强迫解散是一种救亡行为，抑或是某种外交式阴谋的最終目的，——这个问题他想“让公正无私的历史”去解决。“公正无私的历史”将載明，那些在处于多数时曾經这样慷慨陈詞的人，現在当他們是少数时，却像犯了过失的小学生那样低声下气地說話。

“至于要由人民来承认宪法，那我必須对此提出異議，因为我們的議會是

① 俏皮話：Renard（倫納德）是姓氏，其同音詞《renard》則是“狐狸”。——編者注

唯一合法、唯一有权表示这种承认的机关。”

不，雅科比先生，你們的議會决不是这样的机关。你們的議會不过是主要由于政府的阴谋策划而建立起来的机关，是在欽定的所謂选举法的基础上和在臭名昭彰的复选人“独立”的条件下选举出来的机关²⁸⁷。你們的議會当然可以承认宪法，但这将不过是同一部欽定宪法对欽定宪法的承认而已。人民絕不会去理睬它，而“公正无私的历史”不久将只会这样載明：这部所謂的宪法，尽管获得承认——假定它終于获得了这种承认——，終究被欧洲革命的进程所扫除并永远消声匿迹。

也許雅科比先生对于这个知道得不比我們差。右派議員也知道雅科比知道这点。那末这整套关于法制基础的无稽之談又有什么用呢？尤其是在被迫解散的議会的法制基础遭到怀疑的时候，更是多此一举！

杜塞尔多夫和爱北斐特的律师和議員舍勒尔先生对德斯特尔所提出的奏折草案极为憤慨。他认为，在向国王呈递这份奏折的代表团之后，“必定会随即发生武装起义”。舍勒尔先生，在其行动之后随即会实行武装起义的那些人，是用完全另一种語言跟国王們講話的！

这份草案会“投給国家一个火炬”。但舍勒尔先生深信，“火炬不会引起火災，而只会使拿火炬的人遭殃”。

不能把話說得再明显了。舍勒尔先生給左派一个好心的劝告，劝他們把草案拿回去，如若不然，有朝一日，不管議員的什么不可侵犯性，他們会遭到逮捕。真是非常仁慈的劝告，舍勒尔先生！

現在登上讲坛的是瓦尔德克先生。他絲毫也沒有改变；他是个左派，但一点也沒有左过想使大家都能接受的程度。瓦尔德克

先生在发言中一开始就表示遺憾，因为右派总想把挑起关于十一月政变的倒臺爭論的責任推在他头上。要知道，瓦尔德克先生和“他的党”本来就“相当明确地表示了意見，认为根本不應該挑起这种对几条原則的爭論”。照他的看法，“在應該怎样处理宪法这个問題上，議会的意見是一致的，”（这非常不妙！）——必須对宪法加以修改。瓦尔德克先生重又解釋了他为什么认为对几条原則的爭論是多余的，并再一次地博取右派的好感：“难道你們不能暂时把这个問題留作悬案…… 这样你們的观点完全不会受到損害；也怜惜一下別人的观点吧！”

被强迫解散的“人民代議机关”的一个前議員对那些想起国民議会解散成功便拍手称快的多数人的态度是理应如此的！

“也怜惜一下別人的观点吧！”这位大丈夫悬求怜惜！

但是，当宪法的制定工作大功告成，那时——未来的大臣“希望”——“那时，由于議会活动，这个議会将会真正提高到为充分領悟这项声明〈关于宪法合法性的声明〉的影响所必需的水平”！

讲得实在中听！我們的初出茅庐的議会讲坛騎士們虽然只有七个月的議会实践，但却装成这样經驗丰富和精明能干的議員，好像他們在圣斯蒂凡教堂的板凳上坐了五十年，或者参加过巴黎历届議院（从1815年的“无双議院”起到2月24日的“无双議院”止）²⁸⁸的會議似的！

然而就是是，非就是非。我們的議会讲坛騎士們在自己短促的宦海生涯中偶尔尝到一点議会的乐趣就欣然自得到这种程度，以致把自己的革命毅力——*si jamais il y en avait*〔如果說他們曾經具有过它的話〕，——丧失得一干二尽，好像他們在議会的辯論中都变老了。

在瓦尔德克之后显示自己的讲演艺术的，是曾經显赫一时、曾經无所不能的馮·博德尔施文克先生。

像曼托伊費尔先生一样，他的前任上司也“奉陛下之命”成了君主立宪的信徒。听听这位君主专制的末届首相怎样維護君主立宪，倒是很有趣味的。

博德尔施文克先生在二月革命以前曾被认为是当时內閣的最好的演說家。他在联合議会的各次会议上的发言比其他人都成功。但当你讀他現在的讲话的时候，甚至用他本人的眼光来看，也可能会对这个古怪发言的荒唐无稽感到惊異。博德尔施文克先生奉命成了立宪主义者；但是除了这个称呼而外，他——不知是奉命还是未奉命——断沒有任何改变。他为自己辯护說，这是由于他“在乡間幽居”的緣故；而其实可以认为他让人把他埋葬了整整一年。

他坦白承认，左派所提出的毫无瑕疵的奏折草案，“詳尽无遺地向他充分解釋了他們的观点，这一点他在来到議院之前一无所知”。

Quel bonhomme〔头脑多么簡單的人啊〕！看来，在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治理普魯士的时候，他那些靠我們出錢养活的多不胜数的密探沒有給他提供什么情报，所以他現在还滿以为这类現象是后来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呢！

左派声明說，他們来到議院不是根据欽定的軍法宪章，而是根据普选权。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怎样回答这一点呢？

“假若我們认为我們的委任是由普选权产生的，那末一切手續（对代表資格的审查）都完全是多余的。我們只要走到市集上說一声选举我吧，就够了！我不知道，照你們的意見要多少有普选权的分子才能得到进入这个議院的权

利。你們要多少就拿多少；这样你們就很容易湊齐足够数量的选票；如果承认这种普选权，这个議院的会场很快便会挤滿，那时連我們都沒有立足之地了；至少，从我自己这方面來說，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会辞却委任的，而且辞却得愈快愈好。”

如果是某个威斯特伐里亚的农民，或者是荣任大臣时的博德尔施文克先生对于普选权說出这样奥妙无穷的話来，那我們是不会感到吃惊的。上面摘引的他的那一段发言，从这样一种角度来看是頗耐人寻味的，即它表明，可以当普魯士的首相和管理全套受过严格訓練的官僚机构而对最重要的欧洲性問題却“一无所知”。但是，在法国**两度**施行了普选权以后，在普魯士**两度**施行了**左派**所謂的普选权并且結果甚至給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本人也在議院欽定了一个席位以后，——在經過这一切以后，只有老朽的普魯士大臣才能对普选权大放这种妄誕无稽的厥詞！可是不應該忘記，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曾經被埋葬了，他只是在不久前才复活，为的是“奉陛下之命”进入議院！

往下，博德尔施文克先生又說：

“虽然我們决不同意关于这部宪法只有修訂后才能生效的观点，但我們仍然絕對深信王权不会拒絕滿足議院的……願望〈！〉……我們意識到我們不必跟政府吵架和打官司，就好像我們是仇敌一样；相反，我們坚信，跟我們打交道的王权，也像我們一样，所关心的只是祖國的福利……在安乐的時刻和患難的時刻，我們都必須跟我們的君主緊密地團結在一起……这是虔誠信賴、尊重法律、总体精神等等的原則。”

博德尔施文克先生以为他还是在聯合議会上发言。从前也好，現在也好，他总是站在信賴的基础上。然而这个人是对的！由于左派所謂的普选权，而且又靠着关于独立性的条文、間接选举和曼托伊費尔的陰謀詭計，建立了这样一种議院，把这种議院称为高

級聯合議會是完全不算污辱的。

在議員舒尔采-德里奇作了无关紧要的发言以后，輪到曾經显赫一时的阿尔宁伯爵先生讲话。和博德尔施文克先生不同，阿尔宁先生最近一年**沒有**睡大觉，他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

他說，我們为什么必須立即承认全部宪法的道理是显而易見的。

“难道我們能絕對相信**修改宪法**的活动一定会有什么結果嗎？要是万一沒有呢？那时把什么当做根本法呢？这就是說，正因为我們处于三方面不一定会对应予修改的那些宪法条款取得協議的情况下，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們應該使人民在这种情况下也得到宪法。”

难道这不明显嗎？这已經是同一个會議进行中的第二次微妙的暗示了。

議員德斯特尔也发言反对委员会的草案。在参加一般性辯論的左派的所有发言中，德斯特尔的发言无疑是最好的。在那些使人敗兴和煩悶的全部辯論之后，这位来自美廷的議員在攻击右派时所表現的勇气与活力給人留下一种愉快的印象。但是，連德斯特尔也不能不做一些外交式的让步和玩弄議會式的手腕。例如，他声明，他也完全同意革命應該結束。如果說，一个議員由于考虑到議會的情况而說出这种話来，也許还可以原諒，那末，一个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員說这样的話就不應該了，并且，在随后立即同芬克进行关于“文化程度”的爭論时，他絲毫也不应让人怀疑他会认真坚持这种胡說。何况，反正沒有一个人会相信他。

临結束时，議員里德尔以洋洋得意的口吻說，“**国王重又握取了頒布法律的权利**”。喝倒彩的喊声向里德尔表明他說的話是多余的。于是他吓得連忙补充說：“自然这是暫时的！”

这是对議員先生們的第三次微妙的暗示!

議院轉入了对个别問題的討論,关于这些討論,我們留在明天再报道。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3 月 25 日

載于 1849 年 3 月 30 日“新萊茵报”
第 25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

科倫 3 月 27 日。意大利战争开始了²⁸⁹。这场战争使哈布斯堡王朝背上了重担，这付重担大概会把它压垮。

在匈牙利还没有同联合君主国公开交战而只是偶尔对南方斯拉夫人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奥地利还不那么难于对付那些只有一半起来革命、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并因本国君主的三次叛变而瘫痪的意大利人。虽然如此，还是费了很大力气才取得了胜利！首先曾需要使教皇和托斯卡纳大公直接或间接地从威尼斯省调回自己的部队，使查理-阿尔伯特和他那一些是碌碌无能、一些是卖身求荣的将领公然背叛意大利的事业，而主要的是采取两面政策或伪装让步，时而迫使马扎尔人、时而迫使南方斯拉夫人把他们的部队派往意大利，然后拉德茨基才在明乔河畔取得了胜利。谁都知道，只是在南方斯拉夫的边屯团大批调到意大利以后，濒于瓦解的奥军才重又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

后来，当在同皮蒙特签订的停战协定仍然有效，只需要奥地利在意大利仅保持原有军队的数量，而不必过分加强它的时候，奥地利还能够把自己六十万军队中的基本兵力用来对付匈牙利，还能够把马扎尔人赶出一个又一个的障地，依靠源源开来的援兵，最终击溃匈牙利的武装力量。科苏特也就会像拿破仑一样，不能长期地抵挡这样优势的兵力。

但是，意大利战争大大改变了形势。从停战协定显然将被破坏的时候起，奥地利就不得不把派往意大利的部队的数量增加一倍，不得不把刚刚被动员来的新兵分给文迪施格雷茨和拉德茨基两人。这样一来，可以设想到，他们两人谁都得不到足够数量的援兵。

因此，对于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重要的只是赢得时间——购买和制造武器所需要的时间，把民团和国民自卫军变成善战的兵士所需要的时间，使国家革命化所需要的时间，而奥地利同自己的敌人比起来，将一天天弱下去。

正当战争本身的进程越来越有力地把罗马、托斯卡纳甚至皮蒙特都卷入了革命，并使它们日渐增强自己的革命力量的时候，正当它们可以期待到在法国即将发生的危机的时候，在奥地利的第三种破坏势力即斯拉夫人反对派，也在日益扩大自己的地盘并且组织日益完善。为感谢斯拉夫人拯救奥地利而颁布的钦定宪法把他们抛回到三月革命以前的状况，官僚和军阀的胡作非为使斯拉夫人受尽了侮辱，——这一切都是决不能改变的既成事实。

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科伦日报”迫不及待地想要奥地利军队结束同匈牙利的讨厌的战争。例如，昨天它报道说，奥军分兵三路强渡蒂萨河，这个报道所以可靠，仅因为它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战报的证实。相反，另一方面却有消息说，马扎尔人的军队正在加速向佩斯城挺进，显然是企图解救被围困的科莫恩^①。科莫恩虽然遭到猛烈的炮击，但是仍然英勇地屹立着。在遭受炮击时，科莫恩的保卫者一枪不发，但当奥军试图进攻时，他们却以霰弹的猛

① 匈牙利称作：科马罗姆。——编者注

烈射击，使奥军遭受惨重的损失并败退下去。据传闻，正当邓宾斯基安然地等待科堡公爵的波兰枪骑兵团前来进攻，并命令乐队吹奏“波兰尚未灭亡”²⁹⁰的时候，这支枪骑兵团投到马扎尔人方面来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能报道的关于匈牙利战场的全部情况。3月23日从维也纳发出的消息尚未收到。

现在我们来看看意大利战场。在这里，皮蒙特军队沿提契诺河和波河驻扎配置成一道长弧。它的第一线从阿隆纳起，经过诺瓦拉、维吉瓦诺、沃格拉、直到皮阿琴察地区的卡斯特-圣卓万尼。这支军队的预备队配置在这一线之后的几德里的地方，在韦尔切利、特里诺和亚历山大里亚地区内的塞齐亚河和博尔米达河沿岸。配置在最右翼，在托斯卡纳和摩地那交界处的萨尔察纳附近的，是拉·马尔摩拉所指挥的特遣军，它准备穿过鲁尼贾纳山的山口，进入巴马和摩地那，以便左面同主力军的右翼，右面同托斯卡纳和罗马的军队会合，伺机强渡波河和艾契河^①，并在威尼斯省境内进行军事行动。

在对面，在提契诺河和波河的左岸，有拉德茨基。大家知道，他的军队共分为两个军：一个占领伦巴第，另一个占领威尼斯省。从威尼斯省没有传来关于部队配置的任何消息，可是我们却到处听说，拉德茨基在伦巴第把自己的全部军队都集中在提契诺河一带。他从巴马调回了自己的全部军队，在摩地那要塞只留下了几百人。在华里斯、科摩、瓦尔·德·因泰尔维和瓦尔特林纳没有留下任何部队；甚至连国境海关缉私队也不见了。

^① 意大利称作：阿迪杰河。——编者注

拉德茨基所統率的为数五万人的全部军队，占据着从馬振塔到帕維亞的提契諾河沿岸和从帕維亞到皮阿琴察的波河沿岸的障地。

据说，似乎拉德茨基本人曾有这样一个卤莽的计划：率领这支军队立刻渡过提契諾河，利用意大利人势必混乱的机会，直取都灵。不能不令人想起，拉德茨基还在去年——而且不止一次地——就有过诸如此类的拿破仑式的计划，那时他就已经由于这种计划而吃了亏。不过，这一次军事会议一致反对这个计划，并且决定，不进行决战，而向阿达河、奥利奥河方向撤退，万不得已时，甚至向基澤河方面撤退，以便把来自威尼斯省和伊利里亚的援军调集到那里。

奥军能否毫无伤亡地实现这次撤退，他们能否长久地抵挡住皮蒙特军队，就要看皮蒙特军队的机动性如何和倫巴第人的斗志如何了。要知道，奥军现在已经放弃了阿尔卑斯山南坡，即科摩、布里昂察、貝尔加莫阿尔卑斯山区、維尔特林(瓦尔特林納)和布里西亚省的大部分地方，这些地方最适合于开展民族游击战争。集中在平原上的奥军必定会放弃山区。如果皮蒙特军队以轻装部队开始迅速进攻，他们就可以在这里，在奥军的右翼，于短期内组织好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将威胁奥军的翼侧部队，如果能打败奥地利的一个军，就可以威胁奥军的退却，切断它的交通线并把起义一直扩展到特里延特阿尔卑斯山区。要是加里波第在这里就好了。不过他决不会有再为卖国贼查理-阿尔伯特效力的念头了²⁹¹。

拉·馬尔摩拉所支援的托斯卡納—羅馬的军队，应当占领从皮阿琴察到費拉拉的波河一线，尽可能迅速地强渡波河，然后再强渡艾契河，切断拉德茨基和奥地利-威尼斯军的联系，在他的左侧，

可能还在他的背后作战。不过,这支军队未必能这样迅速地赶到,以便影响军事行动的开始。

但是,所有这些因素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皮蒙特人的行动。他们的军队是优良的、善战的,但是如果还像去年一样被人出卖,那它一定会被击溃。伦巴第人要求得到武器以便向自己的压迫者作斗争;但是如果还像去年一样,不坚决的资产阶级政府再次使群众的起义陷于瘫痪,那末拉德茨基就能够再度进入米兰。

对付政府的叛变和怯懦,只有一种手段:革命。也许正是需要查理-阿尔伯特的再次叛变,伦巴第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再次背信弃义,才能使意大利的革命进行到底,同时使意大利争取独立的战争进行到底。但那时卖国贼可就要遭殃了!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3月27日

载于1849年3月28日“新莱茵报”
第25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皮蒙特军队的失败

一

科倫 3 月 30 日。拉莫里諾的叛变奏效了。皮蒙特军队在諾瓦拉城附近被完全击潰，并向博尔哥馬涅罗，向阿尔卑斯山麓败退。奥軍占领了諾瓦拉、韦尔切利和特里諾，打开了通向都灵的道路。

直到現在还没有比較詳細的消息。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如果不是拉莫里諾使奥軍得以楔入皮蒙特各师之間并孤立其中一部分，奥軍就不可能获得胜利。

查理-阿尔伯特也叛变了，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他的叛变是仅仅通过拉莫里諾呢或是还用其他方式——这我們只有以后才能知道。

拉莫里諾正是那个冒险家：他在 1830—1831 年波兰战争期間有过一段非常可疑的经历，以后于 1834 年即进军薩瓦²⁹²时期，正好在发生严重变故的当天携带全部軍款潜逃，后来在倫敦，他又为了一千二百英鎊而替前不倫瑞克公爵制定了一个征服德国的計劃。

这样一个騙子手居然能够得到这样的职位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害怕热那亚和都灵的共和主义者甚于害怕奥地利人的查理-阿尔伯特，从一开始就已经打算叛变了。

在这次失敗以后，人們期待爆发革命和在都灵宣布成立共和国。这从下述事实就可以看出来，即有人想用查理-阿尔伯特让位給他的长子的办法来防止这种事变。

皮蒙特軍队的失敗比德国皇帝的所有各种丑剧都具有更大的意义。这是整个意大利革命的失敗。在战胜了皮蒙特之后，就該輪到羅馬和佛罗倫薩了。

但是，只要各种征兆不是假象，那末意大利革命的这次失敗就正是欧洲革命爆发的信号。法国人民看到，随着本国国内反革命对他們的奴役的不断加剧，外国的武装反革命也逐漸逼近他們的边境。与巴黎的六月胜利和卡芬雅克专政同时发生的，是拉德茨基胜利地进攻到了明乔河；与波拿巴的总統选举、巴罗內閣和俱乐部法²⁹³相应和的，是奥軍在諾瓦拉附近取得胜利并向阿尔卑斯山脉推进。巴黎的新革命酝酿成熟了。一年来一直在准备脱离皮蒙特而并入法国的薩瓦，反对参战的薩瓦，渴望投入法国的怀抱；巴罗和波拿巴一定会拒絕它。热那亚，如果不是太迟的話，也許还有都灵，将要宣布成立共和国并向法国求助，而奥迪隆·巴罗一定会傲慢地回答它們說，他能够捍卫撒丁領土的完整。

但是，如果內閣不願意知道这一点，那末巴黎人民倒是清楚地知道：法国是不会容忍奥地利人呆在都灵和热那亚的。巴黎人民也不会容許他們呆在那里。巴黎人民将用胜利的起义来回答意大利人，而法国軍队，从2月24日²⁹⁴以来唯一沒有上过戰場的一支欧洲軍队，必定会归附他們。

法国軍队急不可待地要越过阿尔卑斯山去同奥軍較量一番。它不慣于反对使它能够得到新荣誉和新桂冠的革命，反对那打着反对同盟的斗争旗帜的革命。法国軍队不是“我的英勇軍队”。

意大利人的失败使人们感到悲痛。除波兰人外，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遭受自己强邻这样的凌辱和压迫，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作过这么多果敢的努力来摆脱他们身上的枷锁。但是，每一次这个不幸的民族都被迫屈服于自己的压迫者。一切努力、全部斗争的唯一结果，就是新的失败！但是，如果现在的失败将导致巴黎的革命并引起到处已露端倪的欧洲战争，如果这次失败成为整个大陆上的新运动——将具有与去年的运动完全不同的性质的运动——的推动力，那末甚至意大利人也会有理由来庆贺自己的这种结局。

二

科倫 4 月 1 日。根据来自意大利的最新消息，皮蒙特軍队在諾瓦拉附近的失敗，并不具有像拍往巴黎的急电中所說的那种决定性的意义。

皮蒙特軍队遭到了失敗，他們被截断了同都灵的联系，并敗退到山中。不过如此而已。

如果皮蒙特是个共和国，如果都灵政府是个革命政府并有勇气采取革命的措施，那就什么也不会損失。但是，意大利的独立的丧失，将不是由于奧軍的无敌，而是由于皮蒙特王室的怯懦。

奧軍的胜利是靠什么取得的呢？是靠下述情况：由于拉莫里諾的叛变，皮蒙特軍队中的两个师被切断了与其他三个师的联系，而陷于孤立的这三个师則被数量上占优势的奧軍击潰了。这三个师現在正向瓦里斯阿尔卑斯山^①麓敗退。

皮蒙特人一开始就鑄下的一个大錯誤，就是他們只用正規軍队来抵抗奧軍，他們想进行最一般的、資產階級式的、規規矩矩的战争。一个想爭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應該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組織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勝大民族，不够强大的軍队抵抗比較强大和組織良好的軍队的唯一方法。

① 意大利称作：平宁阿尔卑斯山。——編者注

西班牙人在1807—1812年证明了这一点²⁹⁵，匈牙利人现在也在证明着这一点。

赫山諾夫斯基被击潰在諾瓦拉城下，并被切断了到都灵的去路；拉德茨基进驻到距都灵九德里的地方。在皮蒙特这样一个君主制（虽然也是立宪制）的国家中，战争的结局就这样决定了；于是向拉德茨基求和。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共和国中，这是决定不了什么的。如果不是君主国天性怯懦，从没有勇气采取极端革命的手段，如果不是这种不可避免怯懦，赫山諾夫斯基的失败可能成为意大利的幸福。

如果皮蒙特是个无须理会君主制传统的共和国，它就有可能完全按另一种方式结束战争。

赫山諾夫斯基败退到比耶拉和博尔哥馬涅罗。在那里，他本来很容易把军队聚集起来，用大胆的进攻把拉德茨基的胜利化为乌有，因为在那里，瑞士阿尔卑斯山脉阻挡他继续退却，几乎不可能把军队沿着两三条狭窄的河谷摆开。

如果皮蒙特军队的统帅具有革命的勇气，如果他们知道在都灵有一个准备采取最坚决行动的革命政府，他们就会明白应该怎样行动。

在諾瓦拉会战以后，馬乔列湖附近驻扎了三四万皮蒙特军队的士兵。如果在大約两天之内把这支军队集中起来，就可以把它迅速调到驻有不到一万二千名奥军的倫巴第。这支军队就能够占领米兰、布里西亚和克雷莫納，組織普遍起义，各个击破从威尼斯省开来的各奥地利军，从而完全摧毁拉德茨基的整个作战基地。

这样，拉德茨基就不会前往都灵，而必定会立刻掉过头来，返回倫巴第，途中必然会遭到皮蒙特民兵的追击，因为皮蒙特民兵一

定会支持倫巴第的起义。

这种真正的民族战争，就像倫巴第人在 1848 年 3 月所进行的结果把拉德茨基赶到奥利奥河和明乔河对岸的战争一样，会把整个意大利都吸引到斗争中来并使羅馬人和托斯卡納人充滿新的毅力。

当拉德茨基还停在波河和提契諾河之間而进退未决的时候，皮蒙特和倫巴第的军队就可以开到威尼斯去解圍，同拉·馬尔摩拉和羅馬军队联合起来，用游击队进行連續的襲击，以便不断地惊扰奧軍元帅，从而削弱并分割他的部队，最后把他打败。倫巴第只是等待皮蒙特人的进军；它甚至还没有等他們到来就已经起义了。只有奧軍的要塞还在箝制着倫巴第的城市。一万皮蒙特军队已经到了倫巴第；再赶来两三万人，拉德茨基的退路就被截断了。

但是，群众起义，全民起义，这是使王室望而生畏的手段。这是唯有共和国才会采取的手段，—— 1793 年就证明了这一点。采用这种手段必须以革命的恐怖为前提，而究竟有哪个君主敢于这样做呢？

可見，断送意大利人的决不是諾瓦拉和維吉瓦諾会战的失败，而是君主制迫使他们采取的怯懦和謹小慎微的行为。諾瓦拉会战的失败只是造成了战略上的损失：意大利人被切断了去都灵的道路，而奧軍却打开了去都灵的道路。假如在会战失败之后立即开始真正的革命战争，假如意大利殘存的一部分军队立刻宣布自己是全民起义的核心，假如把军队的普通战争变为 1793 年法国人所进行的那种人民的战争，那末这种损失就根本算不了什么。

但是，君主国当然决不敢进行革命的战争、决不敢发动全民起义和实行革命恐怖。它宁可跟自己的最凶恶的但出身相同的敌人

讲和，而不願同人民联合。

查理-阿尔伯特是不是个卖国贼，这无关紧要，只是他的一頂**王冠**，只是一个**君主制**就足以把意大利引向灭亡。

但是，查理-阿尔伯特的确是个卖国贼。所有的法国报纸都披露了欧洲列强的大規模的反革命阴谋，披露了反革命企图彻底镇压欧洲各国人民的进军计划。俄国和英国，普魯士和奥地利，法国和撒丁，都签字参加了这个新的神圣同盟。

查理-阿尔伯特奉命同奥地利作战，让人把自己打敗，从而使奥地利人有可能在皮蒙特、佛罗倫薩和羅馬恢复“安宁”并給各地欽定軍法宪法。为此，查理-阿尔伯特一定能得到巴馬和皮阿琴察，俄国人一定能平定匈牙利，法国一定能成为帝国；这样，才能确保欧洲的安宁。照法国报纸上的消息看来，反革命的庞大计划就是如此；而这个计划也向我们說明了拉莫里諾叛变和意大利人失敗的緣由。

但是拉德茨基的胜利使君主制遭到一个新的打击。諾瓦拉会战和皮蒙特軍队在会战后的毫无作为证明，在人民必須竭尽全力来自救的紧要关头，束縛人民最厉害的莫过于君主制了。为了使意大利不致因君主制而灭亡，首先就必须使意大利的君主制灭亡。

三

現在，我們面前終於展現出一幅关于奧軍从出征皮蒙特到諾瓦拉获胜的鮮明清晰的图画。

拉德茨基一面故意散布謠言，說他只限于防禦并要向阿达河撤退，一面則暗地把自己的全部队伍集中到圣安吉洛和帕維亞。由于都灵的亲奧地利反动政党的叛变，拉德茨基充分探悉了赫山諾夫斯基的一切計劃和作战部署，探悉了他的軍队的全部配置情况。相反地，拉德茨基却成功地使皮蒙特人对他的計劃作出了完全錯誤的判断。正因为如此，皮蒙特軍队才配置在波河的两岸，只想集中力量从各个方面同时向米兰和洛迪推进。

不过，要是在皮蒙特軍队的中央进行认真的抵抗，那末拉德茨基无论如何也不能指望有現在所获得的这么快的胜利。如果拉莫里諾軍在帕維亞拦阻了拉德茨基的去路，那就有足够的時間，在援軍尙未开到之前，阻止拉德茨基渡过提契諾河。在这段時間內，駐在波河右岸和阿隆納附近的几个师也可以开到。沿着提契諾河配置的皮蒙特軍队掩护着都灵，它的力量可以綽綽有余地击潰拉德茨基的軍队。自然，只有在拉莫里諾履行自己职责的条件下才能做到这一切。

他沒有这样做。他让拉德茨基渡过了提契諾河，結果皮蒙特軍的中央被突破了，而配置在波河彼岸的几个师則陷于孤立。其实，战局也就这样决定了。

于是，拉德茨基把自己为数六七万人并拥有一百二十門火炮的全部軍隊都摆在提契諾河和阿哥尼亚河之間，并从翼側向提契諾河沿岸的五个皮蒙特师展开了进攻。他仗其巨大的优势兵力，于21日在摩爾塔拉、加尔拉斯科和維吉瓦諾击潰了距离最近的四个师，占領了摩爾塔拉，从而迫使皮蒙特軍隊向諾瓦拉撤退并威胁他們去都灵的唯一能够通行的道路——从諾瓦拉穿过韦尔切利和基瓦索的道路。

但是，皮蒙特軍隊就連这条道路也失去了。为了有可能集中自己的部队，特别是把配置在极左翼即阿隆納附近的薩拉洛利师調来，他們必須把諾瓦拉变成自己的作战樞紐，而且他們还有可能在塞齐亚河彼岸重新部署。

因此，几乎被切断到都灵的去路的皮蒙特軍隊，沒有任何别的出路，他們要不就在諾瓦拉应战，要不就把自己的兵力調往倫巴第，組織人民战争，把預备队和国民自卫軍留在都灵，让都灵去听天由命。这样，拉德茨基就不敢繼續前进了。

但是，要想有这样的出路，就必须要在皮蒙特本土准备群众起义，可是，恰好就沒有这样做。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軍已經武装起来，而人民群众却手无寸铁，尽管他們大声疾呼地要求把放在軍械庫中的武器发給他們。

君主国不敢求助于曾在1793年拯救了法国的那种不可战胜的力量。

因此，皮蒙特軍隊不得不在諾瓦拉应战，尽管他們的陣势非常不利而敌方的兵力又占很大的优势。

炮兵較弱的四万皮蒙特軍隊(十个旅)抵抗着为数至少六万人并拥有一百二十門火炮的奧地利軍隊。

皮蒙特军队布阵在诺瓦拉城下通往摩尔塔腊的大道两旁。

左翼是两个旅，由杜兰多指挥，有相当坚固的比科卡阵地作为依托。

中央是三个旅，由贝斯指挥，有契塔德拉庄园作为依托。

右翼是两个旅，由佩罗纳指挥，有科尔特努奥沃台地（沿着通向韦尔切利去的大道）作为依托。

两个预备军的配置如下：一个由两旅组成的军，由热那亚公爵指挥，配置在左翼；另一个由一个旅和近卫军组成的军，由萨瓦公爵、即现在的国王指挥，配置在右翼。

奥军的配置情况，从他们的战报来看，还不太清楚。

起初，达斯普雷指挥的奥地利第二军攻击皮蒙特军队的左翼，随后阿佩尔所指挥的第三军以及预备队和第四军也都相继展开。奥军得以完全展开自己的战线，以优势兵力对皮蒙特的战斗队形的各点同时发起集中的攻击，击溃了皮蒙特军队。

皮蒙特军队阵地的要冲是比科卡。奥军如果占领了它，就能把皮蒙特军队的中央和左翼部队围困在城市（未设防）和运河之间，就能打散他们，或者迫使他们缴械投降。

因此，主要攻击也就指向以比科卡为主要依托的皮蒙特军队的左翼。这里的战斗非常激烈，可是很长时间不分胜负。

对中央也进行了非常有力的攻击。皮蒙特军队曾数次丢掉了契塔德拉庄园，而贝斯又数次把它夺回来。

当奥军发现在这里遇到了非常顽强的抵抗的时候，他们重又把自己的主力调去进攻皮蒙特军队的左翼。皮蒙特的两个师都被击退到比科卡，最后，比科卡本身也终于被攻陷了。萨瓦公爵带领自己的预备队猛攻奥军，但是没有成功。奥皇军队的优势太大

了，陣地丟失了，會戰的結局也就決定了。皮蒙特軍隊所剩下的唯一退路是通往阿爾卑斯山方向，即到比耶拉和博爾哥馬涅羅去的道路。

關於這次靠叛變進行準備和靠優勢兵力獲得勝利的會戰，早就焦心盼望奧軍勝利的“科倫日報”是這樣說的：

“這次會戰將永遠是戰爭史上的光輝範例〈！〉，因為拉德茨基老將在這裏所取得的勝利是巧妙運用計謀和真正大無畏精神的結果，自偉大的戰神拿破侖時代以來，沒有任何戰績可以與之相比〈!!!〉。”

拉德茨基，或更確切些說，他的總參謀長海斯，非常巧妙地實現了他同拉莫里諾的陰謀，這一點應該承認。自格魯希在滑鐵盧叛變以來，確實再沒有比拉莫里諾所干的卑鄙勾當更駭人聽聞的了，這一點也是真實的。但是拉德茨基卻不屬於“戰神”（！）拿破侖一流的人物；不，這是威靈頓一流的人！威靈頓和拉德茨基兩人為獲得勝利所付出的更多的是金錢而不是勇敢和智謀。

“科倫日報”昨天還信口雌黃地胡說什麼民主派議員都逃出了都靈，什麼倫巴第人的“舉動像一群胆怯的流氓”，等等；對於這類謊言，我們甚至認為沒有必要去談論。最近的事件已經駁倒了這種說法。這種謊言只能證明，“科倫日報”對於大奧地利扼殺——而且還是靠叛變——小皮蒙特是感到高興的。

弗·恩格斯寫於1849年3月30日—
4月3日

載於1849年3月31日、4月1日和
4日“新萊茵報”第260號、第261號
增刊和第263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法兰西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科倫4月3日。在法国国民議會3月31日的會議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位“矮小而机智的人”——梯也尔先生发表了演說。他恬不知耻地和毫不含糊地把1815年的維也納条約贊揚了一番，把这个条約当作当前欧洲政治局势的基础来維護。难道这个矮子譏笑有人在实际上維護这个条約，而在法律条文上又否定这个条約的这种矛盾現象，不是完全正确的嗎？临时政府和卡芬雅克的小心翼翼的行为正是这样。巴罗的对外政策是卡芬雅克政策的必然結果，就像卡芬雅克的对外政策是拉馬丁政策的必然結果一样。拉馬丁是临时政府对外政策的执行者，他同整个临时政府一样，以法兰西共和国的内部发展不致受到妨碍为借口，出卖了意大利和波兰。枪炮的轰隆声同拉馬丁的花言巧語的宣傳大概不大协调吧。临时政府曾經断言，似乎用“博爱”的詞句可以消灭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間的对立，借助幻想可以消除阶级斗争，它对民族矛盾和对外战争也完全采取这种态度。在临时政府的庇护下，波兰、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压迫者和法国资产阶级一起又重新站稳了脚跟，而后者在6月底就已实现了拉馬丁的博爱，为了在国内能够从容地进行内战，为了不妨碍“正直的”温和的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去消灭胜利了的紅色共和国——工人共和国，卡芬雅克支持对外媾和。在卡芬雅克执政期間，欧洲恢复了旧神圣同盟，而法国則

恢复了由正統主义者、路易-菲力浦的拥护者、波拿巴主义者和“正直的”共和主义者組成的新神圣同盟。奥迪隆·巴罗內閣就是这个双料的神圣同盟的內閣。它的对外政策就是这个神圣同盟的政策。为了在法国国内彻底实现反革命，这个內閣需要国外反革命的胜利。

在国民會議 3 月 31 日的會議上，临时政府背棄了卡芬雅克。卡芬雅克却理直气壯地断言，他是临时政府的合法继承人，于是他也背棄了冷靜地确信二月革命的意义就在于 1815 年的維也納条約的奥迪隆·巴罗。弗洛孔声言——連奥迪隆·巴罗也不否认这一点——两天以前，內閣已經真的下了一道不准前往意大利的禁令，所有想到那里去的法国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都拒絕发給护照。难道巴罗沒有資格当亨利五世的首相嗎？

至于說到賴德律-洛兰，他在反駁梯也尔時已經承认：

“是的，我應該承认我做得不对；临时政府本来應該进兵国境，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保护被压迫的弟兄，这样欧洲也許就不会再有暴君了。但是，当时我們沒有下决心进行战争，这是君主政体的过錯，它使我們財源枯竭，使我們軍械庫空虛。”

写于 1849 年 4 月 3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4 月 4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 263 号

* 皇冠喜劇

科倫 4 月 3 日。勃兰登堡先生昨天已把国王在“德国問題”上将采取哪些步驟通知了第二議院。誘惑力太大了；“新普魯士报”的“忠实的埃卡尔特們”²⁹⁶和他們的一切警告全都被置諸脑后了。普魯士国王一定会接受所进献的皇冠，因此，最近我們也許能够亲眼看到基督教德意志帝王陛下隆重地进入“帝国政府”的官邸。

但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在同意从平民的法兰克福議会手中把皇冠接受过来的同时，也給了这个議会本身和希望这个議会独立自主的幻想輕輕的一击。

首相“承认，法兰克福議会的决定将使实现德国統一的事业向前迈进一大步。但是，他不能不顾及各邦政府的权利。他认为，只有在各邦君主自願同意的情况下，決議才能生效，而且只有其君主表示自願同意的德意志各邦才有义务遵行这项決議。为了实现这种自願联合，普魯士政府方面将采取一切措施”。

想得真妙！帝国皇冠始終是可以接受的，特別当它是长期向往而得不到手的東西，是一生的目的的时候，更是这样。請看看馮·拉多維茨的著名小册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什么沒有当上德国皇帝”²⁹⁷。但是，法兰克福議会所进献的皇冠不知沾染了多少平民的血污，不知記錄了多少关于有主权的人民受統治的悲慘岁月的沉痛回忆，以致这位天賦的而且又恢复了自己权力的国

王能够不再費任何周折就把皇冠戴到自己的头上。

只有当其他也是由上帝加冕的君主們表示同意这种行动的时候，上帝才能清洗新皇冠上所沾染的罪恶深重的三月成就的全部污点，使它成为尊貴的东西；只有那时，这位由二百九十名教授和宮廷顧問推选出来的人才会把皇冠拿到手中，并且像某个时候有人在柏林曾經說过的那样說道：“这頂皇冠是上帝賜給我的，誰想染指，誰就罪該万死！”

由于皇冠所引起的这一場喜剧，特别是由于各邦政府对这一切承认或不承认的結果，德意志帝国的混乱局面将进入怎样一个新阶段——这一点我們就让有真知灼見的“科倫日报”来回答吧。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4 月 3 日

載于 1849 年 4 月 4 日“新萊茵报”

第 263 号特別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雇佣劳动与資本²⁹⁸

一

科倫4月4日^①。我們听到了各方面的責难，說我們沒有詳述构成現代階級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經濟关系**。我們只是当这些关系在政治冲突中直接表現出来的时候，才有意地讲到过这些关系。

过去首先必須从日常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階級斗争，并根据已有的和每天新出現的历史材料来从經驗上证明：当实现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工人階級遭到失敗的时候，它的敌人（在法国是資產階級共和派，在整个欧洲大陆則是反对过封建专制制度的資產階級和农民階級）也同时被战胜了；法国“正直的共和国”的胜利，同时也就是以爭取独立的英勇战争响应了二月革命的那些民族的失敗；最后，随着革命工人的失敗，欧洲又落到了过去那种受双重奴役即受**英俄两国**奴役的地位。巴黎的六月斗争，維也納的陷落，柏林十一月^②的悲喜剧，波兰、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拚命努力，爱尔兰的严重饥荒——这些就是那些集中表现了欧洲資產階級和工人

① “雇佣劳动与資本”的某些版本中（包括1891年版在內）去掉了每篇文章开头的日期。——編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柏林十一月”前面加有“1848年”等字。——編者注

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的主要事件。我們曾經根據這些實例證明過：任何一次革命起義，不論它的目的仿佛距離階級鬥爭多么遠，在革命的工人階級沒有獲得勝利以前，都是不免要失敗的；任何一種社會改革，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封建反革命沒有在世界戰爭中較量一下以前，都是要成為空想的。在我們的闡述中，也如在現實中一樣，**比利時和瑞士**都是大歷史畫中的兩幅悲喜劇式的、漫畫式的世俗畫：前者是資產階級君主制的典型國家，後者是資產階級共和制的典型國家，兩者都自以為既跟階級鬥爭無關，又跟歐洲革命無關。

現在，在我們的讀者看到了 1848 年以波瀾壯闊的政治形式展開的階級鬥爭以後，我們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資產階級的生存及其階級統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為基礎的經濟關係本身，也就適當其時了。

我們分三大部分來加以說明：（1）**雇佣劳动对資本**的關係，工人的奴役地位，資本家的統治；（2）**中等資產階級和農民等級**^①在現存制度下必然發生的滅亡過程；（3）**歐洲各國資產者階級在商業上受世界市場霸主英國奴役和剝削的情形**。

我們力求說得盡量簡單和通俗，我們就当讀者連最起碼的政治經濟學概念也沒有。我們希望工人能明白我們的解說。加之，在德國到處对一些最簡單的經濟關係的了解都極端無知和十分混亂，從特許的現存制度的辯護者到**冒牌的社會主義者和未被承認的政治天才**都莫不如此，這種人在四分五裂的德國比“諸侯王爺”還多。

我們首先來講第一個問題：**什麼是工資？它是怎樣決定的？**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農民等級”改為“所謂的市民等級”。——編者注

假如問工人們：“你們的工資是多少？”，那末一个工人回答說：“我做一天工从資產者那里得到一法郎^①。”；另一个工人回答說：“我得到两法郎”，等等。由于他們工作的劳动部門不同，他們每一个人因劳动了一定的時間或^②做了一定的工作（譬如，織成一尺麻布或排好一个印張的字）而从各自的資產者那里得到的貨幣数量也不同。尽管他們得到的貨幣数量不同，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工資是資產者为了償付劳动一定的時間或完成一定的工作而支出的一笔貨幣。

可見^③，資產者是用貨幣**購買**工人的劳动。工人是为了貨幣而向資產者**出賣**自己的劳动^④。資產者用以購買工人劳动^⑤的那个貨幣量，譬如說两法郎，也可以买到两磅糖或一定数量的其他某种商品。他用以購買两磅糖的两法郎，就是两磅糖的**价格**。他用以購買十二小时劳动^⑥的两法郎，就是十二小时劳动的**价格**。可見，劳动^⑦是一种商品，是和沙糖一模一样的商品。前者是用钟点來計量的，后者是用重量來計量的。

① 一法郎等于八普魯士銀格罗申。〔在 1891 年的版本中，“法郎”完全改为“馬克”。——編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了一定的時間或”刪去了。——編者注

③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可見”后面加有“看起来仿佛”。——編者注

④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后面加有：“但这只是表面情形。实际上，他們是为了貨幣向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劳动力**的。資本家以一日、一周、一月等等为期購買这个**劳动力**。而当他把**劳动力**买到手以后，他就使用它，迫使工人在約定的期間內劳动。”——編者注

⑤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資產者用以購買工人劳动”改为“資本家用以購買工人**劳动力**”。——編者注

⑥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使用”。——編者注

⑦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編者注

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即劳动^①去换得资本家的商品，即换得货币，并且这种交换是按一定的比率进行的。一定量的货币交换一定量的劳动^②时间。织布工人的十二小时劳动交换两法郎。但是，难道这两法郎不是代表其他一切可以用两法郎买到的商品吗？可见，实质上工人是拿他自己的商品即劳动交换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③，并且是按一定的比率交换的。资本家付给他两法郎，就是为交换他的劳动日而付给了他一定量的肉，一定量的衣服，一定量的劈柴，一定量的灯光，等等。可见，这两法郎是表现劳动^④跟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即表现他的劳动^⑤的交换价值。商品通过货币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也就称为商品的价格。所以，工资只是劳动价格^⑥的特种名称，是只能存在于人的血肉中的这种特殊商品价格的特种名称。

拿任何一个工人来说，比如拿一个织布工人来说吧。资产者^⑦供给他一架织布机和一些纱。织布工人动手工作，纱变成了布。资产者^⑧把布拿去，卖了——比方说——二十法郎。织布工人的工资是不是这块布中的一份，二十法郎中的一份，他的劳动产品中的一份呢？绝对不是。因为这个织布工人是在布还没有卖出很久以前，甚至可能是在布还没有织成很久以前就得到了自己的工资的。可见，资本家支付的这笔工资并不是来自他卖布所赚的那

① ④ ⑤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使用”。——编者注

③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交换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改为“劳动力交换各种各样的商品”。——编者注

⑥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价格”改为“通常被称为劳动价格的劳动力价格”。——编者注

⑦ ⑧ 在1891年的版本中，“资产者”改为“资本家”。——编者注

些货币,而是来自他原来储备的货币。织布工人从资产者那里领来使用的织布机和纱不是他的产品,同样,他用自己的商品即劳动^①交换所得的那些商品也不是他的产品。可能有这样的情形:资产者给自己的布找不到一个买主。他出卖布所赚的钱,也许甚至不能捞回他用于开销工资的款项。也有可能他出卖布所得的钱,比他付给织布工人的工资数目大得多。这一切都与织布工人毫不相干。资本家拿自己的一部分现有财产即一部分资本去购买织布工人的劳动^②,这就同他拿他的另一部分资本去购买原料(纱)和劳动工具(织布机)完全一样。购买了这些东西(其中包括生产布所必需的劳动^③)以后,资本家就用只是属于他的原料和劳动工具进行生产。当然,我们这位善良的织布工人现在也属于劳动工具之列,他也像织布机一样在产品中或在产品价格中是没有份的。

所以,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劳动^④的那一部分。

总之,劳动^⑤是一种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出卖给资本的一种商品。他为什么出卖它呢?为了生活。

可是^⑥,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以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地,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劳动是已由他出卖给别人的一种商品。因此,他的活动的产物也

① ② ③ ④ ⑤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⑥ 在1891年的版本中,“可是”后面加有“劳动力在动作中的表现”。——编者注

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工人为自己生产的不是他織成的綢緞，不是他从金矿里开采出的黄金，也不是他盖起的高楼大厦。他为自己生产的是**工資**，而綢緞、黄金、高楼大厦对于他都变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資料，也許是变成棉布上衣，变成銅币，变成某处地窖的住所了。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十二小时在織布、紡紗、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十二小时的織布、紡紗、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現，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來說，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飯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来，十二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織布、紡紗、钻孔等等，而在于这是**掙錢**的方法，掙錢使他能吃飯、喝酒、睡觉。假如說蚕儿吐絲作茧是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那末它就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雇佣工人了。

劳动^①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奴隶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②出卖給奴隶主，正如耕牛不是向农民卖工一样。奴隶連同自己的劳动^③一次而永远地卖給自己的主人了。奴隶是商品，可以从一个所有者手里轉到另一个所有者手里。奴隶本身是商品，但劳动^④却不是他的商品。农奴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⑤。不是他从土地所有者方面領得报酬；相反地，土地所有者从他那里收取貢賦。农奴是土地的附屬品，替土地所有者生产果实。相反地，自由工人自己出卖自己，并且是零碎地出卖。他每天把自己生命中的八小时、十小时、十二小时、十五小时拍賣給出錢最多的人，拍賣給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

① ② ③ ④ ⑤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編者注

資料的所有者，即拍賣給資本家。工人既不屬於私有者，也不屬於土地，但是他每日生命的八小時、十小時、十二小時、十五小時却屬於它的購買者。工人只要願意，就可以離開雇用他的資本家，而資本家也可以隨意辭退工人，只要工人使他不能再獲得利益或者不能使他獲得預期的利益，他就可以辭退。但是，工人是以出賣勞動^①為其工資的唯一來源的，如果他不願餓死，就不能離開整個購買者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工人不是屬於某一個資產者，而是屬於整個資產階級^②；至於工人給自己尋找一個僱主，即在資產階級^③中間尋找一個買主，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

現在，在更詳細地談論資本和雇佣劳动之間的关系以前，我們先簡短地敘述一下在決定工資時起作用的一些最一般的條件。

我們已經說過，工資是一定商品——勞動^④的價格。所以，工資是由那些決定其他一切商品價格的規律決定的。

那末，試問：商品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

① ④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編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不是屬於某一個資產者，而是屬於整個資產階級”改为“不是屬於某一個資本家，而是屬於整個資本家階級”。——編者注

③ 在1891年的版本中，“資產階級”改为“資本家階級”。——編者注

二

科倫 4 月 5 日。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

它是由买主和卖主之間的竞争即供求关系决定的。决定商品价格的竞争是**三方面的**。

同一种商品，有許多不同的卖主供应。誰以最便宜的价格出卖同一质量的商品，誰就一定会战胜其他卖主，从而保证自己有最大的銷路。于是，各个卖主彼此間就进行爭夺銷路、爭夺市場的斗争。他們每一个人都想出卖商品，都想尽量多卖，如果可能，都想由他一个人独卖，而把其余的卖主排挤掉。因此，一个人就要比另一个人卖得便宜些。于是**卖主之間**就发生了竞争，这种竞争降低他們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

但是**买主之間**也有竞争，这种竞争反过来提高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

最后，**买主和卖主之間**也有竞争。前者想买得尽量便宜些，后者却想卖得尽量貴些。买主和卖主之間的这种竞争的結果怎样，要依上述竞争双方的对比关系怎样来决定，就是說要看是买主陣营里的竞争激烈些呢还是卖主陣营里的竞争激烈些。产业把两支軍隊抛到战场上对峙，其中每一支軍隊內部又发生內訌。战胜敌人的是內部冲突較少的那支軍隊。

假定說，市場上有一百包棉花，而买主們却需要一千包。在这种情形下，需求比供应大十倍，因而买主之間的竞争就会很激烈；

他們中間的每一个人都竭力設法至少也要搞到一包，如果可能，就把一百包全都搞到手里。这个例子并不是随意虚构的。在商业史上有过这样一些棉花歉收的时期，那时几个资本家彼此结成联盟，不只想把一百包棉花都收买下来，而且想把世界上的全部存棉都收买下来。这样，在我们前述的情形下，每一个买主都力图排挤掉另一个买主，出较高的价格收买每包棉花。棉花的卖主们看见敌军队伍里发生极剧烈的内讧、并完全相信他们的一百包棉花都能卖掉，因此他们就严防自己内部打起架来，以免在敌人竞相抬高价格的时候降低自己商品的价格。于是卖主阵营里忽然奠定了和平。他们冷静地叉着双手，像一个人似地对抗买主；只要那些最热衷的买主出价又没有一定的限度，那卖主的贪图也就会没有止境了。

可见，某种商品的供应低于需求，那末这种商品的卖主中间的竞争就会很弱，甚至于完全没有竞争。卖主中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买主中间的竞争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剧。结果便是商品价格或多或少显著地上涨。

大家知道，较为常见的是产生相反后果的相反情形：供应大大超过需求，卖主中间拼命竞争，买主少，商品贱价拍卖。

但是，价格上涨和下跌是什么意思呢？高价和低价是什么意思呢？沙粒在显微镜下就显得高，宝塔比起山岳来就显得低了。既然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那末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让我们随便问一个资产者吧。他会像新即位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马上毫不犹豫地利用乘法表来解开这个形而上学的纽结。他会对我们说，假如我生产我出卖的这个商品的费用是一百法郎，而我把它卖了一百一十法郎（自然是在一年期满后），那末这是一种

普通的、老实的、正当的利潤。假如我在进行交换时得到了一百二十或一百三十法郎，那就是高额利潤了。假如我得到了整整二百法郎，那就会是特高的巨额利潤了。对于这个资产者来说，究竟什么是衡量利潤的尺度呢？这就是他的商品的生产費用。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换来的一定数量的别种商品，其生产費用少于他的商品的生产費用，那他就算亏本了。可是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换来的一定数量的别种商品，其生产費用大于他的商品的生产費用，那他就算赢利了。他是以生产費用作为零度，根据他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零度上下的度数来测定他的利潤的升降的。

由此可见，供求关系的改变，引起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引起高价或低价。

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由于供应不足或需求剧增而大大上涨，那末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就不免要相应地下跌，因为商品的价格不过是以货币来表示的别种商品和它交换的比率。举例说，假如一尺綢緞的价格从五法郎上涨到六法郎，那末白銀的价格对于綢緞来讲就下跌了，其他一切商品也都是这样，它们的价格虽然没有改变，但比起綢緞来却是跌价了。这时若要交换得原来那么多的綢緞，就必须拿出更多的商品。

商品价格上涨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大量资本将涌向繁荣的产业部门中去，而这种资本流入较为有利的产业部门中去的现象，要继续到该部门的利潤跌落到普通水平时为止，或者更确切些说，要继续到该部门产品的价格由于生产过剩而跌落到生产費用以下时为止。

反之，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跌落到它的生产費用以下，那末资本就要从该种商品生产部门中流出去了。除了该工业部门已经

不合时代要求，因而必然衰亡以外，該商品的生产，即該商品的供应，就要因为資本的这种外流而縮减，直到該商品的供应和需求相适应为止，就是說，直到該商品的价格重新上漲到它的生产費用水平，或者更确切些說，直到供应低于需求，即直到商品价格又上漲到它的生产費用以上为止，因为商品的現时价格总是高于或低于它的生产費用。

由此可見，資本是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門向另一个生产部門流出或流入的。价格高就引起資本的过分猛烈的流入，价格低就引起資本的过分猛烈的流出。

我們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問題时能够证明：不仅供应，連需求也是由生产費用决定的。可是，这样一来，我們就未免离題太远了。

我們剛才說过，需求和供应的波动，每次都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費用的水平。固然，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終不是高于生产費用，就是低于生产費用；但是，上漲和下降是相互抵銷的，因此，在一定時間內，如果把工业中的資本流入和流出总合起来看，就可看出各种商品是依其生产費用而互相交换的，所以它們的价格是由生产費用决定的。

价格由生产費用决定这一点，不应当了解成像經濟学家們所了解的那种意思。經濟学家們說，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生产費用；在他們看来，这是一个規律。他們把价格的上漲被价格的下降所抵銷，而下降則被上漲所抵銷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变动看作偶然現象。那末，同样也可以（另一些經濟学家就正是这样做的）把价格的波动看作規律，而把价格由生产費用决定这一点看作偶然現象。可是实际上，只有在这种波动的进程中，价格才是由生产費用决定的；我們細加分析时就可以看出，这种波动起着极可怕的破坏作

用，并像地震一样震撼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这种无秩序状态的总运动就是它的秩序。在这种产业无政府状态的进程中，在这种循环运转中，竞争可以说是拿一个极端去抵销另一个极端。

由此可见，商品价格是由生产费用这样来决定的：某些时期，某种商品的价格超过它的生产费用，另一些时期，该商品的价格却下跌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下，而抵销以前超过的时期，反之亦然。当然，这不是就个别产业的产品来说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部门来说的。所以，这同样也不是就个别产业家来说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家阶级来说的。

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就等于说价格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因为构成生产费用的是：（1）原料和劳动工具^①，即产业产品，它们的生产耗费了一定数量的工作日，因而也就是代表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2）直接劳动，它也是以时间计量的。

一般调节商品价格的那些最一般的规律，当然也调节**工资**，即调节**劳动价格**。

劳动报酬忽而提高，忽而降低，是依供求关系为转移的，依购买劳动^②的资本家和出卖劳动^③的工人之间的竞争情形为转移的。工资的波动一般是和商品价格的波动相适应的。可是，在这种波动的范围内，劳动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即为创造劳动^④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那末，劳动^⑤本身的生产费用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为了使工人保持其为工人并把他训练成为工人所需要的费用。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工具”改为“劳动工具损耗部分”。——编者注

② ③ ④ ⑤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因此，某一种劳动所需要的训练时间愈少，工人的生产费用也就愈少，他的劳动的价格即他的工资也就愈低。在那些几乎不需要任何训练时间，只要有工人的肉体存在就行的产业部门里，为造成工人所需要的生产费用，几乎只归结为维持工人生存^①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需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

可是，这里还应该注意一种情况。

工厂主在计算自己的生产费用，并根据生产费用计算产品的价格的时候，是把劳动工具的损耗也计算在内的。譬如说，假如一架机器值一千法郎，使用期限为十年，那末他每年就要往商品价格中加进一百法郎，以便在十年期满时有可能用新机器来更换用坏的机器。同样，简单劳动^②的生产费用中也应加入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即使工人阶级能够繁殖后代并用新工人来代替失去劳动能力的工人的费用。所以，工人的损耗也和机器的损耗一样，是要计算进去的。

总之，简单劳动^③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这种最低工资，也和商品价格一般由生产费用决定一样，不是就单个人来说的，而是就整个种属来说的。单个工人所得，千百万工人所得，不足以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但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在其波动范围内则是和这个最低额相等的。

现在，我们既已讲明了调节工资以及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的最一般规律，我们就能更切近地研究我们的本问题了。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生存”后面加有“及其劳动能力”。——编者注

② ③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三

科倫 4 月 6 日。資本包括原料、劳动工具和各種生活資料，這些東西是用以生產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資料的。資本的所有這些組成部分都是劳动的創造物，劳动的產品，**积累起來的劳动**。作為進行新生產的手段**的积累起來的劳动就是資本**。

經濟學家們就是這樣說的。

什麼是黑奴呢？黑奴就是黑種人。上面的說明和這個說明是一樣的。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係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關係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係，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並不是**貨幣**，沙糖並不是沙糖的**價格**一樣。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關係^①。他們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繫和關係；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繫和社會關係的範圍內，才会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係^②，才会有生產。

生產者相互發生的這些社會關係，他們借以互相交換其活動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不僅僅與自然界發生關係”改為“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編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對自然界的關係”改為“對自然界的影響”。——編者注

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

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或若干交换价值或若干**社会定量的**总和。

不论我们是以棉花代替羊毛也好，是以米代替小麦也好，是以轮船代替铁路也好，只要这些体现资本的棉花、米和轮船同原先体现资本的羊毛、小麦和铁路具有同样的交换价值即同样的价格，那末资本依然还是资本。资本的肉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

性质有丝毫改变。

虽然任何资本都是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然而远不是任何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资本。

任何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一个交换价值。任何单个交换价值都是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例如，值一千法郎的一座房子是一千法郎的交换价值。值一生丁^①的一印张纸是 $\frac{100}{100}$ 生丁的交换价值的总和。能同别的产品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这些产品由以交换的一定比率就是它们的交换价值，如果这种比率是用货币来表示的，就是它们的价格。这些产品的数量多少丝毫不能改变它们成为商品，或者表现交换价值，或者具有一定价格的这种性能。一株树不论其大小如何，终究是一株树。我们拿铁同别的产品交换时不是以两为单位，而是以公担为单位，难道铁作为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能竟会因此而改变吗？铁作为一种商品，只是依其数量多少而具有大小不同的价值，高低不同的价格。

一些商品即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究竟是怎样成为资本的呢？

它成为资本，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借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②而保存下来并增殖起来。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

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

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生丁”改为“分尼”。——编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

资本和雇佣劳动^①是怎样进行交换的呢？

工人拿自己的劳动^②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归他所有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得到一部分现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对工人有什么用处呢？用于直接消费。可是，如果我不把靠这些生活资料维持我的生活的一段时间用来生产新的生活资料，即在消费的同时用我的劳动创造新价值来补偿那些因消费而消失了的的价值，那末我一把这些生活资料消费完，它们对于我就算是完全白浪费了。但是，工人为了换到生活资料，正是把这种贵重的再生产力量让给了资本家。因此，对于工人本身来说，这种力量是白浪费了。

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有个农场主每天付给他的一个短工五银格罗申。这个短工为得到这五银格罗申，就整天在农场主的田地上干活，保证农场主能得到十银格罗申的收入。农场主不但收回了他付给短工的价值，并且还把它增加了一倍。可见，他有成效地、生产性地使用和消费了他付给短工的五银格罗申。他拿这五银格罗申买到的正是一个短工的能生产出双倍价值的农产品并把五银格罗申变成十银格罗申的劳动和力量。短工则拿他的生产力（他正是把这个生产力让给了农场主）换到五银格罗申，并用它们换得迟早要消费掉的生活资料。所以，这五银格罗申的消费有两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资本和雇佣劳动”改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编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种方法：对资本家来说，是有生产性的，因为他用这五银格罗申换来的劳动力使他得到了十银格罗申；对工人来说，是非生产性的，因为他用这五银格罗申换来的生活资料永远消失了，他只有再和农场主进行同样的交换才能重新取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

一个棉纺织厂的工人是不是只生产棉织品呢？不是，他生产资本。他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借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

资本只有同劳动^①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起来。雇佣劳动^②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因此，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增加。

所以，资本者及其经济学家们断言，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千真万确呵！工人若不受雇于资本家就会灭亡。资本若不剥削劳动^③就会灭亡，而要剥削劳动^④，资本就得购买劳动^⑤。投入生产的资本即生产资本增殖愈快，也就是说，产业愈繁荣，资产阶级愈发财，生意愈兴隆，资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愈多，工人出卖自己的价格也就愈高。

原来，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竟是工人能勉强过活的必要条件。

但是，生产资本的增加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权力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力量的增加。雇佣劳动生产着对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财富，也就

① ③ ④ ⑤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雇佣劳动”改为“雇佣工人的劳动力”。——编者注

是說生产着同它敌对的力量——资本，而它从资本那里取得就业手段，即取得生活资料，是以雇佣劳动又会变成资本的一部分，又会变成使资本加速增殖的杠杆为条件的。

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劳动的利益**^①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說**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一个方面制约着另一个方面，就如同高利贷者和挥霍者相互依存一样。

当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的时候，他的命运是取决于资本的。所谓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一致就是这么一回事。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的利益”改为“工人的利益”。——编者注

四

科倫 4 月 7 日。資本愈增长，雇佣劳动量就愈增长，雇佣工人人数就愈增加，一句话，受資本支配的人数就愈增多。我們且假定有这样一种最适意的情形：随着生产資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增加了，因而劳动价格即工資也提高了。

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圍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宮殿，这座小房子就縮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規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宮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末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滿意，越发被人輕視。

工資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資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生产資本的迅速增加，就要引起財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資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滿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們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們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們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們是相对的。

工資一般不仅是由我能够用它交換到的商品数量来决定的。

工資包含着各种对比关系。

首先，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①取得一定数量的货币。工資是不是单由这个货币价格来决定的呢？

在十六世紀，由于美洲的发现^②，欧洲流通的黄金和白银的数量增加了。因此，黄金和白银的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比较起来就降低了。但是，工人们出卖自己的劳动^③所得到的银币数仍和从前一样。他們的劳动的货币价格仍然如旧，然而他們的工資毕竟是降低了，因为他们拿同样数量的银币所交换到的别种商品比以前少了。这是促成十六世紀資本增殖和资产阶级兴盛的原因之一。

我們再举一个别的例子。1847年冬，由于歉收，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面包、肉类、黄油、干酪等等)大大涨价了。假定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④所得的货币量仍和以前一样。难道他們的工資沒有降低嗎？当然是降低了。他們拿同样多的货币所能换到的面包、肉类等等东西比从前少了。他們的工資降低并不是因为白银的价值减低了，而是因为生活资料的价值增高了。

我們最后再假定，劳动的货币价格仍然未变，可是一切农产品和工业品由于使用新机器、年成好等等原因而降低了价格。这时，工人拿同样多的货币可以买到更多的各种商品。所以，他們的工資正因为工資的货币价值仍然未变而提高了。

总之，劳动的货币价格即名义工資，是和实际工資即用工資实际交换所得的商品量并不一致的。因此，我們談到工資的增加或降低时，不应当仅仅注意到劳动的货币价格，仅仅注意到名义

① ③ ④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編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美洲的发现”改为“在美洲发现了更丰富和更易于开采的金矿”。——編者注

工資。

但是，無論名義工資，即工人把自己賣給資本家所得到的貨幣量，無論實際工資，即工人用這些貨幣所能買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資所包含的各種對比關係完全表示出來。

此外，工資首先是由它和資本家的贏利即利潤的對比關係來決定的。這就是比較工資、相對工資。

實際工資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的劳动价格，反之，相對工資所表示的則是同積累起來的劳动的价格相比的直接劳动价格，是雇佣劳动和資本的相对价值，是資本家和工人的相互价值^①。

實際工資可能仍然未變，甚至可能增加了，但是相對工資却可能降低了。假定說，一切生活資料跌價三分之二，而日工資只降低了三分之一，比方由三法郎降低到兩法郎。這時，雖然工人拿這兩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恩格斯把自“反之，相對工資”以下的一段話改為：“而相對工資所表示的，則是直接劳动从劳动新創造出的價值中所獲得的那個同積累起來的劳动即資本从這種價值中所取得的份額相比的份額。

上面，在第 14 頁 [見本卷第 477 頁。——編者注] 上，我們說過：‘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產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資是原有商品中由資本家用以購買一定量的生產勞動力的那一部分。’但是，資本家要從賣出由工人創造的產品所得的進款中再補償這筆工資。資本家在補償這筆工資時，照例要在扣除生產費用後，還有若干剩餘，即還有利潤。工人所生產的商品的銷售價格，對資本家來說可分為三部分：**第一**，補償他所墊支的原料價格和他所墊支的工具、機器及其他勞動資料的損耗；**第二**，補償資本家所墊支的工資；**第三**，這些費用以外的餘額，即資本家的利潤。第一部分只是補償原已存在的價值；很清楚，補償工資的那一部分和構成資本家利潤的餘額完全是從工人勞動所創造出來的并附加到原料價值上去的**新價值**中得來的。而在這個意義上說，為了把工資和利潤加以比較，我們可以把兩者都看成是工人生產的產品中的份額。”——編者注

法郎可以买到比从前拿三法郎买到的更多的商品，但是和资本家的利润比较起来，工人的工资终究是降低了。资本家（比如，一个工厂主）的利润增加了一法郎，换句话说，资本家拿比以前少的交换价值付给工人，而工人却得替资本家生产出比以前多的交换价值。资本的价值比劳动的价值提高了^①。社会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更不平衡了。资本家用同样多的资本支配着更多的劳动。资本家阶级支配工人阶级的权力增加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更坏了，比起资本家的地位来又降低了一级。

决定工资和利润在其相互关系上的降低和增加的一般规律究竟是怎样的呢？

工资和利润是互成反比的。资本的交换价值^②即利润愈增加，则劳动的交换价值^③即按日工资就愈降低；反之亦然。利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而利润降低多少，则工资就增加多少。

也许有人会驳斥说：资本家赢利可能是由于他拿自己的产品同其他资本家进行了有利的交换，可能是由于开辟了新的市场或者原有市场上的需要骤然增加等等，从而对他的商品的需求量大为增加；所以，一个资本家所得利润的增加可能是由于损害了其他资本家的利益，而与工资即劳动^④的交换价值的涨落无关；或者，资本家所得利润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改进了劳动工具，采用了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等等。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资本的价值比劳动的价值提高了”改为“资本所得的份额比劳动所得的份额提高了”。——编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资本的交换价值”，改为“资本的所得份额”。——编者注

③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的交换价值”改为“劳动的所得份额”。——编者注

④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首先必須承认，所得出的結果依然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是經過相反的途徑得出的。固然，利潤的增加不是由于工資的降低，但是工資的降低却是由于利潤的增加。資本家用同一数量的劳动^①，购得了更多的交换价值，而对这个劳动却没有多付一文。这就是說，劳动所得的报酬同它使資本家得到的純收入相比却减少了。

此外，我們还应提醒，無論商品价格如何波动，每一种商品的平均价格，即它同別种商品相交换的比率，总是由它的生产費用决定的。因此，資本家相互間的盈亏得失必定在整个資本家階級範圍內互相抵銷。改进机器，在生产中采取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使得在一定的劳动時間內，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和資本可以創造出更多的产品，但絕不是創造出更多的交换价值。如果我用紡紗机能够在一小时內生产出比未发明这种机器以前的产量多一倍的紗，比方从前为五十磅，現在为一百磅，那末我用这一百磅紗交换所得^②的商品，并不比以前用五十磅交换到的多些，因为紗的生产費用减低了一半，或者說，因为現在我用同样多的生产費用能够生产出比以前多一倍的产品。

最后，不管資本家階級即資產階級（一个国家的也好，整个世界市場的也好）相互之間分配生产所得的純收入的比率如何，这个純收入的总額归根到底只是活劳动^③ 加到全部积累起来的劳动上去的那个数額。所以，这个总額是按劳动增殖資本的比率，即按利潤比工資增加的比率增长的。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別人的劳动”。——編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在“所得”之后还有“平均起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時間內”一句話。——編者注

③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活劳动”改为“直接劳动”。——編者注

可見，即使我們單只在**資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这个範圍內觀察問題，也可以知道**資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

資本的迅速增加就等于利潤的迅速增加。而利潤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劳动的交換價值^① 同样迅速下降，相对工資同样迅速下降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在实际工資同名义工資即劳动的貨幣价值同时增加的情况下，只要实际工資不是和利潤同等地增加，相对工資还是可能下降的。比如說，在經濟兴旺的时期，工資提高 5%，而利潤却提高 30%，那末比較工資即相对工資**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

所以，一方面工人的收入在資本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橫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社会鴻沟也同时扩大，而資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資本的依賴程度也随着增大。

所謂資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論点，实际上不过是說：工人把他人的財富增殖得愈迅速，落到工人口里的殘羹剩飯就愈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愈多，依附資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得愈多。

这样我們就看出：

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势**，即使**資本的尽快增加**如何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資產者即資本家的利益之間的对立状态。**利潤和工資仍然是互成反比的**。

假如資本增加得迅速，工資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資本家的利潤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們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橫在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社会鴻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的交換价值”改为“劳动价格”。——編者注

沟扩大了。

最后：

所谓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阶级愈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敌对它的力量，即愈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财富，它就能在愈加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资产阶级增殖财富、重新为资本加强权力而工作——这样的工作无非是它本身在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罢了。

五

科倫 4 月 10 日。然而，是不是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們所說的那樣，**生產資本的增加真的和工資的提高密不可分呢？**我們不應當听信他們的話。我們甚至于不能相信他們的這種說法：似乎資本長得越肥，它的奴隸也吃得越好。資產階級太開明了，太會打算了，它沒有封建主的那種以奴僕的衣着華麗夸耀于人的偏見。資產階級的生存條件迫使它錙銖必較。

因此我們就應當更仔細地研究一個問題：

生產資本的增長是怎樣影響工資的？

如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資本整個說來是在不斷增長，那末勞動的積累就是**更多方面**的了。資本的數目和資本的數額^①日益增加。資本的增殖加劇資本家之間的競爭。資本數額的增加，就使得有可能把裝備着火力更猛烈的鬥爭武器的更強大的工人大軍拋入產業戰場。

一個資本家只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賣商品的情況下，才能把另一個資本家逐出戰場，並占有他的資本。可是，要能夠賤賣而又不破產，他就必須廉價生產，就是說，必須盡量增加勞動的生產力。而增加勞動的生產力的首要辦法是**更細地分工**，更全面地運用和經常地改進**機器**。內部實行分工的工人大軍愈龐大，應用機器的規模愈廣大，生產費用相對地就愈迅速縮減，勞動就更有效率。因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資本的數目和資本的數額”改為“資本家的數目和他們的資本的數額”。——編者注

此，资本家之间就发生了各方面的竞争：他们竭力设法扩大分工和增加机器，并尽可能大规模地使用机器。

可是，假如某一个资本家由于更细地分工、更多地采用新机器并改进新机器，由于更有利和更广泛地利用自然力，因而有可能用同样多的劳动或积累起来的劳动生产出比他的竞争者更多的产品（即商品），比如說，在同一劳动时间内，他的竞争者只能織出半尺麻布，他却能織出一尺麻布，那末他会怎样办呢？

他可以继续按照原来的市场价格出卖每半尺麻布，但是这样他就不能把自己的敌人逐出战场，就不能扩大自己的销路。可是随着他的生产的扩大，他对销路的需要也增加了。固然，他所采用的这些更有力更贵重的生产资料使他能够廉价出卖商品，但是这种生产资料又使他不得不出卖更多的商品，为自己的商品争夺更大得多的市场。因此，这个资本家出卖半尺麻布的价格就要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些。

虽然这个资本家生产一尺麻布的费用并不比他的竞争者生产半尺麻布的费用多，但是他不会以他的竞争者出卖半尺麻布的价格来出卖一尺麻布。不然他就占不到任何便宜，而只是通过交换把自己的生产费用收回罢了。如果他的收入终究还是增加了，那只是因为他动用了更多的资本，而不是因为他的资本比别人的资本更多地增加了自己的价值。而且只要他把他的商品价格定得比他的竞争者低百分之几，他追求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他压低价格就能把他的竞争者挤出市场，或者至少也能夺取他的竞争者的一部分销路。最后，我们再提一下，现时价格总是高于或低于生产费用，这取决于该种商品是在产业的旺季出卖的还是淡季出卖的。一个采用了生产效能更高的新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能得到的超出

他的实际生产費用的百分率，是依每尺麻布的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迄今的一般生产費用为轉移的。

可是，这个資本家的**特权**不会长久，因为同他竞争的資本家也会采用同样的机器，实行同样的分工，并以同样的或更大的規模采用这些机器和分工。这些新措施将得到广泛的推广，直到麻布价格不仅跌到**原先的生产費用以下**，而且跌到**新的生产費用以下为止**。

这样，資本家的相互关系又会像采用新生产資料**以前**那样了；如果說他們由于采用这种生产資料曾經能够用以前的价格供給加倍的产品，那末**現在**他們已不得不按**低于**以前的价格出卖加倍的产品了。在这种新生产費用的水平上，同样一場鉤心斗角的斗争又重新开始。又有人实行更細的分工，又有人增加机器数量，利用这种分工的範圍和采用这些机器的規模日益扩大。而竞争又对这个結果发生反作用。

由此可見，生产方式和生产資料总在不断变更，不断革命化；**分工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規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規模的生产。**

这是一个規律，这个規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資產阶级的生产甩出原先的軌道，并迫使資本加强劳动的生产力，因为它以前就加强过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規律不让資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說：**前进！前进！**

这个規律正就是那个在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中必然使商品价格和商品**生产費用**趋于一致的規律。

不管一个資本家运用了效率多么高的生产資料，竞争总使这种生产資料的采用成为普遍的现象，而当这种生产資料的采用一旦成为普遍的现象时，他的資本具有更大效率的唯一后果就只能

是：要取得原有的价格，他就必须供给比以前多十倍、二十倍、一百倍的商品。可是，因为现在他必须售出也许比以前多一千倍的商品，才能靠增加所售产品数量的办法来弥补由于售价降低所受的损失；因为他现在必须卖出更多的商品不仅是为了得到利润^①，并且也是为了抵补生产费用（我们曾经说过，生产工具本身也日益昂贵）；因为此时这种大量出卖不仅对于他而且对于他的竞争对方都成了生死问题，所以先前的斗争就因已经发明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效率愈大而愈残酷无情地激烈起来。所以，分工和机器的采用又将以更大得无比的规模发展起来。

不管已被采用的生产资料的力量多么强大，竞争总是要把资本从这种强大力量中得到的黄金果实夺去，使商品的价格降低到生产费用的水平；也就是说，只要有可能更廉价的生产，即有可能用同一数量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竞争就使廉价生产即按原先价格供给日益增多的产品数量成为确定不移的规律。可见，资本家努力的结果，除了必须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商品以外，换句话说，除了使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恶化以外，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此，虽然竞争经常以其生产费用的规律迫使资本家坐卧不宁，把他制造出来对付竞争者的一切武器倒转来对着他自己，但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在竞争中取胜，孜孜不倦地采用价钱较贵但能进行廉价生产的新机器，实行新分工，以代替旧机器和旧分工，并且不等到来竞争使这些新措施过时，就这样做了。

现在我们若是想像一下这种狂热的激发状态同时笼罩了整个世界市场，那我们就会明白，资本增殖、积累和集聚的结果，如何导向了不断地、日新月异地、更大规模地实行分工，采用新机器，改进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得到利润”改为“得到更多的利润”。——编者注

旧机器。

这些同生产资本的增殖分不开的情况又怎样影响工资的决定呢？

更进一步的**分工**使一个工人能做五个、十个乃至二十个人的工作，因而就使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五倍、十倍乃至二十倍。工人中间的竞争不只表现于一个工人把自己出卖得比另一个工人贱些，而且还表现于一个工人做五个、十个乃至二十个人的工作。而资本所实行的和经常扩展的**分工**就迫使工人进行这种竞争。

其次，**分工愈细，劳动就愈简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就不需要体力上或智力上的特别本事和技能了。他的劳动成为人人都能从事的劳动了。因此，工人受到四面八方的排挤；我们还要提醒一下，一种工作愈简单，就愈容易学会，为学会这种工作所需要的生产费用愈少，工资也就愈降低，因为工资像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总之，劳动愈是不能给人以乐趣，愈是令人生厌，竞争也就愈激烈，工资也就愈减少。工人想维持自己的工资总额，就得多劳动；多工作几小时或者在一小时内造出更多的产品。这样一来，工人为贫困所迫，就愈加重分工的极危险的后果。结果就是：**他工作得愈多，他所得的工资就愈少**。这里的原因很简单：他工作得愈多，他给自己的工友们造成的竞争就愈激烈，因而就使自己的工友们变成他自己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也像他一样按同样恶劣的条件出卖自己。所以，原因同样很简单：他归根到底是**自己给自己，即自己给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自己造成竞争**。

机器也发生同样的影响，而且影响的规模更大得多，因为机器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

工；因為在最先使用機器的地方，機器就把大批手工工人拋到街頭上去，而在機器日益完善、改進或為生產效率更高的機器所替換的地方，機器又把一批一批的工人排擠出去。我們在前面大略地描述了資本家相互間的產業戰爭。**這種戰爭有一個特點，就是致勝的辦法與其說是增加勞動大軍，不如說是減少勞動大軍。統帥們即資本家們相互競賽，看誰能解雇更多的產業士兵。**

不錯，經濟學家們告訴我們說，似乎因採用機器而成為多餘的工人可以在**新的**工業部門里找到工作。

他們不敢干脆地肯定說，在新的勞動部門中找到棲身之所的就是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事實最無情地粉碎了這種謊言。其實，他們不過是肯定說，在**工人階級的其他組成部分**面前，譬如說，在一部分已準備進入那種衰亡的產業部門的青年工人面前，出現了新的就業門路。這對於不幸的工人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安慰。資本家老爺們是**不會缺少可供剝削的新鮮血肉的**，於是他們就讓死人們去埋葬自己的屍體。這種安慰，與其說是對工人的安慰，不如說是對資本家本身的安慰。要知道，假若機器消滅了整個僱傭工人階級，那末資本的最可怕的时刻就會到來，因為資本沒有僱傭勞動就不再成為資本了！

就假定那些直接被機器從一個產業部門排擠出去的工人以及原已指望受雇於該產業部門的那一部分青年工人**都能找到新工作**。是否可以相信新工作的報酬會和已失去的工作的報酬同樣高呢？**要是這樣，那就是違反了一切經濟規律**。我們說過，現代產業經常是用簡單的和低級的工作來代替較複雜和較高級的工作的。

既是這樣，被機器從一個產業部門排擠出去的一大批工人若不甘願領取**更低更壞的報酬**，又怎能在別的部門找到棲身之所呢？

有人說制造机器本身的工人是一种例外。他們說，既然产业需要并使用更多的机器，机器的数量就必然增加，因而机器的生产也必然增加，而在这个生产部門中工作的工人人数也必然随之增加；况且这个产业部門的工人是熟练工人，而且还是受过教育的工人。

从1840年起，这种原先也只是一半正确的論点已經毫无正确的影子了，因为机器生产部門也完全和棉紗生产部門一样，日益多方面地采用机器，而机器生产部門的工人，比起极完善的机器来，只能起着极不完善的机器的作用。

可是，在一个男工被机器排挤出去以后，工厂方面也許会雇佣三个童工和一个女工！难道先前一个男工的工資不是應該足够养活三个孩子和一个妻子嗎？难道先前最低工資不是應該足够維持工人生活和繁殖工人后代嗎？资产阶级爱說的这些话在这里究竟证明了什么呢？只证明了一点：現在要得到維持一个工人家庭生活的工資，就得消耗比以前多三倍的工人生命。

总括起来說：生产資本愈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愈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愈扩大，工人之間的竞争就愈剧烈，他們的工資就愈减少。

加之，工人阶级还从較高的社会阶层中得到补充；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有大批小产业家和小食利者，他們除了赶快跟工人一起伸手乞求工作，毫无别的办法。这样，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像森林似地愈来愈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則愈来愈消瘦。

不言而喻，小产业家是支持不住这种战争^①的：这种战争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生产的規模經常扩大，也就是說必須要做大产业家而絕不能做一个小产业家。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战争”改为“斗争”。——編者注

当然，还有一点也是用不着进一步说明的：资本愈增殖，资本的总量和数目愈增加，资本的利息也就愈减少；因此，小食利者就不可能再依靠利息来维持生活，必须投到产业方面去，即补充小产业家的队伍，从而增加无产者的候补人数。

最后，上述发展进程愈迫使资本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使用既有的巨大的生产资料，并为此而动用一切信贷机构，而“地震”^①也来得愈来愈频繁，在每次地震中，商业界只是由于埋葬一部分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才维持下去，——也就是说，危机来得愈益剧烈了。这种危机之所以来得愈频繁和愈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愈加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市场^②愈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新市场或以前只被微微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但是，资本不光靠剥削劳动来生活。像显贵的野蛮的奴隶主一样，资本也要他的奴隶们陪葬，即在危机时期要使大批的工人死亡。由此可见：如果说资本增长得迅速，那末工人之间的竞争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就是说，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虽然如此，资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件。

(待續)²⁹⁹

卡·馬克思根据他在1847年12月下半月所做的讲演写成
載于1849年4月5—8日和
11日“新萊茵报”第264—267
号和第26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地震”改为“产业方面的地震”。——編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市场”改为“新市场”。——編者注

*政治流亡者的引渡

科倫 4 月 12 日。普魯士政府发布了逮捕奧、德和非德籍的所謂政治犯，特別是科苏特、貝姆、佩尔采尔及其他匈牙利英雄的命令，这就表明了普魯士的宪法自由和血腥的帝王战地司法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尽管有皇冠問題，尽管有德国問題、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問題和其他問題，波茨坦和奧里繆茨之間仍然存在着 *entente cordiale* [衷心的一致]，这是事实，只有“科倫日报”和其他善于騙人的报刊的那些慣耍外交手腕的文坛田鼠才看不见这个事实。但这种 *entente cordiale* 竟达到卑鄙齷齪的頂点，甚至于把政治流亡者引渡給奧地利人，——这是我們素負盛誉的内閣給我們做出的一件出人意料之外的事。

如果罗伯特·勃魯姆从維也納逃到了普魯士，普魯士政府也会把他引渡給劊子手的。

普魯士政府在今年 4 月 4 日曾把罗伯特·勃魯姆的战友之一、維也納立宪民主党人赫克引渡給战地法庭那些嗜血的奧地利恶狗。“上西里西亚火車头报”刊載了下面这篇拉提博尔^① 4 月 4 日的通訊：

“昨天白天，維也納立宪民主党人赫克被警察用專車从布勒斯劳押送到

① 波兰称作：拉威布日。——編者注

这里，他因参加維也納十月革命而被控以叛国罪，不久前才逃到該城。赫克在其致維也納親屬的一封信中告知了他在布勒斯劳的住址。这封信显然遭到了和許多其他信件同样的命运，就是說，它在奧地利的某个郵政驛站中被人拆看了，因为此后不久布勒斯劳警察当局即奉命应奧地利政府的請求，前往上述赫克的住地将他逮捕并引渡給奧地利人。

依照这道命令，被捕者于昨天白天被押送到此地。被捕者由于早已身患重病，不能繼續前往战地法庭。赫克被关入城内監獄，由士兵严加看守，但今晨五时他已經由两名市警备隊員和一名宪兵押解出境。备受称頌的普魯士人道精神，在这两个半小时的最后路途上，竟无视其病情的需要，一次也未准許他下車。同时也拒絕給他任何清凉飲料喝，因为没有錢买，虽然被捕者声明，他在布勒斯劳被捕时有八十塔勒被沒收了，而旅途的花費，我們确实知道，总共只<！>需要三十塔勒。

德国報紙又不容辞的責任是：严肃地告誡奧地利流亡者，留在普魯士的特別是西里西亞的領土內是很危險的。关于引渡罪犯的旧协定还繼續有效。战地司法所宣称的德国根本大法，無論在普魯士或者在奧地利，都同样得到承认并被狂热地运用着。”

在宣布戒严的各国中的执行战地司法的英雄們所給予我們的教訓，我們應該牢牢記住。当报复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各国民主派必将表现出这些老爷們現在所表现的这种团结精神。

半个欧洲的渣滓——国王們和大臣們——去年春天在英国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

我們向曼托伊費尔、勃兰登堡及其同伙保证，在下一大革命——他們自己正在大力加速它的来临——的时候，一定会很順利地做到使英国把他們引渡給复仇心熾热的胜利的德国人民。对这一点的保证現在就已經具备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4 月 12 日
載于 1849 年 4 月 13 日“新萊茵报”
第 271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声 明

科倫 4 月 14 日。公民卡·馬克思、卡·沙佩尔、弗·安內克、海·貝克尔和威·沃尔弗(助理)于今日成立了萊茵民主联合会区域委员会。

公民馬克思、沙佩尔、安內克和沃尔弗联合发表如下声明：

“我們认为，各民主团体的現行組織成分过分龐杂，这势必将妨碍有利于事业的有效活动的开展。

我們认为最好是建立一个由单一成分組成的工人联合会的更为严密的組織，因此我們声明：自即日起退出各民主团体萊茵区域委员会。

弗·安內克 卡·沙佩尔
卡·馬克思 海·貝克尔
威·沃尔弗（助理）”

写于 1849 年 4 月 14 日

載于 1849 年 4 月 15 日

“新萊茵报”第 273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柏林第二議院四月十三日會議

科倫 4 月 19 日。为了多样化，我們現在又回头來談談我們敬愛的柏林第二議院。它審查了議員資格，通過了奏折，制定了會議規則，并以空前未有的特別興致討論了德國皇帝問題，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是“新萊茵報”小品文的題材³⁰⁰。這一切活動由于諾瓦拉和佩斯的炮聲而毫不被人注意，就連埃克恩弗爾德的“海戰”和攻占杜佩爾村的堡壘³⁰¹ 所給人的印象，都比普魯士人民代議機關中的右派和左派的所有一切發言給人的印象要來得強烈。

但是現在，當可敬的議院忙于討論三個禁口律³⁰²——招貼法、俱樂部法和出版法，而其中之一的招貼法已經審查完畢的時候，事情對於我們的意義就更大一些，探究一下我們的議員先生怎樣竭盡全力來補充欽定憲法，也就更加有趣。

我們來看看 4 月 13 日第二十六次會議的速記記錄³⁰³。

首先，議員利濟斯基就使用波蘭後備軍對丹麥作戰一事，對內閣提出質問。

根據後備軍法第六十一節，只有在國家遭到敵人突然襲擊的情況下，才能動員後備軍。後備軍的全部組織機構證明，一般只有在正規軍和預備隊不足時才能使用後備軍。可是現在卻動員後備軍去對那隻用常備部隊的一個軍就可以打敗的小小的丹麥作戰！

但還不止於此。儘管只是採取背信棄義的行為和野蠻的暴力

才把所謂的德屬波茲南并入德意志聯邦，尽管位于有名的分界綫那边的波茲南部分³⁰⁴，按照各种条約，都跟德意志聯邦毫不相干，当局还是在分界綫两边的波茲南地区动員了一部分后备軍派往什列斯維希。

这些后备軍士兵按民族說来是**真正的波兰人**，并且其中一半人甚至沒有加入德意志聯邦，但他們竟被派到什列斯維希，作为**德意志帝国**的士兵，戴上綴有**德意志帝国**黑紅黃三色帽徽的头盔，为了**德意志的更大的荣誉**而送死！

“**德国**战争”在倫巴第的結局是由克罗地亚人决定的；“**德国**”对維也納的斗争的結局又是由克罗地亚人以及捷克人、卢西人决定的；“**德国**”在什列斯維希的战争的結局将由**波兰人**来决定。現今就是靠这样的士兵来取得“**德国武器的胜利**”的！

国王就是这样来履行他通过自己的全权代表于4月11日向波兰人許下的諾言的：

“据此，出生于波茲南大公国的新兵不应編入西里西亚的或德国的任何其他部队，反之，德国的新兵也不应編入波兰的部队。部队的訓練和指揮應該用他們的語言……各种不同兵种的波兰軍队應該成为**完全独立的单位**”，等等。

利济斯基在談到这一切时的語調是平靜而坚决的。在发言結束时，他提請會議注意这种特別險恶的用心：后备軍有三个营正好是在去年唯一严重遭受普魯士所强加的国内战争危害的省份中募集的。

陸軍大臣施特罗达先生接着发言。

大臣先生向會議作了一个极其冗长的报告。他說：“普魯士的整个軍事組織是建立在常备軍和后备軍相結合的原則上的，在編

制軍和师的时候貫徹了这个原則，而在战时这个原則还推用于旅”；单派“常备軍而不带后备軍到遙远的戰場上去，会大大地妨碍某些作战部队的有机配合，而在动員其余的部队时也会遇到种种严重的阻碍”，等等。这一切都极其有效地使那些坐在議院开会的庸人和官吏对于“我的英勇軍隊”的組織，产生了一种极好的看法。

就算是这样吧。就算“我的英勇軍隊的常备軍”离不开“我的英勇軍隊的后备軍”。就算和丹麦的危險的馬鈴薯战争³⁰⁵使政府不得不施展光荣的普魯士軍制的一切詭計。但是，为什么偏要波兰人来充当这潜伏在光荣的普魯士軍制中的劫运的牺牲品呢？

因为……“就因为目前形势証明这是正确的！”

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普魯士陸軍大臣这样答复質問。

还需要回答下面的法律問題：在德意志帝国的战争中，不應該使用德国軍隊嗎？关于这一点，施特罗达先生声明說：

(1)“波茲南大公国，除一小部分外……是德国的組成部分。”

这就是去年所說的“除一小部分”边境地带应屬於德国“外”，波茲南应屬於波兰的这句话的普魯士譯文。現在，形势已經变得可以不需要漂亮空話的掩飾而用粗魯詞句公开承认自己所干的欺詐勾当了。

(2)“整个波茲南大公国内各軍区的划分，至今还没有任何改变。因此<！>，根据这种情况<！>，已經动員的三个营，大約一半由分界綫这边的居民，一半由分界綫那边的居民組成。”

換句話說就是：要演这出分界綫的滑稽剧，只是为了使波茲南的三分之二直接并入德国版图，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則間接并入。而为了使波兰人最后丢掉那种以为分界綫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幻想，

我們正是現時在分界綫所穿过的地区內募集我們的帝國軍隊。

(3)“直到現在，在使用在波茲南大公國內已經動員的常備軍時，除了合乎國家目的的意見外，其他任何意見均在所不顧。”

既然踐踏了 1848 年 3 月和 4 月所作的有關常備軍的莊嚴誓約，那末為什麼對後備軍就不可以這樣做呢？難道後備軍的波蘭籍士兵就不能像常備軍的波蘭籍士兵一樣也成為優秀的“帝國軍隊的士兵”嗎？

我們所考慮的只是“合乎國家的目的”！

而“合乎國家的目的”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種“合乎目的”的意思是十分清楚的。就是想使能夠拿起武器和受過軍事訓練的居民，離開那些尚未完全跟“普魯士祖國”融為一體的地区。就是想懲罰那些不以普魯士精神來投票的不稱心的選民。就是想使這些選民對公民的義務有比較正確的認識，並為此目的而強使他們到“我的英勇軍隊”中去補課。用自己的普魯士主義態度激起某些可恨的選民的反抗，然後就好極其冷酷無情地判他們十五年苦役，或者甚至可以借助於戰地法庭對他們饗以鉛彈和火藥。

因此，就在波茲南以及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亞一部分地區徵集了後備軍。固然施特羅達先生沒有談到萊茵省，但是克列弗爾營已經被派到什列斯維希去了。或者，莫非是施特羅達先生打算在萊茵省也劃一條分界綫，以便後來聲明：萊茵省“除一小部分外”，都是威斯特伐里亞的組成部分？

尚未發生的事情是可能發生的。雖然征兵的事直到現在還沒有涉及萊茵省的大部分地區，我們還是知道，儘管一再辟謠，但是把第八軍即萊茵省的後備軍也動員起來的這種堅決的意圖仍然存

在。这种动員的准备工作已在进行,而相应的命令也会很快下达。

自然,这也是“合乎国家的目的”并为“目前形势”证明是正确的。

如果萊茵省的議員提出質問,施特罗达先生也会像他現在回答利济斯基先生一样回答他們:問題“实际上已經解决了”,因为“萊茵师业已集中在弗倫茲堡附近”!

施特罗达先生的講話結束以后,利济斯基先生要求发言对事实提出更正。但會議規則禁止对大臣的回答提出事实更正。會議規則是正确的。居然认为大臣的回答需要事实更正,这是多么不合乎普魯士人本性的卤莽无礼的行为!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4月19日

載于1849年4月20日“新萊茵报”
第27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俄 国 人

科倫 4 月 21 日。大約十一个月以前，当“新萊茵报”开始出版的时候，它曾是提醒人們注意俄国軍队在我国东部边境集結的第一家报纸。那时許多善良的公民說这是夸大其詞，庸人自扰，等等。

現在已經清楚了，我們是不是夸大其詞。最初只是保卫自己边境的俄国人，随着反革命势力的加强，开始轉入了进攻。巴黎的六月胜利把他們引进了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維也納和佩斯的陷落又把他們引进了海尔曼施塔特和喀琅施塔得^①。

一年以前，俄国还没有作好战争准备；当时，在它被突然爆发的革命的无限威力吓得惊慌失措的最初时刻，本来是很容易把三四万俄国軍队逐出波兰并建立一个自由的波兰的。有人这样号召过，但是这种号召没有得到响应。这就是俄国人有时間武装起来，而現在他們为数五六十万人的軍队把我們包圍在尼門河到多瑙河与阿留塔河^②一带。据“波罗的海报”的报道，仅仅沿普魯士边境就駐扎有大约十五万人；其余的軍队駐在国内，在加里西亚边境附近，在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在立陶宛、波多利亚和沃倫，在諾沃格奧尔基也夫斯克（莫德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得姆布林和

① 羅馬尼亚称作：錫比烏和布拉索。——編者注

② 羅馬尼亚称作：奧尔特河。——編者注

扎莫斯提耶諸地的要塞中，据“波罗的海报”的报道，在这些要塞中儲存有足够供二十五万人用的武器和軍需品。

这家报纸写道：

“粮食儲备是靠发放强制債券建立的，每个地主都必须接受債券而供应軍队所必需的一定数量的食品。明年这项債券将被折算为賦稅。因此，不久前曾流傳着一种謠言，說俄国政府命令在波兰預征一年的賦稅。”

这项債券的接受情况如何，我們将从其他方面得知。

去年末和今年初，波兰地主曾必須供应大量食品，不过这项供应已被算做納稅。大家滿以为这样就算完了，可是現在才知道，賦稅必須提前交到今年年底。

供应軍队給养的这种强制措施就已經表明，集中在波兰的俄国軍队的数目是多么巨大。

另一家报纸——波茲南的“东方日报”³⁰⁶——4月13日从波茲南报道說：

“在西方的俄国軍队的数量是：在波兰王国駐扎有利季盖尔的一个軍；利季盖尔第四軍的一半再加上預备队，总共大約有十二万人。在立陶宛駐扎着一个所謂的擲彈軍(原沙霍夫斯基軍)和第一軍的一部分。近卫軍会到得迟一些——关于它要来的事已經談了好几个月了。在杜布諾設有大本营的沃倫，配置了契果达耶夫斯基第四团的其余部队。在基輔附近駐扎着第二輔助軍，在克列美涅茨駐扎着六千到八千人的快速軍(巴甫洛夫率領)。最后，在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还配置了为数多至六万五千人的利迭尔斯軍。”

这些部队集結在这里的目的何在——这一点他們自己作了非常天真地解釋：

“俄国兵士和軍官談話都是不太审慎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为什么他們屯駐在边境这个問題，他們每人的回答都是一样，即因为我們的皇帝是普魯士国王的姻兄弟。自从俄国人在大战中打败法国人以后，一直到巴黎的全

部土地都属于皇帝的了；他委任德国各小邦君主 (Fürsten) 来治理国事，而任命自己的姻兄弟普鲁士君主为总督。现在法国人和德国人都举行了叛乱，而德国各邦君主和总督又都向皇帝求援——这就是我们屯驻在边境这里的原因。如果安宁不能很快恢复，我们就要越过国境去整顿秩序。”

但是这还没有完。尼古拉皇帝已经下令在帝国西部募集新兵，每千人募集八名。命令附有必须募集新兵的二十一个省的名单。

国境那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五十万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的野蛮人，只等待适当的时机一到，就将进攻德国并把我們变为信奉正教的沙皇的农奴。

像特兰西瓦尼亚一度被俄国人占领一样，像现在要求三万俄国人进入这个地区和再派三万人穿过加里西亚一样，像巴纳特的塞尔维亚人也向信奉正教的沙皇求援一样，——在我们这里情况也将是这样。我们还会看到，政府和资产阶级将把俄国人召进我们的国家，就像不久前在特兰西瓦尼亚所发生的情形那样。事情也正是这样发展的。反革命在维也纳和柏林的胜利，对我们的影响还不算大。可是，当德国尝到了俄国的鞭子，那时它的举动就会有所不同了。

俄国人是德国的真正的解放者，——我们在去年6月这样说过³⁰⁷。我们现在还重复这句话，但现在已经不单单是我们这样说了！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4月2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9年4月22日“新莱茵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第279号

关于招貼法的辯論

一

科倫 4 月 21 日。現在回过来談談 4 月 13 日的會議。在大臣回答了議員利濟斯基的質問之后，議院就轉入关于招貼法的辯論。

罗尔謝特先生宣讀了中央特設委員會的报告，随后韦森东克先生提議 en bloc〔整个地〕否决政府的法案。

阿尔宁先生(伯爵)接着发言。他說，这个提議是不能接受的。这等于提議轉入討論当前事务。然而对待政府的法案，是不能通过轉入討論当前事务的决定的。这是由會議規則硬性規定的。

左派先生們到現在才明白，右派在會議規則中加进第五十三节的目的何在。对待政府的法案，議院无权通过轉入討論当前事务的决定。这一条款看来天真无邪，然而正好意味着：你們沒有权利 en bloc 否决政府的任何一个法案，而必須对这个法案逐条逐款地加以討論，哪怕它有一千条也好。

这甚至激起了中間派議員的憤怒。于是展开了長時間的爭論，每一方都挖空心思来解釋會議規則，最后，主席宣布韦森东克的提議可以接受，會議隨即轉入进一步的討論。

接着发言的是卢普先生，偉大的卢普，即那个曾經被革职，曾

經遭到各种报纸的迫害和攻訐，并被开除出了前古斯达夫-阿道夫同盟³⁰⁸的卢普。卢普先生发表了一篇演说，据同样偉大和同样有教化的^①柏林“国民报”的意见，在这篇演说之后，不仅在一般辩论中，而且在对个别问题的辩论中，左派都未必还能再有什么补充。那我们就来看看“光明之友”卢普的这篇堪为純理智之产品的透彻的演说吧！

这篇透彻的演说的确是“光明之友”精神、“自由协会”³⁰⁹精神的真正产物，也就是说，它除了重复那些关于招贴问题所能说出的老生常谈以外，沒有透彻地说明任何东西。

卢普先生的发言是从解释政府和中央特設委员会对招贴法的不同说明开始的。政府认为这个法令是純警察性的措施，采取这项措施的目的在于整飭街道交通和顾全美观，而中央特設委员会則撇开这种荒謬的普魯士式的把戏，把政治性的緣由提到了首位。这一解释是“光明之友”的激昂慷慨的說教的前奏。

“可見，这个法案肯定列为本次會議所必須討論的最重大問題。本来我們并不願意說〈我們不願意說！〉，世上多几张或少几张招贴，对于我們反正〈！〉都是一样；因为〈！〉权利与自由的崇高性质也就正在于此，甚至看来是最无足輕重的东西，如果同崇高的东西发生了联系，那它本身也就立即具有較为高尚的意义〈！！〉。”

卢普先生在他那牧师的开場白中确定了招贴的“崇高性质”和“較为高尚的意义”并激发起自己听众的虔敬情感之后，就可以安然让他那“永远清彻的、水晶般純淨的和从容不迫的”純理智之流任其游泄了。

① 原文在此处用了一个难以譯出的双关語：«lichtfreundlich»〔有教化的〕系由«Lichtfreunde»〔“光明之友”意即教化主义者〕一字变来的。——編者注

首先，卢普先生意味十分深长地指出，“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用来防止想像中的危险的措施却制造出实际的危险”。

这句陈腐的话在左派的席位上引起了一阵欢腾和热烈的叫好声。

此后卢普先生又同样意味深长地证明，这个法案跟卢普先生所断然拒不承认的钦定宪法相矛盾！

援引钦定宪法，并以回忆 11 月间所挨的耳光来作为反对继续挨耳光的论据，——左派的这种政策真是奇怪！

卢普先生继续说道，如果政府认为这个法案并不触动出版自由，而只是涉及利用街道和广场传播出版物的问题，那末同样也可以说，过去在书报检查制度之下也有出版自由，因为受管制的并不是出版物的利用，而只是出版物的传播。

凡是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时期在柏林住过的人，都能对这句话的全部新颖之处作出应有的评价，这句话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在所谓自由主义者当中流行了，然而它还是在左派席位上引起了活跃和喝彩声。

卢普先生引证钦定宪法中关于出版自由的条款，并详细地证明曼托伊费尔的法案和曼托伊费尔宪法有着明显的矛盾。

但是，最可爱的卢普先生，*tout bonhomme que vous êtes* [不管您是个头脑怎样简单的人]，您也不可能不知道，曼托伊费尔之所以钦定了宪法，只是为了以后好通过保留旧的或施行新的禁口律，来取消宪法中所包含的一些自由主义的词句。

卢普先生竟然振振有词地向右派解释说，以后，即在修改宪法时，他们可以把招贴法加到宪法里面去，但现在他们必须否决这个法令，因为不然他们就是擅自预先修改宪法！

好像右派先生們所关心的是保持一貫性，而不是快些消灭可恶的出版物、俱乐部、激憤情緒、商业中的不信任及其他多少是由革命所产生的成果似的！

卢普先生还给这些有力的論据加了如下一些老生常談：

(1) 招贴之所以遭到非难，是因为它散布激憤情緒。可是防止激憤情緒不是法治国家的事情，而是警察国家的事情。

(2) 我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不能容忍激憤情緒和招贴的政府不是强有力的政府。

(3) 德国人乐意服从領袖。

(4) 沒有招贴也沒有防止住三月十八日事件。（“不是駿馬，不是騎手”³¹⁰，等等）

(5) 革命是专制暴政的結果。

卢普先生从这一切当中做出結論說，为了曼托伊費爾的利益，招贴法必須否決。

他用哀求的声調呼說：“諸位，保卫政府，別让这个法令像警察国家的任何其他法令一样把它引向自欺自慰吧！”

按照卢普先生的意見，否決曼托伊費爾的法案不是对曼托伊費爾表示不信任，相反地，而是对他表示信任。卢普先生希望曼托伊費爾成为他所幻想的那种“强有力的政府”，因此他反对由于通过招贴法而削弱曼托伊費爾。你們以为卢普先生是在开玩笑么？他甚至連想也沒有这样想过。卢普先生是“光明之友”，而“光明之友”是从来不开玩笑的。“光明之友”像他們那个可敬的亲戚阿塔·特洛尔³¹¹一样，也是不能忍受笑声的。

但卢普先生在結束他的全部发言时摊出了最后一張王牌。

“否決这个法令，将大大有助于使那部分在宪法未經修改以前不能同意

承认宪法的居民感到心安。”

卢普先生所关心的，是“使那部分”还没有跟曼托伊费尔沆瀣一气的“居民感到心安”！

左派先生们原来就是这样！他们厌恶激烈的运动，而既然他们是议员，并且懂得他们无力向军刀专政作斗争，他们希望的只是赶快了结那些关于原则的讨厌问题，装样子把宪法修改一番就宣布其生效，对这部宪法举行宣誓，最后使“革命结束”。那时他们就可以过宪制的安静生活，照章行事，夸夸其谈，互相倾轧，偏袒徇私，更换内阁，等等；就可以过法国的奥迪隆^① 辈、梯也尔辈和摩莱辈在巴黎过了十八年的那种悠然自得的闲散生活，也就是基佐如此喜欢称之为宪制游戏的那种生活。因为只要扰乱他们安宁的革命运动一减退，瓦尔德克内阁就不再是不可能的了！而人民本来还没有成熟到共和国的水平呀！

在卢普先生的演说之后，剩下需要说明的还有一切。首先要谈的问题不是一般出版自由的限制，而主要是出版自由在招贴方面的限制。必须说明招贴的作用，捍卫“街头文学”，特别是捍卫工人享受免费文学的权利，而招贴则是免费文学的一种。不应该对用招贴引起激愤情绪的权利含糊其词，而应该公开地维护这种权利。但卢普先生关于这点却只字未提。卢普先生又一次用庄严而枯燥的语调，罗罗嗦嗦地重复了关于出版自由的陈词滥调，——这些陈词滥调是我们在书报检查制度存在三十三年以来已有足够的机会从各方面加以讨论了的，——并且由于他说出了“国民报”的先生们就这个问题所知道的一切，这家报纸就认为卢普先生透彻

① 即巴罗。——编者注

地闡明了問題!

在“光明之友”卢普之后接着发言的是“蒙昧主义者”里德尔。但是里德尔先生的演說太妙了，不好仓卒地来談它。A demain donc, citoyen Riedel! [那末就明天再見吧，公民里德尔!]

二

科倫 4 月 23 日。議員里德爾的演說在已舉行的辯論中無疑是最典范的一篇演說。當內閣閣員的席位上還保持一定程度的審慎，甚至曼托伊費爾還使用一些假立憲主義的詞句，只有笨拙的暴發戶海特男爵一人有時忘記他所扮演的立憲派角色的時候，從巴爾寧-安格閔德來的里德爾先生卻毫不客氣地以烏凱馬爾克的真正代表的姿態出現。從來還沒有有一個選區像里德爾先生的選區這樣有如此合格的代表人物。

里德爾先生在自己的演說一開始就問：什麼是招貼？並且回答說：

“就詞的本來含義說，招貼乃是應該對居民情緒起安定作用的公開聲明。”

根據里德爾先生的詞源學，招貼的“用途”就是如此。

我們暫且不打算跟里德爾先生爭論“招貼”一詞的來源。我們只提醒他注意：如果他比較仔細地讀完了法案，他就完全不必對詞源學下這麼大的功夫了。法案中不僅談到“招貼”，而且也談到“就詞的本來含義說”除了張貼而外別無任何其他“用途”的“聲明”。

里德爾先生不是這樣，而是對人們最可恥地濫用“招貼”一詞表示義憤：

“招貼照例只是用來煽起激情，煽起特別是對當局的罪惡的仇恨或復仇。

的火焰…… 因此，招贴照例是和它自己的名称完全对立的。所以招贴的使用往往变成滥用（即滥用其名称），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地方警察当局是否应该放任这种使用招贴来胡作非为的行为（即这种滥用“招贴”名称的行为）？警察局是否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种造成滥用（名称）招贴（并非招贴的声明，即并非安定人心的声明）来胡作非为的同谋者？”

简单地说，将来是否应该“按用途”（即按招贴一词的意义）来使用招贴？

曼托伊费尔提出来论证招贴法案的理由，一则是警察性质的，另一则是必须整飭市容，这真是大错而特错了！中央特设委员会从政治上考虑主张通过法令，这是多么大的失策啊！这个法令之所以必不可少，——是由于词源学的原因，而实质上这个法令应该称为：关于恢复招贴一词的“真正含义”的法令。

可是，论据十足的里德尔先生却大大地错了。如果我们不惜使我们的读者感到万分无聊，同里德尔先生进行一场词源学的争论，那我们就会捧着迪茨的语法来向他证明，“招贴”一词完全不是出自拉丁文 *placare*〔安撫、調解、劝慰〕，而只是法文 *placard*〔声明、海报、招贴〕的曲解，这个法文词的词根是 *plaque*〔题词的牌子〕，又是出自德文。这样一来，里德尔先生所谓起安定作用的全部理论，就会像纸牌搭成的小屋一样散场了。

这对于里德尔先生当然无所谓，而且到底还是他对。所谓起安定作用的整个这一套理论，本来只不过是学究式的伎俩，是 *captatio benevolentiae*〔企图哗众取宠〕，而隐藏在这背后的是显然想利用有产阶级恐惧心理的企图。

招贴“煽起激情”，招贴“煽起特别是对当局的罪恶的仇恨和复仇的火焰”，招贴“号召无知的群众游行示威，而游行示威则会危险

地〈！〉破坏秩序并超出法定自由的范围”。所以招贴必须禁止。

换句话说，联合起来的封建主、官僚和资产者去年秋天用武力举行了政变，而现在打算靠议会给我们钦定一些为了使这些先生们能够安然享受自己的胜利成果所必需的补充法令。他们讨厌死了“激情”，他们用各种手段来扑灭“对当局的罪恶的仇恨和复仇的火焰”——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权力机关了——，来恢复“秩序”和重新把“法定自由”限制在适合于他们的范围之内。而这些范围将是什么样的，可以从里德尔先生把绝大多数人民称为“无知的群众”这一点判断出来。

里德尔先生感到侮辱这班“无知的群众”的话还说得不够。他继续说道：

“阅读这些〈包含在招贴中的〉报道的，多半正好是人民中的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最不习惯看书面报道，不能像惯于阅读并熟悉出版物骗局的公众那样，以应有的谨慎和保留态度来衡量和检验书面报道的可靠性……”

这班无知的群众，这个最不习惯看书面报道的阶级究竟是什么人呢？也许是烏凱馬尔克的农民吧？决不是，因为第一，他们是“民族的中坚”，第二，他们不读招贴，第三，他们把里德尔先生选为自己的议员。里德尔先生所指的只是**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招贴是影响无产阶级的主要手段；无产阶级按自己的地位本身来说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无论在立宪制度下还是在专制制度下都是受剥削的阶级；它随时准备再拿起武器；主要威胁正是从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所以，凡是有助于在无产阶级中保持革命毅力的一切东西，都要取缔！

但是有什么东西能比招贴更有助于在工人中保持革命毅力呢？招贴可以把每条街的拐角变为一张大报纸，过路的工人能从

中得悉当天的事件和这些事件的意义，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及这些观点的反对意見，他們能在这里同时遇到不同階級和不同見解的人，跟这些人討論招貼的內容；簡而言之，招貼对于工人來說同时既是报纸，又是俱乐部，并且这一切都是不要花費分文的！

但正好这一点是右派先生們所不喜欢的。到底还是他們对。他們从无产阶级方面受到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危險；那末大权在握的他們为什么不力求用尽一切手段来消除这种危險呢？

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对此表示異議。托天之福，我們在軍刀专政之下生活已經将近六个月了。我們决不幻想現在能够同我們的敌人公开作战，同样我們也决不幻想采用唯一能使我們党取得政权的手段。我們不会卑下到从道义上去責备目前占統治地位的容克地主、官僚和资产者的三角联盟，指責他們想不擇手段地把我們变成奴隶。即使抱怨派先生們那种正气凜然的說教腔調和慷慨激昂的悲憤情緒本身并不是反对我們的，那末单是为了下面这一点，我們也要拒絕这类空洞的論战詞句，即我們終究还是坚决希望对我們的敌人进行报复。

但我們感到奇怪的是，現在执掌政权和拥有正式多数的先生們却不像我們这样开誠布公地发表意見。很难想像还有比里德尔先生更恶劣的烏凱馬尔克的代表了，可是甚至他也禁不住要在自己演說結束时声明：

“当然，我从未打算在任何程度上阻撓自由发表意見。我认为追求真理的精神斗争是自由民族的神圣事业，任何人都不得侵犯。”

在另一处地方，里德尔先生說，他希望

“容許招貼根据一般文学著作的傳布原則来傳布。”

在先已作了各種解釋之後，這幾句話應該作何了解呢？如果出版是自由的話，那末現有的政府和君主立憲目前就根本不能在文明國家中保持政權。出版自由，不同意見的自由鬥爭就意味着允許在出版方面進行階級鬥爭。但夢寐以求的秩序却正好要壓制階級鬥爭，要堵塞被壓迫階級的言路。因此，那班要求安寧和秩序的人就必須消滅出版物中的不同意見的自由鬥爭，必須通過出版法、禁令等等來最大限度地保證自己對市場的壟斷，尤其是必須直接禁止像招貼和傳單這樣的免費文學。這些先生們對於這一切都是很清楚的；可是他們又為什麼不公開地這樣說呢？

的確，里德爾先生，為什麼您不建議立即恢復書報檢查制度呢？要知道，此外就沒有更好的手段來安定“激情”，來撲滅“對當局的罪惡的仇恨和復仇的火焰”和保障“法定自由的範圍”了！*Voyons, citoyen Riedel, soyons francs!*〔真的，公民里德爾，讓我們開誠布公吧！〕要知道事情終究會是這樣的！

里德爾先生離開了講壇。接着發言的是司法大臣，從愛北斐特來的法律顧問西蒙斯，他是烏培河谷如海特男爵一樣的資產階級家庭的後裔。

西蒙斯先生一開始討論問題就提出了令人折服的論證。顯然，他在司法部還是個新手。

司法大臣先生說，招貼是張貼在街道和廣場上的，因此，“首先必然確定街道和廣場的用途是什麼！！”

不錯，里德爾先生值得感謝地確定了招貼的“用途”和“真正的詞義”。可是，問題決不在於此，相反，而是在於“街道和廣場的用途”。正是在這上頭，司法大臣博得了千古不朽的榮譽。

在這個議院中，人們居然鄭重其事地爭論街道和廣場的用途，

爭論只有小学生才感到深奥的語法疑难等等問題，試問，能够設想还有比这个議院更好的小学校嗎？

那末，“街道和廣場的用途”究竟是什么呢？

用途就是：街道……不“能用于任何私人目的或公共目的”。

因为“街道……的这种用途不能得到証实!!”

現在才明白为什么我国要有一个所謂的司法大臣——原来是要他給我們做这样意义深刻的解釋。的确，現在已很清楚，为什么西蒙斯先生沒有好意思向議院作自我介紹。

自然，在听了这些卓越的思想以后，大臣演說中的其他內容就絲毫不值得注意了。西蒙斯先生装作在法国法学方面博学多識的样子，把他以前担任檢察官时一些久已忘怀的往事追述了一番。然后說了諸如此类的一些話：

“对这个刻不容緩的問題必須<!>給予肯定的回答，鉴于有人在这里表示<!!>怀疑<!!!>，至少<!!!!>我的意見<!!!!>是这样。”

最后，西蒙斯先生居然打算“批准限制招贴的法律基础”。

批准基础！西蒙斯先生，您从哪里学来的这种用語？

在里德尔和西蒙斯两位先生发表了这么絕妙的演說以后，我們自然也就不能再来談貝倫茲先生在他們之后所作的发言了。貝倫茲先生正确地感觉到禁止招贴是針對无产阶级的，但这种思想他發揮得很不够。

一般辯論結束了。贊成 en bloc [整个地] 否決法案的是一百五十二人，反对的也是一百五十二人。順便說說，左派当中，科倫的吉尔先生无故缺席。要是吉尔先生出席了的話，法案就会被全盘否決。所以，法案部分通过，應該归功于吉尔先生。

关于草案的各别部分的討論，我們不去談它了。討論的結果是人所共知的，就是对书販建立了警察監督。

对此，书販可以向吉尔先生表示感謝！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4 月 21 和 23 日

載于 1849 年 4 月 22 和 27 日“新萊茵报”
第 279 号增刊和第 28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拉薩尔³¹²

科倫 4 月 26 日。我們应当报道这样一事实，它证明 en fait de justice [在司法問題上] 再也沒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总檢察官尼科洛維烏斯先生显然想获得甚至連黑克尔先生也不會获得的荣誉。

从我們过去的报道中可以看出：杜塞尔多夫的副檢察长馮·阿蒙第一在对拉薩尔进行刑事审讯期間，把拉薩尔写給一个雪恩施坦的农民^① 吁請他在斗争爆发时給杜塞尔多夫增援一百人左右的一封信，放在自己的办公桌里压了三个星期，不交給法院偵查員；只是当法院偵查員通知他偵查已告結束的时候，馮·阿蒙先生才把这封信交給法院偵查員。我們想提醒一下，这封信其实沒有包含任何直接号召起义的内容，因此高等法院和檢察院并未把它当作一种罪证，可是由于这封信必須重新进行偵查，而这就是陪审法庭在上一次开庭期沒有結束拉薩尔案件的原因。

有鉴于此，拉薩尔当时向总檢察官对馮·阿蒙第一先生故意拖延案件提出了抗議。

总檢察官不但沒有給拉薩尔以任何回答，反而把他的声明連同根据第二二二条就这一声明对拉薩尔开始进行偵查的命令送交

① 施坦吉尔。——編者注

杜塞尔多夫的檢察机关，理由是仿佛在拉薩尔的声明中对馮·阿蒙先生进行了侮辱！

Pends-toi, Figaro, tu n'aurais pas inventé cela! [上吊吧，費加罗，你万沒有想到这一点!]^①

于是，根据第二二二条的精神，应当把給尼科洛維烏斯先生的信看成是对馮·阿蒙先生的侮辱！在我們有幸因为出版問題同茨魏費尔和黑克尔两位先生打的那兩場官司的审訊期間，有一次我們已經說明：第二二二条本身不适用于在报刊上进行的公开侮辱，而只适用于对官吏先生們当面进行的侮辱^②。

即使第二二二条曾被应用于报刊上的公开言論所造成的侮辱，但是，显然当时誰也不会断言，給第三者的信就能构成对官吏的侮辱。根据迄今存在的違警法庭的訴訟程序，向来都規定，把含有侮辱內容的文件送給被侮辱者本人或把它公开傳播才能构成罪行。現在，尼科洛維烏斯先生做出一件发明，如果有人向第三者写信时用侮辱性的言詞写到官吏的話，那也是对官吏的侮辱！可見，必須留神不要在私人通信中用不敬的語調談論官吏！

因为拉薩尔的信是呈交馮·阿蒙先生的上級机关的，所以这就是申訴书、抗議书，这样就使案情起了更加令人难以想像的变化。

因为法律甚至責成对于非法的行动要向上級法院提出申訴。这样，如果申訴是真实的，它就完全合理；如果它是虛假的，总檢察官就应当根据第二七三条提起訴訟——因为这是誹謗性的申訴。但在这种情况下，拉薩尔可以用世界上最輕而易举的办法根据文件来证明他的申訴是真实的，然而以侮辱官吏罪受違警法庭审判

① 博馬舍“瘋狂的日子，或費加罗的婚礼”。——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265—272 頁。——編者注

时,他却被剥夺了证明这一点的可能。

案件是由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审理的。可是高等法院也承认,只有当着公众或者当着被侮辱者的面进行的侮辱才能构成罪行,并且停止了对这一案件的审理。检察机关提出了抗议,于是我们这里的久经考验并且向来稳妥可靠的科伦检察院真的根据第二二二条作出了追究拉萨儿的决定,拉萨儿现在有福气还在忍受违警法庭的纠缠!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根据第二二二条有什么样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不过,拉萨儿案件将于5月3日在陪审法庭上审理。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4月26日

载于1849年4月27日“新莱茵报”
第28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第二議院的解散

科倫 4 月 28 日。今天白天傳遍了全城的流言，已在今天晚上得到证实：国王和他的軍法內閣解散了第二議院³¹³。

詳細情况見后面的 de dato Berlin [柏林通訊]。

国王和他的軍法內閣大臣們采取了这种行动，就是又一次的食言背約。根据 12 月 5 日所欽定的軍法宪章，召开議會肯定是为了“修改宪法”。只有在根据这一宪法而召开的第一屆議會对这部拙劣的作品进行修改以后，它才具有最終的完全的效力。去年 12 月所欽定的那种东西的意义就是这样。

由此可見，两院至少有一部分制宪权力。因此，只要两院还没有行使这种权力，只要两院沒有同国王一起修改宪法，它們是不可能被解散的，正如为了协商普魯士宪法而召开的如今已經仙逝的議會不可能被解散一样。

虽然如此，还是把这个在軍刀专政下，在刺刀威胁下，通过賄买、恫吓和欺騙而組成的可怜的第二議院驅散了！

这就叫做“普魯士的荣誉”、“普魯士的信义”！

如果大臣們再等待几个星期，也許匈奧革命就会替他們代劳，把两院都驅散。

至于这种新政变的意义，那是一目了然的。加倍的軍刀統治降临在我們的头上。承蒙皇恩，給我們欽定了出版法、俱乐部法、

惩治叛乱法、招贴法等等，以致德国的庸人只好大哭一场。迫害、惩治、抓人即将开始。到处都将实行戒严，除此以外，最后还将实施备有资格限制的选举权和上院的新宪法，根据这一宪法，目前的第一議院将以**第二議院**的身分登场。

总之，普鲁士蛮横无耻到什么地步，他们就会干到什么地步。

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只希望曼托伊费尔先生重新召开已经仙逝的联合议会。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4 月 28 日

载于 1849 年 4 月 29 日“新莱茵报”
第 285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波 茲 南

科倫 4 月 28 日。如果我們間或談談关于我們的霍亨索倫王朝的“显赫和强大”以及关于这一高貴宝座的主要支柱——遍布全国各省的勃兰登堡騎士臭虫集团同时惊人繁荣的問題，我們的讀者会感激我們的。

我們今天来繼續进行这一富有教益的考察，談談我們狹义的祖国^①的波兰部分。早在去年夏天，由于那用榴霰彈和硝酸銀³¹⁴对波兰进行的臭名昭彰的“綏靖”和“改組”，我們就已經揭穿了德意志犹太人散布的关于在城市中“德国居民占优势”、在乡村地区“德国人占有大量土地”及普魯士国王对提高公共福利有功等等謊言。“新萊茵报”的讀者該記得，我們根据官方的数字材料及格涅茲諾和波茲南大主教給資產階級“过渡”大臣康普豪森的通知查明，在这个地区划入普魯士分界綫的各部分，德国人不是占一半，而是勉强占居民的六分之一³¹⁵。同时，随着反革命进程使重新瓜分和縮小波茲南的波兰部分成为可能，普魯士政府的騙人統計学家便愈来愈扩大这个虛报的德国居民的数目。当时我們查明，德国的民族蠢才和法兰克福議會泥坑里的投机分子在做这项統計时还把波兰的犹太人也列为德国人，虽然这个最令人討厭的种族除

① 即普魯士，以区别于德意志。——編者注

了他們的熏心利欲之外，無論按他們的鄙俗俚語，或是按他們的出身，都不可能同法蘭克福具有血緣關係。我們查明，縱使有少數德國小土地占有者居住在波茲南的個別行政區，那也只是由於普魯士背信棄義地利用波蘭貧困的結果，因為根據 1833 年的敕令，只有普魯士頑固的容克地主才能收買一切拍賣的莊園，為此政府還特為容克地主發放了貸款。最後，如我們所查明的，霍亨索倫王朝慈父般的恩德和功績在於他們在三月革命後由於怯懦而許下了進行“民族改組”的甜蜜諾言，可是後來，隨著反革命勢力的壯大，王朝卻以五次愈來愈廣泛的瓜分把套在這個國家脖子上的絞索拉得愈來愈緊，後來更以“綏靖”、繳械作為進行“改組”的條件，最後當這些條件都已實現，又派出“我的英勇軍隊”去進攻手無寸鐵的易于輕信的邊境地區，以便和猶太人結成聯盟去搶劫教堂，焚燒村莊，在公共場所用探條打死波蘭人或用硝酸銀打上烙印，而在報復了對“三月諾言”的信仰以後，在這遍布死屍的土地上頌揚上帝和基督教德意志陛下。

在波茲南進行普魯士“改組”的恩德就是如此。現在我們來談談普魯士占有大量土地，地產和莊園的來源。它們的歷史在不小程度上是對霍亨索倫王朝的“顯赫和強大”及它所寵愛的流浪騎士階層的英勇行為的一個很好的補充說明。

1793 年三個戴皇冠的小偷，像三個綠林大盜瓜分赤手空拳的行人的財物那樣，瓜分了他們的贓物——波蘭。按照 1815 年霍亨索倫王朝根據世襲君主權利統治了萊茵省的方式，即按照販賣人口和人的靈魂的方式，霍亨索倫王朝當時也成了波茲南和南普魯士的世襲君主。將來當這種販賣人和人的靈魂的權利一被消滅，波蘭人就會像萊茵省居民一樣用紅筆把世襲大公霍亨索倫統治他

們的权利一笔勾銷。

普魯士霍亨索倫王朝对搶劫来的波兰的慈父般的关怀，首先表現在沒收波兰王室和教会的領地上。一般說来，我們絲毫也不反对这种沒收，而且我們还希望很快也会輪到沒收**其他**王室的領地。我們只想問一問，这些被沒收了的領地用来为誰的利益服务？是为了慈父般的勃兰登堡政府在 1848 年“綏靖”和“改組”期間如此仁慈地关怀过的国家的“公共福利”嗎？是为了用血汗創造了这些領地的人民嗎？讓我們看一看吧。

当时的大臣霍伊姆統治了西里西亚省二十年，他独自为政，完全不受任何监督，并利用这一权力进行最可恶的容克地主式的敲詐和勒索，而为了奖励他給上帝、国王和祖国所建树的功勋，南普魯士也委托給他管轄。霍伊姆向他的主子和国君提議，为了王朝“显赫和强大”的利益，为了造成忠誠于王朝的显赫而强大的容克地主，要把尽可能多的教会土地、官地和沒收来的庄园分賜給所謂“有功的人們”。結果也就是这样做了。流浪騎士，王妃的寵臣，大臣們的亲信，他們想要籠絡住的同謀們，大多数都获得了搶劫来的边区的大片富饒領地作为賞賜，这样，在波兰人中間就到处都是“德国的利益”和“主要是德国土地”了。

为了謹慎，以免激起国王的貪心，霍伊姆对国王只以四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价錢估价这些庄园，而且往往还低于它們的实际价值；霍伊姆害怕——而这也确实不是沒有根据的，——如果国王知道这些庄园的真实价值，那他首先考虑的便不是別的，而是他自己“慈父般的”腰包了。在“綏靖”以后，从 1794 年至 1798 年霍伊姆統治的四年中，在波茲南行政区有二十二批，在卡利希行政区（原彼得庫夫行政区）有十九批，在华沙行政区有一批，大大小小总

共是五十二批庄园这样被分賜掉，它們所包括的領地不少于二百四十一个。对国王說这些領地的价值是三百五十万塔勒，而实际上它們的价值超过两千万塔勒。

当波兰人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要夺回根据奴隶买卖权从他們那里偷去的这两千万塔勒，这波兰的亿万財富的时候，他們会想起这点的！

仅仅在卡利希行政区，被分送掉的庄园便占全部王室和教会領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而这些庄园的收入甚至按 1799 年低得可怜的奉送的价格估計，每年也有二十四万七千塔勒之多。

波茲南行政区分布有广大森林的奥文斯克領地被送給了服飾雜貨商特雷斯科夫。同时与其毗邻的連一棵小树苗都沒有的古老領地施里姆却宣布为国家的地产，不得不由国家出錢到特雷斯科夫領地上去购买树木。

最后，在其他各行政区，饋贈文书明确規定免收这些領地的普通賦稅，而且是“永远”免收，因此無論哪一个普魯士国王都无权对它們課以新稅。

現在我們来看一看，这些偷来的庄园是用什么方式贈送并且是贈送給什么样的“有功的人們”的。可是，由于这些頑固的容克地主的功劳浩大，为了叙述連貫起見，我們不得不另写一篇专文來談这个問題^①。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4 月 28 日

載于 1849 年 4 月 29 日“新萊茵报”
第 285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① “新萊茵报”上没有本文的續篇。——編者注

柏林的反革命策划

科倫 4 月 30 日。我們的反革命政府的陰謀策划逐漸地越來越明显了。

政府會想在 4 月 27 日把普魯士反革命推向新的阶段。它想把柏林人民逼上街頭，很可能照卡芬雅克那樣，先让起义行动“采取巨大的規模”，然后使用卡芬雅克的手段，而且也和卡芬雅克一样以压倒的优势力量来进行镇压；設立战地法庭，对某些議員和大批煽动者³¹⁶ 饗之以鉛彈和火药；最后，制定出一些新的欽定法律，以便摆脱那些連 12 月 5 日軍法宪章都还保留着的使我們的反革命先生們感到累贅的羈絆。

如果挑起了起义行动，那就有了很好的借口断言，說什么人民“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运用那些欽賜的自由权利，說什么实行这样的选举法和这样的宪法就无法治理国家。“为了避免流血”，因而也是为了人民本身的利益，就得把自由消除得一干二淨。“为了避免流血”，就得宣布全国（东波美拉尼亚除外）戒严！这一切，只有等到柏林发生了相当大的騷动，而布勒斯劳、馬格德堡、科倫等地也都发生了騷动以后，等到这些騷动被霰彈順利地镇压下去以后，才能实现。

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警察才殘酷地对待在雅叙厅里集会的左派議員³¹⁷，軍隊才包圍登哥夫廣場，向手无寸铁的和平群众猛

烈开火，并且使群众无法逃散，因为广场上所有的出口都被封锁了。

尽管反革命先生们用尽一切挑衅手法，可是人民行动平静，终于粉碎了他们的全部计划。他们没有任何借口来钦定法律，虽然他们必须这样做。或许今天晚间我们就能知道这些先生们又决定玩弄什么新诡计了。

他们的计划有多么庞大，这是清清楚楚的。第一，汉诺威也同时解散了议院，第二，拉多维茨先生奔赴柏林。这两点尤其是第二点便是证明。

拉多维茨先生是普鲁士反革命的首脑人物。十一月反革命政变的计划就是由拉多维茨先生制定的，可是他本人却仍然躲在幕后，在法兰克福为普鲁士夺取世袭皇位而进行阴谋活动。这一次拉多维茨先生亲自到柏林去，据说终于要公开露面，出任首相了。**拉多维茨内阁——这就是症结的所在！**

此外，我们还清楚地知道下列事实：

(1) 上星期所有的行政长官都接到了总督们的通告，通告说议院即将解散，并指示采取一切必要的警戒措施。

(2) 所有行政区政府 [Regierungen] 都接到内阁训令，训令的内容是：

1. 所有各市市长每日应向该行政区政府报告解散议院所引起的反应。各行政区政府则应就此种情况向内阁呈送综合报告。

2. 新的选举暂不举行。同时，对于“所谓”左派的许多成员将采取措施。

3. 必须采取一切预防办法，以制止任何叛乱。

签署此项训令的是：曼托伊费尔。

曼托伊費尔先生，或者更正确地說，他的上司拉多維茨先生，恰恰在此刻公开实行他們企图恢复专制制度的阴謀，对正在发展着的匈牙利-波兰-德国革命說来是再好不过的帮助。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4月30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9年5月1日“新萊茵报”
第286号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拉 薩 尔

科倫 5 月 1 日。后天，杜塞尔多夫陪审法庭将审理拉薩尔案件，拉薩尔被控直接号召武装反对王室。

大家記得，拉薩尔、康塔多尔（杜塞尔多夫市民自卫团指揮官）和发送人韦耶尔斯是去年 11 月間杜塞尔多夫戒严时被捕的。他們以上述“触犯 Code pénal [刑法典] 第八十七和一〇二条之罪行”受到偵查。

偵查阶段一拖再拖，尽量延长。与本案同时起訴的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号召拒絕納稅的案件已于 2 月 8 日在科倫开庭审理，而这个案件只是在杜塞尔多夫陪审法庭进行了数次会审以后才由科倫檢察院移交給該法庭审理。可是馬克思、施奈德尔、沙佩尔都不曾被捕，拉薩尔則被关在杜塞尔多夫的監獄里；而据 Code d'instruction criminelle [刑事訴訟法典] 規定，在押人案件应**首先**审理！

拉薩尔在獄中受到十分特別的优待。“新萊茵报”常常有机会报道关于普魯士王国司法机关的僕从們如何客气地对待拉薩尔的事例。康塔多尔享有各种各样的优待——这是因为不管康塔多尔的政治表現如何，他在杜塞尔多夫的資产階級中間有很多朋友，——而拉薩尔則不得不再一次³¹⁸ 體驗普魯士王国的未决犯所受的虐待。且不說那些小事，我們只提醒一下，典獄长莫萊特先生

曾当着法院偵查員艾貝迈尔先生^①（这位先生已大駕光臨科倫）的面对拉薩爾蛮横无礼。拉薩爾曾向檢察机关递过申訴书，而总檢察官批道：該行为既非犯罪，亦非过失，不应予以起訴！

我們再提醒一件事，医生規定拉薩爾为了維持健康必須有若干次放風，檢察机关对此表示同意，可是当局却予以禁止，尽管根据法律，未决犯不屬当局管理，而屬檢察机关全权管理。

至于到監獄里去探望拉薩爾时会遇到什么样的刁难、推托、借口等等，凡是曾試圖进入杜塞尔多夫这座“老店”内部去看看的人都是知道的。

偵查終於結束了，案件應該移交給高等法院。陪审法庭上一次会审是在2月和3月間，那时候审理此案还完全来得及。可是那些先生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避开这次机会。当此案的材料交到副檢察长馮·阿蒙第一“閣下”那里去做最后結論的时候，他突然拿出拉薩爾写給阿尔滕基尔欣区的一个叫做施坦吉尔的农民的信，以便根据这封信再次提出控告。然而这封信已在阿蒙先生的办公桌里面安安靜靜地放了好几个星期，而他也从未想到把它做为一条新的罪状附在材料里面。可是就在一切都准备好了，陪审法庭即将开庭的时候，阿蒙先生把这封信拿出来了。这当然就需要傳訊新的证人，而审判就要推迟几个星期。这样一段時間就恰好足以阻撓在**当时即将到来的陪审法庭开庭期間**对拉薩爾案件的审理。

这封被阿蒙先生（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长久擱置在办公桌里的信，其实是无足輕重的，無論高等法院或檢察院都沒有理睬它，沒

^① 見本卷第316—318頁。——編者注

有把它列入罪证!

总之，这次算是幸运地躲过了陪审法庭，下次开庭期要等到5月。代表团曾經一个接一个地去見总檢察官尼科洛維烏斯先生，要求迅速处理此案，或者組織陪审法庭特別审判庭来审理。尼科洛維烏斯先生答应尽一切力量，并且宣称拉薩尔决不致被关六个月。結果怎样呢？到六个月总共只差两个星期左右了。

高等法院最后做出决定：将三名被告的案件全移交檢察院办理。可是这就产生了难题：人們确信，在整个杜塞尔多夫司法区都找不到会判决康塔多尔先生有罪的陪审员。可是要釋放康塔多尔，同时也就得宣布拉薩尔无罪，而且要由那些在別的情况下定要判决他有罪的人們来宣布。然而給拉薩尔判罪，正是杜塞尔多夫当局、內閣以至大权奸所渴望的事情。对拉薩尔的怒火“直到国王的宝座前都沒有熄灭”。

結果是：“檢察院停止对康塔多尔起訴，予以釋放。拉薩尔、韦耶尔斯則繼續管押，听候陪审法庭审讯。”

要知道，康塔多尔和拉薩尔是以同一罪名被控的，唯一的区别是拉薩尔在約伊斯发表了一次演說。

于是那些先生們就恰恰抓住在約伊斯发表的这次演說，以此为理由把拉薩尔交付陪审法庭审判。

我們来简单地追溯一下事件的全部經過。

当已經仙逝的国民議會和王室之間每天都有可能发生公开冲突的时候，众所周知，杜塞尔多夫这个城市，是萊茵省最大的宣傳鼓动中心之一。这里的市民自卫团完全站在国民議會方面，而且是由一个民主主义者领导的。只要柏林一发出信号，他們就准备从消极反抗轉为积极反抗。武器和彈药都已准备就緒。拉薩尔和

康塔多尔是整个运动的首領。他們不仅号召公民武装起来反抗曼托伊費尔內閣，而且实际上进行了武装公民的工作。杜塞尔多夫是他們活动的中心。由此可見，如果真的犯了什么罪的話，罪是在这里犯的。但是根据起訴书，犯罪地点在哪里呢？不是在杜塞尔多夫，而是在約伊斯!!

拉薩尔曾經在約伊斯出席一次集会，并且号召派遣武装人員去支援杜塞尔多夫。这一号召沒有产生任何后果，因为事态还没有发展到战斗。看来这就是拉薩尔所犯的罪吧!

可見，拉薩尔所以必須受陪审法庭审判，不是由于他的主要活动，不是由于真正的武装活动，也不是由于那时眼看可能在杜塞尔多夫爆发的真正的起义。在这方面什么“罪”也沒有发现。甚至檢察院，虽然那样昏庸无能，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所謂的罪行是一个純粹偶然的，附带的行为，它完全从属于在杜塞尔多夫进行的主要活动，离开后者則毫无意义，——这个所謂的罪行不是在杜塞尔多夫为反抗政府而組織武装力量，反倒是号召約伊斯的居民支持这种組織活动!

当拉薩尔在約伊斯发表这次可怕的演說时，康塔多尔当然沒有在場；康塔多尔沒有号召約伊斯的居民起来进行武装反抗，康塔多尔只不过組織了杜塞尔多夫的居民准备武装反抗，并且号召当地的本身就是政府武装力量的一部分的市民自卫团起来反抗政府。区别就在这里，因此康塔多尔就被釋放，而拉薩尔則被繼續管押，等候下次陪审法庭开庭审訊。

可是，事情还不止于此。除此而外，拉薩尔还直接向农民施坦吉尔呼吁派遣武装人員支援杜塞尔多夫。这封信附在偵查材料里面，而且起訴意見书里一字不漏地引用了这封信（見“新萊茵报”第

277号增刊)。难道在起訴意見书里，**这封信**是被当作把拉薩尔送交陪审法庭的根据嗎？根本不是。高等法院曾挖空心思对拉薩尔提出九条罪状，而其中有八条都被檢察院取消了，就連这个高等法院也沒有想到要把这封信列为罪状之一。原来，这封信所包含的所謂“罪行”同拉薩尔在約伊斯所犯下的罪行**毫无二致**。

檢察院把此案交付法庭的决定前后不符，自相矛盾，无法理解，很难有編造得比这更糟糕的东西了。

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科倫檢察院本身的决定，去年11月在杜塞尔多夫进行宣傳鼓动，直接号召反抗內閣，武装公民，购置彈药，市民自卫团直接和公开反对政府并拿起武器誓为保卫国民議會而和政府进行斗争——**这一切根本不算犯罪**。科倫檢察院承认了这一点。

因此，在这方面，檢察院和科倫高等法院看法是一致的，甚至和科倫檢察机关也是一致的。在对萊茵区域委员会的案件进行偵查时，它們都絕口不提号召武装起来反对“敌人”的事，都把屬於刑事案件性质的事情放在一边，只是从一件本应屬違警法庭处理的号召叛乱的事实着眼，此事之所以由陪审法庭审理，只是因为这个号召是通过报刊发出的。

对付拉薩尔的办法則阴險得多。先給以刑事追究，而以違警法庭作为后备。万一在約伊斯演說这件事情上拉薩尔被判无罪，就以他在杜塞尔多夫的两篇演說中号召反抗官員(即号召叛乱)为理由，把他送交違警法庭。

这里只需要提醒一下萊茵区域委员会案件的审判經過。案情完全相同。在审判这一案件的时候，研究了这样的問題：是罪行(即拉薩尔被控的那种罪)昭著还是根本无罪。結果认为，号召武

装反抗政府，不能不同时号召反抗組成政府的所有各个官員。陪审团宣判无罪。

拉薩尔的处境将会是这样：陪审法庭无疑将宣判他无罪，但是那时他又要受到違警法庭的审讯。那时将再設法制造要他繼續坐牢的口实，而違警法庭是不会落到陪审法庭那种困难处境的！

明天我們將就起訴意見书本身进行分析，并且根据这份起訴意見书举出新的证据來說明这个案子的全部訴訟程序是多么荒唐可笑。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1 日

載于 1849 年 5 月 2 日“新萊茵报”
第 28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普魯士給法蘭克福諸君的耳光

科倫 5 月 1 日。普魯士反革命的历史上又增添了一段新的插曲。國王狠狠地打了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一記耳光，并把奉獻給他的那頂幻想帝國的虛假皇冠輕蔑地當面擲還給它。

如果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曾經果斷行事，它現在就能下令逮捕這位桀傲不遜的霍亨索倫先生，以“侮辱國民議會”之罪（根據在普魯士也曾頒布過的 1848 年九月法令）交付陪審法庭審判。目前還沒有一條“帝國”法令免除各邦君主對“帝國”的責任。而無需負任何責任的皇權却被霍亨索倫自己否認了。

4 月 28 日的新的普魯士“帝國”照會就所謂德意志帝國憲法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指責，以沖淡這次“帝國”挨耳光的事實。這部無辜的可憐的作品，在普魯士照會中竟被描繪成為萬惡之源，描繪成為革命和秘密共和主義的“超越任何界限的”極端產物。

聖保羅教堂是燒炭黨人的巢穴！韋爾凱爾、加格恩是秘密的共和派，“懷中藏着匕首的麥羅斯”³¹⁹！巴塞爾曼這位看見魔影的先生，自己成了“巴塞爾曼式的人”³²⁰！這對於遭到了人民唾棄、遭到了法蘭克福和維也納那些被迫害的街壘戰士咒罵的可尊敬的法蘭克福諸君說來，當然是一種恭維。各色各樣的人，直到福格特先生都會真的相信這種胡說。

普魯士照會是在真正解散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之前對議會的一

个最后威胁。倔强的霍亨索倫再一次伸出了“协商”之手。的确，国民議會既已墮落到这种地步，它自然很可能再向前移一小步，完全变为普魯士的工具。

可是一部分人民——特别是南德意志諸小邦的农民和小资产者——对国民議會和所謂帝国宪法还迷恋不舍。军队对帝国宪法也有好感。每向統一德国迈进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在人民看来，都是朝着消灭小邦割据局面和免除不堪忍受的苛捐杂稅迈进一步。同时对普魯士的仇恨也起着不小的作用。士瓦本人甚至为保护所謂帝国宪法而鬧了革命。当然，这只是杯水風浪，但仍然是不能忽視的。

可見，假如可尊敬的法蘭克福諸君哪怕是有一絲一毫骨气的話，要解散法蘭克福議會不用暴力是办不到的。目前他們还可能有一个最后机会来弥补他們的大錯于万一。在匈牙利人民取得胜利，奥地利垮台，霍亨索倫—拉多維茨—曼托伊費尔的叛变行为激起普魯士人民的憤慨的情况下，法蘭克福和南德意志已公开起来保卫帝国宪法，这两个地区很可能成为以匈牙利为支柱的一次新的革命起义的临时中心。

到那时，这些先生們就應該不惜宣布內战，如果万一时机成熟，就應該放棄恢复联邦議會而建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

但是誰要以为法蘭克福諸君能够做到这一步，那就大錯特錯了。这些先生們将会嚷嚷一陣，为保住一点起碼的面子而扯扯皮，然后便遵照倔强的霍亨索倫的指示来处理一切。人民或許又要开始在什么地方构筑街垒，然而也要像九月十八日事件那样被出卖的³²¹。

這出精彩的帝國問題的戲，如果由法蘭克福的諸位先生來導演，結局一定會是這樣的。但是匈牙利的驃騎兵，波蘭的槍騎兵和維也納的無產者可能還要發表自己的意見——那時終究會出現另一種局面。

弗·恩格斯寫於 1849 年 5 月 1 日

載於 1849 年 5 月 2 日“新萊茵報”
第 287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解 散

科倫 5 月 1 日。据昨日从柏林到达此間的議員們說，德勒斯頓的議院也被解散了。

汉諾威、柏林、德勒斯頓——慕尼黑議院暫時还只是推迟会期——善良的德国小市民，难道你現在还看不出他們打算和你开什么玩笑嗎？

去年，当法兰克福議會召开的时候，普魯士命令所有小邦都各自成立議院。現在，剛好一年以后，普魯士又命令解散所有的議院。那一次是康普豪森，这一次是曼托伊費尔。两次都是同一目的，同一意图。尽管說得那么好听，可是康普豪森和曼托伊費尔还是手拉着手。

在德国，仍然有保护君主的人！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1 日

載于 1849 年 5 月 2 日“新萊茵报”
第 28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拉 薩 尔

科倫 5 月 2 日。昨天我們答应要回头来分析一下对拉薩尔的起訴意見书。

拉薩尔被控犯有触犯“刑法典第八十七和一〇二条所指的罪行”。

第八十七条系针对“以 exciter〔煽动〕公民或居民武装反对王室为目的的侵害行为或密謀行为”。

根据第一〇二条，凡在公共場合和集会上发表的演說中或者在張貼的标語中 exciter〔煽动〕公众进行前述之罪行者，一律按本章前列各条（第八十七条也包括在內）所規定之刑罰（主要是死刑）惩处。只有在这种煽动未产生后果的情况下，死刑才可改为流刑。

拉薩尔被控的罪名是什么呢？

因为他仿佛一下子，在同一个時間內既触犯了第八十七条又触犯了第一〇二条，所以他只可能被控：

違犯第一〇二条，煽动进行第八十七条所規定的罪行，也就是說：

煽动公民进行以煽动武装反对王室为目的的侵害行为或密謀行为，也就是說：

煽动公民去煽动进行武装活动！

对于通常人的理智來說，这是显然毫无意义的胡說。可是檢察机关和檢察院竟要这样决定！

問題在于，第一〇二条把煽动別人进行第八十六——一〇一条所規定的罪行(如果这种煽动产生了后果)跟本人进行这些罪行等同起来，因此自然就适用于以上所有各条。它甚至还适用于第八十七条中所指的其余各种情况。要知道，所有这些条文都是针对一些**可以煽动的特定行为**的。比如，针对侵害行为和密謀行为的第八十七条，还提到对皇帝的生命和人身的侵害和密謀，提到以推翻或改变政体或改变王位继承办法为目的的侵害和密謀。这都是可以“煽动”的事情。煽动刺杀国王，煽动革命都是可能的事；煽动以刺杀国王和进行革命为目的的密謀行为也同样可能发生。但是，“**煽动組織以煽动武装反对王室为目的的侵害 resp.[或]密謀活动**”，一句話，**煽动一种煽动行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是荒謬的罪名，正像“企图在将来企图进行叛国活动”一样，在实行普魯士法的美好的旧时代，曾不止一个貧苦的学生会會員因这个罪名而坐上十来年牢房；或者正像 *suspect de suspicion d'incivisme* (因被怀疑缺乏公民情感而被怀疑) 一样，戴着正統主义眼鏡的人自称仿佛在 93 年恐怖时期的監獄記事簿中看到过这种罪名。

假如“煽动去煽动进行武装活动”从邏輯观点和法律观点看来真的是可能的罪行，那末，要把触犯第八十七条中的上述部分和第一〇二条的罪行同时归罪于拉薩爾，起訴根据的就不應該是在諾伊斯发表的演說，而應該是給国民議会的建議书，因为他在建議书中說道：“我們恳求国民議会：号召人民拿起武器来！”

这里面包含着“煽动去煽动进行武装活动”。然而甚至在这份 *non plus ultra* [絕妙的] 起訴意見书里也沒有想到，要把这句話

看成罪行。

檢察机关从該章那么多条款里恰好选择这样一个根本用不上第一〇二条的地方来和第一〇二条联系起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道理很简单。第八十七条所规定的罪名是要处死刑的。可是在全萊茵省也找不到一个陪审法庭会把拉薩爾判处死刑。因此他們宁愿使用第一〇二条，这一条规定在煽动“犯罪”未产生后果的情况下，死刑改为流刑。他們想这样便不难找到陪审員了。

所以，为了摆脱拉薩爾这个难题，檢察机关发明了一条莫須有的罪状，把法律上的两处地方凑在一起，而这样凑在一起除了純粹胡鬧而外毫无任何意义。

总之：要么是拉薩爾触犯了第八十七条，如果这样，那就干脆大胆判他死刑好了；要么是他沒有触犯第八十七条，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沒有触犯第一〇二条，那就应该被无条件地宣告无罪。同时触犯前面提到的第八十七条里面的那部分和第一〇二条，这是不可能的。

应该注意檢察机关的詭計。对拉薩爾的控告实质上应按第八十七条(死刑)判刑。但他們不敢这样控告他。他們把第八十七条和第一〇二条(流刑)結合起来控告他；但是，如果这种办法无效，如果陪审团宣告拉薩爾无罪，那就把他送交違警法庭，控以触犯第二〇九条和第二一七条之罪(六天至一年的徒刑)。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同一件事實，即在拒絕納稅运动时期进行宣傳鼓动！

我們現在来仔細分析一下真正的 *corpus delicti* [犯罪构成]——11月21日在諾伊斯发表的演說。

拉薩爾被控直接煽动武装反对王室。

按照起訴意見书所引用的三个证人的证詞，拉薩爾确曾直接

煽动諾伊斯的居民**武装起来**，购置彈药，以武力保卫已爭得的自由权利，以积极的行动支持国民議会等等。然而，**一般地煽动武装起来**既不是什么过失，更不是什么罪行，尤其是从革命以来，从1848年4月6日法令通过以来，更是如此。这个法令保证每一个普魯士居民都有携带武器的权利。煽动武装活动，根据 Code [法典]，只有当这种武装活动的目的是反对个别官員（叛乱）或反对王室 resp. [或] 反对另一部分公民（起义）的情况下，才受刑事处分。这个案子里专门指的是煽动，即**直接煽动武装反对王室**。

但是，在所有三个证人的证詞里，**一个字也沒有談到武装反对王室**；他們只談到武装起来**保卫国民議会**。而国民議会是一个依法召集的，合法存在的机构，是立法权的，在这里甚至是**制宪权的极重要的組成部分**。正像制宪权超越于执行权之上一样，国民議会是超越于“王国政府”之上的。而我們的檢察机关却认为煽动人民全体武装起来保卫这个和国王平行的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是犯了大罪。

仅仅在下面这一点上檢察机关灵敏的嗅觉还能发现对“王国政府”的疏远关系，那就是拉薩尔曾提到諾伊斯的炮台。然而，难道拉薩尔曾煽动諾伊斯的居民武装起来夺取萊茵河左岸的炮台难道是像起訴意見书摘要所說的那样，像为判处拉薩尔的徒刑需要的那样，他曾“直接”煽动他們去这样做嗎？

恰恰相反！他无论“直接”也好，間接也好，都沒有煽动他們去这样做。他只是說：杜塞尔多夫的人民**期望着**諾伊斯的居民拿下这些炮台。而这种至多不过是口头上流露出来的“期望”，照可尊敬的檢察机关看来却是 *excitation directe*，**直接煽动武装反对王室**！

总之，在杜塞尔多夫为保卫国民議會而公开进行的、自然不外是反对普魯士軍隊、亦即反对王国政府 (le gouvernement de l'empereur) 的、不折不扣的、真正的武装活动，絲毫也不算是犯罪，至多不过是反抗个别官員的过失；而这篇簡單的演說，这短短的几句话，却包含着刑事重罪！

对于拉薩尔所做的事情不敢控告；但他所說的話竟成为一項大罪。而他說了些什么呢？——期望諾伊斯的居民拿下炮台。他說是誰在这样期望呢？——难道是他拉薩尔本人嗎？根本不是，——是杜塞尔多夫的人民！

拉薩尔說：第三者期望你們做出什么什么事情，可是按照檢察机关的邏輯，这是“直接煽动”你們真正去做所期望的事情。

目前在柏林，大臣們解散了議院，准备繼續編造欽定法律。假定，今天当局强行廢除普选权，取消結社权和出版自由，我們就会說：我們期望人民用街垒来回答这个可耻的背信棄义的行为。檢察机关就会宣布，这就是我們在“直接煽动”柏林公民武装起来反对王权。假使一切都以檢察机关的意志为轉移，那我們就会因情况不同而被判处死刑或流刑！

对拉薩尔的审判从头到尾都是对一个被仇視的宣傳鼓动家的蓄意陷害。这是一种以“鼓动不滿”为借口而进行的密謀性的审判案，正像我們直到3月間为止也是在萊茵这里有幸領教过的官司一样。对韦耶尔斯的审判案同样也是以侮辱国王陛下为借口而进行的密謀性的审判案。韦耶尔斯曾說：“国王該死”，“一刻钟也不能再让皇冠留在国王头上”；就是这样几句从 Code pénal [刑法典] 观点看来完全无辜的話居然也是“直接煽动进行武装活动”！

然而，即使拉薩尔真的曾煽动武装反对王权，那又怎样呢？我

們从宪法的观点,按照宪法的概念来研究一下。在11月里,“王国政府”出动军队把人民代表的會議从一座飯店攆到另一座飯店,强行制止他們举行會議,把他們的文件发給兵士去卷烟卷、生火炉,直到最后把他們本人驅逐回家,在那个时候,为了保护制宪的人民代表,难道不是每一个公民都有責任不仅“煽动进行武装活动”,而且自己也要**武装起来**反对背信棄义的“王国政府”嗎?难道按照联合議会的決議,按照康普豪森先生著名的“法制基础”(更不要說3月19日所爭得的权利了),这个議會不是同国王“处于平等地位的締約者”嗎?难道不應該保护这样一个議會不受所謂“王国政府”的襲击嗎?

然而,我們看到了,用拳打脚踢的办法对付人民代表已成为“王国政府”的第二天性。欽定議院召开还不到两个月,王国政府一見它們通过一个不如意的決議就把它們驅散了,而这些議院仿佛还是負有修改宪法的任务的!現在,議院已承认欽定宪法,目前我們簡直根本不知道我們还有沒有宪法。誰知道明天还会欽賜給我們什么呢?

有人預見到了这一切,針对这一切采取了行动。他們力图給如此傲慢的权奸的暴力行为以强有力的反抗。从所有立宪国家,特别是**英国**的眼光看来,他們**完全**处于**合法地位**,可是这样一些人却被曼托伊費尔、西蒙斯之流下令逮捕,监禁六个月,最后才交付陪审法庭,罪名是**煽动起义!**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5月2日

載于1849年5月3日“新萊茵报”
第28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萊茵省市政委員會代表大會被禁

科倫 5 月 2 日。我們特別高興地向讀者報道，尊貴的科倫市政委員會召集的萊茵省各城市市政委員會代表大會被當局用一紙命令禁止了。在 9 月間民主派的集會被禁止³²²的時候，“善良的市民們”曾那樣“悠然自得”，現在他們會感謝自己的主子和國君。民主派的集會自由在 1848 年 9 月被取消，至少是由于公開使用暴力的法令，即戒嚴令，而科倫市政委員會的集會自由却是在法制基礎最時行的情況下被一脚踢掉的。

弗·恩格斯寫于 1849 年 5 月 2 日

載于 1849 年 5 月 3 日“新萊茵報”
第 288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萊茵各城市代表大會

科倫 5 月 3 日。萊茵省市政委員會代表大會仍然要舉行，不過將採取不很正式的方式，時間訂于下星期二。

不言而喻，我們對這個資產者的會議不能寄予任何期望。這個會議的代表是按照三級資格選舉制選出的，根據這種選舉制人民群眾被排除於選舉之外。將有一個代表團被派往柏林，它甚至不可能見到馮·霍亨索倫先生。

但是，也許大會根本不開。星期日各個政黨都要在科倫這裡召開代表大會³²³。政府不惜任何代價力圖挑起人民和軍閥之間的衝突，以便像迫害柏林人那樣來迫害我們萊茵省居民。

科倫工人的任務就是粉碎普魯士的這一詭計。行動要沉着冷靜，決不能為軍閥們的任何挑釁所動，這樣科倫工人就能使政府無法找到採取暴力行動的任何借口。

最近將有決定性的事件發生。維也納、波希米亞、南德意志、柏林都是怨聲載道，只等時机的到來。科倫能夠給予支援而且是很有力的支援，但卻不能首先開始堅決的行動。

科倫工人要記住，特別是在下星期日要記住，政府的一切挑釁行為的目的在於：使暴動在不利于我們而有利于政府的时机發生。

只有在發生巨大事件時才能實行革命；如果上了政府挑釁的

當，那結果至多也不過是一次騷動。

科倫的工人們，你們要記住九月二十五日事件³²⁴ 啊！

弗·恩格斯寫於 1849 年 5 月 3 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49 年 5 月 4 日“新萊茵報”
第 289 號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同盟中的第三者

科倫 5 月 3 日。我們曾經數百次地指出過，在俄奧兩國的同盟中，馮·霍亨索倫先生及其內閣扮演著“同盟中的第三者”的角色。正直的德國公民曾經數百次地懷著憤慨的心情否認過這種說法。

結果如何呢？現在已經完全確定，解散議院的秘密原因之一是：根據同奧里繆茨的公爵和彼得堡至高無上的信奉正教的沙皇的秘密協定，桑蘇西宮俄國藩臣^① [Unterknäs] 承擔了調遣四萬名普魯士士兵到波希米亞去的義務——一方面是為了使人民馴順聽話，另一方面是作為反對匈牙利人的預備隊。這件事甚至在聖保羅教堂公開議論過。連柏林的中間派和一部分右派也不能對此保持緘默。因此就把他們驅散了。

但是不僅如此。柏林的“國民報”5 月 1 日從柏林報道說：

我們剛從完全可靠方面獲悉：“昨天早晨，上西里西亞鐵路管理局收到了內務部一封電報，說有三萬名俄國士兵要經由上西里西亞鐵路從克拉科夫調往奧國（可見是從克拉科夫經過梅斯洛維茨、科捷爾、拉提博爾^②和奧得堡^③）。上西里西亞鐵路管理局特此通知，普魯士王國政府對此毫不反對，并

① 奧里繆茨的公爵指弗蘭茨-約瑟夫一世；信奉正教的沙皇指沙皇尼古拉一世；桑蘇西宮俄國藩臣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譯者注

② 波蘭稱作：梅斯洛維策、科茲列、拉威布日。——編者注

③ 捷克稱作：博古敏。——編者注

且如政府所希望的，铁路管理局将丝毫不妨碍这次调运工作。”

在电报上署名的是：**馮·曼托伊費尔**

我們原来已搞到这种地步：俄国皇帝藩臣的波茨坦政府不仅下令逮捕科苏特、貝姆和戈尔盖^①。不，它还调遣三万名俄国宪兵經由铁路通过普魯士領土到匈牙利去，——此外，它还派遣四万名普魯士士兵到波希米亚去镇压其自由遭到粗暴蹂躪，但渴望复仇的民族！

听着吧，萊茵省的居民們！可見，迫使我們屈从于**俄国和普魯士的专制制度**，是为了把我們的儿子和兄弟，像我們一样的萊茵省居民，送到波希米亚去，可能还送到匈牙利去，叫他們为**俄国沙皇效忠**，帮助镇压那个最后拿起武器来保卫 1848 年革命的民族！

1815 年有人把我們出卖給普魯士，是为了使我們也蒙受耻辱，仿佛俄国士兵大張旗鼓地去打匈牙利的革命軍隊，是受到我們的纵容，是通过**我們的領土**，通过跟我們一起被束縛在一个邦中的地方。

我們只是被**武力强迫**才成为普魯士的臣民和繼續做臣民的。我們从来不是普魯士人。但是現在，當我們被指使去反对匈牙利的时候，当俄国匪帮蹂躪普魯士土地的时候，我們感到我們是普魯士人，是的，**我們感到做普魯士人是多么可耻！**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3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5 月 4 日“新萊茵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第 289 号附刊

① 見本卷第 232—233、507—508 頁。——編者注

他們要戒嚴

科倫 5 月 5 日。仍有謠傳，說在星期日，趁各党派召开区代表大会之际，又要給科倫这个美好的城市欽定戒嚴。

从軍事当局所进行的种种細致的准备工作可以看出，它的确在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不仅如此，还采取了显然是要挑起混乱的措施。

譬如，为什么要突然准許“我的英勇軍隊”——这使士兵們本人大为吃惊——可以在晚上十点钟以前而不是九点钟以前回兵营呢？

又有人說要捕人了。我們願意相信这一点。这样的意图是早就有了的。并且大家知道，有一次，就是通过这种逮捕而完全实现了挑起混乱的計劃。

我們再說一遍：民主派，特別是科倫的工人們，應該采取一切措施，以便明天不給渴望戒嚴的当局以任何借口来掩飾其暴力行动。

近来的反革命政变首先威胁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召开了各城市代表大会。我們就让資產階級最先发言。且看这些先生們在星期二会通过什么样的决定。我們确信，某些头脑簡單的民主人士将对这个盛大的“各城市代表大会”的結果大失所望。

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如果在星期二之前宣布戒嚴，那末各城

市代表大会便不会举行,而对于这一点,誰也不会比那些**召开这次大会**的先生們更感到滿意了。

如果工人們明天让人挑起混乱,那末他們就只是**为資产階級**、**同时也就是为政府去火中取栗**。現在,整个德国正处在**內战前夜**,工人們也許很快就有可能举行**实现自己要求的发动**,試問在这种时候他們是否甘願被人这样利用呢?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5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5 月 6 日“新萊茵报”
第 291 号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普魯士軍隊和人民革命起義

科倫 5 月 7 日。在德國，心懷不滿的人與日俱增；情況越來越明顯了。

當德意志的一個反革命中心——奧地利忙於同匈牙利作鬥爭的時候，另一個反革命中心——普魯士卻派遣它的武裝部隊到四面八方去鎮壓人民的革命起義。

在德勒斯頓，在這個藝術與豪華的和平城市里，人民拿起了武器，用街壘和射擊來回答王國政府的背叛性宣言。大部分軍隊都轉向人民方面；鬥爭結果本來可以說已見分曉；但是突然出現了普魯士的隊伍，站在背叛的國王方面反對人民。

在普法爾茨，人民也拿起武器來反抗那越來越無恥的巴伐利亞的反革命；而在这里也有普魯士的隊伍，準備在適當時機進行干涉，並在驅散法蘭克福議會的同時把普法爾茨的起義鎮壓下去。

無論在德國北部和西南部，到處都有普魯士的隊伍，準備用武器實現反革命。

為了使我國和鄰近各邦都不缺少普魯士的隊伍，到處都在按照我們出色的軍制召募後備軍。

因此，在一個地方是奧地利軍隊成為反革命的中心，而在另一個地方又是普魯士軍隊成為反革命中心。起來反對反革命的新的革命一天比一天更加劇烈，更加廣泛。

德勒斯頓還存在着臨時政府，它正在從全國各地動員人民的力量。

普法爾茨還存在着地方保衛委員會，它正在把普法爾茨的居民一天比一天更多地團結在革命旗幟的周圍。

在萊茵普魯士，後備軍拒絕進軍。甚至在愛北斐特，在黑白色的烏培河谷，後備軍也拒絕越出自己的集合地點。

最後，在奧地利，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是**匈牙利的革命正在不可遏止地向前發展**。維也納的郵件沒有到達，這可能是由於馬扎爾人把莫拉維亞鐵路切斷了。絲毫不容懷疑，他們已沖入莫拉維亞。有人從拉提博爾^①給我們來信說，八天前在奧地利邊界的哥爾科維茨，5月3日在洛斯勞^②，以及在普魯士的上西里西亞都聽到了大炮的轟隆聲。無論如何，在雅布龍卡這一邊一定發生了戰鬥。

一般說來，**匈牙利人的勝利從來還沒有像現在這樣近在咫尺**。毫無疑義，**俄國人不會來了**。因此，再過幾天，匈牙利人就要到維也納，匈牙利的革命將要完成，而第二次德國革命就要莊嚴地揭幕了。

弗·恩格斯寫於1849年5月7日

載於1849年5月8日“新萊茵報”
第292號特別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① 波蘭稱作：拉威布日。——編者注

② 波蘭稱作：沃德集斯拉夫。——編者注

*問 工 人

科倫 5 月 7 日。普魯士的先生們看来是想要用一切力量来挑起騷乱。

前天，給炮兵（順便提一下，政府把他們大大地估計錯了）发了上个月的“加賞”，每人十五个銀格罗申。当然，步兵也拿到了这种加賞。

駐扎在此間的一个团的軍官們，直接要求士兵在明天挑起騷乱。

今天晚間，在新市場已經发生了一次小規模的軍民冲突。

我們再一次問一問工人們，他們是否打算听任普魯士的那些大人先生們給他們指定发动起义的日期？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7 日

載于 1849 年 5 月 8 日“新萊茵报”

第 292 号特別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沙皇和他的藩臣們

科倫 5 月 8 日。傳聞法國駐柏林大使就普魯士人進入薩克森一事提出抗議。

可見，法國政府終於發覺，東歐的反革命對它也是個威脅，新的神聖同盟的最終和最高的目的不過是征服，而這一次還可能是瓜分法國。

我們確實知道，根據信奉正教的沙皇同他的奧里繆茨和波茨坦的两个藩臣之間所簽訂的條約，同盟的最終目的是：征服法國，廢除共和制，立“聖路易之子”、波爾多的白痴亨利為法國和納瓦腊的“正統國王”。

奧迪隆·巴羅參與了這一陰謀，幾乎用不着懷疑。

普魯士後備軍的士兵們，這就是他們所希望於你們的！要你們背井離鄉，拋妻棄子，就是為了先驅使你們同德國、普魯士的兄弟們廝殺，把你們去年爭得的自由所剩下的點滴殘余都消滅掉，然後再驅趕你們去打那些對你們的處於威脅中的自由進行援助的匈牙利人；如果你們使你們的王公老爺們和你們的最高主子和統治者，沙皇尼古拉感到滿意，完成了這些任務的話，他們將率領你們跨過萊茵河，去打曾經給你們帶來自由的那個民族，你們現在所享有的一切自由都是那個民族在 1789—1794，1830 和 1848 等年代舉行的英勇起義給你們提供的。

街垒战士们，威严的人民大众！你们在去年争得了一点自由，难道就是为了要在现在以后备军士兵的身分亲手把它断送，然后再为你们至高无上的主子俄国沙皇去摧毁匈牙利和法国这两个自由堡垒吗？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8 日

载于 1849 年 5 月 9 日“新莱茵报”
第 29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霍亨索倫王朝的丰功偉績

科倫 5 月 9 日。馮·霍亨索倫先生的政府显然想在自己和普魯士国家寿終正寢前的最后几天再一次挽回普魯士和霍亨索倫名字的旧有威望。

誰不知道海涅是这样描写的：

这个小孩，南瓜脑袋，
滿嘴胡子，头发花白，
两只手又长又壮，
大大的肚皮，細細的肚腸，
这家伙真是奇形怪状……325

誰不知道那个姓霍亨索倫的下士家族是靠着在继承方面昧良心、搞陰謀、耍流氓而爬上去的？

誰都知道，所謂“大选帝侯”^①（仿佛哪个“选帝侯”可能是“偉大”的！）如何对波兰干出了首次叛卖行为：他在和波兰联合对付瑞典的时候，突然轉到瑞典人方面去，为的是根据奧利弗和約³²⁶更无情地掠夺波兰。

誰都知道，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卑鄙面目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畜牲般的粗野。

^① 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編者注

誰都知道，弗里德里希二世这位家长式暴政的鼻祖，棍棒教育的朋友，如何把自己的国家拍卖給法国投机家；誰都知道他怎样同俄国、奥地利結成联盟来掠夺波兰³²⁷，这次掠夺甚至在 1848 年革命后的今天，也还是德国历史上一个洗刷不掉的可耻的污点。

誰都知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怎样帮助完成对波兰的掠夺，他怎样把掠夺来的波兰国家的和教会的财产分賜給自己的朝臣。

誰都知道，在 1792 年他怎样同奥地利、英国联合镇压光荣的法国革命，侵入法国；同样誰都知道，他的“英勇军队”是怎样丢尽了臉皮被赶出法国的。

誰都知道，他在当时怎样背棄他的盟友，急忙同法兰西共和国簽訂了和約³²⁸。

誰都知道，他自称是法兰西和納瓦腊的正統国王的忠实信徒，从法兰西共和国以賤价收买了这位国王的王冠上的珠宝，就这样乘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弟兄”的危难而大发橫財。

誰都知道，他的生活是純粹霍亨索倫式的混合物，既淫佚放蕩，又崇奉鬼神，既衰老而淫乱，又像小孩子一样迷信。就是这位先生下了几道比碩夫斯威德尔式的敕令³²⁹，扼杀了发表意見的自由。

誰都知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继承者，“正义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怎样为了拋給他的誘餌——汉諾威——而把自己的老盟友出卖給拿破侖。

誰都知道，他随后又怎样把拿破侖出卖給他那些以前的盟友，充当英、俄的走卒来进攻体現在拿破侖身上的法国革命。

誰都知道，这次进攻获得了多大的成績：“英勇军队”在耶拿吃

了空前的敗仗，突然暴露了普魯士整个国家机关的道德腐化。普魯士官吏們的叛卖勾当、卑劣行徑、曲意逢迎的行为是罄竹难书的，連拿破侖和他的將軍們都感到厌恶。

誰都知道，在 1813 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怎样用花言巧語迫使普魯士人民相信，仿佛对法国的进攻是“解放战争”，而实际上是鎮压法国革命，是要使旧日的“天賦的”君主制复辟。

誰都知道，当神圣同盟的参加者們在 1814 年 3 月 30 日一进入巴黎，那些漂亮的諾言就被忘得一干二淨。

誰都知道，当拿破侖从易北河回来的时候，德国人民的热情又大大低落，以致霍亨索倫只好答应立宪（在滑铁卢战役的四个星期以前，即 1815 年 5 月 22 日所下的敕令）来重新激发这股日益减退的热情。

誰都記得，在德意志联邦条例和維也納和約上所許下的諾言：出版自由、宪法等等³³⁰。

誰都知道，“正义的”霍亨索倫是怎样履行自己的諾言的。为鎮压各国人民成立了神圣同盟，召开了代表大会，作出了卡尔斯巴德決議³³¹，实行书报檢查制度，警察逞凶，貴族称霸，官僚橫行，王室对訴訟程序橫加干涉，迫害宣傳鼓动家，大批的人被判罪，在財政上揮霍无度，而宪法連个影子也沒有。

誰都知道，1820 年霍亨索倫怎样向人民保证以后不再增加稅額和国債，后来又是怎样履行自己諾言的：把 *Seehandlung*³³² 变成了国家专用的秘密借貸所。

誰都知道，霍亨索倫是怎样回答六月革命时期法国人民的呼吁的：在边界上調集軍隊，压制本国人民，鎮压德国各小邦的运动，在神圣同盟的皮鞭下彻底奴役这些小邦。

誰都知道，就是这个霍亨索倫在俄波战争时怎样破坏了中立，让俄国军队通过自己的国境去袭击波兰的后方，把本国的军械库、军需仓库供俄国军队使用，给每一个被打败的俄国军在普鲁士提供安全的避难所。

誰都知道，这位出生于霍亨索倫家族的藩臣 [Unterknäs]，按照神圣同盟的意图，全力去巩固贵族、官僚、军阀的统治，用蛮横的暴力——不仅在普鲁士，而且在全德意志——把言论自由消灭得干干净净，绝不让“顺民的有限理智”³³³对政府起一丝一毫的影响。

誰都知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统治时期，特别是在1815—1840年，用来实现这种壮志宏图的蛮横的暴力手段是史无前例的。无论何时何地，从来没有像在这位“正义的”君主统治时期这样大批地捕过人，判过罪，监狱从来没有像这样挤满过政治犯，何况这些宣传鼓动家都是一些无辜的头脑简单的人。

难道还有必要谈论那位用莱宁的一个修道士³³⁴的话说“将是本族最末一人”的霍亨索倫^①吗？难道还用再谈论基督教德意志伟大精神的复活、再度急剧恶化的财政困难、天鹅勋章³³⁵、最高书报检查法庭、联合议会、宗教大会、“一块纸片”³³⁶、借款失败以及1840—1848年这个光辉时代里的其他一切成就吗？难道还需援引黑格尔的话来证明为什么霍亨索倫家族偏偏要用一个喜剧人物来收场吗？

这些都沒有必要讲了。上述事例已足以全面地说明普鲁士霍亨索倫这一姓名的特征。固然，这个姓名也一度失掉光彩，但从曼

①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托伊費爾及其同流成了國王的左右手以來，又恢復了昔日的威望。普魯士又像從前一樣，由一個臣服俄國的准國王治理；霍亨索倫又成了全俄專制君主的藩臣，薩克森、巴伐利亞、黑森-洪堡，瓦爾德克等地所有小諸侯的太上皇；“順民的有限理智”又重新獲得舊日的權利——唯命是聽。“我的英勇軍隊”——信奉正教的沙皇目前還沒有親自使用這支軍隊——能夠在薩克森、巴登、黑森和普法爾茨強行建立那種已在華沙統治十八年之久的秩序，能夠在本國和奧地利利用黎民的鮮血粘合破裂的皇冠。至於從前在危急大難關頭許下的諾言，我們和長眠地下的祖先一樣，絲毫不掛在心上；只要我們一旦平定國內，就立即大張旗鼓向法國推進，征服香檳葡萄之鄉，毀滅偉大的巴比倫這一萬惡之源！

這就是我們的最高當局的策劃，我們的高貴的霍亨索倫就是要把自己的戰船開進這樣一個可靠的避風所。所以欽定法律越來越多，政變越來越頻繁；所以胆小怕事的法蘭克福議會才老是吃耳光；所以才宣布戒嚴、逮捕、實行迫害；所以普魯士的大兵才侵入德勒斯頓和南德意志。

然而，還存在着一支力量，儘管桑蘇西宮³³⁷中的先生們不太把它放在眼里，它終究會發出自己雷鳴般的聲音。這支力量就是**人民**。在巴黎，在萊茵，在西里西亞，在奧地利，他們都在勉力抑制着自己滿腔的怒火，等待着起義的時刻到來，誰知道，也許很快他們就會給所有的霍亨索倫，所有的大小王公貴人以應得的報償。

卡·馬克思寫於1849年5月9日

載於1849年5月10日“新萊茵報”
第294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反革命的进攻和革命的发展

科倫 5 月 9 日。反革命正以迅速的步伐迫近，但是革命发展得更快。

如果說反革命在德勒斯頓获得的成功³³⁸使人們有根据来預見它的胜利，如果說反革命在布勒斯劳利用挑起的叛乱而实行了戒严、书报檢查和組織軍事法庭，那末，革命可以因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别的胜利而感到自豪。

我們且不談萊茵普魯士后备軍的正在迅速增长的公开暴动，它恰好席卷了黑白反动派势力最强的各个区；我們也不談在德国南部发生的运动，它在各处都为各邦政府、資產階級和法兰克福議會本身³³⁹所出卖。我們只談一談那些从外面闖进来的能給德国各种小規模的、分散的、被出卖的运动带来統一并建立起坚实支柱的大事件：匈牙利和法国的革命。

在匈牙利革命接二連三取得胜利并在最近的决定性战斗（这一战斗原来應該在 5 日或 6 日在普勒斯堡^①附近进行）之后将直接向維也納挺进并解放該城的同时，法国突然也重新加入了大家眼看着发展起来的公开运动。最近几个月来处于隱秘状态的发展即将結束。法国軍隊在羅馬城下的失敗³⁴⁰暴露了以往历届政府的

① 斯洛伐克称作：布拉的斯拉发。——編者注

昏庸无能，并使之名声扫地。人民，这个最后的、最高的审判官，又重新出现在舞台上。不管这将通过选举还是通过公开革命而发生，但是法国人民很快就会给运动一个全欧洲都能感觉得到的推动。

欧洲的君主们很快就会看到：优秀的革命人民未改当年本色，——1849年的法国革命将不是用拉马丁的词句，而是用大炮的语言同他们谈话。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5月9日

载于1849年5月10日“新莱茵报”
第294号特别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普魯士新憲法

科倫 5 月 12 日。三位一体³⁴¹中靠天命和戒严治理國家的波茨坦成員，去年 11 月間，在驅散了人民代表以後，欽定了憲法；這一憲法需要提交很快就應召開的議會去修改。大家知道，新的人民代表遭到了跟舊的人民代表同樣的命運；前者被弗蘭格爾的刺刀所驅散，而對於後者，曼托伊費爾的一張關於解散的便條³⁴²就成了解散回家的命令。這樣，憲法的修改工作也就告終了。

於是，基督教德意志臣民之父和他的黨羽，這一大群門第高貴的和身世微賤的，掛滿勳章的和掛不掛勳章的寄生者、懶漢和吸吮人民血汗的吸血鬼——所有這些人都得到了自由廣闊的活動天地，能夠為所欲為。

去年 11 月間，王權、官僚和容克地主還不得不作各種各樣偽善的聲明，把一些看去極為開明的條文加進憲法中去。要把十一月憲法打扮得無論如何可以用來欺騙所謂“普魯士人民”中那個人數眾多的愚鈍部分。

而現在，所有這一切微妙的外交手腕都已變成多餘的了。姻兄弟尼古拉不是已經帶着兩萬士兵駐紮在德國的領土上了嗎？德勒斯頓不是由於大炮轟擊被破壞了嗎？普魯士不是已同科尼施泰因的胆怯的逃亡者、同皇帝候選人慕尼黑的馬克西³⁴³、同漢諾威的惡犬恩斯特-奧古斯特、同德國的一切內外反革命匪幫結成最密

切的同盟嗎？

应当承认，霍亨索倫最巧妙的利用了时机。他下令为自己“心爱的”臣民制訂了新的宪法，并于5月10日在沙洛頓堡批准和欽定了它。

最近頒布的普魯士王国宪法，是表达了真实的意图的唯一的宪法，跟十一月宪法相比它还有这样一个优点，即它总共只有十七节，內云……^①

写于1849年5月12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49年5月13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297号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接着，在“新萊茵报”上以“普魯士的最新宪法”为題刊登了1849年5月10日关于在全普魯士实行戒严和建立战地法庭的敕令。——編者注

杜塞尔多夫的血腥法律

科倫 5 月 12 日。“新宪法”昨天已經在杜塞尔多夫生效。一般的法律和法庭已被廢除，臣民之父授予了“我的英勇軍隊”以杀人的特权。

卫戍司令在取得胜利和血腥地镇压人民之后，立即請求柏林方面給予指示。他收到馮·霍亨索倫先生的下屬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用电报拍来的命令——頒布血腥法律并成立劊子手的軍事法庭。

根据軍事当局所頒布的命令的第一条和第六条，結社权被廢除了，不值一談的欽定宪章的第五、六、七、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和二十八各条均失去效力。

去年，在“公民和共产主义者”德利加尔斯基^①的統治下宣布戒严时，对杜塞尔多夫的报刊实行了檢查，这个措施甚至激起了大部分軟弱无力的协商派的憤怒叫喊。如今，在霍亨索倫王朝取得新的成就之后，当支持波茨坦藩臣的不是議院，而只是同宗的翹鼻子的哥薩克的时候，人們已不滿足于檢查，而要干脆扼杀报刊了。

按第七条的規定，在杜塞尔多夫地区禁止发行杜塞尔多夫的报纸，“新萊茵报”也在禁止之列。第八条規定，只有官方的“告示”

① 見本卷第 64—69 頁。——編者注

才能刊行。

在“公民和共产主义者”德利加尔斯基的軍刀专政下，被任意逮捕的受害者至少应当按一般法律由普通法院审理。可是現在，法律和法院都暂时被取消了，并且成立了劊子手的特別軍事法庭。

第九条。凡通过語言、文字、刊物或描繪等方式号召反对当局的合法(!)决定者，交軍事法庭惩处。

第十条。凡被揭露对合法当局的措施进行公开的或武装的反抗，或者以叛变投敌行为使軍隊遭受危險或損失者，按軍法立即枪决。

嗜血豺狼文迪施格雷茨的桂冠使得恢复了元气的霍亨索倫不能安眠!

写于 1849 年 5 月 12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5 月 13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 297 号

貝尔格区的起义

科倫 5 月 12 日。目前，整个萊茵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愛北斐特，在那里，“起义的旗帜”現在比萊茵省的其他任何城市都举得更高。議院的解散成了一貫風平浪靜的烏培河谷开始行动起来先兆。連愚蠢透頂的“抱怨派”和极其可怜的“伪君子”也懂得了反动派的罪孽过于深重，并为工人們的英勇和热情（对于工人們的精力，我們从未怀疑过）所鼓舞，終于拿起了武器，参加了决心同专制制度进行殊死斗争的街垒战英雄行列。

我們从战地获得的消息很不确切，以致真假难分。不过，下面这些情况还是可以深信无疑的：全体居民都拿起了武器；街道和房屋都变成了街垒；武装的增援部队正从邻近地区——从佐林根、勒姆謝德、格萊弗拉特，从分布在埃奈泊流域的各个地方，——总之，从整个貝尔格区匆忙赶去。起义者并不限于占领愛北斐特和巴門等城市，而要把防御行动扩展到郊区的各个重要据点去。

有人肯定地说，战斗者的計劃中包括赶忙去援助杜塞尔多夫，以便把这座城市从普魯士軍隊的手中解放出来。現在第一次站在人民方面坚决进行战斗的后备軍，在这些行动中起着主要的作用。战斗者有足够的装备和金錢，因为許多大商人都甘願打开自己的錢柜。例如，据报道，仅仅一家商号就給了愛北斐特安全委员会

五百个弗里德里希斯多尔^①。

在这种情况下，王室的雇佣军队要准备进攻，以便在贝尔格区也要极力进行跟在布勒斯劳、德勒斯顿、爱尔福特等地同样残酷的镇压，自然就用不着惊奇了。但愿这次情况会有不同的发展。

威塞尔的炮兵纵列将调到爱北斐特去。进攻大概决定在下星期一开始。

这些消息是否可靠我们不能担保。但是不管反革命的计划如何，爱北斐特所面临的将是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它真正能对祖国作出重大的贡献。

写于 1849 年 5 月 1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5 月 13 日
“新莱茵报”第 297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① 普鲁士金币，等于 $5\frac{2}{3}$ 塔勒，在 1750—1855 年间通用。——译者注

*“科倫日報”賣身求榮

科倫 5 月 13 日。我們提醒本報讀者注意一下最近几天的，尤其是今天的（星期日，5 月 13 日）“科倫日報”。

的确，“最下流的淫佚放蕩”从来没有像在我们出色的当代女人^①最近发表的社論和通訊中那样紧密地同**賣身求榮**的无耻行徑互相結合。

几天以前，我們还看到，“科倫日報”的老板約瑟夫·杜蒙先生在萊茵省市政委員會代表大会上坚毅果敢地拥护大会所通过的決議。今天我們却看到，那同一个人物通过自己的奴才勃律盖曼，在每一句話里都无耻透頂地对起义的失敗表示高兴，虽然这些起义是萊茵省市政委員會作出的那些決議的結果。

然而，正因为如此，“科倫日報”也就有福气成为与戒严状态同时欽定給萊茵省各城市的独一无二的報紙。

不錯，同时欽定給这些城市的还有**鮮血和——污秽！**

写于 1849 年 5 月 13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5 月 13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新萊茵報”第 297 号增刊

① 指“科倫日報”。——譯者注

“十字报”

科倫 5 月 15 日。普魯士的一家該受絞刑者的小報^① 选登了“新萊茵报”对“奧里繆茨的帝俄藩臣”和“普魯士騎士臭虫集团”^② 所說的一些非爱国主义的話，使我們感到特別高兴。这家小报在选登这些話的时候，仅仅刊載了一篇布勒斯劳的通訊，并在它的末尾加上了这样一段伪善而輕率的“十字騎士”的牢騷話。

“同这种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比較起来，就連 1793 年登載在法国‘通报’上的关于普魯士国王結婚的声明：«Le jeune tyran de Prusse vient d'épouser une demoiselle de Mecklenbourg!» [“年輕的普魯士暴君刚刚同梅克倫堡家族的一位女郎結婚!”]也要黯然失色。”

为了尽可能充分地說明“新萊茵报”的“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我們劳駕該受絞刑者的小报把本报第 294 号上 Premier-Cologne [标有記号科倫的一篇社論]——“霍亨索倫王朝的丰功偉績”也轉載一下。据說，馮·霍亨索倫夫人是該受絞刑者的小报的热心讀者，而我們决不会那么“片面”，以致不让尊貴的夫人了解一下有关她丈夫的王朝的某些历史情节，作为消遣。

写于 1849 年 5 月 15 日

載于 1849 年 5 月 16 日

“新萊茵报”第 29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指“新普魯士报”(“十字报”)。——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536 和 569 頁。——編者注

*普魯士給法蘭克福諸君的 又一記耳光

科倫 5 月 15 日。鞭子的神聖同盟剛給普魯士欽定了一部實行戒嚴的最新憲法^①，今天我們又高興地看到了另一個並不遜色的文件。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軟弱無能的議員們，由於自己極端寬大、膽怯和愚蠢，在整整一年中誠摯地幫助了德國人民的僱傭叛徒來準備反革命的勝利，現在他們自食其果了。如果我們的議員們頭腦還可能稍微清醒一點的話，如果在他們心靈里不僅能產生三月啤酒所激起的義憤，而且還能產生哪怕很小一點革命的義憤和熱情的話，那末這在沙洛頓堡的藩臣頒布下列“敕令”以後就該發生了。

“敕 令

我們，受命於天的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及其他人等，據內閣奏請，特頒布命令如下：

第一條

根據 1848 年 3 月 30 日和 4 月 7 日所頒布的聯邦議會決議，及上月 11 日所頒布的敕令，由普魯士邦選入德意志國民議會的議員，其委託書已宣告無效。

第二條

茲責成美因河畔法蘭克福我們的全權代表通知各議員恪守本法令，并指

① 見本卷第 578—579 頁。——編者注

示他們絕不要再出席議會以后的各次會議。

弗里德里希-威廉

勃蘭登堡伯爵 馮·拉登堡 馮·曼托伊費爾

海特男爵 馮·拉貝 西蒙斯

1849年5月14日于沙洛頓堡”

寫于 1849 年 5 月 15 日

載于 1849 年 5 月 16 日

“新萊茵報”第 299 号

特別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新的軍法憲章

一

科倫 5 月 15 日。我們还应当指出波茨坦藩臣最近对他的那些用掠夺和贩卖人口的办法得到的“世襲”臣民所表现的慈父般的关怀。我們指的是不久以前欽定的軍法憲章^①，这是霍亨索倫王朝所作的一切諾言中唯一真实的諾言，在这里，普魯士的尊严终于甚至在最迟鈍、最輕信的蠢人面前都显露出了它的赤裸裸的本质，抛棄了最后一点滑稽可笑的伪善虛飾。

驅散本来应当“修改” 12 月 5 日欽定宪法的无害的柏林議院，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只不过是為俄国人进入德国領土所做的必要准备。波茨坦的巴什基里亚人和信奉正教的沙皇所豢养的跟他們有血緣关系的、像恶犬般到处奔馳的哥薩克联合起来，实行了三国同盟对匈牙利的臭名远揚的侵犯，在这次侵犯中，普魯士由于其胆怯和背信棄义的本性，像一个密探一样带着逮捕令站在大門口，而奥地利和俄国的劊子手則应该在这个国家里面进行血腥的狩猎。但是，除此以外，这个联合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霍亨索倫王朝这个联盟的真正目的就在于：俄国人进入德国領土应当賦予波茨坦的

^① 見本卷第 578—579 頁。——編者注

英雄以必要的**勇气**，并帮助他对革命进行**报复**，因为革命曾在去年3月**迫使他承认胆怯**。

为了说明霍亨索伦王朝在各个时代所固有的天生的**怯懦**，我們不必探索历史，甚至不必追溯这个高贵家族的祖先的经历，他們隱身在丛林草莽之中，像劫路的强盗一样窥伺着手无寸铁的过往行人，并以此为“王朝的**尊严和光辉**”奠定了基础。我們不必提起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向法兰西共和国的大吹大擂的进军，在这次进军中，偉大的霍亨索伦头一个开了小差，出卖了德意志“帝国军队”，以便同俄国一起重新掠夺波兰；我們也不必谈他的继承者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他在用虚伪的诺言把“我的人民”驅入战斗之前，在拿破仑战争中起了可怜的作用。“三月的成果”的遭遇只不过是旧的“世襲的”怯懦和背信弃义的继续。协商議會是由于怯懦（它代替了关于臭名昭彰的大言不惭的“一張羊皮紙”的演說）而向革命作出的第一个让步；当維也納的陷落使恢复了元气的霍亨索伦得到足够的勇气的时候，协商議會就被驅散了。欽定宪法連同“进行修改”的議院是怯懦的伪善的第二个行动，因为“未被削弱的国王”当时还认为必須作出某些自由主义的让步。在同俄国沙皇和君主安排的阴谋如願以偿之后，議院便被解散了。但是只有当俄国人真正进入德国的領土，哥薩克的支援眼看就要来到的时候，霍亨索伦才有勇气拿出最后的計劃：消灭最后一点伪善的“宪法保证”，办法是实行最无限制的，最专横恣肆的軍刀专政，停止旧的甚至3月以前的法律和法院的效力，用“鉛彈和火药”来为霍亨索伦王朝在3月几次让步中所表现出来的怯懦向革命进行报复。

这就是不久前欽定的軍法宪法的历史起源。现在来看看它的内容。

根据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規定，“为了防止騷动”，不仅每一个要塞司令可以宣布要塞实行戒严，而且每一个“軍长”可以宣布該軍所在的全軍区实行戒严。

“为了防止騷动”，c'est-à-dire [就是說]，如果司令官或將軍自以为預先看出了“騷动的苗头”。霍亨索倫王朝的大臣們做起文章来，通常总是語法知識貧乏得惊人，也許他們是想說“一旦发生騷动”吧！? 該如何解釋，由將軍們和司令官們久經考驗的理解力去決定。

这样，“为了防止騷动”，司令官可以宣布自己的要塞实行戒严，而軍长則可以宣布全省实行戒严。但这“騷动”的界限沒有确定。“騷动”一定要在要塞內或省內发生，还是在多么远的距离內发生的危險会使要塞或省受到威胁——这个“分寸”也要由將軍或司令官自己去掌握。而“掌握分寸的本領”，按照梯岑中將的慣用說法，乃是普魯士軍官所首先必須具备的。

为了法制基础的所有崇拜者的利益起見，將軍在“为了防止騷动”时的权力，毕竟有所限制，但这种限制办法又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只有在“为了防止战争”时，將軍和司令官才能**独立地**宣布自己的省和要塞实行戒严。但是，新宪章第二条解釋道，在“为了防止騷动”时，宣布实行戒严的命令由內閣发出；在这种情况下，司令官对于自己的要塞，將軍对于自己的省虽有权宣布实行戒严，然而只是**暂时地、預先地**，即在內閣批准或(!)取消这一戒严令之前。这是对那些受到騷动威胁的臣民的愉快的保证！但是，我們的大臣們难道不是“負責任的”嗎？司令官們和將軍們只不过“暂时”专政，最后一級还是有“負責任的”大臣，——这一切难道不能拯救“法制基础”嗎？不錯，根据第七条和第十三条，“暫时的”戒严使司

令官或將軍有权**暫時地**停止普通法院的活動，**暫時地**成立軍事法庭，而軍事法庭也是**暫時地**宣判死刑(第八條)，并且**暫時地**在二十四小時內執行死刑判決(第七節第十三條)。但是“法制基礎”还是由于有最后一級——“負責任的”大臣們——而得救了，——法制基礎萬歲！这里我們有一个唯一的小小的願望，就是让法制基礎的崇拜者們能够首先亲身体驗一下以上帝和基督教德意志藩臣陛下的名义宣布的**暫時的**死刑。

二

科倫 5 月 16 日。塞万提斯在某处說到一个勇敢的阿尔古阿西尔³⁴⁴和他的司书为了維護社会道德而供养了两个名声很坏的妇人。这两个殷勤的女神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大的集市及其他盛大場合出現，老远就可以看出是什么貨色。她們一勾搭上什么外来的客人，就馬上設法告訴自己的情人，她們到哪个旅館去了。阿尔古阿西尔和他的司书便闖到那里去，使她們大受惊吓，演出吃醋的場面，只有在客人苦苦哀求并付出相当数目的賠償費以后才把他放走。他們用这种办法把私人利益同社会道德的利益結合起来，因为上了当的人会长期警惕，不再重起邪念。

普魯士維護制度的英雄們同这些道德的維護者一样，用最簡單的方法保障正常的軍法安宁。为了进行挑衅，他們派出几个喝得醉熏熏的法制栋梁去进行挑衅，要他們闖入人群用軍刀砍伤几个人，这样在某个边远城市或乡村就引起了激憤情緒，这样就可以借口保护全省免受繼續扩展的罪恶騷动的波及而宣布戒严，并以欺騙手段剝夺該省最后一点点宪法成果。

根据新的軍法憲章第五条，“軍事长官”可以在宣布专区戒严时使最近在 12 月間欽定的“成果”的第五条至第七条和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八条停止生效。

我們来看看，如果我們从三月諾言中把那些被新的軍法憲章所廢除的条款取消，那末剩下的还有什么呢？这样一来，“为了防止騷动”，任何一个“軍事长官”可以随意使下列条款停止生效：

十二月憲法第五條：“保證人身自由”。

第六條：“住宅不可侵犯”。

第七條：“不得剝奪任何人的法定的受審程序”。

第二十四條：“每個普魯士人都擁有……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

第二十五條：“在言語上或出版物上犯的過錯等等，應根據普通刑法予以懲處”。

第二十六條：“如果作品的作者是為人所共知的，並且處在司法當局權力可以達到的範圍之內，則印刷廠主、出版者和發行者可不受懲處”。

第二十七條：“一切普魯士人擁有在室內舉行和平的、不帶武器的集會”。

第二十八條：“一切普魯士人擁有結成其目的不違反刑事法規的社團”。

只要軍事長官“為了防止騷動”宣布戒嚴，“人身自由”馬上就不再有保障了，住宅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法定的”受審程序、出版自由、印刷廠主的保護、結社的權利都失效了，甚至庸夫俗子的“目的不違反刑事法規”的“社團”——娛樂場和跳舞廳，也只有 par grâce de M. le commandant [得到衛戍司令先生的恩准] 才能存在，而決不是根據“權利”存在。

同時，新的軍法憲章第四條規定：

“宣布〈pur et simple〔絕對的〕〉戒嚴以後，行政權即歸軍事長官掌握，一切民政、行政和市政機關都必須執行軍事長官的命令和委託。”

這一節順利地取消了一切通常的市政和行政管理形式，並且給那些已變成“執行委託的奴僕”的愚鈍而無恥的官僚驢牛們套上了主權的軍事獨裁的牛軛。

第八和第九兩條規定了堅毅的霍亨索倫王朝甚至在刺刀和大炮的保護下想借以保護自己的安全和制度的懲治辦法。這個新刑法無論如何要比一切枯燥無味的、協商主義的法律理論簡明得多。

第八條：“凡在宣布戒嚴的地區或專區內蓄意放火，蓄意造成水災〔規定

得多么仔細!)，或者对**武装力量或民政和軍事当局代表**进行攻击或手持凶器公开进行暴力反抗者，一律处以死刑。”

“对武装力量或当局代表进行反抗”！大家都知道“英勇军队”的行动，都知道那些为了統一事业而被大量集聚在西部各省的勇敢的波美拉尼亚人、普魯士人和上西里西亚波兰人，怎样按照最崇高的榜样，只是由于情况关系和解除了公民的武装之后才获得勇气(像在杜塞尔多夫、布勒斯劳、波茲南、柏林、德勒斯頓等地所发生过那样)，并且用屠杀赤手空拳的人們、妇女和孩子来完成戒严。这样，波茨坦巴什基里亚的公爵的“世襲”臣民就被授予了值得深深感謝的自由——在宣布戒严之后，或者让臣民之父的善良旨意的英勇执行者“按照規定程序”杀害自己，或者是进行“反抗”而被按照軍法枪毙。

还有必要来談第九条的条文嗎？根据这一条的規定，散布把当局“引入歧途”的消息，**違反“为了社会安全而頒布的禁令”**，等等，就要判处一年以下的徒刑，甚至連最通常的警察和宪兵职能今后都以战地法庭的精神予以完善了。

还有必要来提起臣民之父霍亨索倫及其走狗西蒙斯—海特男爵—曼托伊費尔的怯懦的背信棄义嗎？他們命令战地法庭由三个“高級軍官”和两个由軍事长官任命的民事法官組成，这样既可以在沒有头脑的資产者心目中保持“訴訟”程序的外观，又可以凭着軍人劊子手在数量上的优势，事先对判决稳有把握。

有必要来提起第十三条关于“軍法审判程序”的种种規定嗎？那里沒有一处談到证人的供詞，可是根据这些条文却显然可以用嗜血的恶狗文迪施格雷茨的精神，即“**根据总的情况**”来定案。

有必要来提起这样一些条款嗎？它們規定战地法庭的判决不

得上訴，而死刑判決僅由“軍事長官”批准，並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執行；最後，即便在戒嚴解除以後，如遇戰地法庭的判決尚未執行，“普通法院”也只能用按照法律的懲處來代替戰地法庭的懲處，而“罪行”本身“則必須認為業已證明”，對於控訴正確與否不得加以討論。

最後，有必要來談這部依靠哥薩克支持的新憲法的最後一條也是最精彩的一條嗎？按照這一條的規定，“除了戒嚴以外”，也就是說，“不是為了防止騷動”，十二月成果的第五、六、二十四至二十八等條，即“人身自由”、“住宅不可侵犯”、“出版自由”和“結社的權利”，也可以在個別專區內取消。

在領教了這一切好處之後，我們就沒有必要因為這些新的、唯一真實的許諾，因為皇上的旨意由於哥薩克的接近而終於真誠地流露出來，而來向一切善意的普魯士人表示衷心的祝賀了。說實在的，我們很高興渴望秩序的資產者和幻想法制基礎的可憐的傻瓜們受到這種血腥的懲處。

但是人民很快就會感到，這種新的“成果”使他們無法再容忍下去，他們會向這些騙人的、胆怯的傷害國家的蝨賊進行報復，而萊茵省決不會放過使我們能高唱 *Ça ira*³⁴⁵ 的這種期待已久的時機！

瘦癯的騎士們，
不久該會走開了，
那時就要從鐵制的長瓶里，
把錢行酒給他們傾倒！³⁴⁶

寫於 1849 年 5 月 15—16 日

載於 1849 年 5 月 16 和 17 日
“新萊茵報”第 299 和 300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爱北斐特

科倫 5 月 16 日。在爱北斐特的街垒上也有过“新萊茵报”的代表。

为了駁斥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語，我們应当請讀者注意关于这个问题的簡短报道。

5 月 10 日，“新萊茵报”編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科倫前往爱北斐特。他从佐林根带去了两箱子彈，这是佐林根工人在突击格萊弗拉特軍械庫时获得的。恩格斯到了爱北斐特以后，給安全委员会作了关于科倫局势的报告，并听候該委员会調动。軍事委员会立即委派他领导修筑防御工事的工作，并給了他如下的委任状：

“安全委员会直屬軍事委员会茲授权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檢查城内全部街垒，并指导建筑防御工事。請街垒上一切崗哨于必要时給該人以协助。

(签名)許納拜恩 特罗斯特

1849 年 5 月 11 日于爱北斐特”

第二天，大炮又交由恩格斯支配：

“茲授权公民弗·恩格斯自行斟酌安装大炮，并招聘为此所必需之工匠。有关开支由安全委员会負担。

安全委员会

委员会代表

(签名)波特曼 許納拜恩 特罗斯特

1849 年 5 月 12 日于爱北斐特”

恩格斯在到达爱北斐特的头一天，就組織了工兵連，并且在該城几个出口处构筑了街垒。恩格斯出席了軍事委员会的各次会议，并建議該委员会聘請米尔巴赫先生担任卫戍总司令，这个建議得到一致通过。以后几天，恩格斯繼續他的活动：改建了許多街垒，拟訂了新街垒的布置計劃，并加强了工兵連。从米尔巴赫到任的时候起，恩格斯就听从他的指揮，也参加了卫戍总司令所召集的各次軍事会议。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逗留的全部期間，受到了貝尔格和馬尔克的武装工人以及志願部队的无条件信任。

在恩格斯到达的头一天，安全委员会委員里奥泰先生就探詢了他的意图。恩格斯說，他来到爱北斐特，首先是因为受到科倫方面的派遣；其次是因为考虑到也許他对軍事方面会有所帮助；第三是因为他本人是貝尔格区人，他认为能够亲身参加在該区人民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是自己的光荣。他只希望进行軍事方面的活动，而根本不想涉及运动的政治方面，因为非常明显：目前在这里，运动只能在黑紅黃三色旗下进行，因而需要避免反对帝国宪法的一切发动。

里奥泰先生完全同意这种說法。

14日早晨，当恩格斯陪同卫戍总司令米尔巴赫到恩格尔堡去参加总集合的时候，安全委员会的另一位委員赫希斯特先生走到恩格斯跟前，对他这样說道：虽然恩格斯的一举一动絲毫沒有可以非議的地方，但是爱北斐特的資产者对他的到来仍然感到万分惶恐；他們时刻耽心他会宣布成立紅色共和国，所以一致希望他离开。

恩格斯說，他不想勉强人家接受他的效劳，但是也不願意胆怯

地离开自己的岗位，因此，为了表明他对这件事不负任何责任，只要求把上述愿望用书面形式清清楚楚地写出来之后交给他，上面并且要有安全委员会全体委员的签名。

赫希斯特先生在安全委员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天就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我们对近来居住在科伦的巴门公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迄今在本城所进行的活动予以充分公正的评价，但是还是请求他今天就离开本城区，因为他的逗留可能引起对运动性质的误解。”

早在通过这一决议以前，恩格斯就已声明，只有当米尔巴赫命令他执行安全委员会的要求时，他才能这样做。米尔巴赫是按照他的建议来到这里的，因此在米尔巴赫未允许他离开以前，他不能擅自离开。

经安全委员会三番五次的恳求以后，米尔巴赫终于在15日早晨签署了相应的命令，这一命令后来以招贴的形式公布了。

安全委员会的决议激起了武装工人和志愿部队的无比愤怒。他们要求恩格斯留下来，并保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恩格斯亲自到他们那里去，安定了他们的情绪，同时谈到了米尔巴赫，他说总司令是按照恩格斯本人的建议邀请来的，并且博得了他的无条件的信任，他不能第一个不服从卫戍司令。

然后，恩格斯又在郊区进行了一番视察，在把职务移交给自己的副官以后，就离开了爱北斐特。

让那些对我们的编辑表示如此深厚的情谊和如此依恋不舍之情的贝格和马尔克的工人记住，现在这个运动只是另一个更重要千百倍的运动的序幕，在那个运动中涉及到的将是他们工人切身的利益。这一新的革命运动将是现在这个运动的结果，而只

要这个新的运动一开始，恩格斯便会——这一点工人们可以相信！——像“新莱茵报”的所有其他编辑一样，立刻出现在战斗岗位上，那时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离开这个岗位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1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5 月 17 日“新莱茵报”
第 300 号增刊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萊茵報”被勒令停刊

科倫 5 月 18 日。不久以前，柏林曾要求科倫地方當局重新宣布戒嚴，企圖按軍法查封“新萊茵報”，但是遇到了出乎意料的反抗。這之後，科倫行政區政府便請示本地檢察機關，企圖以非法逮捕的手段來達到那個目的。這一企圖由於檢察機關在司法上的懷疑而遭到了破產，就同前此曾兩度由於萊茵陪審員的明智而遭到破產一樣³⁴⁷。無可奈何，只有訴諸警察詭計；這次他們達到了目的。“新萊茵報”現在暫時停刊。5 月 16 日該報總編輯卡爾·馬克思接到了下述荒唐無稽的政府命令：

“查最近幾號(!)‘新萊茵報’愈益堅決地煽動居民蔑視現存政府，號召暴力革命和建立社會共和國。故該報總編輯卡爾·馬克思博士應予被剝奪其外人待遇法(!)，因它已遭彼粗暴之破壞，鑒於彼未被允准繼續留居普魯士國土，應令其於二十四小時之內離境。若彼對此項要求不服，應著即押送出境。”

王國行政區政府

繆勒爾

致本市王國警察廳長蓋格爾先生

1849 年 5 月 11 日於科倫

干嗎要玩弄這些愚蠢的詞句，編造這個官方的謊言！

最近幾號“新萊茵報”按其傾向和語調來說同該報“試刊”第一號絲毫沒有差別。在這“第一號”里就曾經說過：

“許澤爾先生的陰謀〈在美因茲〉只不過是柏林反動派企

图……把我們徒手交給……軍隊去擺布的龐大計劃的一部分。”³⁴⁸

Eh bien, Messieurs, qu'en dites-vous maintenant? [先生們，你們對這一點有什麼可說的呢?]

至於我們的傾向，難道政府過去不知道嗎？難道我們不會向陪審法庭聲明過：現時“報刊的任務是破壞現存制度的一切基礎”^①？至於霍亨索倫藩臣，那末請讀一讀 1848 年 10 月 19 日的“新萊茵報”，那里這樣寫道：

“國王是始終如一的。遺憾的是，三月事件把這塊倒霉的紙片置於陛下和人民之間，不然的話國王就會永遠是始終如一的了。看來目前陛下又要像三月事件以前那樣相信斯拉夫民族的‘鐵蹄’的威力，而維也納人民也許就是把鐵變成粘土的魔術家。”³⁴⁹

Est-ce clair, Messieurs? [明白了嗎？先生們。]

而“社會共和國”呢？難道我們只在“最近幾號”“新萊茵報”里才宣布過它嗎？

對那些沒有看出我們關於歐洲運動的全部議論和報道都貫穿着一條“紅”綫的蠢人，難道我們沒有用坦率明確的語言說過嗎？

在 11 月 7 日的“新萊茵報”上我們可以讀到：“就算武器能幫助反革命在全歐洲復活起來，金錢也會促使它在全歐洲死亡。歐洲的破產，國家的破產，注定要把它的勝利化為烏有。刺刀尖碰上了尖銳的‘經濟’問題也會變得像軟綿綿的燈芯一樣。但是發展的進程將不會等待歐洲各國轉給歐洲社會的期票的支付日期。

在巴黎，六月革命會給以致命的反擊。隨着‘紅色’共和國在巴黎的勝利，軍隊將從各國的內地調到邊境並越過邊境，而各個斗

① 見本卷第 278 頁。——編者注

爭的黨派的真正力量也將赤裸裸地暴露出來。那時我們會想起六月和十月，並且也會高聲喊道：

Vae victis!〔戰敗者罪該萬死！〕

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後的無結果的屠殺，二月和三月以後的無止境的殘害，——僅僅這種反革命的殘酷野蠻行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個方法可以縮短、減少和限制舊社會的凶猛的垂死掙扎和新社會誕生的流血痛苦，**這個方法就是實行革命的恐怖。**”³⁵⁰

Est-ce clair, Messieurs?

我們从一开始就認為隱瞞我們的觀點是多餘的。有一次，我們在和地方檢察機關爭論的時候，曾大聲地宣布過：

“‘新萊茵報’的真正的反對立場將在三色共和國的時代開始。”³⁵¹

要知道，在當時我們是和檢察機關說話的呀！我們用下面的話總結了舊的1848年（見1848年12月31日的“新萊茵報”）：

“普魯士資產階級以及一般德國資產階級從三月到十二月的歷史證明：在德國不可能發生純粹資產階級的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君主立憲式的資產階級政權，可能發生的不是封建專制的反革命，就是社會共和的革命。”^①

試問，難道只是在“最近幾號”“新萊茵報”里我們才認為必須明顯地以社會共和的精神發表言論嗎？難道你們沒有讀過我們關於六月革命的文章，難道六月革命的灵魂不就是我們報紙的灵魂嗎？

① 見本卷第146頁。——編者注

那末你們干嗎要玩弄虛偽的詞句，制造荒唐的借口呢？

我們鐵面無情，但也不向你們要求任何寬恕。當輪到我們動手的時候，我們不會用虛偽的詞句來掩飾恐怖手段。但是保皇恐怖主義者，上帝和法律所寵愛的恐怖主義者，在實踐上是殘酷的、卑鄙的、下流的，在理論上是胆怯的、隱諱的、虛偽的，而在这兩方面都是無耻的。

普魯士政府的命令荒唐到如此地步，竟說“新萊茵報”總編輯卡爾·馬克思“粗暴地破壞了外人待遇法”。

外人待遇法是厚顏無耻的侵略者 Vorder-Russen（博魯士）^① 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給我們萊茵省居民欽定的，“新萊茵報”的確“粗暴地”破壞了這個外人待遇法。我們覺得，我們應該因此受到萊茵省的感激。我們拯救了我們祖國的革命榮譽。今後，在萊茵省享受充分公民權的將只有一家“新普魯士報”了。

在臨別前，我們謹向讀者再提一下我們新年號上的一句話：

“法國工人階級的革命起義，世界大戰——

這就是 1849 年的前景。”^②

看吧，在東方，由各民族的戰士組成的革命軍已經同以俄國軍隊為代表的、聯合起來的舊歐洲相對峙，而巴黎已經出現了“紅色共和國”日益逼近的徵兆！

卡·馬克思寫于 1849 年 5 月 18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5 月 19 日“新萊茵報”
第 301 號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① 翻譯不出的雙關語：馬克思以諷刺的口吻稱普魯士人為《Vorder-Russen》（拉丁文是《Borussi》）。——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175 頁。——編者注

*匈 牙 利

科倫 5 月 18 日。正当匈牙利战争随着俄国人的实际干涉而变成欧洲战争的时候，我們被迫停止对战争今后进程的报道。現在只好再次向我們的讀者概要地評述一下这个偉大东欧革命战争的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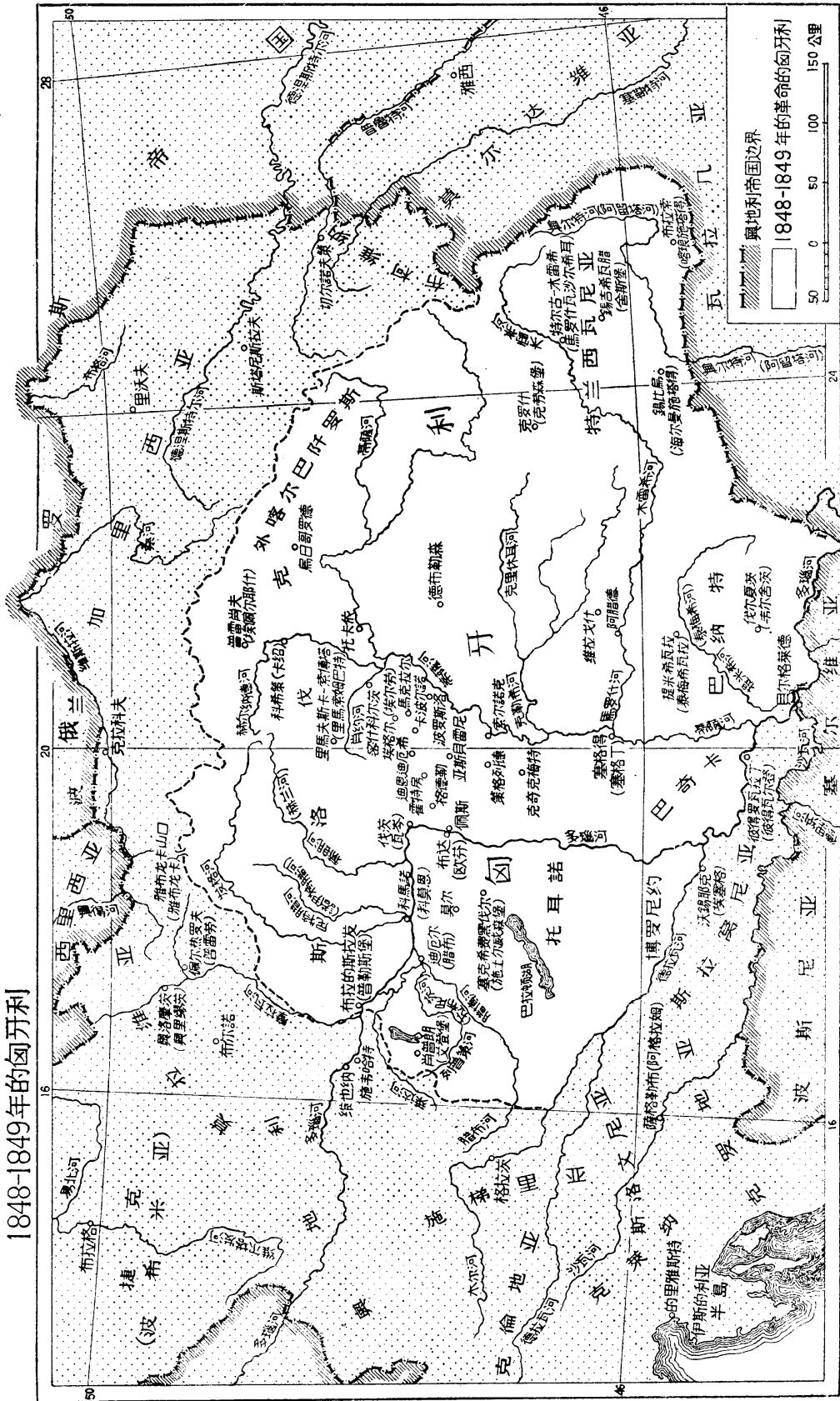
記得还在二月革命以前，即 1847 年秋天，科苏特所领导的普勒斯堡議會就通过了一系列革命的決議，如关于地产出卖权、关于农民迁徙自由、关于贖买封建义务、关于解放犹太人、关于各階級同等課稅等決議。議會还允許克罗地亚和斯拉窝尼亚的居民在內政方面正式使用他們本民族的語言。最后，在巴黎开始二月革命的那一天（2 月 22 日），議會要求成立单独的匈牙利責任內閣，从而迈出了匈牙利和奧地利分离的第一步。

二月革命爆发了。結果維也納政府对匈牙利人的要求的抗拒被摧毀了。在匈牙利革命的第二天（3 月 16 日），維也納政府同意成立独立的匈牙利內閣，因而匈牙利和奧地利之間的关系也就縮小为君合國^①了。

匈牙利独立以后，匈牙利革命就立刻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取

① 君合國——即两个国家由同一君主統治，但两国之內政外交各自独立。——譯者注

1848-1849年的匈牙利



消了一切政治特权，实行了普选制，在国家补偿的条件下，无偿地廢除了一切封建义务——徭役和什一稅，并且同特兰西瓦尼亚建立了联盟。科苏特被任命为財政部长，叛变的总督耶拉契奇被免职了。

同时奥地利政府又开始恢复元气。在維也納的假責任內閣仍旧軟弱无力的时候，音斯布魯克宮廷的权奸依靠在意大利的奥皇軍隊，利用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維亚人的民族要求，利用卢西农民根深蒂固的狹隘性，却愈益加强起来了。

6月17日，塞尔維亚人在宮廷的金錢和密使的帮助下在巴納特和巴奇卡举行了暴动。6月20日，耶拉契奇在音斯布魯克覲見了奥皇，并重新被任命为总督。他回到克罗地亚以后，就拒絕服从匈牙利政府，并于8月25日向它宣战。

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奸的背叛行为是非常明显的。匈牙利人曾再度企图使奥皇回到宪法的軌道上来。他們曾派出一个二百名議員的代表团到維也納去，奥皇却支吾其詞。憤激情緒增长了。人民要求保证，并力主更換內閣。于是混进佩斯內閣的叛徒被清除出去了，9月20日科苏特被任命为总理。但是才过四天，奥皇的全权代表、督軍斯蒂凡大公就逃到維也納去了。26日，奥皇发布了众所周知的致匈牙利人的声明，声明中宣布匈牙利內閣为叛乱內閣，予以撤銷，同时任命仇恨匈牙利的耶拉契奇为匈牙利的执政者，企图消灭匈牙利革命最重要的成果。

这个沒有任何一个匈牙利部长签署的声明曾被科苏特宣布无效。

同时，耶拉契奇利用匈牙利軍官团和总參謀部——名义上是匈牙利的，实际上是前奥皇的——中的紊乱状况和叛变行为，乘机

推进到了施土尔威森堡^①。在这里，匈牙利军队虽然有許多指揮人員叛变，但是仍然击潰了耶拉契奇，并乘胜追入奥地利境内，直抵維也納城下。奥皇和老卖国賊拉图尔决定派兵增援耶拉契奇，决心在德国和斯拉夫军队的帮助下重新征服匈牙利。可是10月6日維也納革命爆发了，奥皇的計劃暂时沒有得逞。

科苏特立刻率領匈牙利军队去援助維也納人。但是由于維也納国会不坚决和他手下的軍官們的叛变，以及他这支大部分由民团編成的军队組織不佳，使他停滯在萊达河附近，无法疾速前进。在那里他不得已逮捕了一两百名軍官，將他們押回佩斯，还枪决了其中的一些人。在这以后，他才决定轉入进攻。可是已經迟了：維也納已經陷落，匈牙利的未受过訓練的民团也在施韦哈特附近被奥地利的正規軍击退。

奥皇军队与匈牙利军队之間六个星期沒有发生軍事行动。当双方军队都在竭力加强自己兵力的时候，奥里繆茨的权奸实行了蓄謀已久的政变。他們迫使因向革命让步而危及自己地位并已毫无用处的白痴斐迪南退位，然后讓他們的工具——索菲婭的儿子，年輕的弗兰茨-約瑟夫登上了皇位。佩斯議會根据匈牙利的宪法，不承认这次皇位更迭。

在12月中旬，軍事行动終于又开始了。在这以前，奥皇军队几乎已包圍了匈牙利。現在从四面八方同时发动进攻。

最高統帅文迪施格雷茨亲自率領至少有九万人的三个軍，从奥地利出发向多瑙河以南推进。努根特率領将近两万人从施梯里亚沿德拉瓦河左岸前进，达倫率領一万人从克罗地亚沿德拉瓦河

① 匈牙利称作：塞克希費黑伐尔。——編者注

右岸向巴納特前进。已經在巴納特作战的，有几个边屯团、泰梅希瓦拉^①的警备部队、克尼查宁的塞尔維亞民团和塞尔維亞輔助軍，共計有三四万人，由泰奧多罗維奇和卢卡文納指揮。在特兰西瓦尼亚，駐有普赫納所率領的两万至两万五千人以及由布柯維納侵入的馬尔科夫斯基所率領的一万至一万五千人。最后，施利克率領两万至两万五千人，从加里西亚向蒂薩河上游进攻。

可見，奧皇軍隊至少有二十万，其中大部分都是参加过战斗的，而曾經在南方和特兰西瓦尼亚参加过战斗的斯拉夫、羅馬尼亞和薩克森的民团和国民自卫軍还没有計算在內。

匈牙利能用来同这支强大兵力对抗的大概总共只有八九万受过訓練的部队，其中有两万四千人曾在奧皇軍隊中服过役，此外有五六万是組織得最差的匈牙利志願兵和民兵，并且这支軍隊的指揮官大部分都像科苏特在萊达所逮捕的軍官們一样，是一些叛徒。

但是，在受暴力鎮压的奥地利目前已无法再多征到一名新兵了，奥地利在財政方面已經破产，几乎沒有錢了，而匈牙利人却还拥有丰富的資源。匈牙利人由于民族自豪感而更加强烈起来的为爭取自由而斗争的热忱，一天比一天高漲，他們为科苏特提供的志願兵，其数目之多，对于一个五百万人的小民族来说是前所未聞的。匈牙利的印刷机为科苏特提供了用之不竭的貨幣来源，每一个匈牙利人都把这些国家发行的紙币当作硬銀币使用。制造枪炮的工厂都在开足馬力进行生产。軍隊所缺少的，只是武器、經驗和优秀的指揮官，这一切必須在几个月之內准备出来。因此，問題只是在于爭取時間，誘使奧皇軍隊深入腹地，在那里它会被不断的游

① 羅馬尼亞称作：提米希瓦拉。——編者注

击战拖得精疲力尽，并且由于必須在自己的后方留下强大的警备部队及其他部队而遭到削弱。

这也就是匈牙利人采取下面計劃的原因：慢慢退到腹地，在經常的小战斗中訓練新兵、在万不得已时，就在自己和敵軍之間沿蒂薩河設防，这里遍布着难以通行的沼澤，这是圍繞匈牙利国土核心地帶的天然屏障。

根据一切推測，即使奧軍有优势兵力，匈牙利人也可以在普勒斯堡^①和佩斯之間的地區堅守两三个月。但是严寒已經到来了，所有的江河和沼澤有好几个月要冻结，其冰层之厚甚至連重炮也能通过。这就使得一切有利于防御的地形条件都丧失了；匈牙利人构筑的一切防御工事都变成无用之物，并且有被包抄的危險。果然不出所料，不到二十天功夫，匈牙利軍隊就由艾登堡^②和普勒斯堡敗退到腊布^③，由腊布退到莫尔，又由莫尔退到佩斯，甚至于被迫退出了佩斯，实际上在战役一开始时就已經退到蒂薩河东岸去了。

其余几个軍也遭到了与主力軍同样的命运。在南方，努根特和达倫对匈牙利人所占据的埃塞格^④不断加强攻势，塞尔維亞人也越来越逼近馬罗什河防綫。在特兰西瓦尼亞，普赫納在馬罗什瓦沙尔希耳^⑤附近同馬尔科夫斯基会师。在北方，施利克由喀尔巴阡山推进到了蒂薩河边，并越过密什科尔茨同文迪施格雷茨建

① 斯洛伐克称作：布拉的斯拉发。——編者注

② 匈牙利称作：肖普朗。——編者注

③ 匈牙利称作：迪厄尔。——編者注

④ 塞尔維亞称作：沃錫耶克。——編者注

⑤ 羅馬尼亞称作：特尔古-木雷希。——編者注

立了联系。

看来奥军差不多要扑灭匈牙利的革命了。三分之二的匈牙利和四分之三的特兰西瓦尼亚成了奥军的后方，而匈牙利人在正面、两翼和后方同时受到了打击。再前进若干德里，奥皇各军就会連結成一个愈来愈小的包围圈，而匈牙利在这个包围圈里会像让巨蟒纏住一样，被窒息而死。

现在的任务是，当蒂薩河障地暂时还是敌人从正面无法逾越的障碍的时候，从各方面来改善自己的阵势。

这一点已从两方面作了：在特兰西瓦尼亚是由貝姆作的，在斯洛伐克是由戈尔盖作的。他们两人都进行了机动，这些机动表明了他们是当代最有天才的统帅。

貝姆于12月29日到达克劳森堡^①，这是特兰西瓦尼亚境内还留在匈牙利人手中的唯一据点。他在这里迅速集中了自己所率领的增援部队以及被击溃的匈牙利军队和塞克列人³⁵²的军队的残部，向馬罗什瓦沙尔希耳进攻，击溃了奥军，驅逐了馬尔科夫斯基，先是越过喀尔巴阡山，把他赶到布柯維納，又由那里赶到加里西亚，一直赶到斯塔尼斯拉夫。然后，他迅速地折回特兰西瓦尼亚，开始追击在退却中停留在距海尔曼施塔特前面几德里路地方的普赫納。经过几次小战斗和向各个方向疾进以后，除了海尔曼施塔特和喀琅施塔得^②两个城市以外，整个特兰西瓦尼亚都落到了貝姆手中。如果不是引进俄军的话，这两个城市也被攻下来了。对方由于一万名俄国辅助部队的增援而占了优势，才迫使貝姆退到塞克列人的地区。在那里他着手組織塞克列人的起义，当他成

① 羅馬尼亚称作：克罗什。——編者注

② 羅馬尼亚称作：錫比烏和布拉索。——編者注

功以后，他就让推进到舍斯堡^①的普赫納去同塞克列民团周旋，自己則繞过普赫納的陣地，直取海尔曼施塔特，赶走了俄軍，击潰了跟踪而来的普赫納，然后向喀琅施塔得推进，不費一枪一彈就占領了喀琅施塔得。

这样就夺取了特兰西瓦尼亚，并解放了匈牙利軍隊的后方。由蒂薩河所构成的天然防綫，現在又有了由齐普斯到巴納特边界的喀尔巴阡山脉和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作为自己的延續和补充。

与此同时，戈尔盖在匈牙利的西北部进行了同样的胜利进军。他率領一个軍由佩斯突圍到斯洛伐克后，在两个月当中使从三面向他攻击的圭茨、乔里奇和西姆尼奇三个將軍的一个軍胆战心惊。当他能面对着敌人的优势兵力无法扼守自己的陣地时，他就冲过喀尔巴阡山，到了埃佩尔耶什和卡紹^②。他在这里繞到了施利克的后方，迫使施利克迅速放棄自己的陣地和整个作战基地，向文迪施格雷茨的主力軍方面退却。戈尔盖則沿着赫尔納德河向蒂薩河进发，与匈牙利的主力軍会合了。

这支現在由邓宾斯基指揮的主力軍也渡过了蒂薩河，全綫击退了敵軍，并推进到了离佩斯六德里的霍特房。但是敌人在这里集中了强大的兵力，这又迫使匈牙利軍隊退却。匈牙利軍隊經過在卡波尔諾、馬格拉尔和波罗斯洛附近的激烈防御战以后，再次退过蒂薩河，这时戈尔盖也正好接近蒂薩河边的托卡依。这两个軍的会合，成了匈牙利人再次发动强大攻势的信号。从后方开来了剛訓練出来的新兵——匈牙利作战部队的援兵。編成了几个波兰

① 羅馬尼亚称作：錫吉希瓦腊。——編者注

② 斯洛伐克称作：普列紹夫和科什澤。——編者注

軍和德国軍，培养和招收了一批有才干的指揮官；突然間，与奥皇軍隊相对垒的，已不是 12 月作战时那种缺乏领导的和缺乏組織的烏合之众，而是集中的、勇敢的、众多的、組織得很好并且有卓越指揮的軍隊了。

匈牙利軍隊分三个軍渡过了蒂薩河。右翼(戈尔盖)向北面推进，在埃佩尔耶什附近迂迴以前追击自己的朗堡师，并迅速把它赶到里馬索姆巴特^① 那边的奥皇主力軍方面去了。奥皇主力軍在埃爾勞^②、迪恩迪厄希、格德勒和霍特房附近被邓宾斯基所击潰，并仓卒地退向佩斯。最后，左翼(費特尔)把耶拉契奇逐出克奇克梅特、索尔諾克和策格列德后，就在亚斯貝雷尼附近将其击潰，迫使他也向佩斯城退却。在这里，奥皇軍隊沿多瑙河配置在由佩斯到瓦岑^③ 一綫，而馬扎尔人則对它构成了很大的半包圍圈。

为了使佩斯不遭到布达方面的炮击，匈牙利人采取了他們行之有效的办法——多用机动，少用正面硬攻来把奥軍趕出陣地。戈尔盖攻克了瓦岑，并把奥軍击退到了赫兰河和多瑙河以西，在赫兰河和諾伊特腊河^④ 之間击潰了沃尔格穆特，从而解救了被奥皇軍隊包圍的科莫恩^⑤。奥皇軍隊由于退路受到威胁，不得不仓卒撤退。新任总司令韦尔登已向腊布和普勒斯堡方面退却，而耶拉契奇为了安定他手下的极端頑固的克罗地亚人，不得不仓卒地率領他們順多瑙河而下，退往斯拉窩尼亚。

① 斯洛伐克称作：里馬夫斯卡-索博塔。——編者注

② 匈牙利称作：埃格尔。——編者注

③ 匈牙利称作：伐茨。——編者注

④ 斯洛伐克称作：赫朗和尼特腊。——編者注

⑤ 匈牙利称作：科馬罗姆。——編者注

在与其說是退却，不如說是竄逃的过程中，韦尔登（特别是在施利克指揮下的后卫部队）和耶拉契奇还遭到了一系列的惨敗。当耶拉契奇軍緩慢而吃力地冲过托耳諾和博罗尼約两州的时候，韦尔登得到了在普勒斯堡收集殘部的机会，这些殘部已根本没有什么大的战斗力了。

与匈牙利人对奥地利主力軍获得这些惊人胜利的同时，摩里茨·佩尔采尔由塞格丁^①和托耳諾向彼得瓦尔登^②推进，解除对它的圍困，占領了巴奇卡，攻入了巴納特，以便在这里同由特兰西瓦尼亚向前推进的貝姆会师。貝姆已經攻克了阿腊德，包圍了泰梅希瓦拉。佩尔采尔配置在紧靠土耳其边界的韦尔舍茨^③，所以巴納特在几天之內就被攻占了。在这同时，塞克列人掩护着特兰西瓦尼亚各个設防的山口，民团則掩护着上匈牙利的各个山口，而戈尔盖率領大軍駐守在通往莫拉維亚-加里西亚的雅布龙卡山口。

总而言之，再过几天，无往不胜的馬扎尔軍隊就会驅赶着强大的奧軍的殘部，胜利地进入維也納，并且永远消灭奥地利君主制度。

匈牙利与奥地利的分离，早于4月14日在德布勒森就决定了。与波兰人的联盟，在1月中旬也已公开宣布，并且由于有两三万波兰人参加匈牙利軍隊而成了现实。从10月6日維也納革命和施韦哈特会战时起即已存在的与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的联盟，也因德意志軍团参加匈牙利軍隊、和当时的战略形势与政治形势而保持住了，当时的形势迫使馬扎尔人必須攻占維也納，使奥地利革命

① 匈牙利称作：塞格得。——編者注

② 塞尔維亚称作：彼得罗瓦拉丁。——編者注

③ 塞尔維亚称作：伐尔夏茨。——編者注

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們所宣布的独立得到承认。

这样,匈牙利战争很快就失去了它最初所具有的民族性质,正因为它的看起来是纯粹民族的行动,正因为宣布独立,这次战争才具有了真正全欧的性质。为了两国的解放而与波兰成立的联盟,为了德国东部的革命化而与德国人成立的联盟,只有在匈牙利与奥地利分离、从而宣告奥地利君主制度解体的时候,才固定下来,并获得坚固的基础。匈牙利独立、波兰复兴、德意志奥地利成为德国的革命中心、伦巴第和意大利取得独立,——如果这些计划得以实现,那末整个东欧国家的体系就会完全瓦解:奥地利会消失,普鲁士会被融化,而俄国会被排挤到亚洲边界。

所以神圣同盟一定要竭尽全力来堵塞具有威胁性的东欧革命的道路。俄国军队已逼近特兰西瓦尼亚和加里西亚的边境。普鲁士已占领波希米亚-西里西亚的边境,并让俄军通过自己的领土进入普雷劳^①,几天之后,俄国的第一个军就驻扎在莫拉维亚的领土上了。

匈牙利人清楚地知道,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将要对付人数众多的新开到的军队,因此没有像最初所预期的那样迅速地向维也纳推进。维也纳也像佩斯一样,他们如果不对市区进行炮击,是不能用正面攻击攻克的,可是炮击又没有可能。像在佩斯一样,他们又要被迫采取迂回运动,但是这需要时间,需要确信自己的两翼和后方不受威胁。可是恰好这时他们后方受到俄军威胁。另一方面,如果直取维也纳,预料将受到拉德茨基部队猛烈的攻击。

因此,匈牙利人这样做是非常聪明的:他们不急于进攻维也

^① 捷克称作:佩尔热罗夫。——编者注

納，而只是加紧肃清匈牙利境內的奧皇軍隊，从小喀尔巴阡山到施梯里亚的阿尔卑斯山脉坡地构成一个很大的弧形来包圍奧皇軍隊，派出一个加强軍把守住雅布龙卡，在加里西亚各山口上构筑了工事，封鎖了这些山口，扩大了对布达的攻势并且迅速征集了二十五万新兵（特別是在新占領的西方各州中）。他們这样做，就保证了两翼和后方的安全，并且建立了軍隊，这种軍隊不会害怕逼近的俄国援兵，就像以前不害怕那么庞大的奧皇軍隊一样。这支著名的黑黃軍隊^①进入匈牙利的时候是二十万人，而回去的时候恐怕还不到五万人；其余的死的死、伤的伤、病的病、被俘的被俘，或者投到匈牙利人方面去了。

不錯，俄国人会派出更庞大的軍隊；預期将調来十二万人，而据另一些消息說，将調来十七万人。根据“的里雅斯特自由港”的报道，野战軍隊远远超过五十万人。但是俄国人好夸大是众所周知的：在所举出的数字中通常只有一半列在花名册上，而被列在軍册上的人数真正在队伍中的又不到一半。如果除了占領波兰所必需的軍隊之外，俄国援軍的实际人数能有六七万人的話，奥地利就很滿意了。而这样一个数目，匈牙利人是能对付得了的。

1849年的匈牙利战争与1830—1831年的波兰战争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前者与后者不同之处，就在于当时对波兰人不利的一切情况，現在都对匈牙利人有利。大家知道，列列韦尔当时曾坚持下面两点而沒有成功：第一，要以解放农民和犹太人的办法来使居民群众依附革命，第二，要以在整个旧波兰发动起义的办法来使参加瓜分波兰的三个强国卷入战争，并使战争成为欧洲的战争。当

^① 指奧皇軍隊，因为他們的兵士的領章、衣領和折袖都是黑黃两色的，所以称为“黑黃軍隊”。——譯者注

时在波兰实行得太迟的事情，匈牙利人一开始就做了。国内社会关系的革命，消灭封建制度是匈牙利的第一个措施。吸引波兰和德国参战是第二个措施，从而使欧洲战争成了事实。随着俄国的第一个军踏上德国领土，欧洲战争就开始了，而随着法国的第一个营进入德国的领土，这个战争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就要到来。

正是由于匈牙利战争成了欧洲战争，它就同欧洲运动的其余一切因素相互作用。它的进程不仅影响着德国，而且也影响着法国和英国。决不能期望英国资产阶级会容忍俄国把奥地利变为它的一个省。同样毫无疑问，法国人民看到反革命日益逼近法国边境，也不会置之不理。不管法国的选举结果如何，军队都会赞成革命。而目前，问题决定于军队。如果军队希望战争，——而军队是希望战争的，——那末战争就会发生。

战争就要爆发。巴黎革命行将到来——不管这是由于选举的结果，还是由于已经发生的军队同革命政党在选举投票箱旁举行了联欢的结果。在未来的德国革命军队的核心正在南德意志形成，因而妨碍普鲁士积极参加匈牙利战争的时候，法国正在准备积极参与斗争。问题将在几个星期之内，也许将在几天之内决定。不久之后，法国的、匈牙利—波兰的和德国的革命军队就要在柏林城下的战场上庆祝自己的友好节日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18 日

载于 1849 年 5 月 19 日“新莱茵报”
第 30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告我的人民”

科倫 5 月 18 日。“告我的人民！”不是“我的英勇軍隊！”俄国人真的被擊敗了嗎？難道風向變了，又像去年 3 月那樣把“未被削弱的”俄国奴僕头上的軍帽吹掉了嗎？難道处于戒严状态中的“順民”的总起义又爆發了嗎？

1813 年，“已长眠地下的”老头儿^①也从哥薩克的推进中吸取了足够的勇气，来結束他所扮演的可怜的懦夫角色以及对革命帝国的血腥懲罰；那时尽管有哥薩克、巴什基里亚人和由于耶拿和馬格德堡两次战役以及尤斯特林举城向一百五十个法国人投降事件³⁵³而聞名的“英勇軍隊”，然而，只是由于“告我的人民书”許下的虛伪諾言，才使神圣同盟反对法国革命继承者的十字軍征討成为可能。而現在呢？難道哥薩克侵入德国領土沒有使恢复了元气的霍亨索倫增加勇气来拒絕他在三月战斗以后所扮演的懦夫角色，来廢除革命“在他和他的人民之間”所放置的那“一块紙片”嗎？難道“我的英勇軍隊”沒有在德勒斯頓、布勒斯勞、波茲南、柏林和萊茵河流域勇敢地用榴霰彈和硝酸銀殘杀手无寸铁的人們、妇女和儿童，以此来向革命进行报复嗎？

難道不久前欽定的軍法宪章不是“甚至不用戒严”就把 3 月間

①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編者注

作出的最后一些胆怯的让步——廢除书报檢查、結社自由和武装人民——重新取消了嗎？

不，尽管有了同哥薩克的联盟，尽管授予了橫行霸道的“英勇”兵痞进行屠杀和設立战地法庭的特权，但是，耶拿和馬格德堡的英雄的儿子仍然感到不够安全。未被削弱的国王非常恐惧，他下詔“告我的人民”，他“感到不得不”还要向被蹂躪的、备尝戒严之苦的和遭到霰彈射击的“人民”呼吁，請他們支持王室反抗“国内外敌人”。

“值此严重关头，普魯士所負之使命乃在保卫德意志，使之免遭国内外敌人之侵襲。为此，我今曉諭万民枕戈以待。事关我国以及有賴我国援助之其余德意志諸邦秩序之恢复与法紀之整飭。事关建立德意志之統一，捍卫其自由，以防奸党之恐怖統治，該党为謀一己之私利，不惜置道德、荣誉、忠誠于不顾，并已使部分国民墮入其謊言与欺騙之迷网。”

“圣諭的实质即在于此”，——警察局恶棍杜蒙这样叫喊道。的确，警察局收买的杜蒙的捧場者找到了真正的“实质”。

“国外的敌人”！对于勇敢的霍亨索倫說来，这是“恐怖党”，阴森可怕的党^①，它使得我們有必要侵入“其余德意志諸邦”。萊茵省、西里西亚和薩克森的人民被号召“为了德意志的統一”，結束其他德意志諸邦，如巴登、巴伐利亚、薩克森等的革命运动！为此目的，霍亨索倫在1813年恩賜給人民的誘餌又重新抛出来了，經過考驗的“皇上的金口玉言”又被当作可靠保证，向“国民”允諾了对法兰克福宪法的有名无实的承认，以及保障权利和自由不受“无神論者”的侵犯。“我与朝廷願效命上帝。”难道作为保证的經過考驗

^① 俏皮話，德文原文是：《Schreckenspartei》（“恐怖党”）和《Partei des Schreckens》（“阴森可怕的党”）。——編者注

的“霍亨索倫皇上的金口玉言”不值得进行一次十字軍征討来反对那个“对于大有希望的国王說来阴森可怕的党”嗎？

俄国皇帝的强大藩臣把普魯士代表从法兰克福召回，只是为了在現在按照自己的三月諾言“称霸德意志”。協商議會和欽定議院被驅散了，“一块紙片”为軍法宪法和劊子手的軍事法庭所代替了，这一切只是为了保证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能够得到“保障”！

出版自由遭到踐踏，在爱尔福特报刊受到檢查，在整个波茲南、布勒斯劳以及西里西亚各个省会报纸干脆被查封了，就像“国民报”在柏林被查封一样。在杜塞尔多夫 de jure [在法律上]重新实施书报檢查，de facto [实际上]报刊已完全被取締了(杜塞尔多夫各报纸、“新萊茵报”，等等)。最后欽賜給“自由”臣民的只有卑鄙无耻的作为警察局爪牙的“科倫日报”和柏林的該受絞刑者的小报^①。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人们不致对“皇上的金口玉言”的价值产生絲毫怀疑！

的确，霍亨索倫的話值得黎民百姓为了加强国王的勇气去穿上軍装，值得独守空房的妻子根据后备軍法按月領取皇上恩賜的一个塔勒，“以免貧困”。

写于 1849 年 5 月 18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49 年 5 月 19 日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新萊茵报”第 301 号

① 指“新普魯士报”(“十字报”)。——編者注

致科倫工人

在臨別前，我們提醒你們不要在科倫進行任何變亂。在科倫軍事管制狀態下，你們會遭到悲慘失敗的。從愛北斐特的例子中你們已經看到了，資產階級怎樣要工人去赴湯蹈火，然后又極其卑鄙地出賣他們。科倫宣布戒嚴會使整個萊茵省精神沮喪，而目前你們只要一起义，戒嚴就會成為必然結果。你們的平靜會使普魯士人感到絕望。

“新萊茵報”的編輯們在向你們告別的時候，對你們給予他們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謝。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后一句話始終將是：**工人階級的解放！**

“新萊茵報”編輯部

寫于 1849 年 5 月 18 日

載于 1849 年 5 月 19 日

“新萊茵報”第 301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文章和文件

1849年5月31日—7月

致“法兰克福报”編輯部

請求尊敬的“法兰克福报”編輯部在貴报显著地位用大号字刊登以下的声明；如果这只能按照收費广告的条件办理，那末請把相应的錢数記在“新德意志报”³⁵⁴ 編輯約·魏德迈的賬下。

卡尔·馬克思博士

5月31日于宾根

声 明

“新萊茵报”編輯部认为自己有責任通知自己的通訊員和公众，以“西德意志报”³⁵⁵名义在科倫出版的一家小报跟它毫无关系。下面署名的編輯部同人保留单另通知“新萊茵报”将在何时何地复刊的权利。

“新萊茵报”編輯部

卡尔·馬克思 恩斯特·德朗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斐·弗萊里格拉特 格奥尔格·維尔特 斐·沃尔弗
威·沃尔弗

卡尔·馬克思写于1849年5月31日
声明載于1849年6月2日和7日
“新德意志报”第129和133号，
及1849年6月3日“新科倫报”
第126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手稿

弗·恩格斯

*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起义³⁵⁶

凱則尔斯劳頓 6 月 2 日。德国的反革命报纸千方百计地诽谤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它们毫不害臊地硬说全部起义的目的只不过是耍把普法尔茨、巴登并且间接地把整个德国“出卖给法国人”。他们极力想用这种办法恢复从所谓美好的古老时代就开始了的对法国人的反革命仇恨，并且指望这样会使我们的德国北部和西部的德国兄弟离开我们。但是，不知为什么，恰好那些责难普法尔茨和巴登把自己出卖给法国的极其骯髒、虚伪的小报却拥护俄国干涉匈牙利，拥护俄国军队通过普鲁士，甚至拥护俄奥普之间的新神圣同盟。我们不妨举其中的一家报纸——“科伦日报”来作证明。

总之，如果为了扼杀匈牙利的自由，俄国人踏上德国的土地，踏上普鲁士的土地，那不是叛国！如果普鲁士国王同克罗地亚人和俄国人结成同盟，来用哥萨克的马蹄践踏德国自由的最后残余，那不是叛国！如果我们大家，如果从尼门河到阿尔卑斯山的整个德国被胆怯的暴君出卖给俄国的沙皇，那不是叛国！但是，如果普法尔茨博得法国人民，特别是亚尔萨斯人民的同情，如果它不以愚蠢的自满心推开这种同情的表现，如果它派人去巴黎了解法国的情绪，了解法兰西共和国政治中即将发生的新转变³⁵⁷——那当然

就是背叛祖国，就是叛国，就意味着把德国出卖给法国，出卖给“世世代代的敌人”、“帝国的敌人”！反革命的报纸就是这样议论的。

是的，“天赋的”可尊敬的先生们，普法尔茨和巴登正是采取了这种行动，并且它们丝毫不为自己的行动感到羞愧。是的，如果这是叛国，那末普法尔茨和巴登的全体居民就是由二百五十万国事犯组成的。的确，普法尔茨和巴登的人民不是为了在自由西方和专制东方之间即将开始的伟大斗争中站在暴君一边而进行了革命。普法尔茨的人民和巴登的人民进行了革命，是因为他们不想成为卑鄙地扼杀自由的同谋者，——奥地利、普鲁士和巴伐利亚最近几个月来极其可耻地沾染了这种污点，——是因为他们不容许使他们也成为奴役自己兄弟的工具。普法尔茨和巴登的军队无条件地参加了这个运动；它拒绝了对背信弃义的君主的誓言，像一个人一样转到了人民方面。无论公民或士兵都不愿意同克罗地亚人和哥萨克人一道去反对自由。如果奥里缪茨、柏林和慕尼黑的暴君们还能找到如此堕落的士兵，他们竟愿意把自己同巴什基里亚人、潘都尔兵、克罗地亚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匪徒相提并论，并且跟这一帮野蛮人在同一面旗帜下作战的话，——那会更糟。不管这对我们如何沉痛，我们将不把这些雇佣兵看作是我们德国的兄弟，而把他们看作是哥萨克和巴什基里亚人，我们不管他们的首领是卖国贼——过去的帝国陆军大臣³⁵⁸。

况且在目前，当欧洲的战争、人民的战争正在叩门的时候，谈什么“叛国”及其他像是蠢感家的攻击的那种责难，根本是可笑的。过几个星期，也许只要过几天，共和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的军队就要在德国的土地上进行决战。人家甚至不要征求德国对这点的同意，——请看君主们和资产阶级已使德国落到什么地步！德国

不积极参加战争，战争将不顾它的意志，不容它进行任何反抗而降临到它的身上。多亏三月的执政者、三月的议院，同样多亏三月的国民议会，德国才在即将来临的欧洲战争中处于这种光荣地位。当问题关系到整个欧洲的自由或奴役，幸福或灾难的时候，就根本谈不到德国的利益、德国的自由、德国的统一、德国的福利。所有一切本民族的问题都在这里告终，这里只有一个问题！你是想做自由人，还是愿意忍受俄国的蹂躏？而反革命报纸还在议论什么“叛国”，仿佛很快就将被变成两军争战的消极舞台的德国，还可能用某种方式出卖似的！无庸争辩，去年的情况不同。在去年，德国人能够进行反对俄国压迫的斗争，他们能够解放波兰人，从而把战争转移到俄国的领土上去，靠牺牲俄国的利益来作战。但是现在，多亏我们的君主，战争将在我们的土地上并且靠牺牲我们的利益来进行，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欧洲的解放战争对德国来说同时又将是国内战争，德国人将在这次战争中自相残杀。

这就是我们君主们的叛卖行为和我们人民代表们的软弱无能所给予我们的恩典，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叫做叛国的话，那末这就是叛国！简言之，在正弥漫全欧的伟大解放战争中，普法尔茨和巴登将站在自由一边反对奴役，站在革命一边反对反革命，站在人民一边反对君主，站在革命的法国、匈牙利和德国一边反对专制的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如果“抱怨派”先生们要把这叫做叛国的话，那末在全普法尔茨和全巴登，谁也不会理睬他们的号叫。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6 月 2 日
载于 1849 年 6 月 3 日“城乡信使”报
第 11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城乡信使”报

卡·馬克思 六月十三日

6月21日于巴黎

你們对巴黎的居民很了解，可以 a priori〔預先〕識破那种說他們怯懦的臭名昭著的責难，认为这是滑稽可笑的。但是我知道，六月十三日事件看起来是根本无法解釋的，尤其在德国是如此，必然有人会利用它来編造形形色色的恶毒謠言。

六月十三日的主要当事人并不是人民，而是“山岳党”³⁵⁹。可是，“山岳党”背后又有秘密委员会³⁶⁰为之撑腰，这个委员会推动“山岳党”前进，并在某种程度上使賴德律-洛兰扮演了主角。

“山岳党”的主要錯誤在于它这样滿怀着胜利的信心，以致希望通过和平的游行示威来获得一切。这样一来，它便使政府有可能不与它作战就赢得对它的胜利。从沙托·得奥街出发通过各条林蔭路的游行队伍完全是赤手空拳的。政府通过密探完全获悉一切詳細情况，便秘密令国民自卫軍、温先猎兵以及其他各部队悄悄地占領了所有重要据点。游行队伍陷入了重重包圍，当时即使他們手持武器，也无法作任何反抗。何况他們都是赤手空拳！預先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的尚加尔涅，非常聪明，沒有下令鳴警報。好像按照魔棍的指示一样，全部有决定意义的据点一下子都被軍隊占領了。由此你們一定明白，赤手空拳的群众便分散到四面八方

去找武器；但是，准备起义用的武器庫已被政府占領，并有軍隊把守。于是，起义便被用陰謀詭計防止了。——这就是在法国革命史上聞所未聞的這一天的全部秘密。也許，你們在德國報紙上看到过关于不費吹灰之力便拿下的**街壘**的消息吧。这些街壘只不过是一些椅子，它們是为了稍微阻擋一下用馬刀乱砍手无寸铁的人們的騎兵而扔在街上的。

六月十三日的可耻結局之所以不可避免，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当賴德律-洛兰和他的同伙正在艺术工艺学校³⁶¹忙于組織临时政府的同一时刻，秘密社会主义委员会也在进行同样的工作。該委员会想宣布自己为公社。这样一来，还在現存政权未被推翻以前，起义就已分裂为两个营壘，而特別重要的是：**人民的政党**并不是“**山岳党**”。单是这一事实本身就能給你們說明許多問題。秘密委员会想在此几天前就开始起义，夜間出动。这样，政府就会措手不及。可是，“**山岳党**”以及与其結成联盟的“**宪法之友**”（“**国民报**”派）³⁶²反对这样做。他們想把主动权操在自己手里。賴德律-洛兰在議会的演說³⁶³应当是“**山岳党**”决定采取重大行动的保证。这样，一方面，挫折了促使立即采取行动的积极力量，准备了和平的游行示威。另一方面，人民看到賴德律-洛兰公然在国民議會中那样大言不慚，便断定賴德律-洛兰同軍隊有密切联系，而且还有深謀远虑的长远計劃等等。但是当发现賴德律-洛兰的强大只不过是一种錯觉，而各項預防措施和进攻行动都只是由政府采取的时候，人民該感到多么驚訝。你們看，这两个革命政党在怎样相互削弱、彼此欺騙。人民对“**山岳党**”，尤其是对賴德律-洛兰在五六月間那种极其曖昧不明的行为的回忆，最后是在工人区特別猖獗的霍乱，完成了其余的一切。总的說来，1849年6月13日只是对

1848年六月的一种报复。那时“山岳党”拋棄了无产阶级，现在无产阶级拋棄了“山岳党”。

不管六月十三日这一天对我们在全欧洲的党来说多么沉痛，这一天还是有积极的东西，即国民議会的反革命政党沒有流很多的血（如果撇开里昂³⁶⁴不算的話）就达到了**独裁**。这个政党不仅将分裂成各个組成部分，而且它的极端派很快就会达到这种状况，即它本身将力图摆脱累贅的共和国外表，那时，你们就会看到，只要輕輕地吹一股風就会把它一扫而光，二月又会重新到来，不过将具有更大的威力。

卡·馬克思写于 1849 年 6 月 21 日

載于 1849 年 6 月 29 日“人民之友”报
第 26 号

署名：卡·馬一思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之友”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在
1955 年“历史問題”杂志
第 11 期

卡·馬克思 致“新聞報”編輯

您在7月26日的“新聞報”上登載了一篇关于我来到巴黎的短評，接着其他各家报纸又逐句地轉載了它。由于这篇文章对一些事实极尽歪曲之能事，所以我不得不写几句话予以回答。

首先，归我所有³⁶⁵并由我担任主編的“新萊茵报”从来没有被封閉过。它由于戒严而停刊了五天。戒严一解除，該报就重新出版，并在以后七个月内繼續出版。普魯士政府看到不可能在合法的基础上封閉該报，于是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手段——排除它的所有人，即禁止我在普魯士居留。关于这一措施是否合法的問題，将由馬上就要召开會議的普魯士众議院予以解决。

我被禁止在普魯士居留以后，起初到了黑森大公国，在那里也和在德国其余各地一样，我并没有被禁止居留。我来到了巴黎，但决不是如貴报所断定的那样作为流亡者而来的，而是完全自願来的，我手头有完全有效的护照，并且所抱的唯一目的是为我在五年前就已动笔編写的一部政治經濟学史再多收集一些材料。

我也沒有接到立即离开巴黎的命令；我有時間来向内政部长提出抗議。我已提出这个抗議，并在等待它的結果³⁶⁶。

此致敬礼

卡·馬克思博士

写于1849年7月27日左右

原文是法文

載于1849年7月30日“新聞報”

俄文譯自“新聞報”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遺稿

卡·馬克思 工 資³⁶⁷

[A]

下列各点已經闡明：

(1) 工資 = 商品的价格。

因此, 工資的确定大体上是与一般的价格的确定相一致的。

人的活动 = 商品。

生命的表現——生命活动——只是手段；与这种活动分开的生存才是目的。

(2) 和商品一样, 工資是由竞争决定的, 是由需求和供应决定的。

(3) 供应本身取决于生产費用, 即取决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時間。

(4) 利潤和工資成反比。其經濟生活表現在利潤和工資中的两个階級的对立。

(5) 爭取提高或降低工資的斗争。工人的联合。

(6) 劳动的平均价格或正常价格(最低工資)只是对工人階級而不是对个别工人发生效力的。工人們为保持工資而联合起来。

(7) 取消賦稅和保护關稅, 縮減軍隊等对工資的影响。平均确定的最低工資 = 必需的生活資料的价格。

[B]

补 充

I. 阿特金森

1. *Handloomweavers* [在手織机上工作的紡織工人]。(每天工作十五小时。)(这种工人有五十万。)³⁶⁸

“手工織工所处的貧困状态是所有从事这类劳动的人的必然遭遇,因为这种劳动容易学会,而且常有被較便宜的生产資料所排挤的危險。在供应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需求的暫時縮减就要引起危机。一个劳动部門变得无用而另一个劳动部門又随之产生,这种情况会招致暫时的苦难。以印度达卡地区的手工織工为例:由于英国机器的竞争,他們不是餓死,便是被迫返回农业生产。”(摘自 1835 年 7 月包林博士在下院的演說。)³⁶⁹

(利用这个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轉移的例子来与糟透了
的自由貿易論者論战。³⁷⁰)

2. 关于人口論再談几句。

3. 分工的变化和更加細密对确定工資的影响。

II. 卡萊尔

1. 不仅应当考虑 wages [工資] 的数量。在质量方面它也发生变化,由意外的情况所决定。

2. 工資的优点是:只有必要性、利益、生意才把工人和雇主連結起来。已經絲毫沒有像中世紀那种宗法制的东西了。

济貧法,消灭鼠患, chargeable labourers³⁷¹。

3. 絕大部分劳动不是 skilled labour [熟练劳动]。

4. 馬尔薩斯主义者和經濟学家們的全部理論归納起来是：工人节制生育，就能縮减需求。

III. 麦克庫洛赫

“工人所掙得的日工資，等于叫做人的机器的所有主所获得的普通利潤量，这里还包括为了 to replace the wear and tear of the machines [补偿机器的損耗]，也就是为了以新工人代替老工人和已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所必需的款額。”³⁷²

IV. 約翰·威德

1. “如果目的是要使工人成为能够在該項工作中提供最大量劳动的机器，那末，更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分工了。”³⁷³

2. 工資的降低就使得工人不是减少自己的开支，便是提高自己劳动的生产率，例如，在使用机器的工厂中（一般情况也是如此），他們要工作更多的时数，或者——手工业者、手工織工等——在同一小时内要生产更多的东西。而正是由于他們的工資降低了，因为需求縮减了，所以他們是在不利的时刻增加供应量。結果工資更加降低，而資產者随后赶來說道：“要是只这些人希望工作才好呢！”

3. 一般說来，不能有两种市場价格，正是更低的市場价格（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占上風，这是普遍規律。

假定有一千个同样熟练的工人；五十个失业；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不是由九百五十个在业者决定，而是由五十个失业者决定的。

但是，这种市場价格規律对劳动这一商品比对其他商品的影

响更加厉害,因为工人不能把自己的商品儲藏在仓库里,只能出卖自己的生命活动,否則,就要因失去生活資料而死亡。

劳动这一出卖的商品不同于其他商品的地方,特別在于:它具有暫时的性质,不能把它蓄积起来,它的供应不能像其他产品那样容易增加或减少。

4. 資本家的人道就在于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尽可能多的劳动。农业工人夏季比冬季收入多,虽然冬季他們需要更多的食物和燃料,需要更暖和的衣服。

5. 例如,取消星期日对工人來說,純粹是損失。雇主們竭力这样来降低工資:他們保持工資的名义数額,却强迫工人多劳动比如十五分钟,縮短吃午飯的时间等等。

6. 工資由时尚、季节的更換和商业行情的波动来决定。³⁷⁴

7. 如果一个被机器排挤出去的工人轉到别的劳动部門去,那末这照例是更坏的部門。他永远也不能恢复自己以前的那种状况了。

机器和分工以更低廉的劳动代替高价的劳动。

有人向工人建議:

(1) 开办儲蓄銀行;(2) 尽可能学会各种劳动(这样一来,在一个劳动部門中出現工人供应过剩現象,就会立即波及一切部門)。

8. 在蕭条时期:

(a) 停止工作;(b) 降低工資;(c) 每周的工作日减少,工資照旧³⁷⁵。

9. 关于 combinations of trade [工会組織],應該指出:

(1) 工人的开支(費用)。由于联合的結果而有机器的发明。另一种分工。降低工資。工厂往别的地区 Déplacement [迁移]。

(2) 如果他們全都做到使工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以致使利潤降低到大大低于別国的平均利潤以下或者使資本增長較慢，那末，一国的工業就要破產，而工人就要和僱主一起破產，甚至更坏。

虽然降低某种賦稅不能使工人得到任何好处，可是增加賦稅却損害工人的利益。在資產階級发达的国家中，賦稅增加的好的一面在于：小农和小私有者(手工业者等)会因此而紛紛破產，并被拋入工人階級的队伍。

爱尔兰人在英国，德国人在亚尔薩斯对工資的影响。

V. 拜比吉

*Trucksystem*³⁷⁶.

VI. 安得魯·尤尔³⁷⁷

現代工業的普遍原則：以童工代替成年工，以非熟練工人代替熟練工人，以女工代替男工。

工資平均化。現代工業的主要特征。

VII. 罗西³⁷⁸

罗西先生认为：

工厂主預先支付給工人的只是工人所应得的那部分产品，因为工人不能等到产品出賣。这是一种投机，直接跟生产过程沒有

任何关系。如果工人自己能把自己养活到产品卖出的时候，那末他作为 associé〔股东〕也将得到自己的一份。

所以，工資同資本和土地不一样，它不是产品的构成部分。它只不过是我們社会状态的一种偶然标志，一种形式。工資不包含在資本之內。

工資不是生产所絕對必需的要素。在另一种劳动組織之下，它可能消失。

[VIII.] 舍尔比利埃

1. “生产資本的增加不一定会引起用于工人 approvisionnement〔生活費〕的份額的增加。原料和机器的数量可能不断增加，而用于工人 approvisionnement 的份額則可能日益减少。

劳动的价格取决于：(a) 生产資本的絕對数量；(b) 資本的各种成分之間的对比关系。这是工人的意志不能給予任何影响的两件社会事实。

2. 与其說是工人的**絕對消費量**，不如說是工人的**相对消費量**决定他的生活幸福或是不幸。在必要的消費的範圍以外，我們享受的价值实质上是相对的。”³⁷⁹

在談到工資的降低或提高的时候，永远也不應該忽視整个世界市場和各个国家工人的状况。

制定公平工資的平均主义的和其他的嘗試。

最低工資本身也在变化并愈来愈降低。以燒酒为例。

[IX.] 布雷

儲蓄銀行³⁸⁰

掌握在专制制度和資本手中的一种有三重意义的工具。

1. 货币流回国家銀行，銀行再貸給資本家，賺取利潤。
2. 政府套在工人階級很大一部分人的脖子上的一条金鎖鏈。
3. 此外，經過这种途徑，資本家本人又掌握了一种新武器。

工資一旦降低，就永远不能再提高到原来的水平。絕對工資和相对工資。

[C]

I. 生产力的提高对工資有什么影响？

(見 VI, 3.)^①

机器；分工。

劳动日益簡單化。劳动的生产費用日益减少。劳动变得日益低廉。工人之間的竞争日益加剧。

从一个部門轉向另一个部門。关于这一点，包林博士自己1835年在議會里談到印度达卡地区的手工織工。

工人被排挤出去而从事的新的劳动比以前的更坏；更具有从屬性。成年工的劳动由童工的劳动代替，男工的劳动由女工的劳动代替，較熟练的工人的劳动由不大熟练的工人的劳动代替。

不是增加劳动时数，便是降低工資。

^① 見本卷第 649—654 頁。——編者注

工人之間的競爭，不僅在於一個人把自己賣得比另一個人便宜些，而且在於一個人要做兩個人的工作。

生產力提高的後果一般是：

(a) 工人的狀況與資本家的狀況相比，相對惡化，享受的價值也是相對的。要知道享受本身不是別的，而是社會的享受、關係、對比；

(b) 工人成為愈來愈片面的生產力，它要以儘可能少的時間生產儘可能多的東西。熟練勞動愈來愈變成簡單勞動；

(c) 工資愈來愈以世界市場為轉移，而工人的狀況也愈來愈不穩定；

(d) 在生產資本中，用於機器和原料的份額的增長要比用於工人 *approvisionnement* [生活費] 的份額的增長快得多。所以，生產資本的增加並不使對勞動的需求也相應地增加。

工資取決於：

(α) 生產資本總量；

(β) 生產資本各個構成部分之間的對比關係。

工人對前者 and 後者都沒有任何影響。

(如果沒有工資的波動，工人就不會從文明的發展中得到任何好處，他的狀況就會始終不變。)

關於工人和機器的競爭應該指出，從事手工勞動的工人（例如手工棉織工人）比直接在工廠里做工的使用機器的工人更苦。

新生產力的任何發展同時也成為反對工人的武器。例如，交通工具的一切改進都加劇不同地區工人的競爭，使地方性競爭成為全國性競爭，等等。

一切商品都減價，而最必需的生活資料却不減價，其結果便

是：工人穿上破衣烂衫，他的貧困蒙上文明的色彩。

II. 工人和企业主之間的竞争

(α)为了确定相对工資，應該指出，一个塔勒对于工人和一个塔勒对于企业主有不同的价值。工人不得不以更貴的价格买更坏的东西。他的一个塔勒能买到的商品，不像企业主的一个塔勒所能买到的那样多，那样好。工人不得不成为揮霍者，違反一切經濟原則来进行买卖。这里我們一般應該指出，我們所指的只是一个方面，即工資本身。可是，只要工人开始以自己的劳动价格交換其他商品，对他的剝削就又重新开始。

Epiciers〔小店主〕、当鋪老板、房东——tout le monde l'exploite encore une fois〔所有的人都要再一次地剝削他〕。

(β)企业主掌握着就业手段 [Beschäftigungsmittel]，也就是掌握着工人的生活資料，就是說，工人的生活依賴于他；好像工人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也降低为單純的謀生手段了。

(γ)劳动这一商品与其他商品相比有很大的缺点。对于資本家來說，同工人竞争，只是利潤問題，对工人來說，則是生存問題。

劳动这一商品有比其他商品更暫时的性质。它不能蓄积起来。它的供应不能像其他商品那样容易增加或减少。

(δ)工厂管理制度。住宅立法。Trucksystem〔实物工資制〕，在这种制度下，企业主用提高商品价格而不改变名义工資的办法来欺騙工人。

III. 工人彼此之間的竞争

(a)根据普遍的經濟規律，不可能有两种市場价格。在一千

个同样熟练的工人中,决定工資的不是九百五十个在业工人,而是五十个失业工人。爱尔兰人对英国工人状况和德国人对亚尔薩斯工人状况的影响。

(b)工人們的相互竞争,不仅表现在一个人願意以比其他人更便宜的工資提供自己的劳动,而且表现在一个人願意做两个人的工作。

未婚工人对已婚工人的优越性等。

农村工人和城市工人之間的竞争。

IV. 工資的波动

工資发生波动的原因:

1. 时尚的变化。
2. 季节的更換。
3. 商业行情的波动。

在发生危机时,

(α)工人势必限制自己的开支,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工作更多的時間或在同一小时內制造出更多的产品。但是,他們的工資既然降低了,因为对他們制出的产品的需求縮減了,所以他們就使供应对需求的关系变得更加不利,那时資产者就說:只要这些人願意工作就行! 于是,由于工人过度辛劳,工人的工資更加降低。

(β)在危机期間:

完全失业。工資降低。工資照旧³⁸¹和工作日数減少。

(γ)在历次危机中,对工人是下述的循环运动:

企业主无法給工人工作,是因为他无法卖出自己的产品。他无法卖出自己的产品,是因为他找不到买主。他找不到买主,是因

为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以外没有什么可进行交换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无法交换自己的劳动。

(δ)至于谈到提高工资，那末应该指出，任何时候都必须注意到世界市场，如果其他国家工人失业了，提高工资就会成为泡影。

V. 最低工资

1. 工人所得的日工资是他的机器即他的肉体给他这个所有主带来的利润。其中包括为补偿该机器的 wear und tear [损耗] 也就是为以新工人代替丧失了工作能力的老工人所必需的款额。

2. 最低工资所产生的结果是：例如，取消星期日对工人来说纯粹是损失。他必须在更加恶劣的条件下挣得工资。这就是拥护取消星期日例假的诚实的慈善家们的目的。

3. 虽然平均最低工资是由最必需的生活资料本身的价格所决定的，但还是应该指出：

第一，不同国家的最低额各不相同，例如，爱尔兰的马铃薯³⁸²。

第二，不仅如此。最低额本身有自己的历史运动，它愈来愈降低到绝对最少的水平。以烧酒为例。最初用葡萄渣酿制，后来用谷物，再以后用马铃薯酒精。

促使最低额达到真正最低的水平的不但是

1. 机器生产普遍发展，分工，工人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并摆脱了地域限制；而且是

2. 赋税的增加和国家预算支出的增加，因为，我们已经说过，取消某种赋税不会使工人得到任何好处，可是在最低工资还没有降低到极限数额以前，实行任何新税都会损害工人的利益。而这种情况在所有公民关系发生紊乱和困难的情况下都会发生。同时

还应指出，賦稅的增加会加速小农、小資产者和手工业者的破产。

例子——解放战争³⁸³以后的时期。生产出更低廉的产品和代用品的工业的发展。

3. 这种最低額使各国趋于平衡。

4. 工資一旦降低，以后就是再提高，也永远不能达到原来的水平。

总之，在发展过程中，工資双重地下降：

第一，相对地，对一般財富的发展来說。

第二，絕对地，因为工人所換得的商品量愈来愈减少。

5. 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時間愈来愈成为商品价值的尺度，因而也成为工資的尺度。与此同时，随着文明的发展，劳动这一商品的生产愈来愈低廉，所花費的劳动時間也愈来愈少。

农民还有空閑時間，还可以有輔助收入。但是，大工业（不是工場手工业）消灭这种宗法制状态。这样一来，工人生活即生存的每一时刻都愈来愈成为交易的对象。

（現在还有下列几节：

1. 关于改善工人状况的建議。馬尔薩斯、罗西等。蒲魯东、魏特林。

2. 工人的联合。

3. 雇佣劳动的积极意义。）

VI. 改善生活状况的建議

1. 最喜欢提出的建議之一是儲蓄銀行制度。

我們絕不认为有必要讲，工人阶级的絕大部分人沒有可能儲蓄。

目的——至少儲蓄銀行的真實經濟意義——像人們所說的，應該在於：工人出於自己的遠見和明智而把對勞動有利的時間和不利的時間均衡起來，即在工業變動的周期循環中這樣支配自己的工資，就是使他們的開支實際上永遠不超過最低工資，不超過生活最必需的開支。

但是，我們看到，工資的波動不僅正好使工人革命化，而且如果工資與最低額比較沒有暫時的增加，工人就會完全置身於整個生產的發展、社會財富的增殖和文明的成就之外，因而對他來說就沒有獲得解放的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工人自己必定會把自己變成資產階級的計算機，把吝嗇作為常規，使赤貧生活具有經常不變的性質。

除此以外，儲蓄銀行制度是專制制度的一種有三重意義的工具：

(α)儲蓄銀行是政府套在工人階級很大一部分人的脖子上的一條金鎖鏈。這樣，這些工人不僅會感到保存現存制度有好处。不僅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參加儲蓄銀行的一部分和沒有參加儲蓄銀行的一部分之間發生分裂。這樣，工人自己就把保存奴役他們的現存的社會組織的武器送到自己敵人的手上。

(β)貨幣流回國家銀行，再被後者貸給資本家，銀行和資本家分攤利潤，因此，由於人民以極少的利息把貨幣貸放給他們（只是由於這種集中，這些貨幣才成為工業發展的有力杠桿），這就增加了他們的資本，擴大了他們對人民的直接統治權。

2. 資產階級喜歡提出的另一個建議是**教育**，尤其是全面的**生產教育**。

(α)我們不打算指出一個荒謬的矛盾，就是現代工業愈來愈

以不需受任何教育就干得了的簡單劳动代替复杂劳动；我們也不打算指出，現代工业日益迫使七岁以上的儿童从事机器劳动，不仅使他們成为資產階級的收入来源，而且成为他們双亲即无产者收入的来源；工厂管理制度使学校教育法失效，普魯士就是一个例子；我們也不打算指出，即使工人受到智力教育，这种教育对他的工資也毫无直接影响；教育一般說来取决于生活条件，資產者认为道德教育就是灌輸資產階級的原則，而且資產階級沒有使人民受到真正教育的經費，即使有这笔經費，它也不肯使用。

我們只来着重指出一个純粹經濟的观点。

(β) 慈善的經濟学家們所主張的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这样的：使每个工人熟悉尽可能多的劳动部門，以便他一旦因工厂采用新机器或分工发生变化而被拋出一个部門时，可以尽可能容易地在另一部門中被雇用。

假定这是可能的。

这样做的后果就会是：如果一个劳动部門的工人过剩，那末所有其他劳动部門的工人馬上也会过剩，并且一个生产部門的工資的降低，就会比以前更快地直接引起工資的普遍降低。

此外，由于現代工业到处都使劳动大大簡單化，使得它很容易为人們所掌握，所以，一个工业部門的工資的提高，也会馬上引起工人涌向这个工业部門，而工資的降低也会多少直接地带有普遍的性质。

当然，我們在这里不能分析資產階級方面所提出的許多小的治标办法^①。

① 手稿中这个地方添有“赤貧現象”几个字。——編者注

3. 但是我們应当轉到第三个建議——馬尔薩斯理論上来。这个建議实际上引起了并且还不断地引起极重大的后果。

我們在这里要探討的这个理論整个可以归結如下：

(α) 工資水平取决于所供应的工人和所需要的工人的比例。

增加工資的办法可以有两个：

或者是使劳动得以使用的資本增长得很快，以致对工人的需求比工人的供应增加得快(以更迅速增长的級数增加)。

其次，或者是人口增加得很慢，以致尽管生产資本增长不快，工人之間的竞争仍然不剧烈。

对相互关系的一方面，即对生产資本的增加，你們工人不能发生任何影响。

相反地，对另一方面，你們完全能够发生影响。

你們尽可能少生小孩，就能够从工人方面縮减供应，即緩和工人之間的竞争。

只要提出下面几点意見，就足以揭穿这个十分愚蠢、卑鄙和虚伪的学說：

(β) (这应该是对第一节“生产力的提高对工資有什么影响”的补充)

如果对劳动的需求增长了，工資就会增长。如果使劳动得以使用的資本增长了，即生产資本增加了，这种需求就会增长。

对此这里应当做两点主要說明：

第一：提高工資的主要条件是生产資本的增加和尽快增长。所以，使工人能够勉强生活的主要条件是他使自己的生活状况比資產階級愈来愈降低，是他尽量增加自己敌人的力量——資本。这就是說：工人只有在他生产并加强和他敌对的力量即他本身的

对立者的条件下，才能勉强生活下去；在这种条件下，当他造成这种和他敌对的力量时，他才能从后者得到就业手段，这种手段又使他成为生产资本的一部分，成为加强生产资本并使之快速增长的杠杆。

順便指出：如果懂得了資本和劳动之間的这种关系，就完全可以明白傅立叶主义者的和其他的想使二者調和的企图是多么滑稽可笑。

第二：在我們这样一般地闡述了这种顛倒的关系以后，这里还要加上第二个更重要的因素。

这就是，生产資本的增加这一說法意味着什么，生产資本是在什么条件下增加的？

資本的增加就是資本的积累和积聚。随着資本的积累和积聚，資本就使劳动的規模日益扩大，因而也就造成使劳动更加簡單化的另一种分工；

其次，使采用机器的規模日益扩大，并采用新机器。

因此，这意味着，随着生产資本的增长：

工人之間的竞争同样地加剧，因为分工簡化了，任何劳动部門对每个人都更加开放了。

工人中間的竞争不断加剧，还因为他們必須同样地与机器竞争，并且他們会因机器而失业。所以，生产資本的积聚和积累使生产規模愈来愈扩大，——而且还由于所提供的資本的竞争，資本的利息愈来愈下降，——

其后果是：

小工业企业倒閉，經不起同大企业的竞争。资产阶级的許多阶层被拋入工人阶级的队伍。因而，工人之間的竞争由于随着生

产資本的增加而必然发生的小企业主的破产而日益加剧。

同时，由于利息率降低，以前沒有直接参与工业的小資本家，也不得不从事工业活动，就是說，补充大工业新受害者的队伍。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工人阶级的人数也在增加，工人之間的竞争也在加剧。

生产力的发展既然引起劳动規模的扩大，那末在竞争愈来愈普遍的情况下，暂时的生产过剩愈来愈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世界市場愈来愈广闊了。因而，危机愈来愈尖銳了。在有这样突然的手段促使工人結婚和繁殖的情况下，工人大批聚集在一起，集中起来，因而他們的工資便愈来愈波动。所以，任何一次新危机都直接使工人之間的竞争大为加剧。

总而言之，随着更迅速的交通工具的出現和流通速度的加快即資本的急剧周轉，生产力的提高，就表現在同一時間內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也就是說，根据竞争規律，必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意味着，生产要在愈来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而为了在这种条件下能經得起竞争，劳动規模就得愈来愈大，資本就必定愈来愈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为了使这种大規模生产有利可图，分工和机器生产就必定不断地和不平衡地发展起来。

这种在愈来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生产也扩展到作为資本一部分的工人身上。工人必須在愈来愈困难的条件下生产更多的产品，就是說，在生产費用愈来愈降低的情况下領取更少的工資，干更多的活。这样一来，最低工資愈来愈促使在最低限度的生活享受条件下更拚命地干活。

不均衡性是以几何級数而不是以算术級数增长的^①。

^① 这句话馬克思写在手稿的頁边上。——編者注

可見，伴隨生產力的提高而來的是大資本的統治加強，叫做工人的機器愈來愈簡單化，由於擴大分工的範圍和採用機器的規模，由於公開規定獎勵生育，由於資產階級的破產的各階層的競爭等等，工人之間的直接競爭也日益加劇。

我們還可以更簡略地把這一點表述出來。

生產資本有三個構成部分：

- (1) 供加工用的原料；
- (2) 機器和煤這種為開動機器所需要的材料，建築物等等；
- (3) 用於工人生活費的那部分資本。

在生產資本增加的情況下，這三個構成部分的相互關係怎樣呢？

伴隨生產資本的增加而來的是生產資本的積聚，而伴隨資本的積聚而來的是只有剝削範圍不斷擴大，資本才能獲得利潤。

因此，很大一部分資本將直接變為勞動工具並作為勞動工具而發揮職能，而生產力愈提高，這種直接變為機器的一部分資本將愈增多。

機器生產的發展，完全和分工的發展一樣，會導致在更短的時間內能夠生產出多得多的產品。因此，原料儲備也要以同樣比例增加起來。在生產資本增加的情況下，變為原料的那部分資本也必需要增加。

現在剩下了生產資本的第三部分，即用於工人生活費的那一部分，亦即變為工資的那一部分。

這部分生產資本的增加和其他兩個部分有什麼關係呢？

分工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是一個工人能生產出以前三個、四個、五個工人所生產的東西。採用機器的後果是同樣情況以更大得無

比的規模表現出來。

首先，不言而喻，生產資本中變為機器和原料的那部分的增加不會引起用於工資的那部分同樣的增加。要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採用機器和實行更進一步的分工就會達不到自己的目的。所以，由此直接得出的結論是，用於工資的那部分生產資本，不會與花費在機器和原料上的那部分同等地增長。不僅如此。隨著生產資本，即資本本身力量的增加，投入原料和機器的資本和花費在工資上的資本之間的不均衡現象會同等地增長起來。這也就意味著用於工資的那部分生產資本，同用於機器和原料的那部分資本比較起來，則愈來愈少。

資本家把更大量的資本投入機器以後，就不得不花費更大量的資本來購買一般原料和為開動機器所必需的原料。但是，如果以前他雇用一百個工人，那末現在他也許只需要五十個工人就夠了。否則，他也許就要再次加倍地增加其他兩部分的資本，即更加擴大不均衡現象。所以，他解雇五十個工人，或者一百個工人仍要以從前五十個人的價格進行勞動。這樣一來，在市場上便出現了多餘的工人。

在分工日益完善的情況下，只有用於購置原料的資本將必定增加。也許一個工人可以代替三個工人。

假定這是一種最好的情況。資本家擴大了他的企業，而所採用的辦法不僅能夠保留原有數量的工人——他當然不會等到能夠這樣做的時候，——而且甚至还增加了工人的數量，這時，為了保留同樣數量的工人或者甚至使工人的數量有可能增加，就勢必要大大地擴大生產，而且工人數量和生產力的比例就會相對無限地更不成比例^①。因此，生產過剩會提前到來，而在最近一次危機

中,失业的工人会比任何时候都多。

可見,从資本和劳动之間的关系的本质必然得出这样一个普遍規律,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变为机器和原料的那部分生产資本,即作为真正的資本的資本,和用于工資的那部分生产資本相比,会不成比例地增长;換句話說,就是工人只得在彼此之間分配跟生产資本总量相比日益减少的那部分生产資本。所以,他們的竞争便日益加剧。換句話說,生产資本愈增加,工人的就业手段或生活資料就相对地愈减少,換句話說,和就业手段相比,工人人口增长得就愈快。而且,这种不均衡現象总是和一般生产資本同等地增长的。

为了消除上述的不均衡現象,生产資本就必須以几何級数增长,而为了以后在危机时期再消除这种不均衡現象,它还要增长得更多些^②。

資产者把这个不过是由工人和資本的关系产生出来的、甚至使对工人最有利的状况——生产資本不断增加——变为不利的状况的規律,由社会規律变成了自然規律,硬說根据自然規律,人口比就业手段即生活資料增长得快。

他們不懂得,生产資本的增加包含着这种矛盾的增加。

以后我們还要談到这一点。

① 翻譯不出的双关語:«...und das Verhältnis der Arbeiterzahl im Verhältnis zu den Produktivkräften ist relativ unendlich mehr Mißverhältnis geworden».——編者注

② 在手稿中这个地方意思不太清楚:«Um das oben angedeutete Mißverhältnis auszugleichen, muß es in geometrischer Proportion vergrößert werden und um es nachher in Zeiten der Krise zu readjustieren, wird es noch mehr vergrößert».——編者注

生产力,尤其是工人本身的沒有报酬的社会力量,甚至是和工人作对的。

(γ) 第一种荒謬說法:

我們知道,如果生产資本增长(經濟学家們所假設的最有利的情况),如果因此对劳动的需求也相应地增长,那末,根据現代工业的性质并根据資本的本性所得出的結論是:工人的就业手段不会以同等程度增长,引起生产資本增加的那些情况会使劳动的供求不均衡現象更快地加剧,——一句話,生产力的增长同时也使工人人数和工人的就业手段数量之間的不均衡現象加剧。就其本身来看,这既不取决于生活資料数量的增加,也不取决于人口的增加。这是由大工业的本性以及劳动和資本的关系中所必然产生的現象。

但是,如果生产資本的增长总是很慢,如果生产資本始終不变或者甚至还减少,那末对劳动的需求來說,工人人数永远都是太多了。

在这两种情况下,在最有利和最不利的情况下,从劳动和資本的关系,从資本本身的本性所得出的結論都是:工人的供应总是超过对劳动的需求的。

(δ)更不用提这样一种謬論了,这种謬論說什么整个工人階級不可能通过一个不生小孩的决定,相反地,它的生活状况会使性欲成为它的主要享乐并使它片面地发展。

資產階級在把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最低限度以后,还想把工人的再生产也限制在最低限度以內。

(ε)可是,从下述事实可以看出,資產階級对待这些話和劝告

是多么不认真。

第一，現代工业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就是对生育的真正奖励。

第二，大工业經常需要未就业工人后备軍以备生产高漲时期之用。因为資产者对工人所抱的主要目的一般在于以尽可能低的价錢得到劳动这一商品，而这只有在这种商品的供应大量超过需求的情况下，即有极多的过剩人口的时候，才有可能。

可見，人口过剩符合資产阶级的利益，資产阶级对工人好言相劝，是因为它知道这种劝告是无法实行的。

(ι) 資本既然只有在它能給工人工作的时候才能增长，所以資本的增长就包含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并且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按照資本和劳动的关系的本性，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必定还要相对地快一些。

(κ) 同时前面提到的理論，即竭力說人口比生活資料增加得快是自然規律的理論，所以更受資产者的欢迎，是因为这种理論安慰了他的良心，責成他把冷酷无情当作一种道德义务，它将社会現象变成自然現象，并且让他能像看待任何一种自然現象那样心安理得、无动于衷地来靜观无产阶级大批餓死，另一方面，把无产阶级的貧困看作是它本身的罪过并主張因此懲罰它。它說什么无产阶级可以用理智抑制自然的本能，并用道德监督的办法来限制自然規律的有害发展。

(λ) 济貧法可以說是这种理論的运用。消灭鼠患。砒霜。Workhouses〔习艺所〕。一般的赤貧現象。脚踏的輪子又列于文明領域之內。野蛮現象再度出現，但它是在文明本身的怀抱中产生的，并且归屬于文明；因此便发生了染有麻疯症的野蛮現象，作为文明的麻疯症的野蛮現象。Workhouses 是工人的巴士底獄。妻

子和丈夫分居。

4. 現在我們要簡略地提一提那些想用另一种确定工資的办法来改善工人状况的人們。

蒲魯东。

5. 最后,在慈善的經濟学家关于工資的意見中,还要指出一种观点。

(α) 在其他經濟学家之中,尤其是罗西發揮了下述观点:

工厂主預先支付給工人的只是工人所应得的那分产品,因为工人不能等到产品出卖。如果工人自己能把自己养活到产品出卖的时候,那末他作为 associé [股东] 将享有对应付給他的那部分产品的权利,就像資本家和工业資本家之間的情形一样。因此,工人的份額具有的正是工資形式,那是一种偶然事物,因为这是投机的結果,是和生产过程同时发生而又絕不是生产过程的必然組成因素的一种特殊活动的結果。工資只不过是現代社会制度的一种偶然形式。它不是資本的必要部分。它不是生产所必需的要素。在另一种社会組織之下,它可能消失。

(β) 这个高明見解可以归結如下: 如果工人持有足够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足够的資本,用不着被迫地以直接出卖自己的劳动为生的話,那末工資形式就会消失。这意味着:要所有工人同时又是資本家,因而也就是說,这等于要保全資本而又不要雇佣劳动这个对立物,但是沒有雇佣劳动,資本就不能存在。

(γ) 其实,这种說法應該加以注意。工資不是资产階級生产的偶然形式,而整个资产階級生产却是生产的暫時历史形式。生产的一切关系(資本、工資、地租等)都是暫时的,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要被消灭的。

VII. 工人联合会

人口論的要点之一是它企图减少工人之間的竞争。相反地，工人联合会的目的是消灭竞争，而代之以工人的联合。

经济学家反对联合会的意见是正确的：

(1) 联合会要求工人负担的费用，在大多数情况下比联合会想争取提高的收入要多。它们不能长久地与竞争规律对抗。这些联盟要引起新机器和新分工的出现，引起生产由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的转移。这一切的结果是工资的降低。

(2) 如果这些联盟能够在一个国家里把劳动价格保持在这样的高度，以致利润同别国的平均利润相比而显著地降低，或者资本增殖受到了阻碍，那末，其结果便是工业发生萧条和倒退现象，并且工人与其企业主一起破产。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工人的状况就是这样。如果生产资本增长，他的生活状况就要飞跃式地恶化，如果资本减少或者始终不变，他就一定破产。

(3)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所有这些反对意见，正如前述，是对的，但只是从他们的观点看来才是对的。如果工人联合会的使命过去和现在真的都只是确定工资，如果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永世不变，那末，这些联盟就会因反对事物的必然进程而崩溃。但是，这些联盟是团结工人的手段，是准备推翻整个旧社会、彻底解决其阶级矛盾的手段。从这个观点来看，工人们嘲笑高明的资产阶级教员们预先给他们算出在这个内战中他们的伤亡和金钱消耗的数目，是嘲笑得对的。谁要想战胜敌人，他就不会去同敌人讨论战争的代价。而工人绝不这样狭隘地看待事物，经济学家们本来可以从下述事实中看出来：大部分联盟是由工资最高的工人

建立的，并且工人把他們能够从工資中节省出来的錢全都用于建立政治团体和工会組織，用于支援这一运动。如果資產者老爷們及其經濟学家一时大发慈悲，允許給最低工資即最低生活添加些茶或甜酒，糖和肉，那末，相反地，他們对于工人把用于反对資產階級的战争的某些开支也計入这个最低額一事，对于工人竟从自己的革命活动中得到生活上的最大享受一事就感到气愤和不可理解了。

VIII. 雇佣劳动的积极方面

最后我們还應該注意雇佣劳动的积极方面。

(α) 如果談雇佣劳动的积极方面，那就是談資本、大工业、自由竞争、世界市場的积极方面，我无需乎向你們解釋，沒有这些生产关系，就不会創造出生产資料——解放无产階級和建立新社会的物质資料，无产階級本身也就不会团结和发展到真正有能力在旧社会中实行革命并使它自身革命化的程度。工資平均化。

(β) 甚至拿工資的最不道德的方面——我的活动成了商品，我完全成了出卖的对象——來說。

第一，由于这一点，一切宗法制的东西都消失了，因为只有商业即买卖才是唯一的联系，只有金錢关系才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間的唯一关系。

第二，旧社会的一切关系一般脫去了神圣的外衣，因为它們变成了純粹的金錢关系。

同样，一切所謂最高尙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們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这

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呵。^①

（第三：人們把劳动变成商品，并使它本身受自由竞争的支配以后，力求尽可能便宜地，即用尽可能少的生产费用来生产它。因此，在未来的社会組織中，任何体力劳动都会无限輕易，无限簡單。——做出一般的結論。）

第三，由于一切都成了出卖的对象，工人就认定，一切他們都能摆脱，都能割棄；因此，他們就第一次摆脱了对一定关系的依附。既不繳納产品，也沒有那种仅仅是一定等級（封建等級）的附屬品的生活方式了，工人可以随便处理自己的錢了，这是一个优点。

馬克思写于1847年12月底

原文是德文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于1924年

俄文譯自手稿

“社会主义經濟”杂志，原文
第一次发表于1925年“在
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

① 手稿中这个地方添有如下的話：“民族关系、階級斗争、财产关系”。——編者注

弗·恩格斯

*法国工人阶级和总统选举³⁸⁴

巴黎。拉斯拜尔还是赖德律-洛兰？社会主义者还是山岳党人？这就是使红色共和国的党派分裂成为两个敌对营垒³⁸⁵的问题。

其实，这里争论的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您问一下山岳党人的报纸“改革报”、“革命报”，它们会告诉您，它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据它们说，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不断革命、累进税、遗产税和劳动组织的纲领，同山岳党所提出的毫无二致；它们会说，没有任何原则分歧，这场不适当的争吵完全是由某些嫉妒成性和野心勃勃的人挑起来的，他们滥用人民的“真诚信任”，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激起对人民政党活动家的猜疑。

如果您问一下社会主义者的报纸“人民报”³⁸⁶，它用来回答您的，会是关于头脑空虚的山岳党人愚昧无知的辛酸倾诉，难以计数的关于法律、道德和经济的论文，最后是神秘的暗示，说问题的实质是公民蒲鲁东所提供的新万应灵药，这种万应灵药很快就要显示出它对路易·勃朗学派那一套陈旧的社会主义辞藻的优越性。

最后，如果您问一下社会主义者工人，他们会简单明了地回答您：«Ce sont des bourgeois, les montagnards» [“这些山岳党人都是资产者”]。

又是唯有工人一下子就看破了問題的实质。他們根本不想知道山岳党，因为山岳党全是资产者。

社会主义民主党早在二月以前就是由两个不同的派别构成的：第一个派别包括演说家、議員、作家、律师等等以及相当数量的追随他們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其实“改革报”派正是由他們組成的；第二个派别是由巴黎的工人群众构成的，他們决不是前者的无条件的追随者，相反，他們是对前者疑心极重的同盟者，他們根据“改革报”派的活动家是提出比較坚决的主張还是采取比較动搖的立場，时而比較紧密地靠近他們，时而又同他們离得比較远。在专制制度存在的最后几个月当中，“改革报”同“国民报”进行論战，表现得非常坚决，于是在它同工人之間就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因此，“改革报”派活动家也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而进入临时政府的。

这里沒有必要来詳談：这些“改革报”派的活动家如何由于在临时政府中是少数派，因此无力捍卫工人的利益而只是帮助了“純粹的”共和派³⁸⁷抑制工人，直至这些共和派重新組織起国家政权——这个政权这时已成为他們的用以反对工人的政权了；“改革报”派的領袖賴德律-洛兰如何由于受拉馬丁那一套所謂自我牺牲的陈詞濫調的影响并醉心于权力而同意参加执行委员会³⁸⁸；从而分裂和削弱了革命政党，使該政党的一部分人为政府效劳，以致促进了五月和六月起义的失敗；此外，他本人又是怎样地反对工人。这一切不需要在这里多談了。这些事实还記憶犹新，历历在目。

簡言之，在六月起义以后，在执行委员会垮台和以卡芬雅克为代表的“純粹的”共和派建立了絕對統治以后，“改革报”派、民主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关于共和国进一步发展的一切幻想都破灭

了。他們被推进了反对派的队伍，他們又变得自由了，又扮演了反对派的角色，并恢复了自己同工人的旧有的联系。

在沒有发生任何严重問題以前，当問題还只在于揭露卡芬雅克那种胆怯的、背叛的和反动的政策的时候，工人能够容許他們在出版界的利益由“改革报”和“民主社会革命报”去代表。何况“真正的共和国”³⁸⁹和真正的工人报纸已經被戒严、倾向性的訴訟和报纸保证金所消灭。同样，工人们能够容許山岳党在国民議會中代表他們。因为拉斯拜尔、巴尔貝斯和阿尔伯已被逮捕，路易·勃朗和科西迪耶尔被迫逃亡。部分俱乐部被封閉了，其余的受到严格的監視，而反对言論自由的旧法律至今仍然繼續存在。报纸上每天都可以看到相当多的例子，說明这些法律如何被用来反对工人。沒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代表說話的工人，不得不又滿足于在2月以前曾經代表过他們的那些人——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和它的演說家。

但是发生了总统选举的問題。共有三个候选人：卡芬雅克、路易-拿破侖、賴德律-洛兰。对于工人來說，卡芬雅克是根本談不上的。这个家伙在六月里曾用霰彈杀害过他們，并向他們投擲过燃燒彈，他指望得到的只能是他們的憎恨。而路易·波拿巴呢？他們只是为了开玩笑才会投票选举他，以便今天用选票把他抬上去，明天又用武力把他推翻，而把正直的“純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和他一起推翻。最后是賴德律-洛兰，他向工人们吹嘘自己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派的紅色候选人。

这样，有了临时政府的經驗以后，在5月15日和6月24日以后，又要求工人们来給激进小资产阶级和賴德律-洛兰投信任票嗎？2月25日，当武装的无产阶级統治巴黎的时候，当可能得到

一切的时候，不就是这些人只会說安慰人的漂亮話，而沒有革命的行动，只会許諾和規劝，而不采取迅速和坚决的措施，总之，只有93年的旗帜、詞句和名称，而沒有93年的毅力嗎？不就是这些人曾經同拉馬丁和馬拉斯特一道呼吁首先應該安撫資產階級，因而忘記需要把革命繼續向前推进嗎？不就是这些人在5月15日表現得不坚决，并在6月23日命令从文森調来炮兵，从奥尔良和布尔日調来几个营嗎？

为了选票不致分散，本来人民也許会投票贊成賴德律-洛兰的。但是賴德律-洛兰在11月25日发表了反对卡芬雅克的演說，再一次站在胜利者一边，并責备卡芬雅克反对革命的行动不够坚决，未能再多派出几个营去反对工人。

这篇演說彻底打消了工人对賴德律-洛兰的任何信任。甚至到現在，在他亲身經受过六月战斗的一切后果之后已經过了五个月的时候，他还是站在胜利者方面反对战敗者，并且以他曾要求派遣比卡芬雅克所能拿出的还要更多的营去反对起义者而引以自豪！

这个惋惜六月起义沒有被尽快鎮压下去的人，竟想充当作为六月陣亡战士继承者的政党的首領？

在发表这篇演說以后，賴德律-洛兰这个候选人在巴黎工人中間已注定要遭到破产。在巴黎取得胜利的是他的竞争者拉斯拜尔，拉斯拜尔更早地被提为候选人，并且得到工人的同情。如果巴黎的选举具有决定意义的话，那末拉斯拜尔現在就是共和国的总統了。

工人们非常清楚，賴德律-洛兰还没有离开舞台，他还能够而且也一定会給激进党带来很大的好处。可是他已失去工人的信

任。他优柔寡断、崇尚虚荣和爱好华丽辞藻，由于这一切他甚至受过拉馬丁的支配，他們，工人們曾不得不为这一切付出代价。无论他在将来能带来什么好处，也不能使工人們忘記这一点。工人們将永远懂得，如果賴德律-洛兰又开始坚决地行动起来，那末他的坚决将只是那些在他后面推动他的武装工人的坚决。

工人們給賴德律-洛兰投了不信任票，同时也就是給整个激进小资产阶级投了不信任票。犹豫不决、好唱 *dévoûment*〔自我牺牲〕等的陈詞濫調、为了革命的模糊回忆而忘記革命的行動，——这就是賴德律-洛兰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固有特征。

激进小资产者之所以带有社会主义情緒，只是因为他們清楚地看到自己即将灭亡，看到自己即将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他們不是作为小资产者、小量資本的所有者，而是作为未来的无产者在幻想劳动組織，幻想資本和劳动之間关系的变革。只要他們获得政权，他們很快就会忘掉劳动組織。因为政权，至少是在最初一些日子的陶醉中，会使他們看到有获得資本和从威胁他們的灭亡中得救的前景。只有当武装的无产者端着刺刀为他們作后盾的时候，他們才会想起自己昨天的同盟者。他們在2月和3月間就是这样行动的，而他們的領袖賴德律-洛兰就是第一个这样行动的人。如果現在他們的幻想已經消失，难道这能改变工人們對他們的态度嗎？如果他們回过头来，願意痛改前非，他們是否有权要求工人們現在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又重入圈套呢？

工人們不会这样做，他們知道應該怎样对待激进小资产阶级，——工人們沒有投票选举賴德律-洛兰，而投票选举拉斯拜尔，就是让激进小资产阶级了解这一点的。

可是拉斯拜尔究竟对工人有什么功劳呢？怎能把他作为一个

par excellence [純粹的] 社会主义者而同賴德律-洛兰相对立呢？

人民知道得很清楚，拉斯拜尔不是官方的社会主义者和体系的发明者。人民根本不要官方的社会主义者和体系的发明者，这些人已使人民非常讨厌。不然，人民的候选人就会是公民蒲魯东，而不是热情洋溢的拉斯拜尔了。

但是人民的记忆力很好，他们决不像未被承认的反动派领袖们出于谦虚所爱指责的那样，是忘恩负义的。人民清楚地记得，拉斯拜尔最先责备临时政府毫无作为而一味空谈共和国。人民还没有忘记 «Ami du Peuple»³⁹⁰ par le citoyen Raspail [公民拉斯拜尔的“人民之友”]。拉斯拜尔最先表现出勇气——而这的确需要勇气，——发表了反对临时政府的革命言论；此外，拉斯拜尔根本不是某种一定的社会主义 couleur [派别] 的代表人物，他只是在为社会**革命**而斗争。这就是巴黎人民群众投票选举拉斯拜尔的原因。

这里所谈的根本不是山岳党在宣言中极其郑重地宣布过的能拯救世界的某些琐屑措施。这里所谈的是社会革命，它将给法国人带来跟那些语无伦次的、已成为死板公式的词句完全不同的结果。这里所谈的是实现这一革命所必需的毅力。问题在于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一度表现了软弱无能以后，是否还能在它那里找到这种毅力。巴黎无产阶级投票选举拉斯拜尔也就是回答说：**找不到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改革报”和“革命报”对下面这一点感到莫名其妙，即人们虽然赞同它们的词句，却不投票选举宣扬这种词句的賴德律-洛兰。这两家可敬的报纸自认为是工人的报纸，其实现在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代表小资产阶级，它们当然不能了解，同

一种要求，在工人嘴里富有革命性，而在它們嘴里就是空洞的詞句。不然，它們就应当拋棄它們自己的痴心妄想！

至于公民蒲魯东和他的“人民报”呢？这一点明天再談。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2 月初

原文第一次載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5 年国际版第 1 部分第 7 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手稿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于

1940 年“无产階級

革命”杂志第 3 期

弗·恩格斯 *蒲魯东

巴黎。昨天我們談到过山岳党人和社会主义者，談到过賴德律-洛兰的候选資格和拉斯拜尔的候选資格，談到过“改革报”和公民蒲魯东的“人民报”。我們曾答应回头来談談蒲魯东。

公民蒲魯东是个什么人呢？

公民蒲魯东是勃艮第的农民，他曾經改換过許多种职业，研究过各种各样的科学。他第一次受到公众的注意，是由于在 1840 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什么是財產？”³⁹¹ 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財產就是盜窃。”

这个出人意外的結論使法国人大为惊讶。路易-菲力浦的政府和毫无幽默感的、老板着面孔的基佐，眼光如此狭隘，竟把蒲魯东置于被告席上。但这是枉費心机的。可以預料，任何一个法国陪审法庭都不会根据这样一种聳人听闻的奇談怪論来給他判罪。事情果然如此。政府丢了臉，而蒲魯东却成了一个著名人物。

至于該书本身，那末全书都是以上述結論的精神写成的。每一章都是令人惊奇的奇談怪論，其表达方式是法国人从来没有見到过的。

此外，該书包括的内容，部分是关于道德法律方面的論断，部分是关于道德經濟方面的論断。其中每一个論断的目的都是想要

证明：财产是以矛盾为基础的。至于法律方面的論据，那是可以同意的，因为再沒有比证明全部法学都是以一大堆矛盾为基础的这一点更容易的事了。至于說到經濟方面的論断，那末其中很少包含有什么新东西，即使有，也是以虛假的計算为基础的。三重規則到处都遭到了恶意的破坏。

可是法国人并不了解这本书。法学家认为它太偏重于經濟，經濟学家认为它太偏重于法律，而两者都认为它的道德气味太濃。他們終究宣称：Après tout, c'est un ouvrage remarquable [这毕竟是一部卓越的著作]。

但是，蒲魯东还力图赢得更大的胜利。他在写了許多未引起人們注意的小文章以后，终于在 1846 年出版了他那包括两大卷的“貧困的哲学”³⁹²。在这部应使他名垂千古的著作中，蒲魯东运用經過粗暴歪曲了的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来論证一种奇怪的、完全不正确的政治經濟学体系，企图用形形色色的先驗的魔法来論证一种自由工人联合的新社会主义体系。这个体系是如此之新穎，以致它在《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 Bazaars or Offices》[“劳动产品公平交換市場或交換所”³⁹³]的名称下，早在十年以前就在英国十个不同城市中破产过十次了。

这部冗长的、臃肿的伪科学著作，不仅对以往一切經濟学家，而且对以往一切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极其粗暴的指責，它沒有給輕率的法国人留下任何印象。这种叙述和論断的方式他們从来还没有見到过，它比蒲魯东上一部著作中的那些可笑的奇談怪論还要更不合他們的胃口。这类奇談怪論在这本书中也頗不少（例如，蒲魯东曾一本正經地宣布“他是耶和华的私人仇敌”³⁹⁴），但是它們隐藏在伪辯证法的論断下面。法国人又宣称：«c'est un ouvrage

remarquable» [“这是一部卓越的著作”]，并把它擱在一边。在德国，这部著作自然受到了較大的尊重。

馬克思当时发表了一部既机智而又严正的著作来駁斥蒲魯东（卡尔·馬克思“哲学的貧困。答蒲魯东先生的‘貧困的哲学’”1847年布魯塞尔和巴黎版³⁹⁵）——这部著作按其思想方式和語言來說，要比蒲魯东那部矯揉造作的荒唐东西千百倍地更带法国味。

至于蒲魯东这两部著作中所包含的对現存社会关系的批評，那末，在讀完这两本书之后，可以問心无愧地說：这种批評等于零。

至于談到蒲魯东关于社会改造的計劃，那末，如前面所說的，它們只有一个优点，即它們早在許多年以前就在英国的无数次破产中光輝地表現了自己。

这就是革命前的蒲魯东。当他还企图不依靠資本、而借助于不亚于輕視三重規則的計算的計算来出版“人民代表”日报时，巴黎工人起义了，他們赶走了路易-菲力浦并建立了共和国。

由于有了共和国，蒲魯东起初成了一个“公民”；后来由于相信他的社会主义者清白名字的巴黎工人的选举，他才成了人民代表。

这样，革命把公民蒲魯东从理論領域推到了實踐領域中，从他的斗室推到了讲坛上。这位固执的、高傲的无师自通的学者，对他以前的一切权威——法学家、院士、經濟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都持同样的輕蔑态度，他把过去的全部历史一概貶为荒誕无稽的东西，而把自己則誉为新的救世主，这个人在他本人应当帮助創造历史的时候，表現得怎样呢？

应当称贊的是，他一开始活动，就在那些遭到他极端蔑視、尖銳攻击，被他称为无知庸人和傲慢笨蛋的社会主义者中間采取极左翼的立場，并同他們一起投票。

誠然，据說在山岳党的大会上他又重新激烈地恢复了他对以前的敌手的旧的尖銳的攻击，他毫无例外地把他們每一个人都称为无知的庸人和空談家，說他們甚至絲毫也不懂得他們所說的东西。

我們很願意相信这一点。我們甚至願意相信，蒲魯东那些以空論家的枯燥热情和过分自信的口吻叙述的經济学方面的奇談怪論，在山岳党人先生們当中引起了不小的混乱。他們当中只有很少数是經济理論家，并且他們还都或多或少地依靠小小的路易·勃朗；而小小的路易·勃朗虽然是比完美无缺的蒲魯东严肃得多的作家，但是他的思維过于直观，不能对付蒲魯东那种矯揉造作的伪科学的經济学原理，不能对付他的荒誕的先驗性和伪数理邏輯。加之，路易·勃朗不久之后不得不从法国逃亡，而他的那些在政治經济学方面束手无策的信徒們就失去保护，落到蒲魯东这只豺狼的凶殘的爪牙中了。

大概沒有必要重复这一点，即蒲魯东尽管取得了这一些胜利，但仍然是一个非常拙劣的經济学家。不过，他的弱点恰好是在多数法国社会主义者所不熟悉的方面。

蒲魯东生平最大的胜利，是他在国民議会的讲坛上赢得的。我已記不清他发言談什么問題了，只記得他滔滔不絕地讲了一个半钟头，激起了議會中的資產阶级的狂怒，因为他讲的純粹是蒲魯东式的奇談怪論，一个比一个更荒誕，而且每一个都是要最粗暴地侮辱听众的最神圣、最高貴的情感。这一切都是用他所特有的枯燥的迂腐的冷漠态度、用平淡的迂腐的勃艮第方言、用最冷酷沉着的声調說出来的。效果——发狂的資產者的舞蹈病——的确不坏³⁹⁶。

但是,这是蒲魯东的社会活动的頂峰。同时,他通过他的报纸“人民代表”(这是在对三重規則的痛苦試驗以后勉强創辦起来的,不久就干脆称为“人民”了)以及工人俱乐部繼續宣傳他那套旨在造福世界的理論。而这一切并不是毫无結果的。工人們說:«On ne le comprend pas, mais c'est un homme remarquable» [这个人很难了解,但他确实是个好人]。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12月初

原文第一次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7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手稿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于1940年“布尔什維克”杂志第14期

附 录

卡尔·馬克思

科倫 11 月 14 日。在“新萊茵報”總編輯**卡尔·馬克思**今晨被法院偵查員的傳訊的消息傳出去以後，大量民眾聚集在上訴法院的院子里向他表示同情，并等候結果。当**卡尔·馬克思**离开偵查員出来的时候，人們向他高声欢呼，并把他送到埃塞尔大厅，在这里，馬克思用簡短几句话对人民的同情表示了感謝，并且說明，他之所以被傳，只是由于要**結束**有关**黑克尔**案件的**审問**。問題在于，前任国家檢察官，現任檢察长**黑克尔**先生认为：**卡尔·馬克思**誹謗性地宣布他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因为“新萊茵報”上登載了一篇由“**黑克尔**”³⁹⁷署名的文件。

載于 1848 年 11 月 15 日
“新萊茵報”第 14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弗·恩格斯請求准許他 居留伯尔尼的申請書

(初稿)

致伯尔尼州司法和警察当局

請允許我根据护照签发局的指令，請求准許我在伯尔尼居留³⁹⁸。

我曾住在科倫(萊茵普魯士)，从事著述。由于今年9月25日和26日在这个城市发生的騷乱，我受到法院的偵查^①，并且有被捕的危險。我只是由于逃亡才躲开了这次逮捕。几天以后，发出了逮捕我的命令(見10月1日、2日或3日的“科倫日报”)³⁹⁹，这样，我的身分便确定为政治流亡者。如果需要，我可以給当局提供这个命令的副本。

到瑞士之后，我之所以願意居留伯尔尼州和伯尔尼城，而不是别的哪个城市，其原因如下：

(1)伯尔尼离德国边境很远，这使德国当局无法制造借口用种种要求来麻煩瑞士政府，說什么我濫用避难权和准备制造騷乱^②。

① 接着在手稿中塗掉了“我被控告号召暴乱，等等”这一句話。——編者注

② 接着在手稿中塗掉了“号召起义来反对德国政府，等等”这一句話。——編者注

(2)伯尔尼正好在現在能給我一个机会，按照瑞士联邦議会的实例来研究宪法的实际运用，从这里面，德国无論如何是能为自己吸取許多东西的，特別是在德国人民可能在自己国内实行在某种程度上相似的宪法的时候。

我想我的流亡不会为时太久，因为，姑且不說普魯士現今的局势未必可能保持稳定，我有充分理由期望科倫的陪審員做出宣告我无罪的判决。我逃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审前的长期羈押。所以，我估計到明年春天就能返回祖国。

至于生活資料，我完全有保证。如果需要，我可以对这点提出证明。

根据护照签发局的指令附上护照一份，这是法国临时政府在我于今年4月間从巴黎返回祖国时根据我的請求签发的，这次特由科倫給我寄来。

我趁此机会謹向当局致以最高的敬意。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48年11月15日于伯尔尼邮政街
43号B格貝尔利先生处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4年第1版第25卷，原文第一次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7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手稿

代表团晋見檢察长茨魏費尔

科倫 11 月 22 日。昨天，卡尔·馬克思、卡尔·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第二諸先生，因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見“新萊茵报”第 147 号）^① 一案，本应去見法院偵查員。可是謠傳当局企图把被傳喚人立即逮捕起来。不管这种謠傳在許多法学家看来是多么不可靠，人民委员会⁴⁰⁰ 还是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去晋見檢察长茨魏費尔先生，以期弄清事实真相。果然，茨魏費尔先生向代表团声明：根本沒有发出逮捕被傳喚人的命令，只有在呼吁书引起叛乱的情况下，才可能发出这样的命令；因为到那时，被傳喚人的那种由第二〇九条和二一七条⁴⁰¹ 規定的过错（这种过错暫且只归違警法庭审理）就可能成为罪行。

檢察长先生认为，根据上述各条法律的規定，应当进行傳訊，与此相反，代表团声明：在目前，当柏林国民議会是普魯士唯一的合法权力机关时，首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来惩办那些用暴力反抗国民議会決議或号召进行这种反抗——如艾希曼总督不久前在科布倫茨所做的那样^②——的官員和机关。

載于 1848 年 11 月 23 日
“新萊茵报”第 15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見本卷第 39 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37—38 頁。——編者注

关于法院偵查員偵訊馬克思、 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第二的通告

科倫11月25日。在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第二因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的第二个呼吁书^①一案而受法院偵查員偵訊时，被告声明这一呼吁书是由他們起草和签署的。这一声明載入記錄后，偵訊就告結束。被告沒有一人被捕。这一通告可以作为对区域委员会所收到的許多信件的答复。

載于1848年11月26日
“新萊茵报”第153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見本卷第39頁。——編者注

“新萊茵報”审判案

科倫 12 月 5 日。几天以前，“新萊茵報”总編輯卡尔·馬克思又被傳到法院偵查員那里去受偵訊。“新萊茵報”的下列四篇文章引起中央政权以誹謗罪名对該报提出控告：(1)“施納普汉斯基”；(2)一篇从布勒斯劳寄来的关于利希諾夫斯基的文章；(3)一篇談論某位“可笑的施泰德曼”的“伪造”报告的文章；以及(4)发表在埃塞尔大厅通过的“就背叛人民一事发表的声明”，这是由于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問題而反对法兰克福多数派的⁴⁰²。

“新萊茵報”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柏林、彼得堡、維也納、布魯塞爾和那不勒斯今后以誹謗罪名繼續不断提出的控告。

12 月 20 日，将开庭审理“新萊茵報” contra[反对]檢察机关和宪兵的第一个审判案⁴⁰³。

我們至今不曾听說过萊茵省哪个檢察官曾运用 Code pénal [刑法典]的哪一条去对付一切有明显而粗暴的違法行为的萊茵省权力机关。

«Distinguendum est!» «Il faut distinguer» [“应当区别对待!”]——这就是勇敢的萊茵省檢察机关的座右銘。

載于 1848 年 12 月 6 日
“新萊茵報”第 16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洛桑工人联合会給 弗·恩格斯的委托书

兄弟!

鉴于不可能派代表去出席伯尔尼工人代表大会⁴⁰⁴，特委托你做我們的代表。作为一个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老战士，在这次大会上你当然也一定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虽然这一次你不必同资产者和其他小商人打交道；要知道这是真正的无产者，你应当同他們一道并且为他們进行工作。那末，讓我們把我們对中央联合会的願望简单地告訴你。

(1)各联合会联合的目的应当是：

- (a)成立中央联合会和中央會計处。
- (b)对工人进行社会的和政治的教育。
- (c)同萊比錫德国工人委员会⁴⁰⁵建立联系，以便加强主要是工人之間的联合。

(2)选出的中央联合会的义务应当是：

- (a)同萊比錫工人委员会建立联系。
- (b)为了减少通訊，着力推銷中央委员会出版的报纸（“博爱报”⁴⁰⁶）。
- (c)掌管中央會計处，每半年提出一次有关报告。
- (d)把一切重要事件及时地通知各兄弟联合会。

(3)各兄弟联合会之間相互的义务以及对中央联合会的义务是：

- (a)每个会员每月交納一巴茨^①以下的会費，同时双方应經常交換邮資总付信件。
- (b)联合会的每个分会应給自己的会员頒发会员证。
- (c)持有会员证的每个联合会会员有权加入任何一个联合会，但会员证須經本人最后所屬的那一个联合会的主席签署。

至于我們的選擇，那末我們仍和过去一样，认为伯尔尼联合会最适当。如果要討論我們的最后一个通告，那末它只不过是今年夏天我們就已承认伯尔尼联合会为中央联合会的結果，但是由于缺乏有关事态发展的任何消息，我們便在这里召开了會議，在会上通过了上述通告。我們否决了每人每周交納半巴茨的做法，因为这样会使会员人数减少，同时并不能使收入增加很多。

代表联合会四十一名会员向你致敬并握手

格·施奈貝尔格

邦格特

克·哈夫

1848年12月8日于洛桑

原文第一次发表于“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5年国际版
第1部分第7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手稿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瑞士貨幣。——編者注

“新萊茵報”1849年第一季度 預訂通知

請預訂下季度(1849年1—3月)“新萊茵報”的訂戶在最近期間將訂單寄來，科倫的寄本報發行科(下制帽坊街17號)；外地的寄德國各地郵局。

在法國收訂人是：日·阿·亞歷山大先生(斯特拉斯堡布蘭德巷28號和巴黎諾特丹·德·納扎列特街23號)，以及亞琛皇家郵政總局；在英國是：伊·伊·尤厄爾先生等(倫敦新門街72號)；在比利時和荷蘭是：相應的皇家郵局和列日的郵局。^①

由於廢除印花稅，訂費隨之降低，今後科倫一季的訂費只收一塔勒七銀格羅申六分尼，在普魯士各地郵局(包括郵資)只收一塔勒十七銀格羅申；德國其他各地的訂戶酌加郵資。

編輯部的成員無任何變動。

前幾個月出版的“新萊茵報”各號就是它的綱領。由於編輯部和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北美的民主派的領導人有私人聯繫，因此它能比任何別的報紙更正確更明白地給自己的讀者報道國外的社會政治運動情況。從這方面看，“新萊茵報”不僅是德國民主派的，而且是歐洲民主派的機關報。

^① 在“新萊茵報”第176—195號上這段話略有變動。——編者注

刊登广告：第四版小号字一行或者相应的篇幅收广告費一銀格罗申六分尼。

由于本报具有广泛的联系,各种广告都能广泛傳播。

“新萊茵报”发行負責人

載于 1848 年 12 月 19 日 —
1849 年 1 月 14 日“新萊茵报”
第 172—19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对“新萊茵报”的审判延期举行

科倫 12 月 20 日。对“新萊茵报”的审判原定今天在陪审法庭进行。被告是“新萊茵报”总編輯馬克思博士先生，該报发行負責人科尔夫先生，以及恩格斯先生。后者缺席。他們被控侮辱檢察长茨魏費尔和誹謗宪兵。审判由于当局沒有遵守訴訟程序的一条規定⁴⁰⁷ 而延期举行。

載于 1848 年 12 月 21 日
“新萊茵报”第 17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德利加爾斯基對“新萊茵報”的控告

科倫 12 月 21 日。今天，馬克思博士由於被控對“公民和共產主義者”德利加爾斯基先生^① 進行誹謗，又被法院偵查員傳訊。這個新的審判是對“新萊茵報”的第幾次審判，這很難確定，因為這類審判太多了。

我們畢竟感到遺憾的是：德利加爾斯基先生竟對我們這樣忘恩負義。要知道，他之所以在歐洲有了一點兒名聲，是全仗我們談到他的幾篇文章。“公民和共產主義者”德利加爾斯基先生，這是多麼可恥的忘恩負義呵！！這就是我們時代道德敗壞的標志——甚至連普魯士皇家共產主義者對別人為他效勞也毫無感激之情。

載于 1848 年 12 月 22 日
“新萊茵報”第 175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① 見本卷第 64—69 頁。——編者注

科倫工人联合会委员会 1849年1月15日会议记录摘要

在宣讀和批准了上一次会议的记录以后，主席勒澤尔問編輯普林茨公民是否在座，有人回答說普林茨已經离去，接着他說，由于普林茨最近的所做所为和他不向联合会請示就擅自改变报纸的方針，作为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必須对他追究責任……

公民馬克思和沙佩尔提出了有許多人附議的提議：在委派普林茨任联合会正式机关报⁴⁰⁸的編輯的同时，再成立一个編輯委员会，它应监督使机关报真正代表联合会的利益，并根据我們党的精神进行編輯工作。

提議被通过了，并委派公民沙佩尔、勒澤尔和賴夫組成編輯委员会。

公民威斯特曼宣讀从布魯塞尔寄来的哥特沙克医生的“声明”⁴⁰⁹，并且說他不同意后者的行动。

公民馬克思提出了有沙佩尔附議的提議，建議現在不討論這個問題，因为上述的声明太可疑、太模糊，很难从中做出一定的結論；为了弄清這個問題，應該指派一个委员会，由它指出看起来模糊的地方并写信給哥特沙克医生，請他对此加以說明和解釋。

这个提議得到一致贊同；經提議选出公民馬克思博士、安內克、沙佩尔、勒澤尔和埃塞尔組成委员会……

公民安內克提議在将来的會議上討論即將進行的選舉⁴¹⁰問題。

公民沙佩爾認為，如果這是在一個月以前發生的話，那末我們作為一個特殊的黨派，也許可能獲得某種重大的結果。但是，現在已經太晚了，因為我們根本還沒有組織起來，工人聯合會不可能使它所提出的自己的候選人當選。

公民馬克思的意見也是這樣，認為處在這種狀態的工人聯合會現在不可能使自己的候選人當選，當前的問題不在於獲得某種原則上重大的結果，而在於起來反對政府、反對專制制度、反對封建主的統治；而這連普通的民主主義者，即所謂的自由主義者也是能做到的，因為他們也完全不滿意現存政府。考慮問題必須從實際出發。既然現在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尽可能強大的反對現存專制制度的反對派，那末根據常識也可以判斷：如果已明白在選舉中不可能捍衛住自己的原則性觀點，那就應該與其他也是站在反對派立場上的黨派聯合起來，不讓我們的共同敵人——專制王權獲得勝利。

接着決定參加這個城市里在劃分選區之后就應成立的共同選舉委員會，並在那里捍衛共同的民主原則。

為了在工人与民主派之間建立更密切的聯繫，指派公民沙佩爾和勒澤爾參加民主協會委員會的會議，並在本委員會會議上作有關的報道……

載于 1849 年 1 月 21 日
“自由、勞動”報第 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自由、勞動”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新萊茵報”被宣判無罪

科倫 2 月 8 日。昨天本報簡略地報道過：陪審法庭昨天開庭審理了“新萊茵報”總編輯馬克思、編輯恩格斯和發行負責人因登載一篇注明“科倫 7 月 4 日”的文章（載 1848 年 7 月 5 日該報）⁴¹¹ 而被控告的案件。這一篇關於安內克先生被捕事件的文章，就成了以誹謗執行逮捕任務的憲兵（Code pénal [刑法典] 第三六七條）和侮辱檢察長茨魏費爾（Code pénal 第二二二條）的罪名提出控訴的借口。陪審法庭在進行了短暫會議後，宣判全體被告無罪。

這個審判案是對“新萊茵報”的許多審判案中最早的一個，它之所以重要，是由於上述的第二二二條和第三六七條（由於第三七〇條）在這一次陪審法庭的判決中，跟至今在萊茵各違警法庭中解釋和應用得完全不同。可是，如果除去懲罰直接號召內戰和叛亂的那些條文以外，第二二二條和第三六七條是高明的萊茵檢察機關至今能夠應用於出版方面的僅有條文。因此，陪審法庭宣告無罪的判決是萊茵普魯士出版自由的一項新保證。

一旦有可能，我們就將向我們的讀者簡略地報道法庭審訊⁴¹²的情況。

今天，馬克思又因號召拒絕納稅一案同科倫議員施奈德爾、

沙佩尔一道到陪审法庭受审，上述号召是他們以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委員的名义发出的^①。

載于 1849 年 2 月 9 日
“新萊茵报”第 21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見本卷第 39 頁。——編者注

对“新萊茵报”的两次审讯

科倫 2 月 8 日。昨天和今天，在我們的陪審法庭上又就报刊案件进行了两次审讯——昨天审讯“新萊茵报”总編輯馬克思以及該报撰稿人恩格斯和沙佩尔，今天审讯馬克思、沙佩尔和律師施奈德尔第二，他們被控犯有煽动人民拒絕納稅、反对政府的罪行。出席旁听的人空前踊跃。在这两次审讯中，被告都是自己替自己辯护，力求证明控告毫无根据；他們的論据如此有力，以致陪審員在两次审讯中都不得不宣判被告“无罪”。

在政治审判案中，政府很不走运，陪審法庭不能使它如願以償。本地卫戍部队的几个軍官的命运可能更坏，他們参加了去年 9 月的人民运动，当这个运动遭到失敗时，他們就越境逃往比利时去了；現在，他們重新出庭受审，等候對他們的已經开始审理的案件作出决定⁴¹³。

載于 1849 年 2 月 16 日“德意志
倫敦报”第 20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德意志倫敦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民主宴会

萊茵河畔繆尔海姆 2 月 11 日（迟到）。今天在这里举行了由工人联合会組織的民主宴会。应邀出席宴会的有科倫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的會員。音乐和歌声同演說和敬酒交相更替。

当地工人联合会主席**本格尔**在他的內容丰富的报告中談論了現在和过去的关系。**魯卡斯**举杯向客人們表示祝賀，特別是祝賀那些像在座的“新萊茵报”总編輯**卡尔·馬克思**那样早在二月革命以前很久就用自己的言行捍卫了工人階級权利的人。**沙佩尔**提議为“民主共和国”干杯。**卡尔·馬克思**談到了德国工人在法国、英国、比利时和瑞士参加斗争的情况。他提議为协商議會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議員之一——**格拉德巴赫**干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举杯为匈牙利人和科苏特祝賀。沃林根的**奥特**談到了立宪自由主义，談到了貴族和民主派，而**費希巴赫**則談到了人民群众的貧困和消灭貧困的办法。**格拉德巴赫**在講話中評論了被解散的国民議會，并激烈地批評了国民議会的軟弱无能、猶豫不決和缺乏革命精神。最后，**克拉埃**談到了二月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愛”。

萊茵省第一次举行的这个民主宴会起了很好的影响，它无疑将成为效法的榜样。

載于 1849 年 2 月 18 日
“新萊茵报”第 22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二月二十四日的宴会

科倫 2 月 27 日。前天，为紀念法国二月革命一周年在埃塞尔大厅里举行了一次宴会⁴¹⁴。能容納两三千人的大厅里座无虛席。

卡尔·馬克思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主席，但他由于工作繁忙，不得不婉言謝絕。根据大家的意見，卡尔·沙佩尔担任了主席。他在宣布宴会开始时，提議为悼念在巴黎二月起义和六月起义中以及在 1848 年其他各次革命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干杯。

在这以后，科倫的議員施奈德尔律师就向自己的选民告辞了。接着由格拉德巴赫議員讲话，他言簡意賅地說明了反革命在最近一次取得胜利的原因，并号召科倫的人民群众，如果发生某种反对議院的新的暴力行动，就应起来保卫自己的代表。（这是对今天“科倫日报”上的告发⁴¹⁵ 的回答。）

举杯祝酒的还有下列人士：里廷豪森博士提議为社会民主共和国干杯。——“新萊茵报”編輯弗·恩格斯：为正在进行斗争的意大利人、首先为羅馬共和国。——卡·克拉麦尔：为紀念罗伯特·勃魯姆。——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維勒：为德国民主。——商人古方蒂：为賴德律-洛兰和法国的民主主义者。——退役炮兵下士丰克：为打倒暴君。——卫尔博士：为在座的妇女們。——貝克尔博士：为各国的民主主义者。——木匠庫尔特：为科苏特和匈牙利人。——沙佩尔：为政治犯和流亡者，特别是伯桑松的德国

人⁴¹⁶。——工人卡斯滕斯^①：为未来的社会革命。——“新莱茵报”编辑斐迪南·沃尔弗：为劳动权。——工人豪斯曼：为统一。——卡·克拉麦尔：为梅洛斯拉夫斯基和 1848 年波兰的战士。——旅館老板、波恩的康普：为各国人民的友爱。——大学生勃鲁姆：为烏培河谷的民主主义者。——工人米勒：为梅利奈、特德斯科和由于里斯康土案件⁴¹⁷而在安特卫普被判刑的其他十五个人。——工人勒澤尔：为紀念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馬拉和 1793 年的其他英雄。

宴会有音乐伴奏，人們唱了“馬賽曲”、吉倫特派歌曲⁴¹⁸及其他歌曲，并且观看了在海尔克斯指揮下的工人合唱团的演出。最后，宴会在为“普遍社会民主共和国”举杯祝賀声中結束。

在宴会上为伯桑松的德国流亡者組織了一次募捐。募集了相当大一笔款子。

在整个晚間，軍隊随时准备出动，街上加强了巡邏，但这一切与其說是由宴会引起的，不如說是由士兵之間的毆斗引起的。

載于 1849 年 2 月 28 日
“新萊茵报”第 23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弗·列斯納。——編者注

居尔岑尼希的宴会

科倫 3 月 20 日。昨天晚上，在居尔岑尼希举行了紀念去年柏林街垒战一周年的宴会。如果資产階級为“祝賀允諾”制宪等等而在本月 18 日举行音乐会时，本城最大的大厅都挤得相当滿的話，那末，昨天，这个大厅甚至未能容納下蜂拥而至的一半公众。在挤得滿滿的大厅里共有五六千人，而在街上还有好几千人徒劳地等机会进去。大厅很快就被挤得水泄不通，甚至有几个演說者直到晚上九点钟以后才进入了大厅。

担任主席的**卡尔·沙佩尔**先宣布宴会开始，他举杯祝賀一切合法权力的唯一泉源——主权的人民。接着，有下面这些人相继举杯致詞：**海·貝克尔**提議为紀念 3 月 18 日和 19 日的牺牲者干杯；公民**瓦赫特尔**举杯祝德国的米歇尔聪明起来；公民**卫尔**举杯祝賀彻底的、而不是半途而廢的革命；公民**里廷豪森**提議为打倒德国皇帝干杯；**卡·克拉麦尔**举杯祝賀出席宴会的民主妇女；“新萊茵报”編輯**威·沃尔弗**举杯祝賀意大利共和国；“新萊茵报”編輯**恩·德朗克**举杯祝賀无产階級革命；**彼·諾特荣克**提議为匈牙利人和科苏特的胜利干杯；“新萊茵报”編輯**哥·毕尔格尔斯**提議为推翻奥地利干杯；“新萊茵报”編輯**斐·沃尔弗**提議为布尔日案件的被告⁴¹⁹干杯；“新萊茵报”編輯**弗·恩格斯**提議为巴黎的六月起义者干杯；**卡·沙佩尔**提議为英国的宪章派及其最革命的領袖厄內斯

特·琼斯和乔·朱·哈尼干杯；卡·克拉麦尔举杯祝贺波兰人；“工人报”⁴²⁰编辑克利·埃塞尔提议为红色共和国干杯。

宴会是在有条不紊、非常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宴会于晚上十一点钟在全体到会者为祝贺红色共和国的干杯声中结束。把我们的宴会同本月18日“抱怨派”在居尔岑尼希举行的音乐会比较一下，我们感到很高兴，因为科伦还没有一个纪念会像昨天晚上在红色旗帜下举行的宴会那样聚集了那么多、那么明理的公众。

载于1849年3月21日
“新莱茵报”第25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科倫工人联合会 1849年4月16日全体會議的決議

會議一致決定：

(1)退出德国民主协会总会，加入中央委員會設在萊比錫的德国工人联合会总会⁴²¹。

(2)为了更加密切地联合純粹社会的政党，委托委員會在召开萊比錫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以前在科倫召开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工人联合会的地方代表大会。

(3)派遣代表出席即将在萊比錫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

載于1849年4月22日
“自由、博爱、劳动”报第2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自由、博爱、劳动”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科倫工人联合会委员会 1849年4月17日会议记录摘要

……(5)为执行昨天全体大会的决定：定于5月的头一个星期日在这里召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

委员会委派公民卡·马克思、威·沃尔弗、卡·沙佩尔、安内克、埃塞尔和奥托六人组成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临时委员会来执行这一决定，并责成他们向各有关的联合会发出适当说明开会理由的邀请书……

載于1849年4月22日
“自由、博爱、劳动”报第2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自由、博爱、劳动”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科倫工人联合会第一分会的決議⁴²²

(1) 鉴于哥特沙克医生在“自由、劳动”报中把公民卡尔·馬克思描繪成为法兰克福議會議員弗兰茨·拉沃的朋友和同道者，而公民馬克思在2月8日委员会會議上发言的意思是，虽然他在目前支持把拉沃和施奈德尔第二提为候选人，但他远不是要在原則方面与这些人团結起来；相反地，拉沃恰好在他活动的最盛时期遭到了“新萊茵报”的无情攻击；但是，現在根本談不到紅色民主主义者和无色民主主义者 [blassen Demokraten]，因为目前的任务主要还是反对君主专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紅色民主主义者和无色民主主义者就必须联合起来反对“抱怨派”；

(2) 其次，哥特沙克医生在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表示，他能使科倫工人倾向于紅色君主政体，就像倾向于紅色共和国一样，从而把工人本身描繪成为对他盲目服从的机器；

(3) 上述报纸对拉沃的攻击极为卑鄙、恶毒，并且指責他身体上的疾病，說什么他生病是假装的；

(4) 这家报纸的其他攻击大部分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其荒唐可笑簡直不值一駁；然而这些攻击暴露了它們的作者可鄙的仇恨，狠毒和卑劣的、背信棄义的性格；

(5) 哥特沙克医生在被宣判无罪以后，对許多工人联合会會員談到改組工人联合会的計劃以及他为了这个目的想把他本人

(作为主席)和由他选定的另外五人(作为委员会委員)置于联合会领导地位的意图, 这证明有专制独裁的趋势并違反最基本的民主原則;

(6) 由于企图实现这个新的組織方案, 他背棄了真正无产者的政党而投入了小资产者的怀抱, 因为他准备把每月会費提高到五个銀格罗申;

(7) 哥特沙克医生未受联合会委托, 甚至沒有通知联合会或它的领导机关, 就擅自变动联合会的报纸, 因而两个星期沒有出报⁴²³; 这是違反联合会权利的行为, 这种行为是无法开脫的, 无论是哥特沙克此后很快就走了, 或是有任何必要性或者认真的原因, 都不能作为原諒这种行为的理由;

(8) 哥特沙克医生在被宣判无罪以后, 辜負了科倫工人的期望, 沒有像以前一样在他們当中重新开始他的进步活动, 而是令人奇怪地連一句告別的話也沒有說, 对工人所表现的忠誠和毅力沒有表示任何謝意, 就走掉了;

(9) 哥特沙克医生由于过分迂腐而自願流亡国外, 并从布魯塞尔寄来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無論如何既不能为他的行为作解釋, 也不能为他的行为辯护, 因为他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 竟在这个声明中說, 他是否能回来只取决于“当今国内最高审判官”或是“人民的呼声”, 可見他不是把全体人民的呼声, 而是把别的什么人当作最高审判官; 他这里所說的最高审判官只能是国王, 因此他便直接轉到正統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方面去了; 另一方面, 在这个声明中他又嘲笑人民, 认为人民能够把凡是承认和求助于别的什么最高审判官而不承认和求助于人民呼声的人都召回来, 他在这里扮演了一个最可怜的伪君子的角色, 并力图为自己保留一条既通向国

王又通向人民的道路；

(10) 哥特沙克医生对于工人联合会請他解釋他那个看来难以了解的所謂声明，尤其要指出他所說的“当今的最高审判官”是誰的要求，沒有給予答复；

(11) 哥特沙克医生虽然沒有得到誰的召請，还是回到了德国，因此这段自願流亡国外的插曲就完全失去意义，而且，如果估計到这时他的弟兄們和朋友們都为了把他选入柏林議會而卖力活动的話，那末这看来必定是一种考虑不周的竞选花招，——

鉴于这一切，科倫工人联合会第一分会声明：本会無論如何不能贊同哥特沙克医生自从此地陪审法庭宣判他无罪以后的行为，并且坚决地、憤怒地粉碎这样一种意图，即认为工人联合会能够让人利用去为紅色君主政体的利益服务，或者容許人家利用对个別人的攻击把它引入歧途，或者强迫它接受一位主席和由諂媚者組成的委員會，或者召回为了贖罪同时恳求国王和人民寬恕的自願流亡者，或者容許任何人像对待一群无知的小伙子一样对待工人联合会。

載于 1849 年 4 月 29 日
“自由、博爱、劳动”报第 2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自由、博爱、劳动”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科倫工人联合会 1849年4月23日全体會議的決議

(1) 全体大会今后将在每星期三举行。

(2) 批准委员会所选出的由卡尔·馬克思、卡尔·沙佩尔、威廉·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安內克、埃塞尔和奥托等人組成的、負責筹备在科倫召开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临时委员会。

載于1849年4月29日
“自由、博爱、劳动”报第2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自由、博爱、劳动”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关于召开工人联合会 代表大会的通知

不久以前，萊茵省民主联合会区域委员会的一部分成员退出了该委员会，同时这里的工人联合会已宣布退出萊茵省各民主团体联合会总会^①。所以采取这种步骤，是因为确信：由于这些民主团体成分复杂，很难指望它们会给工人阶级或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带来什么好处。

因此，就更加迫切地需要使各工人联合会的单一成分紧密团结起来，使它们致力于共同的活动。

为此目的，这里的工人联合会认为，首先必须建立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工人联合会的临时委员会，并选举下面署名的人为该委员会的成员，责成他们采取一切为达到上述目的所必需的步骤。

临时委员会特邀请一切工人联合会以及所有其他暂时虽不用这个名称、然而**是坚决拥护社会民主派原则**的团体，都派遣自己的代表于下个月的头一个星期天（5月6日）⁴²⁴出席省代表大会。

列入议事日程的将有以下几个问题：

（1）组织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工人联合会；

① 見本卷第 509 和 697 頁。——編者注

(2) 选举出席将于 6 月間在萊比錫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

(3) 討論和批准应交给代表带往萊比錫代表大会的各项建議。

务請被选举出席这里的預备代表大会的代表們于 5 月 6 日上午十时前携带委托书前往旧市場上西蒙的“克兰茨”旅館报到。

卡·馬克思(缺席) 威·沃尔弗

卡·沙佩尔 弗·安內克

克·約·埃塞尔 奥托

注意: 书面通知請寄: 下制帽坊街 17 号工人联合会主席卡尔·沙佩尔。

載于 1849 年 4 月 26 和 29 日
“新萊茵报”第 282 号和
第 285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新萊茵报”編輯們的命运

……“新萊茵报”的各个編輯的命运是这样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因在爱北斐特发表的演說而受到刑事追究；馬克思、德朗克和維尔特，作为非普魯士臣民，应该离开普魯士；斐迪南·沃尔弗和威廉·沃尔弗要受司法追究：前者是因为沒有履行軍职，后者則是因为仿佛曾在旧有各省里犯过政治罪行；今天法院拒絕了把科尔夫交保釋放的請求。

（“杜塞尔多夫日报”）

轉載于 1849 年 5 月 22 日“德意志报”
第 140 号和 1849 年 5 月 23 日“特利尔
日报”第 12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德意志报”
和“特利尔日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尔·馬克思离开科倫

科倫。昨天早晨，“新萊茵报”前总編輯卡尔·馬克思先生同其他几个編輯一道离开了科倫，前往上萊茵河地区；在那里，他的活动将会像在这里一样卓有成效。

載于 1849 年 5 月 22 日
“新科倫报”第 11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科倫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新萊茵报”审判案

科倫 5 月 29 日。今天，違警法庭判決了去年 11 月开始的关于誹謗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⁴²⁵的案件。被傳訊的有卡·馬克思、恩·德朗克、格·維尔特、海·貝克尔、海·科尔夫、印刷厂主迪茨和貝希托特。前三人缺席。除科尔夫以外，其他人都被宣判无罪；科尔夫(作为“新萊茵报”前发行負責人)，因侮辱“可笑的施泰德曼”而被判处一个月徒刑并偿付七分之一的訴訟費。法庭断然駁回了就施納普汉斯基-利希諾夫斯基一事而向維尔特提出的控告。

載于 1849 年 6 月 1 日
“新德意志报”第 12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德意志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通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命令

茲根据王国法院偵查員关于傳訊下列人犯的命令，敦請各有关民政和軍事当局，采取措施，緝拿下开人犯，彼等犯有刑法第九十六条所載之罪行，业已畏罪潜逃，一經查获，請予逮捕，并解交本人，計开：（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新萊茵报”編輯，巴門人，最近住在科倫……

代理檢察长
国家檢察官 **艾希霍恩**

1849年6月6日于爱北斐特

計开：（1）**恩格斯**。年齡：二十六到二十八岁；身長：五英尺六英寸；头发：淺色；前額：高聳；眉毛：棕色；眼睛：兰色；鼻和嘴：匀称；胡須：栗色；下顎：橢圓形；臉庞：橢圓形；臉色：健康；身材：匀称。特征：說話很快，近視……

載于1849年6月9日
“科倫日报”第13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科倫日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注 釋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釋

- 1 馬克思所写的“柏林的危机”和“柏林的反革命”等文是普魯士酝酿和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期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直接反应。1848年11月1日国王撤换了普富尔内閣，政权落入公开反革命的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内閣之手。11月9日国王下令，要普魯士国民議會由柏林迁往偏僻的市鎮勃兰登堡开会。政变就这样开始了。到1848年12月5日国民議会被解散后政变遂告結束。馬克思編輯的“新萊茵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发动群众起来反抗酝酿中的反革命政变。

“新萊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到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倫出版，总編輯是馬克思。

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外回到德国之后，馬上就着手实现他們的計劃，即出版一份革命的机关报，他們认为这种机关报是教育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的工具。从德国的具体条件出发，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以民主派左翼即实际上是无产階級一翼的面貌在政治舞台上出現。这样也就决定了以“民主派机关报”的名义出版的“新萊茵报”的方向。

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階級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萊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师的作用，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向反革命作斗争。为了把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的一切最重要的事件迅速报道給自己的讀者，編輯部常常一天中出两次报；当材料多得連四个版也登不完的时候就出增刊，而当收到新的重要消息时就以傳单形式出特別附刊和号外。决定报纸对異常重要革命問題的立場的社論通常都是由馬克思或恩格斯写的。这些社論都标有“*科倫”和“**科倫”的記号。标有星花的編輯部的文章有时也登在报纸的其他栏中（如意大利、法国、英国、匈牙利等国家的通訊栏）。每一位編輯除了修改通訊稿件和幫助总編輯作組織

工作外，都負責研究某一方面的問題。恩格斯寫有關柏林國民議會、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和普魯士議會第二議院的辯論情況的評論，寫有關匈牙利的革命戰爭、意大利的民族解放運動、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戰爭的文章，而在1848年11月到1849年1月期間則寫了一系列關於瑞士的文章。威廉·沃尔弗寫關於德國革命中的土地問題、關於農民和農民運動特別是西里西亞的農民和農民運動的情況的文章，並且還負責“國內新聞”欄的工作。格奧爾格·維爾特負責編輯詩體和散文體小品文欄。恩斯特·德朗克一度當過“新萊茵報”駐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通訊員，他寫了一些關於波蘭的文章，在1849年3月至5月寫了一些關於意大利的評論。斐迪南·沃尔弗很長一段時期是“新萊茵報”駐巴黎的通訊員之一。亨利希·畢爾格爾斯也參加了報紙的工作，但是據馬克思和恩格斯說，他只寫過一篇文章，而且這篇文章還是經馬克思徹底修改過的。斐迪南·弗萊里格拉特在1848年10月參加了編輯部的工作，在報紙上發表了他的革命詩歌。

“新萊茵報”的堅決的、不妥協的立場，戰鬥的國際主義精神，它對普魯士政府和科倫地方當局的政治上的揭發，——這一切使得該報在創刊后的最初幾個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資產階級報刊的攻擊，並受到政府的迫害。當局以不承認馬克思的普魯士的公民權來刁難他，不讓他在萊茵省居住，並且還對該報編輯，首先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連串的控訴。在科倫九月事件之后，軍事當局於1848年9月26日宣布科倫戒嚴，並且封閉了好幾家民主報紙，其中也有“新萊茵報”。恩格斯、德朗克和斐迪南·沃尔弗有被捕的危險，因此他們不得不暫時離開科倫；威廉·沃尔弗也不得到普法爾茨去避一避，後來又在科倫藏了好幾個月，以防警察局的通緝。在1849年1月以前，由於恩格斯被迫離開德國，編輯部的主要重擔（包括寫社論在內）就落在馬克思一人的肩上了。

“新萊茵報”不顧種種迫害和警察局的刁難，英勇地捍衛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捍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進攻的情況下，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沒有普魯士國籍而下令把他驅逐出境。馬克思的被驅逐和“新萊茵報”其他編輯的被迫害，使該報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萊茵報”用紅色油墨印出了最後一號即第301號。

在致科倫工人的告別書中，該報編輯們宣布：“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後一句話始終將是：工人階級的解放！”——第5頁。

- 2 指1848年11月5日“新普魯士報”上登載的“勃蘭登堡內閣”一文。

“新普魯士報”(《*Neue Preussische Zeitung*》)是德國的一家日報，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宮廷權奸和普魯士容克地主的機關報。這個報還稱為“十字報”(《*Kreuz-Zeitung*》)，因為在報頭上畫有十字。——第5頁。

- 3 “協商論”(《*Vereinbarungstheorie*》)是以康普豪森和漢澤曼為代表的普魯士資產階級用來為自己的叛變行為辯護的論據，它主張普魯士國民議會應當只限於“在法制的基礎上”通過同國王協商的辦法來確立立憲制度。——第5頁。

- 4 恩格斯的這篇文章和以後的幾篇文章是他被迫居留瑞士時寫的。1848年9月26日科倫宣布戒嚴，並頒布了逮捕“新萊茵報”的幾位編輯(其中也包括恩格斯)的命令。恩格斯從普魯士流亡到比利時，但立刻又被驅逐到法國。他在巴黎作了短期的逗留以後，於10月徒步去瑞士(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549—571頁恩格斯的手稿“從巴黎到伯爾尼”)。11月9日左右，恩格斯到了伯爾尼，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849年1月。在流亡期間，恩格斯不斷地給“新萊茵報”寫文章，還寫了不少帶有通訊性的短評。在“昔日的公國”、“新的代表機構。——瑞士運動的成績”、“聯邦法院的選舉”、“聯邦委員會委員剪影”、“國民院”、“瑞士報刊”等文章中，恩格斯以鮮明的筆調描繪出了當時瑞士聯邦共和國的政治生活的局限性、地方主義；而當時的瑞士恰好是德國南部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理想。——第7頁。

- 5 諾恩堡-瓦連迪斯公國(德國對紐沙特爾及其領地瓦蘭王的稱呼)在1707—1806年間是普魯士所屬的一個小邦。1806年，在拿破侖戰爭時期，紐沙特爾併入法國。1815年根據維也納會議的決定，紐沙特爾併入瑞士聯邦，成為瑞士聯邦的第二十一州，但同時繼續保持它對普魯士的藩屬關係。1848年2月29日紐沙特爾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最終結束了普魯士的統治，宣布成立共和國。1857年普魯士被迫正式放棄

- 对紐沙特尔的特权要求。——第7頁。
- 6 神圣的埃尔曼达德 是十五世紀末叶由西班牙王权建立的城市联盟，目的是利用資產階級来反对大封建主，以維護专制制度的利益。从十六世紀中叶起，神圣的埃尔曼达德的武装力量执行了警察的职能。后来人們就轉而把警察称为神圣的埃尔曼达德。——第7頁。
- 7 “紐沙特尔立宪主义者报”（«*Constitutionnel neuchâtelois*»）是瑞士君主立宪派的报纸，从1831年起到1848年2月在紐沙特尔出版。
“紐沙特尔共和主义者报”（«*Le Républicain neuchâtelois*»）是瑞士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报纸，从1848年3月起到1849年10月在拉紹德封出版，从1849年11月起到1856年在紐沙特尔出版。——第8頁。
- 8 宗得崩德 是瑞士經濟落后的七个天主教州在1843年締結的单独联盟，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資產階級改革，維護教会和耶穌会教徒的特权。1847年7月瑞士議會决定解散宗得崩德。因此宗得崩德便在11月对其他各州采取了軍事行动。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軍隊被联邦政府的軍隊击潰。——第9頁。
- 9 1848年前瑞士立法机关——联邦議会的議員們，受到本州政府頒布的旨在极力阻撓在联邦議會內实施任何一种进步措施的法令的限制。——第9頁。
- 10 *Moderados*（莫迭腊多斯，即温和派）是西班牙温和自由党的名称。該党是在1820—1823年資產階級革命时期由于自由党分裂成右翼——莫迭腊多斯和左翼——埃克薩尔塔多斯（即激进派）的結果而形成的。——第10頁。
- 11 “日内瓦評論和瑞士日报”（«*Revue de Genève et Journal Suisse*»）是激进党的机关报，1842年起在日内瓦出版，并以此名称一直出版到1861年。——第12頁。
- 12 1847年联邦議會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規定瑞士由国家联盟改組为联邦国家，廢除寺院特权，禁止耶穌会活动。資產階級对封建教权反动派

- 的这一胜利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获得的。——第 12 頁。
- 13 1848 年 10 月 24 日在夫賴堡(法国称作: 弗里布尔) 州发生了天主教会所組織的騷乱, 目的是要推翻該州的民主政府, 这个政府是在宗得崩德被击潰后成立的。騷乱很快就被平息了。——第 13 頁。
- 14 威廉·退尔是关于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瑞士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战争的民間傳說中的英雄; 据說, 他以百发百中的箭术射死了奥地利地方长官。——第 13 頁。
- 15 暗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关于勃兰登堡內閣所說的一句話: “不是勃兰登堡在議會, 就是議会在勃兰登堡。”1848 年 11 月 9 日的“新普魯士报”在引用这句话时这样解釋: “勃兰登堡将在議會, 而議會已在勃兰登堡。”——第 14 頁。
- 16 指从 1417 年起管轄封疆伯爵領地勃兰登堡的霍亨索倫王朝。——第 14 頁。
- 17 傳說查理五世在逝世前不久曾为自己举行了一次葬仪, 并且亲自参加了出殯仪式。——第 14 頁。
- 18 指 1532 年在累根斯堡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的查理五世刑律 (*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 这部刑律以处刑极其殘酷著称。——第 14 頁。
- 19 法王路易十六(路易·卡佩特) 在 1792 年 8 月 10 日人民起义时, 曾企图寻求国民議会的保护。8 月 10 日君主政体被推翻; 翌日国王被捕。国民公会审判了路易十六, 认为他犯有危害民族自由和国家安全的罪行, 宣布处以死刑。1793 年 1 月 21 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1848 年 6 月 19、21、22、26 日“新萊茵报”第 19、21、22、26 号及 9 月 9 日“新萊茵报”第 98 号上曾登載了有关审判路易十六的一組文章——“国民公会关于前法王路易·卡佩特的辯論”。——第 14 頁。
- 20 1848 年奥地利帝国国会的大多数斯拉夫議員屬於資本家地主集团, 他們力图建立一个以君主制奥地利为首的斯拉夫联邦国家。——第 15 頁。

- 21 1848年11月9日，在普魯士國民議會宣布了國王關於將議會會址從柏林遷往勃蘭登堡的命令以後，大部分右翼議員便順從地離開了會議大廳。——第15頁。
- 22 馬克思借用了海涅在1831年出版的“加里多爾夫就貴族問題致穆·馮·莫里特加伯爵書”一書序言中的形象的比喻：“高盧的雄雞如今再次啼叫，而德意志境內也已經破曉。”在這裡高盧雄雞的叫聲象徵着法國革命。——第18頁。
- 23 席勒“奧爾良姑娘”第三幕第六場。——第19頁。
- 24 莎士比亞“特洛埃勒斯與克蕾雪達”第三幕第三場。——第19頁。
- 25 “總匯通報”(«*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國的日報，政府的官方機關報；1789年起在巴黎出版。在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曾是革命政府的機關報。——第20頁。
- 26 1848年11月3日“科倫日報”登載了一篇關於臆造的非洲“黑格蘭”(Hyghlans)〔半人半猿〕部落的短文；文中談到：“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正在學習阿拉伯語。”11月5日的“新萊茵報”曾嘲笑過這篇報道，並加以評論：“這種發現……無論如何對於抱怨派來說具有極偉大的意義，因為他們可以從黑格蘭人身上獲得頗有價值的支持。”關於抱怨派見注172。——第20頁。
- 27 根據1848年11月4日通過的憲法，1848年12月法國應舉行總統選舉。這個憲法賦予作為執政當局的首腦的總統以巨大的權力。這是統治階級——懾於巴黎工人六月起義的資產階級——日益走向反革命的明證。12月10日舉行選舉的結果，路易·波拿巴當選為總統。——第20頁。
- 28 馬克思把1789年6月20日的巴黎事件和1848年11月11日的柏林事件作了对比。1848年11月8日國王簽署了關於將普魯士國民議會會址從柏林遷往勃蘭登堡的命令。國民議會的大多數通過了一項繼續在柏林開會的決定來回答此項命令。11月10日國民議會被趕出它往常開會的地方——話劇院，11月11—13日議會在射擊俱樂部開會。——

第 21 頁。

- 29 “科倫日報”（《Kölnische Zeitung》）——德國的一家日報，自 1802 年起即以此名稱出版；1848—1849 年該報反映了普魯士自由派資產階級怯懦的和反革命的立場，它經常猛烈地攻擊“新萊茵報”。——第 21 頁。
- 30 1848 年 11 月 14 日和 15 日“新萊茵報”第 142 號（增刊）和第 143 號刊登了格·維爾特的“在英國拒絕繳納與 1832 年改革有關的稅款”一文。——第 21 頁。
- 31 這是馬克思給 1848 年 11 月 14、17、18 和 19 日“新萊茵報”第 142（增刊）、145（特別附刊）、146 和 147（增刊）號上連載的標題為“卡芬雅克先生”的幾篇文章寫的編者按語。這幾篇文章轉載（略經修改）自“新聞報”。它們連續發表在該報 1848 年 11 月 7—11 日各號上，總標題是“在 6 月 23 日起義情況調查委員會面前的卡芬雅克先生”。——第 23 頁。
- 32 這是對法國士兵給拿破侖第一取的綽號“小伍長”的改寫；暗示路易·波拿巴流亡英國時參加過特种警察部隊，這支部隊在破壞 1848 年 4 月 10 日憲章派的示威游行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第 23 頁。
- 33 指卡芬雅克將軍參加對阿爾及利亞的侵略以及在 1848 年擔任該地總督期間對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的血腥鎮壓。正是卡芬雅克的這些“功績”使他在法國資產階級中間贏得了可靠的“秩序的維護者”的聲望。——第 23 頁。
- 34 “新聞報”（《La Presse》）是 1836 年起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日報；在 1848—1849 年期間是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機關報，後來成為波拿巴派的機關報。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艾·日拉丹曾任該報編輯。——第 23 頁。
- 35 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指導着萊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亞的民主團體的活動，馬克思在這個委員會中起領導作用。

根據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召開的第一屆民主主義者代表大會的決

議，1848年6月底成立了由科倫三个民主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和工人业主联合会的代表所組成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萊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暂时执行区域委员会的职能。1848年8月13—14日，在科倫召开的萊茵民主主义者第一届代表大会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参加下确定，由科倫三个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的成員組成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該委员会的活动不仅限于萊茵省，而且扩大到威斯特伐里亚。代表大会通过了必須到工厂工人和农民中开展工作的決議。

鉴于普魯士国内开始了反革命政变，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还在国民議會作出相应決議之前，便在1848年11月14日号召萊茵省居民拒絕納稅。

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呼吁在萊茵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1848年11月19日“新萊茵报”第147号增刊报道了各个城市和农村(如維特利希、別恩堡、波恩、科倫及奈海姆)反抗征稅的情形，結尾写道：“柏林只有靠外省的革命毅力才能保全，外省的大城市，尤其是各个省会只有靠乡村的革命毅力才能保全。拒絕納稅(不論直接稅或間接稅)就能使乡村有大好机会来为革命作出重大貢獻。”——第24頁。

- 36 指1848年8月28日普魯士国民議會通过的人身保护法(与1679年英国的法令相似，該法令称为 Habeas Corpus Act [人身保护法])；这一法令一开始就被普魯士政府粗暴地破坏了。——第25頁。
- 37 本文标题是馬克思从歌德的小說“威廉·麦斯特的修业时代”第6篇中引用来的。——第28頁。
- 38 “新普魯士报”的报头上印有一个后备軍的十字勳章，勳章上有一句題詞：“前进，天佑吾王，天佑吾国”。往下在正文中引用了1848年11月11日“新普魯士报”第115号上的話。——第28頁。
- 39 馬克思諷刺普魯士財政大臣汉澤曼所提出的措施与十八世紀荷兰交易所商人品托的观点有若干相似的地方；前者主张以强制公債作为刺激貨币流通的手段，后者把証券投机当作促进周轉的因素。参看“强制公債法案及其說明”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08—309

- 頁)。——第 28 頁。
- 40 奥尔斯瓦特—汉澤曼內閣(所謂“行动內閣”)自 1848 年 6 月 25 日至 9 月 21 日执掌政权。
- 1848 年夏在柏林城里除普通警察外还組織了一支携带武器的便衣警察，他們专门破坏人民群众的街头集会和演說，并且进行特务活动。这支警察部队被称为 констебли (特別警察)，因为他們的行动和参加破坏 1848 年 4 月 10 日宪章派的示威游行的英国特別警察的活动如出一轍。——第 28 頁。
- 41 *Santa casa* (圣殿) ——人們对馬德里宗教裁判所的建筑物的称呼。——第 29 頁。
- 42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話”第八章。——第 32 頁。
- 43 “普魯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 是 1819 年創刊于柏林的一家报纸。自 1819 年至 1848 年 4 月是普魯士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自 1848 年 5 月至 1851 年 7 月，該报成为普魯士政府的官方机关报，名称照旧。
- “福 斯 报”(«*Vossische Zeitung*»)——这是人們根据报纸老板的名字对该报的称呼，原名是“柏林政治和学术問題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該报从 1785 年起以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該报遵循的是温和自由主义的办报方針。——第 36 頁。
- 44 所謂“樞密官区”是柏林西南部的一个街区，普魯士官員大多居住于此。——第 36 頁。
- 45 1848 年 10 月 31 日，柏林获悉奥地利反革命在維也納瘋狂鎮压起义的消息后，发生了大規模的群众示威游行。示威游行以手无寸铁的机械制造工人遭到市民自卫团第八营的挑衅性襲击而告終。普魯士反动派利用这次挑衅事件撤換了普富尔內閣，代之以公开反对革命的勃兰登堡內閣。——第 36 頁。
- 46 市政厅位于柏林的中心区。十九世紀中叶这个区还保留着科恩

- (Köln) 或阿特科恩 (Altköln) 的古称。1848 年 11 月 14 日普魯士国民議会在此举行。——第 36 頁。
- 47 由于这个呼吁书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員會的委員——馬克思、沙佩尔、施奈德尔第二遭到了控告(見本卷第 286—306 頁)。——第 39 頁。
- 48 根据 1848 年 9 月 12 日所通过的瑞士宪法, 联邦法院的成員由联邦議会的两院即国民院和联邦院联席會議选出。——第 40 頁。
- 49 “瑞士国民报”(«*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 是一家資產階級日报, 1842 年起在巴塞尔出版。——第 40 頁。
- 50 指 1848 年 10 月 24 日在夫賴堡(弗里布尔)爆发的反民主叛乱(見注 13)。馬利耶主教是这次叛乱的煽动者。——第 41 頁。
- 51 “窩州新聞”(«*Nouvelliste Vaudois*») 是瑞士的一家資產階級報紙。1798 年創刊, 1914 年以前在洛桑出版; 在四十年代帶有激进色彩。——第 41 頁。
- 52 “瑞士信使报”(«*Courrier Suisse*») 是一家反动報紙, 从 1840 年起 到 1853 年在洛桑出版。——第 41 頁。
- 53 1848 年 10 月 25 日馬利耶主教被捕。10 月 30 日, 加入教区的各州(弗里布尔、伯尔尼、窩州、紐沙特尔和日内瓦)的政府代表在夫賴堡(弗里布尔)举行會議。会上決定釋放馬利耶主教, 但禁止他在上述五州居留和进行活动。12 月 13 日馬利耶被驅逐出境, 直至 1856 年为止。——第 42 頁。
- 54 指 1848 年 11 月 23 日在科倫举行的萊茵民主主义者第二届代表大会。会上討論了有关拒絕納稅运动的問題, 以及吸引农民同反革命派斗争的問題。馬克思参加了大会的工作。——第 44 頁。
- 55 由于国家檢察官黑克尔給“新萊茵报”編輯部写了一封信, 企图推翻对他和檢察长茨魏費尔的控訴, 因此馬克思諷刺地称科倫檢察官是“新萊茵报”的“新的、大有前途的撰稿人”(見“法庭对‘新萊茵报’的审讯”一文,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202—204 頁)。——第 46 頁。

- 56 1848年6月28日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議會通过了一項关于建立临时中央政权的決議，这个政权由帝国摄政王(奥地利大公約翰被推选担任这一职务)和帝国内閣組成。临时中央政权沒有自己的預算和軍隊，沒有任何实力，它只是德意志各邦君主的反革命政策的执行者。——第52頁。
- 57 “国民报”(«*Le National*»)是1830—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四十年代它是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机关报。茹·巴斯蒂德在1836—1846年間曾担任該报外交政策栏的編輯。
“国民評論”(«*Revue nationale*»)是基督教民主派的刊物，1847年5月至1848年7月在巴黎出版，負責人是菲·毕舍和茹·巴斯蒂德。——第52頁。
- 58 馬克西米利安·加格恩受帝国摄政王政府的委托到柏林和什列斯維希去参加关于和丹麦休战的談判。此行完全失敗，因为普魯士和丹麦毫不重視軟弱无力的中央政权的代表。
馬克思把加格恩这次毫无結果之行和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在德国流行很广的約·提·海尔梅斯所写的小說“索菲婭从默麦尔到薩克森旅行記”中的女主人公的命运相比，这位女主人公在旅途中消磨了十年多的時間，但始終沒有达到目的地。——第53頁。
- 59 1848年4月巴登发生了共和派起义，領導人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弗·黑克尔和古·司徒卢威。起义由民主派队伍从瑞士边境进攻开始。到4月底，这一准备得不充分、組織得不好的起义就被鎮压下去了。——第54頁。
- 60 首府州(Vorort)——对瑞士联邦代表會議后来是联邦議會举行會議的那个州的称呼。——第54頁。
- 61 *Quidquid delirant reges, plectuntur Achivi*——昏君闖禍，黎民遭殃(賀雷西“书信集”第一輯第二封信)。——第54頁。
- 62 1848年10月23日德意志中央政权致瑞士首府州伯尔尼的这份照会发表在1848年11月6日的“法兰克福总邮报”上。——第55頁。

63 黎納尔多·黎納尔丁尼 是德国作家克·奥·符尔皮烏斯的同名小說中的主人公。这本屬於所謂“匪盜”小說之列的小說，于十八世紀末出版，受到很大欢迎。

卡尔·穆尔 是席勒所写的“强盜”这个剧本中的主角。

施因德汉斯 (Schinderhannes) —— 意为屠夫汉斯，是德国强盜約翰·毕克列尔的綽号，生于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第 56 頁。

64 暗指路易·波拿巴，他曾利用自己和拿破侖第一的亲屬关系进行投机。——第 56 頁。

65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話”第二十一章。——第 58 頁。

66 1848 年 4 月巴登共和派起义失敗后，它的领导人之一弗里德里希·黑克尔逃亡到了瑞士。他在瑞士的一个乡村穆坦茨(巴塞尔州)一直居住到 9 月，后来便到美国去了。——第 60 頁。

67 1848 年 11 月 20 日法兰克福国民議會通过決議，向中央政府呼吁，請求它通过住在柏林的帝国專員帮助委任一个在国内享有威信的內閣，也就是委任一个和公开反对革命的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內閣比起来更能为普魯士資產階級所接受的內閣。——第 63 頁。

68 这些名称是馬克思从德利加爾斯基告杜塞尔多夫居民书中引来的；“新萊茵报”紧接着这篇文章发表了这个文告。文告中說：

“我作为一个虔信上帝、忠于国王的共产主义者，茲声明如下：为了救济杜塞尔多夫的貧穷的兄弟們，只要我住在此地，我将通过此地的出納总局每年支出一千塔勒，并按月將錢交給本地市济貧金出納处……同胞們！請效法这个榜样，做一个崇高的共产主义者吧。这样，这里及其他任何地方很快就会建立起安宁、和平和信任来。

公民馮·德利加爾斯基

11 月 23 日于杜塞尔多夫。”

由于馬克思的这篇文章，德利加爾斯基对“新萊茵报”提出控告，說該报造謠誣蔑(見本卷第 686 頁)。——第 64 頁。

- 69 指杜塞尔多夫邮政总局局长毛倫布勒歇尔于1848年11月21日发表的声明,这篇声明譴責市民自卫团干涉邮政局的工作。——第67頁。
- 70 关于人身保护法見注36。——第68頁。
- 71 *Code pénal*——是1810年法国通过的刑法典,沿用于法国人占領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1815年萊茵省合并于普魯士以后,它仍和民法典并行于萊茵省。——第69頁。
- 72 見“国家檢察官‘黑克尔’和‘新萊茵报’”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521—526頁)。——第70頁。
- 73 見“逮捕”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90—193頁)。——第70頁。
- 74 引自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德国詩人马·克劳狄烏斯的“萊茵葡萄酒之歌”。——第70頁。
- 75 迪什是科倫的一个旅館;米連茨是柏林的一个旅館,1848年11月15日普魯士国民議会在这里举行會議。——第70頁。
- 76 1848年9月底帝国司法大臣,要求科倫檢察机关控告“新萊茵报”編輯部,因为該报发表了一系列小品文,該文以施納普汉斯基騎士为名嘲笑了著名的反动分子利希諾夫斯基公爵。小品文“著名的騎士施納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是格·維尔特写的,刊載在1848年8—9月、12月和1849年1月的“新萊茵报”上,文章沒有署名。——第71頁。
- 77 根据1831年宪法选举出来的苏黎世州政府,由于1839年9月6日保守派和教权派的叛乱被推翻了。自由派在1845年的选举中获胜,重新掌握了政权。——第72頁。
- 78 S. Franscini. «Statistica della Svizzera». Lugano, 1827; «Nuova statistica della Svizzera», 1848. ——第75頁。
- 79 “洛桑日报。瑞士報紙”(«Gazette de Lausanne et Journal Suisse»)——1798年在洛桑創刊的一家資產階級日报。——第75頁。
- 80 “执行权委员会”(«Commission du pouvoir exécutif»)是制宪議

- 会为了代替已經卸去全权的临时政府而于 1848 年 5 月 10 日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它存在到 1848 年 6 月 24 日卡芬雅克专政确立时为止。——第 76 頁。
- 81 指 1806 年在紐倫堡出版的匿名小册子“深受屈辱的德国”(«Deutschland in seiner tiefen Erniedrigung»)。书商依·弗·帕尔姆为了出版这本反对拿破侖統治和充滿爱国主义精神的小册子而被法国当局槍杀了。——第 78 頁。
- 82 “奥地利事件調查委员会报告。——本报告是因費奈迪、亨利·西蒙、維斯涅尔和鮑恩什米德等議員的質問和收到大批关于奥地利事件請願书而提出的”。这个报告发表于 1848—1849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全德制宪議會记录”第 2 卷第 602—619 頁上(«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verfassunggebenden Reichs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2, Frankfurt am Main, 1848—1849, S. 602—619)。——第 78 頁。
- 83 艾塞勒和柏塞勒是約·威·克利斯特恩匿名出版的諷刺性小册子“1847 年 4 月艾塞勒博士和柏塞勒男爵出席省議會會議旅途散記。現代史的風俗画。”1847 年萊比錫版(«Doctor Eisele's und Baron von Beisele's Landtagsreise im April 1847. Genrebilder aus der neuesten Zeitgeschichte», Leipzig, 1847) 中的两个滑稽人物。——第 79 頁。
- 84 指 1784 年出版的, 十九世紀又多次再版的卡·阿·科尔图姆的諷刺长詩“約卜西之歌。怪誕滑稽的史詩, 共分三章”。附在詩集中的諷諧的旅行图上画着复杂曲折的迷途。——第 79 頁。
- 85 席勒的詩歌“奖杯”(德文标题是«Der Taucher»——“潜水員”)中的一句的改写。——第 79 頁。
- 86 韦尔凱尔是多卷集“政治辞典, 一名政治学百科全书”(«Staats-Lexikon oder Encyclopädie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的发行人之一, 本书第一版于 1834—1848 年在阿尔托納出版。——第 79 頁。

- 87 阿倫特整理的民歌。——第 81 頁。
- 88 罗西尼的歌剧“唐克萊德”中的一句歌詞。——第 81 頁。
- 89 根据維也納會議(1814—1815 年)的決議,萊茵河兩岸的土地划入普魯士版图。此外,还給普魯士国王的称号添上了萊茵大公的头銜。1815 年 4 月 5 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为庆賀这个地区并入普魯士而发表了一篇宣言,允諾在萊茵省和全国实行代議制。——第 87 頁。
- 90 1848 年 4 月 10 日,宪章派在倫敦举行的示威游行,由于軍隊和特別警察的干涉而被破坏了。这次游行的目的是向議會呈递第三次請願书,要求議會通过人民宪章。
1848 年 5 月 15 日,巴黎工人的革命发动被資產階級的国民自卫軍鎮压下去了。
1848 年 6 月 25 日,巴黎无产階級的起义被淹沒在血泊中。
1848 年 8 月 6 日,米兰为鎮压了意大利北部民族解放运动的奧地利軍隊所占領。
1848 年 11 月 1 日,維也納为文迪施格雷茨的軍隊所占領。——第 89 頁。
- 91 1848 年 7 月 25 日,在庫斯托查(意大利北部)附近,奧地利軍隊在拉德茨基的指揮下击败了皮蒙特軍隊。——第 92 頁。
- 92 見“‘模范国家’比利时”和“模范的立宪国家”两篇文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67—370 和 518—520 頁)。——第 98 頁。
- 93 哀杰克斯是莎士比亚的“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中的人物,一个粗魯矜夸的軍人形象。——第 99 頁。
- 94 宗得崩德——見注 8。——第 103 頁。
- 95 巴尔托洛医生是博馬舍的喜剧“塞維尔的理发师”和“費加罗的婚礼”中的人物,也是罗西尼和莫扎特的同名歌剧中的一个人物。——第 111 頁。
- 96 1848 年 12 月 5 日,国王頒布了解散普魯士国民議会的命令。內閣在对

- 該命令的补充說明中譴責議會不服从 11 月 8 日发布的將議會會址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的命令,說什么采取这个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人民代表的辯論自由,使之不受首都无政府主义运动及其恐怖行动的影响”。——第 117 頁。
- 97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 1848 年 5 月在柏林召开的普魯士国民議會称为“协商議會”(«Vereinbarungsversammlung»); 召开这个議会的目的是“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議會把这个公式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从而就放棄了主权屬於人民的原则。——第 118 頁。
- 98 1848 年 12 月 5 日在解散普魯士国民議會的同时,还頒布了欽定宪法。根据这个宪法,实行两院制,第一議院因年龄和财产資格的限制变成了享有特权的“貴族院”;根据 1848 年 12 月 6 日的选举法,只有所謂“独立的普魯士人”才有資格参加选举第二議院議員的两級选举。按照宪法,国王享有广泛的权力,能够直接指示修改宪法条文,这就便利了反革命势力的进一步进攻。——第 118 頁。
- 99 約卜西之歌——見注 84。——第 118 頁。
- 100 普魯士亲王(人民切齿痛恨的反动宫廷权奸的头目)于 1848 年三月革命时逃往英国;但是在康普豪森內閣的支持下他在 1848 年 6 月 4 日又回到了柏林。康普豪森 6 月 6 日在普魯士国民議會會議上,企图把这次胆怯的逃跑說成是增长見識的旅行。——第 119 頁。
- 101 摘自海涅“夜巡邏来到巴黎”一詩。——第 119 頁。
- 102 指 1848 年 9 月 15 日委任接近宫廷权奸的弗兰格尔將軍为勃兰登堡軍区(柏林屬这个軍区管轄)的总司令。勃兰登堡侯国是普魯士最早的中心地区,在中世紀由庫尔馬尔克和涅馬尔克两部分組成;馬尔克(Marken)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第 119 頁。
- 103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以及在其他文章中諷刺康普豪森,称他为有思考力的历史之友,暗指当时一本名著的副标题:卡·罗泰克的“从历史認識的萌芽时期到現在的全部历史;供有思考力的历史之友参考”1813—1818 年夫賴堡和君士坦士版(K. Rotteck. «Allgemeine

Geschichte vom Anfang der historischen Kenntniß bis auf unsere Zeiten; für denkende Geschichtsfreunde». Freiburg und Konstanz, 1813—1818)。——第120頁。

104 見注39。——第120頁。

105 見“康普豪森內閣的垮台”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12—113頁)。——第120頁。

106 第二屆聯合議會 是在康普豪森內閣時期于1848年4月2日召开的。这一为了保持“法統”而召集的等級机关,通过了普魯士國民議會選舉條例,并同意政府發行在1847年遭到聯合議會否決的公債。在此以后,議會于1848年4月10日被解散。——第120頁。

107 指在青年時代經營過黃油和糧食生意的康普豪森和從做羊毛生意開始自己的商業活動的漢澤曼。——第128頁。

108 *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 ——身強力壯但性情乖張的小伙子。見霍布斯“論公民”(《De Cive》)一書序言,該書第一版于1642年在巴黎匿名出版。——第130頁。

109 馬克思在這裡引證普魯士國王多次虛偽許下的在全國實施憲法和代議制的諾言。1815年5月22日的命令答應成立“人民代議機關”——在普魯士成立省等級會議,組織全普魯士的代議機關并實施憲法。根據1820年1月17日頒布的公債法,國家發行公債的決定在征得等級代表機關(省議會)同意之後方能生效。但這些在資產階級反抗運動的壓力下所許的諾言只是紙上空談。結果根據1823年6月5日的法令成立了具有有限諮議權的省等級會議(省議會)。但是,財政困難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7年2月3日頒布了召開聯合議會——由普魯士各省議會代表組成的等級機關——的詔書。曾經否決政府公債的聯合議會很快就被解散了。1848年4月8日的選舉法(由于普魯士三月革命的結果而頒布的)規定召開一個“同國王協商”以制定憲法的議會。這個選舉法所規定的兩級選舉制,保證了資產階級和普魯士官吏在議會中取得多數。——第131頁。

- 110 摘自汉澤曼于 1847 年 6 月 8 日在第一屆聯合議會的會議上的演說。見“第一屆普魯士議會”1847 年柏林版第 7 部分第 55 頁（《Preußens Erster Reichstag》. Th. 7, Berlin, 1847, S. 55）。——第 134 頁。
- 111 指于 1821 年在克韦德林堡出版的希尔德布兰特的小說“庫諾·馮·施萊根施坦，亦名預言家之夢”。——第 134 頁。
- 112 黑和白——普魯士國旗的顏色。——第 135 頁。
- 113 关于特別警察見注 40。——第 138 頁。
- 114 由于 1830 年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而通過的 1831 年比利時資產階級貴族憲法，給選民規定了高額的財產資格限制，從而剝奪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選舉權。——第 140 頁。
- 115 海外貿易公司（*Seehandlung*）是 1772 年在普魯士成立的貿易信用公司；該公司享有許多重要的國家特權，它給予政府巨額貸款，實際上起了政府的銀行老板和財政經紀人的作用。1904 年正式成為普魯士的國家銀行。——第 141 頁。
- 116 关于取消貴族、軍官、僧侶和教師過去享受的所謂等級稅免納權的法案，是汉澤曼于 1848 年 7 月 12 日向普魯士國民議會提出的；关于取消土地稅免納權的法案，是于 1848 年 7 月 21 日提出的。——第 142 頁。
- 117 弗拉·迪亚沃洛（魔鬼大哥）是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意大利的著名強盜米凱爾·皮茨的綽號，是奧伯的同名歌劇中的人物。——第 142 頁。
- 118 見“帕托夫贖買法案建議書”、“廢除封建義務的法案”和“关于現行贖買法案的辯論”三篇文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123—125、325—331 和 360—366 頁）。——第 143 頁。
- 119 指“保護財產和保障一切階級的福利聯盟”的領導人于 1848 年 8 月 18 日在柏林召开的容克代表大會，大會將這個聯盟改名為“保障地主利益聯盟”；這個代表大會獲得了容克議會的稱號。——第 144 頁。

- 120 1848年7月31日在西里西亚地区的一个小城市施魏德尼茨（波兰称作：斯維德尼察），反对反革命軍官压制市民自卫团的抗議游行被鎮压了。施魏德尼茨事件在全德国引起了反应。——第144頁。
- 121 1848年8月9日普魯士国民議會通过了經議員舒尔茨修正过的議員施泰因的提案。該提案要求軍务大臣发出指示，敦促对立宪制度怀有不滿情緒的軍官“履行荣誉的天职”，自动提出辞呈。陆軍大臣施萊根施坦不顾議會決議，不肯发出这样的指示。因此，施泰因于9月7日在国民議会的會議上重新提出自己的提案，提案表决的結果，奥尔斯瓦特—汉澤曼內閣被迫辞职；在继任的普富尔內閣期間，指示终于緩慢地发出了，但这个指示只是一紙空文。1848年9月17日弗兰格尔將軍发布了一道軍令，这道軍令证明了普魯士軍閥公开进攻革命成果的意图。軍令指示要保障“社会安宁”，威胁“反对法制的分子”，并且号召士兵团結在軍官和国王的周圍。——第144頁。
- 122 这是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7年4月11日联合議會開幕时发表的御前演說中的話。国王在这篇演說中声明，他絕不同意实施他称之为“写滿字的紙片”的宪法。——第145頁。
- 123 1814年欽定的路易十八立宪宪章第十四条宣称：“国王是国家的元首”。——第146頁。
- 124 “自由大宪章”（《*Magna Charta Libertatum*》）是受到騎士和市民支持的起义的大封建主向英王“无地約翰”提出的一个文件。大宪章于1215年6月15日签署，它主要是为了大封建主的利益而限制国王的权力，并对騎士阶层和城市居民作了一些让步；而对基本的居民群众即农奴，这个中世紀的等級宪章并未給予任何权利。——第146頁。
- 125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是德国的一家日报，从十七世紀到190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报纸。——第147頁。
- 126 “瑞士信使”（《*Schweizer Bote*》）是1798年創刊的“持論公正和消息灵通的瑞士信使”（《*Der aufrichtige und wohlerfahrene Sch-*

weizer Bote»)的簡称, 1804年起在阿劳(阿劳州)出版。

“巴塞尔州人民报”(«*Basellandschaftliches Volksblatt*»)是瑞士自由派报纸, 1835年在巴塞尔州创刊。——第149頁。

- 127 見“逮捕”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90—193頁)。——第150頁。
- 128 1848年8月9日至30日在安特卫普进行的所謂里斯康土审判案, 是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的政府为了迫害民主派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控訴的理由是, 从法国回国的比利时共和軍团于1848年3月29日同駐在离法国边境不远的里斯康土小村的一队士兵发生了冲突。——第152頁。
- 129 科倫工人联合会 是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支部盟員安·哥特沙克于1848年4月13日創立的。联合会起初約有會員三百人, 到5月初就增至五千人, 他們大多数是工人和手工业者。领导联合会的是主席和各行各业代表組成的委员会。联合会的机关刊物是“科倫工人联合会会刊”(«*Zeitung des Arbeiter-Vereines zu Köln*»), 而从1848年10月26日起則是“自由、博爱、劳动”报(«*Freiheit, Brüderlichkeit, Arbeit*»)。联合会在城市中有許多分会。在哥特沙克被捕后, 莫尔于7月6日当选为主席, 到科倫九月事变以前, 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以后由于有被捕的危險, 不得不逃往国外。10月16日, 馬克思应工人的請求, 暫代联合会主席职务。2月28日沙佩尔当选为主席, 他一直担任到1849年5月底。

工人联合会的大多数领导人(哥特沙克、安內克、沙佩尔、莫尔、列斯納、严森、勒澤尔、諾特荣克、貝多尔夫)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員。

工人联合会在初期是处于哥特沙克的影响下。哥特沙克根据“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精神忽視无产階級在資产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任务的意义, 实施抵制全德国民議会和普魯士国民議会的間接选举的宗派主义策略, 在选举时反对支持民主派的候选人。哥特沙克的詞句非常左而斗争的方法却非常温和, 如以工人的名义向政府和市政府呈递請願书, 只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 支持有手工业者偏見的落后工人的

許多要求等。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策略一开始就遭到贊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路綫的許多會員的反对。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在6月底开始有了轉变。从1848年秋天起，科倫工人联合会在农民中也展开了大規模的鼓动工作。联合会的會員在科倫郊区組織了民主团体和工人联合会，散发了革命文件，其中有“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联合会同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其他一些工人联合会保持有紧密的联系。

1848年冬，哥特沙克和他的追隨者展开了激烈斗争，企图分裂科倫工人联合会。从1849年1月起，他們在自己所办的“自由、劳动”报（《Freiheit, Arbeit》）上对馬克思和“新萊茵报”編輯部进行猛烈的攻击和恶毒的誹謗。但是，这种分裂活动没有得到大多数會員的支持。

为了巩固联合会，馬克思、沙佩尔以及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于1849年1、2月間对联合会进行了改組。2月25日通过了新的会章，会章宣布联合会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4月間，工人联合会委员会通过一項決議，决定在联合会的會議上討論发表在“新萊茵报”上的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資本”。

工人在革命进程中所获得的政治經驗，他們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政策的失望，——所有这一切使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可能在1849年春实际提出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問題。因此，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在組織上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脱离了关系，但是在反对即将来临的反革命的斗争中，并不拒絕和他們采取共同的行动。4月16日科倫工人联合会决定退出德国各民主团体联合会，加入以萊比錫为中心的德国工人联合会总会。1849年5月6日，召开了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

但是，德国当时的局势（反革命的进攻，警察迫害的加剧）妨碍了科倫工人联合会进一步团结和組織工人群众的活动。自从“新萊茵报”停刊和馬克思、沙佩尔以及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离开科倫以后，該会就日益失去了政治性质而逐渐变为一般的工人教育团体。——第152頁。

130 指“科倫工人联合会会刊”（《Zeitung des Arbeiter-Vereines zu Köln》），該刊于1848年4月出版至10月份止；1848年7月以前主編是

安·哥特沙克，在7月至9月期间是约·莫尔。这个刊物介绍了科伦工人联合会以及莱茵省其他工人联合会的活动。1848年10月24日，承印该刊的印刷厂厂主阿·布罗克尔-埃维列尔茨被提起诉讼。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在该刊第12期上刊载了“医生哥特沙克和安内克被捕”的文章，在第13期上又刊载了“科伦的逮捕事件”的文章；说什么这两篇文章侮辱了宪兵和检察长茨魏费尔的尊严。法庭判决印刷厂主以一个月的监禁，如果再出版这个刊物，则要缴纳大量罚金。从10月26日起，科伦工人联合会开始出版新的机关报——“自由、博爱、劳动”报（见注409）。——第153页。

131 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1835年9月颁布的反动法令。这项法令限制了陪审人员的裁判活动，对出版采取了严峻的措施。在出版方面，该法令规定增加定期刊物的保证金，对发表反对私有制和现存国家制度的言论的人处以监禁和课以大量罚款。——第153页。

132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14—17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德国各城市的八十九个民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一切民主团体联合起来，并为此成立了区域委员会及其领导机关德国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会址设在柏林。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有弗吕贝尔、劳、克利盖，当选为候补委员的有拜尔霍费尔、许帖和安内克。但是，由于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软弱和动摇，德国民主运动在通过这个决议以后，仍然是涣散的和无组织的。——第154页。

133 “对哥特沙克、安内克和埃塞尔的倾向性的政治审判。由科伦陪审法庭于1848年12月21日、22日和23日审理。玛·弗·安内克根据文件、被告供词和审讯速记记录公布。‘新科伦报’出版科出版”（«Der Politische Tendenz-Prozeß gegen Gottschalk, Anneke und Esser. Verhandelt vor dem Assisen-Hofe zu Köln am 21., 22. und 23. Dezember 1848. Herausgegeben nach den Akten, nach Mittheilungen der Angeklagten und nach stenographischer Aufzeichnung der mündlichen Verhandlungen von M. F.

Anneke. Verlag der Expedition der «Neuen Kölnischen Zeitung»。本文中的全部引文都是馬克思从这本小册子中摘录下来的。

“市民、农民和士兵的新科倫报”（«*Neue Kölnische Zeitung für Bürger, Bauern und Soldaten*»）是德国革命民主派的报纸，1848年9月10日至1849年6月14日由弗·安内克和弗·博伊斯特在科倫出版。該报的任务是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在城乡劳动者中以及在军队中进行宣傳。——第155頁。

- 134 指1848年7月4日普魯士国民議会會議，在这次会上繼續討論了关于設立專門委员会来調查波茲南事件的問題。在會議結束时决定賦予該委员会以无限的权能；这个标志着奥尔斯瓦特—汉澤曼內閣的失败的決定通过以后，右翼議員違反議会規程，力爭表決关于限制該委员会的权限的提案。左翼議員为了表示抗議，离开了会场。右派就利用这个机会，通过了不許該委员会前往波茲南訊問证人和鉴定人的提議。这样就非法地取消了會議的最初決定。——第157頁。

- 135 “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是資产階級自由派的日报，君主立宪主义者、主张在普魯士领导下統一德国的人們的机关报。該报在1847年到1850年間出版，1848年10月以前在海得尔堡出版（主編是著名的資产階級历史学家盖尔温努斯），随后迁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是巴登政府的机关报，从1757年起于卡尔斯卢厄出版。——第157頁。

- 136 关于科倫三个民主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工人业主联合会——的合并問題，見注35。——第160頁。

- 137 关于拉提博尔、勃罗姆堡和閔斯德各地方法院的決定以及柏林高級法庭的決定的报道載于1848年12月21日“新萊茵报”第174号。——第163頁。

- 138 “德意志改良报，立宪德国的政治性报纸”（«*Die Deutsche Reform, politische Zeitung für das constitutionelle Deutschland*»）是1848—1851年間在柏林出版的一家德国日报，君主立宪主义集团的

机关报。——第 163 頁。

- 139 見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場。——第 164 頁。
- 140 指普魯士国民議会由柏林迁往勃兰登堡开会一事——見注 1。——第 166 頁。
- 141 “野蛮的狩猎”——德国神話故事中有这样一种傳說：每逢夜間，死者的亡灵在“野蛮的猎人”的率領下，发出恐怖的叫喊声，在空中疾馳。碰見了这些亡灵的人就得永远跟它們一起漂泊流浪。——第 166 頁。
- 142 1848 年 12 月，奥地利反革命政府在强制公債問題上遭到了帝国国会的反抗，于是就求助于銀行。但是，政府只是在以沒收銀行全部現金儲备相威胁后才得到了借款。——第 167 頁。
- 143 引自席勒的“欢乐頌”一詩。——第 173 頁。
- 144 羅馬教皇庇护九世为了防止人民运动的发展，在 1846 年当选以后，隨即出面倡导了一系列自由主义改革（特赦部分政治犯，廢除书报預檢制度，等等）。在羅馬人民起义以后，庇护九世于 1848 年 11 月 24 日逃往那不勒斯王国境內的加埃塔要塞。——第 173 頁。
- 145 山岳党是聚集在“改革报”（《La Réforme》，1843 年至 1850 年在巴黎出版）周圍、以賴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主义者的政党；和他們結合在一起的有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者。

“国民报”派联合了以阿尔曼·馬拉斯特为首、以工业資產階級和一部分同它有联系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为依靠的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在四十年代，这一派的信徒聚集在“国民报”（《Le National》）的周圍；該报自 1830 年至 1851 年在巴黎出版。

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議院中的一个反对派集团。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反映了工商业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情緒，他們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种改革是防止革命和保持奥尔良王朝的手段。王朝反对派的首領是奥迪隆·巴罗。

正統主义者是 1830 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襲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

- 朝的拥护者。在反对以金融貴族和大資產階級为靠山的当权的奥尔良王朝的斗争中，一部分正統派往往采取社会蠱惑的手段，把自己装扮成保护劳动者免受資產階級剝削者奴役的好人。——第 174 頁。
- 146 “告我所寵爱的柏林人”是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柏林人民起义方酣时于 1848 年 3 月 19 日早晨頒布的文告。
“告我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 1848 年 3 月 21 日頒布的文告。——第 186 頁。
- 147 弗里德里希斯海茵是柏林的一个公墓，这里埋葬着在街垒战中牺牲的 1848 年 3 月 18 日起义的参加者。——第 187 頁。
- 148 执行普魯士国王秘密使命的陸軍少校維登布魯赫在 1848 年 4 月 8 日递交丹麦政府的一份照会中说，普魯士在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夺取丹麦的这两个公国，而是为了反对“德国的激进分子和共和分子”。普魯士政府竭力迴避正式承认这个有損它的名誉的文件。——第 187 頁。
- 149 指弗·恩格斯的文章“战争的喜剧”、“和丹麦的休战”（两篇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8—40、289—292 和 455—459 頁。——第 188 頁。
- 150 在 1848 年三月革命的影响下，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爆发了反对丹麦的民族解放起义。由于以普魯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的干涉，开始了反对丹麦的軍事行动；但是很快就真相大白，普魯士政府并不打算捍卫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1848 年 8 月 26 日于馬尔摩签订了为期七个月的休战协定，这个协定把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的革命民主成果化为烏有，并且实际上保存了丹麦在这两个公国的統治。1849 年 3 月底，普魯士和丹麦的战争又重新爆发，一直繼續到 1850 年，結果丹麦获胜。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仍然留在丹麦王国中。——第 188 頁。
- 151 根据普魯士將軍普富尔的命令，参加 1848 年波茲南起义的被俘人員都被剃成光头，并用硝酸銀在他們手上和耳朵上打上烙印。——第

- 190 頁。
- 152 指 1848 年 5 月 15 日殘酷鎮壓那不勒斯人民起義的西西里兩島的國王斐迪南二世。見恩格斯的“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21—24 頁）。——第 190 頁。
- 153 文迪施格雷茨指揮下的軍隊於 1848 年 6 月鎮壓了布拉格起義，11 月 1 日撲滅了維也納起義，並在 1848 年 12 月開始進軍反對匈牙利的民族解放運動，佔領了普勒斯堡（布拉的斯拉發）和其他城市。——第 190 頁。
- 154 同革命的法國作戰的奧普聯軍總司令不倫瑞克公爵在 1792 年 7 月 25 日的宣言中威脅法國人民，說要把巴黎從地球上消滅掉。——第 192 頁。
- 155 關於恩格斯在這篇文章中發揮的關於奧地利帝國境內各斯拉夫民族的命運的觀點，參看本卷說明第 XIX—XXI 頁。——第 193 頁。
- 156 指 1846 年 2 月的加里西亞事件，當時在波蘭土地上爆發了爭取波蘭民族解放的起義。克拉科夫的起義者暫時取得了勝利。同時在加里西亞爆發了農民起義。奧地利當局陰險地利用了被壓迫的烏克蘭農民對波蘭小貴族的仇視，於是在一些地方成功地驅使起義的農民去反對波蘭的起義隊伍。克拉科夫起義被鎮壓下去後，加里西亞的農民運動也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了。——第 196 頁。
- 157 盧西人 是資產階級人種志學家和史學家對加里西亞、外喀爾巴阡和布柯維納的烏克蘭居民的稱呼，流行於十九世紀。這些地方的居民被用暴力同全體烏克蘭人民分割開來；1941—1945 年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之後，烏克蘭人民才最終重新統一了。——第 196 頁。
- 158 見“法蘭克福關於波蘭問題的辯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71—414 頁）。——第 197 頁。
- 159 指 732 年在普瓦提埃戰役中法蘭克人對阿拉伯人的勝利。——第 199 頁。

- 160 1241年，在西里西亚的瓦尔施塔特（波兰称作：多勃勒地区）附近发生了会战，结果蒙古人战胜了德国人和斯拉夫人。但是，蒙古人没有利用这次胜利就从西里西亚进攻匈牙利去了。——第199頁。
- 161 1848年6月2日，在布拉格召开了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会上暴露了哈布斯堡帝国压迫下的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两种倾向的斗争。包括代表大会领导人（帕拉茨基、沙法里克）在内的右派即温和自由派，企图用保存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国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左派即民主派（薩宾納、弗利契、里别尔特等人）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并极力主张与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运动采取联合行动。代表大会中属于激进派并且积极参加了布拉格起义的那部分代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留在布拉格的温和自由派的代表于6月16日宣布代表大会无定期延期。
- 1848年6月在阿格拉姆（薩格勒布）举行了南方斯拉夫民族代表会议。——第200頁。
- 162 引自科苏特1848年11月9日在匈牙利议会会议上的演说。见1848年11月11日“公报”（《Közlöny》）。——第206頁。
- 163 黑色和黄色是奥地利国旗的颜色。——第207頁。
- 164 关于法国刑法典（Code pénal）第三七〇条——属于诽谤章——见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审讯中的发言（本卷第279—280頁）。——第208頁。
- 165 这里是指瑞士各州和欧洲各国订立的提供雇佣兵的条约。这种条约从十五世纪中叶一直存在到十九世纪中叶。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许多资产阶级革命中，瑞士的雇佣兵曾充当君主反革命势力的工具。——第209頁。
- 166 “喧声报”（《Le Charivari》）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1832年于巴黎出版；七月王朝时期，该报对政府进行了辛辣的攻讦；在1848年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政府和卡芬雅克的专政。——第210頁。
- 167 “进化报”（《Die Evolution》）是革命民主派的周报，是侨居瑞士的德国流亡者的机关报。1848年至1849年由约·菲·贝克尔任主编，

- 在俾尔(伯尔尼州)出版;1848年12月1日,該报以“革命报”(«Die Revolution»)的名称試行出版。——第212頁。
- 168 恩格斯沒有續写这篇文章,因为他在1849年1月中已返回科倫。——第213頁。
- 169 全名是“普魯士君主立宪拥护者同盟”,成立于1848年6月,地方設有分支机构。这是一些資产階級化的普魯土地主和資产階級的組織。“普魯士同盟”支持政府的反革命政策。因此民主刊物根据它的活动把它叫做“告密社”。——第214頁。
- 170 “市民联合会”(«Bürgervereine»)是三月革命后在普魯士产生的温和的資产階級分子的組織,其任务是在君主立宪範圍內維護“法制”和“秩序”,以及同“无政府状态”即同革命民主运动作斗争。——第215頁。
- 171 1848年12月5日欽定宪法的最后条款和召开議院會議的命令都規定,在最后批准宪法和对宪法宣誓以前,由議院对宪法条文进行修改。——第215頁。
- 172 原文中用的是双关語:«wühlen»和«heulen»,指«Wühler»和«Heuler»。「Wühler»(“煽动者”)是1848—1849年期間德国資产階級立宪派送給民主共和派的綽号,而后者則把自己的对手称为«Heuler»(“抱怨派”)。——第220頁。
- 173 *Code civil*——拿破侖民法典,1804年通过,曾在法国占領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行。1815年萊茵省归并普魯士后,这个法典在該省境內繼續有效。——第224頁。
- 174 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一世于1649年被处死刑;斯图亚特王朝詹姆士二世于1688年被驅逐出境。
在法国,波旁王朝第一次被推翻是在1792年,第二次是在1830年。
在比利时,拿騷国王威廉1830年被推翻。——第227頁。
- 175 1839年1月21日普魯士(代表关稅同盟)和荷兰簽訂了通商条約。条約上規定的荷兰糖的入口稅很低。这給普魯士制糖工业带来了严重的

- 危害,同时也使德国各大城市的商业遭到損失。——第 228 頁。
- 176 指康普豪森和汉澤曼。——第 231 頁。
- 177 普什塔——匈牙利草原,位于多瑙河与蒂薩河之間的多瑙河沿岸的一个盆地里。——第 233 頁。
- 178 席尔达——城市名称。該城居民——席尔达人是十六世紀末流傳在德国民間的同名故事(«Schildbürger»)里所描写的人物,他們是庸人的无知和愚蠢的象征。——第 234 頁。
- 179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1848 年在柏林出版的德国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第 234 頁。
- 180 1848 年 4 月 8 日的选举法規定了“普魯士宪法协商會議”的选举程序。选举在普选权的基础上进行。然而,普选权是有限制的,即受間接的(兩級的)的选举制的限制。1848 年 12 月 6 日继欽定宪法之后頒布的法令,仅仅給了所謂“独立的普魯士人”以选举权(見注 287)。——第 234 頁。
- 181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話”第八章。——第 236 頁。
- 182 1848 年 2 月 24 日——法国人民在这一天推翻了法国路易-菲力浦王朝。
1848 年 3 月 18 日——普魯士革命在这一天开始。在柏林发生了街垒战。——第 239 頁。
- 183 引自歌德的小說“威廉·麦斯特的修业时代”第 5 卷第 16 章,即描述米尼昂的詩篇。——第 241 頁。
- 184 关于抱怨派見注 172。——第 244 頁。
- 185 指执行权委员会——見注 80。——第 249 頁。
- 186 歌德“漂泊者的夜歌”。——第 258 頁。
- 187 梯利——三十年战争时期天主教同盟統帅。1631 年 5 月 20 日他在攻占了馬格德堡以后,让他的士兵洗劫該城。城市几乎全被士兵燒毀,变

- 成了廢墟。三万市民慘遭杀害。——第 260 頁。
- 188 普魯士政府在 1849 年 1 月 23 日的向駐德意志各邦的普魯士外交官員的通告中，提出了恢复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构——联邦議会的計劃。这个議會是根据 1815 年維也納會議的決定强加于德国人民的反动的封建机构。——第 260 頁。
- 189 “新萊茵报”审判案是在 1849 年 2 月 7 日举行的。出席科倫陪審法庭受审的有“新萊茵报”总編輯卡·馬克思、編輯弗·恩格斯、发行負責人 (Gerant) 海·科尔夫。他們被控的罪名是，他們在“新萊茵报”1848 年 7 月 5 日第 35 号上发表的一篇标题为“逮捕”的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190—193 頁)中侮辱檢察长茨魏費尔和誹謗逮捕哥特沙克和安內克的宪兵。虽然法庭从 7 月 6 日起就开始偵訊，但是首次开庭审訊規定在 12 月 20 日才进行，后来又延期。在 2 月 7 日的审判会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护律师是施奈德尔第二，科尔夫的辯护律师是哈根。当陪審法庭宣判被告无罪时，“出席旁听的广大群众发出了一片欢呼声”——审訊記錄中这样写道。——第 262 頁。
- 190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那些为了“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而召集的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称为 协商派 (Vereinbarer)。——第 271 頁。
- 191 在 1848 年 7 月 18 日“新萊茵报”第 48 号上发表了一篇杜塞尔多夫通訊。这篇通訊尖銳地批評了檢察长施納澤反对杜塞尔多夫人民俱乐部的演說。——第 276 頁。
- 192 馬克思指的“新萊茵报”就尤·符尔夫(1848 年 7 月 10 日第 40 号)、法肯海恩(1848 年 7 月 13 日第 43 号)和約瑟夫·沃尔弗(1848 年 8 月 1 日第 62 号)等人被捕事件而进行的揭露。檢察长黑克尔对后一篇通訊提出了反駁(載于“新萊茵报”1848 年 8 月 3 日第 64 号)。“新萊茵报”編輯部針對他的反駁写了一篇短評：“黑克尔先生和‘新萊茵报’”(1848 年 8 月 4 日第 65 号)。——第 277 頁。
- 193 見法庭对“新萊茵报”的审訊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203 頁)。——第 282 頁。

- 194 指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周圍的反動黨羽（格爾拉赫弟兄、拉多維茨和其他等人）。——第 283 頁。
- 195 對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的審判是在 1849 年 2 月 8 日舉行的。卡·馬克思、卡·沙佩爾和律師施奈德爾第二曾出席科倫陪審法庭受審。他們被控的罪名是煽動叛亂，根據是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於 1848 年 11 月 18 日發表了號召拒絕納稅的呼喚書（見本卷第 39 頁）。陪審法庭宣判被告無罪。——第 286 頁。
- 196 關於“野蠻的狩獵”見注 141。——第 297 頁。
- 197 關於 Habeas Corpus Akte 見注 36。
國民議會在 1848 年 10 月 13 日通過的公民自衛團法使民眾武裝完全依附於政府。然而，即使這種形式的民眾武裝在反革命看來也是一種危險，所以在 1848 年 11 月 12 日弗蘭格爾的軍隊開進柏林後，民眾武裝就被解除了。——第 298 頁。
- 198 關於施泰因提議的軍令見注 121。——第 299 頁。
- 199 翁魯“新編普魯士歷史概論”1849 年馬格德堡版(Unruh, «Skizzen aus Preußens neuester Geschichte». Magdeburg, 1849)。——第 300 頁。
- 200 賓夕法尼亞監獄是個設有單身牢房的監獄。第一所這樣的監獄，1791 年修建於費拉得爾菲亞城（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單獨監禁在十九世紀在歐洲非常流行。1844 年在德國修建的有名的柏林莫阿罕特區監獄和其他一些監獄就是這種類型的監獄。——第 309 頁。
- 201 指 1849 年 2 月 7 日和 8 日舉行的對“新萊茵報”編輯和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的審訊。——第 310 頁。
- 202 指發表在 1849 年 2 月 3、4、9 和 10 日“科倫日報”第 29、30、34 和 35 號上的列·許金的“政治對話”。瓦格納是對話人之一，他對烏里安教授說：“你總是有点佯裝摩非斯特斐勒司。”——第 310 頁。
- 203 珂桑德拉是古希臘英雄史詩中的女預言家。——第 312 頁。

- 204 关于“普魯士同盟”見注 169。——第 313 頁。
- 205 1848 年 11 月 22 日拉薩尔在諾伊斯(在杜塞尔多夫附近)民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說,他呼吁:在必要的情况下应給普魯士国民議会以武装支援。当天拉薩尔就被捕了。——第 319 頁。
- 206 *Code d'instruction criminelle* 是一部在萊茵省有效的法国刑事訴訟法典。往下馬克思引用了这部法典的第三六〇条。——第 320 頁。
- 207 关于恩格斯在本文中發揮的关于奧地利帝国境内各斯拉夫民族的命运的观点,參看本卷說明第 XIX—XXI 頁。——第 322 頁。
- 208 «Aufruf an die Slaven. Von einem russischen Patrioten Michael Bakunin. Mitglied des Slavenkongresses in Prag». Koethen, 1848. ——第 323 頁。
- 209 見恩格斯的“在倫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662—676 頁),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演說“論波兰”,恩格斯的“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說”、“‘滿意的’多数派議員”,以及 1848 年 1 月馬克思在布魯塞尔所做的“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09—412 頁、第 423—426 頁、第 430—437 頁、第 444—459 頁)。——第 326 頁。
- 210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話”第七章。——第 327 頁。
- 211 紹克人——居住在斯拉窩尼亚和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維亚人的綽号,他們大部分是天主教徒。——第 328 頁。
- 212 摩尔拉克人——居住在达尔馬威亚的塞尔維亚族,大部分是天主教徒。——第 330 頁。
- 213 見恩格斯的“德国状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631—653 頁)、“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論波兰”的演說、“三个新宪法”、“致‘改良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223—275 頁、第 410—412 頁、第 528—533 頁和第 542—544 頁)。——第 334 頁。

- 214 斯拉夫菩提樹 是1848年4月底成立的一个捷克国民协会。布拉格协会的領導权掌握在資產階級自由主义者(沙法里克、加烏奇)的手中，他們在1848年6月布拉格起义之后轉入反革命陣营，而在各省分会中起領導作用的主要是捷克激进的資產階級代表。——第338頁。
- 215 同盟会——1848年3月在捷克出現的民族的，主要是大学生的組織。
德国大学生联合会——在反拿破侖解放战争的影响下产生的德国大学生的組織；这些組織主张統一德国。在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中除进步思想外，也广泛流行着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第340頁。
- 216 瓦特堡紀念大会 是德国大学生于1817年10月18日为了紀念宗教改革三百周年和1813年的萊比錫会战四周年而举行的。这一表現了民族主义情緒的紀念大会后来形成了反对派大学生反对梅特涅統治的示威游行。——第340頁。
- 217 阿·本策尔于1819年就耶拿大学生联合会解散一事而作的歌曲。——第340頁。
- 218 等級委员会 是1842年在普魯士建立的。这些委员会是各省議會按照等級划分从自己的議員中选举出来的。各等級委员会組成的联合机关——联合委员会，行使諮議职能。——第343頁。
- 219 “普魯士王国法令汇编。1844年”柏林版第96頁(«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1844». Berlin, S. 96)。——第344頁。
- 220 文中所引的統計表和統計材料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已根据奧·泰·維尼格爾出版的“第一屆普魯士議會”1847年柏林版第7部分(«Preußens Erster Reichstag». Th. 7, Berlin, 1847)加以更正。——第344頁。
- 221 卡·阿·康普茨著“普魯士立法、法學与訴訟程序年鑑”1831年柏林版第37卷第407頁(K. A. Kamptz. «Jahrbücher für die Preussische Gesetzgebung, Rechtswissenschaft und Rechtsverwaltung». Bd. 37, Berlin, 1831, S. 407)。——第346頁。

- 222 “普魯士公法”第二篇第二〇章第三三三节 (《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zweiter Theil, zwanzigster Titel, § 333)。——第 346 頁。
- 223 关于馬克思在普魯士联合議會第二議院选举时期的策略見本卷第 688 頁。——第 355 頁。
- 224 这一思想包括在恩·德朗克的“国民議會八月七日和八日的會議”一文中,見 1848 年 8 月 13 日“新萊茵报”第 74 号。——第 356 頁。
- 225 “西里西亚报”(《Schles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从 1742 年起在布勒斯劳出版;在 1848—1849 年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間是君主立宪集团的机关报。——第 356 頁。
- 226 歌德“温和的諷刺詩”。——第 358 頁。
- 227 1849 年 2 月 16 日和 17 日,在科倫审理了金克尔案件,他的被控罪名是侮辱驻美因兹的普魯士警备部队。金克尔被判处一个月的监禁。——第 359 頁。
- 228 “改革报”(《La Réform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派的机关报,自 1843 年至 1850 年在巴黎出版。从 1847 年 10 月起到 1848 年 1 月,恩格斯在該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共和国报”(《La Républiqu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机关报;自 1848 年 2 月 26 日至 1851 年 12 月 2 日在巴黎出版,主編是埃·巴萊斯特。
“民主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派的机关报;自 1848 年 11 月 7 日至 1849 年 6 月 13 日在巴黎出版,主編是沙·德勒克呂茲。——第 360 頁。
- 229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是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 年創刊,1852 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 1844 年 11 月起在倫敦出版。該报的創始人和編輯是非·奧康瑞尔,乔·哈尼也是編輯之一。自 1843 年至 1850 年該报发表过弗·恩格斯的論文和短

- 評。——第 360 頁。
- 230 指意大利的几家民主报纸——“黎明报”(«*L'Alba*»), 1847 年至 1849 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现代人报”(«*Il Contemporaneo*»), 1846 年至 1849 年在罗马出版,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协和报”(«*La Concordia*»), 1848 年至 1849 年在都灵出版。——第 360 頁。
- 231 在“新莱茵报”第 225 号附刊中对这份奥地利的情报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批判。恩格斯在本文的结尾也援引了这份情报。——第 366 頁。
- 232 由于 1848 年 11 月 16 日人民起义的胜利和随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在罗马实现了普选制。在普选制的基础上,1849 年 1 月 21 日选出了制宪议会。制宪议会于 2 月 9 日剥夺了罗马教皇的世俗权力并宣布成立共和国。罗马共和国存在到 1849 年 7 月 3 日,因遭到外国干涉的打击而倾复。——第 369 頁。
- 233 “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 Oberpostamts-Zeitung*») 是 1619—1866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一家德国报纸,属于享有邮政特权的图尔恩-翁特-塔克西斯诸侯。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该报是中央政权——帝国摄政和帝国内阁——的机关报。——第 373 頁。
- 234 “往事述评或上届政府的机要档案”(«*Revue rétrospective ou Archives secrètes du dernier Gouvernement*») 是茹·塔谢罗在巴黎出版的一种汇编,自 1833 至 1838 年按月出版,在 1848 年则不定期出版。在该汇编 1848 年第 3 期上公布了 1840 年、1842 年、1844—1847 年七月王朝外交部的秘密开支的清册,其中记有每年付给基佐政府的密探、“法兰克福总邮报”编辑卡·彼·倍尔利的津贴。——第 373 頁。
- 235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自 1842 年 1 月 1 日至 1843 年 3 月 31 日在科伦出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抱有对立情绪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该报曾吸收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 年 4 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 10 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

- “萊茵報”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許多文章。在馬克思担任編輯期間，該報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当局对“萊茵報”进行了特別严格的檢查，后来把它封閉了。——第 373 頁。
- 236 1849 年 2 月 20 日“法蘭克福总郵報”第 44 号上引用了“德意志改良報”上所刊載的一篇巴黎通訊中的一段。——第 373 頁。
- 237 本文中所引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普魯士議會開幕时的御前演說的全文，发表在 1849 年 2 月 28 日“新萊茵報”第 233 号特別附刊上。“新萊茵報”在这篇文章后面所刊載的御前演說辞，把这段話改成：“我深感遺憾的是，必須宣布首都及其近郊戒严，以便恢复法定秩序和社会安全。諸位，相应的提案将立即提交給你們申議。”——第 375 頁。
- 238 关于九月法令見注 131。——第 375 頁。
- 239 白厅 是柏林王宮中的一座大厅；1849 年 2 月 26 日在这里举行了重新召集的普魯士議會第一次两院联席會議。——第 377 頁。
- 240 指普魯士政府 1849 年 2 月 9 日頒布的关于修改旧的工商业章程的两个命令：即关于实施工商业諮議(Gewerberäte)制度和关于实施工商业仲裁(Gewerbegerichte)制度的命令。——第 379 頁。
- 241 *Gagging laws* (禁口律) ——这是人們对英国在 1819 年頒布的六个特別法令的称呼，这些法令限制了言論、集会和出版的自由。——第 379 頁。
- 242 “德意志总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自 1843 年至 1879 年以該名称在萊比錫出版；1848 年夏天以前該報所持的是保守方針，以后則采取自由主义方針。——第 382 頁。
- 243 在卢格起草的“德国改良派激进党的选举宣言”(1848 年 4 月)中，曾宣称全德国民議會的首要任务是“表达事变的理智”。——第 383 頁。
- 244 該報(“民主总汇报”)沒有出版。——第 383 頁。
- 245 “改革報。民主派机关報”(«*Die Reform. Organ der demo-*

- kratischen Partei*)——是德国一家报纸，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从1848年4月起由河·卢格和亨·伯·奥本海姆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主编是爱·梅因；从1848年夏季到五十年代初该报在柏林出版。——第383頁。
- 246 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是为大地主—土地贵族的利益而在英国实行的。因谷物法而引起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第386頁。
- 247 争夺北美太平洋沿岸的俄勒冈州的斗争，以美英两国于1846年共同瓜分该州而告终。从此，美国就伸展到了太平洋沿岸。——第386頁。
- 248 在1845—1849年間，英国在印度对锡克教徒国家进行了多次掠夺战争；这些战争的结果是整个旁遮普全被东印度公司吞并。——第386頁。
- 249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包林这次发言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85—292、450、453頁。——第386頁。
- 250 *Petty sessions* (即决法庭)是英国治安法院的期庭，这种法庭按简化的诉讼程序审理小案件。
Quarter sessions (季度法庭)是治安法官的例庭，每年举行四次。——第391頁。
- 251 法兰克福的中央三月同盟及其在德国各城市的分支，是在1848年11月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翼议员们组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8年12月起就已经开始在“新莱茵报”上抨击领导同盟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的不彻底和不坚决的政策，指出这种政策对革命的敌人有利。——第394頁。
- 252 1849年3月4日，暗中操纵年轻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奥地利的宫廷权奸，举行了政变，强使国家接受反民主的新宪法；3月7日，正在

- 克累姆西尔举行會議的帝国議会被解散。——第 397 頁。
- 253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 1847 年 4 月 11 日联合議會开幕式上講話时所作的声明：他是“未被削弱的王权的继承者，所以也应该使王权不被削弱地傳給自己的后嗣”。——第 401 頁。
- 254 在十九世紀前半叶，凡是貼在街头上供大众观看的号召、声明和告示，統称为招貼。这种招貼是政治斗争中的銳利武器，是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工具。——第 401 頁。
- 255 黑、紅、黄 这三种顏色是德国民族統一运动的象征。——第 402 頁。
- 256 路易-菲力浦政府于 1834 年頒布的所謂 *crieurs publics* (报販) 法，目的在于阻难反政府派的出版物的推銷。——第 402 頁。
- 257 在 1815 年萊茵省归并普魯士以后，普魯士政府力图取消曾在該省实行的法国資產階級法典，而代之以封建的普魯士法，为此頒布了一系列旨在恢复萊茵省貴族的封建特权(长子继承权)、实施普魯士刑法和婚姻法等的法律、指令和法令。这些措施在萊茵省引起了坚决的反对，在三月革命以后，終於为 1848 年 4 月 15 日的法令所廢除。——第 403 頁。
- 258 汉澤曼創办的“立宪报”(«*Constitutionelle Zeitung*») 是德国自由資產階級的报纸，1849 年春在柏林創刊。——第 408 頁。
- 259 見注 145。——第 419 頁。
- 260 1848 年 3 月 16 日，法国临时政府决定对各种直接稅每一法郎附加四十五生丁。这种附加稅的重担主要落在了农民身上。由于資產階級共和派采取这种政策的結果，使农民离开了革命并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的总統选举中把选票投給了路易·波拿巴。——第 420 頁。
- 261 指波旁王朝 1814 年 5 月的第一次复辟和拿破侖第一企图夺回帝位失败(“百日”)后的 1815 年 7 月的第二次复辟。——第 420 頁。
- 262 “政治和文学辯論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是法国資產階級的日报，1789 年創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是政府的报纸，奥尔良資產階級的机关报。1848 年革命时期，該报

- 反映了反革命資產階級的观点。——第 421 頁。
- 263** 1848 年 5 月 15 日，由布朗基、巴尔貝斯等人所領導的巴黎工人舉行了革命發動，反對資產階級制憲議會壓迫工人的反革命政策，并向它提出了許多要求，其中包括巴尔貝斯提出的向富人征收十億稅款的要求。——第 421 頁。
- 264** 1849 年 3 月 7 日至 4 月 3 日在布尔日對 1848 年 5 月 15 日事件的參加者進行了審判。這次審判的結果，1849 年 4 月 2 日巴尔貝斯被處以無期徒刑，布朗基被處以十年的單獨監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爾、阿尔伯等人各被判處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第 421 頁。
- 265** 指 1848 年 12 月 29 日“新萊茵報”第 181 號上刊載的“三月同盟文獻”一文，該文揭露了法蘭克福左派人物中的小資產階級首領們的眞面目，這些人由於採取不徹底的政策，從而幫助了反革命。“新萊茵報”稱他們為“我國革命中的吉倫特派”。——第 424 頁。
- 266** 指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中的反動的“天主教聯盟”，這個聯盟的首腦是極右派的頭子拉多維茨，馬克思稱他為“普魯士反革命的主腦”（見本卷第 541 頁）。——第 424 頁。
- 267** 暗指羅泰克著的當時一本有名的書的副標題（見注 103）。——第 425 頁。
- 268** 十八世紀末葉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斐揚派俱樂部，是代表和王權有密切聯繫的大資產階級以及自由派貴族的利益的。它團結了君主立憲的擁護者。——第 425 頁。
- 269** 卡尔·福格特是 1848—1849 年“三月同盟”的領導人之一，後來他比“新萊茵報”所預言的更壞，——他成了路易·波拿巴的僱傭密探。見馬克思的抨擊性小冊子“福格特先生”（1860 年）。——第 425 頁。
- 270** 引自哥·奧·畢爾格爾的敘事詩“列諾爾”。——第 427 頁。
- 271** 暗指沙皇軍隊對 1830—1831 年波蘭起義的鎮壓。——第 427 頁。

- 272 帝国法庭 是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德国的最高訴訟机关，由于它处理案件时极端拖拉和緩慢以及其成員的貪脏枉法，成了大家談笑譏諷的話柄。随着所謂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羅馬帝国的消灭，帝国法庭也于1806年不复存在了。——第428頁。
- 273 在1848年4月底5月初鎮压波茲南起义的时候，普魯士軍隊在米洛斯拉弗附近吃了敗仗，并在弗勒申（弗热斯尼亚）附近槍杀了波兰的起义者（見本卷第188—189頁）。
所謂普魯士軍隊的“胜利”，是恩格斯对普魯士軍隊殘酷鎮压安哈尔特（1849年3月）、美因茲（1848年5月）的人民运动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848年9月）的起义的諷刺反語。——第428頁。
- 274 指巴黎工人1848年六月起义一周年。——第430頁。
- 275 康普豪森曾經是1842—1843年在科倫出版的“萊茵报”的股东之一。——第430頁。
- 276 弗里德里希斯海茵 見注147。——第431頁。
- 277 省等級會議（省議會）在普魯士于1823年設立，由四个等級（諸侯、貴族、城市和村鎮）的代表組成。选举資格的限制和选举的一切詭計，保证了貴族在省議會中取得多数席位。省議會由国王召集，其职权範圍仅限于地方經濟和本省的管理問題。省議會拥有非常有限的諮議职权，即有权对政府提交它們討論的各种法案表示自己的意見。1843年，国王以在普魯士实行統一的立法为理由，提交萊茵省議會討論一个新的刑法草案，以代替萊茵省的帶有較多自由主义色彩的法国刑法典。第七届萊茵省議會（1843年）否决了这个法案，宣称萊茵省的現行立法完全符合萊茵省的風俗、习惯和法律关系。——第432頁。
- 278 暗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7年2月3日关于召集联合議会的詔书（特許状）。——第432頁。
- 279 烏凱馬尔克 是勃兰登堡省（屬普魯士）的北部地区，是反动的普魯士容克的堡垒。——第434頁。
- 280 神圣的埃尔曼达德 見注6。——第434頁。

- 281 指維也納和會 (1814—1815 年)，在這次會議上，歐洲反動派的首領奧地利、英國和沙皇俄國悍然不顧各國人民恢復統一和獨立自主的利益，重新繪制了歐洲的地图，以便使各正統王朝復辟。——第 435 頁。
- 282 由各省議會代表組成的所謂聯合委員會，是為討論新刑法草案而於 1848 年 1 月召集的。普魯士政府召集這些委員會的目的，是想借此造成準備進行改革的假象，來平息日益增長的社會騷動。委員會的活動為 3 月初在德國展開的革命發動所打斷。——第 435 頁。
- 283 指普魯士國王 1821 年 3 月 6 日發布的命令，該命令規定有關叛國罪的普魯士刑法在萊茵省生效。——第 436 頁。
- 284 1848 年 12 月 5 日，勃蘭登堡—曼托伊費爾反革命政府解散了普魯士國民議會，公布了所謂的欽定憲法並指定於 1849 年 2 月 26 日召開兩院會議。——第 441 頁。
- 285 抱怨派 見注 172。——第 444 頁。
- 286 在 1814 年 1、2 月出征拿破侖法國的時期，聯軍中的普魯士軍隊在香檳（在奧布河岸巴爾、聖迪濟埃、蒙米賴等地附近的戰役中）打了許多敗仗。
1806 年 10 月 14 日普魯士軍隊在耶拿城下的潰敗使普魯士投降了拿破侖法國。這次潰敗表明，霍亨索倫封建王朝的社會政治制度已完全腐朽。——第 445 頁。
- 287 1848 年 12 月 6 日關於第二議院選舉的選舉法令，承認所謂“獨立的普魯士人”有選舉權；這種含糊的說法使政府有無限的可能來縮小選民的範圍。——第 447 頁。
- 288 倫敦 聖斯蒂凡教堂 是韋斯明斯特大寺院的一部分，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英國下議院的會議就在此舉行。
“無雙議院”是 1815—1816 年由極端反動分子組成的法國眾議院。
1848 年 2 月 24 日的議院 是法國的眾議院，它企圖防止革命的擴展和保持君主制，遂舉路易-菲力浦的孫子巴黎伯爵以接替路易-

- 菲力浦；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遜位予巴黎伯爵。——第448頁。
- 289 1849年3月12日，撒丁國王撕毀了1848年8月9日和奧地利簽訂的停戰協定，3月20日又開始了軍事行動。但是在3月23日皮蒙特軍隊就被擊潰了。於是查理-阿爾伯特退位。新國王維克多-艾曼努爾二世於3月26日同奧地利人簽訂了停戰協定，1849年8月6日締結了和約。——第453頁。
- 290 這是波蘭國歌中的一句歌詞。——第455頁。
- 291 1848年夏天意大利北部發生革命時期，加里波第曾援助過查理-阿爾伯特。但是皮蒙特軍隊的統帥部一點也不援助加里波第的志願部隊，使它實際上不得不跟奧地利人單獨作戰；志願部隊被擊潰而不得不向瑞士撤退。——第456頁。
- 292 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馬志尼於1834年組織的意大利革命流亡者的出征。起義隊伍從瑞士進入薩瓦，但被皮蒙特軍隊所擊潰。——第458頁。
- 293 指1849年3月21日法國國民議會一讀通過的禁止俱樂部活動的法令。這個法令剝奪了工人的集會和結社的自由。——第459頁。
- 294 1848年2月24日是法國路易-菲力浦王朝被推翻的日子。——第459頁。
- 295 在西班牙人民反對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戰爭中，人民游擊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第462頁。
- 296 忠實的埃卡爾特是德國中世紀傳說中的人物，是忠實的人和可靠的衛士的典型形象。在關於湯豪塞的傳說中，他守護在維納斯山旁，警告一切要想接近的人說，維納斯的魔力是很危險的。——第471頁。
- 297 指拉多維茨的小冊子“德國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8年漢堡版（《Deutschland und Friedrich Wilhelm IV》.Hamburg, 1848）。——第471頁。

298 “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馬克思根据他于1847年12月下半月在布魯塞尔德国工人协会所作的讲演而写的。約·魏德迈抄写的标题为“工資”的手稿被保存了下来，这部手稿跟“新萊茵报”上发表的本文几乎完全一致。1848年初，馬克思试图在布魯塞尔发表这部著作。可是，由于馬克思被逐出比利时而未能出版。

这部著作以“新萊茵报”社論的形式于1849年4月5—8日和11日首次发表，标题为“雇佣劳动与资本”。由于馬克思暂时离开科倫，后来又由于德国政局更加紧张以及“新萊茵报”的停刊，这些文章的刊載遂告中断。

“雇佣劳动与资本”的首次发表，就已经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工人中的傳播。例如，根据科倫工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定，馬克思的这些文章曾被推荐给科倫和其他城市的工人联合会討論。

“新萊茵报”停刊后，馬克思曾想出版“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单行本，但是他未能亲自实现这个想法。这部著作的单行本于1880年在布勒斯劳首次出版，馬克思未能参与其事。1881年又在同一地方再版。在恩格斯的参加下，这部著作于1884年又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并附有恩格斯写的一篇关于该书发表经过的简短序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第一种外文譯本是俄譯本（根据1880年德文版譯出）；該譯本于1883年在日内瓦出版。

1891年，为了在工人中进行宣傳，这本小册子又出了一种新版，由恩格斯校訂并作序。在这一版本中，恩格斯作了某些修改和补充，以使文章的叙述符合于馬克思經济学說的进一步发展。关于正文的重新校訂，恩格斯在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所作的一切更改，归納起来只有一点。凡在原稿上是說工人为取得工資而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的地方，在現在的本子上都改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量”。接着，恩格斯論证了作这种更改的必要性。

所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仍然是不完全的。馬克思于1847年12月写的手稿“工資”（見本卷第635—660頁）可以作为正文的部分补充。

在本卷中，馬克思的这部著作的俄譯文譯自“新萊茵报”。凡恩格斯在1891年的单行本中所作的重要更改，均在脚注中注明。这部著作的章节是按“新萊茵报”发表时的样子划分的。——第473頁。

299 正如恩格斯在其为 1891 年版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这部著作在报纸上尚未载完；在第 269 号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續’的字样，但这个诺言未能履行，因为当时爆发的事变——俄国人侵入匈牙利，德勒斯頓、伊塞隆、爱北斐特、普法尔茨和巴登等地举行了起义——使該报本身停止出版”。——第 506 頁。

300 在 1849 年 4 月 6、7、8、11 和 13 日“新萊茵报”第 265、266、267、269 和 271 各号上，刊載了格·維尔特所写的一系列小品文，嘲笑了法兰克福国民議会 1849 年 3 月 28 日所通过的关于选举普魯士国王威廉四世为德意志皇帝的决定。——第 510 頁。

301 在 1849 年 3 月 23 日的諾瓦拉（意大利北部）会战中，奥地利軍队打败了皮蒙特軍队。关于这次会战，可参看恩格斯的“皮蒙特軍队的失敗”一文（本卷第 458—468 頁）。

由于匈牙利軍队的进攻胜利，1849 年 4 月初奥地利軍队被迫撤离佩斯，而把卫戍部队留在布达城的要塞中，对要塞的圍攻繼續到 5 月 2 日，这时要塞才被匈牙利人占領。

所謂埃克恩弗尔德的“海战”，是恩格斯对德国海岸炮垒轰击丹麦分舰队以及 1849 年 4 月 5 日在埃克恩弗尔德港口（什列斯維希）夺得两艘兵舰一事的譏諷；这个对于同丹麦战争的进程没有什么重大影响的事件，曾被普魯士官方报刊說成普魯士軍队的重大胜利。

1849 年 4 月 13 日，所謂的德意志联邦部队攻占了丹麦在杜佩尔村（什列斯維希）的防御工事。——第 510 頁。

302 禁口律 見注 241。——第 510 頁。

303 見“关于奉 1848 年 12 月 5 日圣諭召开的議院辯論的速記記錄。第二議院” 1849 年柏林版第 462—465 頁（《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urch das Allerhöchste Patent vom 5. Dezember 1848 einberufenen Kammern. Zweite Kammer》. Berlin, 1849, S. 462—465）。——第 510 頁。

304 1848 年三月革命以后，在波茲南爆发了波兰人反对反动的普魯士压迫的民族解放起义；参加这个运动的不仅有领导运动的波兰小貴族，还有

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普魯士政府于 1848 年 3 月作了让步，允諾成立一个委员会在波茲南进行改革：建立波兰军队，任命波兰人担任行政及其他职务，承认波兰語为波茲南的正式語言。然而，1848 年 4 月 14 日頒布的敕令却把波茲南公国分为两部分：东部归波兰，西部归“德国”（不准“改組”）。波茲南起义遭到血腥鎮压（1848 年 4—5 月）后，分界綫在后来的几个月中越来越向东移动，最后几乎占領了波茲南大公国的全部領土。給波兰人許下的“改組”的諾言也沒有兌現。馬克思和恩格斯激烈地反对普魯士反动派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对波兰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鎮压（見“对波兰的重新瓜分”、“在波茲南的新政策”、“法兰克福关于波兰問題的辯論”等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62—63、110—111、371—431 頁）。——第 511 頁。

- 305 馬鈴薯战争 是对 1778 至 1779 年普魯士和薩克森一起同奥地利进行的所謂爭奪巴伐利亚继承权的战争的諷刺性称呼，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所謂軍事行动主要表现为因馬鈴薯而引起的军队的調动和士兵的爭吵。——第 512 頁。
- 306 “东方日报”（《*Zeitung des Osten*》）是 1849 年在波茲南出版的民主派的日报，出版者是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波茲南民族委员会的委員弗·斯蒂凡斯基。——第 516 頁。
- 307 見“六月十五日的协商會議”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92—93 頁）。——第 517 頁。
- 308 古斯达夫-阿道夫同盟（于 1832 年創立）是一个为帮助德国天主教地区的基督教团体而建立的宗教組織。曾在科尼斯堡担任牧师的卢普因批評教会的教义而被革职，1846 年被开除出这个同盟。——第 519 頁。
- 309 “光明之友”是 1841 年形成的一种宗教派別，它反对在官方新教中占統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性的虔誠主义。这个宗教反对派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国資產階級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滿的一种表現形式。1846 年，“光明之友”运动引起了官方基督教教会的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組成了所謂的“自由协会”。——第 519 頁。

- 310 引自普魯士国歌。——第 521 頁。
- 311 阿塔·特洛尔 是海涅的同名长詩中的主角熊的名字。詩中許多地方,特别是第 7 章,談的都是厌恶人类的熊对人們嘲笑的憎恨。——第 521 頁。
- 312 拉薩尔于 1848 年 11 月 22 日在杜塞尔多夫被捕。他被控的罪名是号召武装反对国家政权(見本卷第 319—321 頁)。萊茵省司法机关千方百计地拖延对他的审訊。拉薩尔曾写信給馬克思和恩格斯,請求他們替他辯护,为了回答这个要求,“新萊茵报”登載了一系列批評司法机关对拉薩尔滥用职权和采取非法行为的文章。馬克思和恩格斯还参加了 3 月 3 日前往总檢察官尼科洛維烏斯处抗議拖延对拉薩尔案件的审訊的代表团(关于这件事的报道,登載在 1849 年 3 月 6 日“新萊茵报”第 238 号上)。审訊于 5 月 3—4 日举行;陪审团宣判拉薩尔无罪。关于审判案的报道发表在 1849 年 5 月 8 日“新萊茵报”第 291 号增刊上。——第 531 頁。
- 313 1849 年 4 月 27 日,普魯士政府解散了第二議院。解散的理由是議院贊成了 3 月 27 日法兰克福国民議会所通过的帝国宪法。——第 534 頁。
- 314 关于硝酸銀見注 151。——第 536 頁。
- 315 見“法兰克福关于波兰問題的辯論”这一組文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71—414 頁)。——第 536 頁。
- 316 煽动者見注 172。——第 540 頁。
- 317 雅叙厅 是柏林的一所大厅;1849 年 4 月 27 日普魯士省議會第二議院被解散后,左派議員們曾在这里集会。这次集会被警察驅散了。——第 540 頁。
- 318 拉薩尔因訴訟案第一次被关进監獄是在 1848 年 2 月至 8 月。他在 1846 年至 1854 年期間曾担任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的辯护人,他被控告的罪名是,他为了这个案子曾指使人盜窃文件匣。——第 543 頁。

- 319 摘自席勒的叙事詩“保证”。——第 549 頁。
- 320 巴塞爾曼——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1848 年 11 月 7 日以中央政權全權代表之一的身分前往柏林。回來以後，他於 11 月 18 日向議會報告說，普魯士政府採取斷然措施不無理由，因為據說近來在柏林街頭出現了通常在無政府主義騷動以前出現的外表凶惡的人。由此便產生了“巴塞爾曼式的人”這句諷刺話。——第 549 頁。
- 321 1848 年 9 月 18 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爆發了抗議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批准和丹麥休戰的人民起義。當天，起義就被普魯士和奧地利軍隊鎮壓下去了。國民議會左派小資產階級首領們的怯懦行為促使起義遭到失敗。——第 550 頁。
- 322 1848 年 9 月 26 日，當局懾於科倫革命民主運動的高漲，宣布在當地實行戒嚴“以保護生命和財產”。衛戍司令部下令禁止一切帶有“政治和社會目的”的社團的活動，禁止在街頭和廣場上集會，解散市民自衛團並令其交出武器，成立軍事法庭，勒令“新萊茵報”和許多其他民主派報紙停刊。——第 559 頁。
- 323 1849 年 5 月 6 日（星期日），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亞的三個團體在科倫召開了代表大會。這三個團體是：工人聯合會、民主聯合會以及君主立憲派的“市民聯合會”。其中“市民聯合會”的代表大會是在科倫近郊多伊茨舉行的。——第 560 頁。
- 324 1848 年 9 月 25 日，科倫當局用逮捕民主聯合會和工人聯合會的許多領導人的辦法挑起了當時已開始在市內構築街壘的工人的過早的發動。馬克思及其擁護者們曾盡了很大的努力，來阻止科倫工人舉行過早的孤立的發動。次日，當局以“保護生命和財產”為由，在科倫實行了戒嚴。——第 561 頁。
- 325 引自海涅的詩歌“妖魔”（«Der Wechselbalg»）。——第 571 頁。
- 326 根據 1660 年奧利弗和約，從前臣屬波蘭國王的東普魯士被劃歸勃蘭登堡選帝侯。——第 571 頁。
- 327 指普魯士、奧地利和俄國三國於 1772 年第一次瓜分波蘭。——第

- 572 頁。
- 328 指 1795 年普魯士和法国单独締結的巴塞尔和約。——第 572 頁。
- 329 1788 年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樞密官比碩夫斯威德的倡議，在普魯士頒布了限制出版权利和信仰自由的敕令。——第 572 頁。
- 330 1815 年 6 月 8 日在維也納會議上通过并为 6 月 9 日維也納最后決議批准的所謂德意志联邦法令 尽是些有关宪法改革的模糊不清的諾言，这些諾言始終只是一紙空文。——第 573 頁。
- 331 卡尔斯巴德決議是 1819 年 8 月在卡尔斯巴德(卡罗維发利)召开的德意志联邦各邦代表會議所制定的一系列反动決議。这些決議規定在德意志各邦都实行书报預檢制度，对大学实行最严格的监督，禁止大学生結社，成立迫害有反政府嫌疑的人(所謂“蠱惑家”)的中央偵查委員會。这些警察措施的倡导者是奧地利首相梅特涅。——第 573 頁。
- 332 *Seehandlung*——見注 115。——第 573 頁。
- 333 “順民的有限理智”是在德国广泛流傳的普魯士內务大臣馮·罗霍夫的一句話。——第 574 頁。
- 334 指所謂“萊宁預言”(«Vaticinium Lehninense»)。这是一篇拉丁文史詩，产生于十七世紀末，但被认为是出自十三世紀萊宁修道院一修士的手笔。这部有独特風格的作品讲述了統治勃兰登堡的王朝的罪恶，并預言了該王朝的灭亡。——第 574 頁。
- 335 力图复活反动的封建理想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 1843 年頒布了恢复天鵝勳章的命令。天鵝勳章是中世紀的一种宗教騎士勳章，創于 1443 年，廢于宗教改革时代。但是普魯士国王的这种策划沒有实现。——第 574 頁。
- 336 見注 122。——第 574 頁。
- 337 桑苏西宮是波茨坦的一座宮殿，普魯士国王的行宮之一。——第 575 頁。

- 338 1849年5月3日在德勒斯頓爆发的起义，于5月8日几乎完全被鎮压下去了，这次起义为維护帝国宪法的斗争奠下了始基。——第576頁。
- 339 1849年5月初，在萊茵省、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和巴登等地爆发了維护同年3月27日法兰克福国民議會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起义，因为以普魯士为首的許多德意志邦拒絕承认这部宪法。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但是由小資产階級民主派首領們所領導的这次起义具有孤立和自发的性质，因而于1849年7月中旬被殘酷地鎮压下去了。关于恩格斯曾亲自参加的这些起义的性质和經過可參看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維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76頁。
- 340 法国資产階級政府为了对羅馬共和国进行干涉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于1849年4月派遣了一个远征軍团前往直意大利。1849年4月30日法国軍隊被逐出羅馬。——第576頁。
- 341 馬克思指三个反动君主——普魯士国王、俄国沙皇和奥地利皇帝之間的密切关系。——第578頁。
- 342 普魯士国民議會的多数議員，不顾国王頒布的将普魯士国民議會会址迁往勃兰登堡的命令而繼續在柏林开会，这些議員于1848年11月15日被弗兰格尔將軍的軍隊所驅散。
第二議院于1849年4月27日根据国王批准的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政府报告書被解散。——第578頁。
- 343 薩克森国王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二世在1849年5月起义时由德勒斯頓逃亡到科尼施泰因要塞躲藏起来。
“住在慕尼黑的帝国之馬克西”即巴伐利亚国王馬克西米利安二世；法兰克福国民議會的某些議員曾推举他为德意志皇帝的候选人。——第578頁。
- 344 阿尔古阿西尔是西班牙的警官。本文中的这段插話摘自塞万提斯的“懲惡揚善故事集”（“狗的談話”）。——第592頁。

- 345 《Ça ira》（“一切順利”）是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一首革命歌曲。——第 595 頁。
- 346 海涅“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第八章。——第 595 頁。
- 347 指科倫陪審法庭在 1849 年 2 月 7 日和 8 日的審訊中宣判“新萊茵報”編輯和萊茵省民主主義者區域委員會委員無罪一事。——第 600 頁。
- 348 見“許澤爾”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19—20 頁）。——第 601 頁。
- 349 見卡·馬克思“普魯士國王答國民議會代表團”一文（同上，第 509 頁）。——第 601 頁。
- 350 見卡·馬克思“反革命在維也納的勝利”一文（同上，第 540—543 頁）。——第 602 頁。
- 351 見卡·馬克思“國家檢察官‘黑克爾’和‘新萊茵報’”一文（同上，第 521—526 頁）。——第 602 頁。
- 352 塞克列人——居住在特蘭西瓦尼亞阿爾卑斯的匈牙利人。——第 609 頁。
- 353 關於耶拿戰役見注 286。
普魯士要塞馬格德堡和尤斯特林 1806 年 11 月向拿破侖軍隊不戰而降。——第 616 頁。
- 354 “新德意志報。民主派機關報”（《Neue Deut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是民主派報紙，從 1848 年開始出版，1850 年停刊，1849 年 4 月 1 日以前在達姆斯塔德出版，4 月 1 日以後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出版。1849 年 10 月 1 日以前該報的主編是奧·呂寧，10 月 1 日以後主編是奧·呂寧、格·君特和約·魏德邁。——第 623 頁。
- 355 “西德意志報”（《Westdeutsche Zeitung》）是德國民主派報紙，1849 年 5 月 25 日至 1850 年 7 月 21 日由海·貝克爾在科倫出版。該報在“新萊茵報”停刊後緊接着開始出版，它企圖以“新萊茵報”的繼承者自居；該報編輯部聲明，對“新萊茵報”的訂戶今後將改送“西德意志報”。

——第 623 頁。

- 356 本文是恩格斯在“新萊茵報”停刊后移居德国西南部期間写的。刊載于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报纸“城乡信使”(«Bote für Stadt und Land»)上。恩格斯写的第二篇文章没有发表,因为那篇文章“以过分‘刺激’而遭到反对”(見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624 頁。
- 357 鉴于法国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革命事变即将到来,1849 年 6 月 2 日左右馬克思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巴黎,代表德国革命党同法国社会民主党人联系。——第 624 頁。
- 358 指普魯士將軍波伊克尔。1849 年 5 月 10 日以前,他在所謂的帝国政府中担任陸軍大臣,后来指揮过鎮压普法尔茨和巴登两地起义的帝国軍隊的一个軍团。——第 625 頁。
- 359 見注 145。——第 627 頁。
- 360 指二十五人委员会(巴黎民主社会党选举委员会的一个机构)內部的革命派。这一派由工人俱乐部和秘密团体的活动家組成。民主社会党委员会在巴黎领导山岳党参加了 1849 年 5 月 13 日举行的法国立法議会选举的竞选运动。——第 627 頁。
- 361 艺术工艺学校是巴黎的一所学校。——第 628 頁。
- 362 指“宪法之友民主联合会”——温和的资产阶級共和派的組織。这个組織是“国民报”派分子在 1849 年 5 月 13 日法国立法議会选举的竞

选运动时期成立的。——第 628 頁。

- 363 賴德律-洛兰在 1849 年 6 月 11 日的立法議会上宣称:山岳党决心保护宪法,必要时用武力保护。——第 628 頁。

- nomy». London, 1840, pp. 36—38)。——第 636 頁。
- 370 包林在下院的演說中所說的這段話，1848 年 1 月 9 日馬克思在布魯塞爾民主協會的公眾大會上發表的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中也引用過（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53 頁）。——第 636 頁。
- 371 馬克思指的是卡萊爾就英國濟貧法發表的下述意見：“如果使窮人成為不幸者，他們就不可避免地會大批死亡。這就是消滅鼠患的普通辦法：堵塞住倉庫的大小縫隙，發出連續不斷的貓叫聲或警號，使捕鼠器隨時開動，於是你們的這一群 «chargeable labourers» [成為社會累贅的窮光蛋] 便會絕迹，便能根除。更快的方法是砒霜，這也許是更人道的辦法……”托·卡萊爾“憲章運動”1840 年倫敦版第 17 頁 (Th. Carlyle. «Chartism». London, 1840, p. 17)。——第 636 頁。
- 372 約·拉·麥克庫洛赫“政治經濟學原理”1825 年愛丁堡版第 319 頁 (J. R. M'Culloch.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Edinburgh, 1825, p. 319)。——第 637 頁。
- 373 約·威德“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历史”1835 年倫敦第 3 版第 125 頁 (J. Wad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 3rd. ed., London, 1835, p. 125)。——第 637 頁。
- 374 馬克思指的是約·威德的著作中的下面這一段話：“所使用的勞動的數量 [the quantity of employment] 在每一個工業部門中都不是固定的。它可以隨着季節的更換、時尚的變化或生意的好壞而有所變動。”(見前引約·威德的著作第 252 頁)——第 638 頁。
- 375 指計件工資(見前引約·威德的著作第 267 頁)。——第 638 頁。
- 376 *Trucksystem*——實物工資制。拜比吉關於這種工資制寫道：“凡是工人領產品工資或是被迫從僱主店鋪購買東西的地方，對工人們來說，都有許多不公道的事情，結果就造成很大的貧困。”“在蕭條期間，在不減少名義工資的情況下，用提高自己店鋪里的商品價格的方法來降低實際支付的工資。這種辦法對僱主來說，太有誘惑力了，他實難予以抵制。”查·拜比吉“論機器和工廠的經濟本質”1832 年倫敦第 2 版第 304

- 頁(Ch. Babbage.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2nd. ed., London, 1832, p. 304)。——第 639 頁。
- 377 安·尤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經濟”1836年布魯塞尔版第1卷第34、35頁(A. Ure. «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 ou Economie industrielle». T. I, Bruxelles, 1836, pp. 34, 35)。——第 639 頁。
- 378 佩·罗西“政治經濟学教程”1843年布魯塞尔版第369、370頁(P. Rossi.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Bruxelles, 1843, pp. 369, 370)。——第 639 頁。
- 379 安·舍尔比利埃“富人或穷人”1840年巴黎—日内瓦版第103—104、105、109頁(A. Cherbuliez. «Riche ou Pauvre». Paris—Genève, 1840, pp. 103—104, 105, 109)。——第 640 頁。
- 380 約·弗·布雷“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現象及其消除办法”1839年里子版第152、153頁(J. F. Bray.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Leeds, 1839, pp. 152, 153)。——第 641 頁。
- 381 見注 375。——第 644 頁。
- 382 馬克思引证的是他从卡萊尔的“宪章运动”一书摘录出来的一个材料：“爱尔兰約有七百万工人居民，根据統計材料，其中三分之一每年有三十个星期缺乏足够的即使是劣等的馬鈴薯。”(Th. Carlyle. «Chartism». London, 1840, p. 25)——第 645 頁。
- 383 指的是 1813—1815 年期間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侖統治的战争。——第 646 頁。
- 384 恩格斯为“新萊茵报”撰写的“法国工人階級和总统选举”和“蒲魯东”这两篇文章，是 1848 年 12 月初居留瑞士期間写成的；这两篇文章的手稿还保存着。——第 661 頁。
- 385 指定于 1848 年 12 月 10 日举行的总统选举所引起的法国革命民主派內部的斗争。关于山岳党人見注 145。——第 661 頁。
- 386 “人民报”(«Le Peuple») 是法国报纸，蒲魯东派的机关报，1848—

- 1850 年間在巴黎出版；最初該報的名稱是“人民代表報”（«Le Représentant du Peuple»），自 1848 年 9 月至 1849 年 6 月 13 日改稱“人民報”；主編是比·約·蒲魯東。——第 661 頁。
- 387** 所謂“純粹的”（或稱三色）共和派是法國的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國民報”是它的機關報。1848 年革命時期，這個黨的領導人參加了臨時政府，後來靠卡芬雅克的幫助策劃了六月大屠殺——對巴黎革命無產階級的鎮壓。——第 662 頁。
- 388** 指執行委員會 —— 見注 80。——第 662 頁。
- 389** “真正的共和國”（*La vraie République*）是法國的政治和文藝性的日報，小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機關報；該報從 1848 年 3 月 26 日起到 8 月 21 日被查封為止以這個名稱在巴黎出版；1849 年 3 月 29 日至 6 月 13 日以“真正的共和國報”這個名稱繼續出版；巴爾貝斯、托烈、比埃爾·勒魯和喬治·桑參加了該報編輯部。——第 663 頁。
- 390** “1848 年的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 en 1848*»）是法國革命民主派的報紙，1848 年 2 月 27 日至 5 月 14 日在巴黎出版，由弗·拉斯拜爾任主編。——第 666 頁。
- 391** 比·約·蒲魯東“什麼是財產？或關於法和權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 年巴黎版（P. J. Proudhon,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 Paris, 1840）。——第 668 頁。
- 392** 指比·約·蒲魯東“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1846 年巴黎版第 1—2 卷（P. J. Proudhon,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I—II, Paris, 1846）。——第 669 頁。
- 393** *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 Bazaars or Offices*（勞動產品公平交換市場或交換所）是英國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所創立的；1832 年，曾在倫敦創辦過這種市場的羅·歐文領導了這一運動；在這些市場上，勞動產品是用以一小時勞動時間為單位的勞動券來進行交換的。這些企

- 图在商品資本主义經濟的条件下建立不用貨幣的交換的烏托邦作法很快就失敗了。——第 669 頁。
- 394 引自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話”第二十三章。——第 669 頁。
- 395 K. Marx.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 et Bruxelles, 1847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71—198 頁)。——第 670 頁。
- 396 关于蒲魯东的这篇演說見“蒲魯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說”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55—359 頁)。——第 671 頁。
- 397 見注 72。——第 675 頁。
- 398 根据恩格斯的这份申請书, 伯尔尼联邦議會于 1848 年 12 月 9 日給予他避难的權利。——第 676 頁。
- 399 根据帝国司法大臣的要求, 科倫檢察机关以恩格斯曾于 1848 年 9 月間在科倫民众大会上的演說为理由对他提出控訴。关于逮捕恩格斯的命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600 頁。——第 676 頁。
- 400 人民委员会是 1848 年 11 月 13 日在科倫召开的抗議把普魯士国民議會会址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的民众大会上选举出来的。被选入委员会的有馬克思以及博伊斯特、諾特莱克、魏尔、施奈德尔第二等人。委员会的任务是爭取科倫市政委员会方面对国民議會的支持以及要求发还 9 月間被沒收的科倫市民自卫团的武器。如果市政委员会拒絕滿足这些要求, 則应当撤換市政当局。人民委员会还着手改編后备軍, 使其脫离政府与軍事当局的控制, 同时还企图在工人中組織一支志願部队。这些措施都由一个与新成立的后备軍委员会有密切联系的特別委员会来領導执行。此外, 人民委员会还在附近的乡村地区进行了許多工作, 号召农民組織起来拒絕納稅。——第 678 頁。
- 401 指在萊茵省通行的法兰西刑法典 (Code pénal) 中的两条: 关于反抗国家政权的代表的第二〇九条和关于煽动叛乱的第二一七条。——第 678 頁。

- 402 帝国政府据以控告馬克思、科尔夫等人誹謗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的理由是：(1)1848年8—9月、12月以及1849年1月“新萊茵报”上未署名发表的格·維尔特的一組小品文“著名的騎士施納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2)1848年9月6日“新萊茵报”第95号上登載的一篇揭露利希諾夫斯基公爵的竞选陰謀的布勒斯劳通訊；(3)1848年9月14日“新萊茵报”第102号上登載的一篇法兰克福通訊，其中揭露了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施泰德曼所提出的关于与丹麦休战問題表決結果的假报告；(4)1848年9月23日“新萊茵报”第110号所发表的科倫民众大会的決議，決議斥責那些投票贊成与丹麦休战的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背叛人民(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597頁)。——第680頁。
- 403 原定于1848年12月20日审理的“新萊茵报”审判案宣布延期(見本卷第685頁)，推迟到1849年2月17日举行(見本卷第262—285頁和注189)。——第680頁。
- 404 瑞士工人联合会和德意志民主民族联合会分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48年12月9—11日在伯尔尼举行。——第681頁。
- 405 指1848年8月23日至9月3日在柏林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是由許多工人团体倡議召开的。在斯蒂凡·波尔恩影响下制定的代表大会綱領，向工人們提出了爭取实现一系列狹隘职业要求的任务，从而使他們远离革命斗争。德意志工人中央委员会設在萊比錫。和波尔恩一起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还有施温尼格尔和基克。——第681頁。
- 406 “博爱报。全德工人通訊”(«Die Verbrüderung. Correspondenzblatt aller deutschen Arbeiter»)——德意志工人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1848年10月至1850年6月在萊比錫出版，每周两期；1849年5月以前該杂志由斯·波尔恩主編。——第681頁。
- 407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护律師施奈德尔第二以审讯通知沒有及时(十天以前)送給被告为理由，要求审讯延期举行。——第685頁。

- 408 在“科倫工人联合会会刊”（見注 130）停刊后，“自由、博爱、劳动”报（《*Freiheit, Brüderlichkeit, Arbeit*》）便成为科倫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它从 1848 年 10 月 26 日起开始在科倫出版，每周两次。发行人是科倫工人联合会副主席彼·格·勒澤尔，主編是弗·普林茨。1848 年 12 月底，哥特沙克对报纸事务的干預使得該报停刊。1849 年 1 月 14 日起开始出版“自由、劳动”报（《*Freiheit, Arbeit*》），发行人是布罗克尔-埃維列尔茨。該报主編普林茨屬哥特沙克派，执行分裂科倫工人联合会的路綫。普林茨不服从 1 月 15 日科倫工人联合会委员会會議任命的由沙佩尔、勒澤尔与賴夫組成的編輯委员会；因此委员会在 1 月 29 日會議上通过了一項決議：不承认“自由、劳动”报是联合会的机关报，同时，决定恢复出版“自由、博爱、劳动”报，并任命克·約·埃塞尔为編輯。“自由、博爱、劳动”报于 2 月 8 日复刊，一直出版到 1849 年年中。“自由、劳动”报繼續出版到 1849 年 6 月 17 日；它对馬克思和“新萊茵报”編輯部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和恶毒的誹謗。——第 687 頁。
- 409 哥特沙克 1849 年 1 月 9 日在布魯塞尔写了一篇声明，1 月 18 日发表于“自由、劳动”报上。在这篇声明中，他为自己的“自願流亡”辯护：尽管陪审法庭已經宣判他无罪（見注 423），但他的很多同胞仍然认为他是有罪的。他声明：他只有按照“当今国内最高审判官”的召唤或是他的同胞們的召唤才能回国。对这个声明的評價見科倫工人联合会第一支部的決議（見本卷第 699—701 頁）。——第 687 頁。
- 410 根据 1848 年 12 月 5 日的命令，定于 1 月 22 日选举复选人，1849 年 2 月 5 日选举普魯士議會第二議院的議員。——第 688 頁。
- 411 指“逮捕”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190—193 頁）。——第 689 頁。
- 412 关于法庭审讯的簡短报道发表于 1849 年 2 月 14 日“新萊茵报”第 221 号上。其中所引证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見本卷第 262—285 頁。——第 689 頁。
- 413 指参加过科倫九月事变并于 1848 年 11 月被选入人民委员会（見注 400）的阿达姆斯基中尉和尼特哈克中尉。他們僑于被捕而逃往比利

时,但是,在比利时仍遭逮捕并被押送到法国。在他們自願回到德国以后,于12月14日被交付軍事法庭惩处。关于阿达姆斯基,据悉,軍事法庭于1849年5月29日取消了他的軍銜并判处九个月的要塞监禁。——第691頁。

414 在1849年2月15日科倫工人联合会委员会會議上,根据恩格斯的提議通过了一項決議,任命一个由沙佩尔、勒澤尔和賴夫組成的委员会去同一个民主团体联系,以便組織一次紀念法国二月革命一周年的宴会。——第693頁。

415 1849年2月27日“科倫日报”登載了一篇报道2月24日宴会的通訊。在簡訊中特別提到:“在許多发言者中,格拉德巴赫議員勢如雷霆的发言特別突出,他猛烈攻击了霍亨索倫家族、勃兰登堡伯爵以及其他的人。”——第693頁。

416 指一批流亡到伯桑松(法国)的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参加者;后来这批人在維利希领导下組成所謂伯桑松連队,参加了1849年的巴登—普法尔茨的起义。——第694頁。

417 見注128。——第694頁。

418 指在1848年二月革命时期很受欢迎的一首法国爱国歌曲“吉倫特党人”(«Les Girondins»);这首歌也以“誓死保卫祖国”(«Mourir pour la patrie»)这个叠句而出名的。——第694頁。

419 見注264。——第695頁。

420 指“自由、博爱、劳动”报——見注408。——第696頁。

421 見注405。——第697頁。

422 这个決議批評了哥特沙克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立場。哥特沙克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策略路綫上的分歧一开始就暴露出来了。1848年7月,哥特沙克同安內克和克·約·埃塞尔一起被捕,接着他們被以“煽动武装起义反对王权”的罪名被交付法庭审判。12月21日至23日举行了审判。在社会輿論的压力下,陪審員不得不宣判被告无罪。哥

-
- 特沙克被釋放后积极进行了分裂科倫工人联合会的活动。本決議于1849年4月24日經科倫工人联合会委员会批准。——第699頁。
- 423** 关于哥特沙克对科倫工人联合会机关报(“自由、博爱、劳动”报)事务的干涉見注408。——第700頁。
- 424** 据报道(1849年5月10日“德意志总汇报”,1849年5月12日“特利尔日报”),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于1849年5月6日(星期日)如期举行。——第703頁。
- 425** 見注402。——第707頁。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48年11月—1849年8月)

1848

- 11月** 恩格斯和“新萊茵报”的其他几位編輯由于有被逮捕的危險，离开了科倫，因此，該报的編輯工作几乎全部落到馬克思的肩上。同时馬克思还积极参加了科倫工人联合会的活动，担任該会主席，并参加了民主协会和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的工作，动员人民群众起来积极反抗反革命的进攻。
- 11月7日左右** 恩格斯(当时在瑞士)由洛桑到紐沙特尔。
- 11月7日** 恩格斯寄給馬克思一篇关于紐沙特尔共和国的文章，标题是“昔日的公国”，发表在11月11日“新萊茵报”上。
- 11月8日** 由于普魯士正在策划反革命政变，馬克思写了“柏林的危机”一文，发表在11月9日“新萊茵报”上。
- 11月9日左右** 恩格斯由紐沙特尔到伯尔尼。
- 11月9日** 恩格斯写“新的代議机构。——瑞士运动的成績”一文。发表在11月15日“新萊茵报”上。
- 11月11日—13日** 馬克思写关于“柏林的反革命”的一組文章，发表在11月12日(增刊)和14日“新萊茵报”上。馬克思号召人民群众用拒絕納稅的办法来回答反革命的行动。他

认为这是人民对政府施加有組織的革命压力的手段。

11月13日

在科倫民众大会上选出了人民委员会，馬克思当选为该会委员。委员会的任务是組織和武装群众以反抗征稅，反对正在普魯士策划的政变。

馬克思参加了科倫民主协会的会议，他在会上宣读了刚从維也納打来的关于罗伯特·勃魯姆被处死刑的电报，这个消息在会场上引起了极大的憤慨。

11月14日

法院偵查員就“侮辱”檢察官黑克尔一事对馬克思进行偵訊。人民群众齐集在法院前面，表示对馬克思的同情。审讯结束后，人民陪送馬克思到埃塞尔大厅，他在那里感謝人們对他的同情和支持。

馬克思和施奈德尔第二代表萊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向萊茵省各民主团体呼吁，建議它們組織民众大会和号召居民拒絕納稅。为了討論以后的措施，区域委员会决定在11月23日召开萊茵省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呼吁书发表在11月15日“新萊茵报”上。

11月15日

馬克思写“內閣在被告席上”一文，发表在当天的“新萊茵报”号外上。

恩格斯向伯尔尼州司法和警察当局申請准許他在伯尔尼居留。

11月17日

“新萊茵报”发表了馬克思的“良心的懺悔”一文。

馬克思出版了一号“新萊茵报”特別附刊，号召居民不向政府繳納任何捐稅。从11月19日到12月17日該报每号都刊有“打倒捐稅!!!”的号召。

11月18日

馬克思写“艾希曼的命令”一文，发表在11月19日“新萊茵报”上。

馬克思、沙佩尔、施奈德尔第二代表萊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发表第二个呼吁书，号召各地居民用一切方法反抗强行征稅，組織武装队伍，建立安全委员

- 会这种人民的权力机关。呼吁书发表在 11 月 19 日“新萊茵报”上。
- 11月20日** 馬克思和萊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其他两名委员——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第二——接到傳票，要他們在 11 月 21 日到法院偵查員那里去受傳訊。他們被控的罪名是“公开号召叛乱”，因为他們曾呼吁拒絕納稅。
- 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第二再次发表呼吁书，通报他們被法庭傳訊，并警告萊茵省的民主主义者不要过早举行发动。呼吁书发表在 11 月 21 日“新萊茵报”上。
- 11月21日** 法院偵查員就萊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号召人民拒絕納稅一事傳訊馬克思。
- 科倫地方法院审判庭决定把恩格斯和科倫九月事件其他参加者（瓦赫特尔、毕尔格尔斯等）的案件延期到他們亲自出庭时进行审理。
- 11月22日** 馬克思写“法兰克福議會”一文，发表在 11 月 23 日“新萊茵报”上。
- 11月23日** 馬克思参加了萊茵省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工作。会上討論了有关拒絕納稅运动的問題。大会特別重視民主主义者在农村的工作，认为必須吸引农民群众参加反对反革命的斗争。大会批准了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決議，并向代表們发出相应的指示。
- “新萊茵报”发表了恩格斯的“联邦法院的选举”一文。
- 11月24日** 馬克思写“德利加尔斯基——立法者、公民和共产主义者”和“对‘新萊茵报’提出的三个訴訟案”两篇文章，发表在 11 月 26 日“新萊茵报”上。
- 恩格斯将“德意志中央政权和瑞士”及“联邦委员会委員剪影”两篇文章寄往科倫，它們分別发表在 11

月 26 日和 29 日“新萊茵報”上。

11月29日

馬克思寫“意大利的革命運動”一文，發表在 11 月 30 日“新萊茵報”上。

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請他為“新萊茵報”寫關於蒲魯東、關於匈牙利事件以及關於瑞士式的聯邦共和國的文章。

12月初

恩格斯寫“法國工人階級和總統選舉”及“蒲魯東”兩篇文章，都沒有發表。

12月2日左右

馬克思因“新萊茵報”上所發表的一些文章，再次被法院偵查員傳訊，這些文章包括：格·維爾特所寫的發表時沒有署名的一組小品文“著名的騎士施納普漢斯基的生平事跡”，來自布勒斯勞的關於利希諾夫斯基在選舉前的陰謀的報道，來自法蘭克福的揭露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施泰德曼的假報道的報道，以及在“新萊茵報”上發表的 1848 年 9 月 20 日科倫民眾大會的決議。

12月6日

由於普魯士國民議會被解散，馬克思寫“反革命的第二階段”一文，發表在 12 月 7 日“新萊茵報”號外上。

恩格斯寫“國民院”一文，發表在 12 月 10 日“新萊茵報”上。

12月8日

洛桑工人聯合會委派“為無產階級利益而鬥爭的老戰士”恩格斯為代表，出席 12 月 9 日在伯爾尼召開的瑞士德國工人聯合會第一屆代表大會。

12月9日

恩格斯得到在伯爾尼居留的許可證。

12月9日—29日

馬克思以“資產階級和反革命”為題寫了一組論文。馬克思在這些文章中，總結了三月革命，說明了 1848 年底德國階級力量對比的情況，揭露了普魯士資產階級的背叛作用。這組文章分別發表在 12 月 10、15、16 和 31 日“新萊茵報”上。

- 12月19日 “新萊茵报”登載了征求1849年第一季度訂戶的通知，其中強調指出，“新萊茵报”不仅是德国民主派的机关报，而且也是欧洲民主派的机关报。
- 12月20日 陪审法庭原定于12月20日审讯“新萊茵报”总編輯馬克思、发行負責人科尔夫和編輯恩格斯——他們因該报7月5日发表了“逮捕”一文而被控侮辱檢察长茨魏費尔和誹謗宪兵——因手續不周而延期。
- 12月21日 馬克思因11月26日“新萊茵报”发表了“德利加爾斯基——立法者、公民和共产主义者”一文而被法院偵查員傳訊。
- 12月21日—22日 馬克思写“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們的审判”一文，連續发表在12月22和23日“新萊茵报”上。
- 12月24日 “新萊茵报”发表馬克思的“普魯士反革命和普魯士法官”一文。
- 12月31日 馬克思写“革命运动”一文，总結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发展，分析了法国和英国无产階級革命的前途，并強調指出这个革命應該对欧洲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发生的影响。文章发表在1849年1月1日“新萊茵报”上。

1849

- 1月4日 馬克思因科倫市政委员会发行工人手册（城市在业工人守則）一事写“资产阶级的文件”一文，发表在1月5日“新萊茵报”上。
- 1月8日 馬克思写“新年賀詞”一文，发表在1月9日“新萊茵报”上。
- 1月11日 恩格斯写“瑞士报刊”一文，发表在1月17日“新萊茵报”上。

- 1月13日** “新萊茵報”刊載恩格斯的“匈牙利的鬥爭”一文。
- 1月15日** 馬克思參加科倫工人聯合會委員會的會議。馬克思在自己的發言中說明了，為什麼工人應該在本屆普魯士議會第二議院選舉中支持民主派的候選人。
- 1月中旬** 恩格斯由瑞士回到科倫，重新全力投入了“新萊茵報”的編輯工作。
- 1月20日—21日** 馬克思寫“孟德斯鳩第五十六”這篇論戰性文章，揭露了“科倫日報”在選舉前約許的用欽定憲法來解決社會問題的蠱惑性諾言。馬克思號召工人和小資產階級只選舉那些堅決反對腐朽的封建制度的代表。文章連續發表在1月21日和22日“新萊茵報”上。
- 1月21日** 恩格斯寫“普魯士逮捕科蘇特的命令”一文，發表在1月28日“新萊茵報”上。
- 1月25日—27日** 馬克思寫“柏林‘國民報’致初選人”一文，抨擊普魯士自由派，發表在1月26日和28日“新萊茵報”上。
- 1月26日** 恩格斯因科倫九月事件被法院偵查員傳訊。傳訊結果宣布不再對恩格斯提出任何控訴。
- 1月29日** 馬克思參加科倫工人聯合會委員會會議，會上通過了關於恢復聯合會的機關報“自由、博愛、勞動”的決議，以此與哥特沙克宗派集團的機關報“自由、勞動”相對抗。
- 1月30日** 馬克思寫“‘科倫日報’論選舉”一文，證明無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必須為民主共和國共同進行鬥爭。文章發表在2月1日“新萊茵報”上。
- 2月左右** 由於共產主義者同盟倫敦中央委員會特派代表約瑟夫·莫爾來到德國，在“新萊茵報”報社舉行了會議。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討論了改組共

产主义者同盟的問題。

- 2月初**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报”編輯部会見了路过科倫的工人兄弟会的领导人斯蒂凡·波尔恩。
- 2月3日** 馬克思写“康普豪森”一文，发表在2月4日“新萊茵报”上。
- 2月4日** 科倫工人联合会會員大会宣告，馬克思和恩格斯建議經常为會員举办关于社会問題的义务讲座。为了建立一个更巩固的、有固定的章程和机构的工人組織，大会通过关于改組工人联合会的決議。
- 2月7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因“新萊茵报”被控侮辱檢察长茨魏費尔和誹謗宪兵(在該报1848年7月5日发表的“逮捕”一文中)而受审，他們在法庭上发言。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次审讯当众揭露普魯士政府实行反革命政变的罪行。陪审法庭宣判馬克思、恩格斯及該报发行負責人科尔夫无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庭上的发言发表在2月14日“新萊茵报”上。
- 2月8日** 馬克思出席科倫陪审法庭受审，因为他、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第二草拟了1848年11月18日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而被控告“煽动叛乱”。馬克思在他的发言中证明，人民有权用革命来回答王权的反革命行为。全体被告都被宣判无罪。馬克思在法庭上的发言发表在2月25和27日“新萊茵报”上。
- 2月10日** 馬克思写“‘科倫日报’的分工”一文，发表在2月11日“新萊茵报”上。
馬克思写以“拉薩尔”为題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2月11日“新萊茵报”上。此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該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拉薩尔案件的文章。
- 2月11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工人联合会在繆尔海姆（萊茵

- 省) 举办的民主宴会。馬克思发表了讲话, 談到德国工人参加法国、英国、比利时和瑞士革命斗争的情况。恩格斯在讲话中对匈牙利的革命战士表示敬意。工人联合会会员魯卡斯提議, 为像馬克思一样早在二月革命很久以前就在捍卫工人阶级的权利的民主主义者干杯。
- 2月14日—15日** 恩格斯写“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 連續发表在2月15日和16日“新萊茵报”上。
- 2月15日** 在科倫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 恩格斯建議举行宴会紀念法国二月革命一周年; 恩格斯的建議被採納了。
- 2月16日—21日** 馬克思写“博德尔施文克及其伙伴治理下的普魯士財政”和“再論旧普魯士的財政”两文, 分別发表在2月17日和23日“新萊茵报”上。
- 2月17日** 恩格斯写“‘科倫日报’論馬扎尔人的斗争”一文, 发表在2月18日“新萊茵报”上。
- 2月24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紀念法国二月革命一周年的宴会。恩格斯提議为正在进行斗争的意大利人, 为羅馬共和国干杯。
- 2月28日** “新萊茵报”发行科出版了关于2月7日和8日审判經過情形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全文的单行本, 标题是“两个政治审判案”。
- 3月2日—3日** 科倫卫戍部队两名下級軍官来到馬克思的寓所, 他們威胁馬克思, 要他說出“新萊茵报”上刊登的关于烏滕霍芬上尉的短評的作者是誰。馬克思断然拒絕这一要求。3月3日他就此事向科倫卫戍司令提出严重抗議。
- 3月7日** “新萊茵报”发表社論“經濟状况”, 分析了1848年前夕英国經濟的发展, 闡述了1848年革命对工商业状况的影响。

- 3月10日—15日** 馬克思写“三月同盟”及“法兰克福三月同盟和‘新萊茵报’”两文，分别在3月11日和17日发表。
- 3月11日** 在科倫居尔岑尼希大厅的初选人大会上，馬克思当选为負責同第二議院議員保持經常联系的委员会的委員。會議通过了致第二議院議員书，要求他們努力爭取解除柏林的戒严状态和結束軍刀专政。
- 3月13日—23日** 馬克思在“新萊茵报”的几篇社論中尖銳地抨击了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內閣关于俱乐部法和集会法，招貼法和出版法的草案，这些法案一旦实施，1848年三月革命时期所爭得的民主自由就会化为烏有。
- 3月16日** 恩格斯写“第二議院的奏折草案”一文，发表在当天的“新萊茵报”特別附刊上。此后，恩格斯还写了許多批評普魯士議會第二議院的辯論的文章。
- 3月18日** 在馬克思所写的一篇短評中宣布，“新萊茵报”将要为之举行周年紀念的不是柏林的三月革命，而是巴黎工人1848年6月25日的起义。短評发表在3月18日“新萊茵报”增刊上。
- 3月19日** 为紀念柏林巷战一周年在科倫居尔岑尼希大厅举行了盛大宴会，在宴会上，恩格斯提議为巴黎六月武装起义者干杯。
- 3月25日** 恩格斯写“柏林关于奏折問題的辯論”一文，发表在3月30日“新萊茵报”上。
- 3月27日** 恩格斯写“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一文，发表在3月28日“新萊茵报”上。
- 3月29日** 普魯士內务大臣建議把馬克思逐出科倫，萊茵省总督艾希曼虽然也表示贊同这个措施，但又担心它会在城內引起騷动，因此他建議等待一个比較有利的时机，把馬克思不仅逐出科倫，而且逐出普魯士。

- 3月30日—4月3日** 恩格斯以“皮蒙特军队的失败”为题写了三篇文章，分析了皮蒙特和奥地利的战争的进程，指出只有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全民总起义才能使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的统治。文章分别发表在3月31日、4月1日和4日“新莱茵报”上。
- 4月5日—11日** 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他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一著作是根据1847年12月下半月馬克思在布魯塞尔德国工人协会所做的演讲写成的。他力求用通俗的形式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证明资本家的利益和雇佣工人的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
- 4月11日** 科倫工人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决议，把工资问题列为各分会在晚会上进行讨论的项目之一，并指定“新莱茵报”发表的馬克思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为学习文件。
- 4月14日** 馬克思和沙佩尔、威·沃尔弗、安内克一起退出莱茵省各民主团体区域委员会。馬克思及其拥护者虽然在組織上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绝了关系，但并不拒绝在反对反革命进攻的斗争中同后者一致行动。他们提出联合各工人联合会并在这个基础上着手建立独立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任务。这一声明发表在4月15日“新莱茵报”上。
- 4月15日—5月8日左右** 馬克思到德国西北部和威斯特伐里亚各城市去。他訪問了不来梅、汉堡、比雷菲尔德、哈姆，会见了許多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了解了当地的革命情况，并设法为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筹集资金。在馬克思外出期間，該报由恩格斯主持。
- 4月16日** 在馬克思及其战友的影响下，科倫工人联合会在大会上一致决定，退出德国民主协会总会，加入工人联合会总会，工人联合会总会中央委员会設在萊比錫。为了更紧密地团结各工人联合会，大会决定在科倫召开萊

- 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
- 4月17日** 科倫工人联合会委员会推选馬克思参加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临时筹备委员会，代表大会定于5月6日召开。
- 4月19日—23日** 恩格斯写关于普魯士議會第二議院的辯論的两篇文章：“柏林第二議院四月十三日會議”和“关于招貼法的辯論”。文章分別发表在4月20、22和27日的“新萊茵报”上。
- 4月20日** “新萊茵报”发表声明：由于馬克思离开了科倫，他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資本”暫停刊登。德国政治形势的尖锐化和“新萊茵报”的停刊使馬克思未能把这一著作全部发表。
- 4月23日** 科倫工人联合会全体会员大会批准由馬克思、沙佩尔、威·沃尔弗、安内克、埃塞尔和奥托組成的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临时筹备委员会。
- 4月28日** 恩格斯写“第二議院的解散”和“波茲南”两文，发表在4月29日“新萊茵报”上。
- 4月29日** 科倫工人联合会的“自由、博爱、劳动”报公布了联合会第一分会的決議，譴責哥特沙克对工人联合会的态度和他对馬克思的敌意的攻击。
- 4月30日** 恩格斯写“柏林的反革命策划”一文，发表在5月1日“新萊茵报”上。
- 5月上半月** “新萊茵报”报道了薩克森、萊茵省、威斯特伐里亚、普法尔茨、巴登人民起义的經過情形。
- 5月4日—6日** “新萊茵报”发表了恩格斯的“萊茵各城市代表大会”和“他們要戒严”两篇文章。恩格斯在文章中警告科倫工人說：政府企图在5月6日各党派举行代表大会(其中

也有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时挑起混乱,以便制造借口来实行戒严。恩格斯号召工人不要上当局的当,不要在条件对他们不利时发动斗争。

5月7日

恩格斯写一篇阐述薩克森、普法尔茨和萊茵普魯士革命新高漲以及匈牙利革命斗争的文章,标题是“普魯士军队和人民革命起义”,发表在5月8日“新萊茵报”上。

5月9日

馬克思訪問德国各城市回到科倫后写“霍亨索倫王朝的丰功偉績”一文,发表在5月10日“新萊茵报”上。

恩格斯写“反革命的进攻和革命的发展”一文,发表在5月10日“新萊茵报”上。

5月10日左右

恩格斯制定保证萊茵省起义获得胜利的行动計劃。

5月10日

因爱北斐特发生起义,恩格斯奔赴佐林根,又从佐林根同革命工人队伍一起前往爱北斐特。

5月11日

恩格斯到达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委派他领导构筑防御工事的工作,并視察城内全部街垒和炮兵。恩格斯要求安全委员会把工人武装起来,向资产阶级强行征税以便保证武装部队的給养。

普魯士政府下令驅逐馬克思出普魯士,企图用这种办法来迫使“新萊茵报”停刊。

5月14日—15日

爱北斐特资产阶级害怕恩格斯宣布成立紅色共和国,力图逮捕他,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在资产阶级这种压力下,建議恩格斯离开該城。委员会的行为引起了工人的憤慨。他們要求恩格斯留下来,并保证“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他”。

5月15日

恩格斯清醒地估計了局勢,为了避免引起起义者陣营的分裂,就离开爱北斐特回到科倫。

5月16日

馬克思接到驅逐他出普魯士的命令。

- 5月17日左右** 由于恩格斯参加了爱北斐特起义，当局发出了逮捕他的命令。
- 5月17日** “新萊茵报”詳細报道了爱北斐特事件。該报感謝爱北斐特工人对該报編輯恩格斯的同情，并且向他們保证，在工人和資產階級之間决战一旦到来，恩格斯便会像“新萊茵报”的所有其他編輯一样，立刻出現在战斗崗位上，那时，再也沒有任何力量能使他离开这个崗位了。
- 逮捕令使恩格斯不得不离开科倫，他便到爆发了革命起义的德国西南部去。
- 5月19日左右** 馬克思用訂戶的报費和自己的錢，以及他变卖自己的快速印刷机的錢償付“新萊茵报”欠排字工人、印刷工人、紙商、職員、記者及編輯部工作人員的債款。
- 5月19日** 由于馬克思被逐出普魯士，而且恩格斯和其他編輯又遭到迫害，“新萊茵报”用紅色油墨出版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上发表了馬克思的文章“新萊茵报被勒令停刊”和恩格斯的的文章“匈牙利”。該报編輯在致科倫工人的告別书中說，“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后一句話始終將是：工人階級的解放！”
- 5月19日—20日** “新萊茵报”停刊后，馬克思和恩格斯来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在这里他們敦促国民議會左派議員領導德国西南部的武装起义，把巴登和普法尔茨的革命軍召到法兰克福来，并将全德国民議會置于起义人民和起义軍隊的影响之下。这个計劃沒有得到小資產階級議員的支持。
- 5月20日或21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到达巴登。在曼海姆、路易港和卡尔斯卢厄，他們力图說服运动的領導者，使他們相信必須把巴登革命軍派往法兰克福，使起义具有全德的性质。領導运动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拒絕了馬克思和恩

格斯的建議。

5月23日—24日左右 馬克思和恩格斯前往普法尔茨。他們先到斯拜尔，后来又到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凱則尔斯劳頓。鉴于起义是在保卫帝国宪法的口号下进行的，而領導起义的又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袖，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拒絕以任何形式正式参加对运动的領導。

5月29日 科倫違警法庭就馬克思、德朗克、維尔特等人被控誹謗法兰克福議會議員一案宣判被告无罪。他們被控告的原因是，1848年9月14日“新萊茵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揭露了議員施泰德曼所作的关于同丹麦休战問題表決結果的假报告。

5月底 馬克思和恩格斯前往宾根。在途中，他們因被怀疑参加起义而被黑森兵士逮捕，并押到达姆斯塔德，从那里又押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兰克福获釋后又前往宾根。

5月31日 馬克思代表“新萊茵报”全体編輯写一声明，表明他們同“西德意志报”毫无共同之处。声明发表在6月2日“新德意志报”上和其他德国报纸上。

6月2日左右 馬克思預料法国将发生决定性的革命事件，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巴黎，以便代表德国革命党同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取得联系。

恩格斯前往凱則尔斯劳頓，打算最初以政治流亡者的身分在那里先住一个时期，如果斗争一旦爆发，就立即“在这个运动中走上只有‘新萊茵报’才能走上的那个崗位，即士兵的崗位。”

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建議恩格斯担任各种民政的和軍事的职务。但是恩格斯都一一加以拒絕了，只同意为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出版的“城乡信使”报写几篇文章。

- 6月2日** 恩格斯写“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起义”一文，发表在6月3日“城乡信使”报上。由于編輯部认为恩格斯的第二篇文章太“刺激”了，恩格斯把文章索回，并且拒絕再为该报撰稿。
- 6月3日左右** 馬克思到达巴黎。
- 6月3日以后** 馬克思恢复并扩大了他同各俱乐部领导人、各秘密工人組織领导人以及同法国民主主义者代表們的联系。
- 6月6日** 普魯士政府下令通緝恩格斯。
- 6月7日** 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告訴他巴黎的革命形勢很緊張，并且請求恩格斯經常告訴他关于德国的情况。
- 6月13日—7月11日** 恩格斯經紐施塔特前往欧芬巴赫，去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軍队，即維利希指揮的志願部队。他直接参加了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进行的革命战斗。当时恩格斯是維利希的參謀，同他一起制定作战計劃，并指揮完成特別复杂和危險的战斗任务。恩格斯亲自参加了四次战斗，其中有一次是拉施塔特城下的大会战。
- 6月21日** 馬克思写“六月十三日”一文，評述巴黎小資产階級民主派起义的失敗。文章发表在6月29日德国民主派报纸“人民之友”上。
- 7月12日**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敗后，恩格斯曾参加作战的那支部队最后轉移到瑞士境内。
- 7月19日** 馬克思接到法国当局的通知，其中說法国当局已經下令把他从巴黎驅逐到摩尔比安—布列塔尼的一塊有碍健康的沼地去。
- 7月24日** 恩格斯到达斐維(窩州)。
- 7月25日** 恩格斯写信給在巴黎的馬克思夫人，对馬克思的遭遇感到不安，因为听說他被逮捕了；恩格斯在信中还告訴

她自己參加巴登和普法爾茨起義的軍事行動的經過。

7月27日左右

“新聞報”登載了關於“新萊茵報”被查封以及“新萊茵報”編輯以後活動的不正確報道。馬克思在給該報編輯的公開信中批駁了這種報道。這封信發表在7月30日“新聞報”上。

8月1日左右

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說他得到恩格斯的訊息感到很高興，他建議恩格斯寫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歷史，並告訴恩格斯他正在商談關於在柏林出版一種政治經濟雜誌的事。

8月20日左右

恩格斯在斐維逗留一個月後轉赴洛桑。

8月23日

馬克思寫信告訴恩格斯，說他將從巴黎被驅逐到布列塔尼沼地去。因此，他決定流亡倫敦。他建議恩格斯也到倫敦去，以便在那裡一起出版雜誌。

8月24日

馬克思離巴黎赴倫敦。

人名索引

三 画

卫尔, 巴托洛繆斯·約瑟夫 (Weyll, Bartholomäus Joseph)——德国法学家, 1848 年为科倫的民主协会会员、安全委员会委員和人民委员会委員, 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代表(1848 年 10 月)。——第 693、695 頁。

四 画

巴希 (Bassy)——瑞士記者, 原籍意大利, 自由主义报纸“瑞士”的編輯。——第 210 頁。

巴罗, 奧迪隆 (Barrot, Odilon 1791—187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 年 2 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王朝反对派的首領, 1848 年 12 月—1849 年 10 月领导依靠反革命君主派集团的內閣。——第 174、244、245、247—249、459、469、470、522、569 頁。

巴魏, 沙尔·維克多 (Bavay, Charles Victor 1801—1875)——比利时法官; 1844 年起任布魯塞尔总檢察官。——第 265 頁。

巴塞, 哥特弗利德 (Basse, Gottfried 1778—1825)——克韦德林堡(普魯士)的发行商和图书商, 以出版通俗书籍, 其中包括所謂盜俠小說而出名。——第 56 頁。

巴尔曼, 莫里斯 (Barman, Morris 1808

—1878)——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国民院議員(1848—1857)。——第 111 頁。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維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民主主义者, 政論家,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 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 在第一国际中的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由于进行分裂活动, 1872 年在海牙會議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第 323、326、329、337、338、340—342 頁。

巴塔里尼, 卡洛 (Battaglini, Carlo 1812—1888)——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律師, 德森州出席国民院議員(1848—1851)。——第 111 頁。

巴斯蒂德, 茹尔 (Bastide, Jules 1800—187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国民报”的編輯之一(1836—1846); 曾任外交部长(1848 年 5—12 月)。——第 52、96 頁。

巴尔貝斯, 阿尔芒 (Barbès,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領导人物之一; 1848 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 因参加 1848 年 5 月 15 日事件被判无期徒刑, 1854 年因大赦被釋放。——第 421、663 頁。

巴塞爾曼, 弗里德里希·丹尼尔 (Basser-

- mann, Friedrich Daniel 1811—1855) —— 德國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巴登議會議員；1848—1849年革命時期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屬於中間派右翼。——第17、119、398、549頁。
- 韋爾登，弗蘭茨·路德維希 (Welden, Franz Ludwig 1782—1853) —— 男爵，奧地利將軍，1848年參加向革命的意大利進軍；在鎮壓了1848年十月起義後任維也納衛戍司令；1849年4—5月指揮鎮壓匈牙利革命的奧地利軍隊。——第129、357、611、612頁。
- 韋森堡，約翰·菲力浦 (Wessenberg, Johann Whilipp 1773—1858) —— 男爵，奧地利國家活動家，首相 (1848年7—11月)。——第81—84頁。
- 韋爾凱爾，卡爾·泰奧多爾 (Welcker, Karl Theodor 1790—1869) —— 德國法學家，自由派政論家，1848—1849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屬於中間派右翼。——第78—83、397、549頁。
- 韋森東克，胡果 (Wesendonck, Hugo) —— 杜塞爾多夫的普魯士律師，1848—1849年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屬於左派；1849年為第二議院議員，屬於極左派。——第518頁。
- 韋耶爾斯 (Weyers) —— 杜塞爾多夫的德國工人；1848年因進行革命宣傳被捕受審。——第319、321、543、545、557頁。
- 丰克 (Funk) —— 德國民主主義者，1848年是科倫民主協會會員。——第693頁。
- 丰克，亞歷山大·路德維希 (Funk, Alexander Ludwig 1806—1871) —— 瑞士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第10、40、76頁。
- 日拉丹，艾米爾·德 (Girardin, Emil de 1806—1881) —— 法國資產階級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在三十至六十年代曾斷續地擔任“新聞報”編輯，以政治上毫無原則著稱；1848年革命前反對基佐政府，在革命期間是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曾任立法議會代表 (1850—1851)，1850年為所謂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代表；後為波拿巴主義者。——第23頁。
- 卜肯多爾夫，康士坦丁·康斯坦丁諾維奇 (Бенкендорф, 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17—1858) —— 伯爵，沙皇軍隊上校，後是將軍，外交家。——第171頁。
- 比碩夫斯威德，約翰·魯道夫 (Bischofswerder, Johann Rudolf 1741—1803) —— 普魯士將軍和反動的国家活動家，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時期對普魯士內外政策有很大影響。——第572頁。
- 文迪施格雷茨，阿爾弗勒德 (Windischgrätz, Alfred 1787—1862) —— 公爵，奧地利元帥；1848年指揮鎮壓布拉格和維也納的起義；1848—1849年率領奧地利軍隊，鎮壓匈牙利革命。——第13、49、80、81、83、84、92、129、190、194、204、205、209、216、233、336、337、341、362—365、367、390、397、454、581、594、606、608、610頁。
- 戈爾蓋，阿爾都爾 (Görgey, Arthur 1818—1916) —— 1848—1849年為匈牙利革命軍事活動家，匈牙利軍隊總司令 (1849年4—6月)；曾依靠反動軍官和資產階級中的反革命派，陰謀破壞革命戰爭。——第563、609—612頁。
- 毛倫布勒歇爾，彼得·威廉 (Maurenbre-

cher, Peter Wilhelm 1777—1861)
——普魯士官吏，曾任杜塞尔多夫邮
政总局局长(1817—1850)。——第 67
頁。

方通，費里克斯·彼得羅維奇(Фонтоп,
Феликс Петрович 生于 1801 年)——
沙皇俄国外交官，1848 年为俄国駐維也
納大使館的顧問。——第 171 頁。

丹东，若尔日·雅克(Danton, George
Jacques 1759—1794)——十八世紀末
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
雅各宾党人的右翼領袖。——第 193
頁。

孔代，路易·昂利·約瑟夫(Condé, Louis
Henri Joseph 1756—1830)——法兰
西亲王，十八世紀革命初期从法国流亡
出外，服务于侨民軍团，返回法国后以
前被沒收的财产得到了賠償，其中一部
他以遺囑贈給爱妃菲雪尔。——第 423
頁。

不倫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Karl-
Wilhelm-Ferdinand 1735—1806)。
——第 192 頁。

不倫瑞克公爵，卡尔-弗里德里希-奧古
斯特-威廉(Karl-Friedrich-August-
Wilhelm 1804—1873)——自 1823 年
起为不倫瑞克公爵，1830 年 9 月初被推
翻，流亡国外；企图靠欧洲各国的帮助
重新执政，四十至五十年代与流亡民主
主义分子保持有联系，出版过“德意志
倫敦報”。——第 458 頁。

尤尔，安得魯(Ure, Andrew 1778—1857)
——英国化学家，庸俗經濟学家，自由
貿易論者。——第 639 頁。

邓宾斯基，亨利克(Dembiński, Henryk
1791—1864)——波兰將軍，民族解放
运动的活动家，1830—1831 年起义的参

加者，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匈牙利革
命軍的領導人之一。——第 455、610、
611 頁。

五 画

弗雷，萊米鳩斯·艾米尔(Frey, Remi-
gius Emil 1803—1889)——瑞士法学
家，国民院議員(1848—1851)。——第
101 頁。

弗雷-埃罗澤，弗里德里希(Frey-Hérosé,
Friedrich 1801—1873)——瑞士軍
官，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
反宗得崩德战争(1847)的参加者，1848
年为联邦院議員，国民院議員；1854 年
和 1860 年任瑞士联邦主席。——第
74、77 頁。

弗兰茨·卡尔(Franz Karl 1802—1878)
——奥地利大公，皇帝弗兰茨-約瑟夫
之父。——第 83 頁。

弗兰茨-約瑟夫一世(Franz-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
1916)。——第 400、569、585、606 頁。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
—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
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改革報”
編輯之一；1848 年为临时政府委員。
——第 470 頁。

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
(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1784—1877)——將軍，普魯士反动軍
閥的主要代表之一；1848 年 11 月参加
柏林反革命政变，驅散普魯士国民議
会。——第 19、20、49、64、119、145、
188、223、259、284、299、313、376、377、
408、430、431、578 頁。

弗兰西尼，斯蒂凡諾(Franscini, Stefano
1796—1857)——瑞士資產階級政治活

- 动家，經濟学家，激进主义者；原籍意大利；1848年为联邦院議員，国民院議員。——第74—76、114頁。
- 弗洛特韦尔，爱德华·亨利希(Flottwell, Eduard Heinrich 1786—1865)——普魯士的貴族官僚的代表之一；曾任財政大臣(1844—1846)，波茲南的总督，后为威斯特伐里亚的总督；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屬於右派。——第347、349、353、354、370—372頁。
- 弗萊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詩人，开始活动时是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詩人，1848—1849年是“新萊茵报”編輯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五十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第170、623頁。
- 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I 1657—1713)——普魯士国王(1701—1713)。——第571頁。
-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魯士国王(1740—1786)。——第350、428、572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Wilhelm 1620—1688)——勃兰登堡选帝侯(1640—1688)。——第571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Wilhelm II 1744—1797)——普魯士国王(1786—1797)。——第571、572、589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魯士国王(1797—1840)。——第29、30、572—574、589、616、617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魯士国王(1840—1861)。——第8、29—32、51、85、94—96、236、293、294、299、300、350、401—403、405、406、411、412、415、431、471、534、549、550、560、562、563、569、571、574、575、578—581、586—589、601、616—618頁。
-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Friedrich-August II 1797—1854)——薩克森国王(1836—1854)。——第578頁。
- 卡諾，拉查尔·尼古拉(Carnot, Lazare Nicolas 1753—1823)——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政治和軍事活动家，資产階級共和主义者；十八世紀法国資产階級革命时期，傾向雅各宾党人，1794年参加热月九日的反革命政变。——第193頁。
- 卡拉姆，昂利·弗洛里安(Calame, Henri Florian 1807—1863)——瑞士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反动分子，1848—1863年为大会議議員。——第8頁。
- 卡佩特——見路易十六。
- 卡萊尔，托馬斯(Carlyle, 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宣揚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观点和四十年代封建社会主义相近，站在反动的浪漫主义立場批判英国的資产階級，后来傾向托利党，1848年后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工人运动的露骨的敌人。——第636頁。
- 卡洛斯，唐(Carlos, Don 1788—1855)——西班牙王位的僭望者，1833—1840年企图通过发动內战来夺取王位并恢复封建僧侶集团的无限权力。——第184、203、229頁。
- 卡尔大公——見弗兰茨·卡尔。
- 卡斯滕斯(Carstens)——見列斯納，弗里德里希。
- 卡斯托蒂，让·雅克(Castoldi, Jean Jar-

- ques 1804—1871) ——瑞士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法學家，激進主義者；國民院議員(1848—1851)。——第 109 頁。
- 卡貝馬頓，威廉 (Kalbermatten, Wilhelm 1793—1875) ——瑞士將軍，反動分子，1844 年在瓦里斯州領導反革命政變。——第 111 頁。
- 卡芬雅克，高德弗魯阿 (Cavaignac, Godefroy 1801—1845) ——德國政論家，律師和政治活動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30 年革命的參加者，七月王朝時期為秘密的共和主義的人民之友社領導人之一，路易·歐仁·卡芬雅克之兄。——第 112 頁。
- 卡芬雅克，路易·歐仁 (Cavaignac, Louis Eugène 1802—1857) ——法國將軍和政治活動家；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侵略阿爾及利亞的參加者，1848 年二月革命後是阿爾及利亞總督，以在戰爭中採取野蠻手段著稱；從 1848 年 5 月起為法國陸軍部長，極端殘酷地鎮壓巴黎工人的六月起義，曾為政府首腦 (1848 年 6—12 月)。——第 23、91—93、96、174、189、248、459、469、470、540、662—664 頁。
- 卡羅林王朝 (Carolingians) ——法蘭克王朝 (751—843)。——第 331 頁。
- 布雷，約翰·弗蘭西斯 (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5) ——英國經濟學家，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的信徒，職業是印刷工人。——第 641 頁。
- 布倫納，約翰·卡爾 (Brenner, Johann Karl 1814—1883) ——瑞士律師，資產階級政論家，巴塞爾的“瑞士國民報”創始人和發行人，1848 年 11 月起為聯邦法院委員。——第 40 頁。
- 布德堡，安得列依·費多羅維奇 (Будберг, Андр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817—1881) ——男爵，沙皇俄國外交官，從 1848 年 1 月起在法蘭克福擔任代辦職務，後來為駐柏林公使。——第 174 頁。
- 布隆諾夫，菲力浦·伊萬諾維奇 (Бруннов, 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1797—1875) ——男爵，沙皇俄國外交官，四十至五十年代駐倫敦公使，後是大使。——第 174 頁。
- 布朗施奈，路易 (Blanchenay, Louis 1800—1881) ——瑞士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國民院議員 (1848—1860)。——第 109 頁。
- 古方蒂，維干德 (Guffanti, Wigand) ——德國商人，1848 年為科倫人民委員會委員。——第 693 頁。
- 古斯達夫二世阿道夫 (Gustav II Adolf 1594—1632) ——瑞典國王 (1611—1632) 和統帥；為了稱霸波羅的海，對丹麥、波蘭和俄國發動了戰爭；曾參加三十年戰爭，領導新教國家聯盟；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在德國成立的新教聯盟曾以他的名字命名。——第 519 頁。
- 瓦爾德克，貝奈狄克特·弗蘭茨·列奧 (Waldeck, Benedictus Franz Leo 1802—1870) ——德國政治活動家，資產階級激進主義者，職業是律師；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副議長和左派領導人之一；後為進步主義者。——第 162—164、355、356、443、447—449、522 頁。
- 瓦德馬爾 (Waldemar 1817—1849) ——普魯士親王。——第 429 頁。
- 瓦赫特爾 (Wachter) ——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8 年 9 月是科倫安全委員會委員。——第 695 頁。
- 盧格，阿爾諾德 (Ruge, Arnold 1802—

- 1880) —— 德国政論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資產階級激进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屬於左派；1866年以后是民族自由主义者。——第323、341、382—384頁。
- 卢普，尤利烏斯 (Rupp, Julius 1809—1884) —— 德国牧师，“光明之友”宗教运动的参加者，所謂“自由协会”的奠基人和領導人之一；1849年为第二議院議員，屬於左派。——第518—523頁。
- 卢卡文納，朱洛 (Rukavina, Džuro 1777—1849) —— 男爵，奥地利元帅；原籍克罗地亚；1849年参加鎮压匈牙利革命。——第607頁。
- 加格恩，亨利希 (Gagern, Heinrich 1799—1880) —— 男爵，德国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溫和的自由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和議長 (1848年5—12月)，屬於中間派右翼，曾任帝国首相 (1848年12月—1849年3月)。——第49、398、549頁。
- 加格恩，馬克西米利安 (Gagern, Maximilien 1810—1889) —— 男爵，德国官吏，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的議員；亨利希·加格恩之弟。——第53頁。
- 加里波第，朱澤培 (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 —— 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領袖；在反对奥地利的戰爭中，1848年率領义勇軍在皮蒙特軍隊一边奋不顾身地战斗；1849年4—6月为羅馬共和国国防的主要組織者；五十至六十年代領導意大利人民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統一而斗争。——第456頁。
- 尼格勒尔，尼克劳斯 (Niggeler, Nikolaus 1817—1872) —— 瑞士律师和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激进主义者；1848年为“伯尔尼报”編輯。——第42、210頁。
-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 —— 俄国皇帝 (1825—1855)。——第171、341、517、562、563、569、570、578頁。
- 尼科洛維烏斯，格奧尔格·亨利希·弗兰茨 (Nicolovius, Georg Heinrich Franz) —— 普魯士法官，1848年任萊茵省总檢察官。——第69、316、531、532、545頁。
- 皮尔，罗伯特 (Peel, Robert 1788—1850) ——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溫和派的領袖，曾任內政大臣 (1822—1827和1828—1830) 和首相 (1841—1846)，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廢除了谷物法 (1846)。——第386頁。
- 皮泰，本扎曼 (Pittet, Benjamin 死于1863年) —— 瑞士国民院議員 (1848—1851)。——第113頁。
- 皮奧达，卓万·巴蒂斯特 (Pioda, Giovanni-Battista 1808—1882) —— 瑞士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原籍意大利；反宗得崩德战争 (1847) 的参加者；1848—1849年是德森州出席国民院的議員。——第103、111、113—115頁。
- 本生，克利斯提安·卡尔·約西亚斯 (Bun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1791—1860) —— 男爵，普魯士外交家，政論家和神学家，接近普魯士宫廷；提出根据英国精神改革德国新教教會的計劃；曾任駐倫敦大使 (1842—1854)。——第29頁。
- 本格尔，弗兰茨·威廉 (Bengel, Franz Wilhelm 約生于1819年) —— 德国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繆尔海姆 (萊茵省) 工人联合会主席。——第692

頁。

司徒卢威, 古斯达夫 (Struve, Gustav 1805—187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新闻记者; 1848年4月和9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革命失败后离开德国;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方一边。——第53、56、60、61、148頁。

司徒卢威, 阿馬利亚 (Struve, Amalia 死于1862年)——1848—1849年德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 古斯达夫·司徒卢威之妻。——第56頁。

汉普敦, 約翰 (Hampden, John 1594—1643)——十七世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 代表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利益。——第304頁。

汉澤曼, 大卫 (Hanseman, David 1790—1864)——大资本家, 萊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 1848年3—9月任普魯士财政大臣, 实施同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28、114、120、123、124、133—146、150、157、184、215、217、218、223、275、276、283、284、408、414、415、446頁。

包林, 約翰 (Bowring, John 1792—1872)——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語言学家和文学家, 自由貿易論者; 五十年代他是在远东实施英国殖民政策的高级官員。——第386、636、641頁。

叶列娜·巴甫洛夫娜 (Елена Павловна 1806—1873)——俄国的大公妃, 米哈伊尔·巴甫洛維奇大公的夫人。——第172頁。

圣西門, 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偉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222頁。

圣茹斯特, 路易·安都昂 (Saint-Just,

Louis Antoine 1767—1794)——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 雅各宾党人的领袖之一。——第694頁。

六 画

艾希曼 (Eichmann)——旧普魯士贵族官僚的代表人物之一, 1845—1850年任萊茵省总督; 曾任普富尔內閣的内政大臣 (1848年9—10月); 1849年为第一議院議員。——第37、38、44、46、47、284、678頁。

艾森曼, 哥特弗利德 (Eisenmann, Gottfried 1795—1867)——德国政論家, 医生, 1848年是“德意志人民报”編輯;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屬于中間派, 后来屬于左派。——第395、425頁。

艾希霍恩 (Eichhorn)——普魯士法官, 1849年任爱北斐特檢察官。——第708頁。

艾希霍恩, 約翰·阿尔勃萊希特·弗里德里希 (Eichhorn, Johann Albrecht Friedrich 1779—1856)——普魯士国家活动家, 曾任宗教、教育、医务大臣 (1840—1848)。——第29、30頁。

艾貝迈尔 (Ebermeier)——普魯士法官。——第321、544頁。

米勒, 亨利希·哥特洛普 (Mühler, Heinrich Gottlob 1780—1857)——普魯士法官, 1832—1844年任司法大臣; 1848年任柏林最高法院庭长。——第163、167頁。

米歇尔, 格奥尔格 (Michel, Georg 1804—1867)——瑞士陆軍上校,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反宗得崩德战争的参加者, 国民院議員 (1848—1860)。——第

- 106、111、115 頁。
- 米尔德, 卡尔·奥古斯特 (Milde, Karl August 1805—1861) ——西里西亚的大工厂主, 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 1848 年任奥尔斯瓦特—汉澤曼內閣的商业大臣 (6—9 月), 普魯士国民議會議长 (5—6 月), 屬於右派。——第 134 頁。
- 米哈伊尔·巴甫洛維奇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1798—1848) ——俄国大公, 尼古拉一世的兄弟。——第 172 頁。
- 米尔巴赫, 奥托 (Mirbach, Otto) ——退伍的普魯士炮兵軍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 年五月起义时期任爱北斐特卫戍司令; 起义失败后从德国流亡出外。——第 597、598 頁。
- 列斯納, 弗里德里希 (Lessner, Friedrich 1825—1910)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裁縫;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受审者之一;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694 頁。
- 列列韦尔, 約阿希姆 (Lelewel, Joachim 1786—1861) ——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 1830—1831 年参加波兰起义, 为波兰流亡民主派領袖之一, 1847—1848 年任布魯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委員。——第 614 頁。
- 列奥波特一世 (Leopold I 1790—1865) ——比利时国王 (1831—1865)。——第 265 頁。
- 列奥波特二世 (Leopold II 1797—1870) ——托斯卡納大公 (1824—1859)。——第 453 頁。
- 吉尔, 烏尔利希·弗兰茨 (Kyll, Ulrich Franz) ——德国法学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科倫出席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屬於左派; 1849 年为第二議院議員, 屬於极左派; 后来是进步主义者。——第 529、530 頁。
- 吉尔克 (Gierke) ——普魯士官吏, 自由主义者;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屬於中間派左翼; 奥尔斯瓦特—汉澤曼內閣的农业大臣 (1848 年 6—9 月); 1849 年为第一議院議員。——第 134、162、164 頁。
- 吉比奇, 伊万·伊万諾維奇 (Дибич,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85—1831) ——俄国將軍、元帅, 鎮压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沙皇軍隊总司令。——第 335 頁。
- 西姆桑, 馬丁·爱德华·西吉茲蒙特 (Simson, Martin Eduard Sigismund 1810—1899) ——普魯士政治活动家, 法学家;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屬於中間派右翼, 1848 年 12 月—1849 年 5 月任該議會議长, 1848 年 11 月为駐柏林的帝国專員; 1849 年为第二議院議員, 屬於左派; 六十年代为国會議长, 是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398 頁。
- 西蒙斯, 路德維希 (Simons, Ludwig 1803—1870) ——德国法学家, 反动分子;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的議員, 屬於右派, 后来担任司法大臣 (1849—1860)。——第 528、529、558、594 頁。
- 西姆尼奇, 巴塔扎尔 (Симунић, Balthasar 1785—1861) ——男爵, 奥地利元帅; 原籍塞爾維亞; 1848—1849 年曾参加鎮压匈牙利革命。——第 365、610 頁。
- 安內克, 弗里德里希 (Anneke, Friedrich 1818—1872) ——普魯士炮兵軍官, 1846 年因政治信仰被革除軍职; 共产主

- 义者同盟科倫支部的成員，1848年为科倫工人联合会創始人之一，“新科倫报”編輯，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委員；1849年任巴登—普法尔茨革命軍中校；后参加美国内战，站在北方一边。——第151、152、154、158、160、281、282、509、687—689、698、702、704頁。
- 安內克，瑪蒂尔达·弗兰契斯卡(Anneke, Mathilde Franziska 1817—1884)——德国女作家，1848—1849年曾为民主报刊撰稿；弗里德里希·安內克之妻。——第155頁。
- 毕洛夫-庫梅洛夫，恩斯特·哥特弗利德·格奥尔格(Bülow-Cummerow, Ernst Gottfried Georg 1775—1851)——德国的反动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普魯士容克地主的代言人。——第345頁。
- 毕尔格尔，哥特弗利德·奥古斯特(Bürger, Gottfried August 1747—1794)——德国著名詩人。——第427頁。
- 毕尔格尔斯，亨利希(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激进政論家，“萊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1848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支部的盟員，“新萊茵报”編輯之一；从1850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在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中被判处六年徒刑，后成为进步主义者。——第695頁。
- 圭茨，克利斯提安(Götz, Christian 1783—1849)——奥地利將軍；1848—1849年鎮压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第365、610頁。
- 圭拉奇，弗兰契斯科·多美尼科(Guerazzi, Francesco Domenico 1804—1873)——意大利作家，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温和的民主主义者，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第93頁。
- 达倫，海尔曼，奥拉堡男爵(Dahlen, Hermann, Baron von Orlaburg 1828—1887)——奥地利軍官；参加鎮压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第606、608頁。
- 达斯普雷，康斯坦丁(D'Aspre, Constantin 1789—1850)——男爵，奥地利將軍，参加鎮压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第467頁。
-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战略家和国家活动家。——第333頁。
- 托斯卡納大公——見列奥波特二世。
- 伊丽莎白(Elisabeth 1801—1873)——普魯士女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王妃。——第585頁。
- 考斯丘什科，塔杰烏什(Kościuszko, Tadeusz 1746—1817)——杰出的十八世紀九十年代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動家；1776—1783年是爭取北美殖民地独立斗争的参加者；1794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第335頁。
- 乔里奇，安东(Чорих, Anton 1795—1864)——奥地利將軍；原籍克罗地亚；曾参加鎮压維也納1848年十月起义和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第365、610頁。
- 齐格勒，保尔·卡尔·爱德华(Ziegler, Paul Karl Eduard 1800—1882)——瑞士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反宗崩德战争(1847)的参加者，1848年为国民院議員。——第111頁。
- 尧赫，弗兰茨(Jauch, Franz 1807—1867)——瑞士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联邦法

院成員(1848—1852)。——第40頁。

七 画

貝斯, 米凱萊·朱澤培 (Bes, Michele Giuseppe 1794—1855) ——1848—1849年与奥軍作战的皮蒙特軍队的將軍。——第467頁。

貝克, 約翰·巴普提斯特 (Bekk, Johann Baptist 1797—1855) ——巴登的国家活动家, 溫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6—1849年任巴登政府內政大臣。——第407頁。

貝姆, 約瑟夫 (Bem, Joseph 1795—1850) ——波兰將軍, 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 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 1848年参加了維也納的革命斗争; 匈牙利革命軍的領導人之一; 后在土耳其軍队服务。——第507、563、609、612頁。

貝尔格 (Berg) ——瑞士軍官, 1848年为国民院議員。——第107、109—111頁。

貝尔格, 菲力浦 (Berg, Philipp 1815—1866) ——普魯士天主教牧师, 资产階級政治活动家, 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中間派左翼; 1849年为第二議院議員。——第443、444、446頁。

貝克尔, 約翰·菲力浦 (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 ——制刷工人, 三十至四十年代参加德国和瑞士民主运动, 以瑞士軍队軍官的身分参加过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 1848—1849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指揮巴登民团, 六十年代是第一国际的卓越活动家之一, 曾参加第一国际的各次代表大会, “先驅”杂志的編輯;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212頁。

貝克尔, 海爾曼·亨利希 (Becker, Her-

mann Heinrich 1820—1885) ——德国法学家和政論家, 科倫工入业主联合会的領導人之一, 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員會委員; “西德意志报”的發行人 (1849年5月—1850年7月); 1850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后来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509、693、695、707頁。

貝倫茲, 尤利烏斯 (Berends, Julius 生于1817年) ——柏林—印刷厂厂主, 小资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左派; 1849年为第二議院議員, 属于极左派。——第529頁。

貝利耶, 泰奧菲尔 (Berlier, Teophile 1761—1844) ——伯爵, 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国民公会代表; 1799年霧月十八日政变后为国务委員會委員。——第266頁。

貝諾特, 約瑟夫·列奧納特 (Bernold, Joseph Leonard 1809—1872) ——瑞士陸軍上校, 资产階級政治活动家; 1848年为国民院議員。——第101頁。

貝尔鳩斯, 卡尔·尤利烏斯 (Bergius, Karl Julius 1804—1871) ——普魯士官員, 资产階級法学家和政論家。——第345頁。

貝希托特, 阿尔諾德 (Bechtold, Arnold) ——出版“新萊茵报”的科倫印刷所的排字工人。——第707頁。

克拉埃 (Krahe) ——1848—1849年为科倫工入联合会會員; 职业是钟錶匠。——第692頁。

克劳斯, 菲力浦 (Krauß, Philipp 1792—1861)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曾任財政大臣(1848—1851)。——第80頁。

克列弗尔 (Clever) ——普魯士軍官, 1848

- 年与丹麦作战时期是营长。——第 513 頁。
- 克尼查宁, 斯蒂凡·彼得罗維奇 (Книшанин, Stevan Petrović 1807—1855) ——塞爾維亞的司令官, 参加鎮压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第 607 頁。
- 克拉麦尔, 卡尔 (Cramer, Karl) ——德国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是科倫出版的民主報紙“萊茵守卫者”的发行人和編輯。——第 693—696 頁。
- 克倫威尔, 奧利弗 (Cromwell, Oliver 1599—1658) ——十七世紀英国資产階級革命时期的資产階級和資产階級化的貴族的領袖, 1653 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 15 頁。
- 克利斯特恩, 約翰·威廉 (Christern, Johann Wilhelm) ——匿名出版的諷刺小册子“1847 年 4 月艾塞勒博士和柏塞勒男爵出席省議會會議旅途散記”的作者。——第 79 頁。
- 克劳狄烏斯, 馬提阿斯 (Claudius, Matthias 1740—1815) ——德国詩人。——第 70 頁。
- 杜蒙, 約瑟夫 (Dumont, Joseph 1811—1861) ——德国資产階級新聞記者, 溫和和自由主义者; 从 1831 年起是“科倫日報”的发行人。——第 21、43、131、170、214、215、217、218、220、231、256、310、584、617 頁。
- 杜兰多, 卓万尼 (Durando, Giovanni 1804—1869) ——1848—1849 年与奧軍作战的皮蒙特軍队的將軍。——第 467 頁。
- 杜福尔, 吉約姆·昂利 (Dufour, Guillaume Henri 1787—1875) ——瑞士將軍, 資产階級政治活动家; 1847 年率領击潰了宗得崩德軍队的联邦軍隊; 1848—1849 年为国民院議員。——第 11、101、107、111—114 頁。
- 杜厄斯堡, 弗兰茨 (Duesberg, Franz 1793—1872) ——普魯士反动的国家活动家, 1846 年到 1848 年三月革命期間是財政大臣。——第 347、349、353、354 頁。
- 杜沙特尔, 沙尔 (Duchâtel, Charles 1803—1867) ——法国反动的国家活动家, 曾任內政部长 (1839、1840—1848 年 2 月)。——第 114 頁。
- 亨克尔, 亨利希 (Henkel, Heinrich 1802—1873) ——德国教授, 法学家, 1848 年被选入法兰克福国民議會, 7 月 3 日退了委任状, 1849 年 3 月再次当选为議員, 屬於中間派左翼。——第 161 頁。
- 亨利五世 (Heinrich V) ——見尙博尔, 昂利·沙尔。
- 亨利希七十二世罗伊斯-罗賓斯坦-艾貝斯道弗 (Heinrich LXXII Reus-Lobenstein-Ebersdorf 1797—1853) ——德国一小邦弟系罗伊斯的大公 (1822—1848)。——第 222 頁。
- 亨格施坦堡, 恩斯特·威廉 (Hengstenberg, Ernst Wilhelm 1802—1869) ——德国神学家, 反动分子, 柏林大学教授。——第 94 頁。
- 里德尔, 阿道夫·弗里德里希·約翰 (Riedel, Adolf Friedrich Johann 1809—1872) ——普魯士政治活动家;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 屬於右派; 1849 年为第二議院議員, 屬於右派。——第 429、451、523—529 頁。
- 里奧泰, 卡尔·尼古勞斯 (Riotte, Karl Nicolaus 約生于 1816 年) ——德国民

- 主义者，律师，1849年为第二議院議員，爱北斐特1849年5月起义时的安全委员会委員；后流亡美国。——第597頁。
- 里德馬頓，奧古斯丁 (Riedmatten, Augustin 1796—1867) ——瑞士軍官；1844年曾領導瓦里斯州的反革命政变，1848—1849年参加鎮压那不勒斯的革命运动，而且还参加远征西西里島。——第111頁。
- 里廷豪森，摩里茨 (Rittinghausen, Moritz 1814—1890) ——德国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新萊茵報”撰稿人，科倫民主协会會員；第一国际的成員，后来(1864年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黨員。——第693、695頁。
- 沃尔弗，威廉 (Wolff, Wilhelm 1809—1864) ——德国无产階級革命家，职业是教員，西里西亚一个农奴的儿子；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34—1839年被囚于普魯士監獄中；1846—1847年是布魯塞爾共产主义通訊委员会委員，从1848年3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1848—1849年是“新萊茵報”編輯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70、509、623、695、698、702、704、705頁。
- 沃尔弗，斐迪南 (Wolf, Ferdinand) ——德国政論家，1846—1847年是布魯塞爾共产主义通訊委员会委員，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1848—1849年是“新萊茵報”編輯之一；1848—1849年革命后离开；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馬克思；后来放棄了政治活动。——第623、694、695、705頁。
- 沃尔弗斯，弗兰茨·安东 (Wolffers, Franz Anton 生于1813年) ——德国資產階級新聞記者，原籍比利时，1847—1849年是“科倫日报”撰稿人和編委，后来成为波拿巴主义者的奸細。——第310頁。
- 沃尔格穆特，路德維希 (Wohlgemuth, Ludwig 1788—1851) ——男爵，奧地利元帥，参加鎮压1848年意大利和1849年匈牙利的革命运动。——第611頁。
- 伯克，奧古斯特 (Böckh, August 1785—1867) ——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第94頁。
- 伯提歇尔，卡尔·威廉 (Boetticher, Karl Wilhelm 死于1868年) ——普魯士官員，三十年代为普魯士省总督。——第184頁。
- 利济斯基 (Lisiecki) ——波茲南法官；原籍波兰；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屬於左派；1849年为第二議院議員，屬於极左派。——第510、511、514、518頁。
- 利希諾夫斯基，費里克斯 (Lichnowski, Felix 1814—1848) ——公爵，普魯士軍官，反动分子，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屬於右派；1848年9月法兰克福起义期間被人民打死。——第680、707頁。
- 麦迭妮，巴維尔·伊万諾維奇 (Медем, 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1800—1854) ——伯爵，沙皇俄国外交官，駐維也納公使。——第171頁。
- 麦克庫洛赫，約翰·拉姆賽 (Ma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 ——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庸俗政治經濟学的代表人物。——第637頁。
- 努根特，拉伐尔 (Nugent, Laval 1777—

- 1862)——伯爵，奧地利元帥；曾參加鎮壓意大利和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第 365、606、608 頁。
- 庇護九世 (Pius IX 1792—1878) ——羅馬教皇 (1846—1878)。——第 173、369、389、453 頁。
- 勞麥，弗里德里希 (Raumer, Friedrich 1781—1873) ——德國反動的历史學家；1848 年任帝國駐巴黎大使，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屬於中間派右翼。——第 78、96 頁。
- 邦格特 (Bangert) ——洛桑工人聯合會會員。——第 682 頁。
- 沙佩爾，卡爾 (Schapper, Karl 約 1812—1870) ——德國和国际工人運動的卓越活動家，正義者同盟的領導人之一，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委員，1848 年 9 月 25 日至 11 月 15 日被監禁在獄中；1849 年 2 月 8 日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審判案的被告之一；1849 年 2—5 月為科倫工人聯合會主席；1850 年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時期是倫敦“左”傾宗派集團的領袖之一；1856 年又和馬克思接近，是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第 39、44、307、308、509、543、678、679、687、689、691—693、695、698、702、704 頁。
- 李嘉圖，大衛 (Ricardo, David 1772—1823) ——英國經濟學家，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著名的代表人之一。——第 222 頁。
- 蘇里曼二世 (Suleiman II) ——土耳其皇帝 (1687—1691)。——第 332 頁。
- 希爾德布蘭特，約翰·安得列阿斯·卡爾 (Hildebrandt, Johann Andreas Karl 1764—1848) ——德國作家，許多獵奇

小說和武俠小說的作者。——第 134 頁。

八 画

- 拉·馬爾摩拉，阿爾丰梭·費勒羅 (La Marmora, Alphonso Ferrero 1804—1878) ——意大利將軍和政治活動家，陸軍大臣 (1848、1849—1855)。——第 455、456、463 頁。
- 拉沃，弗蘭茨 (Raveaux, Franz 1810—1851) ——德國政治活動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8—1849 年是科倫出席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屬於中間派左翼；駐瑞士的帝國專員，1849 年 6 月是帝國五攝政之一；巴登臨時政府委員，巴登—普法爾茨起義失敗後離開德國。——第 699 頁。
- 拉圖爾，泰奧多爾 (Latour, Theodor 1780—1848) ——伯爵，奧地利國家活動家，君主專制的擁護者；1848 年是陸軍大臣；1848 年 10 月被維也納起義者處死。——第 41、606 頁。
- 拉馬丁，阿爾丰斯 (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 ——法國詩人，歷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四十年代是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1848 年任外交部長，是臨時政府實際上的首腦。——第 52、173、174、322、323、369、469、577、662—665 頁。
- 拉登堡，阿達爾貝特 (Ladenberg, Adalbert 1798—1855) ——普魯士反動官僚的代表之一；曾任宗教、教育、醫務大臣 (1848 年 11 月—1850 年 12 月)。——第 29—32、157、215、217、284 頁。
- 拉薩爾，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 ——德國小資產階級政論家和律師，1848—1849 年曾參加萊茵省

- 的民主运动,六十年代初傾向于工人运动,是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奠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魯士的霸权下“自上”来統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創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別。——第66、68、308、316—321、531—533、543—548、553—557頁。
- 拉莫里諾,吉罗拉莫(Ramorino, Gerolamo 1792—1849)——意大利將軍,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指揮皮蒙特軍隊,采取叛变的策略,使反革命的奥地利軍隊获得了胜利。——第458、461、464、465、468頁。
- 拉斯拜尔,弗朗斯瓦(Raspail, François 1794—1878)——卓越的法国学者,自然科学家,政論家和社会主义者,接近革命无产阶级,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制宪議會議員。——第661、663—668頁。
- 拉德茨基,約瑟夫(Radetzky, Joseph 1766—1858)——伯爵,奥地利元帅,1831年起指揮在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軍隊,1848—1849年殘酷鎮压意大利的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第91、92、102、106、116、209、453—457、459、462—466、468、613頁。
- 拉亚契奇,約瑟夫(Рајачић, Joseph 1785—1861)——卡尔洛瓦茨的大主教,1848年为塞尔維亚的总主教,1848—1849年曾領導塞尔維亚民族运动的反动派;1849年2月至8月为伏伊伏迪納的执政者。——第338頁。
- 拉多維茨,約瑟夫(Radowitz, Joseph 1797—1853)——普魯士將軍和国家活动家,宫廷权奸的代表人物,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右派的领导人之一。——第424、471、541、542、550頁。
- 阿蒙(Ammon)——普魯士官吏,1848—1849年任杜塞尔多夫檢察官,1849年为第一議院議員。——第317、318、531、532、544頁。
- 阿佩尔,克利斯提安(Appel, Christian 1785—1854)——奥地利將軍,曾参加鎮压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第467頁。
- 阿倫特,恩斯特·摩里茨(Arndt, Ernst Moritz 1769—1860)——德国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曾积极参加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战争;因被民族主义分子拘禁而丧失自由;君主立宪政体的拥护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属于中間派右翼。——第81頁。
- 阿貝尔,米歇尔·比埃尔·阿列克西斯(Hébert, Michel-Pierre Alexis 1799—1887)——法国的法学家和保守派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議會議員(1834—1848);1841年起是王国法庭的首席檢察官,曾任司法大臣(1847—1848年2月),1849年为立法議會議員。——第265頁。
- 阿尔伯(Albert 眞名是亚历山大·馬丁 Alexandre Martin 1815—1895)——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848年为临时政府委員。——第663頁。
- 阿尔宁-博伊岑堡,阿道夫·亨利希(Arnim-Boytzenburg, Adolf Heinrich 1803—1868)——伯爵,普魯士国家活动家,反动的普魯士容克地主的代表,曾任內政大臣(1842—1845)和首相(1848年3月19—29日),1849年为第二議院的右派領袖之一。——第415、

- 430、451、518 頁。
- 阿特金森，威廉 (Atkinson, William) ——十九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的英國經濟學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古典學派的反對者，保護關稅論者。——第 636 頁。
- 阿尔梅拉斯，亚历山大·費里克斯 (Almeras, Alexander Felix 1811—1868) ——瑞士資產階級政治家，激進主義者，國民院議員。——第 109 頁。
- 阿基比阿德 (Alcibiades [Ἀλκιβιάδης] 公元前約 451—404) ——雅典政治活動家和統帥。——第 104、110 頁。
- 阿尔文斯累本，阿尔勃萊希特 (Alvensleben, Albrecht 1794—1858) ——伯爵，普魯士國家活動家，曾任財政大臣 (1835—1842)；1849 年為第一議院議員。——第 347、349、353、354 頁。
- 波克，詹姆斯·諾克斯 (Polk, James Knox 1795—1849) ——美利堅合眾國總統 (1845—1849)，屬於民主黨。——第 182 頁。
- 波拿巴 (Bonaparte) ——見拿破侖第一。
- 波拿巴 (Bonaparte) ——見拿破侖第三。
- 波特曼，約翰 (Pothmann, Johann 約生于 1823 年) ——德國民主主義者，1849 年 5 月愛北斐特起義時期為安全委員會委員和後備軍的領導人；起義失敗後流亡荷蘭。——第 596 頁。
- 波旁王朝 (Bourbons) ——法國王朝 (1589—1792、1814—1815 和 1815—1830)。——第 202、227 頁。
- 波尔多的亨利 (Heinrich) ——見尚博尔，昂利·沙尔。
- 波托茨基家族 (Potocki) ——波蘭一個伯爵家族。——第 195 頁。
- 帕托夫，艾拉茲穆斯·羅伯特 (Patow, Erasmus Robert 1804—1890) ——男爵，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國家活動家；康普豪森內閣的商業、工業和公共工程大臣 (1848 年 4—6 月)。——第 143 頁。
- 帕拉茨基，弗兰蒂舍克 (Palacky, František 1798—1876) ——捷克大歷史學家，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自由主義者；1848 年曾任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會主席；實行旨在維護哈布斯堡專制統治的政策。——第 201、204、337 頁。
- 帕麥斯頓，亨利·約翰 (Palmerston, Henry John 1784—1865) ——英國國家活動家，開始活動時是托利黨人，1830 年起是輝格黨領袖之一，依靠該黨右派；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內政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52、55、57、75、171 頁。
- 帕斯凱維奇，伊萬·費多羅維奇 (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1782—1856) ——俄國元帥，1831 年夏天起，任鎮壓 1830—1831 年波蘭起義的沙皇軍隊總司令，1849 年任參加鎮壓匈牙利革命的沙皇軍隊總司令。——第 335 頁。
- 羅西，佩勒格里諾 (Rossi, Pellegrino 1787—1848) ——意大利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法學家和政治活動家，庸俗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他在法國居住很久。——第 639、646、657 頁。
- 羅西尼，卓阿金諾 (Rossini, Gioacchino 1792—1868) ——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第 81 頁。
- 羅爾謝特 (Rohrscheidt) ——普魯士官吏，行政區長官；1849 年為第二議院議員，屬於中間派。——第 518 頁。
- 羅伯斯比爾，馬克西米利安 (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 ——十八世

- 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杰出活動家，雅各賓黨的領袖，革命政府的首腦（1793—1794）。——第28、273、694頁。
- 圖恩，列奧(Thun, Leo 1811—1888)——伯爵，奧地利國家活動家，反動分子；原籍捷克，弗蘭茨-約瑟夫的最親近顧問之一，曾任宗教和教育大臣（1849—1860）。——第337頁。
- 圖爾恩-翁特-塔克西斯，馬克西米利安·卡爾(Thurn und Taxis, Maximilien Karl 1802—1871)——德國的領主王公；1867年以前他享有管轄德國許多邦的郵政事務機構的世襲特權；是“法蘭克福總郵報”的世襲所有主。——第373頁。
- 佩羅納·狄·桑-馬丁諾，艾托勒(Perrone di San Martino, Ettore 1789—1849)——曾於1848—1849年與奧軍作戰的皮蒙特軍隊的將軍。——第467頁。
- 佩爾采爾，摩里茨(Perczel, Moritz 1811—1899)——匈牙利將軍，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參加者；革命失敗後，流亡土耳其，後流亡英國。——第507、612頁。
- 尚博爾，昂利·沙爾(Chambord, Henri Charles 1820—1883)——伯爵，波旁王朝長系的最後代表，查理十世之孫，法國王位僭望者，自封亨利五世。——第310、421、470、569頁。
- 尚加爾涅，尼古拉·安·德奧杜爾(Changarnier, Nicolas Anne Theodule 1793—1877)——法國將軍和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君主主義者；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代表；1848年6月後為巴黎衛戍部隊和國民自衛軍司令，曾參加驅散巴黎1849年6月13日的示威遊行。——第248、249、251、627頁。
- 舍勒爾(Scherer)——德國律師，1849年為第二議院議員，屬於右派。——第447頁。
- 舍爾比利埃，安都昂·埃利澤(Cherbuliez, Antoine Elisée 1797—1869)——瑞士經濟學家，西斯蒙第的信徒，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論和李嘉圖的理論結合在一起。——第640頁。
- 味吉爾(普卜利烏斯·味吉爾·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杰出的羅馬詩人。——第29、412頁。
- 金克爾，哥特弗利德(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德國詩人和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9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參加者；後被普魯士法庭判處無期徒刑，逃出監獄後流亡英國；是倫敦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的領袖之一，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第359頁。
- 屈韋特爾，弗里德里希(Kühlwetter, Friedrich 1809—1882)——普魯士資產階級國家活動家，奧爾斯瓦特—漢澤曼內閣的內政大臣（1848年6—9月）；後來任杜塞爾多夫的行政區長官，威斯特伐利亞省的總督。——第134、139、144、414頁。
- 奈弗，威廉(Neff, Wilhelm 1802—1881)——瑞士法學家，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自由主義者；1848年為聯邦院議員。——第75頁。
- 林泰倫，威廉(Rintelen, Wilhelm 死於1869年)——普魯士官吏，曾任司法大臣（1848年11月—1849年4月）；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屬於右派；1849年為第一議院議員。——第165、166頁。

法肯海恩 (Falkenhain)——德国民主主义者, 1848 年为布勒斯劳“德意志”协会主席。——第 276 頁。

芬克, 格奥尔格 (Vincke, Georg 1811—1875) ——男爵, 普鲁士政治活动家, 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右派领导人之一; 1849 年为第二议院議員, 属于右派。——第 426—429、432、451 頁。

九 画

迪茨, 约翰·威廉 (Dietz, Johann Wilhelm)——从 1848 年 8 月 30 日起印刷“新莱茵报”的科伦印刷厂厂主。——第 707 頁。

迪茨, 弗里德里希 (Diez, Friedrich 1794—1876)——德国哲学家, 罗曼語研究比較法的創始人, “罗曼語語法”的作者。——第 525 頁。

施利克, 弗兰茨·亨利希 (Schlick, Franz Heinrich 1789—1862)——伯爵, 奥地利將軍, 曾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第 362—366、607—612 頁。

施林克 (Schlink)——普鲁士法官; 1848 年为普鲁士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右派, 后属于中間派。——第 28 頁。

施梅林, 安东 (Schmerling, Anton 1805—1893)——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中間派右翼; 1848 年是帝国内政大臣 (7—12 月), 首相和外交大臣 (9—12 月)。——第 49、53—55、59—62、79—81、83、149 頁。

施納澤, 卡尔·尤利烏斯·斐迪南 (Schnaase, Karl Julius Ferdinand 1798—1875)——德国法官, 法学家和艺术

史家; 1848 年任杜塞尔多夫檢察长, 后来是柏林高級法庭的成員。——第 276 頁。

施泰因, 尤利烏斯 (Stein, Julius 1813—1889)——西里西亚教师, 政論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是普鲁士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左派; 1849 年为第二议院議員, 属于极左派。——第 144、145、299、355、356 頁。

施图普, 亨利希·約瑟夫 (Stupp, Heinrich Joseph)——普鲁士官吏, 教权派;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右派。——第 215、218、251 頁。

施梯維, 约翰·卡尔·贝尔特拉姆 (Stüve, Johann Karl Bertram 1798—1872)——德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曾任汉諾威的内政大臣 (1848—1850)。——第 407 頁。

施万貝克, 欧根·阿列克西斯 (Schwanbeck, Eugen Alexis 1821—1850)——德国资产阶级新聞記者, 1848—1849 年为“科伦日报”編委。——第 310—314、357、358、362—368 頁。

施特罗达, 卡尔·阿道夫 (Strotha, Karl Adolf 1786—1870)——普鲁士將軍, 反动分子, 第一议院議員, 曾任陸軍大臣 (1848 年 11 月—1850 年 2 月)。——第 511—514 頁。

施泰德曼, 卡尔 (Stedmann, Karl 1804—1882)——普鲁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溫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 年在馬尔摩签订停战协定的全权代表, 駐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帝国專員 (1848 年 9 月—1849 年 3 月); 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中間派。——第 78、680、707 頁。

施泰格尔, 雅科布·罗伯特 (Steiger,

- Jakob Robert 1801—1862) ——瑞士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自由主義者，1848—1849 年為國民院議長。——第 100、104、107、110、115、148、149 頁。
- 施皮格爾·博林豪森 (Spiegel-Borlinghausen) ——普魯士官吏，1848 年為杜塞爾多夫的行政區長官。——第 64、65 頁。
- 施坦吉爾，約翰 (Stangier, Johann) ——阿爾滕基爾欣地區的莊稼人，萊茵省民主運動的參加者。——第 531、544、546 頁。
- 施奈貝爾格，格· (Schneeberger, G.) ——1848 年洛桑工人聯合會會員。——第 682 頁。
- 施坦普弗利，雅科布 (Stämpfli, Jakob 1820—1879) ——瑞士資產階級國家活動家，激進主義者；四十和五十年代是“伯爾尼報”的創辦人和編輯。——第 42、210 頁。
- 施托克馬爾，克薩維耶 (Stockmar, Xavier 1797—1864) ——瑞士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激進主義者。——第 42、211 頁。
- 施萊根施坦，路德維希·羅特·馮 (Schreckenstein, Ludwig Roth von 1789—1858) ——男爵，普魯士將軍，封建貴族的代表，1848 年 6—9 月是陸軍大臣。——第 134 頁。
- 施奈德爾第二，卡爾 (Schneider II, Karl) ——德國法學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8 年是科倫民主協會主席和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委員；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9 年 2 月 7 日“新萊茵報”審判案中的辯護人；1849 年 2 月 8 日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審判案的被告；1849 年為第二議院議員，屬於極左派；科倫共產黨人案件 (1852) 的辯護人。——第 24、27、39、44、265、268、279、280、288、307、308、543、678、679、689、691、693、699 頁。
- 查理-阿爾伯特 (Charles-Albert 1798—1849) ——撒丁國王 (1831—1849)。——第 453、456—459、464 頁。
- 查理·馬爾泰爾 (Charles Martel 約 688—741) ——法蘭克的宮廷大臣，從 715 年起是法蘭克王國的實際執政者。——第 199 頁。
- 查理大帝 (Charles the Great 約 742—814) ——法國國王 (768—800) 和皇帝 (800—814)。——第 328 頁。
- 查理一世 (Charles I 1600—1649) ——英國國王 (1625—1649)，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被處死。——第 15、289、304 頁。
- 查理五世 (Charles V 1500—1558) ——西班牙國王 (1516—1556)，所謂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1519—1556)。——第 14 頁。
- 查理十世 (Charles X 1757—1836) ——法國國王 (1824—1830)。——第 15 頁。
- 查爾托雷斯基家族 (Czartoryski) ——波蘭一個公爵家族。——第 195 頁。
- 哈夫，克· (Haaf, Chr.) ——1848 年為洛桑工人聯合會會員。——第 682 頁。
- 哈尼，喬治·朱利安 (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 ——英國工人運動的卓越活動家，憲章運動左派領袖之一；“北極星報”編輯；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有聯繫。——第 696 頁。
- 哈諾夫 (Hanow) ——德國官吏；1848 年為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屬於中間派左翼；1849 年為第二議院議員，屬於左派。——第 143 頁。

- 哈尔科特, 弗里德里希·威廉 (Harkort, Friedrich Wilhelm 1793—1880)——普魯士大工厂主, 1848—1849年为普魯士国民議會中一个中間派的首脑; 后为第二議院議員, 属于中間派。——第 429 頁。
- 哈布斯堡王朝 (Habsburger)——1273—1806 年(中有間断) 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的王朝, 奧地利王朝(从 1804 年起) 和奧匈帝国王朝 (1867—1918)。——第 194、195、204、453、605 頁。
- 威德, 約翰 (Wade, John 1788—1875)——英国政論家, 經濟学家和历史学家。——第 637 頁。
- 威灵頓, 阿瑟 (Wellington, Arthur 1769—1852)——公爵, 英国統帥, 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首相(1828—1830), 外交大臣 (1834 年 10 月—1835 年 4 月)。——第 304、468 頁。
- 威斯特曼 (Westermann)——1849 年为科倫工人联合会會員。——第 687 頁。
-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72—1843)——尼德兰国王 (1815—1840); 1830 年以前, 他的政权扩展到了比利时。——第 227 頁。
-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普魯士亲王, 普魯士国王 (1861—1888), 德国皇帝 (1871—1888)。——第 20、85、119、236、259 頁。
- 科苏特, 拉約什 (路德維希) (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領袖, 在 1848—1849 年革命中領導資产階級民主派, 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 革命失敗后逃出匈牙利。——第 193、194、206、232、233、333、358、364、454、507、563、604—607、692、693、695 頁。
- 科尔夫, 海爾曼 (Korff, Hermann)——普魯士軍官, 因政治信仰于 1847 年被革除軍职; 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是“新萊茵报”的发行負責人; 后流亡美国。——第 150、685、705、707 頁。
- 科尔图姆, 卡尔·阿尔諾德 (Kortum, Karl Arnold 1745—1824)——德国詩人和作家, 以“約卜西之歌”一书而著名。——第 79、118 頁。
- 科西迪耶尔, 馬尔克 (Caussidière, Marc 1808—1861)——法国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1834 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 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組織的組織者之一; 1848 年二月革命后担任巴黎警察局长, 制宪議會議員, 1848 年 6 月流亡英国。——第 663 頁。
-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者, 历史学家, 1848 年为临时政府成員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 站在与資产階級妥协的立場上。——第 73、661、663、671 頁。
- 勃魯姆, 罗伯特 (Blum, Robert 1807—1848)——德国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記者; 領導法蘭克福国民議會中的左派; 1848 年 10 月参加維也納的保卫战, 反革命軍队占領維也納后被枪杀。——第 49、84、209、212、362、397、398、507、693 頁。
- 勃律盖曼, 卡尔·亨利希 (Brüggemann, Karl Heinrich 1810—1887)——德国資产階級政論家, 自由主义者; 1845—1855 年为“科倫日报”主編。——第 131、132、224、253、254、310、311、584 頁。
- 勃兰登堡, 弗里德里希·威廉 (Brandenburg, Friedrich Wilhelm 1792—1850)——伯爵, 普魯士將軍和国家活

- 动家,反革命內閣的首腦(1848年11月—1850年11月)。——第5、6、14、15、17—21、25、30—32、37、38、45、46、48—51、63—65、85、94、120、123、145、166、215、217、218、258、260、298、375、376、408、426、471、508、580頁。
- 洛貝爾圖斯,約翰·卡爾(Rodbertus,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國經濟學家,資產階級化的普魯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1848—1849年革命期間是溫和自由主義的政治活動家,普魯士國民議會的中間派左翼領袖;後來宣傳反動的普魯士“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第6頁。
- 洛伊特豪斯(Leuthaus)——普魯士法官,1848年為科倫偵查員。——第44頁。
- 約翰(Johann 1782—1859)——奧地利大公,1848年6月至1849年12月為德意志帝國攝政王。——第87、88頁。
- 約瑟夫二世(Joseph II 1741—1790)——所謂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1765—1790)。——第373頁。
- 耶尼(Jenni)——瑞士政論家,激進主義者,伯爾尼幽默報紙“全景”的編輯。——第211頁。
- 耶拉契奇,約西普(Јелачић, Josip 1801—1859)——伯爵,奧地利將軍,克羅地亞、達爾馬威亞和斯拉窩尼亞總督(1848—1859),積極參加鎮壓匈牙利和奧地利1848—1849年革命。——第23、49、55、84、92、129、203—205、336、338、362、364、365、377、378、605、606、611、612頁。
- 南施蒂爾(Nenstiel)——德國商人,1848年為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屬於中間派。——第143頁。
- 拜比吉,查理(Babbage, Charles 1792—1871)——英國數學家和機械專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第639頁。
- 若里(Jolly)——1848年為瑞士聯邦法院的成員。——第40頁。
- 濟格瓦特-彌勒,康斯坦丁(Sieglwart-Müller, Constantin 1801—1869)——瑞士國家活動家,反動分子,1844年任聯邦議會議長,1845年任宗得崩德軍事委員會主席,宗得崩德失敗(1847年)後,逃亡國外。——第100頁。
- 美延多爾夫,彼得·卡季米羅維奇(Мейендорф, Петр Казимирович 1796—1863)——男爵,沙皇俄國外交官,曾任駐柏林大使(1839—1850)。——第171頁。
- 品德爾,尤利烏斯·海爾曼(Pinder, Julius Hermann 生于1805年)——普魯士官吏,溫和的自由主義者;1848年任西里西亞總督,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屬於右派,1849年為第一議院議員。——第38頁。
- 洪貝格爾,亨利希(Homberger, Heinrich 1806—1851)——瑞士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自由主義者;1848年為國民院議員。——第109頁。

十 画

- 馬拉,讓·保爾(Marat, Jean Paul 1743—1793)——法國政論家,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傑出活動家,雅各賓黨人的領袖之一。——第694頁。
- 馬利耶,埃蒂耶納(Marilley, Etienne 1804—1889)——夫賴堡主教(1846—1879),夫賴堡(在夫賴堡州)1848年10月24日反民主暴亂的煽動者。——第42頁。
- 馬克思,卡爾(Marx, Karl 1818—1883)

- (傳記材料)。——第 24、27、39、44、70、150、262、277、286、307、308、509、543、600、603、623、630、670、675、678—680、685—693、698、699、702、704—707 頁。
- 馬爾滕, 格·(Malten, G.)——德国反动記者,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总邮报”編輯。——第 373 頁。
- 馬米阿尼, 托倫西奧(Mamiani, Torenzio 1799—1885)——伯爵, 意大利詩人和政論家, 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 曾任教皇領地的內政大臣(1848 年 5—8 月)。——第 91 頁。
- 馬拉斯特, 阿尔芒(Marrast, Armand 1801—1852)——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領袖之一, “国民报”編輯; 1848 年任临时政府委員和巴黎市长, 制宪議會議長(1848—1849)。——第 23、93、104、174、664 頁。
- 馬爾薩斯, 托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牧师, 經濟学家, 資產階級化的地主貴族的思想家, 資本主义制度的辯护人, 仇視人类的人口論的宣傳者。——第 223、637、646、649 頁。
- 馬爾泰澤, 約翰(Maltheser, Johann)——普魯士警察厅的密探, 职业是訂书工人。——第 154、160、170 頁。
- 馬爾科夫斯基, 伊格納茨(Malkowsky, Ignaz 1784—1854)——奥地利將軍; 1849 年曾参加鎮压匈牙利革命。——第 607—609 頁。
- 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en II 1811—1864)——巴伐利亚国王(1848—1864)。——第 578 頁。
- 埃林堡, 克利斯提安·哥特弗利德(Ehrenberg, Christian Gottfried 1795—1876)——德国自然科学家, 柏林大学教授。——第 94 頁。
- 埃歇尔, 阿尔弗勒德(Escher, Alfred 1819—1882)——瑞士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法学家; 曾任大会議主席(1847); 1849 年起多次任国民院議長。——第 75、103—106、110、114 頁。
- 埃塞尔(Esser)——普魯士法官, 民主主义者; 1848 年为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 屬於左派; 1849 年为第二議院議員, 屬於左派。——第 162—164 頁。
- 埃塞尔, 克利斯提安·約瑟夫(Esser, Christian Joseph 約生于 1809 年)——德国工人, 科倫工人联合会會員, 1849 年为“自由、博爱、劳动”报的編輯。——第 151、152、158、159、687、696、698、702、704 頁。
- 埃塞尔第一, 約翰·亨利希·泰奧多尔(Esser I, Johann Heinrich Theodor)——普魯士官吏, 律師, 教权派, 1848 年任普魯士国民議會副議長, 屬於中間派。——第 163 頁。
- 埃塞尔第二, 斐迪南·約瑟夫(Esser II, Ferdinand Joseph)——普魯士官吏, 教权派, 1848 年为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 屬於中間派。——第 163 頁。
- 埃斯特哈济·馮·加兰塔, 帕尔·安东(Esterhazy von Galantha, Anton 1786—1866)——匈牙利大地主, 奥地利外交官, 曾任第一屆匈牙利政府外交大臣(1848 年 3—9 月)。——第 363 頁。
- 海特男爵, 奧古斯特(Heydt, August 1801—1874)——普魯士資產階級国家活动家; 1848 年 12 月—1858 年 11 月曾任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內閣的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 1849 年为第二議院議員。——第 123、438—440、

- 524、528、594 頁。
- 海斯，亨利希 (Heß, Heinrich 1788—1870)——奧地利元帥；曾積極參加鎮壓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第 468 頁。
- 海涅，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偉大的德國革命詩人。——第 18、32、58、119、217、236、327、521、571、595、669 頁。
- 海爾克斯 (Herx)——科倫工人歌詠團的領導人。——第 694 頁。
- 海爾佐克，卡爾 (Herzog, Karl 1798—1857)——瑞士政論家和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自由主義者，“伯爾尼憲法之友”報編輯。——第 210 頁。
- 海爾梅斯，約翰·提摩泰烏斯 (Hermes, Johann Timotheus 1738—1821)——德國神學家和作家，長篇小說“索菲婭從默麥爾到薩克森旅行記”的作者。——第 53 頁。
- 格林兄弟，雅科布和威廉 (Grimm, Jacob 1785—1863, Wilhelm 1786—1859)——都是德國哲學家，柏林大學教授，以編著德國民間童話和中世紀史詩著名。——第 94 頁。
- 格羅特 (Groote)——普魯士法官，哥特沙克案件的有責任人。——第 154、160、251 頁。
- 格魯希，艾曼紐爾 (Grouchy, Emmanuel 1766—1847)——侯爵，法國元帥和貴族，拿破侖戰爭的參加者。——第 468 頁。
- 格拉德巴赫，安東 (Gladbach, Anton 死于 1873 年)——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8 年為繆爾海姆（在萊茵省）出席普魯士國民議會的代議，屬於左派，柏林民主俱樂部主席。——第 692、693 頁。
- 格涅茲諾和波茲南的大主教——見普什魯斯基、萊昂。
- 恩格斯 (Engels)——普魯士上校，1848—1849 年任科倫衛戍司令。——第 364 頁。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傳記材料)。——第 7、70、150、279、280、596—599、623、676、677、681、685、689、691—693、695、705、708 頁。
- 恩斯特-奧古斯特 (Ernst-August 1771—1851)——漢諾威國王 (1837—1851)。——第 578 頁。
- 特羅斯特 (Trost)——德國民主主義者，1849 年 5 月愛北斐特起義時期為安全委員會委員。——第 596 頁。
- 特德斯科，維克多 (Tedesco, Victor 1821—1897)——比利時律師，革命民主主義者 and 社會主義者，工人運動參加者，布魯塞爾民主協會創始人之一；1847—1848 年曾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里斯康士案的被告，被處死刑，後改為三十年徒刑，1854 年被釋放。——第 694 頁。
- 特雷斯科夫，西吉茲蒙特·奧托 (Treskow, Sigismund Otto)——德國商人，1796 年起在奧文斯克 (波茲南) 置有產業。——第 539 頁。
- 留博米爾斯基家族 (Lubomirski)——波蘭一個公爵家族。——第 195 頁。
- 留博米爾斯基，埃日伊 (Lubomirski, Jerzy 1817—1872)——公爵，波蘭貴族，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會的參加者，1849 年為奧地利國會議員。——第 341 頁。
-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

- naparte 1769—1821) —— 法国皇帝 (1804—1814 和 1815)。——第 15、175、177、268、274、292、333、335、363、403、405、411、433、454、456、468、572、573、589 頁。
- 拿破侖第三 (路易-拿破侖·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 —— 亲王, 拿破侖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国总统 (1848—1851), 法国皇帝 (1852—1870)。——第 23、56、174、207、421、422、425、459、663 頁。
-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 —— 偉大的德国詩人和剧作家。——第 19、56、79、173、549 頁。
- 席斯, 約翰·烏尔利希 (Schliess, Johann Ulrich 1813—1883) —— 瑞士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曾任瑞士联邦总理 (1848—1881)。——第 55 頁。
- 泰梅, 約多庫斯·多納图斯·胡貝尔图斯 (Temme, Jodokus Donatus Hubertus 1798—1881) —— 德国法学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 年为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左派; 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第 162—165 頁。
- 泰奥多罗維奇, 庫茲曼 (Теодоровић, Kusman) —— 奥地利將軍; 原籍塞爾維亞; 1849 年曾参加鎮压匈牙利革命。——第 365、607 頁。
- 茨魏費爾 (Zweiffel) —— 普魯士官吏, 反动分子, 科倫檢察長, 1848 年为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右派。——第 28、44、46、47、70、71、262、265、270—273、276、279、532、678、685、689 頁。
- 爱特尔, 茹尔 (Eytel, Jules 1817—1873) —— 瑞士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瓦得 (窩) 州激进党的領袖之一, 1848 年为国民院議員。——第 101、109、110 頁。
- 热那亚公爵, 斐迪南 (Ferdinand 1822—1855) —— 撒丁国王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之弟, 1848—1849 年反对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第 467 頁。
- 哥特沙克, 安得列阿斯 (Gottschalk, Andreas 1815—1849) —— 德国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支部的成員; 1848 年 4—6 月为科倫工会联合会主席; 从小資產階級宗派主义立場来反对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德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第 151—155、157—161、687、699—701 頁。
- 庫尔特 (Kurth) —— 德国工人, 木匠, 1848—1849 年为科倫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会员。——第 693 頁。
- 涅謝尔罗迭, 卡尔·瓦西里也維奇 (Не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 —— 伯爵, 沙皇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外交大臣 (1816—1856)。——第 52、171 頁。
- 倫納德, 安得列阿斯 (Renard, Andreas 1795—1874) —— 公爵, 西里西亞地主, 反动分子, 1849 年为第二議院議員, 属于右派。——第 429、444—446 頁。
- 索菲婭 (Sophia 1805—1872) —— 奥地利大公妃, 皇帝弗兰茨-約瑟夫之母, 对反动的宫廷奸党的政策有很大影响。——第 83、171、172、400、606 頁。
- 唐納, 卡尔·魯道夫 (Tanner, Karl Rudolf 1794—1849) —— 瑞士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法学家, 最高法院院长, 1848 年为国民院議員。——第 105、110 頁。
- 翁魯, 汉斯·維克多 (Unruh, Hans Victor 1806—1886) —— 普魯士工程

师，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中間派领导人之一，10月起任国民議会主席；1849年为第二議院議員，屬於左派；以后是进步主义者政党的創始人之一，后来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300頁。

朗堡，格奥尔格·亨利希 (Ramberg, Georg Heinrich 1786—1855) ——男爵，奥地利元帅，曾参加镇压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第611頁。

十一画

梅特涅，克雷門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 ——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神圣同盟的組織者之一。——第171、196、197、313、373、397頁。

梅維森，古斯达夫 (Mevissen, Gustav 1815—1899) 德国銀行家，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会议員，屬於中間派右翼。——第215頁。

梅利奈，弗朗斯瓦 (Mellinet, François 1768—1852) ——比利时將軍；原籍法国；1830年比利时資產階級革命和比利时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布魯塞尔民主协会名誉主席，里斯康土案的被告之一，被判处死刑，后改为三十年徒刑，1849年9月被赦免。——第152、694頁。

梅尔克 (Maercker) ——普魯士資產階級国家活动家，曾任奥尔斯瓦特—汉澤曼內閣的司法大臣 (1848年6—9月)。——第134頁。

梅森豪澤，凱撒·溫采尔 (Messenhauser, Caesar Wenzel 1813—1848) ——奥

地利軍官和文学家，1848年十月起义时期，为国民自卫軍指揮官和維也納卫戍司令；反革命軍队占領城市后，被枪杀。——第212頁。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維克 (Mieroslawski, Ludwig 1814—1878) ——波兰政治和軍事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曾参加1846年波茲南起义的准备工作，1848年三月革命时釋放；1848年領導波茲南起义，后来領導西西里島起义者的斗争；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曾指揮革命軍；在五十年代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有联系；1863年波兰起义期間，被任命为波兰民族政府的执政，起义失敗后，流亡法国。——第189、694頁。

康普 (Kamp) ——波恩—旅社的主人，科倫 1849年2月24日民主宴会的参加者。——第694頁。

康佩斯，蓋尔哈特·約瑟夫 (Compes, Gerhard Joseph 1810—1887) ——德国法学家，自由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会议員，屬於中間派左翼。——第215頁。

康普茨，卡尔 (Kamptz, Karl 1769—1849) ——普魯士国家活动家，反动分子，曾任司法大臣 (1832—1842)。——第346頁。

康普豪森，卢道夫 (Camphausen, Ludolph 1803—1890) ——德国銀行家，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魯士首相，实行与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普魯士駐中央政权的使节 (1848年7月—1849年4月)。——第5、29、118—120、124、128、130—133、135、215、217、218、239、258—261、290、296、376、414、429、430、432、445。

- 536、552、558 頁。
- 康塔多尔, 罗侖茲 (Cantador, Lorenz) ——德国商人,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8 年指揮杜塞尔多夫市民自卫团; 1848 年 12 月因号召武装反对皇帝政权被捕, 1849 年 3 月被釋放; 流亡美国。——第 308、318—321、543、545、546 頁。
- 莫里哀, 让·巴蒂斯特 (Molière, Jean Baptiste 1622—1673) ——偉大的法国剧作家。——第 312 頁。
- 莫萊特 (Morret) ——普魯士警官, 1848—1849 年为杜塞尔多夫的典獄长。——第 317、318、543 頁。
- 莫斯累, 約翰·路德維希 (Mosle, Johann Ludwig 1794—1877) ——德国軍官, 出席联邦議会的奧登堡代表; 1848 年被派往維也納的帝国專員。——第 78—84、397 頁。
- 梯利, 約翰 (Tilly, Johann 1559—1632) ——伯爵, 三十年战争时期的統帥, 曾指揮天主教联盟軍队; 1631 年 5 月他統率的軍队向馬格德堡发起进攻, 占領后洗劫了該城。——第 260 頁。
- 梯岑 (Tietzen) ——普魯士將軍, 反动分子。——第 590 頁。
- 梯勒, 路德維希·古斯塔夫 (Thile, Ludwig Gustav 1781—1852) ——普魯士將軍和国家活动家, 反动分子; 1849 年任国库大臣。——第 371、372 頁。
- 梯也尔, 阿道夫 (Thiers, Adolphe 1797—1877) ——法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曾任总理 (1836—1840); 1848 年为制宪議會議員, 1849—1851 年为立法議會議員, 奥尔良党人; 曾任共和国總統 (1871—1873), 屠杀巴黎公社起义者的劊子手。——第 173、174、249、469、470、522 頁。
-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約姆 (Gizot,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 ——法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1840 年至 1848 年二月革命期間, 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內政和外交, 代表了大金融資產階級的利益。——第 52、265、373、522、668 頁。
- 基斯克爾 (Kisker) ——普魯士法官, 1848 年曾任普富尔內閣的司法大臣, 1849 年为第一議院議員。——第 284 頁。
- 基尔希曼, 尤利烏斯 (Kirchmann, Julius 1802—1884) ——德国法学家和哲学家, 激进主义者; 1848 年为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中間派左翼。——第 162、164 頁。
- 許金, 列文 (Schücking, Levin 1814—1883) ——德国作家; 1845—1852 年是“科倫日报”撰稿人, 曾写过許多小品文。——第 310 頁。
- 許澤尔, 約翰·汉斯·古斯塔夫·亨利希 (Hüser, Johann Hans Gustav Heinrich 1782—1857) ——普魯士將軍, 反动軍閥的代表之一, 1844—1849 年任美因茲的卫戍司令。——第 184、600 頁。
- 許納拜恩, 弗·符· (Hühnerbein, F. W.) ——德国共产主义者, 职业是裁縫; 1849 年 5 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員會委員。——第 596 頁。
- 符尔夫, 尤利烏斯 (Wulff, Julius) ——德国民主主义者, 1848 年为杜塞尔多夫人民俱乐部主席,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第 276 頁。
- 符尔皮烏斯, 克利斯提安·奧古斯特 (Vulpus, Christian August 1762—1827) ——德国作家, 他的长篇小说“黎納尔多·黎納尔丁尼”最为著名。——

第 56 頁。

盖伊, 路德維特 (Gai, Liudevít 1809—1872)——克罗地亚記者, 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1848 年为克罗地亚临时政府委員, 实行旨在维护哈布斯堡专制統治的政策。——第 201 頁。

盖格尔, 威廉·阿尔諾德 (Geiger, Wilhelm Arnold)——普魯士警官, 1848 年任法院偵查員, 后来任科倫警察厅长。——第 155、156 頁。

密尔頓, 約翰 (Milton, John 1608—1674)——偉大的英国詩人和政論家, 十七世紀英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参加者。——第 78 頁。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偉大的英国作家。——第 19、33、99、111、164 頁。

雪恩来因, 約翰·魯卡斯 (Schönlein, Johann Lukas 1793—1864)——德国医生, 柏林大学教授, 君主主义者。——第 94 頁。

曼托伊費尔, 奧托·泰奧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男爵, 普魯士国家活动家, 貴族官僚的代表; 曾任內政大臣 (1848 年 11 月—1850 年 11 月), 1849 年为第一議院和第二議院議員, 曾任首相 (1850—1858)。——第 30—32、37、45、49、51、63、87、215、217、218、221、223、229、232、233、376—379、381、405、408、413、437—440、449、450、508、520—522、524、525、535、541、542、546、550、552、558、574、578、580、594 頁。

勒澤尔, 彼得·格尔哈特 (Röser, Peter Gorhardt 1814—186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制雪茄烟的工人; 1848—1849 年为科倫工人联合会副主

席, “自由、博爱、劳动”报的发行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人之一; 后来倾向拉薩尔派。——第 687、688、694 頁。

十二画

普赫納, 安东 (Puchner, Anton 1779—1852)——男爵, 奥地利將軍, 曾参加鎮压 1849 年匈牙利革命。——第 365、607—610 頁。

普富尔, 恩斯特 (Pfuel, Ernst 1779—1866)——普魯士將軍, 反动軍閥的代表人物之一; 1832—1848 年任紐沙特尔省长; 1848 年 3 月任柏林卫戍司令; 5 月曾指揮鎮压波茲南起义; 1848 年 9—10 月任首相和陸軍大臣。——第 7、8、14、19、37、64、143—145、233、284、299、300、415、445 頁。

普林茨, 弗·(Prinz, W.)——科倫工人联合会會員, “自由、劳动”报的編輯, 哥特沙克的拥护者。——第 687 頁。

普斯庫亨-格蘭佐夫, 約翰·弗里德里希·威廉 (Pustkuchen-Glanzow, Johann Friedrich Wilhelm 1793—1834)——德国作家, 仿歌德“威廉·麦斯特”一书改写的許多恶毒而无能的歪詩的作者。——第 357 頁。

普菲弗尔, 卡济米尔 (Pfyffer, Kasimir 1794—1875)——瑞士律師, 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1848 年为国民院議員。——第 40、102、103 頁。

普什魯斯基, 萊昂 (Przyluski, Leon 1789—1865)——曾任格涅茲諾和波茲南的大主教 (1845—1865)。——第 536 頁。

普路古尔姆, 比埃尔·昂勃魯阿茲 (Plougoum, Pierre Ambroise 1796—1863)——法国官吏, 法学家, 議會議員 (1846

- 1848)。——第 265 頁。
- 普魯士亲王——見威廉一世。
- 斯密, 亞當 (Smith, Adam 1723—1790)
——英國經濟學家, 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220 頁。
- 斯蒂凡 (Stephan 1817—1867) ——奧地利大公, 1847—1848 年任匈牙利督軍。——第 605 頁。
- 斯圖亞特王朝 (Stuarts) ——曾統治蘇格蘭 (1371 年起) 和英格蘭 (1603—1649 和 1660—1714) 的王朝。——第 202、227 頁。
- 斯特拉蒂米洛維奇, 喬治 (Стратимировић, 1822—1908) ——塞爾維亞政治活動家; 奧地利軍隊的軍官; 1848 年為伏伊伏迪納塞爾維亞自由派領袖; 後來轉到反革命陣營方面去了。——第 338 頁。
- 黑克爾 (Hecker) ——普魯士法官, 1848 年任科倫檢察官。——第 70、71、155、156、277、282、531、532、675 頁。
- 黑克爾, 弗里德里希·卡爾 (Hecker, Friedrich Karl 1811—1881) ——巴登的共和主義者,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1848 年 4 月巴登起義的領導人之一, 起義失敗後, 流亡瑞士, 後流亡美國, 美國內戰的參加者, 站在北方一邊。——第 53、60、675 頁。
- 黑格爾, 喬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德國古典哲學的最大代表, 客觀唯心主義者, 極全面地發展了唯心主義的辯證法。——第 202、574、669 頁。
- 黑克舍爾, 約翰·古斯塔夫 (Heckscher, Johann Gustav 1797—1865) ——德國法學家; 曾任帝國司法大臣 (1848 年 7—8 月) 和外交大臣 (1848 年 8—9 月); 帝國政府駐意大利大使;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 屬於中間派右翼。——第 53、78 頁。
- 博寧, 古斯塔夫 (Bonin, Gustav 1797—1878) ——普魯士貴族官僚的代表人物之一; 1848 年任財政大臣 (9 月底—11 月初), 五十和六十年代任波茲南總督。——第 415 頁。
- 博馬舍, 比埃爾·奧古斯丹 (Beaumarchais, Pierre Augustin 1732—1799)
——杰出的法國劇作家。——第 111、224、532 頁。
- 博德爾施文克, 恩斯特 (Bodelschwingh, Ernst 1794—1854) ——普魯士國家活動家, 反動分子; 1842 年起任財政大臣, 1845 年至 1848 年 3 月任內政大臣; 1849 年為第二議院議員, 屬於右派。——第 29、233、343—347、349、353、354、370、429、449—451 頁。
- 舒爾采-德里奇, 海爾曼 (Schulze-De-litzsch, Hermann 1808—1883) ——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政治活動家; 1848 年為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 屬於中間派; 六十年代是資產階級進步分子政黨的領袖之一, 曾企圖用組織合作社的方式使工人離開革命鬥爭。——第 451 頁。
- 舒爾茨 (Schultz) ——普魯士法官, 1848 年為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 屬於左派。——第 144、145 頁。
- 斐迪南一世 (Ferdinand I 1793—1875)
——奧地利皇帝 (1835—1848)。——第 605、606 頁。
- 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 1810—1859)
——那不勒斯國王 (1830—1859)。——

第 173 頁。

費特爾·馮·多根菲爾德, 安東 (Vetter von Doggenfeld, Anton 1803—1882) —— 匈牙利將軍, 1848—1849 年是科蘇特的戰友, 革命失敗後從匈牙利流亡出外。——第 611 頁。

費希巴赫 (Fischbach) —— 1849 年繆爾海姆 (在萊茵省) 工人聯合會舉行的民主宴會的參加者。——第 692 頁。

凱倫, 約翰·康拉德 (Kern, Johann Conrad 1808—1888) —— 瑞士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 法學家和外交家; 聯邦法院院長。——第 40、105、109 頁。

凱撒 (凱尤斯·尤利烏斯) (Caesar, Caius Julius 公元前約 100—44) —— 著名的羅馬戰略家 and 國家活動家。——第 333 頁。

富勒爾, 約納斯 (Furrer, Jonas 1805—1861) —— 瑞士律師, 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 溫和的自由主義者; 1848 年為聯邦代表會議議長, 後來任瑞士聯邦主席, 蘇黎世市長。——第 10、72、73、75、76、105、113、114、116、147、149 頁。

傅立葉, 沙爾 (Fourier, Charles 1772—1837) —— 偉大的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第 222 頁。

雅科比, 約翰 (Jacoby, Johann 1805—1877) —— 德國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1848 年為普魯士國民議會中左派領導人之一; 1849 年為第二議院議員, 屬於極左派; 七十年代傾向社會民主黨人。——第 446、447 頁。

賀雷西 (昆圖斯·賀雷西·弗拉克)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 65—8) —— 傑出的羅馬詩人。——第 54、103 頁。

瓊斯, 厄內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 —— 傑出的英國工人運動活動家, 無產階級詩人和政論家, 憲章派左翼領袖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696 頁。

敦克爾 (Duncker) —— 普魯士官吏, 1848 年任柏林警察廳長。——第 417 頁。

菲雪爾, 索菲 (Feuchères, Sophie 1795—1840) —— 男爵夫人, 路易·昂利·約瑟夫·孔代親王的愛妃。——第 423 頁。

十三画

奧特 (Ott) —— 沃林根 (在萊茵省) 的德國民主主義者。——第 692 頁。

奧托, 卡爾·烏尼巴特 (Otto, Karl Wunibald 約生于 1809 年) —— 德國化學家, 1848—1849 年為科倫工人聯合會會員,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 科倫共產黨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人之一。——第 698、702、704 頁。

奧爾費斯 (Olfers) —— 德國法官。——第 165 頁。

奧克辛本, 約翰·烏爾利希 (Ochsenbein, Johann Ulrich 1811—1891) —— 瑞士資產階級國家活動家, 激進主義者, 後來是自由派領袖之一, 反宗得崩德戰爭時期, 任聯邦代表會議議長, 聯邦政府首腦 (1847—1848); 1848 年任國民院議長, 並且是聯邦院議員。——第 10、72—77、147、149、210、211 頁。

奧馬爾公爵, 奧爾良的昂利·歐仁·菲力浦·路易 (Aumale, Henri Eugène Philippe Louis, duc d' 1822—1897) —— 法國國王路易·菲力浦之子。——第 423 頁。

奧爾良公爵 —— 見路易·菲力浦。

奥尔良的阿黛拉伊德 (Adelaide, Eugénie Louise 1777—1847)——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姊妹。——第 422 頁。

奥尔斯瓦特, 魯道夫 (Auerswald, Rudolf 1795—1866)——普魯士国家活动家, 接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貴族的代表, 曾任首相和外交大臣 (1848 年 6—9 月)。——第 134、138、415 頁。

路易-拿破侖 (Louis-Napoléon)——見拿破侖第三。

路易-菲力浦 (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 (1830—1848)。——第 265、389、398、402、420、422、470、668、670 頁。

路易十一 (Louis XI 1423—1483)——法国国王 (1461—1483)。——第 194 頁。

路易十六 (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 (1774—1792), 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刑。——第 14、15 頁。

路德維希·約瑟夫·安东 (Ludwig Joseph Anton 1784—1864)——奥地利大公。——第 171 頁。

塔敦-特利格拉弗, 阿道夫 (Thadden-Trieglaff, Adolf 1796—1882)——波美拉尼亚的普魯士地主, 反动分子; 1847 年为第一届联合議会的成員。——第 432 頁。

塔謝罗, 茹尔·安都昂 (Taschereau, Jules Antoine 1801—1874)——法国资产阶级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国民报”編委; 1833—1838 年和 1848 年曾发行“往事述評”; 1848—1849 年为制宪議会和立法議會議員, 属于右派, 后来成为拿破侖主义者。——第 373 頁。

塞万提斯·德·薩維德拉, 米格尔 (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

1616)——偉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第 54、439、592 頁。

蒙欽格尔, 約瑟夫 (Munzinger, Joseph 1791—1855)——瑞士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联邦院議員 (1848—1855), 1851 年任瑞士联邦主席。——第 72、75、147、149 頁。

詹姆斯二世斯图亚特 (James II Stuart 1633—1701)——大不列顛和爱尔兰国王 (1685—1688)。——第 15 頁。

十四画

維勒 (Wöhler)——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第 693 頁。

維昂, 弗朗斯瓦 (Veillon, François 1793—1859)——瑞士法官, 国民院議員 (1848—1851)。——第 113 頁。

維尔特, 格奥尔格 (Weerth, Georg 1822—1856)——德国无产阶级詩人和政論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48—1849 年为“新萊茵报”編輯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71、623、680、705、707 頁。

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 (Viktor Emanuel II 1820—1878)——薩瓦公爵, 撒丁国王 (1849—1861), 意大利国王 (1861—1878)。——第 467 頁。

維多利亞 (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 (1837—1901)。——第 350 頁。

維登布魯赫, 路易 (Wildenbruch, Louis 1803—1874)——普魯士外交官, 曾任駐貝魯特总領事, 1848 年与丹麦作战时期, 与普魯士国王秘密使团一起被派往哥本哈根。——第 187 頁。

維特根施坦, 亨利希 (Wittgenstein, Heinrich 1800—1868)——普魯士官吏, 1848 年任行政区长官 (5—9 月) 和

科倫市民自卫团司令。——第 215、251 頁。

維尔騰堡亲王，保尔·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Paul Karl Friedrich August 1785—1852)。——第 172 頁。

赫克(Höcke)——奥地利民主主义者，維也納 1848 年十月起义的参加者。——第 507、508 頁。

赫希斯特，恩斯特·海尔曼 (Höchster, Ernst Hermann 約生于 1811 年)——爱北斐特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 年 5 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从德国流亡出外；后来脱离了政治活动。——第 597、598 頁。

赫山諾夫斯基，沃伊采赫 (Chrzanowski, Wojciech 1788—1861)——波兰將軍；1849 年 3 月实际上指揮与奥軍作战的皮蒙特軍隊。——第 462、465 頁。

福适，萊昂 (Faucher, Léon 1803—1854)——法国资产阶级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經濟学家，馬尔薩斯主义者，曾任内政部长 (1848 年 12 月—1849 年 5 月)；后来成为拿破侖主义者。——第 247 頁。

福格特，卡尔 (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会議員，屬于左派；1849 年 6 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 年逃离德国；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小册子 (1860) 中揭露他是路易·波拿巴的走狗。——第 425、549 頁。

歌德，約翰·沃尔弗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偉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 28、

54、241、258、310、357、358、411 頁。

蒲魯东，比埃尔·約瑟夫 (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論家，經濟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創始人之一，1848 年为制宪議会議員。——第 646、656、661、666—672 頁。

豪斯曼 (Hausmann)——德国工人，1849 年 2 月 24 日科倫宴会的参加者。——第 694 頁。

十五画

德朗克，恩斯特 (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論家，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和“新萊茵报”編輯之一；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英国；后来脱离了政治活动。——第 70、623、695、705、707 頁。

德律埃，昂利 (Druey, Henri 1799—1855)——瑞士国家活动家，激进主义者；曾参加制定 1848 年宪法，联邦院議員，1850 年任瑞士联邦主席。——第 73、75、76、114 頁。

德斯特尔，卡尔·路德維希·約翰 (D'Estter, Karl Ludwig Johann 1811—1859)——德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职业是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支部的成員，1848 年为普魯士国民議会議員，屬于左派；1848 年 10 月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員；1849 年为第二議院議員，屬于极左派；在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起了显著的作用；后来流亡瑞士。——第 447、451 頁。

德利加爾斯基 (Drigalski)——普魯士將軍，普魯士反动軍閥的代表人物；1848

年为杜塞尔多夫的师长。——第 64—68、160、416、580、581、686 頁。

魯卡斯 (Lukas) —— 1849 年为繆尔海姆 (在萊茵省) 工人联合会會員。——第 692 頁。

魯特尔 (Lutter) —— 普魯士官吏, 1848 年任科倫警監。——第 154 頁。

魯維尼, 扎科莫 (Luvini, Giacomo 1795—1862) —— 瑞士政治和軍事活动家, 律師, 激进主义者; 原籍意大利; 1847 年曾参加击潰宗得崩德軍队的战争; 1848 年起为德森州出席国民院的議員。——第 101、105—111、115 頁。

摩萊, 路易·馬蒂約 (Molé, Louis Mathieu 1781—1855) —— 伯爵, 法国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分子, 曾任总理 (1836—1837, 1837—1839), 1848 年为制宪會議代表, 1849—1851 年为立法會議代表。——第 522 頁。

十六画

賴夫, 威廉·約瑟夫 (Reiff, Wilhelm Joseph 約生于 1822 年) —— 科倫工人联合会會員, 后来任工人启蒙联合会書記, 1850 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 曾因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 而受审。——第 687 頁。

賴德律-洛兰, 亚历山大·奧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 Auguste 1807—1874) —— 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的領袖之一, “改革报”編輯; 1848 年为临时政府委員; 制宪會議和立法會議代表, 在議會中領導山岳党; 1849 年 6 月 13 日示威游行后, 流亡英国。——第 76、173、470、627、628、661—668、693 頁。

霍伊姆, 卡尔·格奥尔格·亨利希 (Ho-

ym, Karl Georg Heinrich 1739—1807) —— 反动的普魯士官僚的代表人物之一, 1770 年起任西里西亚事务大臣, 实行兼并波兰的政策。——第 538 頁。

霍布斯, 托馬斯 (Hobbes, Thomas 1588—1679) —— 杰出的英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 대표人物; 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明显的反民主的傾向。——第 130 頁。

霍亨索倫 (Hohenzollern) —— 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霍亨索倫夫人 (Hohenzollern) —— 見伊麗莎白。

霍亨索倫王朝 (Hohenzollern) —— 勃兰登堡选帝侯 (1415—1701), 普魯士国王 (1701—1918) 和德国皇帝 (1871—1918) 的王朝。——第 237、402、410、411、414、428、432、437、440、536—538、571—575、580、588—590、593 頁。

澤特, 奧托·約瑟夫·阿尔諾德 (Saedt, Otto Joseph Arnold 1816—1886) —— 普魯士法官, 1848 年起任科倫檢察官,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控訴人。——第 359—361 頁。

澤泰, 克利斯托夫·威廉·亨利希 (Sethe, Christoph Wilhelm Heinrich 1767—1855) —— 普魯士法官。——第 48、163 頁。

澤肯多尔夫, 奧古斯特·亨利希·爱德华·弗里德里希 (Seckendorff, August Heinrich Eduard Friedrich 1807—1885) —— 男爵, 普魯士法学家, 高級法官; 1849 年为第二議院議員, 屬於中間派。——第 429 頁。

諾伊豪斯, 卡尔 (Neuhaus, Karl 1796—1849) —— 瑞士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溫和的自由主義者；1841年任聯邦代表會議議長，1848年為國民院議員。

——第10、73、74、101、211、212頁。

諾特榮克，彼得(Nothjung, Peter 約1823—1866)——科倫工人聯合會會員和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科倫共產黨人案件(1852)的被告人之一；職業是裁縫。

——第695頁。

穆罕默德四世(Mehemed IV)——土耳其國王(1648—1687)。——第332頁。

璞鼎查，亨利(Pottinger, Henry 1789—1856)——英國外交家和軍事活動家；與中國進行鴉片戰爭(1842)時期任英國軍隊的指揮官，1843年任香港總督，後任馬德拉斯總督。——第385頁。

十八畫

魏特林，威廉(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德國工人運動初期的卓越活動家，空想平均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的創始人；職業是裁縫。——第646頁。

魏德邁，約瑟夫(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國和美國工人運動的卓越活動家；1846—1847年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下，轉到科學共產主義立場上，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德國1848—1849年革命的參加者，“新德意志報”的主要編輯之一(1849—1850)；革命失敗後，流亡美國，站在北方一邊，參加了內戰；為馬克思主義在美國的宣傳奠定了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戰友。——第623頁。

魏茵加特，約翰·奧古斯特(Weingart, Johann August 1797—1878)——瑞士政治活動家，激進主義者，國民院議員(1848—1860)；報紙“湖鄉通報”的發行人。——第212頁。

魏茵哈根，拿破侖(Weinhagen, Napoléon)——克列維(在威斯特伐里亞)的德國律師。——第70、71頁。

薩瓦公爵——見維克多-艾曼努爾二世。

薩拉洛利，鮑洛(Solaroli, Paolo 1796—1877)——1848—1849年與奧軍作戰的皮蒙特軍隊的將軍。——第466頁。

期 刊 索 引

一 画

“1848 年的人民之友。共和重光第一年”
(*L'Ami du Peuple en 1848. An 1-er de la République reconquise*) ——巴黎出版。——第 666 頁。

二 画

“人民报。民主社会共和国的报纸”(Le Peuple. *Journal d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 ——巴黎出版。——第 661、667、668、672 頁。

“人民代表。劳动者日报”(Le Représentant du Peuple. *Journal quotidien des travailleurs*) ——巴黎出版。——第 670、672 頁。

“人民之友。教育人民的文娱性杂志”(Der Volksfreund. *Zeitschrift für Aufklärung und Erheiterung des Volkes*) ——維也納出版。——第 629 頁。

“十字报”(Kreuz-Zeitung) ——見“新普魯士报”。

三 画

“上西里西亚火車头报”(Oberschlesische Locomotive) ——拉提博尔出版。——第 507 頁。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 ——見“科倫工人联合会会刊”。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 ——見“自由、博爱、劳动”。

四 画

“日内瓦評論和瑞士报纸”(Revue de Genève et *Journal Suisse*) ——第 12、41 頁。

“巴門日报”(Barmer Zeitung) ——第 417 頁。

“巴塞尔州人民报”(Basellandschaftliches Volksblatt) ——第 149 頁。

五 画

“东方日报”(Zeitung des Osten) ——波茲南出版。——第 516 頁。

“民主总汇报”(Allgemeine demokratische Zeitung) ——柏林出版。——第 382、383 頁。

“民主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 ——巴黎出版。——第 360、661、663、666 頁。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 ——倫敦出版。——第 360 頁。

“市民、农民和士兵的新科倫报”(Neue Kölnische Zeitung für Bürger, Bauern und Soldaten) ——第 155、623、706 頁。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 ——第 157 頁。

“立宪主义者报”(Constitutionelle Zeitung) ——柏林出版。——第 408 頁。

六 画

- “西里西亚报”(*Schlesische Zeitung*)——布勒斯劳出版。——第356頁。
- “西德意志报”(*Westdeutsche Zeitung*)——科倫出版。——第623頁。
- “自由、劳动”(*Freiheit, Arbeit*)——科倫出版。——第687、688、699頁。
- “自由瑞士人”(*Der Freie Schweizer*)——伯尔尼出版。——第211頁。
- “自由、博爱、劳动”(*Freiheit, Brüderlichkeit, Arbeit*)——科倫出版。——第687、696—698、701、702頁。
- “共和国报”(*La République*)——巴黎出版。——第360頁。
- “全景”(*Der Guckkasten*)——伯尔尼出版。——第211、212頁。
- “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post für Europäische Zustände, öffentliches und soziales Leben Deutschlands*)——紐約出版。——第170頁。
- “协和报”(*La Concordia*)——都灵出版。——第360頁。

七 画

- “伯尔尼报”(*Berner-Zeitung*)——第209—211頁。
- “伯尔尼新聞”(*Berner Intelligenzblatt*)——第209頁。
- “伯尔尼宪法之友”(*Berner Verfassungsfreund*)——第147、210頁。
- “改革报”(*La Réforme*)——巴黎出版。——第360、661—663、666、668頁。
- “改革报。民主派机关刊物”(*Die Reformorgan der demokratischen Partei*)——柏林出版。——第382—384頁。

- “每周通报”(*Wochen- und Adreß-Blatt*)——爱尔福特出版。——第417頁。
- “杜塞尔多夫日报”(*Düsseldorfer Zeitung*)——第68、165、705頁。

八 画

- “国民报”(*Le National*)——巴黎出版。——第52、173、247—249、251、419、421、628、662頁。
-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柏林出版。——第234—236、239、241—245、377、379、417、519、522、562、618頁。
-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見“瑞士国民报”。
- “国民評論”(*Revue nationale*)——巴黎出版。——第52頁。
- “国家报”(*Staats-Zeitung*)——見“普魯士国家总汇报”。
- “国家通报”(*Staats-Anzeiger*)——見“普魯士国家通报”。
-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第147、309、623頁。
- “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 Oberpostamts-Zeitung*)——第373頁。
- “往事述評，或上届政府秘密档案”(*Revue rétrospective ou Archives secrètes du dernier Gouvernement*)——巴黎出版。——第373頁。
- “波罗的海报。波罗的海交易所新聞”(*Ostsee-Zeitung und Börsennachrichten der Ostsee*)——施特廷出版。——第515、516頁。
- “的里雅斯特自由港”(*Triester Freihafen*)——第614頁。
- “罗森堡-克罗茨堡电訊”(*Rosenberg-Kreuzburge Telegraph*)——第416、417頁。

九 画

- “总邮报” (*Oberpostamts-Zeitung*) —— 见“法兰克福总邮报”。
- “科伦日报” (*Kölnische Zeitung*) —— 第 21、27、35、68、131、157、170、214、215、217、253—257、310—315、357、362、365、367、375、376、424、430、454、468、472、507、584、618、624、676、693、708 頁。
-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Zeitung des Arbeiter-Vereines zu Köln*) —— 第 152、153、160 頁。
- “柏林閱报室” (*Berliner Zeitungs-Halle*) —— 第 382 頁。
- “柏林政治和学术問題王国特权报” (*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 —— 第 36 頁。
- “宪法之友” (*Verfassungs-Freund*) —— 见“伯尔尼宪法之友”。
- “独立主义者” (*Der Unabhängige*) —— 伯尔尼出版。——第 212 頁。
- “革命报” (*Die Revolution*) —— 俾尔出版。——第 212 頁。
- “总汇通报” (*Le Moniteur universel*) —— 巴黎出版。——第 20、112、585 頁。
- “政治和文学辯論日报”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 巴黎出版。——第 420—421 頁。
- “洛桑日报。瑞士报纸” (*Gazette de Lausanne et Journal Suisse*) —— 第 75 頁。
- “城乡信使” (*Bote für Stadt und Land*) —— 凱則尔斯劳頓出版。——第 626 頁。
- “持論公正和消息灵通的瑞士信使” (*Der aufrichtige und wohlverfahrene Schweizer*

Bote) —— 阿劳出版。——第 149 頁。

十 画

- “真正的共和国。政治和文学日报” (*La vraie République. Journal quotidien,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 —— 巴黎出版。——第 663 頁。
- “特利尔日报” (*Trier'sche Zeitung*) —— 第 705 頁。
- “議會通訊” (*Parlaments-Correspondenz*) —— 柏林出版。——第 214 頁。
- “紐沙特尔立宪主义者” (*Constitutionnel neuchâtelois*) —— 第 8 頁。

十一 画

- “現代人” (*Il Contemporaneo*) —— 羅馬出版。——第 360 頁。

十二 画

- “普魯士国家通报” (*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 —— 柏林出版。——第 36、96、181、182、343、415 頁。
- “普魯士立法、法学和司法年鉴” (*Jahrbücher für die Preussische Gesetzgebung, Rechtswissenschaft und Rechtsverwaltung*) —— 柏林出版。——第 346 頁。
- “进化。政治性周刊” (*Die Evolution. Ein politisches Wochenblatt*) —— 俾尔出版。——第 212 頁。
- “博爱报。全德工人通訊” (*Die Verbrüderung. Correspondenzblatt aller deutschen Arbeiter*) —— 萊比錫出版。——第 681 頁。
- “湖乡通报” (*Der Seeländer Anzeiger*) —— 伯尔尼出版。——第 212 頁。
- “萊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

- be)——科倫出版。——第373、430頁。
 “联邦海尔維第。政治、工业和文学的报
 紙”(L'Helvétie fédérale. Journal politi-
 que, industriel et littéraire)——伯尔尼
 出版。——第211頁。
 “喧声报”(Le Charivari)——巴黎出版。
 ——第210頁。

十三画

- “瑞士”(La Suisse)——伯尔尼出版。——
 第147、148、210頁。
 “瑞士报”(Schweizer-Zeitung)——伯尔尼
 出版。——第211頁。
 “瑞士信使”(Schweizer Bote)——見“持論
 公正和消息灵通的瑞士信使”。
 “瑞士国民报”(Schweizerische National-
 Zeitung)——巴塞尔出版。——第40、
 149頁。
 “瑞士联邦报”(Schweizerische Bundeszeit-
 ung)——伯尔尼出版。——第210頁。
 “瑞士观察家”(Der Schweizerische Beob-
 achter)——伯尔尼出版。——第209頁。
 “瑞士信使报”(Courrier Suisse)——洛桑
 出版。——第41頁。
 “新聞报”(La Presse)——巴黎出版。——
 第23、630頁。
 “新普魯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
 ——柏林出版。——第5、28—34、36、
 87、214、220、224、229、273、289、306、
 391、392、410—414、427、428、431、437、
 471、585、603、618頁。
 “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Zeitung)——
 第105頁。
 “新萊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
 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科倫出版。——第6、8、13、22—
 24、26、27、34—36、38、39、42、43—48、

50、51、56、57、60—63、69—72、77、84—
 86、88、93、95—97、116、117、146、149、
 150、161、169、170、172、175、180、185、
 192、207、213、214、216、231、233、246、
 250—252、257、261、262、271—275、
 285、306、308、309、315、321、326、327、
 334、342、354—356、358、361、368、369、
 372、374、375、381、384、390、393—396、
 400、406、409、410、415、418、423—425、
 429—431、440、452、457、468、470、472、
 506、508—510、514、515、517、530、533、
 535、536、539、542、543、546、548、551、
 552、558、559、561、563、565、567、568、
 570、575、577、581、583—585、587、595、
 596、599—603、615、618、619、623、630、
 675、678—680、683—686、689—696、
 699、704—708頁。

“新德意志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Deu-
 t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
 623、707頁。

“窩州新聞”(Nowelliste Vaudois)——洛
 桑出版。——第41、210頁。

“奥佩恩区报”(Oppelner Kreisblatt)——
 第232頁。

十四画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見“柏林
 政治和学术問題王国特权报”。

“蜜蜂”(Die Biene)——伯尔尼出版。——
 第210頁。

十五画

“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1847
 —1848在海得尔堡，1848—1850在美
 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157、254
 頁。

“德意志人民报” (*Teutsches Volksblatt*)
——维尔茨堡出版。——第 394、395
頁。

“德意志倫敦报” (*Deutsche Londoner Zei-
tung*)——倫敦出版。——第 691 頁。

“德意志总汇报”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萊比錫出版。——第 382
頁。

“德意志改良报, 立宪德国的政治性报纸”

(*Die Deutsche Reform, politische Zei-
tung für das constitutionelle Deutsch-
land*)——柏林出版。——第 163 頁。

“閱报室” (*Zeitungs-Halle*)——見“柏林閱
报室”。

“黎明报. 政治和文学性报纸” (*L'Alba.
Giornale politico-letterario*)——佛罗倫
薩出版。——第 360 頁。

譯 后 記

本卷中“僱傭劳动与資本”一文及“資產階級和反革命”這一組文章中的第二篇是在“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中譯文的基礎上校訂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匈牙利的斗争”、“‘科倫日报’論馬扎尔人的斗争”、“匈牙利”这几篇文章在譯校过程中参考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关于殖民地及民族問題的論著”一书中的譯文。